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杜鲁门传

(上)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质

杜鲁门传

第一部 中部边地之子

一、蓝河乡村

作为农业区，密苏里州为联邦各州之冠，它的确是农民的王国……

——密苏里州杰克逊县志，1881年

1

1841年春季，约翰·泰勒就任总统期间，一位肯塔基州农民和他红头发的妻子打点起行装，带着他们的两个尚幼的孩子开始向“大西部”跋涉。农民的名字叫所罗门·扬，他妻子叫哈里特·路易莎·扬。他们决定奔赴密苏里州最西部的那片从未见过的陌生土地去试试运气，当时那块地方是美国的“边疆”。

约略20年前，丹尼尔·布恩的儿子丹尼尔·摩根·布恩从密苏里的边境发回几组报告，对那里的“新伊甸园”进行了描述，同时密苏里州于1821年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了联邦，在这些事件的鼓舞下，大批肯塔基人便离开本土，扬氏夫妇亦裹挟在这迁徙的人流中。早期移民中有博格斯家族、戴利家族、阿戴尔家族、麦克洛伊家族、麦克莱兰家族、奇尔斯家族、皮切尔家族和格雷格家族。1827年，他们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独立城，小镇怡然自得地坐落在当时被人们称之为蓝河乡村的杰克逊县的一片高地上。后来同扬氏夫妇一起迁来的人当中有如下一些家族：希克曼、霍姆斯、福特、达文波特、麦克弗森、曼、诺兰德、诺兰、弗里曼、杜鲁门、皮科克、香克、华莱士和惠塞特，共有几百人。

他们几乎都是农夫，举止谈吐质朴无华，没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大字不识几个，甚至目不识丁。然而他们也并非像有时被人描绘的那样穷途潦倒，只是按后来的物质标准衡量，他们方够得上贫穷。尽管没人够得上富有，但有些人却来自殷实的家庭，红头发的哈里特·路易莎就是其一。她告别了那幢坐落在肯塔基州的镶着壁纸和有凸边的木制希腊风格的大房子，房主是她哥哥兼保护人威廉·格雷格，他拥有大批奴隶和绵延数百英亩的土地。

这些迁徙者的大多数都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他们是浸礼会教徒和民主党人，同托马斯·杰斐逊一样，他们也认为在大地上辛勤劳作的人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自视为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偶像是田纳西州的“老核桃树”安德鲁·杰克逊，那个“具有一往无前勇气”的杰克逊，那个与他们一样同属于苏格兰和爱尔兰后裔、第一位来自于阿里甘尼斯山脉以西地区的美国总统。杰克逊县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他们也会似他那样粗犷、勇敢、率直、易怒、偏狭、目光短浅、好发脾气和与人争吵；此外还有固执。古老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祷词中便有这样一句：“主啊，赐我永远正确，因为你知道我绝不会轻易转变。”

迁徙者携带着《圣经》、农具、猎枪、烈性玉米威士忌以及黑奴，他们还带来了在肯塔基生成的对纳税、罗马天主教及东部生活方式的固执的厌恶心理。他们所信赖的唯有上帝和常识。他们和他们的祖辈之所以能在边远落后的肯塔基州以及更早时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高地幸存下来，主要依赖于如他们所说的“良好和实实在在的感觉和永无休止的劳作”。

这是一群劳动者和孤独者，具有极强的独立意识，而且对同类绝对忠诚。他们还多子多孙，并为此而骄傲。根据记载，第一个在杰克逊县大草原上破

土耕作的人是大卫·戴利，他西迁时携带着妻子和 12 个儿子；克里斯托夫·曼是戴利那代人中活得最长的，他和妻子贝茜生了 17 个子女，尔后在第二次婚姻中又生了 8 个（许多年后，在他 87 岁高龄时，这位颇令人怀念的杰克逊县的拓荒者声称他的牙从没有一颗是烂掉的，而且还可以憋气 1 分半钟）。这些人崇尚大家庭，也生长自大家庭。子孙是民族的财富，亦是农夫的财富。泰勒总统本人有 7 个子女，54 岁时他妻子去世，他再度结婚，又生了 7 子，所以总共是 15 个孩子，破了总统记录。

所罗门·扬有 10 个兄弟姊妹，他妻子哈里特·路易莎有 12 个兄弟姊妹，他俩来自位于路易斯维尔以东的肯塔基谢尔比县。拥有 10 个孩子的寡妇南希·泰勒·霍姆斯是他们的同乡，她的儿子们在杰克逊县立住脚后，她也于三四年后的 1845 年西行前往密苏里州。她随身带着一大口袋茶砖和装在一只皮革帽盒里的她死去丈夫的一顶海狸帽。与她同行的有几名奴隶和她两个最年轻的女儿，其中之一的玛丽·简·霍姆斯正偷偷思恋着家乡谢尔比县的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名叫安德森·杜鲁门，有 11 个兄弟姐妹。

我们无从知道当时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是否认识霍姆斯或杜鲁门家族中的人，因为没有任何记载。

几乎所有西行的人都采用了相同的方式，乘汽轮穿越荒野，而不是靠大车或骑马。路线是从路易斯维尔出发沿透迤的俄亥俄河而下，路过汉德森和帕杜卡到达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的凯罗，再沿密西西比河而上至圣路易斯。在圣路易斯他们换船，沿被戏称为“浊泥河”的密苏里河西行，逆着暗流航行 457 英里，直至河流急剧转弯的地方停泊。此地有两处破烂不堪、满地泥泞的小居民点——韦恩城和西港，他们可在任何一处登岸，此时离边疆唯一重要的城镇独立城只隔几英里之遥。

由于有“可怕的暗流”与他们作梗，所以需在密苏里河上航行一周。吃水不深的汽轮往往负载过重，河水通常可漫上船舷的上缘。甲板上挤满了大车、货物、烧发动机的成捆的木柴、骡子、马匹、成摞的马鞍和挽具等，乘客只剩下立锥之地（当年一艘两侧有轮翼的汽轮沉入河底，100 年后才被打捞上来，它上面装载的货物包罗万象，有斧把儿、猎枪、学校用的书写石板、门把儿、鲸油灯、黄蜡烛、2500 双皮鞋和靴子以及打算和印第安人做买卖的几千粒色泽鲜艳的珠子和纽扣），日复一日，繁茂荫翳的树林缓缓从岸边滑过，偶尔才显露出一片空旷的草地或一小块居民地，几个孤独的人影站在树墩上向船只摆动着手臂。有些树高高越过河堤，向河面伸出 6 英尺远。夏日的清晨，从枝叶间透向水面的斑驳晨曦充满神奇的魅力。

乔治·凯莱布·宾厄姆创作的伟大的密苏里河图描绘的就是这个年代。宾厄姆所画的那条河即是迁徙者之路。比如他的那幅《密苏里河船夫》，画面上一只汽轮从充满阳光的晨雾中远远驶来，它很可能就是“拉德纳”号、“亨利·布赖”号或是“威诺纳”号；总之，是运载肯塔基迁徙者的 20 来只河轮中的一艘。

圣路易斯以西唯一一处显著的文明之物是杰斐逊城中坐落在一个峭壁之上的州议会，它是一幢白色的“结构十分坚实”的石灰石建筑。里面展示着一幅汤姆斯·哈特·本顿参议员的全身画像，此人是密苏里州主张向西部扩张的积极倡导者。这幅画据说价值 1000 美元，这在当时是个闻所未闻的数字。

迁居者除了来自肯塔基州的之外，还有的来自弗吉尼亚、北、南卡罗来

纳和田纳西州。他们同肯塔基人一道使这次迁徙成为一场主要是限于南方的运动，而且犹如南希·泰勒·霍姆斯那样，是一次无数奴隶主的迁移。所罗门·扬可能也带去了奴隶。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知道他有三四个奴隶——一个厨子、一个女佣和一两个佃农——迁往杰克逊县的人大体都有这么多数量的奴隶。移居者是农民，不是棉花种植园主，对大多数人来说，拥有奴隶是兴旺和社会地位高的标志。迁往未开发的边远地带的黑人男女及儿童的累计数量是十分可观的。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名叫杰贝兹·史密斯的奴隶贩子在独立城附近从事贩卖奴隶的生意，据载他竟令人不可思议地贩运了 200 多名奴隶。

白人、黑人、老人、少年与令人厌烦的牧师及打牌作弊的人一道挤在驶往上游的汽轮上，他们中间间或还夹杂着个别面色苍白因健康原因西去的东部人。旧的刊物里还谈到穿军服的前往莱温沃思要塞的士兵、披着毯子的堪萨斯印第安人，法国皮货商以及留长发穿扎眼鹿皮的拓荒者，可谓各色人物具备，服饰五彩缤纷。传说南希·泰勒·霍姆斯戴了顶白色花边帽，从而遮住了她头上的一块丑陋的伤疤。在她孩提时，一次肯塔基州的肖尼人发起暴动，她装死躺在地上，肖尼人割她头皮时她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因而捡了一条命。抛开此说的真伪不论，她的后人却以为这反映出了他们家族的勇敢精神。

幸存者往往津津乐道于一起寻欢作乐的伙伴、蛮荒的景致和作为直接及全部人类经验的“历史”。著名的开拓者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上尉 1842 年来到密苏里河上，开始他前往落基山脉的首次探险旅行。（一位探险者将弗里蒙特一伙人描绘成“体魄健壮、滑稽可笑和绝不墨守成规……与赞美诗唱诗班的歌手及贵格会教徒大相径庭，这帮人只要高兴，就吃喝聊唱，摸纸牌，抽雪茄，而且他们总是处于欢乐之中”。）翌年，即 1843 年，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也来了。1846 年夏季，波士顿的一位年轻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仁立在“拉德纳”号的船舷边，被密苏里河一望无际的褐色河水、险恶的暗礁和流动的沙洲所震惊。后来他把那次旅行精彩地记录在一本名为《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小道》的书中。他在书中写道：“密苏里河永无休止地变换着航道，一忽儿吞噬掉这边的堤坝，一忽儿又在另一边形成一道新的堤坝。它的流向变化无穷。岛屿出现了又被冲刷掉，一边岸上的古老森林被瓦解冲走，稚嫩的枝干又在另一端的新土壤上破土而出。”他又说：“稠密的似军事鹿砦般的槁死折断的树干坚固地扎根在沙滩上，枝杈指向河面，随时会把涨潮时穿越它们的倒霉汽轮刺穿，这一景致令人不寒而栗。”独立城附近的登陆地点被贴切地描绘成一块“荒漠和险峻的地方”。

也是在 1846 年夏天，安德森·杜鲁门告别了肯塔基，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是骑马而行的，这是有关安德森·杜鲁门的几桩不同寻常事体的记载之一。也许他买不起船票。

对于这位杜鲁门家第一个赴杰克逊县定居的人可谈及的不多。他的全名是安德森·希普·杜鲁门。他的祖上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据人们记忆所及都是农民。他的父亲威廉·杜鲁门大约于 1800 年从弗吉尼亚来到肯塔基，而且据说在 1812 年的战争中服过兵役。安迪（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在杜鲁门农庄长大，杜鲁门农庄坐落在肯塔基州一个不大的名叫克里斯琴伯格的交叉路口村庄附近。他矮小温和，少言寡语，而立之年却尚无所作为的指望。然而小他 5 岁的玛丽·简·霍姆斯却对他了解甚深，决定违拗母愿执

意嫁他。她以探望一位已婚的姐姐为借口，于那年初夏返回肯塔基，一俟到那儿她就公开表白了她的意愿。

她性情厉害的母亲南希·泰勒·霍姆斯大吃一惊，于1846年7月24日从密苏里给玛丽·简写了封信，道及了她的心情——信是由她口述，她另一个女儿执笔的，这说明南希·泰勒·霍姆斯可能一直是文盲，得知这一消息后，南希便寝食不安。“玛丽，难道你是我女儿中第一个不听我劝告的人吗？”安德鲁·杜鲁门为何如此无法接受不得而知，后来所能找到的一个解释是南希认为玛丽·简是“屈尊出嫁”，因为杜鲁门家不占有奴隶。

婚礼于8月中旬在已婚的那位姐姐家举行，这是幢漂亮的饰面呈白色的红砖房，至今还矗立着。之后，玛丽·简的“杜鲁门先生”（她总是这样称呼他）便骑马奔赴密苏里的“荒凉乡村”，希冀一俟得到他新岳母的祝福就返回故里。

他从密苏里发出的第一封信一个月后到达玛丽·简的手里。令他惊奇的是，他竟大受欢迎，玛丽的母亲和姐妹们抱他亲他，人人都悲喜交集。他们劝他留下来过边地的生活。他在信中对玛丽说，只要能和她在一起，他无论在哪儿都幸福，即使在密苏里也一样。“对我来说只要你能来这儿，我就会感到满足……我想只要你乐意，我可以在此生活。”

玛丽乘汽轮来到密苏里，她得到了母亲的祝福和一份婚礼——霍姆斯家一名叫汉纳的女奴和她的孩子，于是这对年轻夫妇从当地一位名流那里租下一个农庄，定居下来。这位名流叫约翰·莱金斯，是个浸礼会传教士（牧师兼医生），他去边地的最初意图是想拯救印第安人的灵魂，但后来转做土地投机生意。他和其他一些人正在密苏里河的大弯曲处，即堪萨斯河和密苏里河的交汇点宵衣旰食地创建一座新城镇，并野心勃勃地打算将其冠以堪萨斯城的大名。在这些人眼里，城镇和贸易就是未来。他们大谈地理位置的优势，这对每一个看地图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这里就是通向下游的圣路易斯、新奥尔良、路易斯维尔或匹兹堡的伟大的“自然公路”密苏里河。在上游，越过大弯曲处，则伸展着全部大西北和无穷尽的机遇。

这里还是通往加州圣菲和俄勒冈州的陆路起点，这亦十分重要。杰克逊县是通向整个第二美国的门槛和起跑线，那里的干枯草原一直延伸至落基山脉。杰克逊县的乔赛亚·格雷格于184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草原贸易》的书，它是一部通往圣菲小道的指南。作者把独立城描绘成通向“浩森草原海洋”的启航港。

实际上，被称做“小道城皇后”的独立城是美国西部的第一座繁华之镇，对于经过长途河上旅途的新来乍到者，这里仿佛是商店、铁匠铺、牛车作坊林立的大都市，街道拥挤，熙攘喧闹。前往俄勒冈州的大车队中传出的牛鞭声像枪声似地响彻云霄。来自圣菲的由牛车和驮骡组成的墨西哥商队络绎不绝，他们将用大把大把的墨西哥金币买走美国人的产品。所罗门·扬一家抵达杰克逊县的那年春天，一支由22辆牛车组成的从圣菲来的商队据说用金币买走了价值20万美元的货物。独立城像海港城镇一样也有一个海关。

弗朗西斯·帕克曼说：“骡马和牛车触目皆是，店铺四周到处站着一群群相貌强悍的汉子，田地里星罗棋布停放着从圣菲来的移民大车……有些牛车上载着一大家的孩子，从遮布底下往外窥视着”。

19世纪40年代，独立城的固定人口大约仅有700人，但在春季的任何一天，杰克逊广场里和四周都汇集着二三千人，广场中心矗立着漂亮的红砖

砌成的县政府大楼，大门上是一个扇形气窗。广场周围有几座公共建筑物，其中最大和最有名的是二层楼的“诺兰屋”，它被誉为美国最西部的旅舍，只要客人不在意两三人共挤一张床，它可以容纳400人。附近的牛车作坊是“海洋草原”的“船坞”，据说在那里制作的大车可以经受住穿越大草原的任何严酷磨损。作坊主是一个叫海勒姆·扬的自由黑人，此人充满魄力，同别的从事为移民提供吃穿住行当的人一样收入颇丰。

然而肯培基人来此地还是为了土地——杰克逊县那绵延起伏一望无垠的高地沃野。这里春天天气晴朗，两条较大的河流从堪萨斯准州流淌而来，即小蓝河和蓝河。所有必需的资源就在脚下——石灰石场、美丽的酷似肯塔基州的蓝草牧场以及河流岸边的茂密林木。过去的一份资料记载：“居住在一个长着不熟悉的林木的地方是不可思议的，肯塔基人将无法忍受在远离他们所习惯的森林的地方建立新居。”杰克逊的山核桃、按树、榆树、梧桐、柳树、杨树、三角叶杨和橡树每种树均有三四个品种。最受喜爱的胡桃树遍地都是，谷仓和房屋都是用这种木材建造的。

这里的土地大幅度起伏，绵亘无际，美不胜收。草原的草“又高又绿”，处处生长着各种各样散发着芬芳的野花和药草，其中有牧地玫瑰、龟头花、蛇根草、西方雪果和银莲花。独立城以南10英里外依旧是绿色如茵的草原。

用犁翻掘土地需要6至8对同轭牛，马匹无法胜任。土壤表层的下面便是黑黝黝的足有2至6英尺厚的沃土。有些河床下面的沃土可深达20英尺。写指南一书的作者乔赛亚·格雷格在看到从密苏里河至格兰德河这一地区后，声称“独立城周围美丽肥沃的高地完全可以被称作美国西部地区的‘花园区’”。

大部分上乘的土地已经被耕作。此外，10年前这片“花园区”已成为被温和地称之为“摩门问题”的发源地，土地争夺异常激烈。1831年，即独立城诞生后的若干年，近代耶稣基督教会的一小批先遣教徒来到此地，当地居民最初只把他们看作一群无恶意的狂热者。然而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置地，在蓝河边建起了一个拓居地和一处摆渡口，在独立城开了杂货店并主办了全镇第一家报纸。有些人甚至发表言论反对奴隶制。没过多久人们就感到受到了他们的威胁，诋毁他们是“东部的渣滓”，邪恶和寡廉鲜耻，受的教育比“我们的黑人强不到哪去”。这些教徒把边界那边居住在堪萨斯地界的印第安人称作以色列的同胞部落，这在许多倔强的老拓荒者看来几乎近于发疯。

更可怕的是他们表白了想成为整个地区主人的意图。他们的先知和带头人约瑟夫·史密斯宣布杰克逊县为圣土，指命独立城为他们的天国之城。1833年夏季，教徒们似乎要控制秋季的选举，因为他们的人数已约占全县人口的1/3，超过了1000人。于是在县政府大楼召开了群众集会。人们发表了愤怒的言论，正式宣布摩门教徒不再受欢迎。

暴力接踵而至。一群乌合之众砸烂了摩门教徒的印刷厂，一个摩门主教浑身被涂上柏油并粘上羽毛。在万圣节之夜，一群人全副武装骑马袭击了蓝河边的摩门教徒拓居地，将妇女和儿童驱逐出家门。他们的举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自认为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庄稼和谷仓被烧毁，男人们被拖到田地里施以鞭挞。杰克逊县处于“可怕的骚动之中”。在另一次冲突中，3人被杀死。

11月12日夜晚，天空出现了一场密苏里边地从未见过的流星雨奇观，

许多人认为这是将摩门教徒彻底驱逐出那片土地的征兆。1000 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渡过密苏里河，被赶到北边人烟稀少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只是此刻他们开始奋起反抗。密苏里州长利尔伯恩·w·鲍格斯——他是独立城的一位店老板——聚集了民兵，宣布为了公众的利益，所有摩门教徒都必须离开密苏里州，否则将被“剿灭”。一场宗教战争，亦即密苏里州的第一次内战爆发了，直至摩门教徒 1839 年离开那里前往伊利诺伊时方告结束。

所罗门·扬和他的小家庭于 1841 年抵达时，上述事件已成为明日黄花。然而就在翌年的 1842 年，一名大概是摩门教徒的杀手孑然一身来到独立城，他爬进窗户，朝利尔伯恩·w·鲍格斯开了一枪，险些要了他的命。虽然蓝河区受尽大自然的厚待，它却绝不是一个和平的王国。

新移民还很快就意识到，密苏里的自然气候并不总是温和宜人。冬天很寒冷，整个地区压抑沉闷，阴暗的天气可长达数周，气温寒峭刺骨。若干年后，一个农民在日记中道出了杰克逊几代人的感受：

冷极了；我今天没干活，太冷了；这是今年最冷的一天；
躺在床上也冷；阴云密布北风呼啸；我浑身打战；风又大又冷；今天早上特别冷……冷得干不了活；人人都冻得躲在家里，没人出门，我冷极了……

那里的气候变化无常，甚至在一天中都是如此。几小时之内温度的升降可相差 50 度。夏天要么极干燥，要么极潮湿，但永远是火辣辣的炎热。1844 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龙卷风接踵而至，树木篱笆拔地而起，许多人在灾难中丧生。

然而谁也没指望边地的生活会一帆风顺，这一点农民们更明白。

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先在一座叫帕里什的农庄定居下来，这个农庄离密苏里河不远，坐落在堪萨斯城轮廓线以内。后来在 1844 年，可能是由于洪水的缘故，他们第一次提出要在远离蓝河的一片高地购买公地的要求。他们购置的地名叫蓝岭，约在独立城以南 16 英里的地方，位于希克曼磨坊拓居地附近。这是一块肥沃不涝的高地，适宜种植玉米和小米，也是放牧的理想场所。地面一马平川，一直可以望到堪萨斯准州，可与县中任何一块高地媲美。

他们按照土地法的最低要求，在蓝岭买了 80 英亩土地，所罗门·扬付的是公地的最低价格，每英亩 1.25 美元。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扬必须在这块土地上住上一段时间，于是他和哈里特·路易莎如何拿着“一杆枪、一把斧头、一条地毯和抱着两个孩子”前往蓝岭定居的故事便一代代相传下来。他们的孙子辈后来听哈里特·路易莎讲述了所罗门骑马去 70 英里外的位于克林顿的土地办公室申请购买土地的经过，以及她如何好几个晚上只与两个孩子守在由栅栏和灌木丛围成的陋室里等待着。那两个孩子叫苏珊·玛丽和威廉姆，当时虽已不再是婴儿，但还很小。

后来家庭添了人口，所罗门的产业也积少成多。他们相继又生了 6 个孩子：萨拉·安、哈里森、伊丽莎白、劳拉·简、马莎·埃伦和艾达。他们同时还购置了更多的土地，造起了房子和谷仓，在蓝岭扎下了根儿。所罗门时常经济拮据，若不是精神乐观怕是早被压垮。然而他在那一带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一流农夫和牧场工，遂于后来发迹。他会鉴赏马匹和骡子，熟稔土壤，

一有机会就买下牲畜和土地，再转手卖掉。久而久之，他创立了一家跨草原运输企业并占有了大量土地，按照杰克逊县的标准，他的产业不啻为一座小王国。从各方面讲，所罗门·扬都很出类拔萃，与他和哈里特·路易莎的传说相比，安德森或玛丽·简·杜鲁门简直是默默无闻。

所罗门·扬于 1815 年生在辛普森维尔镇附近的肯塔基州的谢尔比县，当年正值安德鲁·杰克逊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大获全胜。所罗门赴密苏里时是 26 岁。他父亲雅各布·扬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他母亲雷恰尔·古德奈特·扬在他 12 岁那年作古。他父亲再婚后搬走了，撇下所罗门自谋生路，于是他靠称猪和做牲畜买卖勉强糊口。成年的所罗门又高又壮，自立能力很强，他精力充沛，口才无双，侃大山使所罗门感到乐趣无穷，哈里特·路易莎则是少言寡语。

所罗门同大多数离开肯塔基的人不一样，既不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合血统的后裔，也不是浸礼会基督徒，而是德国人的后裔（在北卡罗来纳扬 Young 这个名字拼作荣格 Jung），并且是个有名无实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对那些大肆渲染宗教的牧师和其他人持怀疑态度，他常说每当他听到有人大声的祈祷，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跑回家把鱼肉熏制屋的门锁上。政治对他毫无吸引力。

所罗门于 1838 年 1 月的第 2 周与哈里特·路易莎·格雷格结婚。哈里特·路易莎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合血统的后裔，她的族人是肯塔基州最早和最大的浸礼会会众的热心成员，他们称作“长远”的浸礼会教堂建在辛普森维尔，那块地方的所有权曾属于亚伯拉罕·林肯的祖父亚伯拉罕·林肯上尉。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 1839 年，第二个孩子生于两年以后，即她和所罗门西行的春季，这说明她在密苏里河的乘船途中正照管着婴儿。哈里特·路易莎拥有一头浓密的红发，她以性格稳健著称，对于当时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她都没有抱怨和失去过信心。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是个坚强的女人……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事情吓倒”。她最后一次生产是 1856 年，但婴儿没能活下来。她当时已近 40 岁，按照那时的标准早已人过中年，但对于她来说，漫长和经历丰富的人生还未走完一半。

所罗门曾数次指挥大车队西行，留下哈里特·路易莎操持一切家务。但他首次西行的确切时间却无人知晓。人们所知的只是他在内战前曾去过几次，最早的一次约在 1846 年，那一年发生了墨西哥战争、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向大盐湖城做长途跋涉以及安德森·杜鲁门抵达独立城，因而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年份。远程西行在规模上堪称是壮举。陆路车队通常由 40 至 80 辆大型罩着帆布的运货中车组成，每一辆都需配备 6 对同轭牛或骡子以及两个赶年人。一辆车的长度为 90 至 100 英尺。当时的做法是车与车之间的间距约为 100 英尺，因而有些车队可在大草原上绵延 3 英里。为了掌握方位，所罗门像位船长似地携带着一副铜制望远镜。

所载货物价值可观，可相当于 3 万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利润亦相当可观。所罗门似乎干得蛮不错，当时在人口普查时，他已把自己称作运输商。1850 年，他所记录在案的财产是 5000 美元，10 年后，他的财富翻了 10 倍。38 岁时他已够得上一位富翁，土地和财产的价值约达 5 万美元。据说他拥有 5000 英亩土地，马匹都是价格昂贵的纯种马，餐桌上摆着货真价实的银餐具。

走圣菲小道须从独立城出来后先向南行驶，然后再向西越过蓝河，所以

它距所罗门的农庄只有几英里。所罗门通常是春天上路。他出发时留着大胡子，戴一顶阔边帽，那人高马大的样子定是威武雄壮。他的家人送他时所留下的记忆便是一个“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男人的形象。一次他赶着 1500 头牛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州。旅途整整用去一年的时间，半途还失去了 500 头牛，然而他历经艰难险阻，横跨半个大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在萨克拉门托他用剩下的牛换了一个占地 4 万英亩地的大牧场。但据说为了替一位合伙人还债，他又把牧场卖掉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朋友还债、与朋友休戚与共的人。他举世无双的口才给他的子女留下了许多故事，他的子女们又把这些故事代代相传下来。

1860 年，所罗门驾驶着 40 辆大车前往犹他州，车上载着为部队提供的货物和咸猪肉。他到盐湖城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大车一对一对地排在一起（1860 年 8 月 16 日版的《德塞莱特新闻》撰文说），一辆在前，一辆在后，每对都载有约 6000 磅重的货物，由 6 对牛拉着。……扬先生的看法是：将两辆大车组成一对儿是将货物运往这一地区的最经济的方法。……扬先生的牛看上去非常好，据说他在路上没有因事故或其他原因失去一头牛。

当盐湖城的负责军官出于某种原因拒绝接受货物时，所罗门找到了布里格姆·扬，后者虽与所罗门不沾亲，却也是共济会成员。他说若所罗门能贷款给他，就答应收下全部货物。成交的结果使双方都很满意。

此时，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前往俄勒冈州和圣菲，所罗门为他们提供咨询和旅途设备，这方面的生意也做得红火。1849 年至 1850 年是加州淘金热和人们往来于独立城人数最多的年头，然而这座小镇如日中天的阶段却即将逝去，因为大量的人潮亦带来了病毒性霍乱。1849 年，“诺兰屋”一天就有 10 人死亡。1851 年霍乱再度流行。1854 年，由于 7 月至 11 月干旱无雨，全县都没有收获到庄稼。以后的几年一直传播着猩红热、肺炎和霍乱。1857 年春天，扬氏夫妇失去了 9 岁的孩子伊丽莎白，她的死因没有记载。

与此同时，在堪萨斯一带，长期存在的奴隶制问题逐渐酝酿成一场可怕的风暴，它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杰克逊县几乎所有人的生命和观念产生影响。

2

对于居住在密苏里西部的许多人来说，南北战争并非发生在攻打南卡罗来纳州萨姆待尔要塞的 1861 年，而是开始于 1854 年，当时国会通过了重要的堪萨斯—内华达法，让堪萨斯和内华达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是否应允许蓄奴。密苏里在 1820 至 1821 年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后以蓄奴州加入了联邦，国会的另一个妙想是同时让联邦吸收了自由州缅因，并禁止在密苏里南部边界，即北纬 36° 30' 以北蓄奴。此时过去的密苏里妥协案规定的界线已不复存在。旨在缓解紧张局势的新法案正好具有相反的效果。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散布在密苏里西部边界的比例失调的奴隶人口——此处大约有 5 万奴隶，几乎是密苏里州所有奴隶的一半。仅杰克逊县就有 3000 多名奴隶，而已他们的主子无论对联邦持何种态度，都十分惧怕自由区近在咫尺，因为奴隶容易逃跑，武装的奴隶解放者也会闯入境内。在奴隶主眼里，

奴隶除了对其生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也常常是他最宝贵的财产。随着爆发战争可能性的增大，每个奴隶的金钱价值也在稳步地提高，贵到一个健康的男性奴隶可卖到 3000 美元，相当于 500 英亩优质土地。

其他地区的人们认为堪萨斯是解决问题的焦点。纽约州参议员威廉 H·西沃德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说：“来吧，奴隶州的先生们……我们将为堪萨斯的处女地而展开竞争，上帝将把胜利奉献给在数量和道义上都强大的一方。”似乎是为了回敬他的话，几千名支持奴隶制的密苏里人——他们的一位领导人说，“这么些人足以杀死堪萨斯准州所有该死的废奴分子”——携带着枪支和威士忌席卷过边界，企图帮助堪萨斯选举出一个支持奴隶制的立法机构。

数量上更多的废奴主义者立即作出反应从东部赶来，这股新的移民潮使处于动乱中的小堪萨斯城获利匪浅。当全副武装的支持奴隶制的“游击队员”企图以恐吓河上船只的方式切断密苏里河的航道时，废奴主义者便经衣阿华走陆路穿越过去。

摊牌时间显然在逼近。1856 年 5 月 22 日，善于骑马的密苏里“边界暴徒”袭击了废奴主义者在堪萨斯的据点劳伦斯镇。两天后，一位相貌粗野奇特的老头认为“解决事端”的时机已到。此人是新到堪萨斯的定居者，名叫约翰·布朗。他和他的几个儿子手执磨得异常锋利的大砍刀，天黑后袭击了坐落在波塔瓦脱密湾旁边的 3 个与世隔绝的小木屋。他们把与袭击劳伦斯镇毫无关联的赞同奴隶制的 5 名堪萨斯男人和孩子剁成了肉酱。约翰·布朗声称：“这是上帝的旨意。”

废奴分子们在下一轮选举中刚刚在堪萨斯立住了阵脚，堪萨斯的骑兵们便越过边界线冲向密苏里，开始了他们的纵火和杀戮。南北战争在东部爆发前的若干年，这场可怕的边界战——它是不折不扣的内战——便沿着密苏里和堪萨斯的交界处全面展开，直至在阿波马陶克斯的投降方偃旗息鼓。成群结队的土匪骑兵在陆地上恣肆妄为，其恐怖程度可与中世纪相比。这些人随时都会从天而降，领头的其实都是些恶棍，有的还精神失常。其中有身材短小的詹尼森“博士”，他率领的一帮堪萨斯亡命之徒被叫作废奴派游击队员或红腿子（因为他们都穿红色革制护胫）；还有密苏里游击队中的“冷血比尔”，他姓安德森，嗜好肢解他的受害者。这是一场充满劫掠、偷袭和永无休止的复仇的战争。每个人的生命都危如累卵，毫无防守能力的城镇被焚毁，密苏里的奥斯奥拉和堪萨斯的肖尼镇都彻底从地图上消失了。

美国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未意识到其恐怖的程度。多数人也始终没明白大部分密苏里人——包括像所罗门·扬那样的奴隶主——是一直忠于联邦的，而且他们与臭名昭著的游击队员毫无相似之处。人们普遍认为西部密苏里人的形象是一群手执枪支、大杯大杯灌威士忌酒的群氓，这一看法与认为堪萨斯人个个都是正派的新英格废奴主义者的化身一样不准确。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受害最深的是平民百姓。正像一位堪萨斯人后来所说的：“魔鬼来到了边界，喜欢上了那儿，就留了下来。”

杰克逊县成了“大火焚毁的地区”。废奴派游击队员詹尼森“博士”第一次洗劫该县时，家住李兹萨米特镇的亨利·扬格法官眼看着自己的农庄被烧毁，尽管扬格是一名联邦派。后来他遭到残忍地杀害，这促成了他血性方刚的儿子科尔曼投奔了声名远扬的密苏里游击队头目威廉·匡特里尔。

一位叫李的杰克逊县医生因为他的儿子们参加了南方联盟军而被无情地

枪杀。农民约翰·哈根星期天乘大车与家人外出郊游时被联邦骑兵截住。骑兵命令他从火车上下来，把他带进树林里，无缘无故地朝他头部开了一枪。那位多子多孙、能憋气1分半钟的老一辈肯塔基拓荒者克里斯托弗·曼被密苏里游击队用枪口顶着，眼睁睁看着他的农庄被烧毁。“他们问我是不是废奴分子，我对他们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先生！’一个游击队员就用左轮手枪打我，敲掉了我两颗牙。”

第一次独立城之战发生在1862年8月11日破晓前，匡特里尔率领着一伙乌合之众呐喊着冲进广场，一支穿制服的南方联盟军歼灭了一个熟睡中的联邦军营。两年后在那里进行的第二次战斗是一场激烈的巷战，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天，最后依然以南方联盟军获胜而结束。

最令人发指和不可饶恕的暴行是匡特里尔导演的劳伦斯大屠杀。匡特里尔可鄙、胆大、足智多谋，经常出没于杰克逊县，躲藏在弯曲的蓝河岸边低地的茂密灌木丛中。在大多数奴隶主的心目中，匡特里尔是条好汉，多年后在杰克逊人的记忆中，他是战争中唯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仿佛他是造物主派下来的古老南部豪侠气概的化身。其实他出生在俄亥俄，而且在残杀开始之前他从未对南方表示过同情并接受过他们的信仰。

1863年8月21日凌晨，天空刚刚泛出鱼肚白时，一支近500人骑着马的队伍擎着一杆黑绸大旗，在匡特里尔的率领下袭击了堪萨斯的劳伦斯。当时大多数人仍沉浸在睡梦中。匡特里尔命令杀死所有能拿得动枪的男人并把全镇烧毁。事后至少有150名男人和男孩被杀戮。天空晴朗宁静，从几里外都可望见滚滚浓烟从焚毁的城镇升向天空。

杰克逊县不少人与游击队员都有亲属关系，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也不例外。他们的三女儿萨拉·安嫁给了一个叫詹姆斯·丁·奇利斯的人。此人声名狼藉，人们都叫他吉姆·克罗·奇利斯。他是边地生活的害群之马，是后来扬氏和杜鲁门联姻家族的耻辱。

他年幼时热衷于一种流行的叫作“吉姆克罗的群舞”，所以得了个“吉姆·克罗”的绰号。他出生在早期在杰克逊县拓荒的一个大土地所有主的家庭里，所以开始时得到扬氏夫妇的好感。然而在1857年，吉姆·克罗在诺兰旅舍的酒吧里杀死了一个人，死者是个陌生人，只是觉得吉姆的吃相不雅说了他几句。（此事发生后不久另一位与吉姆·克罗一起前往圣菲的人回忆说，他平时还算随和，甚至谈笑风声，“但却喜怒无常，一旦发起脾气来，是个什么都能干出来的人物”。）1859年，他在独立城县政府大楼受到审判，但陪审团的判决受到有名望的奇利斯家族的左右，将其释放，紧接着他就与萨拉（或叫萨莉）结为秦晋。萨拉当时16岁，吉姆·克罗则是个“打扮入时的小伙子”，以一双黝黑的眼睛和“强健匀称的身材”著称。战争伊始，吉姆·克罗就步匡特里尔和黑心比尔·安德森的后尘，立即显示出他也热衷于杀戮的嗜好。堪萨斯的一家报纸在他命归黄泉时这样写道：“他总是暴露出最残忍的非人性的特征。”比如他积极参与了在小蓝河逮捕联邦上尉丹尼尔·H·戴维的行动，尔后像约翰·布朗那样将戴维和他手下人用乱刀砍死。

在当时激变的无情历史面前，扬氏家族同其他边地的人一样亦被卷入漩涡之中，他们所讲述的关于烧杀劫掠的故事代代相传，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件被重叠在一起，有些细节漏掉了或变得比真正发生的更为生动，这完全取决于讲故事的人以及讲述的时间和对象。譬如狂热的“堪萨斯残暴首领”吉姆·莱恩是何时洗劫扬氏农场的就很模糊，一种说法是1861年夏天；当莱

恩途经密苏里去烧毁奥斯奥拉的时候，即劳伦斯大屠杀两年之前；另一种说法要早一些，即战争刚刚正式爆发的 1861 年春天。但莱恩确实来过这里，而所罗门当时正远离家门进行长途跋涉却是毋庸置疑的（所罗门可能认为他既然公开宣称支持联邦政府，他的家就不会罹难）。他们的大儿子威尔·扬当时也不在——他加入了南方联盟军——所以家中只有哈里特·路易莎和孩子们。这场战争出现了不少奇异的人面兽心的魔鬼，最奇特和最骇人的恐怕是詹姆斯·亨利·莱恩。此人高挑身材，相貌憔悴，长着一张瘦长尖削面带菜色的脸；一口烂牙，嗓音怪异刺耳，即使穿着军装也是一副邋遢样子。然而他口才迷人，是个狂热的政治投机家。他一夜之间就变成一名咄咄逼人的共和党员，因此新成立的堪萨斯州最初当选的两名参议员中就有他一个。战争前夕他到达华盛顿，组织起一支边地卫队保护亚伯拉罕·林肯；一连几夜，他和手下人实际就住在总统府的东屋里。他在密苏里以“搜刮”战士而闻名遐迩，意思是凡是沾他手的东西他一律抢走，如食品、饲料、金线、丝绸衣料、家用银具，钢琴有时也抬走不误。人人都知道吉姆·莱恩，在密苏里一带对他侧目而视，就像堪萨斯人惧怕匡特里尔一样。当莱恩穿着蓝色联邦军军装从大路骑马而来时，哈里特·路易莎一眼就认出了是他。战争结束 35 年后的 1902 年，路易莎具呈了一份正式索赔报告，其中提到联邦军队在 5 名不同军官的带领下曾 5 次莅临农庄，第一次是 1861 年 5 月，为首的是莱恩将军。他们掠走和毁坏的物品都曾被一一记录下来。如果记录准确无误的话，莱恩只抢走了 15 头骡子和 13 匹马，价值为 4525 美元。但在索赔报告具呈前后，根据哈里特·路易莎本人对几次抢劫的回忆，以及曾亲眼目睹过当时情形的她孩子们的多次陈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莱恩和他手下的堪萨斯人射杀了 400 头罕布什尔猪，然后只把腿臀切下来，其他部位任其烂掉。尔后又命令哈里特·路易莎制作饼干，直到她“手上磨出了水泡”方才罢手。一些士兵在院子里打牌消磨时光，把她手缝的最漂亮的被子铺在泥地上坐在屁股底下。还有些人“纯属嗜杀欲大发”，拿她的鸡当枪靶子打。莱恩是否知道所罗门家与吉姆·克罗·奇利斯的关系以及威尔·扬加入了南方联盟无从得知。但为了弄清所罗门·扬的下落，这群堪萨斯人把当时 15 岁的“当家的”哈里森抓起来，用根绳索套住他的脖子，把绳索的另一头绕在树上，扬言他若不供出他父亲的藏身之地就吊死他。据说哈里森如实他说所罗门随大车队赴西部了。士兵们把绳子拉紧，“狠勒他的脖子”，再次逼问。哈里森又照前说了一遍。这帮人蓦地玩腻了这场游戏，遂放了哈里森。他们放火烧了干草仓，接着莱恩和手下人拿着猪大腿、饼干、鹅毛被和银制器皿骑马扬长而去。

不过根据哈里特·路易莎的正式索赔报告，1862 年 10 月，她家被掠走 1200 磅咸猪肉、65 吨干草、500 蒲式耳玉米、44 头猪、2 匹马（其中一匹配着马勒和鞍子）、“好几张床和被褥”、7 辆大车和 3 万桩篱笆。抢劫者不是莱恩，而是一个叫伯里斯的上校。一个叫斯特吉斯的将军抢走了 150 头牛；此外还有一个名叫阿克萨林的上尉抢走了 1.3 万桩樊篱、1000 蒲式耳玉米和 6000 份口粮。被抢物品总共值 21442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25 万美元。有趣的是银制器皿没有被列出，也没提及住房被摧毁。然而多年后，老吉姆·莱恩是如何掠走家用银具的不断地在传说中提到，而且当时只有 9 岁的马莎·埃伦·扬后来对《纽约时报》的一位撰稿人描述过她和母亲如何站在院子里，脸上被熊熊燃烧的谷仓飘落下来的烟灰熏得黧黑，满怀仇恨地注视着蓝衣服

大兵扬长而去的情景。尽管银具可能没被掠走，但掠走它们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即便扬氏农庄的房屋没有被摧毁，那个小女孩很可能在这“被烧毁地区”目睹过其他农庄被火舌吞没的惨状。不管怎么说其后果都是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索赔与代代相袭的传说相比还是后者更为重要。历经这种劫难和拥有这些记忆的家庭据说在感情方面变得“强硬”起来。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发生在密苏里西部最惨痛的一幕是联邦政府推出的一项臭名昭著的措施，俗称第 11 号总命令。驻堪萨斯城联邦指挥官詹姆斯·尤因准将推算，密苏里外围 2/3 的人口不是与“游击队沾亲”（如扬氏夫妇），就是“积极而卖力地为游击队提供衣食住行”（如住在蓝岭的扬氏夫妇的近邻斯劳特一家）。于是决定遣散那一地区的整个人口，以便铲除游击队的供应基地。

这一命令发布于 1863 年 8 月 25 日。除居住在联邦军在堪萨斯城、独立城、希克曼磨坊、普来桑特山和哈里森维尔驻地 1 英里之内的居民之外，所有住在杰克逊、凯斯和贝兹县的平民必须在 15 天之内“迁出现在的住所”。凡能证明对联邦的忠诚并得到驻地指挥官的满意者可以留在上述城镇中或越过疆界迁往堪萨斯；否则必须离开密苏里。限期到时凡在上述地区发现的一切粮草尽数烧毁。

2 万人被赶出了家园，那一地区几周内就成了无人之境。联邦骑兵把居民丢剩下的值点钱的东西拾走，然后一把火点着了房屋和庄稼。一个联邦军官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所见的惨不忍睹……乡村变成一片荒芜，遍地是男人女人和孩子，有些人衣不遮体。有的步行，有的坐在老掉牙的大车上。哦，上帝。”另一个被其亲眼目睹的惨状所震惊的联邦军官是画家乔治·凯莱布·宾厄姆。战后他定居在独立城，将其感受到的愤慨绘成了一幅名为《11 号命令》的画，画中尤因将军本人正驱赶一家人离开他们的住所。

这一政策似乎在扬氏农庄贯彻得不折不扣，尽管所罗门在一年多前曾在书面上签字发誓忠于联邦。全家只允许带走一牛车的财产。小马莎·埃伦后来还记得悲惨地赴堪萨斯城流放的情景：跟在摇摇摆摆的大牛后面步履维艰地北上，天气炎热，路上尘土飞扬。

在此期间，安德森·杜鲁门的境况却要好得多。他也签署了一份忠于联邦的誓言书。他同住在肯塔基的杜鲁门家其他人一样，只支持“目前的联邦政府”。（“我希望你没有背叛光荣的联邦”，他哥哥约翰·杜鲁门从谢尔比县发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那里的情形同密苏里一样，家庭成员和邻里们尖锐地分成了两派。）但早些时候，安德森和家人穿过密苏里迁到了普拉特县，后者虽离前线不远，战事却几乎没有波及。安德森愈益信仰宗教，不愿染指暴力。他憎恨天主教，不过也仅此而已，故而守着土地整日耕作，平平安安地过着简朴的生活。有一天天黑后，奴隶汉纳听见隔壁农庄传来尖叫声和马匹的嘶鸣，人人都以为红腿子来了，于是当时已逾古稀之年的霍姆斯祖母领着杜鲁门家最小的孩子们躲进了玉米地里。其实来者是南方联盟的一支骑兵队，到邻居家抓壮丁。杜鲁门家在战争中的经历不过如此。

当时有 5 个孩子，3 个女孩分别是玛格丽特、埃玛和玛丽；男孩是威廉和约翰，他俩都太年幼，没法持枪上战场。

1865 年 8 月战火停息后，安德森为他的 5 个奴隶——汉纳、马基和他们的 3 个女儿——备了一个月的粮食，让他们坐上一辆农庄的大车，直奔堪萨斯的莱温沃斯而去，那是他的奴隶选择的开始他们自由生活的地方。几年后安德森再度前往莱温沃斯打听他们的情况，结果一无所获。

“他们从来没买卖过一名奴隶。”后来一位为他们家记录家史的人这样说，他的口气对安德森·杜鲁门一家和他们的奴隶颇有好感。

密苏里近乎9年的战争所留下的创伤非一朝一夕所能愈合。虽然战败的南方联盟军中的大部分老兵都能尽其所能成家后重新安定下来，但也有一些人感到已不可能再返回到往日的时光中去。科尔·扬格成了亡命之徒，他和他几个兄弟以及另外两个曾在匡特里尔、弗兰克和杰西·詹姆斯手下厮杀过的人结成一个团伙。离独立城10英里左右是密苏里的小利波提，它的主广场旁边有一家银行，它是这个团伙于1866年2月抢劫的第一家银行。后来他们又想出了打劫火车的新点子。

最典型的例子是吉姆·克罗·奇利斯。他在堪萨斯城开了一家臭名远扬的名叫“司令部”的赌场，作为他的活动基地，多年来一直以单干的形式制造恐怖。他俨然成了开放的堪萨斯城中地痞流氓的首领，吹嘘他身上永远带着两把龙骑兵左轮枪、两把短筒小手枪和一根黑色蛇鞭，这根鞭子已成了他的标志。他住在独立城，家里有一个马房，还养了一群半夜猎猎狂吠的猎犬，然而对此没人敢提出抱怨。他是个“大众仇人”，是经常进入孩子们恶梦中的城中恶霸。在黑人眼里他是个活生生的魔鬼。每逢酩酊大醉，他就骑马执鞭抽打黑人。据载他曾两次在独立城残忍地杀死过两个黑人，他朝他们开枪仅仅是为了“看他们跳起来”。据报道，后来一个叫詹姆斯·皮科克的警察局副局长决定破天荒地摸摸他的老虎屁股，当时奇利斯手里已有9条人命，而且因3起谋杀被起诉。

1873年9月21日清晨，两人在县政府大楼广场西侧相遇，双方都全副武装，各带着一个儿子，也都荷枪实弹。21日是个星期天，不少人目击了全部过程。

杰姆·克罗走到皮科克跟前，激他出手，接着一拳朝对方面部打去。皮科克回手反击，两人立即拳打脚踢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扭做一团，两个儿子也冲上去助战。杰姆·克罗的儿子伊莱贾视力高度近视，近乎全盲，但却毫不迟疑。混战中开了枪，杰姆·克罗的肩膀被打中，皮科克背部中弹，伊莱贾也吃了枪子。接着皮科克枪口对着克罗的脸开了一枪，当场将其击毙。

杰姆·克罗的尸体被抬到“诺兰旅舍”的酒吧，即他第一次杀人的地方。伊莱贾于次日死亡。皮科克则幸存下来，但一颗子弹却嵌在了他脊柱里。作为铲除杰姆·克罗·奇利斯的警察，他成了全县的传奇人物并在选举时大获全胜。与此同时，奇利斯家族公开宣布皮科克不负任何责任。

所罗门家同奇利斯家一样，认为此事件是一出可怕的莫大悲剧，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拒绝谈及此事，尽管据说所罗门·扬曾咒骂他的女儿萨莉，他的宠女马莎·埃伦还烧毁了一幅杰姆·克罗的肖像。萨莉守寡时正值而立之年，肚子里怀着另一个孩子。她的儿子伊莱贾死时刚满13岁。

对于马莎·埃伦·扬来说（人们都称她马特或马蒂），战争结束后第3年的1868年，生活又恢复正常。那一年她17岁，她家又重新搬到了蓝岭，住进了~·幢崭新宽敞的房子。这一地点是哈里特·路易莎选定的。新房子朝西，坐落在一条笔直25英里长的车道的末端，车道两旁是马蒂帮她父亲栽种的双排榆树。房于是木制结构，涂以白漆，百叶窗是绿色的，房前有宽

广的游廊和位于中央大厅前的两间方形的大客厅。饭厅和厨房在房后的边房里，由更多的游廊所围绕。越过房后的果园矗立着一座完全由厚重的胡桃木板和大梁建造的红色大谷仓，其建造材料取自于古老的希克曼磨坊。

紧靠着住房不远的农场占地 600 英亩，田地均用被称作石栅栏的高大石灰石墙围绕。所罗门似乎把在战争中失去的家业又重新置办起来。马蒂有好几匹鞍辔精良的马，她常骑着配有女鞍的马在一马平川的高地上驰骋，度过了许多最美好的时光。她父亲对她说，你若不学挤牛奶，就永远也不必去挤奶，所以她就没学。

不过她却学了烤面包、缝纫和射击，枪法不让须眉。她扫走廊时，总爱把扫帚抛来抛去，在描绘她性格的家信中，使用的形容词是“活泼”。不久，她被送往密苏里列克星顿的列克星顿浸礼会女子学院，那是个静溢、树木成荫的所在地。两年的时间里，她。学习绘画、弹钢琴，并培养了终生对书籍和亚历山大·波普诗歌的热爱。

她身高约 5 英尺 6 英寸，略高于中等个儿，身材颀长，乌发，一张白静圆脸，爱用那双清澈、灰蓝色的眼睛直接看着你。她崇拜她的父亲，同他一样，她也善于言辞。

农场的生活回复到春播秋耕的古老节奏；晚餐桌上的话题不外乎是猪的价格和纳税；或是摩门教徒依旧坚信独立城是他们的天国之城，又开始从犹他州迁徙而来，要么就是堪萨斯城的第一座横穿密苏里河的汉尼巴尔铁路大桥，据说它将改变一切。

堪萨斯城已发展得今非昔比。1869 年大桥竣工，那一年横贯大陆的铁路也正式通车。到了 1872 年，仅 3 年之后，已有 7 条铁路线进出于堪萨斯城。汽轮和牛车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密苏里已不再是美国西部地区，而成了美国的大中部。

1874 年夏天，蝗虫遮云蔽日，铺天盖地而来。它们飞走后，大地光秃秃一片像被烧过一样。翌年它们再度降临，仿佛在嘲弄人们热衷谈论的所取得的进步。

马蒂最酷爱的社交场合是在她家前厅或邻居农庄举办的舞会。她是个劲头十足的舞迷，“脚步轻盈的浸礼会教徒”。一年冬天，一场暴风雪后，整整一周每晚都有舞会。邻里们一直跳到深夜，第二天再坐上大盒子式的雪车跑很远的路到另一家去跳。

也许就在一次这样的夜间舞会上马蒂第一次遇见了约翰·杜鲁门，后者于战后随家人返回到杰克逊县，在马蒂家附近务农。总之，他俩在 1881 年宣布要结婚时似乎已认识了一段时间，当时马蒂 29 岁。

约翰·安德森·杜鲁门长马蒂一岁，除了上过一所农村学校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没听说他有过任何冒险经历，唯一的一次就是在战争期间的一个夜晚，他随祖母霍姆斯为了逃生钻过玉米地。他也没有任何技能和钱，杜鲁门家没人发过迹，然而约翰却踌躇满志，希冀像所罗门·扬那样买卖牲畜。他干活卖力，性情欢快，乐于取悦于人。马蒂弹钢琴时他喜欢唱歌。他有时也脾气暴躁，不过尚没因此而给他招致什么麻烦。他给人的总体印象不错。他和马蒂成婚的那年出版了一本新的厚厚的《杰克逊县志》，书中涉及到约翰·A·杜鲁门时这样说：“他和其父住在一起管理农场；他是个勤奋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可望成就一番事业。”

他母亲玛丽·简·杜鲁门于两年前的 1879 年去世。1881 年时，不可屈

服的南希·泰勒·霍姆斯也已作古，她活了 93 岁。

约翰·杜鲁门一贯非常重视修饰边幅。他在堪萨斯城照的结婚照中扎着白色蝴蝶结领结，戴着羊皮手套，身穿黑色礼服大衣。他的皮靴擦得锃亮，薄薄的褐色头发上了油，修剪得无可挑剔。据说他拍照时要求取坐姿，因为他对自己的身高极敏感。他 5 英尺 4 英寸，比马蒂矮 2 英寸。马蒂站在他身旁，身着花边宽领的织锦缎服装，头发中分，按当时流行的式样平滑地梳向后面。她左手搭在约翰的肩膀上，眼睛同他的一样，直接注视着照相机。

所罗门送给女儿的结婚礼物是一个用带疤纹的胡桃木打制的三屉梳妆台，顶部冠以大理石，镜子两边是小搁板。后来马蒂再也没有拥有过比这更漂亮的家具。

婚礼于 1881 年圣诞节三天后的 12 月 28 日在家里举行。小两口最初的家在密苏里的拉默，这是个多尘多风的贸易城镇和巴顿县政府所在地，坐落在正南 90 英里处。约翰付了 685 美元就骄傲地成了一幢街角房屋的主人，这栋白色房子的面积为 20 乘 28 英尺，刚刚够上扬氏家厨房的大小。里面隔出 6 个小间，没有地下室、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然而房子是新的，舒适而阳光明媚，朝南的厅里有一扇竖铰链窗。

约翰还花了 200 美元在街对面买下一座谷仓，并在那里做起了生意。他在拉默出的报纸《民主党人》上登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买卖骡子。本人在肯塔基大街的白谷仓出售大批上乘骡子。任何想置办车队的人请与 J·A·杜鲁门联系。

约翰的姐姐玛丽·马莎·杜鲁门是个老处女，她和约翰的父亲都到约翰家住过一段。在她眼里，拉默简直就是世界的末日，令她颇觉痛苦，不过她说马蒂依旧像“以往那样活泼”。

这对夫妇定居在拉默的第一个秋天，马蒂的头胎男婴流产了。一年半后生下了第二个男孩，生的地方是挨着大厅的一间寝室，小得仅能放下一张床。W·L·格里芬大夫收取了 15 美元的接生费，为了表示庆贺，刚当上爸爸的约翰在前院种上了一株松树苗子。传说他为了求吉祥还在大门上钉上一个骡蹄铁，但这是不足信的。

那一天是 1884 年 5 月 8 日。

两天后，一个浸礼会马戏团的骑手把孩子抱到外边呼吸春天的空气，他把婴儿高高举在太阳光下，说这个孩子好结实。

然而直至 1 个月后，格里芬大夫才到大街北边的县办公室把孩子的出生日登记上，登记时孩子还没有名字。给孩子取中间名字时，马蒂和约翰因决定不下纪念各自谁的父亲而感到左右为难。最后他们只好折中地选择了字母“S”。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既可代表所罗门又可代表希普的第一个字母，这种做法在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合血统后裔中并不少见，有时教名也这么起。这孩子的教名是根据他伯父哈里森的名字而取的，叫哈里。

他就是哈里·S·杜鲁门。

孩子对拉默和他所降临的房子没有什么记忆，因为不久约翰·杜鲁门就把房子卖掉，携带全家再次北上，在哈里森维尔附近的一座农庄定居下来，离扬家仅有 7 英里之遥。对哈里·杜鲁门最早的文字描绘是 1885 年 4 月 7 日发自哈里森维尔的一封信，当时哈里还不满周岁。约翰的姐姐玛丽·马莎

在信中说：“宝贝这回是真病了，他脾气暴躁得我们不知怎么办才好。”

在拉默做的骡子生意不尽如人意，哈里森维尔的耕作亦是如此，因为杜鲁门家在那里居住的时间甚至更短，仅仅两年。在此期间第二个儿子约翰·维维安出世，他的名字是根据其父亲和一名妇孺皆知的南方联盟骑兵军官的名字约翰·维维安而取的；他出生后人们都管他叫维维安。

在哈里森维尔居住的日子里，小哈里后来只记住了两件事。说来有趣，他最早的记忆是笑。他曾围着院子追逐一只青蛙，青蛙每跳一次他就咯咯大笑。对于见过不少孩子的扬奶奶来说，两岁的孩子就体现出这样的幽默实在是非同小可。第二件事是他妈妈从2层的窗户上把他抛出去，由高大的哈里伯父伸开手臂在底下接着他。自那以后他特别喜欢这位伯父。

此时已年逾古稀的所罗门·扬仍旧精神矍铄，是全县最受尊敬的老人之一。无论是战争、流行病，抑或是风烛残年，一切似乎都不会动摇他的意志。1887年，约翰·杜鲁门一家又搬回到扬氏农庄，约翰还成了所罗门的合伙人。约翰两次事业上的失利对这一决定起到多大的影响，或马蒂从中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想象了。

故而小哈里·S·杜鲁门于3岁时最早观察世界的地方是在扬氏农庄。安德森·杜鲁门爷爷也搬了来——他在2层有一间寝室——此处还住着一个姓奇利斯的没有父亲的外孙子，索尔表哥。如果把所有的人都计算在内（单身的哈里森、艾达姐姐、一个受雇的女孩、若干下人、总是来暂住的个别亲戚或走失的邻里的孩子），这家人不下十四五口，整整跨了3代，同住在蓝岭农庄的一个屋檐下，而那正是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许多年前以低价购买的地方。

二、模范儿童

哈里，你要听话。

——马莎·埃伦·杜鲁门

1

哈里·杜鲁门后来总爱说，他度过的童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扬祖父带着他乘坐一辆高轮儿大车，由一匹红棕色花毛马拉着，小跑着在乡村周游。一年夏天，一连一个礼拜他们每天都跑6英里路去贝尔顿集市，坐在主判官席上看赛马和吃条纹糖。那是“孩子最喜欢的日子”。祖父“真是了不得的人，一个高大的伟人”，他苍髯飘拂，还有一双强有力的手。

在妈妈生第3个孩子之前，哈里争宠的唯一对手是头发还是卷毛的小维维安。有一天，他和外祖父合谋把维维安放在房南游廊的高椅子上，给他剃了个头，哈里觉得这一天犹如去贝尔顿集市一样有意思。妈妈发现此事后大为震怒，但却一言没发，可见外祖父的权威是多么不可冒犯。

给维维安剃头的那个游廊俯瞰着一片宽广的草原，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孩子们可以单独到那里玩耍，陪伴他们的是一条身世不明的叫坦迪的黑棕色狗和一只叫鲍勃的猫。哈里还记得家门外一棵老榆树下有一个秋千，家中前厅里也有一个，是为下雨时玩的。房子北边长长的游廊是孩子比赛他们红色快车的好场所。

他们掏鸟窝，在青草跟他们一样高的草原里采野草莓。农庄是个“可爱的地方”。那是段“非常美好和充满猎奇的时光”。扬家的土地似乎一望无际。挨着住房的农场占地600英亩，再过去几英里是属于外祖父的另一个农场，占地1000英亩。农庄上养着成群的牛、驯马、驮马、骡子、羊、猪、鸡鸭和鹅。哈里的父亲送给他一匹黑色设得兰小马和一副新鞍。他巡视田地时就手牵小马的缰绳，让孩子骑在马上在他身边并行。哈里后来写道：“我熟悉农庄上的各种牲畜，每逢麦收、打谷、剥玉米壳和割堆干草时就在一旁观看；每晚吃饭时还听我父亲吩咐帮手们第二天要干的活……”

这是杜鲁门家度过的一段唯一自给自足、富裕充足的日子。

哈里记忆中最有意思的是丰富的食品——苹果干儿、桃子、各种各样的糖和坚果、“好吃的饼干”、馅饼、玉米布丁和夏天的烤麦穗。他后来写道：“还有桃子黄油、苹果黄油、葡萄黄油、果子冻和果酱。”这些都是由扬姥姥和一位雇来的德国小姑娘在拥挤的大厨房里做的。晚秋是杀猪的季节，过后就开始制作香肠、腌渍品、腌猪蹄和装在一只巨大铁壶里的猪油，铁壶沉得据说连老杰姆·莱恩都没把它掠走。

哈里跟艾达姑姑学会了32张纸牌戏。哈里伯父给他讲迷人的故事，还教他玩当时比扑克要流行的两人用两副牌玩的纸牌戏。虽然单身的哈里伯父为“眼花缭乱”的堪萨斯城所迷而放弃了务农，他却时常回来，每次都带回糖果和玩具。他和外祖父扬一样长得人高马大，足有6英尺多高，“壮得像个摔跤手”。他英俊、脾气好，像外祖父扬似的让哈里感到自己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以伯父的名字取的。“只要他一来，就像过圣诞节似的。”

根据哈里后来的回忆，他幼时喜欢每一个人。索尔·奇利斯表哥当时十

来岁，他脾气乖戾不好相处，哈里却记得他是个能让你“感到生活愉快”的人。索尔的妈妈萨莉姨妈“非常可爱”。另外一个常从堪萨斯城来家造访的劳拉姨妈则是个“我们永远愿意跟她在一起玩”的人。

然而生活也有烦恼和悲伤。杜鲁门爷爷去世的那年夏天，3岁的哈里扑到床边揪老人的胡子，拼命地想把他拽醒。之后不久，有一次他爬上一把椅子想照着镜子梳头，不料仰身摔下来折断了锁骨。还有一次桃子核儿卡住了他嗓子眼儿，幸好他母亲没有往外掏，而是当机立断用手指把核儿捅了下去，否则他就憋死了。后来，外祖父扬病卧在床，小哈里小心翼翼地走上前问他感觉怎么样，这位老拓荒者目光无神地盯着他说：“你感觉怎么样？我关心的是你。”

哈里看出，最理解他的莫过于妈妈。他认为她比任何人都聪明而且对他最关心。她抱他坐在她腿上，给他讲解家里那本大字书《圣经》，5岁前就教会了他认字。1889年夏天，他刚过完5岁生日，妈妈又给了他一个惊喜：事先谁也没告诉，她就给他生了个小妹妹。哈里和维维安从楼上传来的哭声中得知，一个新的小宝贝诞生了。新生儿是按约翰·杜鲁门母亲的名字取的名，叫玛丽·简。几个孩子都没见过这位奶奶，哈里对她很崇拜，认为她是个奇迹般的人物。一年后匆匆带着哈里去堪萨斯城试配昂贵眼镜的也是他母亲。虽然他视力一直很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睁眼睛”——但直到7月4日晚上放焰火时似乎才被注意到。当时马蒂发现他对头顶上的五彩缤纷毫无反应，而只是听焰火的声音。根据堪萨斯城配镜师的诊断，他患的是一种叫“扁眼球”的不常见的畸形（这意味着孩子是远视眼），于是马蒂同意花10美元为他配一副双强度的金属丝边的眼镜。

霎那间，整个世界似被施了魔法般地在他眼前变了样。他也很快引起了别人的好奇，因为密苏里乡村戴眼镜的孩子几乎绝无仅有。

马蒂曾说他很疼爱哈里，但决心不娇惯他。外祖母对每个孩子都放任自流，妈妈却告诫他们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她有一根细软的鞭子，有时还真用它。一次哈里领着维维安和另一个孩子跑到草原南边的一个水坑去疯玩了一下午，相互抹了一身泥，她严厉教训了哈里一顿，放过了另外两个孩子，因为哈里是领头的。

但最令人害怕的是爸爸偶然的发作。约翰·杜鲁门从来不打人，生气时也从不动孩子一根指头，这对他这样一个易怒的人来说似乎很不简单，然而他的责骂却像“从你身上剥皮”似地厉害。有一件事哈里永远不会忘记。他父亲领着他骑在小马上走，哈里从马上摔了下来，父亲说凡是小马走时从它身上摔下来的孩子必须自己步行。于是哈里一路哭着走回了家。他妈妈认为这事冤枉了孩子。

1890年夏天，即哈里配眼镜的那年，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妈妈说为了让哈里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打算离开农庄迁到独立城去。约翰·杜鲁门用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一笔钱买了一幢房子和几块地皮，地点在南克里斯勒大街，靠近密苏里通往太平洋的铁路线。虽已到不惑之年，约翰并未像《杰克逊县志》里预测的那样成就任何事业，于是决定再尝试做一回牲畜买卖。他用1000美元的现金支付了房子和地皮，再以3000美元的借款将它们抵押给城里一个叫塞缪尔·布利茨的犹太人，认定讨了个便宜。

哈里戴上新眼镜后世界才开始变得真切起来，故而未来的几年对他来说是个大调整时期。

1892年，所罗门·扬辞世，享年77岁。此后不到一年，一个年轻的黑人女佣点煤油灯时不慎失火，扬氏的房子遂化为灰烬。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而且尽管在原址又为扬奶奶盖了一栋临时栖身的小屋，哈里森伯父也回来帮着料理家务，过去的生活模式却一去不返。火灾中唯一幸免的是外祖父的一件随身之物，即他在横穿大平原的日子里使用的铜制望远镜，大火前他就把它送给了马蒂。

9岁的哈里在他外祖父长辞于世时所经历的情感没有记载下来。但他后来常常提到他祖上那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单枪匹马凭借勇气和意志成家立业，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大西部，他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他还总是回到他密苏里的那个家。有这样一个外祖父的孩子很难想象自己将来会一事无成。

哈里好像上学伊始就喜欢上了学校。他喜欢一年级的老师米拉·尤因小姐，也喜欢二年级的老师明尼·沃德小姐。他后来曾说，所有的老师他都喜欢——“我不记得在校期间遇到过坏老师。”他回忆说。他还很快学会了怎样让他们也喜欢他。这方面他认为自己有诀窍。他记得他曾分析过人。“我长大一点后，就开始观察我周围的人，弄清他们想什么，什么能使他们最高兴……我曾仔细观察我父母，以便尽力让他们高兴，对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是如此。”他发现他因和别人关系处得很好，所以几乎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根据所有的记载，他是个非常机灵、性情开朗的小男孩，他的蓝眼睛在镜片后显得特别大，使他显得聪敏而对一切都饶有兴致。他的一年级老师米拉·尤因记得从来没责备过他。“他总是笑咪咪的。”她说。二年级时，他拼写、阅读和行为举止的成绩始终保持在90分以上。第一次期末考试他的最低成绩是写作，得了86分——他天生是左撇子，后来被矫正用右手写字——但到第三次期末考试时，他的写作达到90分，而语言和算术都得了100分。

第四次期末考试他没有成绩，因为在1894年的仲冬，他和维维安都得了白喉。维维安很快就康复了，哈里的病症却急剧恶化。他的腿和胳膊都瘫了，只能无可奈何地躺着。一连数月，马蒂用小推车推着他走来走去，后来他突然奇迹般的痊愈了，此后便很少得病。

多年后人们问维维安当时他俩的病是不是让他的母亲很害怕，维维安说她“不是个轻易能被吓住的人”。

哈里通过夏天的补习进步快得惊人，学校允许他从二年级跳到了四年级。这时“凡是我能弄到的书我都读——历史、百科全书等等”。1894年春天，他妈妈送给他一套厚厚的带插图的丛书，丛书的名字很响亮，叫《伟大的男人和著名的女人》，用烫金字印就。他后来认为那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套书共有4卷：《士兵与水手》、《政治家与哲人》、《平民与英雄》和《艺术家与作家》。这些书并非儿童读物，而是刊登在《哈泼斯》月刊及其他英美著名杂志上的文章选集。里面涉及的人物有几百个，上至摩西下至格罗弗·克利夫兰。作者有写歌德的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写塞缪尔·约翰逊的麦考利勋爵、写科泰兹的H·赖德·哈格德和写温菲尔德·斯考特的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把这几卷书全部啃了下来，其中最吸引他的是《士兵与水手》。他也梦想着成为一名将军。最让他着迷的是只有一只眼睛的汉尼拔的故事。“一个孑然一身的天才面对重重困难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这一杰出范例在整个历史中可谓空前绝后……”他所崇拜的美国英雄很自然的是安德鲁·杰克逊和罗伯特·E·李，后者亦是他母亲的偶像。后来哈里对一位好友披露说，学习那些“伟人”的生涯才算不辜负他母亲对他的期望。

在李的传记中有一封李于1860年写给他儿子的信。马蒂若会像李那样表述，在新的世纪到来前夕，她也会用同样的语言写信给哈里的。李的信是这样写的：

你必须坦诚地面对世界；坦诚是诚实和勇气之源泉。每次你要怎样做就怎样说，而且要把做正确的事视为理所当然……永远不要为了交友或保持住一位朋友而去做错事；你若这样做就等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你的同学相处时要友善和果断；你会发现这个方法是经得起考验的。总之，万万不可以伪装的面孔出现在别人面前。

马蒂和约翰·杜鲁门都愿意藏书。约翰有一只旧浅皮箱子，他从里面拿出一只碟子专门搁零用钱，为了攒够了买一套莎士比亚。哈里从不记得在家里感到枯燥过，他说：“一次都没有，因为我们满屋子都是书。”他读《圣经》（他后来说12岁时就已读过两遍），他“仔细研读”他父亲送他的《普鲁塔克列传》，后来还逐渐通读了新版莎士比亚戏剧集。他解释说，读书不是你在屋外侃出来的，“你必须去读才行”。

他们的家此时同独立城的大多数住户一样，房外包上了一层由木匠制作的白色护墙板，与众不同是房上有一个小圆屋顶，顶端是个镀金的公鸡风标。房后是个斜坡，有几英亩很深的地，约翰·杜鲁门酷爱园艺，在地里种些草莓和蔬菜，还养着他正在买卖的牛、马及其他牲畜，数量有时相当可观。曾经一度仅山羊就养了不下500只。他本想钻口井，却挖出了天然气，便用它来为自家和一个邻居家取暖。这对约翰·杜鲁门来说是少有的运气。

离后篱笆150码左右的地方，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的货栈，而主干线则紧挨着房子的北边，火车一跑厨房里的盘子就震得叮乱响。除了那500只山羊的气味外，马蒂还要忍受着火车的烟灰和噪音。

哈里则是个火车迷，每天过往的车次共有23辆。他常常一人坐在房后煤棚的屋顶上数货车厢，冬天夜里他就睁眼躺在床上，倾听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公司东去的火车，这些车在独立城不停，离城几英里之外就开始高声鸣笛。

“哈里，你还记得你是多么喜欢火车么？”多年后他表妹埃塞尔·诺兰曾问他。

“我现在还喜欢。”他说。

二年级和三年级是在南自由大街的诺兰学校上的，得走很长的路，后来位于南河大街有8间教室的哥伦比亚学校落成，哈里只需走3个街区就能赶到。他与他同龄的孩子不太合群，后来他曾深有感触地提到儿时的孤独：“小时候是很孤独的。”他不怎么玩游戏，害怕学校乱糟糟的操场。因为他戴副眼镜，所以认为凡跟球类有关的体育活动他都玩不了。他更喜欢呆在家里。

这时哈里家雇了个叫卡罗琳·辛普森的女人帮着洗衣烧饭，辛普森黑的“面如泼墨”，她和丈夫莱奇及4个孩子都住在杜鲁门家。辛普森空闲时就教哈里在大木炉子上烧饭，并和他长时间地唠家常。哈里喜爱厨房里的温暖气息，也爱在那儿唠家常，他还喜欢照顾他的小妹妹。他常常抱着她坐在一把摇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给她梳头，唱歌哄她入睡。玛丽·简后来说

对她最好的就是他哥哥哈里。在院子里时，他的视线一刻也不离开她，生怕她像他有一次那样伤着。那次地窖的门轧住了他的脚，把大脚趾头轧掉了一块。他妈妈立即冲过去，将轧掉的那块肉又接到他的脚趾头上去，直到医生赶到，用结晶碘仿和绷带把断趾肉固定住才罢手。

对于哈里那么大的孩子，他爱整洁的程度显得有些过分。约翰·杜鲁门是个要求凡事都需做得井井有条的父亲——栅栏边上的草要随时修剪，马要刷洗打扮得漂漂亮亮，孩子们也要衣饰整洁。哈里在 13 岁时在堪萨斯城照了张像，他当时即将升入中学，照片里的他不仅显得清洁利索、井井有条，而且好像他将永远保持那副样子。

他在同学当中吃不开，他管他们叫斗士，自己却打不进他们的圈子。后来他回忆说，由于他戴眼镜，所以要忍受别人的嘲笑。“说实话，我有点女人气。”他用这个他讨厌的字眼儿回忆说。他承认一碰到打架他就跑。但他弟弟维维安却不记得别人因他带眼镜而嘲笑过他，按照他儿时几个朋友的说法，别人也没认为他女人气，正像一个人说的，他只是与众不同，“太正经”而已：

大家想叫他女人气，但没说出口，因为都挺尊重他。记得有一次我们玩……杰西·詹姆斯或江洋大盗，我们假扮堪萨斯城的多尔顿兄弟……于是为此争吵起来……我们把历史给搞混了……但哈里走来给大家讲解，谁是多尔顿兄弟，杀了多少人等。反正他讲的那些事大家都挺佩服。他们就没叫他女人气。

在他同龄的女孩子面前，他害羞得几乎不敢开口说话。他家刚搬到独立城的时候，他与当地的孩子接触始于主日学校。马蒂没把他送到浸礼会，而是送到了位于莱克星顿街的那所又大又新、红砖砌成的第一长老会教堂，因为她认为长老会的牧师很和蔼。在长老会主日学校，哈里遇到了一个金发碧眼叫伊丽莎白·华莱士的女孩儿，觉得她是他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尤物。但直到 5 年后他才壮胆第一次跟她说话。他的表姊妹埃塞尔和内利·诺兰是他仅有的与之相处不感到紧张的女孩儿，她们是他姑姑埃拉和站父约瑟夫·诺兰的女儿。

哈里的日子大体是在女人堆里度过的——妈妈、卡罗琳·辛普森、他的老师，还有经常来看他们的外祖母扬。他被“裙钗”围绕着，如鱼得水，相互逗乐和说故事。他妈妈常说他“有意让人们把他当女孩看待”，这句话他似乎百听不厌。

2

约翰·杜鲁门混得颇为成功，他已有钱雇人、买书和照像。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惊喜，他买了一对儿套着定制的挽具和小型农车的红山羊。这个小羊车成了左邻右舍热衷的话题。

约翰天天早起，整日操劳，人们还觉得他“特聪明”，因为他在家里的后院挖到了天然气和创造了不少发明。他制造了一种用于铁丝网的钩环拔具，并申请了专利。据说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提出付给他一年 2000 美元的专利权税，购买他发明的自动铁路道岔。当芝加哥—阿尔顿公司提出付给他 4 倍于大多数美国家庭生活一年的 2500 美元时，约翰要求再翻一倍，结果

两家公司都拒绝了他，并采用了一种与他的发明相差无几的道岔——显然是剽窃他的想法。约翰最后落得一无所获。人们常讲述这个故事，证明约翰·杜鲁门的固执己见。

在做牲畜买卖方面约翰口碑载道。他的“眼力极佳”，一眼就能判断出骡马的年龄，根本不必看它们的牙。他虽少言寡语，讲起行话来却头头是道。最重要的是约翰·杜鲁门说话算数。“在做买卖方面绝对是个大好人，”一个邻居回忆说，“……他特固执，但心眼实诚。”

由于哈里特别喜爱母亲，随时都尽力讨她的欢心，此外跟她在一起他感到很开心，后来人们就大谈特谈他母亲对他的影响，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依赖母亲的儿子”。但后来时间证明，他和他父亲有许多共同点，尽管他俩在哈里童年时都没太意识到。此外，凡是熟悉约翰·杜鲁门的人都认为他对儿子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包括哈里自己在内的家庭中每一个人也都这样认为。

约翰精瘦矮小，像个职业赛马骑师，他的脸黝黑而久经风霜，眼角的鱼尾纹给人一种总在微笑的感觉。人们最喜欢看他咧嘴一笑，那样子同他的脾气一样不易让人忘却。他对自己的个头极为敏感，自尊心又强，所以稍被触犯就暴跳如雷，并像哈里描绘的“大打出手”。一次在法院里，一个律师指控他撒谎，约翰朝他抡拳就打，追着他出了门跑到大街上。每逢选举日约翰·杜鲁门几乎都得打一架。哈里孩提时有个朋友叫迈兹·彼得斯，他父亲也是个卖马的。迈兹记得一次一个满头鲜血的人闯到他爸爸卖马的地方，说他因与约翰·杜鲁门发生口角被他用鞭子抽了一顿。

对全镇的人来说，一个体格如此瘦小，平日性情又温和的人居然能施展出这等暴力，着实令人不可思议。人们说：“他是个火爆性子。但面对约翰·杜鲁门这样正派勤奋的人……你什么都可以原谅。”

约翰同当时的不少男人一样，对女性怀有强烈和富于情感的尊重。哈里回忆说：“你要是当看我父亲的面唠叨我姑、我姨或我妈妈，准得倒大霉。”三个孩子中，约翰最宠玛丽·简。爸爸像母亲偏爱哈里似的偏爱玛丽·简。哈里花大量时间照看玛丽·简与他认为这样会让他父亲高兴不无关系。

约翰区别他父亲的地方是他在宗教信仰上被认为是个“自由派”。他承认非常信奉上帝，但也信奉通过勇气和意志所成就的一切。一个叫格雷斯·萨默的侄女说：“约翰厌恶懦夫，他教诲孩子要对自己和他们的潜力充满信心……。”

约翰在他雇的黑人莱奇·辛普森的帮助下，在镇南的一块租地上种了点庄稼，对不动产生意亦偶一为之。此时他也可能在堪萨斯城开始投机谷物期货。他总在伺机而动，做梦都想发财。哈里说他是个只要有钱赚就肯把拥有的一切都压进去的人。

1895年哈里11岁时，约翰与别人换了房子，还额外收取了5400美金，新址在靠北几个街区的的地方。新房虽比不得位于克里斯勒街那栋的面积大，却坐落在比较体面的沃尔多大街和滨河大街的拐角，而且距法院广场仅一箭之遥。克里斯勒并非是贫穷区，但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沃尔多大街909号无疑是更胜一筹。

约翰用现金为马蒂买了一台崭新的钢琴，家里人记得她常出于“惊奇和自我消遣”而弹奏。哈里对钢琴显示出兴趣时，她一上来先自己教他，后来请隔壁的年轻女子弗洛伦斯·巴勒斯按时给他上课。

客厅里摆架钢琴已成为殷实的美国生活的一部分，是繁荣和健康的家庭娱乐的标志。杜鲁门家的竖钢琴是当时最流行的“金布尔”牌，售价 200 美元（“音乐为大众服务”是金布尔公司的口号）。按习俗，家庭的少女才修钢琴课，但哈里学得很投入，他为自己的进步和父母支持他学琴而颇感喜悦。

同父亲一样，哈里的生活也大有改观。新邻居有许多同年龄的儿童，他一反常态开始交上了朋友。在沃尔多居住的日子在他记忆中同在农庄一样是“最美好的”。

他现在有了“一伙哥儿们”。“我们家成了附近男女孩子的大本营……家里有一座漂亮的谷仓，里面有圈马和牛的分隔厩，还有一个玉米围栏和储存草料的顶棚，孩子们都聚在那儿，策划着各种各样的冒险方案……”妈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能忍耐”。

哈里上中学后，对友谊更加珍视。保罗·布赖恩特住在沃尔多街对面的那座不大的伍德兰德女子学院，他父亲是那儿的院长。穿过后街是浸礼会牧师儿子费尔丁·霍钦的家。埃尔默·特怀曼是杜鲁门家庭医生的儿子，他父亲曾为哈里治疗过白喉和接过脚趾头。还有画画儿比别人好的塔斯克·泰勒和高个儿腼腆、从没逃过一次学的查尔斯·罗斯，他也同哈里一样无书不读。

然而，尽管哈里喜欢他的朋友们，他在男生中却没一个知己。他唯一最好的朋友依旧是他的表姐妹埃塞尔和内利·诺兰。她们性情温柔，像他一样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不慕虚荣（也不算漂亮），而尤其重要的是对他特别好。哈里曾计算过，他的表姊妹兄弟统共有 39 人之多，但他最青睐埃塞尔和内利，而且对她们的情意终身不变。尤其是埃塞尔，所有人中最理解他的非她莫属。

埃塞尔仅比哈里大 6 个月，在学校里却高他一年级。内利则比他大 4 岁，在他眼里像个大姐姐。他们仨放学后和晚上都泡在一起，通常是在位于枫叶街的诺兰家。两个女孩儿每年夏天都到蓝岭的农庄去玩。埃塞尔记得哈里总是很体谅人，特友善。“哈里什么时候都那么有意思”。他们朗诵莎士比亚剧本，扮演剧中角色。他们演过《哈姆雷特》后，埃塞尔便管哈里叫霍雷肖，有时还叫他勇敢的霍雷肖或忠贞不渝的朋友。

诺兰姐妹知道，哈里私下依旧热恋着伊丽莎白·华莱士。自从哈里从 4 年级转入哥伦比亚学校开始，伊丽莎白一直与他同班，而且由于按字母顺序安排座位的缘故，每年她都正好坐在哈里的后面。

人们都称她贝西，她家住在北特拉华街，离杜鲁门家有 2 个半街区，高大的房子是木板制的，门牌号是 608，房前草坪上有一棵绿荫蔽日的刺果橡树。哈里后来说：“只要上学和回家的路上我能想法替她背着书包，那一天我就心花怒放。”这番话断定他已大大克服了他的腼腆羞涩。

她是他“理想中的人物”，她在同学中吃得开，特扎眼，穿着总是最入时的。她是个天生的全能运动健儿，垒球打得不亚于男生（她打第三垒，把球掷到一垒一蹴而就）。她跑得比她哥哥们都快，打网球赢他们更是不在话下。哈里常在伍德兰德学院看她打网球，他知道她同龄人的网球球艺几乎无出其右。冬天他伫立观看她穿着冰鞋在学院的池塘上往来驰骋。她会滑冰、会跳舞，会那么多他所不会和从未学过的事情。她甚至还会吹口哨，这在女孩子当中是极少见的。

她们家住的北特拉华大街都是宽大的住房和六边形石子铺就的人行道，那是独立城最漂亮的街道，房屋使广场以西的整个地区呈现出一副雍容典雅

的气派。她富有的祖父乔治·波特菲尔德·盖茨那幢高大灰色的住宅坐落在特拉华大街的北端，是全镇的豪华住宅之一。她祖母盖茨是英国人。圣诞节一到，贝西就把用花哨的纸包装的礼品分送给朋友们，她还身着丝绸参加哈里从未被邀请过的聚会和舞会。

此外，贝西是长老会信徒，因而置身在“社会的最上层”（内战结束后，浸礼会教徒降到了坎贝尔派和南北卫理公会教徒之下，排在第三或第四的位置，但地位仍高于路德教、天主教和从犹他归来的摩门教教徒，后者又称“重建现代圣徒”）。多年后，当人们问及贝西最好的朋友和邻居玛丽·帕克斯顿是否记得她们年轻时哈里·杜鲁门经常在华莱士家附近徘徊时，她振振有辞地说：“不会，不会的！哈里是个浸礼会教徒。”

3

在这座城镇里，犹如人们所说的，谁叫什么干什么人人都知道。人口是6000，虽在增长却速度缓慢。与堪萨斯城相比，此地犹如一潭死水，大多数居民墨守教会议式，抱残守缺，这正是他们所乐意的。堪萨斯城已然是一座厚脸皮的北方佬城镇，“金钱至上”，“新派人”充斥。独立城却在精神和节奏上都是南方化的——连中西部的风格都谈不上——而且非常固守成规。

南北战争后开始大兴土木。铁路的建成，堪萨斯城杂乱无章的扩展，几家当地新型企业的诞生对独立城都产生了影响。南北走向、位于广场以西4个街区的北特拉华大街便典型地呈现出一副新面孔。高大的布伦家住宅、镶着丝纱罗玻璃窗的索耶家住宅以及宽敞的盖茨家住宅都是战后新建的，它们的出现就像建造它们的金钱似的给人一种新奇感。布伦家族在堪萨斯城创办了生意最为兴隆的埃默里—伯德—塞耶织物公司，艾伦·索耶是战后创建的独立城银行总裁。乔治·波特菲尔德·盖茨是独立城瓦戈纳—盖茨磨坊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成立于1866年，因推出了一种风靡中西部的产品而致富，产品的名称叫“食用面粉大王”。

盖茨本人是北方人，战后随移民潮南下。他来自佛蒙特，路经伊利诺伊，于1833年加盟威廉·瓦戈纳开始做磨坊生意，两年后将其位于北特拉华和蓝街把角处的不算太大的房子重新翻修和扩展。据独立城的《哨兵》报报道，其装修规模之大，足足花去了8000美金的巨资。翻修完的带护墙板的“宅第”呈灰色，窗户边是黑色贴脸，室内有14间房子，宅子前后均带游廊，浮雕细工很纤巧，房前凸窗配镶色玻璃，石板屋顶，煤气照明，并有冷热水。

盖茨的合伙人威廉·瓦戈纳住的房子更加富丽堂皇，它坐落在太平洋大街，正对着磨坊，曾是乔治·凯莱布·宾厄姆的旧居。瓦戈纳重新装修时不惜工本。宅子位于一个圆丘上，周围20英亩开外枝叶茂盛，犹如一座花园。

斯沃普家的房子位于南快乐大街，其顶层辟了一个舞厅（斯沃普是靠做堪萨斯城的土地生意发的迹）。坐落在北自由大街维尔家的房子是独立城最浮华的一幢。它由红砖砌成，石头饰面，酷似一个高耸的维多利亚式的婚礼蛋糕。宅内有31间房子和若干由卡拉拉大理石砌成的壁炉。维尔家马厩隔栏的墙壁均由桃花心木嵌镶。他家还有一座花房，4个专职园丁。哈威·维尔靠供给“清洁水”和承包邮递起家，就算他不是全镇的首富，他也摆出一副首富的架子。

总体上讲，那是一段豪华住宅林立的街区。主要街道用水泥铺筑，清洁

无尘，两边高大的老榆树和三角叶杨遮蔽成荫。那里的住户沾沾自喜于他们的花园，夏季的夜晚，夜幕降临后，各家人坐在房前的游廊上侃侃而谈，每个从房子中间穿过草坪的人都能在夜色中听到他们的声音。

年复一年，能些许引起人们兴奋的时刻是国家的庆典和政治活动。给年轻的哈里·杜鲁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于1892年第二次取胜的那一天，当时他家还住在克里斯勒大街。约翰·杜鲁门爬到他家屋顶上，在镀金风标上拴上一面旗子。当天夜晚，他看去非常骄傲，便骑上一匹灰马参加了火炬游行的行列。贝西·华莱士的朋友、后来撰写城镇生活的玛丽·帕克斯顿记得，男人们擎着耀眼的火把沿北特拉华大街迤迤南行，在黑黝黝的树下留下一串光迹。她、哈里以及他们同时代的所有人记得那是最令他们兴奋的一个夜晚，因为直到20年后随着威尔逊的当选民主党才得以庆祝另一次总统竞选的胜利。

独立城在诸多方面依旧是个乡镇。黎明可以听到公鸡报晓，许多家的午饭仍是正餐。星期天做完礼拜后标准的正餐有炸鸡、黄油豌豆、土豆泥、奶油肉汁和用“食用面粉大王”做的薄饼干，因为这是种“软麦”面粉，所以被认为是天下最好的。星期日晚上农民进城理发和备料，因而广场上挤满了溅满泥污的轻便马车和农车。镇里的孩子每天都要干点农活儿。哈里和维维安得挤中奶，给马匹喂水喂料和进行梳刷，还要为厨房的炉子劈木柴。

冬天晴朗的夜晚，树枝光秃秃的，从全镇各家窗户中映出的只是煤油灯柔弱的光亮，黑色苍穹中的星光便显得格外明亮清晰，这是后来生活在“电气化”时代的人们感受不到的一种意境。

偏爱独立城的人坚持称它为城市，并炫耀正在兴建的耗资3万美元的电厂和一所费用更高的新中学。当地商人被描绘成“正直诚恳，做买卖守信用，生活中待人友善，性情随和，在这些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尽管如此，独立城还有一种潜在的绅士风范，甚至可谓高雅的斯文。镇上一些古老的贵族家庭经常谈论赴欧洲漫游或去科罗拉多温泉消夏。“研讨小组”常聚在一起探讨文学和诗歌，其成员的鉴赏水准和活力常令参观者叹为观止。

哈里上过的几所学校的教学水平是一流的。除了伍德兰德女子学院，还有也是专招女生的长老会学院和圣玛丽女子学院。诚然，这些学校都不大，而且惨淡经营——伍德兰德学院毕业班通常只有10几个学生——但它们地位颇高，深为当地人引为骄傲。埃塞尔·诺兰多年后回忆说，独立城“象征着文化”，她知道这一说法易使外人嗤之以鼻，但她和与她持相同看法的人对此却矢志不渝。

“人们常在一起聊，”她说，“我是说聊的内容是世界大事，聊思想。”

该镇赞助了两家书店，多数大户人家除了《哨兵》报和《杰克逊考察家》报之外，还订阅堪萨斯城的报纸。去堪萨斯城只有10英里路，一般坐有轨电车或被称做“航线”的新火车。因此你若想了解外部世界，丝毫不会有与世隔绝的感觉。

此镇历史悠久，凡对过去怀有情感的人，没有一个会觉得它枯燥乏味。“在历史遗迹方面，西部没有任何一座城镇可与美丽的独立城媲美。”一位独立城的新导游这样说。镇南某处曾是大车队穿越蓝河的地方，车辆留下的罅隙依稀可见。乔治·凯莱布·宾厄姆在瓦戈纳宅第的一间古老的配屋中画成了《11号命令》。克里斯曼—索耶银行坐落在法院广场的西北角，它红色

的砖墙上至今还印刻着南北战争留下的斑痕。哈里·杜鲁门童年时，每逢清晨晴朗无云，就可看到老皮科克警察局长步履僵硬地在镇上散步。他身躯挺拔瘦，胡须苍白，手拄一根拐杖。人人都知道，他的脊柱里还带着那颗吉姆·克罗·奇利斯射出的子弹。

贝西·华莱士的爷爷乔治·波特菲尔德·盖茨喜欢给贝西和她的朋友们讲一段他亲身的经历，以此来逗吓她们。很久以前他参加完一个乡村婚礼后，乘坐一辆轻便马车深更半夜往家里赶，突然一个神秘的骑手从黑暗中蹿出来，用手枪顶住盖茨的脖子，一直就这样进了镇子。持枪人是杀气腾腾的吉姆·克罗·奇利斯。但当他们走上北特拉华大街时，吉姆·克罗“发出一声鬼怪般的笑声”，又突然消失在黑暗中，就像他出现时那样迅速。

笼罩全镇的依然是南方的氛围——南北战争前未开发的旧南方。乐队一演奏《南方颂》人们就挥舞手绢。南方联盟女儿联合会依旧兴旺发达，上流社会青年如贝西·华莱士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光顾的聚会无论从楼梯扶手上的花卉装饰还是由鸡丁沙拉和水果奶油布丁构成的便餐上，都与过去在迈肯和塔斯卡路萨举办的聚会相差无几。伍德兰德公墓里的最大纪念物是南方联盟纪念碑。许多家的前厅里都挂着李和杰克逊的画像。夏季，匡特里尔“手下的”——那些头发已灰白、嚼着烟草、打扮得像要去教堂的边地战争的老兵们——整整一天聚集在室外，中间围着一幅披着黑纱的匡特里尔的画像。有时在这种场合中也能见到杰西·詹姆斯的弟弟弗兰克，往往引起一阵兴奋的骚动。

在学校，哈里最喜欢的一位教拉丁文的老师阿德利亚·哈丁常给全班讲她父亲的经历。在皮克特进攻葛底斯堡期间，她父亲饮弹三次，以为死了被丢在战场，后被天主教修女发现送到巴尔的摩的一家医院。康复后，他拒绝宣誓效忠美国，于是被关进监狱，直到战争结束。50年后哈丁小姐非常愉快地回忆说：“哈里总是愿意听那段故事。”

几乎全镇的人都生在美国，尽管40岁以上的黑人生来就是奴隶。那些拥挤地居住在堪萨斯城西部恶劣的河边洼地的爱尔兰、意大利、克罗地亚和其他穷途潦倒的外国移民在独立城很少能见到。

黑人居住在广场西北方向的“黑鬼区”，那是一片建在柿子林里的简陋棚屋。大多数商店都不欢迎黑人，镇图书馆也不允许他们进入。黑人孩子有单独的学校，即扬学校，它是以拓荒时期那位制作牛车的自由黑人海勒姆·扬命名的。虽然诸如杜鲁门这样的白人家庭对他们的黑人佣人怀有深厚和长久的情感，“黑鬼”这类字眼儿却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被习以为常地使用。一旦黑人忘记了自己的“位置”，便存在着潜在的暴力威胁。当地报纸对发生在南方的私刑事件进行大肆渲染，旨在表明受害者是罪有应得。1901年夏天，即哈里中学毕业的那年，《杰克逊考察家》报在其社论中声称：

倘若一个黑鬼在独立城受到私刑，全体居民不必为此大惊小怪。眼下是处罚他们的最佳时刻。镇上有不少无用之黑鬼整日游手好闲，连佯装在干活儿的意思都没有。他们站在大街上，满嘴脏话，对过往的女士等出言不逊。他们挤上电车，寻衅滋事……

编辑们还小心翼翼地补充说，镇里也有不少遵纪守法的黑人，“他们是好公民，同大家一样知晓我们所阐述的真理”。

当时在那个地方，一些戒律和俗语成为人们恪守的信条，在那里长大的几乎所有人都至少在原则上受到这些信条的熏陶：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它既省时间又免除忧虑，因为你若总是讲实话，就永远不必记录你所说过的话。

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之人。

不付努力莫谈收获。

初试不成，不惜再试。哈里的父亲常说：“永远不要认输。”

有什么样的父母必有什么样的孩子。每次哈里出门时，他母亲都反复地告诫他：“哈里，你要听话。”

哈里对这些训戒就像面对黑人不平等的观念一样，似乎从未提出过质疑，他回忆说：“在那个年代，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你根本不必去谈论。”

许多大家非常熟知的箴言直接引自《圣经》：“荣誉是汝父母。”“名声胜过财富。”“看见那个辛勤劳作之人吗？他将坦然站在诸国王面前。”“要充满希望。”

通过上主日学校和自己阅读《圣经》，哈里记住了不少《圣经》中的段落，尤其是《马太福音》中的5、6、7章，即《登山训众》，“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他还记住了一段他在一生中经常引用的祷词：

噢！全能的上帝，天地宇宙的创造者：

助我言行永远正确，成为正确之人，因为这乃是正道；让我在万事之中真实、诚恳、高尚；让我为正义、荣誉而成为诚实的智人，永不索取回报。在我同胞面前赐我以慈善、宽恕和耐心之秉性——助我洞察他们的动机和瑕疵——正如你洞察我的一般！

阿们！阿们！阿们！

他在家里的训戒是，说你想要说的，想什么就说什么。守信用，绝不要恃才傲物。不可忘记朋友。这些不仅是智者之言，它们同社团、学校、教堂和法院一样，似乎已深深地植根于生活方式之中，当然，并非人人都能实践这些信条，但哈里认为人人都应该尽力而为。倘若生活圈子局限在镇里，广场就是世界的中心。哈里14岁还在上中学时，就开始去J·H·克林顿在广场开的一家杂货店里干活，这是他第一个挣钱的零活。克林顿的店铺位于广场的东北角。店主克林顿住楼上，哈里的任务是每周工作日的早上6点30分赶到铺子，打开店门，清扫人行道，拖地，擦柜台并力所能及地对铺子各处进行除尘和清洗，直到7点钟时克林顿从楼上下来，哈里便离开上学。半个世纪后，他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恐怕有好几千个瓶子需要除尘，还得擦无数个专卖药箱子和橱柜。至少看上去有那么多，因为我上学之前永远擦不完瓶子和橱柜，只得第二天早上从停下的地方接着干。全部擦完之后便又到重擦一遍的时候了。

前窗的两个大玻璃瓶和周围供展示用的专卖盒必须擦干净。玻璃一周擦一次，药方箱除尘时须“格外小心”。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哈里便按照法院上的大钟从下午4点干到晚上10点。然后克林顿先生打烊，哈里便步入夜

色之中，看着广场周围其他店铺窗户里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他若加快脚步，12分钟就能赶到家。

J·H·克林顿做广告兜售“雪茄、烟具及烟草、香水、卫生间用品、香皂和文具及昼夜仔细配制的处方”。但哈里不久发现，这家铺子还为全镇提供另一种东西，而这一发现显然使哈里第一次认识到某些以道德高尚而知名的公民们的虚伪，于是他称他们为“唱高调的”。

面对店门有一个处方箱子，它遮住了铺子后面的视线，下面是个装满各种威士忌酒瓶的小壁橱。清晨时，有时在克林顿先生到来之前，一些虔诚教徒和反酒吧联盟组织的成员便躲在处方箱后面喝酒，他们一盎司付10分钱。喝罢他们擦把嘴，从箱前的观察孔中窥两眼，然后离去。这一现象使14岁的哈里对那些模范公民和在教堂中领头说阿们的教徒所伪装出的公众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哈里然后把酒瓶放在柜台上等着。“那些人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我不去动它们，一直等克林顿先生来后由他把它们放进现金收入记录机”。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喝酒的人“虚伪”到了家，他不屑染指他们的交易。哈里认为镇里的那些“粗人”都强似他们百倍，只要高兴，他们就在酒吧里明着买酒喝，根本不顾及面子。

克林顿的杂货店和其他类似的店铺都是由古老的“诺兰屋”演变而来的，后者是边地的旅舍兼酒吧，哈里臭名远扬的姑夫吉姆·克罗·奇利斯的尸体在决斗后就曾停放在那里。这段历史哈里自然知道但却从不提及。广场四围由枫叶、缅因、莱克星敦和自由大街组成，克林顿的铺子就在枫叶和缅因街的把角处。在枫叶街的另一街区还有一家珠宝店、一家书店、两家食品杂货店、大都市旅馆、H·W·拉梅尔的马鞍挽具店、7家布店和法院交易酒吧。面对法院在广场周围的其他地方还有三家杂货店、两个酒吧、A·J·邦休的百货商场（其招牌上写着“光顾一次，就永远会来光顾”）、两家理发店、一家烟草铺、一个鞋店、一座戏院、一座歌剧院、一个五金商店、一家面包房和一个冰淇淋铺。三个犄角处突出矗立着三家银行——第一国家银行、独立城银行和古老的用砖砌成的克里斯曼索耶银行。若干家店铺的楼上是法律事务所和牙医诊所以及邓拉普小姐的舞蹈班。广场附近有一座贮木场、西部联盟办公室、一家黑人理发店、两个马车行、一个饲料房、一个邮局、一座镇监狱和火车站。因此生活中所必需的设备都很方便，J·H·克林顿杂货铺的斜对角甚至还有一家奥特—米切尔开的殡仪馆。

但无论从规模还是外观上，位于广场中心坐落在葱郁草坪之中的政府大楼依旧是所有建筑之冠。过去那幢简朴庄重、正门上开着一个扇形气窗的老建筑早已被一幢庞大的红砖结构的新楼所取代，后者高5层，是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风格，带一个复折屋顶式钟塔。政府大楼是独立城的中心——几英里开外就可看见高出树梢之上耸立的钟塔——而且是民主党的总部，虽然共和党人并非在独立城默默无闻，在镇中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民主党。人们生来就是民主党，犹如他们生来就是浸礼会或天主教徒一样。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正像某个人说的：“敢于上刀山下火海的就是民主党人，否则就是共和党。”

每逢温暖的季节，政府大楼草坪上斑驳的阳光洒在木条椅上，上面坐着镇里的无业游民和“哲人们”。镇上大多数人——政府大楼的从政者、商人、

镇外的推销员、商店售货员、银行老板和穿着长裙携着女儿们购物的母亲们——她们是镇上的主体——在人行道上穿梭往来，不时地停下来“参观”一下政府大楼。从堪萨斯城开来的墨绿色有轨电车停下又开走，在自由大街和莱克星敦大街交界处拐弯时铃铛叮当作响，轱辘发出刺耳的声音。仲夏时分，路边排满了装满农产品的大车。夏天有时为了抑制尘土飞扬，镇里的水车每天都要围广场绕好几圈。

每天早上起来去广场打工使孩子感到自己俨然是个大人。如果是个像哈里·杜鲁门那样的开朗活泼、诚实可靠的孩子，打工可以博得人们的注意，让人们谈论，获得个好名声。杂货店的一些主顾尽管令哈里感到很失望，他在那儿打工却颇觉开心，而且若不是他父亲的干涉，他也许还会做下去。在他的记忆中，他第一周挣得的3块银元是“我当时最大的收获”。他为母亲买了一份礼物，又想把剩下的钱给他父亲，他父亲却好意地让他自己把钱留下。

三个月后，约翰·杜鲁门对孩子说打工可暂时打住，他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

4

哈里一贯听话，学习刻苦，经常整个下午泡在镇图书馆里，仰面就可望见一尊本·富兰克林的半身石膏像。图书馆有两个房间，与中学毗邻，藏书约2000卷。哈里和查理·罗斯发誓要将大百科全书在内的全部藏书读完，后来两人都声称达到了这一目标。哈里喜欢马克·吐温和富兰克林的《自传》。他读沃尔特·司各脱爵士的小说，因为那是贝西·华莱士钟爱的作者。镇图书馆的管理员卡里·华莱士是贝西·华莱士的表姐，这对哈里在读书上表现出的热情恐怕不无影响。

埃塞尔·诺兰回忆说：“哈里是天下读书最多和最勤的人，他简直就是个‘书呆子’。”

他啃了一书架的有关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权威著作，开始热衷于历史。埃塞尔说：“他对历史有种真实的感觉，不是书本里的历史，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或过去时代的一个层面，因为它们与人有关所以激发了他的兴趣。”他自己后来说他想要了解的是“真实的事实”。“读历史对我来说远不止是一次充满浪漫的冒险。我渐渐发现实实在在的教训和富有哲理的说教才是我想得知和需要的东西。”他说他认定是人创造了历史，否则将无历史可言。他断言绝不是历史创造了人。

他心目中的伟人与日剧增。在安德鲁·杰克逊、汉尼拔、罗伯特·F·李之外又增添了辛辛纳图、西庇阿、居鲁士大帝以及17世纪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杰斐逊、林肯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人物尚没有列入他所信奉的伟人行列。上个世纪末的美国儿童对安德鲁·卡内基和汤姆斯·爱迪生推崇备至，哈里对他们却不以为然。按照他的标准，伟大仍属那些了不起的将军们。

镇上升中学的男生寥寥无几，多数人都很早就开始工作。中学就像钢琴课似的主要是女孩儿的专利。哈里的班在当时那所新中学里是人数最多的，共有30名女生，男生仅有11人。

哈里的拉丁文学得不错，数学“很出色”，拼写却不佳。他深受所有老

师的影响，他的老师都是女性，除了校长 W·L·帕尔默“教授”之外。他教科学，是哈里唯一不喜欢的科目。女老师按照学校体制的规定一律是未婚者（哈里的拉丁文老师阿德利亚·哈丁——即其爷爷经历过皮克特进攻的那位——成为帕尔默教授的妻子后，便只好放弃教书生涯）。人人都认识这些教师，他们本身在镇里形成一个团体，被视为模范人物。哈里说：“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分子，他们向我们灌输崇高的理想，而每月只领取不超过 40 美元的薪水。”除了拉丁文、历史或莎士比亚之外，他们还以同样的热情宣扬传统的价值观——忠诚、热爱家人、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等。蒂利·布朗小姐说，每当她进教室之前，耳畔都会响起这样一条训戒：“脱去你的鞋子，因为你将站立的场所是神圣之地。”虽然有些人暗暗窃笑她的举止，却没人怀疑她的真诚。

哈里后来说，他老师对他一生的影响仅次于他母亲，当他感谢蒂利·布朗或玛格丽特·费尔普斯对他施予的教育时，他晓得他同时代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几个同蒂利或玛格丽特一样的老师，因而可以理解他内心的感受。

玛格丽特·费尔普斯开设的历史概论从亚当夏娃讲起。玛格丽特的身材颀长苗条，高高盘起的头发总是梳得光洁齐整，她十分严厉，大多数学生在真正熟悉她之前都有点怕她。哈里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而且他历史学得最优异。玛格丽特·费尔普斯一次在阐述她的信念时令人回味地说，历史是一门最重要的学科，“它开发大脑的各个官能，培养同情心，解放思想和情感，陶冶崇高的情操”。

具有同样魅力的英文教师蒂利·布朗（她的全名是马蒂尔达·布朗）是“一位教会我们欣赏优秀文学的天才”。哈里在她的指导下写的两本作文本幸存下来，一本完成于 1899 年，另一本的作文写于 1900 至 1901 年，即他即将毕业的那年。他写的主要是人和道德理想。他对某一作家或人物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颇多感慨，最厌恶的是道貌岸然的伪善。根据他所写的来判断，他最推崇的是勇气。他的一些作文在描述金钱和他所说的“激情”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时，他的聪明程度似乎超出了他的年龄。我们无从知道他所写的有多少是他本人的观点，多少是蒂利·布朗的思想，不过若照他自己所说他是个知道怎样取悦老师的人，那么在他的价值判断中很可能将布朗和他自己的想法搀合在了一起。

他在 1899 年写的一篇作文对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库珀的名字令我联想到印第安人、大海和革命的传说，在那些传说中我们死里逃生，历经了无数次的冒险。他的名字还使我想到一个爱戴祖国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艰难和必须与别人争斗而胆怯退步。他不是个宁愿受别人“支配”的人，他认准了一个观点就会坚持到底。

他还写道：“库珀的书有趣而著名，唯独句子都太长了。”

在“勇气”的标题下，他以遭劲、清晰和直率的字迹写道：“我所称之为勇气的美德不只总是体现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它还体现在对家人的照顾……真诚的心，坚强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我认为一个人具备了这些就无往而不胜。”他在毕业班的作文本里有一篇写《威尼斯商人》的作文，在述及安东尼奥时他说，虽然理想的人物如凤毛麟角，但他理想中的男人“首先应该勇敢，还须敬畏上帝……他不该冷酷、傲慢或虚伪；他必须古道热肠

而且具有爱心（最好会爱女人）”。

夏洛克讨他喜欢的主要原因是夏洛克是个强者。他的弱点是他让自己的情感支配了他。16岁的哈里·杜鲁门写道：“一个人一旦让情感所左右，他就完了。”后面他还写到了巴萨尼奥：

这个世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从最完美的到最卑鄙的无其不有。追逐钱财的可以为钱不顾一切，直至出卖灵魂。

还有人喜欢金钱积极的一面，他们希望用钱使他人幸福。有喜欢女人、杯中物和享乐的世俗之人；有过于拘泥的教徒，无暇顾及他人和世事。这类人都失之极端。我赞同的人则既有足够照顾自己的世俗经验，又有时间去爱上帝和他周围的人。

然而阿德利亚·哈丁说，给老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哈里的“韧劲”。每次老师叫他在课堂上发言时，他都起立站到桌旁，端平肩膀才开口。

他的成绩没有保存下来，因为学校的成绩册在一次大火中被烧毁。

若以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哈里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弹钢琴。巴勒斯小姐是按曲调方式教他的，他的水平超过了巴勒斯的能力之后，便每周两次去堪萨斯城找E·C·怀特夫人上课。怀特夫人是个天才教师，曾师从当时颇负盛名的美国钢琴家范尼·布卢姆菲尔德·蔡斯勒和曾教过帕岱莱夫斯基的西奥多·莱斯柴蒂斯基。哈里后来特别喜欢上了格雷斯·怀特（他表姐埃塞尔说，他对多数上了岁数的人都很喜欢，“从小他就喜欢年长者”）。怀特夫人领他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他则以超群的毅力学习，每天从不间断地练习两个小时，从凌晨5点就开始弹。成年后他常无关痛痒地说是在给“琴键挠痒痒”，仿佛弹钢琴只是他突发奇想而学来的手艺。但那位瘦瘦的，腰杆笔挺戴副圆眼镜，每天天刚擦亮时就坐在琴旁的少年却是一丝不苟的。他认为自己具有成为一名音乐会钢琴家的素质，怀特夫人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他不仅刻苦练琴，对各种各样的讥嘲也不以为然。他的朋友查理·罗斯记得哈里常常胳膊底下夹着一卷乐谱，在大街上匆匆走着去赶开往堪萨斯城的有轨电车。“别人的妈妈都把他当作榜样，所以孩子们都嘲笑他。在独立城那样的镇子，想学音乐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才行。”哈里的另一位朋友亨利·邦休说，哈里是那种“似乎对母亲的话百依百顺的孩子”。

哈里酷爱音乐；他真心地迷恋怀特夫人教他弹奏并坚持让他学习的伟大的古典作品。怀特夫人的家是栋老式房子，坐落在堪萨斯城布鲁克林大街上，她用一架硕大的斯坦威牌钢琴教哈里弹巴赫、贝多芬、韦伯、格里格的作品及门德尔松的《无言歌》。他学弹当代美国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尔新创作的《伍德兰德素描》。在后来的生涯中，他能不借助乐谱弹奏帕岱莱夫斯基的《G大调小步舞曲》和肖邦的几支华尔兹舞曲。“伤感”的音乐能使他感动，如贝多芬的《悲枪奏鸣曲》和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他认为冯·韦伯的作品“很美”，如《辉煌回旋曲》和《光明波尔卡舞曲》。但他更偏爱肖邦的华尔兹和波罗乃兹舞曲。莫扎特的作品是他最喜欢的，在怀特夫人的指导下，他终于学会了莫扎特的《第9奏鸣曲》。

他全心全意地弹奏严肃音乐，一有机会就去听音乐会。当时有许多音乐会大师都曾赴堪萨斯城演奏。范尼·布卢姆菲尔德·蔡斯勒演奏过两次，第一次在莱西姆，第二次在佩珀音乐厅，哈里每次都在场。他听她演奏斯卡拉蒂的《田园曲》和《随想曲》及贝多芬的《奏鸣曲，作品111号》，关于第

二个曲目，《堪萨斯城日报》的一个评论家称其为是她“演奏的最深刻的曲目”。当时是1898年，哈里14岁，正在杂货店里打工。后来他还听过约瑟夫·莱维纳的演奏，认为他是“天下最棒的”。1900年，趁帕岱菜夫斯基到堪萨斯城演出之际，怀特夫人安排哈里在后台与那位“了不得的”人物见了一面，大师私下向哈里示范了演奏他的《G大调小步舞曲》的技巧。

哈里心中憧憬着做音乐家的抱负，脑子里装满了莎士比亚和高尚的罗马人，他还在一座十分注重外表的城镇受到讥讽，而且那里的每个孩子都逃脱不掉数不清的阿姨、叔叔、老师、店老板和邻居们的品头论足，因而作为他那样的儿童，心里应该郁积着一股反叛的情绪。他要么应像生长在内布拉斯加红云地区的威拉·卡瑟那样渴望逃走；要么就该像在明尼苏达的绍克桑特度过童年的辛克莱·刘易斯似的，希冀对小城镇狭隘封闭的观念给予回击。然而无论是从他的言论或文字记载中，还是他的家人和朋友的详尽回忆中，我们都无法寻找出哈里·杜鲁门在青少年时期对其所处的环境曾流露出丝毫的愤怒、失意或受到伤害的痕迹。很显然，他热爱独立城，热爱密苏里，也热爱那里的人们。他为自己是哈里·杜鲁门而感到高兴。

他变高变瘦了，大约达到了5英尺7英寸。他虽然希望再长高点儿，但已经超出了一般个头，且比他父亲高出了几英寸。他衣冠楚楚，性情开朗，依旧和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得很融洽。大家都认识他，也喜欢他，这与他总夹着一卷乐谱和他那副眼镜不无关系。他没有仇人，也无怨言，没做过什么错事和令他感到羞耻的举动。最重要的是，他父亲总给予他鼓励，尽管他们表面上志趣不尽相同。哈里“不错”，约翰·杜鲁门说。维维安回忆说：“父亲明白哈里有能力，他喜欢哈里从不浪费时光的做法……”

维维安则与他女性化的名字相反，是个身体强健虎头虎脑的孩子，他酷爱运动，对书本和学钢琴不感兴趣。他很小的时候就熟谙买卖牲畜的门道，于是约翰·杜鲁门在他12岁时就给了他一本支票簿，让他当上了自己的“合伙人”。哈里也曾试过做买卖，但终觉没此方面的头脑，正如他后来向贝西·华莱士解释的那样：“我要是花30美元买头牛，再以50美元的价格倒给另一个人，心里总觉得抢了人家20块钱。”

哈里和他父亲的共同兴趣是热衷于社交和政治。哈里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就是每年8月在隆杰克举行的隆重的民主党野餐会。当天早上约翰·杜鲁门早早把家人叫醒，在两个男孩的协助下把两匹最壮的骡子套上大车，车上装着炸鸡、糕点和烙饼。一切准备就绪后，全家便登上了5英里路的旅程。中午时分，几千人聚集在隆杰克，在草地上铺上桌布，上面摆满食品，穿梭往来地打招呼。约两点来钟演讲就开始了。哈里特别喜欢一个叫克里斯普上校的候选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竞选国会议员，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名声来自于他一年一度的野餐会上的演说，题目永远是内战期间的隆杰克战役。一次一个参加过那次战役的老兵对他所讲的史实提出质疑，克里斯普回答说：“该死的目击者，他总是破坏一个动听的故事。”另一个演讲者是来自里萨米特的众议员威廉·S·考赫德，他讲的一则故事令哈里津津乐道，终其一生都在重复它。众议员在谈到一项他不赞成的悬而未决的关税法案中的若干条文时，说他想起了一位走访纽约的农民。这个农民头一遭走进一家豪华酒店的餐厅，侍者先给他上了一盘芹菜，他吃光了，接着又给他端上一碗清炖鸡汤，他又一饮而尽。当侍者把一只大虾端到他跟前时，农民气愤地抬起头说：“我吃了你们这儿的花儿，喝了你们的洗碗水，要是再吃你们的虫

子我就不是人！”

1900年夏天，哈里和他父亲赴堪萨斯城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再次提名“伟大的平民”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第二次与威廉·麦金莱竞选总统。约翰·杜鲁门有一位做“庄稼生意”的朋友叫威廉·T·肯珀，此人是堪萨斯城颇有作为的公民之一，而且还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于是约翰作为他的客人坐进了包厢席位。哈里坐在楼厅里，或给肯珀跑点儿腿，觉得特别开心。他记得那个大厅宽敞无比，里面坐着1.7万来人，几乎是独立城人口的3倍。提名布赖恩的发言引发了一场示威，持续了半个小时。

哈里和他父亲宣称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布赖恩的选民”，尽管布赖恩和他的竞选伙伴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在11月输给了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布赖恩却以平民代表的形象成为哈里心目中的偶像。

民主党在1900年的大选时提出了帝国主义的议题，然而得到全国赞同的却是麦金莱的繁荣说，即共和党竞选中所鼓吹的“盛满饭碗”的口号。哈里家当时空前富裕，他对此是否很了解我们无从知道，但约翰·杜鲁门通过威廉·T·肯珀这样的“内部关系”搞谷物期货买卖，则正迅速地朝他致富的梦想迈进。

那年秋天是哈里毕业前的最后一年，所以他感到特别忙碌。他和查理·罗斯、塔斯克·泰勒及其他几个人为学校创办了第一份年刊。查理根据坦尼森的诗作《梅林和曙光》将其命名为《曙光》。插图由塔斯克负责。哈里和查理翻译西塞罗的文章《人民之利益是最高法则》，并以此作为学习拉丁文的实践。查理是年级长兼《曙光》主编，他在学业上也是名列前茅。

一连几个星期，哈里和埃尔默·特怀曼一道按照凯撒在其《论评》中的描述，制作了一个横跨莱茵河的凯撒大桥木制模型，他还经常去找拉丁文的“高手”内利·诺兰表姐。当时诺兰家已搬到了北特拉华大街216号的一幢木制房子里，与盖茨家的宅子相对。最令哈里欣慰的是，贝西·华莱士此时也常去诺兰家走动。

“贝西经常过来，”埃塞尔表姐回忆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学了多少拉丁文，因为他们总是玩耍。”哈里学起了击剑。“他有两把钝头剑，或叫轻剑；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起练击剑。虽然我们对剑术一窍不通，却觉得特好玩，我们在游廊上……屋子里练，有意思极了……间或学一点儿拉丁文。”

进步和新世纪是热门话题。“人人都在高呼‘进步’，”埃默尔·特怀曼在《曙光》中写道，“处处都在发明、改良和革新，这些领域包括武器、热能、照明、食品、医药、建筑和运输。的的确确，我们是创造奇迹的奇才。除了飞艇、点金石，或‘青春之喷泉’，我们什么都不缺。”哈里抄录并保存下一首他所喜欢的坦尼森的诗，诗名叫《洛克斯莱大厅》，描述了所有即将问世的奇迹，包括飞艇、空战和宇宙法则：

我堕入未来，至那肉眼看不见的所在，
窥见梦幻中的世界，及所有即将来临的奇观；

看见苍穹充满贸易，挂着魔帆的商船，
以巨大的痛苦滑下去的是，紫色朦胧中的飞行员；

听见空中传来呼喊，那如雨般可怖的水珠，

来自各国空中海军的英勇鏖战；

南刮的暖风细声细语地扫遍全球，
各族的旗帜被卷入暴雨雷电；

直至战鼓不再擂鸣，战旗在人类的
议会，世界联盟中不再飘展。

多数人的理智敬畏地将躁动不安的王国主宰，
慈善的大地呵，在宇宙法则的包揽中
就进入安详的梦幻。

全班合影是在学校大门口照的，哈里在最后一排，独自一人靠后站着。骄傲地手执一顶男帽的是埃尔默·特怀曼，他已决定步他父亲的后尘当一名医生。查理·罗斯坐在前排的边上，他两条长腿向上翘起，袜子都露了出来。他即将进入密苏里大学主修新闻。哈里为了照像除去了眼镜。他没笑，注视着摄影师，右手搭在站在他前面的威尔·加勒特肩膀上。此人是班里的诗人，个子矮小，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哈里决定去考西点军校，他和打算去安纳波利斯的菲尔丁·霍钦正通过补习费尔普斯小姐的历史课在为考军校做准备。书卷气的哈里只跟女孩子击过剑，一辈子没打过一次架，还自称怕枪，却认为自己若当不了一位钢琴大师，或许能成为一名将军。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哈里在照片中的位置与在第二排边上的笑吟吟的贝西·华莱士相去甚远。

毕业的当天晚上，仿佛半个镇的人都挤进了学校礼堂。女生穿白裙，男生穿硬领的黑制服。用《杰克逊考察家》报的话说，站在台上的毕业生是天底下最漂亮的一群。发言的学生中没有哈里，他也没得到任何奖章和荣誉。那天是1901年5月30号，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俗称装扮日——所以直到天明，旗帜四处招展，乐队演奏的音乐不绝于耳。当时哈里17岁。

三、农夫之道

是埃克斯波兰瑟干的——爸爸过去常这样说。

——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1

哈里从独立城中学毕业后不到一年，灾难降临到杜鲁门家，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无法预料的变化。对哈里来说，仿佛一道帷幕突然从天而降，终结了他的童年和小镇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他是如此的热爱和适应，并曾以为会永远存在下去。

约翰·杜鲁门在小麦投机生意上走了背运。1901年夏天他开始蚀本，为了补偿损失，他把更多的资金压了进去，直至将他和马蒂所拥有的一切全部赌光——总共是价值4万美元的现金、债券和个人财产。其中包括马蒂父亲送给她的位于蓝岭的160英亩良地。

约翰·杜鲁门可谓是一败涂地，在51岁时，他变得一贫如洗。位于沃尔多大街的房子只好变卖。一段时间，全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他们不得不收拾家什，彻底离开了独立城。他们在堪萨斯城一个收入较低的居民区定居下来，约翰在当地找了份过去杜鲁门家人从未干过的拿工钱的工作。他在一座装卸粮食的仓库当夜间守门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挣的只相当于一个农场帮工的工钱。这对他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和那些爱他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段痛苦的时期。

但他们没有怨言，杜鲁门家从不怨天尤人。埃塞尔·诺兰后来曾说，到处宣扬你的苦处的做法不可取，一个人应该永远乐观。遇到别人问你怎么样，你的回答应始终是：“很好，你呢？”要把痛苦压在心里。她的话是肺腑之言，因为她父亲也曾“盲目地投资”铁路生意，结果落得个“一文不名”。

哈里关于他父亲所经历的灾难，在后来的岁月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认为他可以致富，但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彻底破了产。”

哈里在毕业的那年夏天也试过一次小赌博，他当时坐火车东行去看望他最喜欢的住在南伊利诺伊州的小姨。那是他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回来的路上他在圣路易斯停留看望他妈妈家的另一个亲戚赫蒂·鲍威尔姨婆和她的家人。他被带去看一场赛马，其间他表姐和其他三个小伙子将5美元压在一匹获胜可能性非常小的叫克劳德的马上，并说服他也加入了他们的赌注，赌金就是5美元中的1元。哈里后来才知道，克劳德是个有名的“泥马”，跑道的条件越糟糕它跑得就越快。比赛刚刚开始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克劳德不仅得了第一，赌它的人还都赚了大于赌金25倍的钱。哈里从没像那天似的感到那么富有，不过在未来的40年中他没再赌过一次马。

由于视力原因西点军校没有录取他。此时由于他父亲经济拮据，上大学已没有指望。从圣路易斯回来后，他在堪萨斯城市中心一所不大的斯波尔特商学院报了一门会计课程，但最后由于学费太贵只得放弃。为了资助家人，他在《堪萨斯城明星报》的收发室找了份差使。后来在夏天快要结束时，一位同学突然不幸死亡，一份更好的工作就落到哈里手里。他们班里的画家塔斯克·泰勒一直在圣菲铁路线上做一名工地记时员。8月的一个炎热夜晚，他在位于密苏里河上游的独立城抽水站附近游泳时溺水而死。哈里在约翰·杜

鲁门的敦促下接过了这份工作，对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说，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艰难的开端。

圣菲线路当时正在堪萨斯城铺设双道铁轨。哈里一周工作6天，一天10小时，薪水是每月30美元外加住宿。这意味着他和工友们一起住在河边的帐篷里，每天吃油腻腻的食物和倾听他们的言谈。若按小时计算，他所得报酬比在克林顿杂货店里时好不了多少。工友们的语言大多粗俗下流，所聊内容是哈里难以想象的一种生活。

他记录每个人的上工时间，工友的人数共有400来人，包括赶骡子的、铁匠和主要由流动工人组成的普通民工。他还负责两周发放一次工钱，一般是在星期六晚上在一家酒吧里，这样一来民工就把他们挣得的钱全部喝光，周一便不得不重新返回工地做工。哈里不无悲伤地看到，这一招总是很灵验。

他对工作本身却颇感兴趣。他尤其喜欢独自一人坐在铁路上的四轮小车里在帐篷之间疾驰。而且他与工友们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喜爱他们。他管那段日子叫“活生生的教育”，工人们也非常喜欢他。6个月后工程竣工，在大家告别时，一个工头祝他快乐，并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说，哈里·杜鲁门是个“不错”的家伙。“他从头到屁股都是个好人。”

这是哈里第一次公开受到夸奖。

1903年4月24日星期五，哈里西服革履，黑色制服上衬着硬领，走上堪萨斯城的沃尔纳特大街，去雄伟庄严的国家商业银行申请工作，他从里到外都是个标准银行职员的打扮。

“你善长数字么？”一份两页纸的就业申请表上这样问。他写道，“还可以。”被解雇过么？没有。抽烟么？喝烈性酒么？欠着债么？对这3个问题他都做了否定的答复，然后迅速勾出代表“同上”的破折号向表格下方移动。“你是否赌博过或玩纸牌赌钱？”“他又写上没有。”“你是否赌过马或以任何形式做过投机？”

我们无法猜测他脑子中是否闪现出克劳德的记忆，但保存下来的表格表明，他显然在此犹豫了一下。他想写点什么——已写出了一个字母的下行比划——但显然又改变了主意，再度划了一条表示“同上”的破折号。回答又成了否定的，这个我们所知的他亲笔写下的最早的符号表明，一旦情势所迫，他可以不说出事实的全部，也表明他亦是个常人。

当问到他是否有奢侈的兴趣和习惯时，他说没有。“你喜欢什么形式的娱乐活动或消遣？”他写道，看电影和读书。“你在哪儿消磨晚上和星期天的时光？”在家。都是实话。

他怀揣一封怀特曼医生写的推荐信，上面说他是个“模范的年轻人”。约翰·杜鲁门走运时的朋友威廉·肯珀从中帮了他一把也是可能的，因为肯珀是银行的董事之一。不管怎样，他以职员的身份被雇，以起点20美元的月薪在保管库工作，前后干了2年。他开始的报酬与他父亲做夜间守门人的收入相差无几。在他雇主眼里，他的表现极为出色。他的顶头上司A·D·弗林特姆对他总是赞不绝口。在他写的关于年轻的哈里·杜鲁门的第一份报告中，他写道：“哈里是个绝顶聪明的青年，自他接管保管库后，那里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起色。”

他任劳任怨，坚守岗位，尽一切努力与同仁搞好关系。保管库里过去从没有过像他这么好的孩子。他做事一丝不苟，由于他的细心，发现了许多一个粗心的孩子

容易疏漏的差错。他衣冠整洁，习惯和性格都无可挑剔。

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弗林特姆对杜鲁门“出类拔萃的性格和良好的习性”再次大加赞赏。他上班准时，“总是坚守在岗位上”，他的工作“颇有起色”。此外他还“很有抱负”。“银行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能超过杜鲁门。”弗林特姆在呈交给查尔斯·H·穆尔副总裁的报告中写道。弗林特姆并非滥施溢美之辞，这在他对此时也进入银行工作的维维安·杜鲁门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弗林特姆认为维维安“尽管外表很帅，能力却平平，与他哥哥大相径庭……”

职员们都称哈里工作的保管库为“动物园”，它的位置在地下。银行的大堂具有科林斯式圆柱和铜制痰盂，还有许多通往各处的通道，保管库就在大堂之下。哈里兑现从乡村银行支取的支票，有时每天要处理100万美元的金额，所有标记均用普遍写法记录。这个工作不太需要想象力和首创性，故而他不大喜欢，而且查尔斯·H·穆尔副总裁似乎是第一个让哈里不喜欢的人。这家银行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银行，哈里·杜鲁门多年后回忆说：“每当穆尔把某个好欺负的倒霉的小职员叫到富丽堂皇的大堂站在他面前时，他永远都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训斥人家笨手笨脚，办事拖沓……”然而哈里却始终尽力而为，薪水也不断上升。一度他曾挣到一个月40美元，成为他家中薪水最高的人。

他在国家商业银行的时间是1903年至1905年。他刚上班两个月就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贝西·华莱士的父亲、独立城知名人士之一大卫·华莱士自杀身亡。各家报纸纷纷登载了这条消息。7月17日凌晨，大卫趁家人依旧熟睡期间，为了不吵醒妻子小心翼翼下了床，穿好外衣，从梳妆台里拿出一把手枪，顺着大厅走进卫生间，站在房子中央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耳后，然后扳动了扳机。他43岁，按《杰克逊考察家》报的描绘，“周身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除了妻子马奇·盖茨和18岁的贝西·华莱士外，他还有3个儿子，年龄分别从3岁到16岁。他死时没留下任何文字。“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自戕呢？”《考察家》报问，“这是个我们所爱他的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报道中还包括了一个可怖的细节：子弹穿过他的头部，落在了浴缸的龙头处。

独立城上了些岁数的朋友和邻居都记得20年前马奇·盖茨嫁给大卫·华莱士的那场婚礼，那是这座镇的历史上最隆重的场面之一。当晚月明风清，盖茨府邸的草坪上挂满了中国灯笼，映照得灯火辉煌。客厅中的结婚礼物中有许多油画和一套瓷器和银制的咖啡餐具。大卫·华莱士是来自肯塔基州的一个老拓荒者的儿子，直至结婚时既无财产又无社会地位。他在政府大楼里从政。然而盖茨家的显赫地位足以补偿了大卫的卑微身世，而且不少人认为他是独立城最漂亮的男子。他就像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的诗作《里查德·科里》中那个风度翩翩的小镇人物，相貌迷人，“心绪不宁，在一个静谧的夏日夜晚，回到家中将一颗子弹射入头颅”。

《考察家》报没有涉及、但人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大卫·华莱士是个酗酒者——他常被朋友们抬回家——在推测这一悲剧发生的诱因时，多数人把起因归咎于这一点。有人传闻说他在钱财方面出了麻烦，认为他负债累累，“不能自拔”。

倘若杜鲁门家因约翰经济上的破产而感到羞耻的话，他们的羞耻与出现

自杀的家庭所经历的难堪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当时杜鲁门家已搬走，马奇·盖茨带着贝西和年幼的几个儿子去了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一年之内杳无音信。与马奇家要好的人除了在私下里从不谈及大卫的事。“体面的人”是不希望谈论这类事的。

直到6年以后贝西的好友玛丽·帕克斯顿才详尽描绘了那天早上她父亲如何将她叫醒，让她立即到隔壁去陪陪贝西，因为华莱士先生自杀了。“我记得（贝西）两手握拳在后屋里走来走去，她没有哭。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陪着她走……”从没有人听见哈里·杜鲁门在公开场合谈论过此事。

杜鲁门家离开独立城后哈里就再没有见到过贝西。也不知她的下落。甚至直至她从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返回，开始每天坐车去堪萨斯城为有钱人家女子设立的巴斯托精修学校学习之后，他俩依旧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贝西和内心痛苦的母亲及几个弟弟搬进了北特拉华大街219号她外祖父母的家，故而当杜鲁门家的“境遇”大为衰败之时，贝西却成了盖茨府邸的“小公主”。哈里获知的有关贝西的消息都是诺兰姐妹提供的，她们因住在盖茨家的街对面，因而消息比较灵通。

自从到银行工作以后，哈里一直住在堪萨斯城那个临时将就的家里，除了车钱和饭费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开销。根据他兜里记帐薄的记录，他一天的伙食费为50美分。一次他把价钱置之脑后，花11美元买了一些领带、领子、袖口、饰针及其他东西。后来又花10美元到怀特夫人家上钢琴课，然而很快就放弃了。他后来曾说他停止学钢琴的原因是因为弹琴未免有点女气。事实却是他已付不起钢琴课的费用。

他唯一的享受就剩下看戏了，他对戏剧乐此不疲而且舍得花钱，有时可消费2美元。他去奥菲厄姆和格兰德剧院观看轻歌舞剧。有一阵他每逢星期六下午就在奥菲厄姆剧院当引座员，仅仅为了免费看戏。他看科汉4兄弟和萨拉·伯恩哈特的表演。他还去会议大厅听音乐会和看歌剧。这位“霍雷肖”一次用国家商业银行的信笺匆匆写就了一张字条，约他表姐埃塞尔和内利在某处与他会面一同去看戏，在结尾处他写道：“我知道贝雷斯福德先生演技很出色，所以你们一定得来。我已经搞到了票……”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在《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中的表演令哈里感到无比惊骇，以至不敢单独回家。

堪萨斯城人口20万，仍旧是座牲畜满目的农业城镇。圣路易斯则是个古老的都市和有钱人的聚集地。圣路易斯朝东，堪萨斯城面西，是两座迥然不同的城市。然而堪萨斯城的发展速度却突飞猛进，并以能为人们提供最新潮和上乘的服务和商品而引为自豪。敏感的年轻人不难发现，美国在新世纪伊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生机和自信唯有在堪萨斯城才能日日感受得到。哈里以为这里是“成就事业”的所在。一次，他和几个职员冲出银行跑到第10大街去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站在一节火车的尾部进行演讲。那是他第一次目睹一位总统，尽管罗斯福说起话来嗓音平和，而且身材异常矮小，哈里却认为他的演说很出色。人群极为振奋。“他们想让他笑一下，看看他的牙，总统照办了。”1905年5月，哈里报名参加了国民警卫队的一个新支队。他回忆说：“那年5月我满21岁，已经可以自做主张。”警卫队与西点军校的梦想虽不可同日而语，但二等兵哈里已开始加入密苏里轻火炮部队第一旅B炮兵连进行操练（“他们需要兵员。”他后来解释为何他的糟糕视力竟能通过体检时说）。当年夏天他的第一个驻扎地是在遥远的位于密苏里东南角的

基拉多角。他先坐火车到圣路易斯，然后坐汽船顺密西西比河而下，“那着实是一番有意思的经历”。他回家时已成为下士——“是我所获得的最高的晋升”。——在周末探望扬氏农庄时，为了讨他外祖母的欢喜，他穿上一套崭新的袖口镶着漂亮红色滚边的深蓝色军服。然而他刚跨进门槛，就让她外祖母想起了联邦士兵。她告诉他以后绝不能再当着她的面穿那套军装。

此时哈里已基本自立。约翰·杜鲁门工作上潦倒，城市生活亦使他感到厌倦，于是决定东山再起。他在密苏里州的克林顿租了一座不大的农场，地点在东南方 70 英里开外的一处富裕乡村，坐落在格兰德河河畔。马蒂只得再次打点行装迁徙，哈里便留在堪萨斯城，寄居在约翰姐姐埃玛·即罗彻斯特·科尔根太太的家里。

堪萨斯城依旧是个自由放任的城市，完全与它的名声相符。妓院和酒吧的数量远远超过教堂。作家爱德华·达尔伯格的母亲是坐落在第 8 大街上的“名星夫人”发廊的老板，他回忆说：“每当单身汉或心力交瘁的怪僻的家伙们想（女人）放松一下时，他们就在橱窗上寻找写着‘暂栖屋’或‘轻松家务陋屋’的招牌。”在达尔伯格的记忆里，他儿时的故乡堪萨斯城在 1905 年时几乎充满了性和其他方面的诱惑。在他眼中，这是个“粗野的、性欲横流的城市”。他的同时代人、后来成为一流作曲家的弗吉尔·汤姆森在文章中曾写道，整条街整条街除了酒吧别无他物，这与边界那边的枯燥乏味、“绷着一副道德面孔”的堪萨斯州形成鲜明的对照。“孟菲斯和圣路易斯到处弥漫着布鲁斯音乐，而我们则有歌唱愉快的下等人生活的‘12 大街拉格泰姆’乐队。”但哈里似乎与这种享乐型的下等人的生活无缘。后来他和朋友就他学音乐的话题开玩笑说，倘若生活的发展是另一个样子，他很可能就到妓院弹钢琴去了。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涉足那类地方，也从未“染指”任何堪萨斯城的时髦潮流。

在埃玛姑姑家住了几个月后，哈里搬到了位于特鲁斯特大街的一个说得过去的供膳寄宿处，主人是特罗太太。连房租带餐费（早餐和晚餐）他每周付 5 美元。住在此处的另一个小伙子是商业银行的一个信使，他是来自堪萨斯阿比林的阿瑟·艾森豪威尔（阿瑟的弟弟德怀特·大卫当时还在家里上中学）。阿瑟后来回忆说：“我和哈里每周只剩下一美元可以放纵一下。”

哈里因商业银行拒绝了他一次提薪要求，于是辞职调往位于第 9 大街和巴尔的摩大街交界处的联邦国家银行。后者设在堪萨斯城最著名的 10 层纽约生活大厦里，正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只巨大的铜鹰。他的工资提高到每月 75 美元，联邦国家银行的工作环境也比从前好得多。作为助理出纳，哈里不久就挣到每月 100 美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份薪水的确可观。

新工作，高收入，加上哈里新结识的朋友和他在国民警卫队的训练，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幸福。倘若他 4 年前上了大学，此刻可能刚刚开始找工作。他买了顶巴拿马帽，还照了张像。在新建成的票价昂贵的威利斯伍德大厅，他观看亨利·欧文和埃伦·特里表演《威尼斯商人》。

然而他想在金融界发迹的梦想不久就幻灭了。新的不幸又降临到约翰·杜鲁门头上——他在克林顿种的玉米全部被洪水淹没——于是他同意搬到扬氏农庄，管理蓝岭农场。一直在那里操持的哈里森伯父感到力不从心，打算再返回城市。蓝岭农场面积颇大，而且帮手越来越难找。

大家对新的安排似乎都很满意，于是 1905 年 10 月，杜鲁门一家除了哈里之外全部搬回蓝岭。问题是尽管有维维安的帮助，约翰也感到那里的活计

过于繁重。因而四五个月后，哈里接到家里的通知，让他辞职回家。家庭的利益永远第一，即使哈里心怀不悦或颇为后悔，他也从未流露过，他的朋友则断定他绝不会一辈子务农。

2

接下来的日子与堪萨斯城的生活可谓是天壤之别。直至5年后他重新遇到贝西·华莱士为止，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庄稼、季节、种子、昆虫、雨水和阳光、家畜、农场、农具、银行贷款之上，同时还随时受到他那位精力充沛、固执倔强、决心在成功之路上做孤注一掷的父亲支配。

农场成了万事的中心。它是整个家庭，包括其主计、责任和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命脉。哈里记得人人都得干活，“当二流子就得喝西北风”。

一位邻居说：“你想成功就得干活。”这是一句富有哲理的共识。“即使猛干一通你也未必能成功，但你必须苦干，否则就别想有出息。”

另一位邻居回忆说：“简单的生活也不总是很简单。生活很艰难……需要韧劲才能维持……你得一件件的事去做。”

每天凌晨5点钟，屋外还漆黑寒冷时，哈里的父亲就在楼下把全家人喊醒，哈里的一天就算开始了（当时是1906年，是哈里返回农庄的第一个春天，碰巧又是杰克逊县所遇到的异常寒冷泥泞和暴雨连绵的春天）。他父亲鞭策他一天不停地干活，教他各种活计，还不断地提醒他不要伤着自己，不可抬过重的东西，哈里就把自己当作两个劳力拼命地干。显然，约翰·杜鲁门是想既把庄稼种好，又把那个笨手笨脚的银行职员锻炼成个人才。

哈里学拉套犁，那是由4匹马拉的安装在3个轮子上的双犁。窍门是要让每一匹马都平均使上力。起初，他一天10个小时能犁5英亩地。有时早上为了暖和身子，他不坐在犁上，而是步行拉犁。他记得有时早上寒冷难当，穿一件毛衣、两件外套和一件大衣都不管事。

仲春时节，他开始学开玉米播种器和小麦条播机。约翰·杜鲁门不允许玉米行距出现偏差，麦田里也不能有空地，因为这两种庄稼都是赚钱的作物。倘若玉米地和麦田里出现空当儿，哈里就得听父亲唠叨一夏天。“我父亲告诉我在开播之前须先调整好播种器，把马控制好，在1/4英里或半英里之外的田地另一头找一个目标，把播种器的辕杆对准那个目标朝前走，让马轻快地跑起来。”哈里的日子大体就是这样度过的。

有些麦地一望无际。有一匹马总不听使唤，哈里夜里在梦中都在冲它叫喊。

农场占地约600英亩，是全县最大的之一，比密苏里一般的农场大上4倍，因而需要约翰、哈里、维维安和几个帮工全身心的投入。哈里发现，矮小而饱经风霜的约翰无法理解有些人何为早上过了5点还不起床，在约翰面前，没有什么活计能吓倒他。哈里讨厌给牛挤奶，尤其无法忍受它们沾满粪便的尾巴甩在他脸上。耙干草也是个“可恶的活计”。他还受不了往猪鼻子上套环，而且认为给玉米脱壳时那尘土飞扬的场面不啻于下地狱。然而孩子们发现约翰·杜鲁门却处于幸福的巅峰。他说若不是顾及到他们的教育，他从前压根儿就不会离开农庄。玛丽·简记得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知道他在何处，因为他干活时嘴里永远哼着歌。

他晓得怎样让哈里他们精神“抖擞起来”，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准的活干

得不错。一个打小就帮着他们打谷的邻居盖伦·巴布科克说：“没错，你的活要是干得棒，他就夸你。他让你觉得你必须把活干漂亮。”另一个人记得杜鲁门家同时用3组马给玉米地播种。几天后他又看见那3套马再次在还没长苗的玉米地里耕作，目的是在野草长出前就把它们除掉。

每天都得干活，永无休止的活儿，“凡是能干的活儿”哈时都干过——夏天在毒日头下锄玉米和土豆、晒干草、给马看病、修农具、磨锄头和镰刀、修篱笆。有些活儿他很擅长，另一些差点儿。他用左手使斧头和锯，做得活儿一看就知是用左手干的，为此常遭到嘲笑。他学会了草地云雀的歌（按照当地的传统，云雀唱的是：“漂亮的小伙快去干活。”），还知道刮西北风就意味着有雨。他父亲教他时他很认真，因而同维维安一样也成了家畜方面的专家。他们养登记过的短角牛、羊、骡子、良种马和罕布什尔猪。约翰还因他的马获过几次奖。哈里最喜欢的是猪，给它们起的名包括“泥巴”、“老鼠”和“卡里国”。他还负责帐簿，把卖给别人庄稼的种类和价钱记录下来：

土豆，1906年10月

本·维斯特 2蒲式耳 每蒲式耳7便士 付1.4美元

艾伦太太 1/2蒲式耳 付0.35美元

猪和牛

8月23日 给K·C· 9头猪 74.38美元

8月24日 给K·C· 1头猪 15.93美元

10月18日 给K·C· 1头母牛 32.85美元

11月4日 卖马差额 3.00美元

其他

10月18日 菲利普斯 8蒲式耳苹果 付2.00美元

11月2日 约翰·斯威敦 6蒲式耳存款帐户 1.65美元

9月16日 5/4蒲式耳绿豆 6.80美元

11月4日 12蒲式耳萝卜布朗先生 3.00美元

农场边界依旧是所罗门·扬活着的时候竖立的石头樊篱，两根方形的石灰石大门柱是从石路通往入口处的标识。农庄前马路两旁的榆树已长得茂密高大，因而从马路到房子的那段距离遮映在浓荫之下。房子后面越过果园依旧矗立着那座涂成红色的用胡桃木造的老谷仓。

目力所及的唯一邻居是北边的斯劳特一家，他家农庄的边界与杜鲁门家毗邻，将近1英里之长。斯劳特家有8个孩子，是那一带最富裕的农户。O·V·斯劳特和他妻子伊丽莎白从小就认识马蒂。夜幕降临后所见到的唯有他家的灯光，除此之外则是清一色的庄稼地、树木和天空。

杜鲁门家离开的那几年，蓝岭地区最大的变化是位于南部一英里之遥的格兰德维厄的发展。所罗门·扬死后不久，农场的南端建造了两条铁路：堪萨斯城南线和圣路易斯—旧金山线，格兰德维厄小镇便应运而生。如今乘大车从石路上走，只消10分钟就能到达邮局、食品杂货店、饲料和五金商店以及两个火车站。星期天清晨，格兰德维厄浸礼会教堂的钟声清脆嘹亮。

整个农庄依旧属于外祖母扬。那座在大火后为她盖的木制小农屋还算结实，只是现在住进了杜鲁门家5口人显得有些拥挤。房子涂成白色，镶以墨绿色贴脸，室内有7间狭小的房间——厨房、餐厅、前厅，起居室和二楼的

两间卧室。哈里和维维安睡在餐厅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头顶就是屋檐，屋里开有两只落地式小窗户，小屋只能从狭窄的后楼梯上去。

房子没有电、自来水和抽水马桶。马蒂用一只煤炉烧饭。冬天，手力压水机常常冻得瓷瓷实实。夏天，哈里和维维安位于屋檐下的屋子活像个大火炉。除了马蒂的那个胡桃木的梳妆台，所有的家具都简陋无华。唯一的一个现代化家什是部电话，挂在前厅旁的墙上。

邻居们记得杜鲁门家惊人的整洁干净。哈里说他母亲有鼓捣扫帚癖，搅得人人不得安宁。他写道：“冬天最冷的时候，她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手里握着一把扫帚和抹布，我们都冻得要死，她却得意洋洋无限幸福。猫狗一见到她的身影就各寻逃路。”

土地依旧是全州最肥沃的，哈里颇为满足地说：“你在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土地。”他渐渐对“从地里制造出东西来”感到极大的兴趣，为此他自己都颇觉吃惊。他阅读卡托《论农业》一书中有关种植豆角、苜蓿、做混合肥料、熏火腿以及甘蓝的医疗价值等方面的知识。他还钻研《华莱士的农民》并浏览农业大学的报告以便获取科学知识。杜鲁门家早于当地的大多数农民开始轮种庄稼，一些年份的收获相当可喜——每英亩小麦产量从13蒲式耳提高到19蒲式耳。为了预防土壤流失，哈里把大捆大捆的腐草倒入冲沟中。土壤在草上覆盖后，他就撒上梯牧草种子。这种做法过去从没有人在格兰德维厄尝试过。

当地兽医埃德·扬形容哈里时说“永远奔前跑后，总能把事情办成”。倘若约翰·杜鲁门是个做事愿意看到成效的人，哈里亦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倾向尤为明显。他家的帮工布朗尼·休伯回忆说，他在给马具上油时，哈里让他把马具上的带扣全部解下来，以便带扣底下也能抹上油，他帮过工的主人中唯有哈里让他这么做。

布朗尼·休伯为杜鲁门家干了6年活，他说哈里还有另一大特点。他能“烤出一炉饼干，味道不亚于任何女人的手艺”，再有他做错事就承认。30年后，休伯回忆起一年秋天他正在为冬小麦耕犁时发生的一件小事：

土地硬得像石头，所以我耕完一圈就得让3岁的小马驹停下来休息一下。他家里的什么人可能抱怨我老歇着，因为第2天哈里走来对我说道：“布朗尼，最好能不间断地犁。”我连续耕到第3圈时小马驹突然摔倒了。我叫哈里，他匆匆跑来，感到很痛心。我们把马卸了套，牵它到树荫下吹凉风。过了一会儿哈里转过头对我说：“布朗尼，从今后活怎么干你看着办。”后来我为哈里干活时他一直采取这种态度。

在有些人眼里，哈里给人的感觉有所不同。一位格兰德维厄的居民看到哈里衣着整洁，彬彬有礼，以为他肯定是个牧师。一个年轻女子记得他十分随和。她说：“他人很实际，但又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当时就有。”打谷时节，作为季节性的劳力互补，邻近农民都过来帮助杜鲁门家。哈里经常是上午干完活后，当别的男人都歇着等着丰盛的午餐时，他迅速洗洗就去厨房帮着他妈妈和妹妹。斯劳特家的小儿子斯蒂芬·斯劳特说，他从没看过哈里像其他农民似地穿着像个大围裙似的工装裤，因而他与众不同。“他老是穿得很整齐——不是专门修饰，而是很整洁。不，不，他从不穿肥大的工装裤。”斯蒂芬第一次见到哈里时是在斯劳特的农庄，那是打谷季节的一个清晨，当

时他还是个孩子。哈里赶着一辆大车冲进了院子，他戴顶巴拿马帽，赶车时独一无二地站在车上。

哈里的生活圈子逐渐扩大。在农庄呆了3年后，他参入了共济会。他爷爷和老爷都是共济会会员，约翰·杜鲁门尽管没参加，但一直有此愿望。1909年1月30日，哈里被选拔去贝尔顿分会接受等级晋升。3月份，他因“熟谙”仪式程序被提拔为长老共济会会员。他对联谊会表现出很大的热忱，并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参加仪式和接受共济会纲领的道德教义。这一团体历史悠久，莫扎特和安德鲁·杰克逊都曾是会员，许多总统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当时的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是会员，这些以及共济会兄弟般的情谊使哈里感到精神振奋。每个共济会成员都知道，乔治·华盛顿就职宣誓时面对的是一部共济会《圣经》，而且砌国会大厦奠基时用的是一把共济会泥刀。

1909年秋天，哈里·杜鲁门被任命力执事。翌年，他在格兰德维厄创立起一个新的分会，地点设在梅恩街一家店铺楼上的房间里。26岁时，他已成为那一带的重要人物。共济会兄弟盖伦·巴布科克回忆说：“哈里是个相当不错的分会会员。”盖伦不像其他人似的认为哈里是个出色的农民，对他的性格也不以为然。他觉得哈里好像是杜鲁门家一个“杂务工”。而且他还对哈里成年后仍弹钢琴和嗲声嗲气地称呼他妈妈很看不惯。巴布科克更喜欢维维安和约翰·杜鲁门。然而他认为哈里“在分会的工作做得很好——非常出色”。

对哈里加入共济会产生主要影响的是贝尔顿一家银行的职员弗兰克·布莱尔。斯蒂芬·斯劳特回忆说：“弗兰克·布莱尔让哈里产生了兴趣……聪明的哈里又很有抱负。他(哈里)有想法……我敢肯定他甚至有参政的想法。”哈里还加入了杰克逊县农庄局，局长就是斯蒂芬的父亲O·V·斯劳特。

1909年12月，外祖母扬刚过完91岁生日就过世了。非常爱她的哈里试图在脑海中勾画出她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她生于1818年。她曾对哈里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所罗门不在家，一群印第安人闯进屋索要蜂蜜，并在磨刀石上霍霍磨刀。她冷不丁放出一条大狗把他们赶跑了。晚年时她喜欢在阳光下坐在一把摇椅上，默默地用烟斗吸玉米棒子的芯。她的死第一次直接触动了哈里。当年圣诞节是最令他悲伤的一次节日，他说，因为有了外祖母。

按照哈里特·扬的遗嘱，农庄归马蒂和哈里森所有，她其他5个孩子没有份，原因是他们没有参予农庄的活计，故而应将多年来他们所收到的金钱礼品视作公平的补偿。不言而喻，这份遗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与此同时，哈里森伯父愈来愈频繁地从堪萨斯城来农庄探望，每次来都带回一肚子的滑稽故事并期待着与哈里打桥牌决一雌雄，令哈里无比兴奋。哈里逐渐看出，哈里森伯父是个“人物”，他是个魁伟、健谈、口带脏话、心胸开阔的人，伊然是密苏里州的福斯泰夫。别人不该做的事他却做得痛快淋漓——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显然，他有别于格兰德维厄所有的人。他身高6英尺，体态粗壮——哈里估计他重240磅——总是穿三件套的西服，戴金表链，怀里还老揣着大把大把的现金。他喜欢游荡、爱看轻歌舞剧、着迷赌博和堪萨斯城女人，而且认为哈里应学一种叫“鸽子翅膀”的新舞步。他还酗酒成性，哈里注意到，他要是歪在沙发上睡着，便可创打呼噜的世界纪录。

哈里以为杜鲁门家的人从本质上讲都是忧郁者，唯独哈里森伯父说他让别人替他代劳忧虑。哈里森伯父对哈里影响颇大，因为他俩相互欣赏。

哈里渐渐长胖，体魄也强壮了。和父亲相处使父子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四季一道干活，俩人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感情会如此亲密起来。约翰·杜鲁门开始依赖于哈里并尊重他的主意。一天一匹马在谷仓里拉木梁时木头砸在了约翰身上，造成腿骨折，哈里便承担起农庄的活计，直到3个月后的1911年4月。后来一头小牛将哈里撞倒，致使他左腿膝盖以下部位骨折。几周里他父母对他显示出的关怀和照顾令他大为震动，“爸爸给我买糖和水果，好像我是个两岁的孩子，”他写道，“妈妈每天都腾出一半的时间照顾我，给我烙我爱吃的大饼。你只有受伤后才知道别人心里是多么想着你。当然我以后要多加小心。”

那年的下半年，维维安娶了邻家农民的女儿利拉·坎贝尔，从家里搬了出去，于是约翰就像所罗门·扬当年对他似的让哈里成为他的正式合伙人。碰到农场能净挣4000美元的好年头，哈里就能分到2000美元，相当于他在银行工资的两倍。但按照合约，哈里也须对半担付约翰·杜鲁门所欠的巨额债务。

他们印制了新的信笺，上面刻着“J·A·杜鲁门父子，农民”的字样。且不说那一地区人们的观点，按照他家代代相袭的生活标准，哈里·杜鲁门已算功成名就。维维安多年以后振振有辞地说：“在密苏里当个好农民——那就是最大的成就。那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哈里本人在1911年10月写下的一段文字总结出了几代人对杰斐逊所鼓吹的农民国的古老梦想的坚定信仰：

你们知道，只要一个国家是那种类型，人民就更有独立性而且可成为优秀的公民。一旦建立了工厂和大都市，国家很快就变得压抑萧条，人民中也将产生阶级。每一个农民都认为他不次于总统，或许比他还略胜一筹。

这是写给独立城的贝西·华莱士诸多信中的一封，因贝西对农场和农活知之甚少，所以哈里想向她灌输这方面的知识和影响她。此时他已深深地坠入了爱河。

3

“我见到她啦。”据说哈里191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咧嘴笑着对诺兰姊妹这样说。

埃塞尔和内利·诺兰都做了教师，依旧住在北特拉华大街那幢房子里。埃塞尔是家史的记录者，据她说，哈里一次正在她家作客，有人提到须把一只装点心的盘子还给华莱士太太，哈里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主动要求前往。他穿过街道，走到盖茨宅邸前，跳上四级台阶站在游廊上，按下那扇高大的带着双页扇大门上的电铃，然后伫立等待着。“开门的是贝西，”埃塞尔回忆说，她肯定一直站在自家的游廊上注视着他，“毋庸置疑，能再次见到她和她交谈对哈里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欢喜。”

从农庄到北特拉华大街仅有16英里，但乘轻便马车却需很长的时间——来回要4个多小时，而且哈里想去时约翰·杜鲁门还得有现成的马车供他上路。坐火车也快不了多少，且并非省事。哈里得先步行至格兰德维厄，登上旧金山开往堪萨斯城线的列车，然后再转乘开往独立城的车。然而在格兰德

维厄停车的车次极少，转搭连结也很差，即使一切不出差错也经常长时间晚点。另一个办法是截一辆马车先到蓝河边一个叫多德森的地方，然后在那儿搭乘州际电车至堪萨斯城，再换乘另一辆电车至独立城。不管哪种走法似乎都有意要与他作怪。然而他一有机会就去，经常躺在诺兰家的长沙发椅上过夜。镇上的老朋友和亲戚们颇为他的热情所感动。在独立城人的眼里，格兰德维厄就是“乡下”。

他还被邀请去贝西家赴周日晚餐，一个黑人仆人给上菜时，他恭敬地坐在贝西、她正襟危坐的母亲、她弟弟们以及她外祖父母之间。餐罢他就在客厅里为他们弹钢琴。贝西也接受他的邀请去堪萨斯城听音乐会和看戏，还陪他去看他从前的钢琴老师怀特太太。哈里十分肯定她俩会相互喜欢（“她是不是很特别？”他后来这样说及怀特太太）。然而别人留意到，贝西没有去农庄见哈里的家人。

然而他向她倾吐情感的方式却是一封接一封的信——随着时间的飞逝，他总共写了几百封信。他向她描述在她面前他无法发现的事情，他一生中从没写过那么多字，而且发觉写信可以给他带来莫大的满足。他还饥渴地盼望她也给他写信，他对她说这种渴望是促使他如此频繁和详尽地给她写信的主要原因。用合用线打电话是不可能的，因为邻居们可以偷听。哈里压根儿就不喜欢电话。他向贝西解释说：“一打电话我就紧张，永远说不出我想说的话。”

由于贝西那一时期写给哈里的信没有一封保存下来，因而她信中的内容、所采用的口吻只能靠想象或从哈里的回信中推测了。

从格兰德维厄寄出的大量情书中，贝西所认识的的是一个乐观、滑稽、有趣、非常机灵、率直和情感奔放的小伙子。而她也有许多与他相同的地方。尤其是她的活力和幽默感，使她在她的圈子里颇受欢迎。在哈里·杜鲁门再度见到贝西之前，几个小伙子也被贝西的魅力所吸引。独立城首富之一的公子克里斯曼·斯沃普是贝西家的常客。追她的人当中还有一个叫扬先生，一个叫哈里斯先生，而且显然她还和一个朱利安·哈维的堪萨斯城小伙子有过一段“浪漫史”。哈里从一开始就明白，贝西是个习惯别人围着她转的女子。

哈里知道他自己的拼写很糟（“手头总是备着一本中学时的字典实在是带劲，”他写道，“这本字典怎么拼我都不会，还得查它的封底。”）。不言而喻，他热衷于谈论他自己。他本人是他喜欢的话题，但他总能适可而止而且具有幽默感。贝西觉得他写给她的信别具特色，非常幸运的是，把它们都保存了下来。

你在操作一台老掉牙的收割扎束机时须得坐在离拉机器的马半英里远的地方（他在一封信中解释说），要么你扯着嗓子喊个不停，要么马就给你停在那儿。我的马鞭太短，要是把鞭子放长点儿它就得被碾在机器里，给我机器内部零件造成灾难，而且也有损于代办事妥当的名声。所以还是冲着马骂娘来得容易些。

“今天早上我帮着给人挖墓，”他在另一封信中说，想说明农民“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能遇到……”

掘墓并非像想象的那样悲惨。我们总共有五六个人，换着轮流挖。暂时不挖的人就坐着，瞎扯着他们挖过多少墓穴和养过多少头猪。那个下午我们过得挺愉快，然后就去参加了葬礼。

这些几乎算不得情书，全无“风花雪夜的废话”。他给贝西讲哈里森伯父、雇用的帮工，虽然他偶尔对干活的艰辛有所夸大，但却丝毫没有为了贝西而美化农庄的生活。其实他写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我去了地里，给大约一半的猪鼻子上套了环，共有 100 来头。你想象不出这活儿让人多么兴奋，尤其是泥已深到膝盖的时候……”他还描述了他的眼睛一次被玉米叶戳伤，以及拉了一天的干草脸就被晒得像生牛肉似的红。

他的主张强烈分明，而且偏见颇深，然而贝西并不在意，也没觉得他说的“黑鬼”、“西班牙穷鬼”和“黄脸儿”的字眼儿如何让她反感，否则她就会说出来，而他们的关系也就会告吹，因为哈里说过：“我的正确观点有其过分之处，我热切地希望你能忍受它们！”

他有时还变得很富哲理，虽然他不喜欢这个字眼儿。

有一次他说：“你知道，当人们能为生活中的凡人小事而感到兴奋时，那才叫生活。”

“你大概不理解经历可以培养同情心。”他在把腿摔断后不久在另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他知道她母亲十分看重宗教信仰，关于这一层他说他们一起长老会主日学校度过的日子他仍记忆犹新，而且尽管他自那以后加入了浸礼会，按照格兰德维厄地区对这一字眼儿的理解，他只是个差强人意的施洗礼者。“我看待宗教同其他事物一样，我认为行动比说更重要。”贝西曾邀请他参加在独立城举行的圣公会礼拜仪式（华莱士家也退出了长老会）。他对她说他还是第一次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他对“四旬斋之类的事体”一无所知。某个礼拜天他在堪萨斯城坦白地说：“我去教堂为的是做礼拜，却往往在教堂里聚精会神地听起了舒伯特的乐曲。”

他们还一起讨论作家。哈里认为马克·吐温是文学泰斗。一年前，他曾用自己的 25 美元买了一套 25 卷本的吐温的著作，这事他并没对她提起过。贝西劝他读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哈里的腿骨折后，于 1911 年 5 月写了封信，告诉她他惊讶地发现《大卫·科波菲尔》非常令他着迷：

我正在读《大卫·科波菲尔》，奇怪从前我为何对狄更斯不欣赏。过去我只读过《雾都孤儿》和《双城记》，印象一般，就没再读他别的作品。一个邻居给了我两本书《多比和儿子》和《大卫·科波菲尔》，我很高兴，因为它们激发了我新的兴趣。想到今夏我要读许多书，腿摔折了也算是值了。我恢复得很快，老怕好得太快就看不了几本书了……密考伯是我读过的书中出现的最滑稽的人物。他简直栩栩如生。格兰德维厄就有六七个这样的人物。他们总是盼着能发生点什么事……

后来出人意料地，他在当年 6 月在一封信中向贝西求婚，因怕她耻笑，他表露情感的口吻中还搀杂着几分自卑和拘谨。

你知道么，我要是个意大利人或是诗人，我就将使用欧美大陆最华美的语言。但我两者都不是，不过是个没出息的美国农夫。我心中总潜藏着一种感觉，某一天我会出人头地。

可现在我对此却产生了怀疑。我们家的人天生都不善理财，所以注定得倒霉。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认为你是天底下最完美的女孩儿。你可能猜不出，其实我们一起

上主日学校时就让我倾倒了。但我没有勇气，甚至不敢奢望你看我一眼……你说你对书中那些男欢女爱的故事已经厌倦了，因而我正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想你可能觉得可笑，但你必须记住我初次经历这样的事，而且是非常真心的。

三周过去了，贝西却音信杳无。他在痛苦中期待着，尔后又写信问贝西是否他说错了话得罪了她。她拒绝了他的求婚，而且显然是在电话里说的。当天，哈里又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贝西：

你很痛快地就拒绝了我，这几乎让我很高兴。我还不笨得不可救药，奢望你这样的姑娘会喜欢上像我这样的人，但我不能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一直希望你找一个富有漂亮的男人，但我一旦有机会，我也一定要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哪怕你以后永远不再理我。令我欣慰的是你对我的答复很认真，而且没有取笑我。你知道吗，当一个男人把心掏给一个女孩儿却遭到她的嘲弄时，我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你瞧，这些事除了你之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认识的所有女孩儿都把我看作一个傻呵呵的白痴和命里注定的光棍儿。她们根本不晓得其中原因，而且永远也不会。我一直害怕你连让我做你的好朋友都不成。只要能做你的朋友我也就满足了。

你可能想我跟其他男孩儿一样很快就会过去。不过我觉得我有点与众不同。我从来没有为了取乐而和别的女孩儿玩弄情感的欲望，原因一直是为了你。我每逢遇到一个女孩儿都要首先拿她与你相比，看她的缺陷在哪儿，结果每次我都能发现缺陷。

请千万别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此刻说的都是心里话，这些话我以后不会再对任何人讲，也不会再用它们来烦你。我这人的理想色彩多于实际方面，因而我并不期待着爱你而从中得到什么回报，尽管我将永远企盼着……

接着，为了下次再见到她时不显得自惭形秽，他换了个话题。你知道怎样人工降雨吗？他问贝西。

他俩交换了各自的照片，贝西随时欢迎哈里星期天去盖茨宅第赴晚餐。哈里一连几周想方设法请贝西到格兰德维厄去，但均未如愿。8月，他声称要在他家旁边的一片平地上为贝西建一座草地网球场。她可以带朋友来，痛快地玩一天。哈里在堪萨斯城的蒙哥马利区买了一台滚路机。由于农庄上和格兰德维厄没人会打网球和知晓网球场地的要求，他就让贝西给他寄去了场地规格。他打算在劳动节那天把一切安排就绪，并许诺说妈妈将做烧鸡招待她。“不像城里的正餐，只是午餐，明白吗？所以一定要来……一定要在劳动节那天来。”

马蒂也异常激动，看见哈里执意要使贝西的造访成功，她便收拾出了几个房间，劳动节的前3天，哈里给贝西寄出一张路线图。节前的星期天他在网球场上整整干了一天，夜幕降临将一切安排停当，还准备了许多西瓜。

然而贝西没有来。她捎信说独立城正在下雨。哈里立即复信表示他的“失望”，问她能否下次来，还说妈妈仍欢迎她来吃饭并言及劳动节那天格兰德维厄是风和日丽。几周后，贝西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出现在农庄，然而网球场不够平整，只得敷衍地玩玩而已。

但哈里并不灰心。他拿出他学钢琴的劲头，以乐观的执着继续追求贝西。

他给她讲在共济会中取得的成绩，给她寄书，还评论他喜欢的两本杂志《大众生活》和《探险》上的文章。一次他对她说：“今天早上我一直在读柏拉图的《共和国》，其中有苏格拉底对理想的共和国的论述……你瞧，除了《探险》之外，我也读别的东西。”

他知道他有口才。他发现只要他有跟别人讲话的机会，大体就能实现他想要做的事。写信就是他与贝西谈话的方式，可以倾诉他面对她时无法说的事。

贝西渐渐知道他特别喜欢蛋糕、烙饼、莫扎特、肖邦和威尔第。她还了解到他不喜欢的东西：牙医、枪炮、势利小人、形形色色的虚伪、职业拳击家、离婚、《堪萨斯城明星报》（因其充满共和党的偏见）、律师（由于他外祖母的遗嘱正在引起纠纷）和他认为肯定与“阴间之神普路托是一丘之貉”的理查德·瓦格纳。他为自己的相貌深感遗憾。他在信中形容他的嘴是“女孩儿的嘴”，而且还像姑娘似的爱脸红。他还承认拥有其他女孩子的特征，如拔牙时乱叫以及照像时“过分注重于外表”。他对贝西说，黑夜一个人回家时，他可以被“吓得半死”。他在堪萨斯城换乘火车时，生怕被出没于附近的流浪汉饱以老拳，有时晚上从格兰德维厄车站步行回家时没有月光，他就惧怕魔鬼和流浪汉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次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他走到家门口，正往厨房门口摸时一头撞在了水泵上。第二天他便把水泵涂成了白色。

他认为人人都是好人，“只要你诚实、体面、不是黑鬼和中国佬”。他参加过南方联盟军的舅舅威尔·扬的说法是：“上帝用尘土捏了个白人，用泥巴捏了个黑鬼，然后把剩下的往天上一抛，掉下来后就成了中国佬。”哈里显然认为这句话能使贝西发笑。“舅舅真的讨厌中国佬和小日本，我也一样，”他继续说，“我想这叫种族歧视。不过我的确认为黑鬼应该在非洲，黄种人在亚洲，白人才在欧洲和北美洲。”

然而有一天晚上，玛丽·简在钢琴上练习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时，他写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坐着听一支乐队演奏一首前奏曲，想象着世事应该还原为它们本来的样子，而不该像现在这样？我能明白的音乐总能激起我这种感觉。”倘若贝西是他带她观看的那类舞台音乐剧中的女孩儿，她当时肯定就接受了他的爱情。

哈里手头拮据，因而渴望拥有金钱的欲望经常在他心中蒙绕，这恐怕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在格兰德维厄，人们极少谈及金钱财富，也不以此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圭臬。“我们评判一个人时从不看他有多少钱，”斯蒂芬·斯劳特回忆说，“性格和人品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一家拥有大宗银行存款或价值连城的财产，甚至斯劳特家也不例外。斯劳特家的人同所有的人一样，都有欠债。然而哈里渴望比格兰德维厄人获得更多的东西；至少他想让贝西·华莱士明白他有着更高的目标。

他曾对她说特想拥有一辆汽车。“想想那样的话，我一天将从这儿往独立城跑多少趟。”他在堪萨斯城看中了一件75美元的大衣。倘若他是个富翁，他也就可以住在独立城了。他在1911年圣诞节前一个寒冷的夜晚写给贝西的信中，披露了他和父亲“债台高筑”，让她不要将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后来，他说他想致富的原因有两条。首先是还债并为他母亲盖一幢漂亮的房子；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赢得贝西的心。

贝西若对他的话稍微在意，他或许会对他所谓的“成就点儿什么”的努

力表示怀疑。贝西回信说，她和玛丽·帕克斯顿认为，只有当一个男人能力一个女人提供雍容华贵的生活方式时，这个女人方能认真对那个男人加以考虑。哈里说无论她的本意如何，他将把她的话视作鼓励的信号。

他十分渴望实现他的追求，尤其是他自己的梦想，但他不知该怎样左右他的生活，怎样闯荡世界。他像大卫·科波菲尔似的也极想知道他是否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角。

他高兴地得知贝西的母亲很佩服他的钢琴演奏（华莱士夫人本人也是一位公认的造诣颇深的钢琴师。她年轻时曾就读于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哈里坦率地告诉贝西：“曾经一度我真地想当个职业敲琴键的，幸好在涉足太深之前兜里的钱用光了。”他已退出了国民警卫队。部队生活也失去了其吸引力。“我酷似马克·吐温。他说若只有朝炮口前进时方能获取名声，他宁愿在炮膛空的时候才朝那个方向走……”

别人为他找了份工作，在县城南端开设个小银行，但通过他与银行里的人打交道的经验，他兴趣不大。“你知道，你得特别吝啬，一分钱的邮票都得尽力省下来。有时你还得投机取巧，坑害好人。光为这我也愿意当个农民。就算你得像个黑鬼似地玩命干活，可你知道你并没为了自己活得自在而把别人的油水榨干。”

哈里承认他考虑过参政，“天知道，指不定哪天我也能成为辛辛纳图式的人物，被选为达贵显爵。”总体上说，他内心充满躁动。

哈里同另外两个格兰德维尔人坐火车去南达科他州，参加那里的印第安人土地抽彩。一路上，坐在从相反方向开来的火车上的人冲他们喊着：“傻瓜！傻瓜！”后来他又前往新墨西哥州去看地，两次均一无所获，然而他沿途却目睹了“美丽如画的乡村”。他乘坐的火车开到格兰德河谷的上方，快接近圣菲时，他看见空中一道彩虹，透迤好几里长。“我想立即下车，”他在信中对贝西说，“沿着彩虹走到它的尽头，因为我觉得尽头说不定有一座金矿呢。”

贝西后来写信对他说，她不再喜欢他称呼她“贝西”，太正规。于是哈里的信首开始冠以“亲爱的贝丝”（贝西、贝丝系同一人的两种称呼——译注）的称谓，尽管落款永远是“忠诚的哈里”或“最忠诚的哈里。”

4

哈里·杜鲁门在农庄度过的年头被称作美国农业的黄金时代，因为农产品价格一直稳步上升。那是一段最值得务农的时期。小麦、玉米、干草，所有作物的价格都在提高——小麦价格1912年提高到每蒲式耳90美分。对哈里和他父亲来说，这意味着不间断地、每天长时间地劳作。1912年夏季的一天，他们整整干了12个小时，把将近300捆干草装运上一节火车厢。那是使哈里感到最吃劲的一天，黄昏时他庶几要崩溃了。但当天晚上，他父亲看见闪电频仍，便非要再出去把还须打包的干草盖上。他们摸着黑干，哈里给他父亲传递14英尺长的木板，再由他父亲把木板压在干草堆的顶上。哈里数了一下，他总共传递了32条14英尺长的木板。约翰·杜鲁门又买了许多牛，使他们的牲畜翻了一番，从30头增加到82头。哈里在1913年9月写给贝西的一封信中说：“今天上午我播种小麦，累得就像下了地狱。每次我扛起一包100磅重的小麦，爸爸都得嚷一通……今天下午先把小麦的活放下，把干

草叉成堆。”那一年他们的干草足可以打成 600 包，哈里的父亲大谈特谈翌年可以有 400 英亩的小麦收成，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便可“脱离困境”。晚上在客厅里，当哈里给贝丝写信时，他父亲常常在椅子上沉睡过去。哈里简直忙得不亦乐乎，他又得干活，又得往返于独立城和堪萨斯城，晚上还要参加在洛奇的共济会活动和写信。虽然没有几个孩子像他那样尽力尽职，约翰还是责备他对农庄失去了兴趣，而且早上经常叫不醒他。一次哈里没赶上火车，深更半夜摸到家时发现他父亲还没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以为儿子肯定凶多吉少。“他以为我被人打了，或掉进了河里。我告诉他我没赶上火车时，他又发起了脾气……但哈里最担心的是他没日没夜苦干的父亲。约翰通过他在独立城政府的朋友的关系，准备出任华盛顿区南半部的修路监工，格兰德维厄也划分在这一地区。哈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担忧起来。乡村道路的维修和保养由当地人承担，他们自己出马队，要么采取被雇的形式，要么将其作为偿付 6 美元教育税的一种方式。这项活计没完没了，被任命的监工是个公差，每天只付 2 美元的报酬，是个人人都躲不及的差使。哈里告诉贝丝，他父亲之所以要干这份工作，完全是他对政治的嗜好使然。“他对我说，我只有参政才可以离开农庄。”哈里若参政便可自行其事，他父亲将不加干涉。

约翰·杜鲁门当上监工后，格兰德维厄的人们认为这表明杜鲁门家“破了产”，亟需钱花。大家都认为约翰是个好人和好邻居。正如斯蒂芬·斯劳特回忆时说的：“把约翰换给谁我们都不干。”但与斯劳特家相比，杜鲁门家总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斯劳特家的农场没有杜鲁门家的大，土地也不如他家的好，但斯劳特家却兴旺发达。O·V·斯劳特资助他 8 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多年后斯蒂芬说：“我始终不明白，他们在农场种庄稼，我们也种庄稼。他们老赔本儿，我们却相反。”

然而在约翰·杜鲁门的监督下，修路的质量明显有了提高。哈里见他父亲决心把路修成一流的水平，其劲头不亚于在农场干活，于是决定帮他一把。然而他对贝丝说，他父亲若想借修路的成绩竞选其他的职位，他哈里就将站出来发表演说反对他。

哈里非常热衷于这一话题，他接着说，事实是他内心也受到参政欲望的煎熬。他想赚钱，但他知道钱只能给他带来些许满足，根本谈不上个人价值的实现。他看到政治充满诱惑和陷阱。他晓得这是肮脏的营生并鄙视某些人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故作姿态。但政治的魅力仍旧吸引着他。下面是他一封很有意思的信：

政治使许多优秀的人身败名裂。浮夸的空话和贪污受贿不仅冲昏了他们的头脑，还使他们失去了朋友和变得一文不名。话虽这么说，但我若很有钱，我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选票和官职，就像买游艇和汽车那样。我认为成功的概念因人而异。有人认为只要把零花钱都攒下来，他们就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至于是不是每天都喝汤咽菜或拿破仑是人还是一块银子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

有的人则认为只要他们位居高职，面对瞠目结舌的大众发表空洞无物的冗长演说并摆出一副人之楷模的模样，就算达到了成功的巅峰。在我看来，不少人善于自我吹嘘，以为自己是佼佼者。为了成为富翁，你就得六亲不认；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他就得自私或当傻瓜，要么就充当掌权者的工具。而我则以为，最理想的办法是努力苦干，以至一旦罢手也不会瞬间破产。然而你心中明白，只要你停止努力

你就无法生存。其次还应根据你的财力来造房交友及寻求享受，比如说一个月开支1000块钱。倘能如此，我将高兴地让卑鄙的野心、政治或金钱去见鬼。

当约翰·杜鲁门看到贝尔顿的一家报纸称他为杰克逊县政府的“仆从”时，他奔到贝尔顿想“抽”！那个编辑几鞭子，然而未得逞。哈里为此而颇感欣慰。“我对他说那句话并不强烈，可以看作是对为政府干事的人的赞许。”这是多年来约翰第一次旧脾气复发，而哈里私下里却很高兴。

人们管哈里叫“脾气温和”的杜鲁门，他家人因外祖扬的遗嘱而祸起萧墙，在法庭内外相互攻讦，惟独哈里似乎能和家里所有人搞好关系。他们都能跟他说得上话，因而他是家庭的调解人。

1913年秋季，哈里和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五六个格兰德维厄人又尝试了一次印第安人土地抽彩，这次他走得比以往都远，到达了东北方向几乎靠近加拿大边境的蒙大拿。哈里喜欢这样的旅行，尤其是最后一次。他在从明尼阿波利斯寄给埃塞尔·诺兰的明信片上说，他“快活得像个小天使”。

终于，1913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贝丝说如果她要嫁人的话，非哈里莫属，哈里坐在那里惊讶地哑口无言。贝丝随后又写了封信重申了她的诺言。他俩同意私下里订婚。哈里茫然不知所措，“兴奋得欣喜若狂，踌躇满志”。他称贝丝让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乐天派。贝丝则称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哈里说他很乐意听这句话，尤其出于她的口，“因为我始终怀抱着这样一个看法，即绝顶聪明者才不可思议”。

在堪萨斯城的一次约会中，哈里带贝丝去看由朱莉娅·桑德森和唐纳德·布赖恩主演的新歌剧《犹他来的女孩儿》。剧中最轰动的曲子是杰罗姆·克恩谱写的《他们永远不会相信我》，当漂亮的头发乌黑的男主角唱起这支歌时，哈里握住了贝丝的手。

当我告诉他们，我一定要告诉他们，
我就是那个你要嫁的人时，
他们永远不会相信我，他们永远不会相信
在这茫茫人海中，你终于选择了我。

哈里的视野变得广阔无垠。“与一个雄心勃勃想当蒙大拿州长和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的乡下佬订婚是何滋味儿？”他问贝丝，把他想入非非的理想化作一句幽默。令他惊讶的是，贝丝立即写信说他是她最钟情的人。哈里说：“我把你最后一封信的每一个字都背了下来，每天读40来遍。哦，再给我写一封同它一样的信吧。”他想他是不是该把这封信放进一只保险箱里，以免磨损坏。

你不知道我还如此柔情和多愁善感，是不是？其实我感情很丰富，但我绝不会用嘴表达出来。我可以用纸写我多么爱你并认为你是个出色的女孩儿，可当着你的面却说不出口。

我老怕我笨嘴笨舌招你笑话……我要是能为你做点什么就是死也心甘情愿（想想看，一个戴眼镜嘴长得像女孩儿的小伙子扮演兰斯洛特爵士是什么情形）。既然我不能把你从魔怪的身边救出来，也不能把你从着火的楼房中背出来，或轮船快要沉入海底时驮你浮水上岸——原因是我害怕魔怪，背不动你，又不会游泳——所以

只好去做工，挣出足够的钱还清债务，然后让你认清真实的我：一个直觉不够敏感、凡事都渴望做得正确的普普通通的人。我这人特好，所以你跟我相处不会有麻烦……你觉得自己母亲会不会喜欢我，接纳我为你家的一名成员？

这最后一点的确是个问题，因为据说马奇·华莱士自从她丈夫自杀后，庶几成了“耻辱的俘虏”，只能依靠贝丝才能获取生存的勇气。她需要贝丝犹如约翰·杜鲁门缺不了哈里一样。贝丝是名门贵族的小姐，正常情况下也是个备受呵护的“宝贝”。对一个负债累累的农村小伙子来说，即使他再持之以恒，举止文雅，其追求贝丝的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诺兰一家人都积极地想为哈里出力，其中一人回忆说：“华莱士太太对哈里一点儿也不赞成，她说：‘你不会是想嫁给那个农民小伙子吧，你没有任何出息。’所以她根本不促成此事，而是要阻止它……”

每次哈里登门造访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他都会清醒地看到他与贝丝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正门上蚀刻图案的玻璃、梅红色的布鲁塞尔地毯、漂亮的瓷器、客厅狭长窗户上厚重的花边窗帷、吃甜食用的银制刀叉、不必为生计而日夜操劳且宁静的环境，以及不受打扰的舒适和处之恬然，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与哈里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家老是搬来搬去，好人不是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的。”一次他用自卫的口吻对贝丝说）。即便只是缩小他俩在等级上的明显差异，哈里就将历经推石上山般的艰难，他心里恐怕也是这么想的。而马奇·华莱士面对任何一个想把贝丝从她身边带走的人所造成的威胁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起来。

华莱士圈子里的一个人 60 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她笑着说：“是的，华莱士夫人的确觉得哈里配不上贝丝。不过你要知道，其实她认为能配得上贝丝的男人根本没有。”

1914 年 3 月，哈里的母亲突然病倒。当地医生请来一位专家，后者决定必须立即在哈里家里实施疝气手术。手术时哈里不得不站在床旁边举着煤气灯，目睹母亲的“器官”从身上被切除。他后来说，这种经历但愿以后千万别再遇到。

他抱歉地告诉贝丝几天之内他不能离开家。他曾在信中写过，没有谁能代替母亲的位置。“我希望她能长命百岁”。

后来发生的事情与哈里在手术前后表现出的坚强是否有因果关系我们不能确定。总之，几周后他妈妈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买一辆轿车，而且买的还不是一般农民开的 T 型福特牌。能以这等慷慨的举动奖赏儿子的母亲可谓绝无仅有。没有任何事能让哈里如此高兴并使他的生活发生遽变。这部轿车是他最贵重的财产，因而十分上心。他后来一生中都很喜欢轿车，然而却把这部车视如他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辆 1911 型号的斯塔福德牌黑色大型 5 人座轿车，由特里·斯塔福德在堪萨斯城亲手制造。这种车只生产了 300 辆。它有 4 个汽缸的引擎、右手驱动装置、高大的铜边挡风玻璃以及同火车车灯几乎一样大的前灯。哈里很快就发现，它在条件较好的路面上每小时可达到 60 英里的速度。有钱人都买这种车，新车售价是 2350 美元，哈里则花了 650 美元。他家的房子需要粉刷；支付货款和为他外祖母的遗嘱打官司的费用几乎已耗尽他家的财力。从各个方面讲，这部轿车都够得上一大奢侈——650 美元支付两名帮工一年的薪水还绰绰有余——然而哈里却认为用 650 美元换来这样一部车等于是“白

捡”。虽然它不是格兰德维厄的第一辆私人轿车，这辆车却是最漂亮的。在独立城，连乔治·波特菲尔德·盖茨那样的人都没有这么高级的车子。哈里稍为拾掇了一下发动机，发现它爬多森山的速度飞快，未到山顶前他就得关闭油门。多森山是当地试验车子好坏的场地。

此刻哈里便可以来去自由，多数情况下他离家的时候多，沿蓝岭大街开往独立城。春季的一个星期天他驾车跑在独立城的林荫大道上，头戴一顶花哨的新帽子，穿一件洁净的、扎着礼服领结的白衬衣，车顶篷打开，车身擦得锃亮，谁见了也不会以为他是个乡下佬。贝丝和其他三四个朋友常常挤进这部“机器”里，由哈里开到蓝河边钓一下午鱼，或开到密苏里河苏格湾边的自来水厂附近去野餐。有时哈里还带着他们到乡下兜风。

这时他又像童年时期那样有了一群朋友。除贝丝和诺兰姐妹外，还有贝丝的两个弟弟弗兰克和乔治以及他们最好的女友纳塔利·奥特和梅·萨瑟恩。哈里和他的车子是朋友圈子的中心。大家都站在车旁照像，哈里每次都坐在方向盘前。不久就将与贝丝的弟弟乔治结婚的梅·萨瑟恩说，哈里永远都是一个不错的朋友。许多年后她又说，从来没听见哈里发过牢骚，除非土豆沙拉里放了洋葱，“哈里不喜欢洋葱”。

哈里森伯父也喜欢把车盖放下来，无论刮风下雨都出外兜一圈。有一次为了满足他，哈里开车去莫尼高温泉，那是离格兰德维厄 80 英里地的一处古老的密苏里矿泉疗养地。他妈妈也要求坐“利齐”一起去（利齐是当时哈里给车起的名字）。

我礼拜天出发去莫尼高（他对贝丝讲述那次颇值得回味的旅行时这样开头）。

妈妈也一起去了，我们一路顺风，但眼看快到温泉时出了事故。离温泉还差半英里地时车子撞到了。哈里森伯父从后座折到了前座，妈妈则扑到了我头上。他俩都没受伤，只是哈里森伯父又开口大骂。我把利齐从树桩上倒出来，在车轴被撞弯的情况下开进了城镇。我和妈妈星期一早上 6 点钟开始往家开。才开出 5 英里多路就下雨了，路面滑得一塌糊涂。由于车轴歪了方向盘也走了形，我简直无法控制车的方向。离哈里森维尔以南 5 英里的地方，利齐照直朝一个沟里冲去，左前轮撞成了报废。我给弗森打了个电话，他答应给我送来一个前胎。出事的地点离一棵树火车站只有半英里路，我和妈妈坐在那儿等轮胎，从下午 1 点半一直等到 8 点。晚上轮胎才到，可我怎么也装不上。接着又下起了滂沱大雨，我成了落汤鸡。一个好心的农民走来，把我们带到他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他把马车套在利齐上，将它拽出了土沟（前一天晚上我安轮胎时装错了方向）。他为我们提供住宿和拽车却不收一分钱。我们向哈里森维尔驶去，到达它以北 5 英里左右的地方又陷进了一个水坑，溅得浑身是水。只好又给哈里森维尔打电话，叫一个人来把车子拖了出来——花了 5 美元。又有一个农民招待了我们一顿饭，下午 3 点才回到格兰德维厄……

玛丽·简嚷嚷着要学车，哈里不情愿他说：“看来我只好教她了，毕竟车钱是妈妈付的。”当玛丽把车子撞到前门上时，哈里心里谢天谢地，暗想幸好她没撞在石柱子上。

哈里在 3 个月的时间里共跑了 5000 英里。自从他戴上眼镜后，使他生活发生巨变的就属这辆车了，而且这次还归功于他妈妈。诚然，她的决定也是在暗示他，她对他在路上跑来跑去的理由是赞成的。倘若哈里想得到贝丝·华莱士，她将尽一切努力排除他们之间的障碍。

不久，哈里的父亲亦表示购买了一部车子使他“很高兴”，仲夏时，他也常“吵闹着”让哈里开车带他去检查道路。“想想坐在小车里修路有多神气。”哈里在信里写道。

1914年仲夏，即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序幕的时候，约翰·杜鲁门的境况愈发糟糕起来。他曾一再告诫哈里不要累着自己，可他自己却成了疲劳过度的牺牲品。这个瘦小固执的硬汉子一次想把一块大石头从路面上搬走，他就像寓言里的人物似的不甘示弱，结果被累垮了。

虽身上疼痛，他却同马蒂一样拒绝看大夫，怕动手术。劳动节时，x片显示他患了由严重疝气引起的肠梗阻。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做手术只有死路一条。当时他体重已大大减轻，样子也很难看。

哈里写道：“每当别人问他感觉如何，他总说还好，其实他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哈里担心病情恶化，坚持主张实行手术。

家里的车子如今成了接送约翰去堪萨斯城看医生的工具，尽管医生是他家所憎恨的东方人之一的中国人。哈里变得整日愁眉不展，他对贝丝说，他想象不出若失去父亲他将怎么办。“你知道他已经63岁了，这把岁数做手术十之八九凶多吉少。”

哈里负责起农场的活，接过了修路工作，还每周4次开车送约翰去看病。他对贝丝说，他怀疑命运故意在和他作对，但她的“信帮助我汲取了勇气，即使面对魔鬼和他的帮凶，我也能成就我执意要成就的事情”。有时他父亲晚上一句话也不说，于是他妈妈便一反常态地让哈里别再去独立城。依靠哈里使家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和收割200英亩麦子毕竟是至关重要的。

约翰·杜鲁门的手术于10月在堪萨斯城的瑞士医院进行。贝丝送去了花束，使哈里和他父亲满心欢喜，约翰不让护士把花扔掉，直到它们自行枯萎了事。约翰术后回到家里，但哈里明白他支撑不了多久了。有关他的境况的消息不胫而走，左邻右舍纷纷登门探望。

斯蒂芬·斯劳特写道，“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天下午，爸妈开车去杜鲁门家看望约翰。当时大家都说杜鲁门先生活不了多久了。我还记得爸妈回来后满面愁容的样子。”约翰心情绝望地称自己是主活中的失败者。“父亲则尽最大的努力安慰他。”斯蒂芬回忆说。大家告诉约翰他是个好邻居，他人缘好，还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不错的家庭。不言而喻，哈里在他父亲谈论自己的失败时也在场，因为当时他很少离开他父亲的病榻。

1914年11月2日星期天清晨，约翰·杜鲁门与世长辞。

“我当时守在他身边，”哈里多年后说，“我一直坐在他床边观察他。后来打了个吨儿，醒来时他就去了。”

当时在杜鲁门家帮工的布朗尼·休伯回忆说：“我和哈里常常起得很早，我们动作很轻，以免吵醒他母亲和妹妹。哈里做饼干，煮燕麦粥和煎鸡蛋。哈里父亲死的那天早上也是这样。我吃早餐时哈里进屋去陪他父亲，突然他又出现在门坎儿说：“父亲去世了。”

葬礼那天格兰德维厄的学校都停了课。朋友们从全县各处来到杜鲁门家参加仪式。他们的马车和T型轿车在两边是秃树的车道上排成一溜长龙。独立城的《考察家》报就约翰的去世做了报道，标题是《一位正直公民之死对他的社区将是一大打击》。尸体埋葬在堪萨斯城古老的林丘墓地，与坡顶上的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的坟茔相毗邻。

整个夏天农民们一直在说，战争果真能继续下去，小麦价格还将上升。果不其然，8月伊始，6万名德军越过比利时边境到达列日。所有的报纸都登满了战争新闻，诚如威拉·卡瑟后来在文章中写的那样，甚至“对性情沉静的种麦子的人们来说，列日前的攻城大炮也构成一种威胁，这并非对他们的安全和农作物而言，而是触动了他们舒适和固定了的思维方式。这些大炮具有超人的力量，在后来的战争进程中屡屡制造不可预料的灾难……”9月，德军穿越比利时，直抵法国境内的马恩河，在那里遇到法国人英勇的抵抗。

所有这些都应引起哈里极大的兴趣，因为他有历史感，着迷于战争英雄，而且还曾参加过国民警卫队。然而他的信里对战争只字未提，甚至他对父亲之死的忧伤过去之后，也没涉及过国际方面的话题。根据他写给贝丝·华莱士的信来看，从1910年他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开始，所谈及的均是与她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唯一的例外是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为总统的总统大选。威尔逊是自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后在总统竞选中获胜的第一个民主党人，也是哈里心目中的伟人。即使欧洲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他的关注，或者他感觉到报纸标题与他的命运之间有某种联系的话，他也从未透露过，只是在两年后他告诉贝丝他做了一个梦。他从法国上空的一架飞机上掉下来住进了医院，因不能见到她而放声痛哭。

事实是，他有许多需要操心的事。他妹妹后来说，农场像一副重担压在他身上，“他全身心都扑了进去”。1915年4月他在信中对贝丝说：“到今晚为止玉米基本种完了……我早上6点就下了地，晚7点才收工，整整干了一天。我只能白天黑夜地干才能保证今年的收成。”他担心天气，担心债务，还担心帮工不会像为他父亲那样替他干活。

他仍担任着公路监工的职务，直到6个月后一个对立派在独立城具政府占了上风，他才被排挤掉。从2月到8月，他还当上了格兰德维厄的邮政局长，但只是在名义上，因为他把工作交给了一位他认为比他更缺钱花的寡妇助手。

虽父亲去世，他依旧每天伴着晨曦起床。他总说清晨是进行“敏锐思考”的最好时光。那年他年届30，在农场已呆了8年，度过了他一生1/4的年华。他仍旧强烈地爱着家人，一如既往地决心赢得贝丝·华莱士，而且没失去幽默感（他说贝丝必须再给他寄一张她的照片，以便他能楼上楼下各摆一张。“每天都得跑上楼去看看你的模样实在太不方便了”）。然而他比从前更加烦躁不安，他痛恨农场“发展缓慢”，尽管农产品价格已经提高。其实他已步入生命的一个节骨眼上，一旦机会降临，他就有可能朝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他和哈里森伯父跋涉到得克萨斯州，希冀引诱伯父做点土地投机生意，然而这趟旅行同前几次一样一无所获。接着他又介入了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座锌矿，他对贝丝说：“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一门心思成功的人。”他幻想他俩住在一幢理想的乡村房子里，这一想法令他无法忍受推迟他梦想的实现。“后来我醒过来，看到我们的旧房子因年久失修而变得破烂不堪，因为我必须偿付我没有能力偿付的债款利息，我的梦想就只得拖延下去。”

当外祖母遗嘱的官司终于在6年后了结时，哈里母亲的境遇与从前相比并无明显改善。她是官司的赢家，保住了农庄，但农庄所能带给她的钱都花

在了诉讼费上。甚至在约翰·杜鲁门过世之前，她就不得不再次用土地作抵押借了一笔款。为了付医生和葬礼的费用，哈里被迫把他不久才搞到的几头苏格兰牛卖掉。他妈妈和哈里森伯父为了他的锌矿生意先预支了他一笔钱，这使维维安大为恼火，维维安认为哈里得到的已经够多，应该把精力放在农场上。

后来证明维维安是对的。锌矿是哈里的经历中第一次出于自己之手的惨败。

锌矿坐落在俄克拉何马东北角一个叫康默斯的地方，离密苏里铁路线不远，距格兰德维厄 192 英里。倘天气晴朗，通往那里的道路是可行的，据哈里声称，只要他的斯塔福德车胎不爆裂并顺利越过 4 个河边低地，7 个小时他就能到达康默斯。一般情况下他则乘火车去。

“这儿简直是个鬼地方，”1916 年年初他在从康默斯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只要一下雨，水就有 6 英寸深，所有的东西都被淹没。可不下雨的天气到处又都是尘土，其厚度不亚于雨水。”他想家、孤独，但期待着尽快在投机中“发一笔”。他发誓总有一大他也能拥有一部“利剑”牌轿车。

在他失败之前他对贝丝说：“如果不试一次一夜成个暴发户，这辈子我也不会真正感到愉快。”

哈里为这笔生意投入了几千美元，他与另外两个共济会兄弟合伙，一个叫詹姆斯·休斯，是格兰德维厄的一个农民；另一个是堪萨斯城的推销员，叫杰里·卡伯特森，两人关于锌矿的知识和哈里比是半斤八两。他们自封为 T—H—C 矿产公司，在康默斯买下了一座叫尤里卡的锌矿。前届矿主在地面上撒下了许多废矿石，他们 3 人希冀用这些矿石补偿他们创办公司的费用。创业伊始问题便接踵而至。他们雇的工头后来被发现是个骗子；一个竞争对手切断了加工矿石所需的水源；设备亦出了故障。同时哈里还得一周两次地穿梭于锌矿和格兰德维厄之间，力图兼顾两头的工作。

杰里·卡伯特森对锌矿的日常业务不感兴趣，汤姆·休斯则在听说他在格兰德维厄的谷仓遭雷击被烧成灰烬后，把工作交给了哈里一走了之。哈里一忽儿踌躇满志，一忽儿消沉悒郁，情绪摇摆不定。他后来在得志的时候曾说，那是一次昂贵的大手大脚的教育。出于无奈，哈里兼机械师、工头、夜间值班员于一身，还是个处理各种琐事的“勤杂官”。他从未像那段时期那样玩命和操心。然而他拒绝认输。“我不可能永远走背字。”他不无凄凉地在信中对贝丝说。家里的事他让玛丽·简负责，但帮工们不愿听命于一个女人的支使。当两名帮工辞去后，哈里不得不乘上下班列车往家赶。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付诸东流。1916 年 5 月 19 日，在格兰德维厄度过了难熬的一天后，哈里感到格外顾影自怜，于是提笔给贝丝写了一封她过去从未见过的信。他开始认为她身上有遗传的失败习性：

锌矿生意落空了，我彻底赔了本。若不是哈里森伯父病了，我星期二晚上本应再往那儿跑一趟的。我想我不会从此次挫败中很快复原的。我的牲畜没有赔进去，那是因为我得把它们还给我妈妈。看来我要沦落为那些不会签支票的人的行列了。赚钱实在艰难，但又不得不为之。我们杜家人没有一个有挣钱的本事，我也不例外。

我将尽力使农庄维持原状，所以只得留下来。我的资金全折腾光了……也许你把我一脚蹬掉，找一个理智和能力都比我这个易受命运摆布的人强的人会更好些。

但在他睡了一场好久没有睡过的好觉后，他又信心十足地对贝丝说，他还像从前似的怀抱希望。他还能“继续做生意，因为哈里·社鲁门还有潜力”。在贝尔顿银行做事的弗兰克·市莱尔告诉哈里，与卡伯特森合作实在是失策，尔后便贷给他一笔款，为哈里解了燃眉之急。哈里问贝丝是否愿意成为他们的同伙，一起经营锌矿。

哈里在7月从康默斯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此地 在树荫下也永远是华氏 110 度。蚊子也特活跃，每天晚上飞个不停。白天还到处是苍蝇。”当年夏天正是凡尔登和索姆战役的时候。

“衷心地祝我赢吧，”哈里对贝丝说，“不断地祝我走运，因为锌矿生意就是我的一切。”他8月又对贝丝说。

他想买一枚订婚戒指，但又觉得必须搁一搁，因为用借的钱买戒指不吉利。他的运气、他俩的运气以及命运的意志在他心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谈到打算在康默斯设立个福特汽车公司代理商，认为那肯定是一条致富之路。

1916年9月锌矿关闭。11月时，哈里在堪萨斯城的一间办公室里做起了买卖石油租约的生意。尽管弗兰克·布莱尔警告过他不要与杰里·卡伯特森合作，而且他自己在康默斯也肯定对杰里有所了解，这次他还是与他联起了手。不过此次他就像约翰·杜鲁门那样，想抓住主要时机。这桩新生意的第3个合伙人大卫·摩根后来说，吸引哈里的实际是生意中的赌博因素，即“冒险”性。摩根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律师和石油生意人，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很熟悉，这一点哈里很赏识。

哈里投进了5000美元，共是5张1000块1张的10个月到期支付的票子，根据合同，这笔资金还须“由上述哈里·s·社鲁门的母亲、马莎·E·杜鲁门签字”。他妈妈敦促他要时常想着外祖父，而不是他自己的父亲。她说据她所知外祖父扬3次受挫，但“每次他都又东山再起”。外祖父扬是家庭成功的象征，他赤手打天下，是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硬汉子，因而是获取勇气的榜样。

他们的实体取名摩根炼油公司，摩根任总裁。卡伯特森负责销售和公关。哈里是司库，所以名字印在了公司的新信笺上。但一位叫布莱斯福特的簿记员后来说哈里真正的特长是与人打交道。“哈里身边永远围着一群人。推销员、租借人、租借主、搞商情的，等等。摩根有他的责任，故而把与人打交道的负担卸给了社鲁门先生。”

虽然哈里似乎在推销方面没有成绩，他却各种行当都拿得起来。他对买了这家公司股票的贝丝说：“如果这桩买卖吹了，我就得倒大霉。”

哈里也许并没预感到美国会卷入欧洲的大战，而卡伯特森却指望着美国参战而发财。由他撰写的一则报纸广告说：“倘若我国不幸被迫参战，对汽油和各种原油产品的需求肯定会供不应求，价格将上升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摩根确信，财富就埋藏在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的农田下面。公司在这3个州及路易斯安那州租出了几千英亩地。但1917年4月，伍德罗·威尔逊呼吁国会宣布参战，而战争非但没给摩根炼油公司带来横财，反倒促使其倒闭。没有人力开采石油，投资者不翼而飞，公司只得关门大吉。只是后来才发现，他们在堪萨斯东南部租出去的一个开采点蕴藏着一部分著名的梯特尔石油层，倘若他们再挖得深一点儿，公司及其合伙人就能赚取几

百万。

贝丝同其他投资这家公司的人一样，所投的钱全部赔光，哈里似乎打了个平手。他在锌矿上总共赔了多少无法确定。最初他说 1.1 万美元，后来又说他 7500 元。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笔不少的数目，而且是借款。如果他在他父亲的债务中承担的数目是 1.2 万美元——这是他一次私下里对贝丝透露的——那么他后来所欠债款的总数大概达到了 2.3 万元。1917 年马蒂以农庄作抵押筹措了 2.5 万美元看来并非是偶然的了。

哈里对他的失败颇觉沮丧，有时甚至非常低沉，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农庄和抵押，因为它们意味着安全感。遇上好年头，他家可以净赚约 4000 美元，而当时普遍的工人家庭只能挣 1000 元。特别好的年头甚至可以挣 7000 元，杜鲁门家显然碰到过几次这样的丰年。

此外，农场当时已完全属于杜鲁门家，哈里森伯父 1916 年夏天去世，将他那部分所有权留给了马蒂和孩子们。单从金钱价值的角度讲，他们坐享的便是一笔财富。1916 年小麦价格又达新记录，卖到每蒲式耳 1.65 美元。杰克逊县的优质土地 1917 年每英亩的售价是 200 美元。哈里家的农场至少值 10 万美元，但完全可能卖出两倍于此的价钱。马蒂根本没有卖它的打算，即使遇到麻烦它也没易过主，而且还经营得不坏，这正如邻居们所说的，原因是杜鲁门家是出色的农民。

同别人一样十分了解哈里的埃塞尔·诺兰说，她一直就断定哈里不会一辈子当农民。对此哈里心里也清楚。然而他在农场一干就是 10 年，承担的事情比他应该做的还要多。他在俄克拉何马的康默斯还发现，若让他在务农和采锌矿之间做出抉择，他宁愿选择前者。

后来提起在农场的岁月，他认为那是一段宝贵的经历。他常提到当时艰辛的活计，称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干农活可使人拥有独处的时间，而他正需要和喜欢这些时间享受生活 and 与人交往。“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地坐在犁车上使你有许多时间去思考。”多年后他回忆说，“耕犁的过程中我对人类的罪恶都进行过思索。”

诚如后来许多报纸报道的那样，哈里一直保持着早起和勤奋工作的习惯。他母亲说农场培养了哈里观察事物的直觉。哈里则用酷似他父亲的口吻对他妈妈说：“管理农场和干别的一样，都能让你为之骄傲。”

四、士兵

这是伟大的冒险，我参与了。

——美国远征军上尉哈里·杜鲁门

1

生活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厄的哈里·杜鲁门除了从堪萨斯城的一些报纸和他喜爱的杂志上读到欧洲战事的消息外，对这场使世界发生巨变的战争本可以不必关心。如果他乐意，根本不必参战，别人对此也不会说什么。1917年春天他已33岁，比新颁布的选征兵役法规定的年龄超出两岁。他离开国民警卫队已近6年，视力也远远达不到各军兵种的征兵标准。他还是他母亲和妹妹生计的唯一保障人。此外作为农民，他也该留在农场履行他的爱国职责。伍罗德·威尔逊总统说，全国的农民维系着战争的成败以及美国和世界的命运。

因而哈里有种种理由完全可以守在家里。然而当威尔逊于1917年4月呼吁国会宣战时起，哈里就自愿选择参加战争，他的人生也因此而发生了转折。他把管理农场和照顾母亲的责任移交给他妹妹玛丽·简，故而简的生活也因此而产生了巨变，但后来她只是轻描淡写和富有责任心他说：“我们熬过来了。”

她已长成一个漂亮的少女，笑态甜美，性情温柔。有些人认为她长得最美丽，是杜鲁门家最具魅力的，哈里参战时，随身带了一张简在照像馆里照的像。她戴一顶阔边花帽，面部的表情温柔中透着坚强。哈里离家开往多尼潘军营的夏天她28岁。简未婚，尚没有马上出嫁的意愿，但很招人喜欢。哈里走后，简几乎没有时间支配自己的生活，活动圈子也局限在格兰德维厄，自他们的父亲死后所有肩负在哈里身上的烦恼和责任如今都由她担当起来，而且哈里很快还深切地意识到，简比他更孤独无助。“当时对我妈妈和妹妹的确是很大的打击。”哈里多年后承认说。他的理想主义和“过激的行为”让他无暇顾及将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贸然采取了行动”。钦佩他的玛丽·简还认为他变得有点骄傲和以自我为中心。

贝丝·华莱士对他的决定做出的反应是建议他们立即成婚。哈里却不可思议地拒绝了。他说她不能受到回家时是个跛子或是死在疆场的人的拖累。他们只能等他完整地返家时再办婚事。

在解释参军的动机时，哈里的理由同那个慷慨激昂年代成千上万的美国小伙子的想法大同小异。他仍然不喜欢枪炮，没体验过任何形式的搏斗，也没以生命冒过险。但“这是桩总得有人要干的事。”战争将把他历练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做“逃避兵役的懦夫”，即使他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未经过考验，他也希望理解和关怀他的人都这样期待他。此外他还说，德国人尚没造出打死他的子弹，而且一旦美军参战，战争的结束便指日可待。他还记得当时觉得“因为拉斐特的缘故我们欠法国点什么”，而且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战争的演说使他“全身心”备受鼓舞。最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能成为崇高的远征军的一分子，横跨大洋前往古老欧洲的“那一边”。

朝着那一边，朝着那一边，

把这一消息传到那一边，
美国人就要来到你们的身边……

哈里当时在钢琴上弹奏着这首及其他令人振奋和充满情感的歌曲——《再见百老汇，你好法国》、《让家园的火继续燃烧》等。哈里在很久以后描绘那一时代的情感时，强调说多数美国人同他的反应一样，“在那个伟大的年代人人都受到同一支火炬的鼓舞”。

严峻的事实却是，人类从未像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如此大量迅速地遭到杀戮，而且还为此津津乐道。机关枪、自动步枪、密集火炮、毒气、喷火器、飞机和坦克使传统的教科书上的战略及战场上的英勇行为相形见绌。1916年，长达350英里、北起北海南至瑞士边界的西部战线伤亡人数多达200万，然而尽管屠杀如此残酷，战斗的双方却没有移动一寸土地。索姆河战役的时间是1916年的7月至10月，在仅仅4个月的时间里，德军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国南北战争4年期间里战死疆场的人数。1917年春天，当哈里满怀“爱国激情”参与组建一支新的密苏里炮兵连时，英军在伊普尔的一次正面进攻中仅向前推进了7000码，而5天的激战中死伤人数竟高达16万人。

起初，人们普遍认为战斗不会持续太久，这场战争很快就能结束。然而从1914年夏天起，屠杀年复一年地继续着，整整一代英国、苏格兰、法国和德国人都葬身沙场。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宣战演讲中道出了这一冷酷的现实，他说：“把这些伟大的、热爱和平的人们拖进这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具灾难性的战争中是多么恐怖。”然而这场战争又与南北战争相似，人们想象着穿着漂亮军服的军团和旗帜飘舞的壮丽行列，贝当在凡尔登所说的那句响亮的口号“他们绝对攻不过来”震撼鼓舞着美国小伙子们为“世界的安全和民主”而纷纷报名参军，但人们记忆最深的还是威尔逊气壮山河的演说。

哈里·杜鲁门后来说，他当时觉得自己仿佛是“追求耶稣圣杯的纯洁的加拉哈德骑士，我永远忘不了当我告诉我的恋人我要当兵时她伏在我肩上痛哭的情景，当时我就是死也值得了”。

他的信念使他成为一名激情饱满的新兵。他把他的斯培福德涂成鲜红色，穿着新军服坐在里面在堪萨斯城开来开去。他整日军服不卸身，从未像此刻这样兴奋过，如今每一天都有了目标。

哈里顺利地重新加入了国民警卫队，立即参与组建一支新炮兵连并希望自己能在F炮兵连中担任中士。结果他却被选为中尉；警卫队当时仍沿袭南北战争的方式，军官由大家选拔。这在他一生中是件大事，因为他还从未被人选中做过什么官。

训练于5月在堪萨斯城的大街上和会议大厅内开始进行，街对面是联邦火车站。当众所周知的第2密苏里野战炮兵部队成为隶属于35师60旅的第129野战炮兵团时，哈里不得不第一次接受正规军的体格检查。他被脱光了衣服，量了体重身高，医生还查看他是否有疝气、淋病、痔疮、平足及视力缺陷。据他弟弟维维安说，他把视力表背了下来，因而通过了视力检查（维维安常说哈里若不戴眼镜，篱笆以外的东西就看不见了）。记录上真正的检查结果是，哈里的裸眼视力右眼为0.8，左眼是0.04，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他左眼是瞎的。

同一纪录上还记载着他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151磅，比标准体重重10磅，比新兵的平均身高高出1英寸。他胸围“呼气时”是33英寸，“吸

气时”是37英寸，其他项目都“正常”。

当时美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已抵达法国，指挥官是所有老密苏里人都熟悉的在密苏里土生土长的约翰·J·潘兴将军。1917年7月4日，当哈里穿着军服出现在贝丝·华莱士家门口，炫耀他的银靴刺和短柄马鞭时，美国第1步兵师正在热烈的欢呼中列队步入巴黎。

9月，哈里前往多尼潘，那是一片新搭起的位于当风平原的帐篷军营，在科曼契印第安人居留地内，与坐落在俄克拉何马州劳顿的西尔要塞咫尺相望。方圆没有一棵树，劳顿小镇在20英里开外。除了西边有几座秃丘外，那片土地坚硬的地盘平坦如桌面。开来的火车几英里之外就能看到。军营是以墨西哥战争英雄亚历山大·多尼潘命名的，多尼潘率领800名密苏里志愿兵开创了军事史上最长的一次远征，从圣菲经埃尔帕索、齐华华直至伯纳维斯塔，全程3000多英里，沿途击败了几支人数超过他手下人的墨西哥军队。

5点45分吹起床号，6点半吃早饭，7点半训练开始。夜晚奇冷无比，大风昼夜不停地呼啸，大兵们称其“苦不堪言”。哈里在10月的信中写道：“此地过去就特冷，今日依旧。”不久又刮起了风沙，“50码之外的帐篷一点部看不见。我嘴里、眼睛里、鼻子里和脖子里都是沙子”。大家都说如果德军同意停火，他们宁愿把俄克拉何马让给德国人。哈里在信里说，每逢破天荒没风的日子，“我们感到特高兴”。

其实几乎在无论什么情况下哈里都是个愉快的人。贝丝根本不必替他担心。他对她说他紧张得根本没时间情绪低落和酝酿“邪念”，他的意思似乎是指容易使大兵们招惹麻烦的那类女人。（他在一封信中说，她没必要担心他看上别的女人，因为他心中只有她，而且劳顿只有印第安人，且“奇丑无比”。重新考虑了一下后他又迅即补充说：“就算全美国所有长得像莉莲·拉塞尔斯和波林·弗雷德里克斯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也没关系，因为我只喜欢一种风格的美，那就是你的风格。”）

哈里的职责包括教士兵们训马——这方面他比多数新上任的军官都懂得多——挖壕沟和操作数量不多的3英寸口径的火炮。他尽力让自己习惯用公制进行思维和计算。过去在警卫队时他对大多数火炮术语已经熟悉：遮蔽的意思是“让前方一个物体，如山丘、树木或建筑物遮挡住自己……”；纵射炮火是“用枪或炮弹从侧面纵向射击……”；火炮区“是位于单炮或炮群射程之内的地区，中间没有任何障碍物或遮蔽加以保护”。他每天盘桓在训练场地上，随时对训练情况进行检查。“我一会站在这个班的东边，一会站在那个班的侧面，手臂不停地抬起放下，一张嘴就是让某人把腰板挺直或跟上步子。”哈里的步子按照规定的速度走得非常漂亮，1分钟120步，每步32英寸。他说他还学会了像基德上尉那样会骂人的本事，心想会不会有一天他将为此而遭报应。

每晚军官们都聚集在一起，接受火炮和野战勤务规章制度的“培训”，或听法国战场的报告。哈里在听完一个法国军官的报告后在信中写道：“我学会了凡尔登、孚日、比利时和伪装工事的发音。”另一天晚上，他在听完从西部战线来的一名英国上校的报告后，写信对贝丝说：“上校让我们感到我们是为你和整个世界而战，我和他的看法一致。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也不能错过这个史无前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一次24小时的“实战”演习中，哈里在战壕里伏了一夜，首次目睹了有名的法国75毫米速射炮的威力。在防毒气特殊训练期间，哈里学会了戴上

面罩，然后在所谓的“毒气屋”里坐上10分钟。1918年1月，一场暴风雨变成大雪，尔后又转成雨夹雪和哈里从未见过的最强烈的暴风，这让他想起了外祖父扬和他在大平原上所经受的一切。一连几周温度都保持在零度或零度以下。面包冻得梆梆硬，用锯才能切开。哈里仍旧住在帐篷里，取暖的炉子仍是过去在大平原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士兵使甲的那种。

2月的一天哈里在马背上呆了一天，认定自己非常强壮，因为他一点儿也没觉得累。一个更加意外的收获是，他发觉他能让士兵“听从他的指挥”。

除了他应尽的职责外，上级还指派哈里负责团部的小卖部，销售糖果、苏打水、香烟、烟草、鞋带和信纸等，不久，他就因此而在整个营地出了名（后来成为作曲家的弗吉尔·汤普森也应征参加了129炮兵连，当时亦驻扎在多尼潘。多年后他记得杜鲁门上尉是“我们印象中最深的军官之一”）。为了使小卖部赚钱（大多数军队的小卖部都赔本），哈里找了一个合伙人，爱德华·雅各布森中士，他当兵前在堪萨斯城的一家服装店当职员。“我找了个叫雅各布森的犹太人经营小卖部，这人特棒。”哈里告诉贝丝，好像这就是他能赚取利润的全部理由。不过具体的事情的确由雅各布森管，这一点哈里总是很痛快地就承认。

他俩成了铁哥们。雅各布森回忆说：“每天哈里都给他的女友贝丝·华莱士写封信，我也给我的心上人布卢玛·罗森鲍姆写一封……然后我进城（去进货）时，我就把两封信发出去”。哈里把他那辆斯塔福德弄到了营地，拆卸一番改装成一辆小卡车。这辆红艳艳的小车穿梭往来，通常由杜鲁门驾驶，雅各布森坐在他身边，车后扬起滚滚尘土，很快就成了军营的一大景观。

为了资助小卖部，团里每一个人都交纳2美元，于是顷刻间就筹集到2200美元的资金。杜鲁门和雅各布森的生意“规模可观，发展迅猛”，一天能赚500至900美元。不久又增添了一个理发馆和一个裁缝店。在6个月的时间里生意大获成功，小卖部上交了1万元红利，遂使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大名远扬，他俩也认为他们简直是天衣无缝的生意搭档。有的军官开始拿哈里开玩笑，称他为“走运的犹太佬”，还给他杜撰了个犹太名字“杜鲁门海默”。“我应该为我具有犹太人的本事而骄傲”。哈里说。

他的一个隐忧是，他可能因达不到一名军官的标准而被淘汰以至丢脸。此时人人都在传说不久就要开拔去法国。在新的一次体检中，医生因他的视力两次没有让他通过，哈里就动用他三寸不烂之舌，直到把医生说动了侧隐之心为止。他对贝丝说：“在特殊情况下，我的口才总能派上用场。”不过他这次堪称侥幸。

哈里万分思念贝丝。“雅各布森说若能让他回12大街度一晚上，他宁可在禁闭室里关30天。我要是能见你30分钟，蹲上40天也无所谓。”不久他乘飞机回到独立城与贝丝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返回营地后他写道：“直到分手时我才意识到我爱你爱得简直要发疯。”他这一时期的信里没再流露他过去因对自己的前程把握不定而产生的痛苦。那种因所谓的杜家人总走背运而引发的自我怀疑和怜悯已销声匿迹。他身体状况极佳，只是闹了一次他措辞谨慎地称之为“消化不良”的疾病，但当一个年轻的天主教牧师L·柯蒂斯·蒂尔南拿着一瓶威士忌为他“解救”时，他的消化不良迅即就消失了。

哈里有六七个哥们儿，其中包括雅各布森中士和蒂尔南牧师。其他几位都是共事的军官，有3位来自独立城，他们是埃德加·欣德、斯潘塞·索尔兹伯里和罗杰·塞门。另一位是堪萨斯城政治家T·J·彭德格斯特的外甥詹

姆斯·M·彭德格斯特。彭德格斯特中尉手下的3名士兵被他们发现的一颗储备炸弹炸死，于是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对彭德格斯特进行调查，杜鲁门中尉是调查小组成员，他尽最大努力保护彭德格斯特，结果他被判定无罪。

哈里还劝说他的两名上级军官卡尔·D·克莱姆上校和罗伯特·M·丹福德中校加入了共济会，他觉得这也大大扩大了他的影响。克莱姆和丹福德都是西点军校1905级毕业生，哈里若上了西点正好和他们一个年级。克莱姆是堪萨斯城人，办事效率高，却不苟言笑，同哈里一样，官阶也是众人选的。此人过于严厉，是个“普鲁士式”的长官，后来给哈里和其他人造成很大的痛苦。哈里后来承认：“我们选了克莱姆，后来就后悔了。”

丹福德则正好相反，他具备哈里最崇拜并希望在自己身上培养的一名军官所应有的一切素质。他说出的话句句在行（他参与了火炮手册的编写），虽然也很严格，但同时也会以慈祥和理解的方法对待手下人。哈里尽管在丹福德手下时间不长，仅限于训练期间，但他永远也没有忘记此人以及他所树立的榜样。“我在火炮学校和团部学校学了6个月，但他在1个半月里教给我的管教士兵和火炮的基础知识比那6个月还要多。”其他教官似乎决意要把火炮中的数学知识讲得模糊隐晦，而曾在耶鲁教过军事学的丹福德却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使射弹击中目标。丹福德是为数不多几个戴眼镜的军官之一，这或许是哈里佩服他的另一层原由。

然而哈里最知己的朋友是特德·马克斯中尉，他是英国人，与其他几个密苏里人完全不同。他长着一张愉快开阔的脸，扇风耳，天生一副军人风度。马克斯入伍前在堪萨斯做裁缝，他裁做的漂亮的定制西服一套卖75美元。他生在利物浦，16岁离家出走，到美国前在英国皇家特种部队干过3年。他和哈里第一次相遇是10年前的1906年，当时马克斯走进一间办公室报名参加国民警卫队，坐在办公桌后面办公的是一位戴着眼镜叫杜鲁门的年轻下士。哈里问他到这个国家多久了，马克斯说6个月，哈里接着说：“来此时间不长就能讲这么好的英语，实在不简单。”听了他的话马克斯暗想，他到底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一次适逢多尼潘营地最寒冷的一天，马克斯、杜鲁门和另外一个中尉纽厄尔·佩特森前往卢西恩·D·贝里上将处参加提升考核。贝里严于军纪，是位性格强悍的老将军。他蓄着小胡子，颇似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画中的人物，以乐于抨击国民警卫队的军官著称。在他看来，警卫队的军官与“政客”不相上下，不值得提拔和尊敬。一次，也曾当过警卫队军官、统管社鲁门的上尉呈交了一份工作效率报告，对杜鲁门大加赞扬并推荐提升他，贝里把报告打了回去，上面附的批言是：“没有这么好的人。”

3个中尉在贝里办公室外等着一个个被叫，气温接近零度，冷彻骨髓。佩特森第1个被叫进去，马克斯和杜鲁门又站着等了1个半小时。轮到哈里时，将军和3名上校对他足足“考问”了1个小时，贝里的声音响亮粗暴，哈里什么也没记住。他答得对贝里就愈发气恼，若答不出来贝里就傲然在屋里踱来踱去，揪着胡子嚷道：“你难道答不出来么？”要么就是“让你做指挥官将给美国带来灾难！”

哈里满脸通红气愤填膺地走出来，觉得考得糟糕透顶。接着由于已接近中饭时间，马克斯只考了30分钟。结果3名中尉都通过了考试，尽管几个月后哈里才得知他的擢升。上级只是通知他，他和佩特森将和另外精选出来的8名军官及100名士兵先行出国，赴法国接受进一步训练，哈里明白这是对

他极大的表扬。

“我想你这辈子要跟我的傲气打交道了。”哈里在信中对贝丝说，“玛丽觉得我傲气十足，尽管我从不这么认为。”

开拔前夕，哈里不知怎样处理他的汽车，于是把它卖了 200 美元。

1918 年 3 月 19 日之夜，他乘军用列车“终于开拔了”，一路颠簸剧烈，他几乎无法完成写给贝丝的信。“要是在去大洋彼岸之前能见上你、妈妈和玛丽一面，让我做什么我都情愿。”他写道，“……你给我写信时可以写到新泽西州梅里特营地 129 远征军 35 师分遣队，我可能就能收到。”火车在堪萨斯城调车场做短暂停留时，哈里立即跳下火车，摸黑沿着铁轨寻找电话。一个工棚里的扳道工对他说你可以随便打。哈里许久以后记得那位工友说：“电话就属于你了，如要是凌晨 4 点钟还没撕毁婚约，她就是真爱你。”

上船之前在纽约暂休期间，哈里和 4 名军官住进了百老汇大街上的麦卡尔平饭店，并利用他们有限的时间把“纽约逛了个够”。他们在冬花园看了场轻歌舞剧，欣赏了百老汇的夜景，翌日还逛了第 5 大街。他们乘高速电梯上到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厦、58 层的伍尔沃思大厦的顶层。此外他们还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在一家中国餐馆饱餐一顿，哈里本指望纽约将令他叹为观止，结果发现对纽约的描绘不免过多溢美之辞。冬花园的演出是一大败笔。闻名遐迩的百老汇灯光在哈里眼中与堪萨斯城口大街的景致大同小异。堪萨斯城的米尔巴赫饭店一点儿不比麦卡尔平饭店逊色。他在写给贝丝的信中称纽约为“犹太城”，给诺兰姐妹的信中解释说，除了成千上万的“有以色列血统的人”外，纽约还有数不尽的“意大利人”。至于漂亮姑娘，纽约与堪萨斯城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唯一令人满意的是伍尔沃思大厦。顶端的景色让你感到 50 美分花值得。

在麦迪逊大街购物时，哈里深为配镜师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两副铝边眼镜他只收了哈里 17.50 美元，这比他在家乡买要便宜得多。以防万一起见，哈里为法国之行随身备了 6 副夹鼻眼镜。

“我想他戴眼镜的矫正视力是 20—20，如果摘下眼镜，20 英尺以外他连他弟弟都认不出来。”一位叫哈里·沃恩的军官后来回忆说。他和哈里在多尼潘驻地就成为了朋友。“所以他总是随身带好几副眼镜以防万一……眼镜一没他就束手无策了，别人还告诉他打仗时不能戴普通的架在耳朵上的眼镜，因为那会影响你戴防毒面具。耳朵两边会露出空隙，毒气就会钻进去。所以我记得他说他带了……四五副根据他的镜片配制的夹鼻镜。”

1918 年 3 月 29 日是耶稣受难日，当天夜晚，一艘被没收来的德国豪华巨轮“乔治·华盛顿”号载着 7000 名士兵启航了，当时距总统宣战的日期已近一年。哈里回忆说：“我们立在船上看着纽约市的轮廓渐渐退去，心想这一去不知将成为英雄抑或死鬼。”他和佩特森中尉扶着甲板栏杆聊了一阵儿德国的潜艇和“许多将要发生的事”。然后他们下到舱里，据哈里回忆，那天晚上是在玩扑克中消磨过去的。

横跨大洋的整个行程天气一直十分晴朗，是潜艇攻击的最佳气候。巨轮是护航队的一部分，接近潜艇攻击区时就采用之字形航线。每天都要在甲板上做无数次操作救生艇训练，随时都需穿着救生衣。晚上甲板上禁止吸烟，船上一片漆黑。空间小得可怜，6 名军官挤在一个船舱里。哈里既不会游泳也从未见过海洋，久而久之，他纳闷有些人为何愿意当海员。他极度思念家

乡。他留意到随着晴天阴天的变化，海水忽儿呈蓝色，忽儿呈铅色。目力所见的唯一景观就是日出和日落，而海上日落与哈里家乡的日落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

2

“乔治·华盛顿”号于4月13日清晨驶入拥挤的布雷斯特港。当日和煦温暖，杜鲁门中尉觉得那座小城“棒极了”。此处并非巴黎，但若巴黎比这座城更热闹更大，那实在是个“好去处”。乐队奏起了音乐，海岸上满是欢迎的人群，几千人一边欢呼着一边挥动着旗子。

此时美国远征军在法国的人数已达近100万，这一数字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头年夏天的7月4号，美国第一批步兵部队在巴黎阅兵时，全法国才有1.4万名美国士兵。此刻从“乔治·华盛顿”的舷梯上走下来的7000名美国步兵只是每月抵达法国士兵中的一小部分。仅当时的4月份就来了12万人。不久每个月部将来25万人，最终美国部队在法国的总人数竟达到200万。

离布雷斯特港400英里，在东北部的比利时边界地区，历史上一场最残酷的战斗正在进行。陆军元帅埃里克·冯·鲁登道夫在阿尔芒蒂耶尔附近的利斯河对部署在那一带的协约国军战线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俄国由于沙皇政权的倒台而于前一年的12月退出了战争，这使德国人达到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期望的将兵力集中在一条战线上的目的，因此他们把赌注全部压在了这次进攻上。死伤人数令人发指。4月12日，即哈里抵达法国的前一天，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发布了他那道驰名的命令：“我们每一个人都坚信我们为正义而战，我们必须背水一战，一直拼到底。”利斯战役持续了3周，最后挡住了鲁登道夫的进攻。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是西部战线乃至整个战争的决定性战役。然而对杜鲁门中尉以及数千名随他一齐抵达法国的士兵来说，当时尚未预见到这场战役的严重性。他们在登岸后几天甚至几个月之内所目睹的是歌舞升平的法国。诚如哈里写给诺兰姐妹的信中所说的，他觉得自己犹如《傻瓜出国记》中的马克·吐温，既是个当兵的也是个游客。

哈里发现，作为一名美国远征军的军官，意味着可以享受他从未想象过的住宿待遇。在布雷斯特的一家旅店里，他自己住的那间屋子的面积超过盖茨宅邸的任何一间。窗子上配的是双层花边窗帷，屋里有一个白色大理石壁炉台，其上挂一只17世纪的荷兰钟，罩在玻璃罩里，挂钟虽然不走，造型却很漂亮。椅套清一色红色长毛绒，地板擦得光滑如镜。他尤其钟爱一只细颈盛水瓶和镶着一块大镜子的桃花心木的衣橱，他可以戴着海外部队的军帽和武装带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风采。

足有两周，他除了游玩无所事事。纽约和大西洋带给他的失望都在法国得到了补偿。他喜欢法国餐（尤其是面包）和葡萄酒。花园修剪得天衣无缝，找不到一根草，令他十分赞叹。他对贝丝说，四周乡村纵横交错的田地和栽成树篱的一排排灌木使他渴望成为画家。“人们待我们很好，而且好像很高兴地想尽一切努力款待我们。”后来他又写道：“我愈来愈喜爱法国。法国人是天下最勇敢的。”他们还懂得如何把道路修得像台球桌面那样平坦坚固，“而且每隔20米路两边就栽着树木”。电影里每逢出现爱情场面，观众的鼓

掌和欢呼方式总能让哈里深受触动。“法国人是我所见到的最富感伤的民族。”他不无赞赏他说。他说如果让他放弃密苏里，他只愿意当法国公民，尽管在讲法语方面他战战兢兢，除了一句“我不知道”，别的一概不会说。

美食好酒和法国白兰地应有尽有，而且美国士兵的薪水高得可观。哈里计算了一下，他每月津贴 1100 法郎，几乎够他“在此地退休了”。一顿不错的菜肴只消 10 法郎，葡萄酒和白兰地也相对便宜。大多数 35 师的官兵因在俄克拉何马州呆得过久，似乎都憋着劲要把法国喝干。然而哈里又说，他们决计不能得逞，因为法国酒是“无穷尽的”。哈里没有告诉贝丝，女人也是无穷尽的。布雷斯特充满诱惑，哈里后来所去的其他法国内地城市亦复如此。一位美国中尉在他日记中写道：“走在黑暗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女人。黑暗中是那样的神秘和性感……男人在这儿须洁身自好，但很少有人能做到。”然而哈里显然做到了。“我个人认为，哈里是最干净的伙计之一……是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最贞操的伙计。”来自独立城的埃德加·欣德中尉回忆说，“我从没见过他做过任何有失体统的事。他一直都很自爱。我对他这一点非常佩服，一个人当兵时，他的道德观可以受到很好的考验。”“我希望今晚能走进你家看望你。”4 月 17 日夜哈里在信里对贝丝说，当时他到法国已经 5 天。其间他“只见过一个漂亮的法国女人，她好像嫁给了一位法国将军或元帅，总之，他身上的金镶边足有七八码长”。

4 月底，哈里被分配到布雷斯特以东 500 英里的一个精锐火炮学校，校址在洛林，距山顶城镇肖蒙不远，亦是潘兴的司令部。他愉快地写信告诉埃塞尔·诺兰，他坐的头等车厢装潢得与“利剑”轿车一般无二。有钱人出外旅行乘坐的车也不过如此了。

他新住的地方比他所见过的住所更豪华，那是一座用灰石砌就、坐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中央的漂亮城堡，四周用围城圈起。村庄的名字叫芒提尼苏奥比，建在一个坡度不大的峡谷里。城堡里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一条护城壕，围城厚 6 英尺；里面是花砖地板、大理石楼梯，木制品均是手工做的。哈里对埃塞尔说：“一切都如同书中读到的一般。你根本想象不出战争正在这同一片土地上进行，这里非常的宁静和美丽。”春天已披上了盛装，空气清爽而散发着香气，邻近陡坡上的树木已绽出了新绿。唯一困扰哈里的是头几个晚上使他无法入睡的钟声。教堂的钟声在 11 点钟敲响，“尔后城堡的挂钟 5 分钟后也报时 11 点整，5 分钟后另一只不知哪儿的大钟也报时 11 点。此时教堂的钟声又敲响了 11 点 1 刻，整个晚上便都沉浸在这欢快的交替不迭的钟声之中”。

由于不让透露地址，哈里只好说他“在法国某地”。

火炮学校的第一周是哈里经受过的最痛苦的折磨。此后的学习愈发艰难起来。他因从未上过大学而感到力不从心，总是担心自己跟不上。数学完全是大学的课程。他学测量和天文学。时间十分紧张，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10 点，除了学习就是学习，连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的时间似乎都没有。哈里说他对战事的进展及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知得就跟在阿肯色州似的。教室内和发射场上的训练都使用法式 75 毫米火炮，这是一种小型速射来夏加农炮，以其机动性和百发百中著称。此炮是 20 年前造的，建造技术是法国人的军事秘密。6 英尺长的纤细炮管是镍钢和其他保密合金制成的。炮栓、炮架和液压气动后坐系统的设计均很独特。此炮后坐时不离开炮架，发射炮弹时火炮的位置保持不动，开炮的间距不需再调整瞄准，因此可以速射。它每分

钟可发射 20 至 30 发炮弹，有效射程 5 英里。与大多数加农炮相比，此炮体轻，仅略微超过 1 吨半，高辐木制车轮还使其操纵灵敏，故而非常适于堑壕战。由 4 个炮组发射出的火力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它被称作奇炮，法国人后来说他们赢得战争依赖的就是这种火炮。美式和英式的野战炮没有一种可以与其媲美，美国部队使用的几乎都是这种炮（实际上在战争期间，美国派遣的所有部队均没有使用美国野战炮以及美式飞机和坦克）。德国人则称这种炮为“恶魔炮”。

在过去的三周里，我所学到的东西和强度比任何时候都多和繁重（哈里 5 月底在信中对贝丝说）……出一个教室马上就进另一个教室，然后就是接连不断的考试，通不过训斥便接踵而至。

昨天我们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潘兴上将也在场。我负责指挥一个营的火炮，将军根本没过来看看我能否让那么多炮开火……我的角色除了计算数字外不过是摆摆花架子。我手下有 3 个炮组，由 3 名少尉指挥；一名中尉当副官，团长是名少校。演习很过瘾，我们还步行了 6 英里路。参加的还有一些少将、准将、上校和少校，小汽车比 1 月份的丧葬还多。看着一名少将咔嚓一声立正，在上将面前费劲地举手敬礼的样子特别有意思，他的胳膊好像都要折断了。能见到少将敬礼的机会平时绝无仅有。

礼拜天，哈里去天主教堂参加礼拜仪式，那里气氛庄严，他却一句话也听不懂。他认识到，就法国人而言，法兰西是个崇高的所在，因此他理解他们为此而战的心情；“所以我赞成帮助他们，但我要的还是美国、密苏里和杰克逊县，以及住在县府里的那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儿。”他 5 月 3 日这样写道，当时离他 34 岁生日还差 3 天。

他在信中说，5 月某星期六进行的一次测试耶鲁大学校长见了也得发疯。次日星期天无事可做，他和几名军官来到一所基督教青年会，那地方曾是当地一个富翁的宅邸。哈里在青年会里发现了大量的乐谱——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和一架一流的钢琴，他尽情地弹，别人在一旁听，“那实在是繁忙一周后的绝妙消遣”。

5 周后，他的磨难结束，他为自己“混了过来”而颇觉庆幸，此时他过去隶属的炮团已抵法国，驻扎在昂热，上边命令他返回旧部。在再度西行的列车中，他的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越过的风景。同许多美国士兵一样，他惊讶于乡村的古老和美丽。一位与他同行的年轻军官亚瑟·威尔逊记得哈里在法国历史方面的知识曾令他惊讶不已。“他有好几张地图，知道我们在朝哪儿走，而那些地名对我犹如天书……”在奥尔良停车时，哈里非要下车去看城里那座著名的大教堂和主广场上圣女贞德的骑马铜雕。

到昂热后，哈里惊奇地得知几个月前他已被晋升为上尉，然而根本没人通知他，这一消息他是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

作为第 2 营的副官，他的工作是把他所学的东西教授给其他军官。“我本人才勉强从学校里混了个及格，现在他们却让我教三角、对数、测量和工程。”他对贝丝说。一个从密苏里来的“乡巴佬”向哈佛和耶鲁的学生传授知识，她是不是觉得十分滑稽可笑？在另一封信中，他说他至今才意识到受大学教育的宝贵。

贝丝忠实地给他写信，他妈妈、玛丽·简和埃塞尔·诺兰也一样。他们

的信通常一个多月才能到他手里，而且一次就是六七封。“请不断地写信给我。”哈里对他们说。他知道他们很担心他，所以从来不说令他们不放心和抱怨的话。“没有，我从没见过值得让我看上两眼的女孩儿……”他食欲不错，一天能走 15 英里路。他心情特佳，佩戴着上尉军衔帅气十足。“那顶小帽子歪贴在我一只耳朵上，手握一根短柄马鞭，一身马裤呢制服，高视阔步，我俨然一个醉酒狂欢中的暹罗国王，盖了帽了”（“这正是这场战争的一个特点，”威拉·卡瑟后来写道，“小地方的人到部队后受宠若惊，拿出一副趾高气扬妄自尊大的神态……”）。哈里让亚瑟·威尔逊为他照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哈里·杜鲁门上尉承认，他同别的美国士兵一样，都有种“病态欲望”，想让家乡人领略他现在的风采。

他上衣的口袋里装着 3 张照片。右边的口袋里是母亲和戴着帽子的玛丽·简；左边贴近他的心的口袋里是贝丝的照片，她的神态若有所思，她的照片中哈里最喜欢这一张。贝丝在照片的背面为他写道：“亲爱的哈里，愿此照能使你平安地从法国返回家园。”

7 月的第一周，129 团从昂热开拔到雷恩附近的柯奎丹营，进行实战前的最后一次训练。柯奎丹营过去曾是拿破仑的火炮基地。杜鲁门上尉得知他将被提升为炮兵连长，不禁再次大喜过望。卡尔·D·克莱姆上校把他召去，告诉他立即上任。他最大的抱负得以实现，不由得受宠若惊，将有 4 门火炮和 194 名士兵听他调遣。

1918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哈里昂首阔步地来到操练场地，第一次与 129 野战炮兵团 2 营 D 连的士兵见面。该连的绰号叫“刺头 D”，多数人都是来自堪萨斯城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辛德中尉回忆说：“那是群桀骜不驯的爱尔兰人，他们曾有过一位叫查理·艾伦的上尉，后来又换了几任连长，谁也治不了他们，后来他们就调杜鲁门去指挥该连。他这个共济会成员的周围都是天主教徒，我们觉得够他的钱……”

他与士兵们想象的大相径庭。其中一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他看去像个“窝囊废”。另一位记得：“虽然大家都立正站着，行列里却一阵躁动，你可以感受到爱尔兰人的血液在沸腾——仿佛众人在说，这小子要是以为能震住我们，他可是大错特错了。”一个叫维尔·利的二等兵回忆说：“他矮小精悍，一脸正经，戴副眼镜。当官的我们见过的多了，当时觉得他也没什么两样。”在另一些人的眼里，戴着夹鼻眼镜的哈里像是个站柜台的或教书匠，总之不像个当兵的。“没错，”二等兵埃德华·麦金说，“你能看得出他紧张得要死。”

当时的情形哈里比任何人都记得清楚，他说他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他感觉得到他们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上下打量着他。“无论在哪儿，即使在战场上也没那么紧张过。”

据后来在堪萨斯城当法官的二等兵阿尔伯特·里奇说，新来的上尉好一阵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只站在那儿看着每个人，在队列前慢慢来回走了几次。士兵们由于他们先前的表现，本指望遭一顿痛斥，但杜鲁门上尉只是看着他们。很久以后，哈里用第 3 人称写到自己时承认：“他吓得要死，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他大声说：“解散！”他转身走时，士兵们一起对他唾舌嘲笑（“后来我们对杜鲁门上尉嘲弄了一番，这是事实。”维尔·利说）。熄灯后，D 连还在军营里打了场架，几个人还受伤进了卫生室。

清晨，杜鲁门上尉把被降级的军士名单张贴出来。二等兵利回忆说：“他非常果断，第二天早上就贴了出来。他肯定一晚上没睡……我想名单上第一个是上士。”

哈里把其他军士都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这事只能由他们自己收场。“我这儿来不是围着你们转的，”他说，“而你们必须围着我转。如果你们当中的哪一位做不到，现在就说出来，我立即撤他的职。”他说得一本正经，没人不相信他是认真的。哈里记得自那以后“我们的关系缓和了”。一个叫弗洛伊德·里基茨的二等兵还记得伙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杜鲁门上尉对他们亦很关心，与他们讲话的方式与以往的军官也不一样。

哈里成了一名模范军官，在D连“粗野的爱尔兰人”中深孚众望。亚瑟·威尔逊回忆说：“我觉得哈里主要的特点是与人为善，他热情，喜欢跟人交往。他绝不是那种傲慢、颐指气使型的人，没有普鲁士式长官的习气。我们当中的许多年轻人，肩膀上扛上了金杠杠就以为是世界的主宰了。哈里则像个年长的人，当官当得不大吹大擂……他很严厉，却公正。我不知道也说不清他的魅力在哪儿，只知道他有魅力。”

“你们对我负责，我也对你们负责。”哈里对他的下属说。他崇拜的罗伯特·丹福德上校在多尼潘驻地曾说过：“每时每刻都应尽一个军人的职责。”

接下去的一个月，他在射击线上训练士兵，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法国75毫米火炮的知识教给他们。士兵们觉得这炮简直神了，练了一阵儿后，他们以密苏里人的幽默声称，他们能射中栖在9000码以外一根电线上的麻雀。

哈里对下属要求严格，让他们努力训练、遵守规矩，他自己亦以身作则；他为他手下的士兵以及他新获得的权力而感骄傲，亦在这份工作中得到从未感受过的莫大满足。“说起步兵，”他夸耀地说，“他们对着德国鬼子一次只能射出一发小子弹。而我只要对我的连队一声令下，他们一轮就能发射862枚炮弹，而且每隔3秒钟还能再发出同样数量的炮弹，直到我下令停止拉倒。”无论他过去多么不喜欢或害怕枪炮，这种感觉早已烟消云散。他现在晓得了他的判断力极为至关重要。“你想象不出带领194个人上战场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对贝丝说。他若让他们送了命，他就再没有脸面见人。

他心里萦绕不休的念头是炮弹一旦真正在头上乱飞时，他的勇气到底有多大。他脑海里总浮现出哈里森伯父曾给他讲过的一个人，此人拥有最勇敢的头脑，就是两条腿到时“就不听使唤”。

终于，美军开始一批批奔赴前线，营地里的激情高涨起来。整个春季，杜鲁门上尉在蒙提尼—奥布期间，德军在西部战线一直处于数量上的优势。关键是美军能否按时增援并在军事力量上弥补数量上的差异。6月，德军再度返回马恩河畔，进入巴黎的火炮射程之内，局势十分险峻。法、意、英的领导人警告伍德罗·威尔逊，除非美军迅即出动，否则“将很有可能失去这场战争”。潘兴一直决心让其部队听任独立的美军指挥部的调遣，但迫于情势紧急，25万美军匆忙开赴前线，在费迪南德·福克元帅的指挥下救援法军。美国人在蒂耶里堡和贝洛伍德作战英勇。尔后于7月15日，德军对巴黎又发起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即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协约国军只有34个师（其中美军9个师）抗击德军的52个师。3天的时间里，从7月15至18日，战争局势扭转过来，鲁登道夫认为美军是“决定性”因素，德国总理后来亦承认，“1918年7月初我就确信无疑……9月1日前我们的对手就将把和平建议书送到我们手里。……那是15日。18日时，即使我们当中最乐观的人也知道

大势已去。一段世界史在 3 天之内拉下了帷幕”。

但对美国人来说，更残酷的激战还在等着他们。

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团公认为最差的炮连在杜鲁门上尉的调教下明显地变成最好的连队之一，这在他们 8 月 17 日奔赴战场的那天表现得尤为突出。129 野战炮兵团从附近的一座火车站开拔，一次走一个连。从很大程度上讲，这场战争取决于铁路。部队和装备在铁路上的移动举足轻重，所以官兵在开拔时的速度和方式便引起高度的重视。尤其对炮兵而言，“移动”委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每一个连所乘载的列车都有 17 节无顶平板车厢、30 节漂亮的法国棚车车厢（上面写有“载重量 40 人，8 匹马”的标记）和一节军官车厢。所需一切物品均要运上车——部队、枪炮、弹药箱、野战炉灶、马匹、马具、干草饲料、连队记录及各类额外必需品。装运要求高速操作、有条不紊。

事实上，每个连都可在一小时左右完成装载进入待发状态。D 连的时间是 48 分钟，破了记录。

早上 8 点列车出站，旅程持续了 2 天，哈里乘坐的列车与巴黎擦肩而过，他们看见了埃菲尔铁塔的顶端。越过巴黎便是一望无际的乡村，若不是满目战争疮痍，那景致就是密苏里或东部堪萨斯。然后他们来到马恩河畔，穿过美军大获全胜之地蒂耶里堡。火车接着驶入一个渐趋狭窄的峡谷，路过埃佩尔奈驶入香槟之乡的中心。列车在此处掉头东南，连亘十几英里均是一座座小村庄，长满树林的山丘时不时映入眼帘，村庄桔黄色的瓦屋顶和教堂的尖顶千篇一律，如出一辙。

他们朝位于阿尔萨斯的美丽的孚日山脉行进，几乎接近了战线最东部的瑞士边界。由于此处是一直最不活跃的战区，美国最高指挥部便认为这里是缺乏经验的部队在固守阵地方面练兵的理想场所，也是为美国发动全面进攻前的热身之地。前一年秋天，美军在孚日的战斗中首次受创，自那以后，不少师团曾先后参加过这一带的战斗。

天黑后列车来到战线的末端——萨鲁亥斯镇。此镇坐落在一个山谷中，周围是一条湍急的小河。8 月中旬，D 连到达的那天夜晚，河边高大的冷杉树和一片片紫色的百里香使空气中充满芬芳。哈里还记得当地啤酒清冽可口。

翌日清晨，即 8 月 20 号，东边五六英里之外的天空上喷出一团团白色烟雾，中间是一个移动的斑点。德军一架侦察机正遭到防空榴霰弹的射击，这是首次出现的战争迹象，然市当时哈里已在进入山谷的途中。

3

杜鲁门上尉率领一支小分队去寻找配置火炮的阵地，小分队里的中士弗雷德里克·鲍曼回忆说：“那个防区战斗不激烈，不过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堑壕战的滋味。”他们起先坐卡车，沿着蜿蜒的道路来到一座叫克鲁斯风景如画的小村落。然后在一个不会讲英语的法国军官的带领下，骑马朝长满冷杉树的山上攀登，伐木者踩出的小径陡峭得像垂直的屋顶。这里的地形密苏里人从未见过，山间有湍流的小溪、绿色苔藓足有一英尺多厚，到处是堆积在一起的巨大花岗石，一切都荫蔽在高大粗糙的树干之下。敌军的火炮布置在山对面。鲍曼回忆说，地势“呈 U 字型”，荒芜崎岖，好像就算双方不停地开炮，谁也伤不着谁一根毫毛。

天空晴朗无云，气温温暖和煦，能见度极佳——这是平日不多见的天气——但人和马都完全掩蔽在树木之中。只是走到一处德国人能看见他们、无遮拦的山脊时，法国军官才让他们把间距拉开，一次走过一个人。

他们在一片树林旁找到了布置火炮的地方，此处是一块高地，哈里估计距山谷底部有 2000 英尺。他们记得他们吃的野餐有冷蚕豆、牛肉、硬饼干和在路上采摘的一大餐具的野红山莓，最后还痛饮了一番法国军官带去的香槟酒。

他们在树林里野营，花了几天的时间做准备工作。然后全连便拖着大炮开始艰巨而长久的向上攀登。“这山的确陡得厉害。”哈里写道。一次一罐猪油从火车上掉落，竟一口气掉到了山底。阴云朝山上压下来，给树木罩上一层雾霭。此时不必担忧被发现，但哪怕是最轻微的声音在潮湿的空气中也能传得很远。为了让炮轮子不出声，哈里命令给轮子裹上粗麻布，一些人认为这办法傻得可笑。其实把一切装备拉到他们选好的阵地而付出的九牛二虎之力最后都变得荒唐可笑，因为在阴云密布中等了几天后又遇上大雨，接着连队接到命令，立即打包开拔。

上级命令哈里再向德军阵地推进一英里地，找好阵地后准备发射毒气弹幕，故而他第一个任务是向敌军发射毒气。

夜幕降临后连队开拔，人、马和炮车冒着雨在泥泞的道路上艰苦地行进。第二天下午抵达新阵地后雨依旧不停，人人都因缺觉而疲惫不堪，但又因终于要投入实战射击而兴奋不已。目标是 4 英里之外的德军几组炮群。弹幕射击将在夜间进行，用炮兵的行话来说，这叫“压制火力射击”，就是“抑制敌人的活动能力”，而并不一定非要摧毁其阵地。

晚 8 点钟射击命令下达后，129 团的 4 个炮组一齐开炮。75 毫米炮的尖锐啸声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D 连一共齐发了 500 次。二等兵利回忆说，“我们不停地发射，痛快极了……直到把那边的人吵醒。”

炮声停止后，夜晚倏地一片寂静，唯有沙沙的雨声。此时全连应全速转移，在德国人缓过劲来还击之前撤到新的阵地。应立即将马匹从后方牵过来，把大炮拖走，但负责马匹的上士失踪了。这份工作是轮流做的，当晚轮到的是格伦·伍尔德里奇上士，半个小时后他才牵着马匹出现。当时人人都想抢时间，在黑暗中四处乱跑，忙作一团。士兵们惧怕德国人也发射毒气弹施加报复，于是都戴上了防毒面具。有些人还慌乱地把面具往马嘴上扣。

德军第一排炮弹呼啸而来时，哈里正骑在一匹马上察看全连情况。一颗炮弹在离他不到 15 英尺的地方轰然炸开，他的坐下马被击中——或脚底滑倒——跌进一个弹坑里，压在哈里身上，使哈里动弹不得。待他被一个膀大腰圆、叫卡克·豪斯霍尔德的中士从坑里拽出来时，嘴里几乎快没了气——豪斯霍尔德记得他“大口大口吸气的样子就像刚从水里出来的一条鲑鱼”。同时一半的马匹和两门大炮摸黑越过了一个小山丘，他们走错了方向还绝望地陷入泥沼之中。接着，那位晦气的伍尔德里奇上士突然惊恐万状地高声叫喊，说德国人已开始对他们“交叉射击”，让大家快跑。

伍尔德里奇说罢自己先跑了，其他人追随而去，跑了多少无法断定。是夜大雨滂沱，一片漆黑，加上四周一片混乱，谁也看不清周围的情形。人人都头戴面具，即使打个照面也不可能辨清对方面目。二等兵沃尔特·梅尼菲后来说没跑的人只有杜鲁门上尉和另外三四个人。“我跑在了前头。”梅尼菲承认说。维尔·利则认为除了伍尔德里奇，没有几个人逃离阵地。

总之，杜鲁门上尉没有动摇，他的呼吸恢复正常后，立即令人瞠目结舌地破口大骂，因为他似乎一贯是一名颇为斯文和沉默寡言的军官。在哈里自己的记忆中：“我爬起来后把他们三代祖宗都骂了。”他脸色铁青，惊悸不已。

多年后，每逢在堪萨斯城团聚时，D连的老兵们总是一边品着威士忌，一边开心地拿那次第一次与敌人遭遇的经历相互揶揄取笑，他们称那是D连的“溃逃战役”。但事发之时却丝毫没有喜剧色彩。

由于杜鲁门上尉的狠狠责骂和他在炮火中所树立的英勇气概的榜样，全连将士终于又返回到阵地。两匹马死亡，另外两匹不得不用枪射死。大炮在泥里已陷至车轴的深度，不可能靠人力拖出。哈里决定以后再想办法拖炮，当即率领连队在倾盆大雨中摸黑撤回到阵地后方。

大约在凌晨4点钟，哈里吃了顿热饭回到自己的帐篷，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口气睡了12个小时。

他丢了脸面，因而忧心忡忡地病倒了。然而他的上司马文·盖茨少校宽慰他说新兵初上战场均表现欠佳，劝他不必介意。盖茨只是建议立即对伍尔德里奇上士进行军法审判。哈里不忍心这样处置，便将伍尔德里奇降为二等兵并调往另一个连。在未来的战斗中，伍尔德里奇表现得英勇出色。

哈里在一封信中对贝丝说，他直到那个可怕的晚上结束后的第二天才意识到发生的一切。“别人都以为我不怕炮弹，其实他们不知我怕得连跑的勇气都没了，实在是吓破了胆。”

由于在混战中没人伤亡，于是大家认定杜鲁门上尉——哈里上尉——不仅在炮火下能临危不惧，而且还是个吉祥人物。当需要返回阵地去拖炮时，全连人都自告奋勇地要求前往，尽管那是一项具有潜在危险的差使。此举大大感动了哈里，他只派出了最低限度的人和马去执行这项任务。

9月3日黎明，全团再次转移，人人都全副武装，戴着头盔，背着防毒面具、毛毯，全部装备重达70磅，相当于一些人的一半体重。堪萨斯城格兰德大道上挂着一幅招牌，上书“参加炮兵去骑马。”但此时为了在陡路上保护马匹，人人都须步行，当官的也不例外。

哈里对秀美的山谷赞叹不已，是时正在收割于草和谷物，劳作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年迈的女人均披着丧服。”法国的男人的确都当兵了。”一个叫杰伊·李的中尉写道，“免服兵役的唯有老弱病残者，但他们也得干活。”

两天后抵达瓦尼村，全团登上一辆列车北上。第二天夜晚，在摩泽尔河畔的巴扬发生了一件把哈里吓得够呛的奇怪事情，尽量他没怎么道出他的恐惧。到车站后，一个密苏里步兵师的中校告诉哈里让他的人马赶快下车，在破晓前全部隐蔽起来。他说那一地区正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哈里在黑暗中发现站台旁横着两具死马的尸体。中校自我做了介绍，他叫贝内特·克拉克，是选自密苏里州的众议院议长钱普·克拉克的儿子，而钱普·克拉克是约翰·杜鲁门所拥戴的民主党党员之一。克拉克中校说，他不愿见到哈里和他的属下也遭到同那两匹马一样的命运。“我当时吓坏了。”哈里后来写道，“整个列车由我负责，我责无旁贷。我只得让全连人把火炮弹药卸下车，在天亮前找到藏身的地方。”于是人人都以玩命的速度把大炮、马匹和弹药从车上卸下来拖进了一个松树林。然而早上的时光过去后并未见德国飞机的踪影，哈里于是走回车站，看到克拉克正咧嘴冲着他笑。这是跟哈里开个玩笑，克拉克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德国飞机。当哈里问及那两匹死马的缘由时，克拉克说

它们是被一个兽医用枪打死的。

克拉克的恶作剧似乎令哈里很开心，因为他的士兵痛快地享受到了他们渴望的休整，还在河里泡了个澡。哈里和克拉克在未来的日子里过从甚密，但在当时俩人谁也没有理由期待还会有再见面的机会。

黄昏时全团再度开始步行，走了一晚上和翌日全天。哈里在兜里的一个日记本里记下了他们的行程：“9月10日。晚上离开夸维勒。天下雨……9月11日。晚7点30分离开鲍塞维。总是下雨，一片漆黑中走过南锡。”

战争结束后，杰伊·李中尉在一部自费出版的129团历史的书中写道：“谁也忘不了当年夜行军的情景！”

我们有时一个晚上可步行30至35公里，这倒算不了什么，就是道路上时常发生堵塞，让人等得烦躁不安和引起担忧。行军的行列不啻是个奇迹，给人留下声动和肃然起敬的印象……前后左右都是马匹、火炮和弹药车、弹药及士兵，排成长长的永无穷尽的队列……成千上万的士兵都穿戴着清一色铜盔和军用雨衣；每个人都怀着同样的目的和决心，但又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这50万大军是美军首次大规模攻势的一部分，正在朝凡尔登以南的圣米耶尔推进。

我们的行进缓慢至极，6个小时才向前推进了三四英里路（李中尉在描述穿越南锡那天的夜行军时继续说道），突然，我们北面的整个战线火光冲天，一阵连续不断的可怕的炮击声响彻云霄；巨大的探照灯光柱夹杂着信号弹像极光似的在天空中扫来扫去。那声音和场面是我们破天荒第一次耳闻目睹。

哈里在9月12日星期四的日记中写道：“美军大规模进攻开始了，听到了美军的第一声炮击。”

几天之内，他们作为后备军驻扎在圣米耶尔附近，马不卸鞍，整装待发，只要一声令下就可出战。哈里觉得此刻他才真正投入到“伟大的冒险”之中。数千名衣衫不整的德军俘虏排成长队从他们跟前走过。“我们正尽力完成扫尾战斗，尔后重返家园。”哈里在信中对贝丝说，“但战斗不结束我们不能离开，其实胜利到来之前我们也无意离开。”

此时哈里可以依赖的下属中有在“溃逃战役”的混乱中表现英勇的埃德华·迈兹伯格少尉；年龄只有19岁却具有成熟判断力和韧性的拉尔夫·撒克；军中最优秀的厨师李·海尔曼和弗兰克·斯皮纳以及火炮仪器少尉哈里·凯利，后者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超凡战士”，他计算射击数据的本事不亚于哈里。

9月16日夜，月光如水，他们开始了永远铭刻在他们记忆中的急行军。由于美军在圣米耶尔出人意料地作战告捷，两天之内歼灭了德军，于是改变了行动命令，129团向阿尔贡森林方向移动。“这次行军走了一晚上和半个白天，只睡了几个小时的觉，然后又接着走。”哈里写道。

最高司令部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全线进攻来结束战争。这场攻势将从凡尔登至海边沿着西部战线全面展开，其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划给美国陆军的战场从凡尔登以北的默兹河一直到阿尔贡森林，全长24英里。美军的目标是切断德军在色当的铁路线。

这次后来被称做“默兹—阿尔贡进攻”的大规模战役是到当时为止美国

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行动。行进在道路上的美军人数可谓空前绝后，共有 15 个师——6 万人、近 3000 辆炮车、卡车、坦克和军需车、9 万多匹马。能把这样一支数量上令人震惊的队伍调动起来是乔治·C·马歇尔上校的杰作，他是潘兴手下一位才华出众的僚属。步兵和弹药由庞大笨重的链动卡车运载，但由于马拉的火炮速度缓慢，为了使队列能够连结，便须时常变换行进命令。沿途严重阻塞时有发生，纪律很差。只有 3 条路供大军行走，而且被替换下来的法国军队从前线返回，因而多数情况下还形成双向交通。此外，为了避开德军的耳目，无论前进或后退均需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负责交通的军官不得时常挥舞着左轮枪催促队伍移动。除了第一个晚上月光皎洁之外，后来一路上一直小雨不断，将道路化为一片泥泞。许多马匹精力衰竭，套着挽具就倒在路上，只好将它们击毙。

为了减轻马匹的负担，炮兵们力所能及地加重负载。二等兵弗洛伊德·里基特回忆说：“上面有命令，让我们跟在大炮后面前进的炮兵不要扶靠炮车或弹药车，以便不给马匹增加额外负担。但完全步行累得要死，你根本控制不住抓着弹药车拉着你走。”

克莱姆上校骑着马一反常态地在队列里跑来跑去，“发疯似地”指手划脚，一次乃至荒唐地命令向一座距离颇长的山丘跑步行进。一些士兵后来说，他当时要不是穿了件宽大的黄色油布雨衣，后背准得挨一枪。由于蒂尔南神父也穿了件颜色相同的雨衣，所以谁也不愿冒在黑暗中打错人的风险。

哈里将他的人马拉到路边小憩，克莱姆发现后质问他目的何在。“执行命令，长官。”哈里答道，据说此事发生后他的属下对他崇拜有加。

后来哈里不顾违抗命令，让扭伤了脚踝的吉姆·多尔蒂少尉骑上自己的马。克莱姆看到后雷霆大作，命令多尔蒂下马。哈里告诉克莱姆，只要这个连还由他哈里指挥，多尔蒂就绝不下马。克莱姆暴跳如雷，掉转身纵马而去，但显然在走前把哈里骂了个狗血喷头。

“上校难听地侮辱了我一番。”哈里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有教养的人绝不会像他那样说话。去他妈的！”

（一些人许久以后谈论起那次行军时，猜测克莱姆当时若不是一时真的疯了就是醉了。多少年后人们想起他时心里都有种不痛快的感觉。1925 年，他在堪萨斯城自己公司的办公室里开枪自尽。）

行军持续了一星期。“天气恶劣、多雨，我们白天在灌木丛和小树林里睡觉，黄昏时出发继续走一夜。”二等兵里基特说。他们路过了几处已沦为废墟的地方：乌切斯、卢瓦西和伦伯库尔。哈里记得，他和蒂尔南神父有时走在全连的前头，大侃“世界史和其他话题”。他对蒂尔南说，如果天下的牧师都跟他一样，就不会有请教徒了。

9 月 22 日清晨，他们钻进拉希库尔对面的一座湿漉漉的树林里睡觉，不远处即是他们的最后阵地。从此处起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撒下供给，人人都骑马前行。哈里在 9 月 22 日星期一写的日记只有寥寥数语：“今晚骑马快速奔往阵地。”后来他在信中为贝丝做了生动的描述：

我让全连抛弃一切不必要的装备准备投入战斗。我知道这次是动真格的了，因为我只带上了火炮和足够操纵火炮的人，他们第一次可以骑马前进了。出树林时我们被陷住了，一辆弹药车纹丝不动，任你怎么祈祷和破口大骂那辆可恶的车就是不挪窝。我又骂又祈求上苍，最后让所有的人把绳索套在上面一起把它拽了出来，接

着就开始了快速如飞的骑马行军。好像法国所有的奔赴前线的卡车和炮车都挤在了我们那条路上。我们的队列有 12 辆车，4 辆炮车、6 辆弹药车和两辆行李车，其中一辆是仪器，另一辆装满了干粮。我觉得这些车哪辆也丢不得……最后终于把连队拉到了大道上朝前线进发。这回可是真的战场，位于凡尔登以西，阿尔贡森林边上。那些可恶的卡车想把我连一切两断，全连几乎一路都得飞跑前进，我必须骑着马前后跑来跑去让队伍跟上。一旦抓住机会我就切入一溜卡车的前头把道封死，让我的连队先过去；卡车瞅准机会也从我们的队列中往前穿行。他们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只要我占了先就想方设法堵住他们……不知上次跟你说过没有，雨依旧下个不停，地上溜滑如冰。

他们这次急行军大约走了 100 英里，按时抵达阵地。其实此次大规模向前线移动非常成功。每一支部队都奇迹般地预期到达了指定的地点。129 团的指定阵地是 209 高地，它是一个平缓的坡地，半英里开外是一座叫纳维里的位于一个交叉路口的村庄，村庄里有一座石砌的被炸坏的教堂，它后来成为了战地医院。教堂里一幅巨大的耶稣复活绘画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依旧悬在圣坛上方破损的墙壁上，后来各家报纸争先登载的一张照片记录的就是躺在担架里拥挤在圣像下的伤兵。

杜鲁门上尉和他的 D 连被命令镇守在一丛小树苗中，前方不远处是一个不大的树林，中间隔着一片泥地。他们于凌晨 3 点钟到达，天依旧下着雨，人马疲惫不堪。他们采取 12 匹马拉一门炮人人都在后面推的办法才在天亮前把 4 门火炮拖到了阵地，跨过远处无人区地带便是德军的布雷耶据点。

未来的 3 天都在为总攻时刻做准备。他们挖战壕，堆放弹药并挖树开辟出一个火力区。德国人的炮弹时而呼啸而过。第二天夜里几颗炸弹落到了哈里第一天早上睡觉的地方，他说若不是挪了地方早就粉身碎骨了。9 月 25 日星期六晚上，连指挥官们在克莱姆上校的防空掩体里接受了命令。总攻时间定在翌日清晨 5 点 30 分。每个连队都必须 1 小时发射 1000 次齐射。这意味着每门炮 1 分钟要发射 6 次，因为每隔 1 小时每门炮需要 10 分钟的冷却时间。步兵出动前的头一个小时是“预备”射击，目的是摧毁带刺铁丝网。总攻开始后将进行 2 个小时的“徐进弹幕射击”，其间落弹点将稳步前移，每 4 分钟前移 100 米，始终保持在进攻步兵的前头。炮兵指挥员或炮手哪怕是稍有差错都会给自己的部队带来灾难。

“万事已经具备，此刻处在风暴前的静寂之中。杰伊·李他那本关于那段历史的书中写道，“黄昏时，团人事长官罗杰·T·塞门上尉按惯例视察了连队，即使在这一不寻常的时刻他的到来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在同一战线的某处，一位争强好胜的坦克指挥员乔治·巴顿中校对天明的到来等得颇不耐烦，便在信中给妻子写道：“在我出发去参加在这次战争中可望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战役之前给你写几句话。”

1918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清晨 4 点 20 分炮击开始了，当时天还未破晓，寒气逼人。整个战线的 2700 门火炮以空前未有的发聋振聩的隆隆声一齐发射。3 个小时之内消耗的炮弹超过了整个南北战争的炮弹量——估价为每分钟 100 万美元。美国王牌飞机驾驶员埃迪·里肯巴克在黎明前驾机起飞，据他说：“黑暗中，整个西部地平线变成一片锯齿状的火海。”从 290 高地望去，仿佛天空着了大火——“似乎法国所有的火炮都在射击。”哈里说。

总攻时间准时于 5 点 30 分开始，徐进弹幕射击接踵而至。据下士哈里·墨

菲的回忆：“炮队的射击极有规则，真是——真是大开眼界，准确极了。他们发射得特快——令人不可思议。”

“我们的炮筒烫极了，”哈里写道，“简直要把我们铺在它们身上为了冷却的麻袋布烧着。”

炮轰结束后；周遭一片死寂，唯有远处传来哈里觉得像打字似的怪怪的机枪声。

步兵冲入一片弹坑累累满目焦土的空旷区域，然后便消失在白色的浓雾之中，乔治·马歇尔后来写道：“战斗的第一阶段相当混乱。”德军尽管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但却隐蔽在高地的堑壕里，高地易于防守，对攻者则威胁极大。中间地带是一处陡峭的拱地，树木丛生，德军在彼处构筑了4年的防御工事，拥有多处对他们有利的制高火力点。大多数向德军进攻的美军师团过去从未与敌人交过锋。有些部队的士兵这次是第一次摆弄枪支。

129野战炮兵团接到命令，紧随步兵向前推进。杜鲁门上尉和盖茨少校先行一步以期寻找敌军的炮位，不幸在一条小道上被机枪火力阻住了道路。从他们开始开炮的地方到无人区另一头的隐蔽树林仅有1英里半的距离，但由于地面被炸得一团糟且布满弹坑和歪七扭八的铁丝网，把大炮拖到树林足足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总共12个小时，直到晚上才告结束。从头顶飞过的德军炮弹尖啸刺耳，骇人的爆炸掀起的泥土和碎弹片四处飞溅。然而夜幕降临时人人都筋疲力尽，有人甚至站着就睡着了。

翌日，在澄清几道混乱的命令之后，他们继续向前推进。此时他们见到了俯拾皆是死尸，几乎都是美国人，因为撤退的德军把他们的死伤者一道抬走了。在切皮附近的一个交叉道口，17名美国步兵的尸体堆在一起，路上还有10来名都“倒栽葱”地趴在地上，哈里猜想“他们是横跨马路时背部中弹死亡的。”他记得看到这一景象时他的属下均缄默无言，一个少尉说：“他妈的，这回你算相信真的是在打仗了。”

炮连进入切皮以西的一座桃园中。哈里同他手下的一名中尉莱斯利·泽墨尔、中士凯利及下士威廉·奥黑尔先行去建立一个观察点。他们在架电话线时不知不觉超越了步兵几百码。傍晚时分，哈里在一座山丘顶上看见一架美国飞机在西侧投下一颗照明弹，他把双筒望远镜对准那个方向，看见28师驻地河对面的左翼有一支德军炮队正在进入阵地，那一带不属于他的轰炸区。他的任务是只轰炸35师前方的敌军炮队。哈里决定不听从命令。

“杜鲁门一点儿也不慌乱，”二等兵利回忆说，“他让他们（德国人）把马从炮位旁牵走，换了他他也是那么做。要是我的话，一看到他们就喊叫D连开炮了。哈里没那样做，他让他们进入炮位，做好一切开炮准备，当时马匹已被牵到2英里之外。然后他计算好了射击数据。要是不懂数据的人给他这么一个机会也没用……”

“杜鲁门把计算结果拿了回来。”二等兵麦金说，“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哈里说：‘自由射击，速度越快越好。’于是我们就雨点般朝那边轰去。”

毋庸置疑，哈里的决定拯救了28师官兵的生命，虽然暴跳如雷的克莱姆上校立即打电话来威胁要对杜鲁门上尉进行违令军事审判，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一架德国飞机发现了位于桃园里的D连——其实飞机驾驶员已驾机飞到离地面300英尺高的地方，投放了几枚德式木柄手榴弹——于是哈里下令所有的人立即撤退。紧接着，德国火炮的“重型炸弹”便呼啸而至。

维尔·利说：“你要是个炮兵，他们不用机枪朝你打，因为你远离战场。可他们朝你轰重型炸弹。他们把那个桃园都炸没了。”

当天是9月27日。夜里，炮连还在撤离途中时，骑在马上哈里脸被一根低垂的树枝刮了一下，突然他发现眼镜不见了，视线一片模糊。马依旧随着队伍往前走。哈里骑在马鞍上慌乱地往回看，却发现眼镜不偏不倚地落在马背上。

他当天的日记极为简洁：

9月28日：进入切皮—瓦雷纳路的阵地。炮轰了德国鬼子的哨所……德国鬼子
炮队撤离时向他们炮击。

9月29日：弹幕射击。

9月30日：同昨天一样。

一个士兵写道：“这两天的炮火实在吓人。炮弹不停地尖叫着从我们头顶飞过。德国人常轰炸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做拥抱地球状，体力消耗颇大。我觉得老了30岁……”

29日下午传来消息说，步兵已失去阵地。美国落伍士兵络绎不绝地出现。德军即将开始反攻。哈里的顶头上司是约翰·迈尔斯少校，人人都晓得，面对即将被攻破的阵地只可能有两种命令。第一道命令是“直射”——对冲上来的敌人做近距离平射——然后守住大炮或牺牲或被俘。第二种命令是抛弃大炮并退却。迈尔斯说：“伙计们，准备好对敌军进行直射。”

德军的进攻没有实现。然而正如李少尉后来写的：“但那天紧张的下午迈尔斯少校和他属下所表现出的沉着勇敢和一拼到底的气概却感人至深，因为他们准备捐躯沙场的行为并非是被迫的。”

步兵伤亡惨重——35师高达50%。位于切皮绷扎所的担架床有好几百张。仅从这一个地方每天就有14辆救护车载满伤员开往后方。9月30日，几千名伤员和中毒气的士兵在那里接受照料。蒂尔南神父整个下午都冒着炮火为死者安葬。一支救护队中就有50多名成员受到伤亡。

本来预计美军将步圣米耶尔战役的后尘，在默兹—阿尔贡攻势中再获大捷，然而却事与愿违。色当最终被占领，但代价骇人听闻。这场战役中出现了所谓的“全营覆没”，一个步兵营被围歼5天，70%官兵阵亡；还出现了一个美国战史上最动人的英雄，来自田纳西州山区的步兵阿尔文·约克。此人单枪匹马一天中俘获了132个德国人。47天的激战中，美军伤亡总数为11.7万人。14246名牺牲的士兵被埋葬在位于战场中部罗马尼高地的军事墓地上，使其成为欧洲最大的美国军人坟地。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惨，但已经相当惨了。”哈里在10月的第一周写信给贝丝时说。他又补充说，英雄们都涌现在步兵里。

炮团撤退整休。哈里手下人个个骨瘦如柴，但对哈里却更加崇拜。“他是上尉，是带头人。”维尔·利后来说。“我们就是这么看他，尊敬他，他的尊敬是他自己赢得的。我们之所以尊重他，是因为他值得尊重……他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人。他不是巴顿，你知道。与巴顿相比，他可能是个更出色的士兵，但他不善于炫耀。”

哈里掉了20磅肉。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所经历的一切。尽管战事可怕至极，却也“是我生活中最过瘾的一切经历”。他的人马都活着而且连队尚在，

不由他不感到骄傲。

10月中旬，气候变得更加阴沉寒冷，炮团在色当以东、默兹河谷之上的一片荒凉高地进入新的阵地，准备最后一次进攻。士兵们每天忙着铺电话线、挖新的掩体和构筑伪装工事。D连很快就藏匿起来，哈里天黑后都很难找到手下人的位置。他的掩体在一条道路之下，里面有炉子、桌椅，床旁边还有一部电话，俨然是座“宫殿”——“家中所有舒适的东西应有尽有，唯一不足的是我将养成睡地下的习惯，恐怕将来回家只有睡地窖了。”

在另一个团的哈里·沃恩中尉自从离开多尼潘驻地后断绝了与哈里的联系，此时他俩又经常见面，他纳闷哈里在堑壕里呆了几周后何以还能看上去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

D连的前方是著名的杜奥蒙防区，它似一头地下怪物的脊背似地从可怖的地平线拔地而起；作为世界最大的要塞，它曾经一度是法国阵地工事的骄傲。哈里认为这座要塞及其周围的地形是他目睹过的最令人悒郁的景致。被毁坏的死树像鬼似的矗立着。地面的弹坑比比皆是。凡尔登城内没有一座建筑物免遭毁坏。这座古城饱受战争的创伤，市内居民早已逃逸。在哈里的想象中，那座古城肯定优雅美丽一如他所见过的法国其他地区。

为了阻止1916年德军的大举入侵，法国往凡尔登调遣了大量的士兵和火炮。战斗之激烈和恐怖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哈里听说法国人把75毫米炮一个紧挨一个地排起来向冲上来的敌人平射。激战破记录地持续了10个月。双方死伤人数共是90万。地面依旧布满了武器残骸、弹壳和衣服碎片，谁也不知到底死了多少人。哈里在写给诺兰姐妹的一封信中，对他们阵地西侧的一块空地做了如下描述：“每次炮弹在那儿爆炸都能炸起某个人的残骸。”他在信里从未抱怨过，也只字未提及他亲眼目睹过的恐怖。同几乎所有给家里写信的人一样，他试图对可怕的战争加以掩饰，只是此刻他似乎有些动摇了。他无法把那些死去的人从心头抹掉。“当月亮升起时……”他对贝丝说，“你想象得出在这里被屠杀的50万法国人的灵魂就在废墟上凄凉地游走。”然而他毕竟没有提及弥漫于空中的怪味儿和四处乱窜的老鼠。

他们的堑壕盘旋弯曲，足有4英里长，尽头靠近德国的防线。他在尽头新哨所附近的岩石上采了一朵罂粟花，寄给了埃塞尔·诺兰，他总共寄回去两朵花，另一朵给的是贝丝。

官兵们忙于修筑工事，构建防毒掩体，搬运弹药和设防。炮声和远近的枪声几乎不分昼夜地持续不断。

天气愈发寒冷，又下起了雨。出太阳的天哈里便觉得值得在日记里提上一笔。“晴天。”他于10月28日写道。10月29日的日记是：“难得的好天。”11月1日破晓前，所有火炮部队向德军战线一齐开炮，轰炸了5个小时，情景同阿尔贡战役一样。

几周以来一直传闻着将要停战。一个在D连后面被击落的德国飞行员说战争不出10天就将结束。11月7日，美联社的一名记者罗伊·霍华德从巴黎发出一份电报，说当天下午2点钟战争已经停止。此消息不是事实。

11月9日，步兵在一个小时的弹幕射击后再次出击。哈里的朋友特德·马克斯率领其C连奉命向前推进支援步兵。第二天，进攻和火炮支援继续进行着。11月11日清晨，D连再次开始轰击，但在8点30分，指挥部通知杜鲁门上尉，2个半小时之后的11点整——即11月11日11时——德军将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迈斯伯格中士被传唤到杜鲁门上尉的掩体，看见后者正放

松地歪在地上啃一块黑浆果饼，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他一边嚼着饼一边递给我一份电文。‘中士，拿着这个回去，把它念给全连人听。’”令迈斯伯格大惑不解的是杜鲁门上尉从何处搞来一张黑浆果饼。“我连按规定的时
间放完了规定的炮弹，”哈里写道，“最后一枚炮弹是朝一个叫赫梅维尔的小村落发射的……发射时间是 10 点 45 分。”

当整个战场的枪炮声停止后（他继续写道），……四周寂静得让我觉得好像我突然失去了听觉。

操纵火炮的士兵、我这个上尉、尉官们以及中士和下士们面面指觑，接着整个堑壕里爆发出强烈的欢呼声。我们可以听到在我们前方 1000 米处的步兵们歇斯底里的叫喊。位于我们阵地后面的法国炮兵又跳又唱，挥舞着酒瓶……战线整天都沉浸在庆祝之中，一直持续到夜里。手枪、火箭弹，凡是方便的家伙顺手抄起来就发射。

我夜里 10 点钟上的床，但法国炮兵的弟兄们跑来围着我的床纷纷与我握手。他们高喊：“美国上尉万岁！威尔逊总统万岁！”然后大口喝几口酒，重新再喊一遍，就这样一直折腾到 2 点我才睡觉。

停火时，F 连一个叫布罗德斯的的中尉正在空中的一个汽球里指挥火炮射击。他记得地面上“大家发疯似地欢呼胜利竟忘了把他放下来……我在汽球里足足坐等了 2 个小时”。

“你想象不出我们为战争结束而有多么高兴，”哈里在写给埃塞尔·诺兰的信中说，“昼夜不停的狂轰乱炸迟早要让你精神崩溃，而 11 月 11 日 11 点时我在精神上已经快支撑不住了。传来停战的消息时，那种莫大的欣慰感真是从未感受过。”

大战拉下了帷幕，对于胜利者来说，这是文明的胜利。今后如何确保持久和平就是政治家的事了。不到半个月，威尔逊总统乘坐“乔治·华盛顿”号动身前往法国，这条船曾载过哈里和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

对于 129 野战炮兵部队来说，真正的战役是默兹—阿尔贡进攻，它给 129 团造成了伤亡。D 连只伤了 3 个人，其中一人后来死亡，但这 3 人负伤时并未在杜鲁门上尉的指挥之下，而是在执行护送弹药辎重队特殊任务的途中。“我们只是——怎么说呢，一半是运气，一半是有好领导，”二等兵维尔·利说，“有些连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好领导。”

4

停战后的第 16 天，哈里·杜鲁门上尉在巴黎休假，来到马克希姆用餐，他看见邻桌有一位他到法国以来所遇到的最漂亮的女人，尔后惊喜地发现她是在红十字会工作的美国人。饭后他和几位军官去看“狂欢”表演，幕间休息时被一群“小妇人”围在中间（经年后他说那场表演简直“不堪入目”，但当时他却对埃塞尔·诺兰说“跟狂欢节的表演差不多，只是更热闹些”）。他参观了巴黎圣母院和拿破仑墓穴。在凯旋门前，他将胶布棉雨衣的腰带系紧抵御着 11 月的寒风，在一尊俘获的德国大炮前照了张像。他乘出租车跑完香榭丽舍大道，然后驶入皇家街，再入马德琳街，再北上里沃利街，沿壮丽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经过塞纳河。他走访了卢森堡宫杜莱希花园和卢浮宫，并在歌剧院大道和“诸多小巷里”散步。所有这些他只用了 24 小时。

他们从巴黎乘火车前往尼斯。哈里称巴黎是“我所去过的最喧嚣放荡的地方”。尼斯是个“理想的所在”，一边是地中海，另一边是阿尔卑斯山麓。哈里住的旅馆“漂亮非凡”，俯瞰大海。“我窗前的景致实在迷人……地中海的蓝色真是天下无双，”他对贝丝说，“加上远山、带灯塔的岬角和点点白帆的点缀，不由不让你想起韦伯的‘波兰舞曲’，据说他就是在这一带创作的那首乐曲。”倘若贝丝再在这里，此地就不啻为天堂了。

他第一次见到了棕榈树，他在灿烂的阳光下漫步，胃口像头牛，而且12月初驱车去了蒙特卡洛，在那儿他看见了一位正在喝啤酒的真正的公主。他和盖茨少校租了辆车开到意大利边境，然后沿峭壁大道返回尼斯。“沿途的景色是我驾车旅行中见到的最美的。”

返回巴黎后，在他假期即将结束之前，他和盖茨少校看了场当时正风靡法国的歌剧，由法国作曲家马斯内创作的《黛依丝》。大歌剧院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再度灯火辉煌。由于他刚从地中海游憩胜地里维埃拉返回，心中又思念着他所钟爱的女人，那华美动听的音乐便深深打动了她。“唱得美极了，风景道具（又见到了更多的棕榈树）胜似真正的风景。”他在信中强调说，这才是“真正”的歌剧。即便光让他看一眼金壁辉煌的歌剧院建筑他也情愿付门票。

他返回位于凡尔登附近的师部驻地，那一带满目都是泥泞。等待回家的日子令人有一日三秋之感。他的一位来自独立城的朋友、C连的上尉罗杰·塞门回忆说：“为了避免发疯，我们不分昼夜地打扑克。”当哈里听说家乡正蔓延流行性感冒时，他惊讶地不知如何控制自己。他得知在他度假的那几周里，贝丝和她弟弟弗兰克都患了“西班牙流感”，玛丽·简和埃塞尔·诺兰病例了，尽管4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却还令他放心不下。“几乎每天我们部队里都有人听说自己的母亲、姊妹或情人死去了。”他写道，“想到我们在此处竟安然无恙，而那些我们不惜生命想要保护的人却比我们更接近死神，不禁让人痛心。”截至1919年初流行性感冒莫名其妙地消失后，美国病死的人数达到了50万，包括2.5万名军人，几乎是美军在战争中阵亡人数的一半。仅多尼潘营地就有51人死亡。

一月下旬，当哈里听说他所喜欢的炮连文书基南中士在后方医院死于阑尾炎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犹如失去一个儿子似的悲伤。”

潘兴上将和威尔士王子莅临师里视察。潘兴握着杜鲁门的手对他说，他手下的人个个都是好样的，“要把他们像来时一样身心健全地带回家去……”哈里对此命令非常上心。

现在要阻止190个人不出外捣蛋不是件易事（他后来写信对埃塞尔·诺兰说）。我必须想出种种惩罚的办法施之于失职者。幸好我们远离酒、女人和喧闹，否则将够我们受的。有时我必须罚某人多干活，这也实在出于无奈，因为公平是最可怕的暴君。如果我罚一个人星期天洗刷炮车上的泥，因为他没向我请假就跑了趟凡尔登，那么另外一个犯了同样过失的人尽管有充足的理由我也得以同样手段罚他。这些人快让我发疯了，我宁肯当一介大兵也不愿做他们的头。有的小伙子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我也检查过他的信件，知道他对家乡的一个女子望眼欲穿，但我照样也得铁下脸来惩罚他，这实在是一件痛苦之极的差使。我不得不让他们循规蹈矩。你肯定认不出我做连长的那副样子。

他时刻思念着家乡和他的前程。他在信中提到继续回农庄务农，但也表

露了以他从军作战的资历打入政界的可能性——如竞选杰克逊县东部的法官乃至跻身国会。他说他目睹了和平时期的军队生活后，说什么也绝不进入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他同许多后备役军官一样，对西点军校毕业生已存有不容动摇的偏见。他认为他们大部傲慢、懈怠和自我感觉良好，因而无法想象在他们控制的体制下生存。“我想象不出一个有首创性和有头脑的人有何理由会在和平时期留在部队里，”他写道，“那些永远压在你上面的老顽固们除了墨守成规外没有丝毫的想象力，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他对贝丝说，年轻时他曾“渴望受到西点的教育……因为只有那样你才能入主皇宫或实现你的抱负”。而如今他所认定的是盼望“返回天赋之国，回到古老壮丽的密苏里绿色草原的怀抱”；其实他现在除了家没处可去；他囊中羞涩又在热恋之中——“我爱你爱得发疯”——而且热切期待着离开军队尽快结婚。他梦想着徜徉在北特拉华大街的情景，还梦想着拥有一部福特车，带着她去乡下兜风。“也许参加点政治活动，间或举办个惬意的晚餐聚会充作调剂，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结婚的时间和地点由你说了算。”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你只请一个人也好，把全城的都请来也无妨，只要我回去马上就办就成。”

在幸存下来的贝丝的信当中最早写的即在这一时期，她在一封信中答道：“你若高兴的话，可以请35师全体官兵参加婚礼，这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她说她母亲希望他们成婚后能搬到北特拉华129号同她一起过。“现在就盼着你回家，别的都不必担心。”

他等得颇不耐烦。他希望伍迪（指伍德罗·威尔逊）停止在法国“寻欢作乐”赶快回国，这样美国士兵们也能步其后尘。拯救世界已超出他的关注范围。他对埃塞尔·诺兰说：“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才不屑理会（客气地说）俄国的政权是红色的或是根本没有政府，倘若某个国家的国王想屠戮他的臣民或他的首相，与我们毫不相关。”

3月，炮团移驻勒芒附近的古斯蒙，军官们再次下榻在豪华的舍奈城堡，它一度曾是闻名遐迩的运河建筑师费迪南德·德莱塞普斯的宅邸。哈里又得到一次飞往巴黎的机会，在城里他看见伍德罗·威尔逊的车子从身旁驶过，他还在和平街的一家商店里买了一枚结婚戒指。1919年4月9日，他和129野战炮兵团的52名军官及1274名士兵乘坐过去曾是德国的航轮“齐伯林”号驶往纽约。

返程航行是哈里伟大冒险的最后一章，这位归程途中的英雄几乎一路都晕船不止。一度他曾巴不得仍留在阿尔贡英勇地战死。然而他知道他能忍受一切痛苦，因为他们正在驶向美国。

第二部 政治家

五、锲而不舍

我一生历经几番挫折，但从未气馁认输。

——哈里·杜鲁门

1

哈里观察力敏锐的表姐埃塞尔·诺兰曾说过，哈里·杜鲁门骨子里是个19世纪的人。他降生时正值切斯特·A·阿瑟当政，而当时美国是否应继续建设一支防御性的海军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大战爆发时他33岁，几乎是已步入中年的成年人，一次世界大战则比任何历书都更加有效地结束了旧世纪和迎来了全新的历史。哈里的世界观、趣味及思维方式赖以形成的年代与1918年之后的时代迥然相异。时间后来证明，一次大战是一次划分历史的事件，而哈里·杜鲁门尽管生性乐观并崇尚进步，却与战后出现的多数事物格格不入。

他在旧时代中更感到应付裕如。他对电话和战争期间发明的夏令时从未发生过兴趣。他曾试着用过一段打字机，但半途而弃。他终生崇尚的作家一直是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安德鲁·杰克逊和罗伯特·E·李是终其一生的英雄。直到他遇到乔治·C·马歇尔，他才打消了“新时代”无法造就伟人的念头。

1913年纽约举办阿墨里艺术展，在公众中引起轰动，那是美国现代画的首届大型展览，其中包括马塞尔·迪尚创作的鼓噪一时的《走下楼梯的裸体》，但哈里却对画展嗤之以鼻，称其为“蹩脚艺术”。他所钟爱的是过去的大师。不言而喻，他欣赏的美国艺术是乔治·凯莱布·宾厄姆创作的密苏里船工和以政治活动为题村的作品，或是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笔下的西部风景，后者曾在堪萨斯城开过一座酒吧。

哈里·杜鲁门从未流露过他是否对爱因斯坦或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兴趣，战后时髦词如“利比多”或“本能冲动”之类从未在他言谈中出现过。其实，他对多数风靡一时的举止风范和道德习俗颇感绝望。他讨厌雪茄、杜松子酒和时尚食品。他对女人吸烟喝酒大不以为然，甚至不赞成男人当着女人的面喝酒。经过一番争论贝丝决定剪短发时，他只是勉强同意（“不管我的看法如何，我只是希望你高兴。”他对她说）。他不喜欢爵士时代之音，包括堪萨斯城风格的爵士乐。他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约翰·奥哈拉在小说中描绘的喧嚣浮华的20年代十分陌生。他从没学过跳舞、打高尔夫球和网球，也没参加过乡村俱乐部。他不打桥牌和麻将，唯一的消遣是玩扑克。“爵士乐时代的特点是对政治的冷漠。”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但哈里·杜鲁门在那个年代却发现政治是他的生活目标。

战争是历史的分水岭，亦是哈里生活的转折点。他后来写道：“我时常在想，倘若当时没有发生战争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最明显的是战争使他脱离了农场，除了回去看看外，他不再务农，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这一点上同他一样（1919年一首走红的歌中唱道：“他们已经见到了巴黎，你如何还能把他们拴在农场？”）。更重要的是，与他一年前奔赴巴黎时相比，他如今已判若两人。变化是惊人的，此时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自信。他发觉他具有指挥才能，而且对此道比以往做过的任何事情都热衷。他发现他很勇敢——

他不再是一见打架就跑的小孩——而且知晓如何将勇气感染给别人。

他重返家园时身后跟随着一批追随者，他所交的人数最多的一帮炮连“哥儿们”都把他作为老大哥看待。杰克逊县的子弟们安然无恙地衣锦还乡全是他这位上尉的功劳。在法国时，他在帐篷或掩体里点着昏暗的灯光给他属下的双亲们写回信，这种关心在美国远征军的军官中并不常见，因而在堪萨斯城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他从伍的生涯是一大成功；战争使他在各类人眼中变成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而最主要的是这其中也包括贝丝·华莱士，她刚一听说他要应征入伍就做出了嫁给他的决定。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和他们的婚礼竟发生在同一天，实在是奇妙的巧合。

由于战争的缘由，他还结识了埃迪·雅各布森和吉姆·彭德格斯特并与他们结为挚交。129野战炮兵部队凯旋的清晨哈里便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生活，而上述两位朋友连同贝丝一道，对其新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记得他归来的那天热闹极了。”埃塞尔·诺兰说，“我们都进了城，观看他们在大街上列队行进……然后我们前往会议大厅参加大型欢迎会。”

129团顶着上午的烈日从联邦火车站向市中心行进，他们像在巴黎阅兵时一样，全副武装，头戴“镀锡圆顶帽”。哈里和其他军官骑在马上。高楼和路灯柱上的旗帜绚丽多彩，格兰德大道两边挤得人山人海。11大街上立起了一座欢迎拱门。人们眼中噙着热泪欢呼着，把孩子高举过头观看队列。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在她丈夫身边，穿着高跟鞋从火车站一路跟到会议大厅。

3天之后的5月6日，在堪萨斯的芬斯顿军营，士兵们办理了最后退伍手续，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又25天，贝丝和哈里举行了结婚仪式。但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两桩大事。

5月8日，即哈里的生日和他到家后的第2天，他和贝丝之间发生了第一次显然也是最后一次激烈的争吵。缘由可能与婚礼安排有关，也可能是贝丝的母亲坚持让他们与她一起住的原因。无论如何，哈里在一生中对这一天给他造成的不愉快始终记忆犹新。30年后他在写给贝丝的一封信中称那次吵架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争吵。

婚礼前的一个月，他还和埃迪·雅各布森在堪萨斯城的商业区租下了一片店铺。虽然雅各布森在法国时服役于另一个炮兵连，却和哈里时常见面，而且也是乘“齐伯林”号返回美国的。他俩确信他们在多尼潘驻地的合作只是在商场上成就大事业的前奏曲，于是决定再度联手开个男士服饰用品商店。这一决定做得十分匆促，甚至包含冲动的成分，从哈里的角度讲，他似乎是想以此给贝丝和她母亲留下个能干的印象。

婚礼于1919年6月28日星期六下午4时在独立城北自由大街不大的三一圣公会教堂举行。当天的天气是密苏里典型的夏季气候。家人和朋友们把教堂挤得水泄不通，空气燥热得花都开始萎缩。

新娘穿一身质朴的白色乔其纱绉绸，头戴白色阔边花式帽，手擎一束玫瑰。女傧相是贝丝的表姊妹海伦·华莱士和路易斯·华莱士，她俩身穿玻璃纱，手中也拿着玫瑰。新郎穿一身灰色细方格三件套礼服，这套服装是赊购的，由男傧相泰德·马克斯专为这次婚礼制作，他回国后又重新操起男装裁缝的旧业。新郎还戴一副他在部队使用的夹鼻眼镜，他站在教堂门前的样子仿佛像刚从理发店里出来。

新娘由她身材高大、过早谢顶的弟弟弗兰克·华莱士牵着走至圣坛，仪

式由 J·P·普伦基特牧师主持。

婚礼酒会在盖茨宅邸的草坪上举行，出席的有华莱士夫人和她母亲盖茨夫人、弗兰克·华莱士先生和太太、乔治·华莱士先生和太太和年轻的弗雷德·华莱士；“城外客人”中据报纸记载包括 J·A·杜鲁门夫人、她女儿玛丽·简·杜鲁门小姐和 J·维维安·杜鲁门先生和太太。诺兰家的人自然都到场了，还有几个哈里过去的战友。一个没能出席的战友写信对他说：“但愿你在这场新的战争中能像在过去的战争中一样取胜。”

酒会上有混合甜饮料和冰淇淋。新郎新娘合影照了一些像，哈里看去一脸的严肃，贝丝的神态则略显茫然。不久，新娘新郎便乘坐由弗兰克·华莱士驾驶的车子开往堪萨斯城去赶火车，他们身后还跟着许多小车。

在车站站台等车时，泰德·马克斯对哈里的母亲说：“杜鲁门太太，你失去了哈里。”

“其实我没有失去他。”她答道。

几年后回过头追忆那天的情景时，玛丽·简谈到她和母亲在赶到教堂之前所做的事情。当时农场正收割麦子，玛丽·简为 12 名农场帮工做了顿午饭，“跟平常一样”，她说，有肉、土豆、鲜面包和自制大饼。

埃塞尔·诺兰仍记得哈里站在教堂里看着贝丝从通道走进来时脸上的表情。“从没见过哪个男人的脸上会释放出那样幸福的光彩。”

从哈里那天晚上去贝丝家还盛饼碟子之日算起，9 年已经过去。哈里已届 35 岁，贝丝 34 岁。

这对蜜月夫妻所去之地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和密歇根的休伦港。在芝加哥时他们住的是“黑石”饭店。在休伦港他们去休伦湖沙滩游玩，气候美丽怡人，如同他们在一起的心情一样。在冰冷湖边度过的日日夜夜如此甜美迷人，后来“休伦港”几个字在哈里心目中永远意味着最完美的幸福。

可惜良辰美景过于短暂。贝丝担心她母亲的健康——马奇·华莱士患有坐骨神经痛及其他或真实或想象的病症——决定提前返回独立城。按照她母亲的意愿，他们搬进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住进了顶层朝南的贝丝的房间。全家现在包括贝丝、哈里、马奇、正在上大学的马奇的宠儿弗雷德和住在底层前厅旁边房屋的盖茨夫人。在房后车道之外从前的花园里，面朝范霍恩大街分别为两个兄弟弗兰克和乔治及他们妻子盖了两间不大的平房。因此全家依旧住在一个“所谓的大院子里”，在马奇·华莱士老妈妈的眼皮子底下。后者是个干净利落、思想守旧的小老太，脸上总挂着一抹甜甜的笑意，如头发挽个髻，脖子上依旧围着老式的丝绒硬高领。邻居们都认为她大概是全城最正统完美的妇人而且“非常不好相处”。

贝丝认为这样的安排是权宜之计，等她母亲适应了她已结婚了这一事实后她和哈里就搬出去。哈里搬进去时所携物品中有他的衣服、一些书和一箱子在部队用的东西，这几乎就是他的全部所有了。

2

“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商店位于堪萨斯城西口大街 104 号，开在格伦农饭店的底层，斜对面便是米尔巴哈大饭店，故而地界很理想，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哈里管帐，埃迪负责进货。销售工作两人轮流干。

雅各布森个头不高，性情乐观认真，虽只有 28 岁，但由于戴副眼镜和日

渐稀疏的头发，看上似有 35 岁上下。他与哈里不同的地方是，此人在衣着零售生意方面有 12 年的经验。他是 6 个孩子之一，全名“埃德华”，但人人都称他“埃迪”，他父母是从立陶宛移居美国的贫困犹太人，起初定居在纽约东边的贫民窟，在那儿生下埃迪后又迁往堪萨斯城。埃迪 14 岁开始打工，在一家纺织品商店做存货管理员。埃迪也成亲在即——计划当年 12 月在堪萨斯城最古老的拜奈杰胡达新教教堂与布卢玛·罗森鲍姆举行婚礼——因而他与哈里一样十分渴望生意上的成功。

他俩打算把店儿办成“一流的”，专卖著名品牌。他们不准备卖西服和大衣，而清一色经营“男士服饰用品”——衬衫、袜子、须带、皮带、内裤和帽子。他俩用合资和从银行贷款的方式对店铺里外重新翻修了一番，并购置了价值 3.5 万美元的存货。

哈里投进了 1.5 万美元，主要是变卖格兰德维厄农庄的牲畜和机器所得。他希望农庄能像过去那样存在下去，并试图劝说玛丽·简继续经营，但她说如果他不回去管理她将放弃经营，再干两年就关门大吉。那年秋天，他们拍卖了马匹、猪、耕犁、播种机和几乎所有的东西，拍卖所得都转入了哈里的商店。考虑玛丽·简所做的贡献，这一做法不能算是公平，全家人为此而高兴的唯有哈里。土地将租赁给他人耕作。

商店 1919 年 11 月开张营业，朋友们及主顾都记得那是家“相当合乎规范”、装潢时髦的所在。

店名“杜鲁门和雅各布森”镶嵌在面街入口处的彩色贴砖上，左右是两只巨大的厚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条纹衬衣、15 至 20 顶帽子和用金属丝垂直悬起来的 100 来个可拆开的硬领。衬衫和领子的品牌“艾德”正规地写在橱窗上方店门的顶端。店内是长长的柜台，摆着衬衫、皮手套、皮带、内裤、袜子、衣领别针和袖口链扣，柜台后面是装满衬衫和可拆领盒子的搁板。可拆卸的领子是艾德产的“马纹”牌，犹如橱窗里展示的，“漂亮的大翻领”是其特色。但立即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几百条色彩款式各异的丝质领带，挂在从屋顶垂下来的金属丝上，在左边排满一墙。

店内光洁如洗，砖铺地板总是闪着光泽。柜台玻璃也熠熠生辉。天花板上悬着一个巨大的电风扇，店内还有一台崭新的现金收入记录机。离记录机不远的一个柜台上摆着一个 4 英尺高的银制纪念杯，它是 D 连的小伙子们赠给“哈里上尉”的礼物，亦是店里引以为荣的时常提起的话题。店内靠里帽架的上方是 5 面协约国的国旗，插成一束花的形状。

纪念杯和国旗所烘托起的氛围使小店犹如一家校园商店，只是这是所具有战争意义的校园而已。任何一个像哈里一样喜欢服装的人（哈里总希望自己的外表看上去“很帅”）肯定都很喜欢店内的格调。

但不难想象，哈里从一个连指挥官成为一个店老板，这其中的心理调整必然是痛苦的，依据他对贝丝透露的对未来的追求以及以胜利者的姿态行进在格兰德大街的感受，他肯定认为目前的局面是难以忍受的屈尊俯就。对中原因他似乎没有提供任何诠释，唯一的可能是他和贝丝像战前一样急需钱花，因而将合伙经商视为良机，同时哈里还可与他的“哥儿们”及城里的某些人保持接触，以便一旦他参政，这些人将对他予以支持。他后来对开店的解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时我想做什么。”

他和埃迪每天早上 8 点开门，晚 9 点打烊。时逢美国繁荣时期，繁华喧闹的 12 大街——即《12 大街格拉泰姆调》里唱到的 12 大街——熙来攘往。

来此开会的人从米尔巴哈饭店里进出不绝。街对面的迪克森饭店里还开了两家赌场，妓女在大街小巷里游荡。不分昼夜，商人、秘书、外省来的购物者及所有的人似乎都有花不完的钞票。“12大街如日中天，我们的战友和12大街的青年男女都是我们的主顾。”埃迪·雅各布森忆起那段时日面露欢愉之色，“最走俏的是男式丝质衬衫和内裤。衬衫我们卖16美元一件。我们店不赊帐，只收现金。”大宗买卖的衬衫是埃迪的长项。哈里索性管他们的店叫“衬衫店”，做买卖时他一般站在两个柜台之间，一个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另一只手扶着另一个柜台，皮鞋锃亮，领带笔挺，厚镜片上反射出天花板上的灯光。同商店一样，他亦是一身的光鲜利索。

正如所期待的，小铺成了他们战友之间相聚的场所，其中一些人把哈里当作生意和法律顾问，“甚至凡事都找他咨询。”埃迪说。埃迪·麦金回忆说：“白天我们常到那儿探一头——那儿成了碰头点。”有时晚上战友多得几乎抢占了真正顾客的地盘。“但我们去哈里似乎很高兴。”当过中尉的迈兹伯格说。甚至在街角处当警察的“平足”沃尔特·蒂斯利在多尼潘军营时也在D连做过中尉。

哈里尽量回报战友们对他的惠顾。他在泰德·马克斯的裁缝铺买服装，在弗兰克·斯皮纳的理发馆剪发。他常说这些人如同他的手足。贝丝不喜欢哈里剪的头发，但哈里解释说弗兰克·斯皮纳是他的弟兄之一，“你不能背弃人家”。

住在其他地方的人则写信祝哈里事事顺心。一位弟兄写道：“以你迷人的性格和诚实的道德准则，我看不出有何理由你的买卖不成功。”

另一位叫尤金·唐纳利的弟兄从遥远的得克萨斯油田写信说：“先生，别把我忘了。当你看见一个漂亮妞儿从米尔巴哈饭店出来时，千万要对自己说，幸好我没像老唐纳利似的和200多人窝在一个远离火车站7英里路的鬼地方。”在法国停战以后的一天，唐纳利和另外几个D连的人准备去巴黎度假，却发现囊空如洗，哈里知道后当即借给了他们一笔钱。“当时我们情愿为他做任何事。”多年后唐纳利在一次访谈中说，“我认识的人当中至今谁也没有改变这一想法。”

后来埃迪的妻子布卢玛说她丈夫从没像第一年在12大街的商店里那样干活玩命，她猜想哈里亦复如是。他俩之间没有文字协议，原因是没必要。“他们只是觉得关系特好可以相互信任，而一生中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年底，他们售出了7万美元的货，这意味着与他们的投资相比是笔极大的利润。

哈里·杜鲁门先生和夫人在芝加哥黑石饭店度完蜜月的第二年，共和党的政客们在同一家饭店经过密商选举出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沃伦·G·哈定作为总统候选人。这位仪表堂堂的哈定在1920年的竞选中提出了恢复“常态”的口号。他说美国人民已不再对英雄主义感兴趣。他与其竞选伙伴、前麻省州长卡尔文·柯立芝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考克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赢得了有史以来票数最多的多数席位。恢复常态似乎的确是国家当时之必需，从这个角度看，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在堪萨斯城不断地往架子上上货，招待顾客，似乎与时代潮流极为合拍。哈里参加了堪萨斯城俱乐部、三角俱乐部（一家与扶轮社类似的商人午餐团体）和堪萨斯城体育俱乐部。他以不懈的努力在体育俱乐部学会了游泳，他的泳姿奇特、不协调，是一种自创的侧式，头部露出水面，以便他的眼镜可以不沾水。他定期与泰德·马克斯或

彭德格斯特去位于第9大街的古老的萨沃伊饭店用午餐，里面的炙烤餐厅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还梦想着买辆新车，取代他那辆进出城开的、4缸二手货的“道奇”牌双人座敞篷车。

愈发使人担忧的事是农民们的境况每况愈下，其原因只要你赶到堪萨斯城谷物交换市场便一目了然，20年前约翰·杜鲁门就是在那儿一赔到底的。价格在猛跌，1920年秋季，小麦从1919年每蒲式耳最高记录的2.15美元降到每蒲式耳1.44美元。总体农作物价格下降了40%，农民的困境开始蔓延开来。中西部受到的影响最惨重。到1921年，象征着战后繁荣的“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商店中的丝绸衬衫开始滞销。年中，他们“红火的生意”大幅度滑坡。由于全国陷入严重萧条，哈里和雅各布森亦被卷入窘境。为了使他们的商品款式时新，他们只好借钱。

老朋友们依旧光顾，但绝少有人似从前那样买东西。个别人发现小店是个借上8块10块的方便场所，于是它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俱乐部或失业机构，而且由于哈里的慷慨，还俨然是个借款办公室。埃迪·雅各布森回忆说，倘有人进来找“哈里上尉”，他就知道是来讨钱的。倘说找“杜鲁门上尉”才是买东西的。

1921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D连的人在堪萨斯城埃尔克斯俱乐部聚会，不料在晚餐上“弟兄”们争吵起来，菜汤面包卷一痛泼洒乱抛，最后赔偿者依旧是哈里。尽管当时是禁酒期，晚上他们却没少喝威士忌，结果闹得出了格，只好把警察唤来。不料警察中的一员竟是从前D连的少尉乔治·布赖斯，于是弟兄们放肆地将他的左轮手抢夺下，又把他衣服庶几扒光，惹得其他警察大为开心。

随着萧条的恶化，合伙人渐渐无事可做，令哈里日益焦虑起来。“他常常出去吃午饭，和别人交往……由埃迪·雅各布森留在店里照顾生意。”泰德·马克斯说，他起初并不赞成哈里干零售买卖。此时他们除了哈里的困难外，什么都聊。“那阵子我们都度日如年……房租上涨，日子很不好过。”马克斯回忆说。

哈里和埃迪用吸墨水纸印成传单，在柜台向顾客发送：

A·格声姆·蔡斯尔博士说：

“人皱眉头时需要动用65块肌肉而笑时只需动用13块肌肉——为何还要超负荷工作呢？”

请以我们的新价格购买男式服饰用品。价格的下降能使你笑起来。销售提高了我们也能笑起来。这样一来我们谁也不会过分劳累了。

1921年秋天，政府计划在堪萨斯城建造一座庞大的战争纪念馆，还将在彼处举行美国军团代表大会，作为落成仪式的组成部分。哈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主动要求提供服务。作为装饰委员会主席，他组织募捐、定制旗帜并发起大规模宣传活动，让所有城内企业、贸易商行、俱乐部及各个家庭在这次他称之为全国最具爱国意义的集会中“张挂旗帜”，他还称这次大会肯定会使堪萨斯城成为“全世界最热门的话题”。他充满活力热情饱满，办事效率极高。11月1日这不同凡响的一天终于到来。法国派来了费迪南德·福煦；英国派来了海军元帅大卫·贝蒂伯爵；意大利派来了阿尔曼多·迪亚斯上将；比利时派来的是雅克上将男爵，后者魁梧高大，脸庞红润，留一撮骑

兵胡髭。令哈里颇感兴奋的是珀欣上将也进了城，莅临的还有埃迪·里肯巴克和柯立芝副总统。据说副总统举止腼腆谦恭，几次集会都险些被门卫拦在外面。参加游行的有 85 支乐队和 6 万美国军团老兵，包括被选中向协约国指挥官献国旗的哈里·杜鲁门上尉。福煦在观礼台上出现时使集会者大为振奋，他说他从未感受过这样一种情绪以及如此众多的人所表现出的耐心和“近乎神圣”的专注。共有 10 万人参加了集会。

然而后来的活动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调。哈里的朋友和战友哈里·沃恩回忆说：“后来我们几乎把巴尔的摩饭店闹了个底朝天。”某人把一头得克萨斯小公牛牵进了饭店大堂。在饭店门口的大街上还进行掷骰子赌博，致使交通堵塞。埃迪·麦金记得哈里没有参加那些“喧闹的嬉闹……但他可能从他男式服饰用品商店的门口看到了女睡衣从米尔巴哈饭店的窗子里被抛出来的情景。其目的是让它们挂在电车架空线上，阻止电车运行……”

哈里和埃迪·雅各布森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尊敬并未因他们经历的挫折而丝毫动摇，尽管从根本上说这仍是种商业伙伴的友谊。埃迪的妻子感到杜鲁门夫妇和雅各布森夫妇之间有种距离感，她以为这是哈里的姻亲反犹太人情绪使然。她说华莱士家被看成是贵族，因而杜鲁门夫妇不便请犹太人赴他们家做客。但实际上哈里把朋友带到北特拉华大街的情形绝无仅有。马奇·华莱士的隐私世界必须维护，绝不容与外界混淆。

杜一雅商店 1922 年倒闭。经过认真考虑，两个合伙人决定不宣告破产——这样便可还清一切债务——但是只能一点一点地尽最大努力把债务还清。商店大约透支了 3.5 万美元。埃迪继续做衬衫推销员，以期付清他那部分债款，但 3 年后终于支撑不住，宣告破产。后来两个朋友在城里见到并一起吃中饭，哈里注意到埃迪的衣服已经磨损，便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去买几件新衣服。商店关闭后的 15 年，哈里的债务依旧尚未还清，因为他在 20 年的时间里可谓捉襟见肘。但犹如乃父，他从未疏忽过外表的修饰。

商店生意惨败，但没人认为是哈里无能。他是客观环境的牺牲品，时代在跟他违迕。当过中尉的埃德加·辛德曾在独立城推销威利斯越野汽车，据他回忆：“哈里办的店儿相当不错，他只不过像我们一样，也是情势的牺牲品。那阵儿相当艰难，真的，度日如年！”小麦价格 1922 年 1 蒲式耳仅卖 88 美分。

与此观点相反的只有哈里过去在格兰德维厄的邻居和共济会分会弟兄盖伦·巴布科克，他记得哈里的失意不值得惊奇。他父亲也在哈里的店里投过资，他认为那只是“哈里又一次走背运的”例子而已。

哈里则把责任归咎于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客。他坚信他自己和他的命运都未与他作对，而是由于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紧缩金融政策。然而恐怕也可以这样说，当威尔逊总统于 1920 年突然削减政府开销和提高税收时，危机就已显露出端倪。

3

贝丝认为哈里军中的多数朋友都是大老粗，但一次哈里对她说吉米·彭德格斯特则“是个出色的弟兄，他是他爷爷的名字命名的，而他的聪明劲无愧他的名字”。

他爷爷叫詹姆斯·彭德格斯特，即赋有传奇色彩的市参议员吉姆。他是

彭家第一位在堪萨斯城参政的人，也是堪萨斯王朝的奠基人，而不同的人对此王朝则毁誉参半。他的奋斗史极具美国化。他父母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定居在密苏里河上游的圣约瑟夫，生了一窝孩子。吉姆于美国建国 100 年后的 1876 年来到堪萨斯城，这个小伙子当时既没金钱也没关系，急需找份差使。他先在西区洼地的一家屠宰场干了一阵儿，尔后转入一座铸铁厂。他做工的那片地方是欣欣向荣的工业区，位于密苏里河弯曲处和城市陡岸的泥泞低地。吉姆·彭德格斯特身材健壮，嗜爱交际，很快就以他开朗的性格结交了不少朋友。1881 年，他还用积攒下的积蓄和赌马赢得的钱买下一座旅馆和酒吧，因他赌赢的那匹马叫“巅峰”，为了纪念它，他的酒吧亦起名叫“巅峰”。几年下来他又买下了若干家酒吧，它们名声不错，利润丰厚，尤其吸引顾客的地方是酒吧后屋增添的赌厅。除此之外，吉姆·彭德格斯特还介入烈酒批发生意。

然而他真正喜好的是政治。他是民主党员，天生会讨选民的青睐。西区洼地的民众劳作辛勤、酗酒成风，人口亦稳步增长，不久，他便以这个第一选区为基地，建立起堪萨斯城第一个政治组织，并自封为老板，尽管他不喜欢用这个词儿。“我朋友众多，”他常愉快地说，“这便是当老板的全部意义所在——广交朋友。”1889 年，吉姆把 3 个弟弟迈克尔、约翰和汤姆斯从圣约瑟夫带到堪萨斯城帮他处理事物。3 年后的 1892 年，他从第一选区竞选市议员。“吉姆·彭德格斯特是堪萨斯城里最善良和最富同情心的人。”一位忠诚的民主党员在介绍这位候选人时说。这一名声绝非轻易就可获得。

凡是向吉姆·彭德格斯特寻求帮助的男女老少都不会空手而归（一位他同时代的人回忆说），这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因为他依旧对贫穷和不幸的人们给予施舍……过去的 20 年中，每逢冬天他都去西洼地游走一遭，探察穷人的需求，他走访后每家贮藏食品的柜子便都充盈起来。食品商、屠夫、面包师和煤炭商所接到的订货单应接不暇，但他们必须确保西洼地的穷人不吃苦，然后把帐单统统寄给吉姆·彭德格斯特。

他在市政委员会干了 8 年，年年获选。他是“大个儿吉姆”、“王中王”、彻头彻尾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并以此为荣。他外貌酷似当时名声大震的爱尔兰裔美国职业拳击手约翰·L·沙利文，但这对社会名流的身分丝毫没有影响。他是个美食家，因而体重达 200 磅多。他留一撮浓密黑色的车把儿胡髭，扎黑色蝴蝶结领结，胸部挂一条颇沉的金表链，不懈地为改善公共设施而努力——修建公园、大道、建筑物及一切可为老百姓提供工作的工程。他呼吁提高消防员的薪水，反对敌视天主教的美国保护协会。他与改革派抗争，不但不关闭酒吧，还在离市政厅一个街区的梅恩街又买下一家并将其作为他的总部。他颇有勇气和讨别人喜爱的幽默感。有人在位于杰斐逊城的州议会提出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任何拥有酒吧的人参加竞选政府职位，当记者就此事问及他的想法时，市参议员吉姆说这项法案大概是想提高酒吧老板们的知名度。

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他的影响伸入到爱尔兰人之外的其他选民——黑人、波兰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屠场工人及所有移民族裔，尤其是人数最多的意大利人，后者住在第一选区之外，聚集在拥挤而犯罪率高的北区。世纪初时他的势力达到巅峰，当时正值败落的杜鲁门家迁居堪萨斯城。当时

市长詹姆斯·A·里德是由他亲手选定的，市政厅其他重要职位亦是如此。有人指控他在第一选区的选票中作弊，然而继之而来的调查并未发现舞弊证据。吉姆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从不选票上耍花招，我的愿望不外乎给朋友们提供选举投票的机会。”

他 1911 年逝世后，在俯瞰西洼地高坡的马尔基广场上为他立起一尊 10 英尺高的铜像，铜像由公家赞助，市参议员吉姆被塑成威严的坐姿，上面镌刻着“献给这位性格粗犷成绩斐然者，其私生活和社会公职皆是真理和勇气的化身”。甚至集团政治主要对手、《堪萨斯城明星报》对他的作古亦表示悲哀。他说的话即是他的诺言，这家报纸说：“他所给予支持的个人或法案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

然而大个儿吉姆最了不得的遗产是彭德格斯特的“组织”，继承这一组织衣钵的是小他 16 岁、足可以做他儿子的汤姆弟弟。病魔缠身的吉姆在他位于梅恩街的酒吧里对一群主顾以安慰的口吻说：“汤姆兄弟将成为一名优秀的市参议员，他将像我一样，绝不会亏待弟兄们。”年轻的汤姆以做酒吧簿记员和小选区主管起家，完全靠自己学会了生意和政治，后来升至总管，在控制民众方面仅次于市长。吉姆隐退后，汤姆步其后尘被选进市政委员会。与吉姆不同的是，汤姆对做官兴趣不大，于是于 1915 年引退，尔后没再参加任何竞选。

汤姆的全名是托马斯·约瑟夫·彭德格斯特，是个绝对惹不起的人。他身高虽然只有 5 英尺 9，强壮得像头牛，他金发红脸，一颗庞大的头颅即使安在他粗壮的身躯上也显得硕大无朋。他的脖子仿佛是他宽厚肩膀的组成部分，几乎可以说没脖子，据说他只消一拳就能把对手击晕。尽管如此，他却有几分斯文和一种迷人的温和风度。人人都说他那双大而鼓凸的浅蓝色眼睛长得怪异，然而流露出的眼神却不让人惧怕，而是给人以温暖。按照曾在近处观察过他的、一位叫威廉·雷迪格的人的说法，正是他那双眼睛和虎背熊腰的身躯使他看上去既可怖又迷人。雷迪格是《明星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他称汤姆是堪萨斯城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而且使人过目不忘。

汤姆同他兄长一样是个厌恶酗酒的酒吧老板，对啤酒只是偶一为之。他每天早上都虔诚地做早弥撒。他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是他从没有一个晚上撇下老婆在别处过夜。此外汤姆聪颖过人，这正是大个儿吉姆一直赞赏的。

尽管彭德格斯特的生意从未缺少过资金，而人们常说金钱只有用于政治才最能体现其价值，管帐的汤姆却只将政治看成是做生意的机会，这一点与吉姆有所不同。汤姆又买下更多的酒吧并扩大了其批发烈酒的生意。另一位兄弟迈克·彭德格斯特被委任为杰克逊县的烈酒执照督察长，手中握有 600 多家酒吧的经营权，自然，他对哪家首肯或阻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酒吧老板是否愿意与彭家做生意。

汤姆还建立了最初几家之一的预拌混凝土公司，后来证明这一举措十分重要。公司在工厂里将混凝土制好，然后用卡车送往施工工地。吉姆因热衷于改造公共设施而被人们称作建设者——彭家所有的人都是建设者——但汤姆看到城市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便认为如果他的组织能承办的事就绝没有理由让别人获利。除预拌混凝土公司之外，他后来还创建了 W·A·罗斯建筑公司、中西部铺路公司、中西部普里克特公司、堪萨斯城水泥管道公司、中部都市轧碎机公司、一家烟草公司、一家石油公司和公共设施研磨公司。面对他利用政治势力控制合同和提供公家材料的指责，汤姆的

回答是：“是的，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难道我的产品不比别人的好么？”其实总体说来，他的产品往往比别的质量高。

多年后，几百个各行各业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众口称赞汤姆·彭德格斯特友善、慷慨和正派，更不必说他作为政治领导人的魅力了。一位忠诚他的组织的维修检查员说：“汤姆是个出色的领导者！他擅长分析问题。他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的，他关心的首先是大众……他心胸极为宽广，想象力丰富……他时时刻刻彬彬有礼，总是听你把话说完。”一位与汤姆的组织没有关系的年轻律师只与汤姆见过一次面，但那次接触足以使他确信“此人大概可以说服任何人为他干他想干的事”。

“他为穷人干了这么多事”是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几年中他为数千人谋到了工作。一位通过他在一家医院的洗衣房就职的妇女说：“噢，他是个大好人。我觉得他就像罗宾汉。”一位天主教牧师回忆说：“没有。我跟他在一起时从没有罪恶感。你在此人身上找不到罪恶感。”甚至后来把彭德格斯特投入监狱的法官事后也承认他要是认识汤姆，也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位朋友。

汤姆生性沉默寡言，据说不轻易流露内心的想法，这对他是一种“优势”。但在他一生中与他过往甚密如哈里·杜鲁门者却听他反复发表过下述言论：

业余政客搞不了政治，因为政治关注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多数人自己不思考，完全依赖于报纸”。“你不可能通过制定一条必须让某人成为好人的法律使某人变好，这是违背人性的”。诚如他兄长吉姆常说的，政治首要的目的是交友。“我们有种理论，如果我们帮过某人，他也会帮你一次。这是人的本性”。忘恩负义的人是极少数，那是莫大的罪恶。“凡事应顺其自然”。

他对记者们始终以礼相待，在他们面前他把自己仅仅描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并称他比城里任何人和任何一家报纸都更了解民众的心声。“知道这一点是我的职责。”

崇拜他的人还乐于指出，汤姆·彭德格斯特不是那种热衷炫耀权力的人。他从不在法院和市政厅招摇过市。他喜欢默默的办事作风，密切关注着他的组织所在的各个选区，那是他的生意一年365天赖以生存的地方。

“政治是门生意，是门一年到头的竞争生意。谁胜了谁就瓜分官职。我说得比较坦率，可能玩世不恭了点儿，但却是事实。地方和全国都是如此。得到官职的人并非出类拔萃之辈，他必须适合钻营政治。这和别的行当的情形大同小异。”

他的组织的形式是依照法律为举行选举目的而设立的。设有大选区领袖，每个小选区有选区主管，小选区内的每个方形街区亦设有负责人。每逢新移民迁入，首先看望他们的是小选区主管，他要确保新居里供应水电和煤气。无论是谁只要需要，组织就免费为其提供食品、衣物、冬天用煤及医疗保健，那些曾得到过这类帮助的人一往情深地记得，整个程序不需填表、从不拖延而且没有领取救济的耻辱感。汤姆常说：“只要有人需要帮助，我们从不问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们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培养人们对我们的好感。”

政治是人际的交流。冬日的暴风雪一旦袭击城市，各个彭德格斯特企业派出的卡车便载着大衣和其他衣物开到西部洼地，将它们分发给无家可归者、酗酒的乞丐及每个遭到风雪袭击的人。每年圣诞节汤姆都免费发送3000

份晚餐。1918 至 1919 年的病毒流感大肆蔓延期间，汤姆·彭德格斯特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走家串户，探查谁需要帮助，此事许多人终身都铭记在心。

所期待的回报是选举日那天在投票处表达出的谢意。对多数人来说这点谢意微不足道且理所当然。还有许多人甘愿做“重复投票者”，即在选举那天“早投和多投票”。以那位在医院洗衣房做工的女子为例，她离法定选举年龄还差 3 年的 18 岁就开始重复投票，而且投得特开心。她和另外几个人每次投票前都换一身衣裳，坐在一辆漂亮的大轿车里在投票处之间往来穿梭。多年后她回忆说那就像演戏。一天结束之前她往往要投票四五次。“哦，我知道这不合法，但我绝没想到那有什么错。”

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势力炙手可热，继之成为堪萨斯城集团政治的霸主，但他并非绝无对手。直至 20 年代，他的权力依旧受到钳制。与他抗争的是民主党的一支派别，为首者也是一位绝顶机敏深孚众望的爱尔兰天主教政客，名叫约瑟夫·B·香农。按杰克逊县的说法，彭德格斯特的民主党人是“羊派”，香农的人叫“兔派”，两派都为各自的别名而骄傲。二者名字的来源据说是因为与市参议员吉姆结为同盟的穷苦人家在西洼地之上的坡地上养有山羊；而香农的人所居地界兔满为患。另一个说法是，某次在参加一次政治会议的途中，市参议员吉姆大声嚷道：“我们像山羊似的翻山越岭，而他们跑起来却像兔子。”但无论如何，香农的秉性与兔子则无丝毫关联。他举止文雅，穿着入时，长得几乎同沃伦·G·哈定一样漂亮。他还同彭家的人一样无所畏惧，具有鼓舞追随者的勇气和个性。共和党由于支持者不多，很少能在全县范围内举行大选，因而你死我活的竞争就总是在初选时在民主党内旗帜分明地展开。每个民主党员，无论其住在城内或乡下，都把自己划分为山羊派或兔派。约翰·杜鲁门生时是山羊派，他做修路监工的差使就是他在独立城县政府就职的羊派朋友替他谋得的。从此意义上讲，约翰·杜鲁门是彭德格斯特的人，而哈里在接替其父当监工的短暂期间亦是如此。

两个派别的区别主要反映在风格上。羊派喜欢以实力取胜，选举日往往发动大量选民。兔派则以智谋著称。然而两者也都会借用金钱和酒吧暴徒采取强硬手段。它们为了在一党之内争个雌雄，不惜运用所有令人作呕的手段，如在投票处施展高压策略、投假选票、盗窃投票箱、用威士忌和金钱拉拢选票及血腥的械斗等。这些手法自纽约头子特威德采用过以后使得大城市的集团政治臭名昭著。“窃取选举已变成一门高超的艺术，”一个人写道，“不断的党派之争已使其日趋完善……”从赌注中能赢得的永远是权力——就业机会、势力、金钱及像汤姆·彭德格斯特常说的“生意”。这是一场“弟兄们”以饱满的热情玩弄的“游戏”，从来不触及共和党或无派别公民偶尔提出的改革中的问题。无论是民主党兔派或羊派，都把共和党绝少取胜的原因归咎于共和党老板们的智商远远低于约瑟夫·香农或汤姆·彭德格斯特。

市参议员吉姆在世时，与兔派达成了一项意义重大的交易，主要是因为吉姆最终意识到兔派已与羊派形成抗衡的局面。他和香农之间的交易被称作平分协议，即选举后无论哪方获胜，官职一律平均分配，以此保证没有输家。但追随羊、兔两派的势力并未衰减，两者之间的磨擦依旧继续着。套用兔派一位大选区老板卡两米尔·韦尔奇的话说，政治说到底是“斗士之间的游戏”。

在每一个羊派的心目中，汤姆·彭德格斯特是大老板，他弟弟迈克则是拉拢追随者的人。迈克性格坚强好胜，心境好时很具魅力，至少比汤姆好说话。作为“充满血腥味的第 10 大选区”的老板，他常深入到民众中间，这与

汤姆形成对照，因为后者更愿意躲在彭家拥有的、名声不太好的杰斐逊饭店大堂旁的舒适办公室里，深居简出。他俩外表亦大相径庭。迈克身高6英尺，宽肩窄体，胯部瘦得只能既用皮带又使吊带才能让裤子不下滑。他神态坚定，轮廓清晰，下颌强健，眼睛比汤姆的还要蓝。他称得上是个美男子，而其众所周知的最大缺陷就是脾气暴躁。他是“老式的争强好胜型”，性情鲁莽，厌恶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和低头妥协，正因为此，市参议员吉姆才舍弃了他而将组织的头把交椅传给了汤姆。迈克从不举行中庸之道，他憎恶所有兔派的人，声称消灭兔派是他最大的抱负之一。某个礼拜六他只身一人来到一家兔派人作为据点的酒吧。他请了五六个人陪他一起喝酒，他为平分协议精神祝酒后，突然将杯中酒朝众人脸上泼去，结果挨了顿臭揍。但他后来说他那样做值得。

由于他与汤姆的亲近关系（后者称他“迈克尔”），人们认为他的观点就是汤姆的观点，这使他的地位仅次于汤姆。此外因为迈克是第10大选区的老板，他亦负责乡村选举，后者囊括了县东的全部地盘，如格兰德维厄镇、萨米特镇及独立城（据哈里·杜鲁门的回忆，不知什么原因，汤姆·彭德格斯特对乡村选举不感兴趣）。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彭家的确定继承人出自迈克的膝下。汤姆有3个孩子，但2个是女孩儿，唯一的儿子在20年代初尚未及弱冠之年。而迈克则有1女6子，最大的儿子已在接受继承组织的训练。此人就是哈里的朋友吉姆·彭德格斯特，也正是这位彬彬有礼、仪表堂堂的后生某一天将其父亲带到了位于12大街的男子服饰用品店去找哈里·杜鲁门。

他们见面的时间大约在1921年深秋或初冬，在杜一雅商店破产之前的几个月，但哈里当时知道他们的生意已奄奄一息。

迈克父子想知道哈里愿不愿意竞选杰克逊县的东部法官。这是一个在独立城政府的职位。按照密苏里的体制，法官是行政而非司法职务，相当于县专员，是个政治上的肥缺，这一点哈里早已明白。法院有3名法官——东部法官（负责边沿县）、西部法官（负责堪萨斯城）和首席法官——只要获得3人中的一票就能起很大的作用，哪怕仅仅出于交换的目的。县城的财务由法官们控制，他们雇用和领导修路监工、筑路队、县府职员及其他雇员，总人数在几百上下。他们还能决定与何人签署县合同，就当时县里的公路情形来看，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保养和维修的活计。

按照彭德格斯特家的传统，让哈里参加竞选完全是吉姆一人的主意，有意思的是，他父亲甚至在见到哈里之前就首肯了此建议，原因之一是他了解约翰·杜鲁门。倘若杜鲁门上尉与吉姆描述的完全吻合，他又是约翰·杜鲁门的公子，那么只要他与三K党或任何反天主教派系没有联系，杜鲁门上尉在迈克看来就是合适的入选。

哈里当时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他们想让我参加独立城东部法官的竞选，我想已经将此事敲定了。”此信的落款是1922年2月4日，暗示说没有指名的“他们”早将此事安排成定局，不可更改了。在迈克管辖的第10选区民主党俱乐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哈里静静地坐着，讨厌发表讲话的迈克起身说：“现在我来告诉诸位竞选县法官的入选。他是哈里·杜鲁门。他在战争中战绩辉煌，家庭背景不错，将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

倘若迈克愿意，他还可强调说哈里·杜鲁门是施洗礼者和共济会会员，

他能和农民谈耕作，这是大城市的爱尔兰裔政客所无法企及的；哈里身上有老拓荒者的血统，他是一位诚实的农民和修路工头之子；哈里于县城政治是个新手，但据他所知是个诚实正派的人——这些是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的品质，而恰恰又是组织为赢得乡村竞选所寻求的理想品质。彭德格斯特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认为哈里·杜鲁门实在是最佳人选，梦想中的候选人，为此，当时和后来都有一些人以为，杜鲁门带给彭家的实惠远远大于后者对他的恩赐。

“老汤姆·彭德格斯特想粉饰门面，”哈里的好友哈里·沃恩后来解释说，“而杜鲁门正可以用来为他充当这一角色，因为他可以说：‘这是我弟兄杜鲁门。杜鲁门无可指责，人人都认为他不错。’”

哈里则认为当时找到他在时间上是再理想不过了。他亟需有人拉他一把。有人认为他参政是出于买卖失意的绝望，这对他后来的崇拜者和研究他生涯的学生来说是个不容接受的说法，是尽可能贬低他的捏造。必须强调的是他对政治的兴趣是由来已久的，参政是彭家的人找的他，而不是他上门求人；此外当时彭家的势力并非至高无上，足以达到统治一个政治王朝的地步。这些才是真正的事实。自然哈里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了如指掌，而且他也清楚应该对谁感恩致谢。

“踌躇满志地做起了买卖，结果连本带借款都赔光了，”哈里在记事本上写道，“迈克·彭德格斯特选中了我，提携我参政，因而我很走运。”迈克不啻于他的“政治老师”，哈里还写道，“我就像喜欢自己的父亲一样喜欢他。”

他记得迈克和吉姆走进他商店的那天他正“郁郁不乐”地站在柜台后面。哈里特别想要澄清的一点是，彭家并非在此事中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并非他们对他们不存感激之恩，而是使他生涯发生巨变的是对他感兴趣的迈克，不是大老板汤姆。自那以后很长时间，哈里才见到汤姆·彭德格斯特。

东部法官的年薪是 3465 美元。倘能当选，哈里的任期将是两年。

他军界的朋友对他的想法一致赞同。只有个别人想劝他作罢。在他手下当过中士的埃迪·麦金说他疯了。当哈里坐在埃德加·欣德在独立城开的威利斯越野汽车修理库里，向欣德解释他要做的事时——欣德记得他咧嘴笑着——欣德对他说他不是搞政治的料儿。哈里则答道：“我总得混口饭吃。”

为了探查在独立城说话有影响的老一辈人的看法，哈里拜访了《考察家》的编辑威廉·萨瑟恩上校。萨瑟恩获得的是荣誉上校军衔，他是贝丝弟弟乔治的妻子梅·萨瑟恩·华莱士之父，故而多少与贝丝家沾亲，所以他的支持和友好态度对哈里至关重要。上校五短身材，红润润的脸，留撮山羊胡子，嘴里总咀嚼着雪茄，坐在办公桌旁还习惯戴着帽子。他耐心听完哈里的陈述后，对后者说他要是把自己的生活与政治“掺和”在一起简直就是个大傻瓜。上校后来说：“我对他讲了没完没了的竞选活动所产生的副作用对一个人的影响，我还告诉他搞政治的回报得不偿失……总得想方设法获取民众的支持将损坏一个人的性格。”哈里微笑着只是摇摇头，说他主意已定。

贝丝的看法如何，她母亲私下里说了些什么，杜鲁门妈妈是如何想的，均没有记载。毋庸置疑的是埃塞尔·诺兰对哈里非常支持，她后来曾简练地道及哈里希望与彭德格斯特家联手的愿望：“他们一直喜欢挑选胜利者，他们看中了哈里。的确，若不是他们的集团支持他，哈里就不会去竞选。他十分感谢他们……”

候选人杜鲁门于1922年3月8日在里萨米特的一座礼堂里拉开了竞选序幕，当时距他38岁生日还差2个月，到场的人是一群老兵，致使集会振奋人心，群情激昂。出席演讲的有300人，他们可以免费享受雪茄，听音乐并聆听名义上作为美国军团候选人的哈里·杜鲁门提出一个被誉为新颖和具有进步意义的想法（《里萨米特日报》载文说：“如果他们（老兵）想涉足政治，这是他们的权力。而当他们参与其中时，他们将像解决法国皇帝的问题那样处理国事。”）。D连的爱尔兰裔弟兄基本都到了场，还有“少量”彭德格斯特的人。参加过阿尔贡战役的前上校E·M·斯特顿介绍过哈里后，哈里只说了句他愿意竞选就说不下去了，初次上台的怯场使他“慌乱得不知所措”。多年后他回忆说：“那个第一次大会对我来说是场惨败。我害怕极了，比1918年第一次参加战斗时还害怕。”但观众所期望他的就是讲几句而已。当在法国做过红十字会的艺人、来自堪萨斯城的埃塞尔·李·巴克斯顿唱起“爱尔兰人的眼睛在微笑”时，集会被推到高潮，最后以一曲“亲爱的妈妈”结束。

哈里的第2次演讲是在晚上，地点是格兰德维厄；第3次是站在希克曼磨坊教堂前的一个粗糙的木制讲坛上，后两次他都说得不多，只是说他已参加竞选，希望朋友们的支持。他第3次出场的介绍人是他的老邻居O·V·斯劳特。战争期间斯劳特曾领导过杰克逊县的红十字会，后出任格兰德维厄银行总裁，他是那种与参议员和州长们说得上话的人，但“骨子里”仍保留着农民的本色。他胡须已灰白，俨然一位古代族长的模样。尽管在公共场合他极少讲话，但一旦开口便具有说服力。他那次讲话只有一句，令人记忆犹新：“哈里·杜鲁门还未生前我就认识他了。”他说。对那些认识约翰和马蒂·杜鲁门或同斯劳特一样仍记得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的人们来说，仅此一句便胜过更华丽的溢美之辞。据说在那一选区只有3票反对哈里。

参加竞选的共有4名民主党人——一位叫汤姆斯·帕伦特的农民和筑路监工；一位独立城商人詹姆斯·V·康普顿；第3位是个公路承包商，叫乔治·W·肖，也来自独立城；最后一位名叫埃米特·蒙哥马利，是蓝泉地区的一个银行家。此4人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帕伦特的后台是曾做过法官的一位华而不实的政客，叫迈尔斯·巴尔杰，他既作兔派亦不是羊派，而是个专擅拆台的人。康普顿曾在法院做过，可以炫耀其经历。肖是个众所周知的老实人，哈里说这在承包商里并不多见。最大的劲敌则是兔派候选人埃米特·蒙哥马利。

哈里·杜鲁门鼓吹修筑更好的公路并使县企业的管理恢复到一流水平。他初期演讲的唯一特点就是简短。苏格湾是一座炼油镇，坐落在独立城北边的河边洼地，埃德加·欣德记得一天晚上哈里在那里举行的竞选“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差劲的演说，我部为他难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夏季之前人们愈发想看到一场“够刺激的竞选”的需求，哈里的演讲有所改善。“如果你想涉足政治，”哈里后来若有所思地说，“你就必须学会向人们阐述你的纲领。学会站在一大群人面前演讲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所以我只好为之。”

埃德加·欣德、埃迪·麦金、汤姆·墨菲和泰德·马克斯始终不停地为哈里捧场，他们挨家挨户地散发传单，只要需要，随时随地都会抛头露面。据在D连当过中士的汤姆·墨菲回忆：“我们尽可能地帮助哈里。”在竞选

过程中，墨菲、麦金及其他人散发出一份传单，声称哈里·杜鲁门是“在法国和其他各地最受喜欢和爱戴的上尉军官”。

弗兰克和乔治·华莱士也为他出力。哈里过去的拉丁文老师阿德利亚·哈丁·帕尔默在独立城组织了一次走家串户的游说，以求获取妇女的选票，这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尚属首创。

哈里的演讲地点遍及白橡树，雷城、隆杰克、英格伍德和蓝泉。他自己驾驶着那辆老掉牙的4缸道奇牌汽车跑遍了所有乡镇和选区，道路常常坑洼不平，为了不让头磕在挡风玻璃上，他不得不把几袋水泥放在车尾行李箱里充作镇重物。

那年7月在橡树丛举办野餐会，共有4000人到场，是预想人数的两倍，野餐会也是那年夏天主要的一次政治活动。每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将到场发表演说。为了让哈里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埃迪·麦金安排他坐飞机到场。哈里和飞行员克劳伦斯·英格兰（此人也是一次大战老兵）驾驶着飞机在人群上空飞翔，那是一架在法国使用过的双人座飞机，驾驶舱上没有顶盖。他们在空中绕了几圈，洒下一些传单，然后朝野餐场地旁边的草原降落，费了很大的劲才没撞到一道带刺的铁丝网上。当人群冲向前时，候选人从机舱里爬出来，伏在了铁丝网上，面色惨白。显然，这是哈里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过了一会儿他便朝演讲台走去。

这是他面对的人数最多的人群，因而晓得是一次难逢的机会。他的演讲被排在最后。“现在我告诉大家我的纲领及为什么你们应该投我的票，”他语调快捷低沉地说，“现在已经到了就我们的公路和财政问题制定出确切的政策的时候了。它们与税务问题息息相关，倘若处理得当，税收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对竞选初期哈里的表现记忆犹新的埃迪·麦金觉得哈里已经磨练了出来，开始创立自己的风格。阐明了问题后，哈里继而以深入浅出的哲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打算让深谙公路及想要工作的人当筑路监工。这些人为挣一天的钱而做一天工，既为全县也为他们自己干活。我宁肯找40位乐意干活的筑路工人做工头，也不愿找60位对工作漠不关心的政客。我认为诚心诚意为全县服务就是最好的政治。”

让全县负债是最失败的生意和最差的策略，他说。他要停止这种做法。

到目前为止，哈里在竞选中只受到一项指责——在1920年的选举中，他为一个共和党人投了一票，这位共和党人是在阿尔贡战役中曾做过他上司的约翰·迈尔斯少校。这是反对他的人所能抓到的他最严重的把柄，考虑当时杰克逊县的政治气氛，这一指责非同小可。此刻他利用此次机会为自己辩白：

“你们已听说了我曾投票选举约翰·迈尔斯出任县警察局长。我代表另外5000名退伍军人承认这一事实……我与约翰·迈尔斯情同手足。我曾亲眼目睹他如何将危境化险为夷。”他的声音不再平静。

我曾目睹当法军后退时他依旧坚守阵地。我曾看见约翰·迈尔斯只身一人只率领着3门火炮固守美军阵地抵御着德军，直到反攻胜利为止。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他自己或国家的信念，他就不会为他的朋友投票。反对我的人搜遍了我的档案，只找到了这一条罪状，如今你们可以依据事实评判我的做法。我知道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了解我的心情，我绝不我的所为而道歉。约翰·迈

尔斯和我的战友们与我的感情胜过兄弟。这种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我的朋友约翰是唯一一位我为之投过票的共和党人，我并不认为这有何过错。

在那一时刻，对于多数听他演讲的人说来，选举东部法官的初选已经结束，胜者是哈里·杜鲁门。

县选举多年来从未激起过如此强烈的兴致，有些人将此归因于破天荒的妇女投票。然而哈里却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三 K 党的影响上，后者的势力当时正日益膨胀。十字架在里萨米特附近被焚毁，三 K 党在独立城的党员人数直线上升，哈里的两位竞争对手帕伦特和肖背后均有三 K 党的支持。埃德加·欣德敦促哈里与三 K 党联手，立即加入该组织，坚信这是“最佳策略”。欣德本人已加盟该党并在后来解释说“是为了摸摸情况”。三 K 党内一位叫“琼斯”的组织者告诉欣德随时可让哈里搭帮入党，说只要哈里这样做就能获得三 K 党的撑腰。

哈里起初没答应，后来给了欣德 10 美元的入党费。“琼斯”坚持要在巴尔的摩饭店与哈里私下会面，哈里欣然同意。晤面时，“琼斯”对他说他只有答应被选后不雇用天主教徒才能得到三 K 党的支持，哈里听罢即刻中断了谈判。他说他在法国指挥的炮连中绝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工作应分给他认为合适的人去做。毋庸置疑，他的 10 美元被退给了他。

哈里在表明他有意参加三 K 党时就已犯下了令人痛心的错误。这一行为若不是天大的幼稚，就是显露出他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即在压力下为达到其抱负而宁肯拿原则做交易。不管从哪方面讲，整个事件既卑鄙又与其性格不符，更无从谈起最佳策略。他若加盟三 K 党必然对彭德格斯特家族造成毁灭性打击，更不必说他那帮可爱的“爱尔兰裔弟兄们”了，而他认为三 K 党给予他的支持将如何补救上述后果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在他后来的辩解中，他说三 K 党在 1922 年时尚还是个无伤大雅的组织，一个虔诚的爱国分子自然会被其吸引。此外该组织还为那些在席卷全国的变革大潮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发表他们见解的机会。然而就在一年前，哈里还对共济会镇压在圣路易斯的三 K 党表示支持。对三 K 党的性质他应有所了解。《明星报》的威廉·雷迪格尼得当时杰克逊县的三 K 党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不仅憎恨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雷迪格写道，“他们什么人都恨。”

彼时三 K 党传播出一则谣言，称哈里的外祖父所罗门·扬是犹太人。8 月 1 日初选前在独立城举行的一次三 K 党会议上，一位从亚特兰大来的客座发言人称哈里·杜鲁门不是百分之百的美国种——即他不可能彻底反对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欣德起身表示反对，于是有人叫嚷着要把他扔出去。哈里在格兰德维厄的一个朋友托刊弗起身说他们也可以把他扔出去，欣德记得他的话起到了“冷却效应”。但三 K 党从前对杜鲁门参加竞选的冷漠态度终结了。哈里后来说使他竞选成功的是士兵的选票加上“几乎各个选区的亲属们的支持”。他常说他被选上纯属“偶然”，而且男子服饰用品店的垮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多数人都破了产，因而一个承认自己生意上失意的人参政能博得他们的同情。”还有一些曾密切关注竞选的人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哈里·杜鲁门本人。人们喜爱他——主要是因为他也很喜爱大众并乐于深入到他们之中。私下里，哈里对彭德格斯特手下人为他所做的努力深感失望，他本指望他们会更卖力一些。某个星期六晚上在县政府举行大型集会，标志着

竞选活动结束。选举日那天，载着人们开往投票处的车子在城镇里川流不息，车上贴满了标语牌。萨瑟恩上校是个绝对戒酒者，他写道：“不少男人的嘴里喷吐着老酒、走私劣质酒和上乘威士忌酒的味道。”渐渐地，投票处开始发生冲突事件。在堪萨斯城铁路线附近的费尔蒙联轨点投票处，一群持枪的香农的心腹企图抢在彭德格斯特的人之前把投票箱掠走，结果被两名警察局副局长截住，后者是奉哈里的共和党朋友、警察局氏约翰·迈尔斯之命赶到现场的。正当双方剑拔弩张之际，香农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了，副局长约翰·W·吉布森立即用一支0.45口径的自动步枪顶住了他的大肚子，香农见状便说双方最好都平静下来各回各家。倘若香农的人得逞，哈里很可能将竞选失败。选举的总票数是（参加竞选的4个人都包括在内）1.11万张，结果哈里以超出279票勉强击败兔派候选人埃米特·蒙哥马利。完全是“混蛋的共和党人”作的祟，约瑟夫·香农咬牙切齿地说，如果共和党人不插手，哈里·杜鲁门根本没有赢的希望。也许事实的确如此。手持0.45口径自动步枪的警察局副局长吉布森同约翰·迈尔斯一样，也是129野战炮兵团的老兵。

5

秋季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获胜的都是民主党人，1923年元旦，新当选的县法官在县政府举行的仪式上就职。另外两名法官是伊莱休·海斯和亨利·麦克尔罗伊。海斯是首席法官，虽属兔派，在哈里眼中却是个“好心的老先生”。新上任的西部法官麦克尔罗伊则是个彻头彻尾的羊派并与汤姆·彭德格斯特关系甚密。此人精瘦，长一口龅牙，是个雄心勃勃的商人，其效率受到人们的众口称誉。房间里摆着的巨大红玫瑰花篮是麦克尔罗伊在“小意大利”区的崇拜者送给他的礼物。哈里被称作“法官”，心里喜不自禁。这份工作的声誉以及他踌躇满志地出入于政府大楼时人们向他致意的方式令他心满意足。他再度有了头衔。作为首席法官，伊莱休·海斯应该是政府里的主宰人物和领袖，而且按照平分协议，他的兔派朋友们期待着能在他控制下的政府中平分县内的职位及其他形式的赏赐。然而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从一开始实权就落在了亨利·麦克尔罗伊的手里，而他根本无意对兔派施舍任何好处。由于有杜鲁门法官投他一票，麦克尔罗伊独断独行便易如反掌（“他靠我的一票管理政府。”哈里后来说）。筑路监工的名单清一色都成了羊派的人。县府的职位无论大小均被羊派包干。裁员时，一直领取薪水的兔派们总是首当其冲。安德鲁·杰克逊的古老格言，即赃物属于胜者，再次变成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行动准则。一切决定均是彭德格斯特家族的旨意，平分协议寿终正寝。哈里后来回顾时认为那种做法凶多吉少，但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他充满务实精神，精力全部集中在削减经费、改善服务设施上，力求按许下的诺言办事。

他还知道兔派的惨境将给他的老师迈克·彭德格斯特带来莫大的愉快。

哈里后来声称：“我们兢兢业业地以经济为基础治理着县城。”事实上，与背离教派的前任迈尔斯·巴尔杰统辖下的情形相比，新届政府的确大有起色。在麦克尔罗伊和杜鲁门的领导下，全县100万元的债务还清了一半。县的信誉亦提高了。县里的服务尤其是公路的质量大为改观。哈里·杜鲁门后来炫耀说，他“对每一条道路和每一座桥梁都了如指掌……走访每一座住有本县病人的州立医院”。经年的管理失误和不正当的合约使修筑的道路质量

低劣，像馅饼皮似的凹陷不平。桥梁不符规格或年久失修，因而所做出的改善是不容忽视的。连《堪萨斯城明星报》都对富有生气的高效率的县政府所取得的业绩大加赞誉。在政治上哈里按麦克尔罗伊的指点行事，在务实上麦克尔罗伊则完全依赖哈里。“当一项筑路工程或造桥申请呈递到县政府时，通常的程序是这样，”一位共和党人写道，“麦克尔罗伊法官询问杜鲁门法官的意见，10次有9次杜鲁门法官已经去过现场、对申请已心中有数。他就项目向政府做出说明，然后麦克尔罗伊便说：‘好吧，如果你同意，我附议此项工程上马。’这就算敲定了。”

在米尔巴哈饭店三角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上，海斯、麦克尔罗伊和杜鲁门法官受到人们长时间鼓掌欢迎，这似乎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降临。

但哈里发现，他的工作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他惊奇地感到常因找不到更多的事可做而烦躁不安，他想寻求其他能使他出名的途径，想在“县政府之前的人群”之外继续发展关系。他在共济会和陆军预备役的活动中变得愈发活跃，晋升为杰克逊县第59共济会区的副长老。1923年夏天，他首次在婚后与贝丝长时间分离，赴堪萨斯的利纹沃思要塞服了两周的现役。9月，他在堪萨斯城法律学院的夜校注册，开始刻苦学习（布莱克斯通的教科书、合约和刑法），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只有精力异常充沛的人才能保持他那样的生活节奏。

与此同时，北特拉华大街129号——哈里总是称它为盖茨屋——的生活平静而与世隔绝。贝丝没有参与哈里的政治竞选活动，因为她经受了第2次流产，而这只有他们家人知道。第一次流产是在1920年春季，当时商店尚还景气，流产的消息亦没向外人透露。当着朋友的面，哈里明确表示他和贝丝都想要孩子，并暗示若有问题肯定是他的原因。当一位堂兄弟拉尔夫·杜鲁门从斯普林菲尔德写信来说他刚得到一个孩子时，哈里回信说：“但愿你能把你过去的一条马裤寄给我，我把它挂在床头，说不定能给我带来好运。”

他对贝丝的爱心始终如初，由于他1923年夏天赴利纹沃思要塞致使两人分离而不得不再度鸿雁往来，我们了解到贝丝对她“从前的心上人”同样是爱如既往。

“现在是10点20，我已经上了床。我拉下被子时看到床上有一只黑虫子，只好自己动手把它打死——但这只虫子并不是让我第一次想到你。”贝丝写道，“一遍遍地吻你，祝你晚安。”

她时常几个小时地站在前窗前等待邮递员的到来。第二周快要结束的夜晚是“最难熬的一夜”。

“你做个好女孩，我也做个乖男孩。”哈里写道。一周后他在信中说他真希望没有离家这么久。他告诉她他感觉“棒极了”，准备回家“击败所有兔派的人”。

当时他俩知道，贝丝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婴儿在1924年2月17日一个暴风雪的星期天降临。除了哈里的婚礼外，这是他生活中当时为止最大的一件事，是那个对他不景气的一年中一个光辉明亮的光点。

他曾力劝贝丝去医院，但贝丝和她母亲都坚持在家里生。出于事前大惊小怪可能会再次导致失望的迷信心理，连一个婴儿床或摇篮都未置备，结果婴儿问世后的头几天是在衣柜的抽屉里垫着枕头度过的。

中午时分，家人告诉哈里给医生打电话。查尔斯·E·克里明格医生人高

马大，脸庞红润，长着一双大手——“两手的尺寸胜似煎锅”——他身上蒙着雪走进来，直接朝楼上奔去。一位叫埃德娜·金纳曼的未经正式训练的护士不久也赶到了，她记得华莱士夫人和哈里整个一下午都耐心地在楼上大厅中等待着，正统的华莱士夫人坐在一只杉木柜子上，哈里则坐在一把椅子上，表情异常镇静。

据金纳曼护士说，贝丝“生得很顺利”。顺产的婴儿是个女孩儿，重7磅半。“（孩子生下后）我们都不必宣告她的问世……因为他们听见了她的啼哭声，接着姥姥和爸爸就冲进了屋。”是时是5点钟，哈里给他妈妈和妹妹挂了电话，告诉她们孩子的名字叫玛丽·玛格丽特，是按玛丽·简和华莱士夫人的名字而起的。哈里一位朋友的妻子不久后就见到了他，说哈里“满面生辉”。

自从马奇·华莱士在那幢老房子里度过童年后，那里就再没有过婴儿。但从此刻开始直至那年春天盖茨夫人逝世为止，宅子里共是4世同堂。小玛格丽特——人人都这样叫她——不仅仅是贝丝和哈里的新生儿，还成了太姥姥、姥姥、住在后院仍没有孩子的4位华莱士舅舅舅妈、仍住在家里的弗雷德舅舅以及街对面的两位诺兰表姊妹的宠物和关注焦点。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家庭的气氛。对于已近不惑之年的哈里来说，生活增添了新的意义。金纳曼记得他对孩子的那份喜爱可谓舐犊情深。

当时全国各地的形势对民主党极为不利。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破天荒地以103票选中了一位名不见经传、希望不大的华尔街律师作为总统候选人，此人名叫约翰·W·戴维斯，仿佛是个命里注定必然失败的人。提名个性赋予色彩、信奉天主教的纽约州州长艾尔·史密斯的倡议没有成功，谴责三K党的一项决议亦中途流产。当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想发言时，被听众无礼地哄了下去。在杰克逊县代表团看来，这一场面令人悲伤。唯一的一线曙光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虽因小儿麻痹致残，却发表了提名史密斯的演说。汤姆·彭德格斯特被他的演说“深深打动”，他说罗斯福若在体力上能承受竞选活动，将成为会议的入选。“他的性格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具吸引力的。”彭德格斯特后来声称。

共和党人的提名不出人们所料是卡尔文·柯立芝，他在沃伦·G·哈定一年前突然去世后接任了总统职务。虽然哈定政府丑闻累累，使民主党在竞选中大可文章可做，坐镇白宫进行竞选的柯立芝却以将近一倍的票数于当年11月大获全胜。

即使杜鲁门法官在那年春天开始重新选举的竞选时已预测到失败，他也没有丝毫表露出来。诚如他的朋友们在他一生中时常观察到的那样，哈里从没有过灰心丧气的时刻。“格卢姆·蔡斯尔博士”的秘方始终不曾被忘记。彭德格斯特手下一位叫汤姆·伊万斯的工作人员记得：“哈里喜怒不形于色，总是永远乐观……”

香农的势力对自己的境遇忿忿不平，期待着报仇雪恨，于是与三K党抱成一团企图在初选中击败麦克尔罗伊和杜鲁门。香农是天主教徒，他还亲自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抨击过三K党，如今这些事实他已全然不顾。当麦克尔罗伊和杜鲁门初选获胜后，香农私下决定在秋季不再为自己的候选人撑腰，而与三K党一起转而支持共和党人。

哈里·杜鲁门能以1000多票在初选中取胜在当时的形势下是非常可观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堪萨斯城明星报》的鼎力支持。该报暂时捐

弃对彭德格斯特的厌恶，声称候选人麦克尔罗伊和杜鲁门是出色的公务员。报纸说民主党人只顾“派系之争”而忽略公职的效率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杰克逊县政府的业绩令人耳目一新……去年政府开销比前年减少了 64 万美元强。迄今为上，赤字已减少近 3/4，如今现金平衡已超过了 25 万美元。”独立城的《哨兵》报称哈里·杜鲁门为模范公职人员，其文章说：“在他忠诚地服务了两年后，哪怕稍微提一下把他撵下台都将对公职人员为民谋利的动机起到毁灭性的后果。”《明星报》对此说法首肯，并说任何信仰优秀政府的人都应投哈里·杜鲁门法官一票。

在《明星报》的同一期上，当地三 K 党头目托德·乔治断言他的组织将“毫不妥协地反对”哈里·杜鲁门。哈里后来说三 K 党还曾威胁要杀他。当三 K 党在里萨米特召开一次大型露天集会时，哈里决定驾车前往与他们展开公开对峙。到场的大约有 1000 人，许多哈里都认识。“我冲他们发表了一通演说。”他回忆说，“然后，我从主席台上下来，穿过人群朝我的车子走去。”回家的路上，他迎面遇到另一辆开往集会的车，里面坐满了“我的人”，均手执猎枪和垒球棒。他明白若是他们早到一会儿，必然会引起一起事端。

共和党东部法官的提名人是独立城的马具制造商亨利·拉梅尔。许多年前，他曾为那对儿小红羊配制过挽具，以便牵拉坐在小型农车里的杜鲁门家的孩子。哈里喜爱和尊重这位“老人”拉梅尔，故而在竞选中没有说过攻击他的话。

最后拉梅尔获胜，哈里再次失业，麦克尔罗伊亦然。哈里未显示出怨忿。选举后的第二天上午，哈里在广场附近的一隅遇到一位为推出拉梅尔而不遗余力地为免派卖力的朋友亨利·奇尔斯，哈里跨过马路与对方握手，说他们之间不应存任何怨忿。奇尔斯对自己所扮演的击败哈里的角色表示歉意，说他深感惭愧，哈里则让他不必往心里去。“你是按照你们的人的旨意行事，我则听从我们的人的指挥。”搞政治就是如此。拉尔夫·杜鲁门堂兄写了封鼓励他的信，说哈里在两年之内若再次竞选肯定能大获全胜，这一想法在哈里心中早已形成。

这一期间哈里在堪萨斯城成了个务实家。他在商会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为堪萨斯城汽车俱乐部出售会员资格，刨去开销外，他每吸收一名新会员就能赚取约 5 美元的佣金。一年之内他吸收了 1000 多名会员，净得 5000 美元，这笔钱正是他养家还债急需的。道路、公路和新一代的汽车产品成了他的特长。他被命名为全国古道协会主席，这是家非赢利组织，致力于在全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道上修筑公路并以传播历史知识来吸引游客（他代表该组织经常出差，在一次出差期间他从堪萨斯城写信对贝丝说：“这差使特像竞选总统，不同的是人们都向我许诺，而不是我向他们做任何保证。”）。他与老朋友往来依旧，还继续积极参与共济会和预备役的活动。唯有他对法律学校的兴趣日趋衰退。在那儿学了近两年后，他终于退学。

早期创办摩根石油公司的时候，哈里被描绘成始终被人们围着的人物，他周身永远是“人，人，人”。此刻又恢复了当时的状态。泰德·马克斯记得他始终不停地忙碌。“只要一件事干不成，他立即就转干别的。他从不闲着，永远有事做。”

哈里在此期间又做了一件错事。他与斯特顿上校、斯潘塞·索尔兹伯里及另外几个人接手了一家名为“公民保障”的濒临倒闭的银行，这家机构坐落在与独立城毗连的英格伍德。不久，哈里和他的合伙人发现在资产数量上

他们上了当，于是他们立即脱身将利息卖了出去。大家在这笔交易中都没赚钱，其中也没有作弊的证据。然而银行旋即倒闭，新接手的总裁 B·M·霍克（他是哈里初中同学费尔·J·霍克的兄弟）在他的车库里自杀身亡。许多人认为此事不清不白，因而给人们留下了不良印象。

哈里随后又为新创办的独立城社团储蓄和贷款协会卖股票，与他联手的仍有斯潘塞·索尔兹伯里——后来不少人认为此事说明哈里在朋友之间不会看人。索尔兹伯里也是参加阿尔贡战役的一位弟兄，他出身于独立城一个古老富裕的家庭，做了一辈子投机商。此人活跃善谈，以“小聪明”著称，尽管“有点圆滑”。他又高又瘦，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蛇眼”索尔兹伯里。连他妹妹都觉得他是个“冷酷的家伙”。多年后当埃德加·欣德被问及哈里为何与索尔兹伯里混在一起时，他的回答是：“凡是哈里的朋友……除非有谁抡拳照直朝哈里脸上打，否则他不会抛弃他们。我想这是哈里的最大缺点之一。”

没多久哈里看出索尔兹伯里在买卖上坑他，于是不声不响地与他脱离了关系。他只是私下里才发泄内心的忿恨，几年后他写道，索尔兹伯里“利用我达到他的目的，他掠走了应属于我的，让我陷入一种想报复他但必然会伤害诸多无辜者的境地。他还对我加以嘲弄，几乎使我悲观厌世。”在此之前他从没有过敌人。

索尔兹伯里多年后目睹哈里·杜鲁门的事业愈发腾达，便称他为“没用的畜生”。但杜鲁门当时运用他在华盛顿的影响派遣联邦调查人员对索尔兹伯里后来在独立城从事的生意活动进行调查，结果索尔兹伯里在利纹沃思监狱里被关了一年零三个月。几年后，为了报复，公开声称自己是三 K 党的索尔兹伯里对记者说哈里·杜鲁门绝对参加过三 K 党，这是个谎言，但其危害却波及甚远。

从 1925 至 1926 年，哈里与吉姆和迈克·彭德格斯特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遇到天气怡人的夜晚，他便驱车进城来到花园大街迈克的家，坐在宽敞的房前门廊里与迈克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迈克认为哈里下次应竞选县收税员，这是一个诱人的美差，因为薪水高的令人咋舌，共是 1 万美元，外加相当于工资数量的配给费用。后来迈克领着哈里去见汤姆，后者说他已把收税员的职位许诺给了一位比哈里在组织内工作时间长的人。汤姆以为依哈里在县政府工作的经验，较适合于首席法官，这一职务的薪水是 6000。迈克劝哈里若有意于收税员的位子不妨尽力争取，但哈里却认为还是按汤姆说的去做更好些。

就哈里而言，这显然是他第一次面对面地与大老板接触。当时的时间是 1926 年初，地点是梅恩街 1908 号汤姆的办公室，即杰克逊民主党俱乐部的新总部。那是一幢汤姆建造的浅黄色砖砌两层建筑，毫无特色，坐落在汤姆拥有的小门罗饭店旁边。四邻是一些单调乏味的小铺、廉价餐馆和金工车间，压根儿没有权力中心的踪影。在游客眼中象征着堪萨斯城财富的活力的大银行、写字楼和商店均在六七个街区的北边。俱乐部会议室和汤姆的办公室在二层，底下是一家批发亚麻织物供应店。狭窄的楼梯共有 20 个木台阶，其气氛让人想起通向练舞厅和裁缝店的通道。

于是此事便拍板敲定，哈里将竞选首席法官。当时彭家与约瑟夫·香农之间的争斗已偃旗息鼓，因此竞选结果将是不言而喻的事。初选时哈里没有遇到阻碍，11 月，他和所有民主党候选人当选就职。亨利·麦克尔罗伊被选

为堪萨斯城的新领导人。作为首席法官，哈里·杜鲁门终于实权在握。

6

任期为4年，并非2年，哈里连任一届，共8年，时间从1927年1月至1935年1月。他的表现尤为出色，几乎有口皆碑，这其中包括市领导人、商界人士（共和党人亦在内）、同行官员、新闻界、攻读政治专业的学生（当时和后来的）以及至关重要的全体选民。他在1926年的选举中以1.6万票取胜。1930年再次竞选首席法官时，他获胜的超出数是5.8万票。

奇迹出现了，独立城的《考察家》报在哈里第一任期的一半时说：“作为县中心的县政府从未受到过严厉的批评或发生过重大丑闻，也没有受到贪污腐败的指控。”《明星报》对哈里“全身心投身于县府工作”大加赞扬。哈里·杜鲁门办事效率高，对情况熟悉。“凡事都可以找他谈，他对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及应如何处理都了如指掌。”堪萨斯城市政研究所的一位代表说。位于哥伦比亚市的密苏里大学主办召开了一次如何更好地做好州及地方政府工作的会议，会上，圣路易斯《明星时代》的一位编辑说，到会的密苏里官员中能同专家们以同等的知识探讨行政管理问题的唯有杜鲁门法官。

每争论完一个问题后，大家迟早都会最后听取坐在我桌子对面的那位说起话来语调平静的人的见解（那位编辑写道）。每到此时我就会感到十分惊奇乃至不可思议，因为众多改革者们如此尊重其见解的那位沉静的人竟是杰克逊县的首席法官……他的管辖区是臭名昭著的彭德格斯特集团的大本营。

更重要和同样不可预料的是哈里作为领导者的方式，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表述了下列观点：

我们的宗旨是本着纳税人的利益管理县政府。我们是以民主党的身分被选上的，但我们的身分也是公务员。我们将任命民主党人担任一切可以任命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做到每一个人一天所完成的工作要与他的报酬相符。换句话说，我们将以最大的效率和最节俭的作风处理县府工作。

另外两名新县政府成员霍华德·弗鲁曼和罗伯特·巴尔都将听从他的指挥。西部法官弗鲁曼是位和蔼可亲的堪萨斯城不动产公司的经理，属兔派；巴尔是个乡绅和西点毕业生，哈里亲手选择他填补了自己过去担任过的东部法官的空缺。因此实际上，首席法官杜鲁门是最高行政长官。有人在他后来的生涯中曾指责他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但事实是他当时负责着每年700万美元的经费预算，这一数字比某些州的预算都大而且还调遣着700名雇员——县司库、县行政司法长官、县议员、修路监工、测地员、公路工程师、医疗卫生官员、负责假释的官员、采购商、验尸官、收税员（他本想做的差使）、契约书记、学校督学、烈酒执照检查员、选举委员和9名治安官。他全面负责县养老院、县医院、麦丘恩（白人）男孩教养院、（白人）少女教养院、黑人少年男女教养院及7000多英里长的县公路。他还负责两所法院（包括监狱），因为堪萨斯城也有一所法院。他对预算分配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并握有控制帐目的终极权限。从理论上讲，他有权选择签署合约的对象、调整税率、

发行债券或决定何时及从哪家银行为县里贷款。作为县的最高领导，他还是首席发言人，须在工作餐上抛头露面、参加会议并宣传杰克逊县的发展和机遇。

从理论上说，他应对其负责的唯有全体选民，而且他的选民已不再像他当东部法官时那样仅仅局限于乡村。他的选区已扩大到全县，包括拥有 50 万人口的堪萨斯城。若撇开理论，尚有哈里过去几乎未谋过面的汤姆·彭德格斯特。他可指望迈克·彭德格斯特做他的后盾。迈克依旧以老师的身分时常造访县政府，坐在一辆墨绿色的由吉姆驾驶的“无敌”牌车里，有时他的小儿子罗伯特也跟着一起去，这个小男孩喜欢坐在杜鲁门法官的转椅里转圈。然而迈克并非汤姆。此外，政治争斗的压力已使他精神崩溃，于是在家人和医生的劝说下，他最后辞去了在组织中的职位。

杜鲁门一反多年的积习，不再以 6% 的利息从堪萨斯城的银行为县里贷款，而是去芝加哥和圣路易斯贷来了利息为 4% 的款项，后来又降到 2.5%。当大为震怒的堪萨斯城银行家们告诉他他的做法是对银行股东的不公正的惩罚时，哈里说全县的纳税人对此事也有发言权。

1928 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宣布选定堪萨斯城作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接着似乎又因费用问题而犹豫不决，哈里见机便帮着共和党人在当地募捐，其原因很在理，即会议将使堪萨斯城的经济受益（共和党正是于 6 月 12 日在堪萨斯城的会议厅里提名赫伯特·胡佛为总统候选人的）。

哈里兑现了他的诺言，只雇用民主党员，职位由羊派和兔派平分秋色。他还为维维安谋了份差使，当县养老院的采购商。为了抚慰贝丝和她母亲，他的小舅子弗雷德·华莱士亦被他聘为县建筑师。弗雷德继承了他父亲喜好杯中物的秉性，很令人头疼，但依旧是他母亲的宝贝儿子。

最受重视的是公路。上任没几天，杜鲁门法官就任命了一个由两名土木工程师组成的两党成员委员会，成员是 E·M·斯特顿上校（后来成为将军）和共和党员小 N·T·维奇。他俩的任务是查看全县的公路并草拟出一项规划，这项工作尚属首例。哈里曾陪他们多次出外视察，总共跑了好几百英里。3 个月后写出的报告明确指出 350 英里“‘馅饼皮’似的公路无法适应现代交通的需求”，并强调仅仅维修它们的费用就可能超过征得的税收。新计划将铺筑 240 英里新水泥公路，整体设计的思想是让每个农民与公路的距离都不超过 2 英里。费用为 650 万美元，靠发行债券募集，这种做法在杰克逊县的筑路工程中也属首例。过去发行债券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但哈里却坚信只要确保合同公正、施工质量创一流，老百姓会支持这一项目。

《堪萨斯城明星报》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当哈里征求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同意时，后者的看法与《明星报》一致。“你不能这样做，别人会说我把钱都偷走了。”哈里记得“大老板”这样说。哈里说只要他把他的意图向老百姓讲清楚，他们会投票同意发行债券的。彭德格斯特的答复是，哈里愿意向选民们说什么都无妨，哈里把它理解为对方的首肯。

这样一来哈里似乎把他读过的罗马人的历史、制作凯撒大桥模型的记忆、他那辆老式斯塔福德汽车从前在路上遇到过的数不尽的险情、法国公路在他脑海中留下的记忆以及他在格兰德维厄农庄附近的公路上跑来跑去的经历和他那位决心为维修好公路而辞世的父亲，都包容进了这一宏伟的建筑规划之中。他发誓他铺设的道路即使够不上全国一流也要成为全州之冠，而且施工过程中杜绝营私舞弊的现象。

他又开始在各镇之间做巡回演讲。“我对选民们说我们将与最低报价人签订合同，在两党成员组成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监督下修路。”当时正值满地泥泞的早春季节，道路的状况如何是不言自明的事。每一个选民都得到一张地图，上面标着将要改善的位置。

发行债券的数额扩大了，以便在堪萨斯城追建一座法院和监狱、一座新的县医院和一所弱智儿童福利院。法院、监狱和儿童福利院均来得到选民的同意。公路和医院被认可，投票的那天是1928年5月28日，正好是哈里44岁生日。结果是大获全胜——同意发行债券票数的比例是3比1。哈里恪守其诺言，与南达科他州的一家建筑公司签署了第一份40万美元的合同。其他项目也很快被一些不常接手杰克逊县公共工程的公司承包下来。

公路建成了，而且质量上乘。5年后的1933年，《考察家》载文说：

1928年成立了由E·M·斯特顿将军和小N·T·维奇两党工程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公路系统的建设……今天大家公认，当年县政府和该委员会许下的每一个承诺都认真地得到兑现。呈交计划中建议的每一条路都按许诺的那样一丝不苟地建成，资金未超出投票规定的数额和工程师们的估算。

哈里根据在法国的记忆，在道路两边植上了树木，共栽培了7000株榆树和杨树幼苗。然而令他悲伤的是，杰克逊县似乎还未达到能欣赏卢瓦尔山谷景致的层次，因为农民们把树苗都除掉了。

他在讲话中曾反复强调实用性，但也试图种树并在道路完成之后出版了一本印制精美的小册子《县规划之结果》，里面100多帧照片标明全县有哪些美丽的景致将通过发展开发出来，而不是被破坏，并且人人都将受到裨益。“这里有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成千上万的人……大家相互依赖……只要有一项规划和坚定的决心就能开发这些机遇，而且先例一立便会群起而效之！”小册子继续说，很快就会出现“花园和娱乐中心，它们将建在全县人口集中的地方——这些是有益健康的消遣场所，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众多人口和下几代人的需求”。图片展示的是学校、农场、工业区、主要街道、方兴未艾的堪萨斯城高大建筑物的空中轮廓、横跨密苏里河及大、小蓝河的桥梁和伸展在起伏乡村的连绵不断的公路，那里曾是拓荒史的发源地。首席法官所强烈感受到的对历史的兴趣全部反映在这本书中。雷镇主要街道的照片配的解说词说：“雷镇曾是奔赴圣菲商队的汇集点，它还以附近的一个小屋而著称，小屋建于肯塔基州，通过水路运至此地——它便是距雷镇西南2英里半之遥的杰西·巴恩斯的家。房子的一部分至今犹在。”另一张照片是圣菲小道穿越大蓝河的蹊径，已被车队踏平。还有一张是掩映在老榆树之间的一幢木屋，其下的解说词云：“玛莎·E·杜鲁门夫人自1867年以来一直住在这座位于蓝岭大街的农庄里。她1852年生于杰克逊县，是县政府首席法官哈里·S·杜鲁门之母。”

“哦！我要是约翰·D·洛克菲勒或梅隆……肯定会把这部分地区（6个县）变成世界真正的乐园。”哈里私下里写道。事实上，公路体系按计划完成，而且不可思议地低于原估算的造价。

为了建造更多的道路以及修造堪萨斯城政府办公楼及重新翻新独立城县府大楼，又进行了一次发行债券的投票。原先的堪萨斯城政府办公楼是座维多利亚式的无太平门设施的建筑物，电梯吱嘎作响，木地板满是油渍，取而

代之的新楼将是全县一项长久的 10 年计划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还包括一座新的市政大厅和一座市礼堂。这是全国最宏伟的城市规划之一，得到《明星报》和彭德格斯特的全力支持，这意味着它肯定能上马。

哈里的工作劲头如以往一样风风火火，果断利索，似乎有用不尽的精力，他事无巨细皆必躬亲，这是他人所不可企及的。他生来十分注重外观，视其为自我尊重的表现形式，而且恪守古老的凡值得做的事就必须做好的信条，加之希冀为自己和他的社区创建一番事业，便决计为全县建造一座天下无双的堪萨斯城政府大楼。

由于对新楼的形式没有把握。他便决定自己先学习一番再说。于是他驾驶着自己的车子，自己掏钱开始了惊人的全国周游，观看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并与它们的设计师交谈。他跑了几千英里，西至丹佛和休斯敦，东至布鲁克林，南至巴吞鲁日。他带上了弗雷德·坎菲尔与他做伴并帮他开车，很显然前者颇讨他的喜欢，但在不少人眼中，他却是堪萨斯城可惜的玩弄权术的彻底化身。无论是外表作派和名声，坎菲尔都是个典型的彭德格斯特手下的鲁莽汉子，借用几年后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证词，他是个“喋喋不休、满嘴脏话、庸俗粗野的家伙……是个品质最差的选区小喽罗”。人们认为他霸道，好吹牛，“夸夸其谈”，傲慢而粗鲁。此人身高 6 英尺，壮得像个重量级摔交手，几乎永远是横眉怒目表情邪恶。他的帽檐压得极低，两腿总是叉开站着，脚底沉实，仿佛是在挡道。人们觉得他奇异而诡谲，是个“神秘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他瓮声瓮气的嗓音，他又被称作“低声弗雷德”。人们低声私下说“低声弗雷德”有犯罪前科。

与他共事多年的人对他的来历和住所一无所知，甚至他是否成家也是个谜。坎菲尔在为杜鲁门做事之前曾在商会大厦里有一间办公室，但既无招牌也没登记电话。他有一辆漂亮车子，西服都是定制的，但谁也摸不清他以何为生。一位想雇用他的堪萨斯城知名民主党人试图挖出他的底细，结果徒劳无获，最后只得针锋相对地问他：“你到底靠什么糊口？”坎菲尔只是仰头大笑，说这是许多人都想探听的事。那人仍不死心，便求警察局长暗中探查坎菲尔。然而几天后警方的结论只是坎菲尔定期在萨瓦尔炙烤餐厅的一个隔间里与哈里·杜鲁门和泰德·马克斯用餐（当时大约是 1925 年，哈里正在为堪萨斯城汽车俱乐部卖会员资格，在商会大厦里有间办公室，那里也是泰德·马克斯办公的地点，坎菲尔身上的高档西服显然就是出自他的手）。

据哈里·杜鲁门所知，坎菲尔的真实身世如下：

他与哈里同庚，在堪萨斯城的一座农庄长大。他未婚，与一个妹妹住在堪萨斯城东特雷斯街 77 号的一个小房子里。战前，他曾为一家马戏团管过一段帐，后来在他妈妈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为一家“凯迪拉克”代理处的维修部当了几年主管。他在商会大厦办公室工作时，正在为堪萨斯城的一个房东充当收租金人。与谣传的说法相反，他从未犯过罪。

没人知道他是何时介入彭德格斯特的组织的，根据后来的证词，他获得彭德格斯特组织的恩宠是由于杜鲁门法官的关系，而并非组织青睐于他。

哈里与坎菲尔初次相识是在部队。他被选入县政府后，便聘请坎菲尔为税务调查员。哈里欣赏此人，喜欢他的工作作风。“弗雷德的确有点粗，但他人不错，非常忠诚。”哈里多年后回忆坎菲尔在他身边工作时解释说。他只是表面上喋喋不休语言粗俗，他曾是一名出色的士兵，完全靠自己的本事从中士提升到少尉，这一点哈里很器重，而且也被调查人员后来在他的服役

档案中证实。保存在战争部的坎菲尔的档案中有一条写道：“性格一直不错，因而推荐其为一名能力突出的军官。”另一句说道：“通常他每天工作 12 至 15 小时，但我从不见他面露倦意。他总是满腔热情，渴望着下一项任务……”

哈里在旅途中最看中的建筑物是一座新建的体积庞大的凯督教区法院，坐落在坎菲尔过去做过事的什里夫波特，于是决定雇用其设计师爱德华·F·菲尔德作为他的顾问。这一建筑后来被称作装饰派。虽然哈里对“现代”绘画不以为然，却对装饰艺术风格极为欣赏。

一如他希望在道路两旁栽上树木那样，此时他决计在政府大楼前塑造一座安德鲁·杰克逊的骑马铜像。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看见一面雕有杰克逊头像的石壁，以为技艺高超，便立即聘用了来自纽约的这位雕塑师查尔斯·L·凯克。为了追求历史真实——也是出自长时间的对“老安德鲁”的热爱——哈里驾车开到杰克逊的家乡田纳西州的赫米塔奇去测量杰克逊的衣服。他要使他心目中英雄的雕像与真人的大小分毫不差。“我要的是骑在一匹真马上的真人。”

《堪萨斯城时报》称新的公路网是一项“卓越的成就，足以为美国任何一个县的脸上贴金”。这话不假。《明星报》对首席法官杜鲁门的“非同凡响的业绩”赞不绝口。哈里被选为大堪萨斯城规划协会主席和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主任。

随着他知名度的迅速提高，熟悉他的人觉得他依旧是从前欢愉乐观的“老哈里”，工作对他是一种激励。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他日益感到紧张，神经绷得过紧，正如他在一次旅途中写信对贝丝说的：“我要么就得躲起来，要么就得喝个大醉。”他讨厌电话声，而无论他家里或办公室的电话总是声不绝耳——“每个自从我生下来后曾与之打过交道的人都想讨得我的同情，从我这儿赚走一些县里的钱，而且不抱还钱的打算。”他开始患头疼、晕眩和失眠。渐渐地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的头疼日见严重。他经常外出，视察全国各地公共建筑物、参加共济会会议或夏令军营，其首要原因就是他的头痛症和躲避电话铃声。有趣的是，军队的医生称他身体棒得像头牛。其中一个说他体格好得不亚于 24 岁的小伙子。

1927 年夏天，他在抵达堪萨斯的赖利军营后的第 3 天写信对贝丝说：“自从这儿后我的头没疼过一次。”另一天他又对她说：“今天痛快极了。我收到你一封信，骑了一阵儿马，看着火炮射击出现了 9 次故障，游了一小时的泳，吃了顿美餐，累得不亦乐乎但头却不疼。”预备役中的一些军官如哈里·沃恩有时禁不住想他们为何还要加入预备役。“我们没有武器，”沃恩回忆说，“没有一名士兵，亦没有设备……我们简直两手空空。”但在哈里眼里，走出户外参加运动，并在没有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和朋友们在一起无异于天赐良机。哈里变得满腹忧愁。小玛格丽特面黄肌瘦，常常生病，令他十分焦虑。他开始服用镇定药。他还为金钱及可能和别的女人卷在一起而担忧，后者是由来已久的毁掉政治家的手段。有一次别人邀请他去巴尔的摩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开会，为了以防万一，他让埃德加·欣德与他同行。欣德记得他们敲过门后，一个穿着睡衣的金发碧眼女郎把门打开，哈里见状扭转脚跟跑回大厅，消失在街角。欣德认为这是一种近乎于病态的恐惧。

我跟他一起参加美国军团会议。他在那儿有个房间，自然，人人都愿意往他的

房间里跑。要是有谁带个女人去，哪怕是老婆，哈里也会戴上帽子穿上大衣一走了之，在女人们离开之前你甭想再见到他的踪影。他不想让他饭店的房间里有人出入……他对此有种恐惧心理。

“3件事可以毁掉一个人，”哈里后来对一名记者说，“权力、金钱和女人。”

“我从不觊觎权力，”他说，“我一直就囊空如洗，而且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女人就住在家中的房子里。”

1929年4月30日，哈里在为筑路合同拨出了约600万美元的款项后，收到一份缺席判决书，罚他为男子服饰用品店的旧债付8944.78美元。同时他母亲不得不再次用农场向银行抵押借款。但当一条新修的路占去她农场11英亩的土地时，哈里觉得出于自己的职位应恪守原则，于是没有按通常的做法用县款补偿他母亲。倘若他不是首席法官，她母亲应得到每英亩1000或1100美元的补偿费。

他在金钱方面一丝不苟，可谓到了谨小慎微的程度，对许多政治家可以受益的小恩小惠他也绝不染指。关于他廉洁无私的事多少年后人们仍在传说。

堪萨斯城的麦基路有一家盖伊·沃森纺织品公司，一个叫扬西·沃森的来自独立城的小伙子在那里为他表哥做事。他记得一次杜鲁门法官来买汽车座套，价钱是32美元，但年轻的沃森按照他表哥的吩咐说，要是杜鲁门法官能安排县里的小车和卡车到他们公司订点货，钱他就不必付了。哈里瞟了他一眼，“孩子，我可不用这种方式做买卖。”他说，说罢付了钱。

不久，当汤姆·彭德格斯特为他的车订了价值65美元的座套时，扬西·沃森把电话挂到他的办公室，提出了同样的交易，彭德格斯特往椅背上一靠，说：“我想这样可以。”

1929年9月2日，股票市场崩溃前的一个月零三周，哈里“爱之如乃父”的迈克·彭德格斯特死于心脏病。随着大萧条的降临，作为全县行政第一把手的杜鲁门法官感到身上的压力日益加重，因为工作愈是难找，农场和企业倒闭得愈多，对他们县的合同和就业机会的影响就愈大。甚至他分配出去的最不起眼的差事也成了美差。他们县由于拖欠税款的人数急剧上升也陷入了困境，而当他正要为此而被迫减员时，朋友和亲属却无时无刻不尾随其后伸手要工作。他最后终于裁去了200名县雇员，那天晚上他一到家就闹起了胃病。

贝丝由金纳曼护士陪伴，带着玛格丽特前往位于墨西哥湾边上的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期冀几周气候的变化能恢复孩子的健康。哈里则为了让自己安静一会儿或晚上睡个好觉，常开车去格兰德维厄，睡在他那张厨房上方的旧床上，或让城里一家旅店的老板不经登记给他开个房间，“以便那些不想被解雇的人既找不着我也没法给我打电话”。

选举日的前夕，即1930年11月3日星期一下午，有人企图绑架6岁的一年级学生玛格丽特，她当时正在离家仅4个街区的位于滨河大街的布赖恩特学校的教室里。

据她的老师马德琳·埃策豪泽说，马上就要下课时，一个陌生的头戴帽子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教室门口，说他来接杜鲁门法官的孩子玛丽·玛格丽特。“我觉得有点奇怪，”埃策豪泽小姐后来说，“因为我们一直管她叫玛格丽

特，从不说玛丽·玛格丽特。另外还让我不解的是放学接她的永远是杜鲁门太太或玛格丽特几个舅舅中的一个”。她让那个人稍等，便立即朝校长办公室跑去。等她回去时那人已不见了。“几分钟杜鲁门太太来到教室，一脸惊惶之色。我想她可能以为玛格丽特已不在了，发现她安然无恙后才长舒了一口气。”杜鲁门法官和几名行政司法副长官须臾也赶到了。“真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翌日是选举日，当哈里走访县里各选区的投票处时，一名副司法长官陪着玛格丽特和她母亲在城里一家旅馆度过了一天，周身有警方的严密守卫。绑架之事与政治有多大关系，贝丝和哈里不得而知，他们也没能掌握更多的情况。然而玛格丽特此后便一直受到严密的保护，2年后发生的林德伯格绑架事件对杜鲁门夫妇震动很深。

哈里心中对政治现实产生出极大的不安和混乱，尽管他当时未表现出来。他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失望和良心上的悲痛，这些都可能是造成他头痛的主要根源。

“局外人看来你掌握着权力，而且每天报纸都登你的名字，隔一天还有你的照片，好像是很风光的一件事，实则并非令人愉快。”他对贝丝说。“政治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变成窃贼、酒色之徒和一个悲观厌世者，但这类人我都不是……”他在另一封信中对贝丝说。但他能抵御得住压力吗？

后来我们对他当时在幕后所经受的一切得到一些生动的尽管有些零碎的描绘，这些都是他偶尔记录下的回忆，包括他只身躲在堪萨斯城市中心的匹克威克饭店用两三个夜晚写下的一篇生动的写给自己的回忆文字，这篇东西没有日期，篇幅很长，他将心中的感受宣泄在一页页纸上，不为别人，只为自己。

7

为修路而发行债券的决定通过后，麻烦接踵而来，因为汤姆·彭德格斯特很快便发现哈里真地要兑现他向选民许下的诺言，在合同交易上杜绝偏袒之风。

“老板想让我把内情透露给许多心术不正的承包商，我不能那样做。”他写道。彭德格斯特因哈里不肯妥协而恼羞成怒。他说哈里奉为至高无上的信誉准则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无济于事，故而称修路计划是毫无价值的小题大做，不过是替工程师们扬名罢了。他对哈里说，只需把招标修改一下，合适的人就能得到合同。哈里据理不让，争辩说他的做法对公众和党都最为有利，彭德格斯特似乎此刻才初次认识到他弟弟迈克把一个什么样的人拉进了组织。也许彭德格斯特是在考验哈里，不管怎么说，他的气愤最终消弭。后来在他办公室安排了一次会议，一部分原因是彭德格斯特想欣赏一场对抗，而那次对抗后来竟成了哈里最热衷谈论的话题。

梅恩大街1908号的办公室小得可怜，只有12乘14平方英尺，仿佛彭德格斯特孑然一人就已把它塞满。两扇带软百叶帘的窗子俯瞰着大街。屋里摆设简单——靠墙是一张有活动桌面的写字台、几把椅子和几个痰盂，地上铺一块褪色的绿色地毯，写字台上方挂一张嵌在框子里的卡通画，它是从《明星报》上剪下来的，描绘的是兴高采烈的市参议员吉姆手里捧着第一选区的投票箱。痰盂是为客人备的，因为彭德格斯特只抽烟卷，使一杆漂亮的烟斗。

他有戴着帽子坐在办公桌后的习惯，身子前倾坐在他那张木转椅上，样子好像有事要马上离开似的，他发现这办法不错，可使谈话简短扼要。他办公室外面坐着他那位人高体胖的老秘书兼看门人伊莱贾·马瑟斯，此人从前做过江轮船长，故而人称“船长”，其体胖不亚于彭德格斯特。

到会的有5人——彭德格斯特、哈里及3位筑路承包人，根据哈里后来的叙述（也是有关会议的唯一记载），承包人都是组织的老朋友，对哈里的态度均极为反感。其中一位是罗斯建筑公司的总裁迈克·罗斯，彭德格斯特在这家公司拥有股权，他亦是小意大利选区的头目，因而地位非同小可。私下里，哈里认为罗斯“是个地道的窃贼”。

“这些弟兄们说你不给他们合同。”彭德格斯特首先发言。

“如果他们的投标价格低，就可以拿到合同。”哈里答道，“而且他们的施工还要符合规格，否则得不到报酬。”

“我没跟你们说过么，弟兄们。”彭德格斯特说，“他是密苏里最乐意故意作对的家伙。”

3个承包商开完会离开后，彭德格斯特告诉哈里觉得怎么对就怎么放手干，尔后自然又加了一句，他彭德格斯特若想把哈里拉下马，可以随时示意另外两个法官照他的旨意行事。

自那以后彭德格斯特显然说话算数，从未再让哈里做不合法的事。“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做事一贯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几年后哈里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他从未再插过手……”

他俩的关系平平——和哈里与迈克之间的那种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开始相互尊重。彭德格斯特认识到哈里的正直委实不可多得。哈里则在上述事发后没多久在匹克威克饭店里写的回忆中把大老板描绘成一位颇赋才华的人，尽管其准则与自己的相去甚远，但并不能阻止他对他产生佩服之心。就算彭德格斯的发家史粗俗卑鄙，他却不虚伪，绝非“两面讨好之徒”。

“他过去开过一家妓院、一家酒吧和赌场，从小在那种环境中长大，但他是个男人。”哈里写道他怀疑在上帝的眼中谁更像个人？是汤姆·彭德格斯特还是“那些礼拜天哭泣，礼拜一玩妓女，礼拜二酗酒，礼拜三投靠老板，礼拜五忏悔，礼拜天又重新再来一遍的假做悲伤的牧师们”。

他觉得他理解彭德格斯特。至少他知道在哪方面应与他站在同一立场。令他感到震惊和愤懑的是政府另两个官员弗鲁曼和巴尔。杜鲁门以为凡与女人寻欢作乐的男人都不可绝对信任。他发现弗鲁曼和巴尔“都喜欢情人”，而且为“应召妓女”安插工作（“我要替大老板说一句，”他顺带写道，“他不与女人鬼混。”）。西部法官弗鲁曼虽是个“不错的家伙”，但就是铆着劲地想从县里的生意中贪污中饱。哈里亲手擢用的东部法官巴尔令他大失所望而且哈里对他的所作所为大为不解：

自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信仰荣誉、道德观和正派地做人。我发现只有极少一部分人与我的想法一致。比如我提了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生与我共同创办事业，其父享有很高的荣誉，因而他应把华盛顿、李、杰克逊和古斯塔夫·阿道夫作为他理想中的人物，然而他却是个废物，意志薄弱，没有理想，一无是处。他以权谋私，欺骗老婆（一个在婚姻关系上不忠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也不诚实）。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出卖我或任何人……

在他的叙述里隐隐谈到了他所陷入的窘境，这一窘境比巴尔的道德败坏更糟，令哈里寝食不安。他发觉为了避免更大的灾祸，他自己也不得不往错路上走。巴尔贪污了一万美元，哈里发现后为了保障他发行债券的成功及防止巴尔继续贪污，决定必须放巴尔一马。

我这位甜言蜜语的同事兼朋友本应是支持我的，却与老板的一位朋友、从前当过承包商的一个骗子做了笔交易……为了保证选举通过的公路网建设能上马，我不得不做出妥协……我不得不让一位过去开过酒吧、杀过人的老板的朋友从县府的年收入中窃走一万美元，以便满足我这位理想的同事并阻止更多的无赖们从债券中贪污上百万甚至更多。我做的是对还是在向犯罪妥协？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我要修筑价值 650 万美元的公路，这一数字足以使那帮无赖垂涎三尺。为了让我家人欢心，我不得不雇用我的小舅子（弗雷德·华莱士），尽管他饮酒成癮，我也一定要让医院的造价低于同类设施。为此我只好亲自抓医院的施工同时还得付给他工钱……我还算不算是个负责人？也许我也是一个为了让工作展开而一味妥协的无赖？还是由你来判断吧，我不知答案。

除此之外，他还在饭店的房间里抒发了更多的感慨，写了厚厚的一摞。他还写了政府办公时弗鲁曼和巴尔如何吹牛聊天，哈里处理事务时他俩均蜷缩在法官的椅子上（实际上，哈里发现他俩闲呆在那儿他办事效率更高）。哈里一贯认为多数人都有廉耻心，但此刻他对此萌生了怀疑。彭德格斯特对他说大多数人只要机会允许又可避免惩罚都会忘掉诚实去进行欺诈，那口气就像在给一个不开窍的学生授课。哈里暗忖，政府周围若总有一群虎视眈眈的贪得无厌的人围绕，还有何指望保持廉洁呢？“倘若我们光与汤姆打交道，老百姓恐怕还有指望，但汤姆离不开约瑟夫（香农）和卡斯（韦尔奇）的协助。卡斯是条恶棍，是最卑鄙的骗子，20 年前就该入大狱。约瑟夫则从没有雇过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哈里越写越气忿：

我雇了这么多不中用的混帐东西不知是不是做错了，此外为了满足政治权力和节省 350 万美元的资金，还付给提供物资的一群王八龟孙高出他们身价的报酬。我觉得我没做错。反正我没有与他们任何一伙同流合污，只要我一下台就将比过去还穷。

他计算了一下，如果他乐意，他可以将 150 万的公款中饱私囊，后来透露的记载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事实是，“我连 150 美元都不趁”。他想他要是辞职开个加油站恐怕也比现在挣得多。

他补充道：“种种这些使我头痛不止……”

在小休·奥格登眼里，和她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玛格丽特·杜鲁门住的大房子是一座躲避大萧条的富丽堂皇的避难所。玛格丽特的外祖母华莱士是位穿着老式时髦服装的举止考究的夫人。玛格丽特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玛格丽特还有一个新秋千。每次玛格丽特的父亲从外出差回来都给她买一件礼物。休记得“玛格丽特要什么有什么”。杜鲁门法官永远衣冠楚楚，他们还有一个叫维耶塔·加尔的黑佣人，负责烧饭和服侍全家人用餐。

独立城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冲击。1931 年，3 家银行在 3 周内倒闭。几百

户人家都受到了影响。据记载，1931至1932财政年度期间，全镇900多户人家共计2800人领取救济——食品和衣物。发放救济的有六七个组织，包括社区福利会、红十字会、基万尼斯俱乐部和救世军。救世军在广场搭起了一座施粥所。福利会将古老的县监狱变为发放中心，去那里排队的人数稳步上升。1932至1933年，共有4347人靠吃救济为生，超出了前一年人数的一半。休·奥格登的父亲是名机械师，因找不到任何工作只好时常到镇外四处寻觅。奥格登记得每当他父亲带着全家到其他镇去时，她总是饿肚子。她知道玛格丽特永远不愁没饭吃。休和她的家人都认为玛格丽特是财富和特权的宠儿。

玛格丽特记得由于经济危机的缘故，她每周的零花钱从50美分降到了25美分。“这实在是个大灾难。”

休·奥格登和她姐姐贝蒂是杜家的邻居，与杜家隔一条窄街，住在南面。杜鲁门太太鼓励玛格丽特与奥格登家的两个小女孩玩，一则因为她们像杜鲁门太太小时候似的都顽皮的像假小子，二则她们住得很近。她们是“安全的”玩耍伙伴，休回忆说。自从那次绑架受到惊吓后，杜鲁门夫妇对玛格丽特的安全“极为担心”。“我们不得不教她出外玩时要注意什么。”

杜鲁门法官看去总是放松而平易近人，“一副当爸爸的样儿”。他“穿着睡衣也从不觉得发窘。我们在屋里他就会感到非常平和。我们在浴室里玩他的划水运动器械，他一点儿都不在乎”。

奥格登姐妹把杜家当作自己家似地出出进进，或在杜鲁门太太和维耶塔能望得见的屋后车道上玩耍。房子里是个“特好玩的所在”。被称作“地牢”的地下室大得可以骑着玛格丽特的自行车拐来拐去。“漂亮的顶楼”里塞满了可以用来乔装打扮的旧式服装。这是个似乎年复一年都过得很祥和的家庭，从来没发生过一次摩擦。休回忆说：“即使有不和睦的地方甚至潜在的不如意，他们也掩饰得极好。”1927年开始为杜家当佣人的维耶塔·加尔后来说：“我跟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里从没听到过一声口角，也从没见过杜鲁门先生生气……”她父亲曾为盖茨外祖父当过男仆。她记得“全家人都是好脾气，特好伺候。他们喜欢与人为善，所以我喜欢他们，与他们相处得很好。”

贝丝的生活井井有条，除了与圈子内的朋友交往外，很少与外界接触。她是桥牌俱乐部成员和刺绣协会的秘书，刺绣协会是个为穷人募捐衣物的妇女组织，这类活动定期由年轻的休·金特里在独立城的《考察家》报社会栏目上加以报道。对贝丝来说这已足够了。她的家庭是她生命的全部。她不希冀过多奢求，也无意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和出风头。

玛格丽特记得她自己的生活庶几完美得无可挑剔。“我是独生女，有许多姨妈姑妈和舅舅，他们都没孩子，什么东西都属于玛格丽特，幸福极了。”家里唯一对她施加管教的人是她母亲，后者有时会严厉地盯着她，偶尔还打她屁股，而她爸爸从没动过她一根指头。玛格丽特回忆说，对那些咎有应得的人，她妈妈比她爸爸更狠得下心。“我要让他任我摆布。”

吃晚饭时，外祖母华莱士坐在餐桌的首位，父亲坐在另一端。玛格丽特随母亲坐在侧面，对面是弗雷德舅舅。开饭时间是6点半，餐桌上铺着白色亚麻台布、摆着亚麻餐巾和漂亮的银具。雕刻是出自父亲之手，据维耶塔·加尔说：“美极了。”饭桌上的气氛永远平和而有规矩。外祖母华莱士进餐前略改变一下发式并换上一件亮丽些的衣服。“我的举止必须十分得体。”玛格丽特回忆说。当父亲和舅舅讨论政治问题时，母亲偶尔插两句嘴，但对政治和搞政治的人不闻不问的外祖母从不介入。“虽然她的话不多，但大家都

强烈地意识到她的存在。”

吃的饭简单而丰盛，都是由马奇·华莱士每天早上用电话订的——弗吉尼亚熏火腿、常备的烧排骨、热面包、老式饼干、烤甜土豆、上市的新鲜蔬菜、糕点、饼及桃子馅饼。哈里最喜欢吃玉米面包和密苏里高粱。据在杜家干了36年的维耶塔·加尔说，哈里最爱吃的甜食是蛋白做的蛋糕。“是的，我把他惯坏了。”她说，“但他为人总是那么好。”

一到星期天，哈里、贝丝和玛格丽特就开车去格兰德维厄，在农庄吃一顿丰盛的炸鸡午餐。玛格丽特记得农庄的气氛“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仅她父亲期盼着来此地，她妈妈亦是如此。“贝丝非常喜爱杜鲁门妈妈”，妈妈“很风趣”，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位充满生气个头不高的“乡村祖母”与在独立城的那位截然不同。与杜鲁门妈妈在一起你会觉得回到了拓荒时代，会感受到那永恒的天真的活力和气质。祖母依旧和玛格丽特的表兄弟们（维维安的儿子）去打兔子。一次她在房子后面的走廊上给一个叫花子饭吃，当那个叫花子嫌咖啡太凉时，她夺过杯子进了屋，须臾拿着一杆猎枪走出来。她让叫花子立刻走开，否则她连咖啡带他一起煮。

玛格丽特看到父亲和祖母在一起时的愉快劲心里很高兴。“哈里，你要听话。”每次他们临别时奶奶都这么说。但有时奶奶也说：“太听话了也就没意思了。”这句话他们都爱听。

玛格丽特和奥格登姐妹及另外六七个邻里的女孩子在北特拉华大街219号的后院演起了戏。有一出戏的名字叫《捕获聪明者》，主角由玛格丽特担任，《考察家》报还专门派了一名摄影师为全体小演员拍了照。演出都在天黑后进行。一张乒乓球台子立起来作为背景道具，院子里挂满了灯光，厨房的椅子拿出来给观众坐。哈里场场演出必到。“我希望她什么都尝试并拥有一切，同时还能意识到多数人为了生存必须工作。我不想让她成为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他在写给贝丝的信中说。

家务事一应俱全他都操心过问，他时常检查车子的轮胎面是否完好无损，能承受35磅的压力，每开1000英里他必然要换油保养。玛格丽特记得“每隔几天车子就刷洗一次”。“车子的内部经常清扫吸尘。他不许别人在车子里乱扔口香糖纸——要扔就扔进烟灰盒里——他不喜欢别人抽烟，因为他自己从来不抽，而且烟灰容易弄脏车子内部装潢……他对车子十分爱惜。”对自己的外表也十分讲究——西服、领带和皮鞋。他每次出门都戴帽子，那个年代男士们都如此，他的帽子总是戴得很正。“戴得十分规矩。”玛格丽特回忆说。

哈里像多数农民一样，对气候很感兴趣。“他阅读报纸上所有气象云图，还有一个抬头就能看见的气压计。”

他保留旧鞋带，一把折叠式剃刀能用两个礼拜，每次刮胡子之前都将刀刃在手掌上磨一磨。有意思的是，尽管他在农庄呆过多年，熟悉各种工具和活计，家里修修补补的事他却从来不干，既不修草坪也不管搭屏风。毋庸置疑，这是他岳母的意思。那些活是男仆干的。

“那根本不像是杜鲁门的家。”休·奥格登回忆说，“而彻头彻尾地是华莱士夫人的家。很显然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

玛格丽特另一位幼年时的朋友玛丽·肖记得她父母曾说：“哈里怎么能忍受的了呢？”

多年后玛格丽特对一位参观那幢房子的人坦白他说：“当时的确挺难为

我父亲的。你知道，我父亲在家时既安静又温和。他与家人相处融洽，我是说，他不得不那样做……因为他爱我妈妈，而我妈妈愿意住在这里。”

每天破晓前，在别人还没起来的时候，整个房子都属于哈里。他阅读报纸，包括他喜欢的漫画，尤其是安迪·冈普（人们告诉他作为县法官可以任意挑选汽车执照的号码，他便选中了369号，因为那是安迪·冈普的车号。只要有人问及个中缘由，他便乐此不疲地加以解释）。

晚上他便埋头于书籍之中，而且全神贯注。“他看书时你可以跟他说话，但别指望他会理睬你。”在玛格丽特的记忆中，她父亲静静坐在家里时手里从没有没书的时候。

哈里加入了许多组织。除了共济会、美国军团和海外战争老兵联谊会之外，他还参加了国际相识联盟、麋鹿会及鹰会。每个星期一晚上他都去城北的广场，在农商银行楼上的一间密室里打扑克。牌友仍是过去的老朋友，有几个是部队的战友如埃德加·欣德及已成为市长的杂货商罗杰·塞门。他们自诩为独立城风琴协会或竖琴俱乐部，因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曾在当地电影院的一次比赛中演奏风琴（或称法国竖琴），虽演技极差情感却奔放洋溢。扑克的赌金以10美分为限。他们不顾禁酒法喝一点啤酒和威士忌，牌桌上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政治。这便是3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最严重时哈里·杜鲁门法官的社交生活，当时呵道夫·希特勒的政权正如日中天，日本已入侵了满洲里。

哈里去农庄探望他母亲和妹妹时虽然心情还很愉快，但已无意再在乡村定居。他喜欢城市。“他喜欢步行去县政府广场。”玛格丽特说，“他愿意与人打交道……喜欢与人们在一起和他们交谈……”

这座城镇在许多方面依旧保留着他儿时的面貌。农民们还是每星期六晚上汇集到广场，但平时夜里却很宁静，间或能听到过往的火车声和县府大楼的钟声。玛格丽特·费尔普斯和蒂利·布朗还分别在中学教历史和英语。在城镇电话簿里还能看到早期定居者的名字——博格斯、戴利、阿戴尔、麦克莱兰、奇利斯、希克曼、霍尔姆斯、福特、戴纹彼特、麦克弗森、曼、皮科克、香克，自然还少不了杜鲁门、华莱士和诺兰。哈里几乎对所有家族的历史都耳熟能详——诚然做到这一点是很明智的，但他同时也热爱这座城镇。

他对贝丝的情感笃挚如初。他出差或夏季住在军营时，几乎天天给她写信。1930年夏天他从堪萨斯的赖利要塞发出一封信，信中说他简直不知他们婚前他身边没有她时他是怎么过来的。“想想那些虚度的岁月……”

另一年夏天他从明尼苏达州的里普利驻地写信问玛格丽特：“你练习音乐了吗？”圣诞节时他破费了一笔钱，为她买了一台小型斯坦威牌钢琴，玛格丽特虽很惊讶但并不领情，因为她梦想要一个电子火车。“我希望你毫不犹豫地弹奏那些练习。如果你能做到，我回去时就教你识低音谱。”

早在1930年时人们就传说哈里·杜鲁门可能是州长的人选，这一前景令他十分喜悦。“你可能将成为密苏里的第一夫人。”他对贝丝说。无论他内心承受着什么样的痛楚，也无论多少清晨几乎令他感到绝望，归根到底他还是热衷于政治。他为他所建造的道路和新落成的堪萨斯城市府大楼以及他所成就和希冀成就的一切而感到自豪。独立城政府大楼正在施工中，他把它看成自己的大楼，而且这项工程得到人们的首肯。“自从杰克逊县建成以来，”《考察家》报的萨瑟恩上校写道，“众多与此县名人安德鲁·杰克逊拥有同样不屈不挠之勇气的人们一直住在这‘密苏里的花锦之地’。他们的眼光一

直展望着这片伟大土地的伟大未来，心中所想的唯有建造，期冀把它建成令全州都为之骄傲的县。”

然而给哈里带来更大满足的是他为普通百姓所做的一切，不需大吹大擂，也无须在史书中加以炫耀，这些事只有他参政才能办到。几年后，哈里在纽约与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共进午餐，其间他提到作为密苏里的一位县法官，他发现由于法律上的漏洞，不少人无能力或不愿意赡养家中老人和给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因而数以百计的老人便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而他通过调查恢复了这些老人的权益和自由。他说他从此事中获得莫大的满足感。

“他喜欢政治，”泰德·马克斯回忆说，“他奋斗不息直到达到一个目标为止。我想无论他干什么，他都全力以赴。他热爱他的工作并付出最大的努力……”

哈里快接近不惑之年时才找到他真正的工作。但正如埃塞尔·诺兰所说的，难道他一直不都是个大器晚成者吗？“他35岁才结婚……凡事他都起点很晚。”他自然而然地步入了政界。埃塞尔说：“尔后他便朝着政治目标迈进。”

六、彭德格斯特的参议员

顺境中朋友无足轻重，真情只能在逆境中显现。

——哈里·杜鲁门

1

弗朗西斯·M·威尔逊是个脸长雀斑、思想守旧的密苏里树桩演说家，乡下的选民都管他叫普拉特的红头啄木鸟。他能迷住乡下人的手法是善长用诗一样的语言赞美他们可爱的州内的自然美景。他性情乐天，64岁时已练就出一副政治家的风采，1932年彭德格斯特选中他当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时已排在全国候选人名单的榜首——因而威尔逊期待着一场选举。

威尔逊的选举地址虽仍是位于郊区的普拉特县，他的家却在堪萨斯城东林伍德大街一座无电梯公寓的4层。1932年10月凌晨太阳升起之前（当时离选举还差3周），他对妻子艾达说他身体不适。只有艾达和他几位要好的朋友知道他患有严重的溃疡。艾达立即打电话给弗朗西斯当内科大夫的兄弟R·P·威尔逊，后者带着他妻子及儿子在天蒙蒙亮时赶到。

弗朗西斯·M·威尔逊于6点钟作古。当有人提出给承办丧葬的人打电话时，艾达不同意。办丧葬的人一旦知道，消息就会传开。她说应用电话通知汤姆·彭德格斯特。

威尔逊大夫挂了电话，只说让彭德格斯特立即来一趟。7点钟彭德格斯特爬上4层楼梯气喘吁吁地赶到。威尔逊医生的儿子赶去开门。他后来叙述说：“彭德格斯特先生对于前前后后怎么回事一概不问，只是问：“你们通知丧葬承办人了吗？””当告之还没有时，他问他们希望让谁在选举中顶替威尔逊。弗朗西斯的家人说应该让县巡回审判法官和他们的邻居盖伊·B·帕克出马。彭德格斯特听后回答说：“从哪钻出来一位盖伊·帕克？”又商量了一会儿后，一直站着的彭德格斯特说他得马上离开，并让他们在他打电话来之前暂将此事保密。

他们等了将近4个小时，弗朗西斯·威尔逊的尸体就停放在隔壁房间。11点钟彭德格斯的电话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话：“通知殡仪馆。”

于是一头白发、不苟言笑的盖伊·B·帕克入主州长官邸，哈里·杜鲁门未能如愿。

在彭德格斯特选中弗朗西斯·威尔逊之前，哈里·杜鲁门就极渴望成为州长候选人。一些朋友和几家报纸的褒扬之词都称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州最高行政长官，使他备受鼓舞，因而在遭到彭德格斯特的拒绝后他大失所望。接着，10月12日下午传来了令人震惊的威尔逊病逝的消息，当时哈里正和3.5万人在郊外的野餐会上庆祝公路网的建成，据说那是杰克逊县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野餐会。哈里不无苦涩地回忆说：“那是我得意的一天。”

显然他不失时机地又与彭德格斯特取得了联系，不料再次被告之选中的不是他，而是盖伊·帕克。那天晚上，哈里驾车开到河北的避暑小镇木丝泉，住进了一家旅馆，在一间屋里关了好几天。哈里对自己前途的焦虑由来已久，令他备受煎熬。由于他已在县政府连任两期，已无再次竞选县法官的资格，而且与其他担任公职的人不同的是，他既无律师执照或保险生意赖以糊口，也没有其他个人收入。他对自己是否选择了生活中正确的道路产生了

质疑。他在一封信中劝告他侄子说：“你最好到一家银行或商业机构谋职，获取真正的经历，搞政治学无所长，而且任期一满立马就失业。”哈里·杜鲁门的任期到1934年满后，他将满50周岁，若得不到彭德格斯特的首肯，无论怀抱何等抱负，他的政治生命将几近终结。诚如他自己说的，“只有大老板信任我”……才会有好的转机。

前一年6月，他曾随彭德格斯特前往芝加哥，作为密苏里州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参加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彭德格斯特表示支持美国参议员詹姆斯·里德，此人来自密苏里，在市参议员吉姆时代以堪萨斯城市长身份登上政治生涯。里德是个聪明的利己主义者，他是参议院中对国际联盟议案投否决票的“9个固执的人”之一，因此哈里对他没有好感。彭德格斯特的热情主要是博得里德欢心的一种假象。实际上他是在玩弄不为哈里所熟悉的一种复杂的新花招。哈里后来说，彭德格斯特“对政治风云洞察秋毫，其纵横捭阖的本事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

大会召开前彭德格斯特曾专门去了趟奥尔巴尼与罗斯福会晤。罗斯福的颇具影响力的政治顾问詹姆斯·A·法利也曾在米尔巴哈饭店的一次午餐上受到堪萨斯城组织的隆重款待。事实上，此时彭德格斯特对罗斯福的热情比1924年还高。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灯光辉煌的芝加哥体育馆里做出支持里德的姿态，厌恶里德的哈里出于无奈，只好也装出赞同里德的样子以表他的忠心。紧接着大老板就让选票投向罗斯福，一丝不差地按詹姆斯·法利所希望的一次投一少部分，使支持罗斯福的票数稳步上升。最后，彭德格斯特、哈里及杰克逊县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返回家乡时都对选举结果极为满意。

1933年春季，哈里感到他受到的恩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昨天与彭德格斯特愉快地谈了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贝丝，“我还是他最中意的人。他让我在县里雇人方面按着我的意图办……他说整个组织都支持我。他还说我或许能当众议员或税收官，让我考虑考虑。”

汤姆·彭德格斯特的权力可谓已跃居全国政治老板之首，至少和他们平起平坐。政治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组织中任何一位有能力的人都将有望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1930年，即哈里再次当选首席法官的那年，彭德格斯特说服约瑟夫·香农让他进入国会，从而使历时悠久、令人烦恼的羊派兔派之争得以化解。白发苍苍油嘴滑舌的香农被一脚踢到了华盛顿，他在众议院连任6期，以鼓吹往日托马斯·杰斐逊的信念而著称。只有经历了几十年羊兔之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对这位大老板来说这是个多么辉煌的胜利，而且赢得如此轻松。

1931年，堪萨斯城获得了指挥其警察的“自治权”，在此之前则一直受州政府的管辖。故而从实际意义上讲，警察部门如今被置于组织的控制之下。

1932年，密苏里州议会没有按照国会的要求建立新的众议员选区，结果每一位众议院的候选人都须经过全州而不是选区的选举。这使彭德格斯特的权力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大杰克逊县的选票——即彭德格斯特的选票——对州内各地的众议员选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彭德格斯特不仅能任命他自己的州长，还能为国会指派13名众议员。那年秋天他只经受了一次失意：东密苏里州的贝内特·钱普·克拉克公然对抗堪萨斯城组织，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参议院活动，并以胜利告终（这位贝内特·克拉克就是密苏里州大名鼎鼎的钱普·克拉克之子，他曾在法国的一个火车站跟哈里·杜鲁门开了个大玩笑，让后者相信敌人的空袭已迫在眉睫）。因而在1933年初，

由帕克坐镇州长，彭德格斯特的权力炙手可热。杰斐逊城的议会已被人们称作“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于罗斯福和他推行的新政在华盛顿占据上风，前景便呈现出一派灿烂辉煌。在梅恩街 1908 号的小办公室里，彭德格斯特写字台的上方推崇备至地挂起一幅罗斯福的肖像。

即使是在大萧条的低谷期，堪萨斯城也呈现出一派建造浪潮方兴未艾的景象。密苏里州最高的摩天大厦——34 层的电力光源大楼——像一幢闪亮的信念象征物矗立在城中。哈里·杜鲁门每天早上驾车从车道开上范霍恩大道朝城里开去时，就能看见这栋标志着进步的大厦骄傲地从地平线上升起。

一座造价 300 万美元的纳尔逊美术馆正在施工中。作为堪萨斯城 10 年计划一部分的富丽堂皇的市政礼堂将占据整整一个街区，里面没有一个可容纳 1.2 万人的戏院和一座音乐厅。10 年计划还包括一座新公安大楼、一个新供水系统和一座新公共市场。离杜鲁门法官的高耸入云的政府大楼几街区之外便是面积更大的市政厅。

与其他城市相比，堪萨斯城的面貌自信而奢华。就业机会颇多，大多数工作都是由当地政府，即组织提供的。在市行政官亨利·麦克尔罗伊的领导下，几千人挥舞着锄头和铁锹，将重型机械弃置一旁不使，从而更多的人可以就业（麦克尔罗伊后来声称新政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就是在堪萨斯城人人就业计划的启发下设立的）。一项看似永无止境的工程是用彭德格斯特公司的预拌混凝土铺设带有厚实地基的一望无际的灌丛港。

大萧条初期，杜鲁门法官的周围围满了申请工作的人，但与彭德格斯特相比他是小巫见大巫。多数工作日期间，坐落在梅恩街的那栋黄砖楼前的队伍黎明前就开始排起，九十点钟时已达二三个街区之长。彭德格斯特以不管是谁先到先见的原则尽可能多地会见人们，会见至多不超过几分钟，从早上 9 点开始，中午他吃午饭时间准时结束，绝少有人空手而归。彭德格斯特始终彬彬有礼，认真听着，问几个问题，然后在一张纸头上划拉几笔，央求某城某县的组织或他自己的一家企业的某人考虑持有纸条者的需求，他将“不胜感激”。这最后几个字不啻于他的命令。实际能否找着工作与他使用铅笔的颜色有关。如果纸条是用红笔写的，他的“不胜感激”意味着必须立即给申请人一份工作或恩惠。如果大老板使的是蓝笔，说明一有机会时可以考虑此人。倘若纸条上的字用的是普通颜色铅笔，对当事人就不必太介意。

当一位记者问彭德格斯特他们是否要求就业人在选举时投组条件。”

哈里很愿意讲述某一天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排队想见彭德格斯特的人格外多，于是他的看门人马瑟斯“船长”出来说，队列中凡有哪一位有什么东西送给汤姆者，可以直接进去，然而没有一个人响应。

彭德格斯特鼓吹的、政治主要为结交朋友的一贯政策是不分种族、宗教信仰或肤色的。民主党员仅是一名民主党员而已。宽容是最好的策略。虽然在减轻苦苦挣扎的黑人选区的贫困方面做出的努力甚微，黑人却将彭德格斯特组织的态度看成是一种进步。正如一个黑人回忆时说的：“组织主要施点小恩小惠，但这总比一点恩惠都没有强。”

商人对该组织及其老板无甚怨言。税率很低，只需打一两个电话，找彭德格斯特或年轻的吉姆说两句，拖拉的办事程序就奇迹般地迎刃而解，项目便可进行。生意人发现对于重要问题他们可以得到迅速可靠的答复，与城市有关的问题能以惊人的速度加以处理。人们对汤姆·彭德格斯特最多的评论是“他是个办事的人”。

甚至《明星报》的编辑们当时对市行政官麦克尔罗伊的领导能力也表示深深的佩服，但这一判断后来使他们终生后悔。1930年《明星报》说，堪萨斯城“的市政府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首席法官杜鲁门经常被引为模范官员。

其他一些人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尊重。后来有时人们暗示说，哈里·杜鲁门并非是一群恶棍中唯一一位出污泥而不染者。吉姆·彭德格斯特诚实能干，而且根据他的牧师阿瑟·泰伊阁下的回忆，“具有一名政治家难得的温柔性格”。汤姆·彭德格斯特的朋友兼顾问、县民主党委员会主席詹姆斯·P·艾尔沃德律师精明肯干，在堪萨斯城知识分子圈里备受尊敬。

连彭德格斯特本人当时在外表上也更侧重于绅士派风度，他在过去是不大留意修饰的。此时他开始穿着款式保守做工考究的西服。他携同妻子去了趟巴黎，此后便毫不掩饰地大谈特谈巴黎的迷人之处。他的朋友们知道他喜爱上了法国烹饪。他的新家是他法国看到的一所房子的原原本本的复制，坐落在乡村俱乐部区的沃德花园街，那里是堪萨斯城最漂亮的住宅区。房子是一幢摄政风格的红砖砌就的府邸，每一个细部都完美无缺。

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禁酒法于1933年12月废除，彭德格斯特家族遂又做起了合法经营烈酒的生意。他们最好的牌子是“老1889”，以汤姆初到堪萨斯城那年命的名。此酒是存放7年半的肯塔基威士忌，强度标准为100。

赌博、嫖娼、非法卖运酒、贩卖麻醉剂和敲诈勒索是尽人皆知的堪萨斯城热门生意。谁也不怀疑这些活动的幕后总老板就是汤姆·彭德格斯特。当时是彭德格斯特的鼎盛时期。即使是南北战争后的媚俗时代，该城也没对非法活动如此“大开绿灯”。城里开着40家舞厅，100多家夜总会，提供舞蹈、喜剧、夜总会表演及全美顶尖的布鲁斯和爵士乐音乐。里诺有本尼·莫顿乐队；之后贝西伯爵和他的堪萨斯城七人组也在里诺演唱“一点钟跳跃”；萨布威有小号手霍特·利普斯·佩奇；黄色战线酒吧则有布鲁斯歌手朱莉娅·李，全国所有的歌手乐手都涌到了堪萨斯城，他们中大部分都是黑人，经济危机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便来到这遍地都是工作机会的地方。他们中的一位回忆说：“每个酒馆里都有音乐，每个酒馆。”

堪萨斯城地处美国心脏地带，但与其近邻独立城形成鲜明对照，后者依旧保持着古老的乡村城镇的宁静。

1932年春天，音乐球乐队在《明星报》上登的一句广告词是：“跳个通宵！”这支乐队在劳动庙夜总会表演，同一地点还有本尼·莫顿、安迪·柯克和他的欢乐之云乐队、沃尔特·佩奇和他的蓝鬼乐队、夜鹰乐队，总共是8支乐队每天演奏到日出为止。

娱乐场所昼夜营业，在18和瓦因大街上的萨布威夜总会的地下室里，30至40个音乐家“挤在一起”演奏。“谁愿意演就演……每晚你都能在那儿听到音乐……其实它在（凌晨）1点钟才正式开门。”贝西伯爵回顾说，“那是个穷苦白人的城镇，却活得快活。”13和14大街的红灯区连亘几个街区之长。其中档次高的切斯特菲尔德俱乐部雇用只穿高跟鞋和玻璃纸短裙的女服务员为商人们提供餐饮。约翰·杜汉在堪萨斯城住了一辈子，他后来曾试着描绘该城那段声色犬马的时期，但总是写着写着就得停笔，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描述挂一而漏万。“……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法律可言。”杜汉说。他在《明星报》的研究资料中心任职，职责是记录堪萨斯城的发展史。

夜总会开个通宵，烈酒消费势头凶猛。每处都有一支乐队……赌场遍布，甚至《明星报》四周都有（在格兰德和 17 大街）。……东北角有赛马登记处和赌场。东南角也有登记赛马的和赌场。《明星报》北边隔两个门脸儿就有两家酒馆可以登记赌马。你要是去梅恩街……31 大街和普劳斯帕克特大街之间、34 大街和梅恩街都有赌窟……

赌场……卖淫——肆无忌惮。花上 2 毛 5 或 5 毛钱，敲敲窗子就能进的色情场所比比皆是。

每当问及这些，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回答永远是：“有钱人有他们的俱乐部，可以去那儿赌博和享乐。难道你能剥夺穷人同样的权利么？”

彭德格斯特曾反复强调他说：“我们的城市漂亮、干净，秩序井然。”约翰·杜汉也记得几乎没有暴力的恐怖。

我得说这座城市相当安全，根本没有打劫的事发生。你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城里走，去黑人区也没有危险。我是说……你知道，犯罪现象极少。但到处都是坑蒙拐骗。

其他一些体面和受尊重的公民们私下里也承认对非法活动取缔不严对生意有好处，尤其是在萧条时期。

非法职业的头目叫约翰尼·拉齐亚，汤姆·彭德格斯特称他是自己的“副官”。此人个头不高，西服革履，是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他有司仪般的魅力性格，曾因持枪抢劫蹲过大狱。1926 年，他从彭德格斯特手下人迈克·罗斯手中夺下第 9 选区的权力，一跃而成为小意大利之王。汤姆·彭德格斯特不得不把他吸收进组织，主要是出于无奈，也显然是认识到他可以利用拉齐亚阻止艾尔·卡彭和其他城外的歹徒进城。“我们的约翰尼”依赖手中的权力和他的魅力，不久就和汤姆老板成了“哥儿们”。更重要的是，当时彭德格斯特赌马如命，经常需要这样的“哥儿们”。他在梅恩街 1908 号安装了连接东部跑马场的电话线，甚至在俱乐部聚会室的里间还设立了赌房。在密苏里河对岸的普拉特县，他修建了自己的跑马场——河畔花园赛马俱乐部，并在那里设立了马厩。

汤姆为了回报拉齐亚在第 9 选区对自己的支持，允许拉齐亚控制城内的酒业和赌场，并在警察局拥有制定雇人政策的权力。据说他在警察局甚至还有一间办公室。一位被派遣调查拉齐亚活动的联邦特工人员向华盛顿汇报说，当他把电话挂到堪萨斯城警察总部时，接电话的竟是拉齐亚。

拉齐亚亦懂得如何为朋友两肋插刀。前参议员詹姆斯·里德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内尔·唐纳利 1931 年被绑架后，里德立即求助于拉齐亚，后者便把唐纳利安全地送回了家。两年后的 1933 年，市行政官麦克尔罗伊的打扮入时的 25 岁女儿玛丽被绑架，出面救驾的又是“我们的约翰尼”，这次他以闪电般的速度从朋友和赌客手中凑齐了 3 万块钱赎金，送到绑架者手中。

面对这样的现实，提出抗议的只有一个勇敢的人，他就是博奈杰胡达教堂的犹太教教士塞缪尔·S·迈耶伯格。1932 年春天，他决定在一个政府研究俱乐部里提出他的看法，那个俱乐部由 40 来人组成，绝大多数是妇女。自那之后便开始了一场改革运动，尽管组织中似乎无人特别感兴趣，而且虔诚

的百姓中也没人踊跃加入他的行列。“使我最棘手的不光是反抗黑社会，”迈耶伯格后来说，“而是花精力和时间劝说那些优秀诚实的人们……作为受尊重的公民，他们也应该投身于此（反抗黑社会的斗争）”。

1933年，联邦调查人员因拉齐亚偷漏个人所得税而对他起诉，汤姆·彭德格斯特立即写信给在华盛顿的新上任的邮政部长、罗斯福的心腹吉姆·法利，强调拉齐亚对他是多么的重要。“吉姆”，他写道，“拉齐亚是我的左右手，无论你现在或将来为我做什么事，都不会超过我对他人身安全的真心关注……”

接着几周后，便传来了令人发指的堪萨斯城“联邦车站屠杀”事件，那是整个歹徒时代最耸人听闻的暴行之一。1933年6月17日星期六，3名臭名昭著的银行抢劫者和杀手维恩·米勒、亚当·里奇蒂和“漂亮小伙儿”弗洛依德手持半自动步枪，企图搭救另一个“公众敌人”弗兰克（“杰利”）·纳什。当时执行人员正押着戴着手铐的纳什从一辆列车朝停在联邦车站的一辆小轿车走去，打算驾车开往利纹沃思的联邦监狱。埋伏在车站外停车场的3名杀手趁警察把纳什往车里推时开了火。一名警察转身开了一枪。3名歹徒用机枪扫射，打死5人——两名堪萨斯城警察、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一名俄克拉何马州的警长和纳什。尔后杀人犯便逃之夭夭。尽管这3人明里与堪萨斯城没有任何关系，可当地一个叫迈克尔·詹姆斯·拉卡普拉（“吉米·尼德尔斯”）的敲诈勒索者后来作证说，安排他们3人安全出城的是约翰尼·拉齐亚。毋庸置疑，拉齐亚成了堪萨斯城里人们谈论最多的人物，其名声比汤姆·彭德格斯特的都大。

哈里·杜鲁门的宦途漫长而多舛，但个别日子却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1933年9月5日星期二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尽管他当日正处在一个艰难和不稳定的时期。

9月5日星期二是新建的坐落在独立城的造价20万美元的县政府办公大楼——自1836年以来所谓的第5次“翻修”——落成的日子，为此从清晨到晚上举行了庆典仪式活动。活动包括掷马蹄铁比赛、小提琴比赛、黑人舞蹈比赛、7支行进乐队和鼓队演奏的音乐、泳装选美比赛、马术表演、街头舞蹈、当地商人的彩车游行和具有历史意义的露天庆典。正式仪式是以政府大楼那座四钟面古钟时间下午2点开始的（古钟也重新进行了擦拭并被安置在一个殖民地风格的圆顶钟阁里），内容包括帕克州长和哈里·S·杜鲁门法官的讲话。

当天温暖宜人，阳光明媚，人人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简朴破旧的维多利亚式的政府大楼被改造成了一幢更大更宽敞、风格约略类似费城的独立大厅的建筑物，虽然其设计师（即哈里的小舅子弗雷德·华莱士）在当天《考察家》报的专刊号上说带圆柱的南北门廊的灵感是他受到了古希腊“风神殿”的启发。

新建筑与从前的形式大相径庭，其粉色砖墙、带圆柱的门廊、圆屋顶和擦洗过的大钟以及大理石前厅，看上去更加整洁规范。所有的人都认为政府大楼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是那些在里面工作的人，此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正从楼上敞开的窗子朝下观看着杜鲁门法官，后者身穿白色西服，正站在讲台上发表简短应景的讲话。《考察家》报称政府大楼“气派、宽敞、对称”，并大肆夸赞使这幢大楼成为现实的人的领导才能。

这家报纸说：“作为首席法官，哈里·S·杜鲁门在其6年半的任职期间，

与政府的同僚们通力合作，干出了几件非同小可、在本县历史上必然会彪炳千古的大事。”接着文章便列出了“几项”：通过发行两次债券而建造的造价 1000 万美元的公路桥梁网；杰克逊县老幼病残养老院内的一所现代化医院；坐落在县农场的黑人少女收容所；估价 400 万美元的新建堪萨斯城政府办公楼以及此幢造价 20 万美元的坐落在独立城的政府大楼。此乃县史上破记录的成就。

在对杰克逊县热心服务的这些年期间（《考察家》报的话锋又转到杜鲁门法官身上），哈里还抽出时间出任全美古老小道协会主席，至今他仍担任着这一职位。他的名声在密苏里已闻名遐迩，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迟早他将成为州长……

但在杜鲁门法官自己看来，他的前途依旧是个难解的谜，是他一块心病。

1933 年秋末，罗斯福政府指派一名共和党党员出任密苏里州联邦重新就业局主任，令汤姆·彭德格斯特大为震怒，他向华盛顿发了通牢骚，结果共和党党员主任旋即便解聘，由杜鲁门法官接替了他的职务。哈里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愿放弃县政府的职位，于是同意无报酬兼任新的联邦政府的职务。他舍弃了每月 300 美元的薪水，开始一周两次驾车横跨半个州去杰斐逊城的联邦机构上下班。他的职责是将失业的劳工输送给承包了联邦公共设施工程的承包商们，根据他在县工程中积累的经验，他对这一工作胜任愉快。长距离开车还给他以足够的时间思考未来。

哈里的业绩又一次为彭德格斯特脸上贴了金。不出几个月，《密苏里民主党人》（组织所办的一家报纸）报道说，新实施的联邦（民主党）计划使 10 万男性和近 1 万女性在州内就业。

哈里的顶头上司是罗斯福手下负责公共设施的官员哈里·霍普金斯，为此哈里经常为政府事宜赴华盛顿出差，这是他过去从未有过的经历。哈里最后终于考虑成熟，他将违背妻子的意愿参与国会竞选，他妻子更倾向于收入高有安全感的税收员的职位，此外她不愿离开独立城。哈里对她说，在国会里他将有“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权力”。

但当他去见汤姆·彭德格斯特时，后者说他已不会再有这种机会。彭德格斯特选择了另一个人，一个叫贾斯珀·贝尔的巡回审判法官（此人在初选和 11 月的大选时都将轻易取胜，在国会将连任 6 届）。哈里万般沮丧，发现自己再度遭到冷落，用他的话说是“被挤对出来”。

几周过去了，不再有新的消息，他也没被告之别的的机会，于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灭。

然而在 1934 年 5 月初，事态在没有任何前兆下发生了突变。哈里在密苏里州的华沙进行巡回演讲时，接到吉姆·彭德格斯特打来的电话，说立即要见他一面，地点是塞达利亚的博思韦尔饭店，有要事相告。

开车到塞达利亚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除了彭德格斯特之外还有吉姆·艾尔沃德，他们 3 人在饭店大堂的一角找了 3 把椅子坐下来。哈里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被告之开了个会，汤姆·彭德格斯特想让他竞选进美国参议院。哈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愕得哑口无言。“老板 95% 支持你，”艾尔沃德安慰他说。

“剩下的 5% 是怎么回事？”杜鲁门问。

“哦，你明白我的意思，”艾尔沃德说，“老板支持你。”

他需要时间考虑，杜鲁门说。他们对他说他必须为了党的利益参加竞选，于是此事显然就成了定局。哈里同意竞选但他说他一贫如洗。过了一两天，艾尔沃德和吉姆·彭德格斯特一人给了他 500 美元作为开始的经费。

哈里不久就获悉，他是汤姆·彭德格斯特的竞选参议院名单中的最后一个。彭德格斯特先问了 3 个人，结果都给了他否定的答复。率先问的是吉姆·里德，主要是出于礼貌（《纽约时报》曾预计里德将是入选）。里德拒绝了彭德格斯特之后，后者又去问约瑟夫·香农，香农直言不讳地说他不赞成新政，并说他这把年纪只宜呆在家里。第 3 名也是最认真的人选是艾尔沃德，人们都一致认为他会是一个实力派候选人，一旦当选也会成为一名一流的参议员。几家报纸亦曾屡次提到他的名字，称其为可能性最大的人选。但艾尔沃德对彭德格斯特说他没有定居在华盛顿的渴望，他也不想放弃家人和离开他的律师职业。

尔后又考虑了其他几个人，当吉姆·彭德格斯特提到哈里·杜鲁门时，任何人直到那一刻都没有想到过他。艾尔沃德热情地同意哈里，汤姆·彭德格斯特却狐疑不定。“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你真地认为杜鲁门能被选进美国的参议院？”艾尔沃德记得彭德格斯特大声说。但在艾尔沃德和吉姆的一再坚持下，汤姆·彭德格斯特终于同意。

当问及约瑟夫·香农的意见时，他说他认为汤姆·彭德格斯特的最初反应很正常。香农觉得杜鲁门“太嫩了”。“一个很招人喜欢的人，”香农后来对记者说，“而且他廉洁……但另一方面……我想他当参议员还不够老练，想象不出他能打进国会……”但香农又补充说：“汤姆也没有出类拔萃的阵容供他挑选。”

1934 年 5 月 14 日宣布了杜鲁门候选人的提名。那天破晓前，他单身一人在匹克威克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写下了下面的一段文字：

明天，其实是今天，现在已是凌晨 4 点，我将把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公布于世。我如今所占据的职位是所有人希望在我这个年龄想获得的，两个礼拜前我还在想，我的前途不过是领取一份小县官的养老金退休而已。

2

密苏里州占地 7 万平方英里，比新英格兰地区还大。1934 年的人口是 370 万，其中 1/3 的 100 万人集中在堪萨斯城和圣路易斯，这两座最大的城坐落在州内的西边和东边，相距 260 英里。

地貌相差极大，东南沿密西西比河的“靴子根儿”地带是淤积土层棉花地；中南部是崎岖的奥扎克山丘；沿堪萨斯城一带则是大平原的农田。州内有十几条纵横交错的铁路，六七条从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飞进飞出的航线，小一些的城市如圣约瑟夫、斯普林菲尔德和乔普林均有租赁飞机业务。但 1934 年夏天，密苏里的民主党主要是依靠轿车展开争夺国会席位的初选活动的。候选人、竞选班子及几百名工作人员开车驾驶几千英里，分散到州内各地。虽然连接堪萨斯城和圣路易斯的 40 号公路和路经杰斐逊城的 50 号公路——是最快和最常走的路线，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全州 114 个县选票，几乎跑遍了州内所有的水泥路和土路，能做到此绝非易事，因为 1934 年夏天密苏里的高温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高速公路上的热浪令人晕眩，酷似沙漠上的海市蜃楼。吉姆·彭德格斯特在写给他妻子凯瑟琳·彭德格斯特的一封信中说：“昨天华氏 104 度，今天 102 度。”自从哈里·杜鲁门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以后，吉姆一直就没着家，如他所说的“忙得东颠西跑”。吉姆·彭德格斯特和吉姆·艾尔沃德先开车到杰斐逊城，以确保盖伊·B·帕克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并拉拢同帕克州长一样在就业上都欠堪萨斯城组织一份情的为数庞大的州府工作人员。同时堪萨斯城还派出 50 来人，让他们返回各自的出生县或城镇鼓动人们支持杜鲁门法官。吉姆接下来的任务是劝说当地各家报纸。由于酷暑难熬，他非常渴望下一场大雨刷洗炎热的天空。但整个 7 月里，华氏 100 或 100 度以上的高温持续了 21 天。唯有哈里·杜鲁门对炎热无动于衷，他这一特性后来又曾屡次引起人们的注意。

负责竞选活动的是现任州委员会主席艾尔沃德，在哥伦比亚召开的首次推出杜鲁门的集会竞选的典型例子，被称作“堪萨斯城占领哥伦比亚”。县办公大楼与密苏里大学接壤，其前方的草坪那天挤满了约 4000 来人。除了从堪萨斯城来了好几大轿子车的人之外，从杰斐逊城也派来了许多人，据说都是州府各个部门的职员。现场还配备了一辆传递杜鲁门法官声音的“新奇的扩音卡车”，按几家报纸的话说，那是使政治现代化的确切标志。人群喧闹，服装色彩斑斓，美国军团乐队不停地奏着乐曲，那气氛就像欢迎从战场归来的士兵。

哈里在竞选中有两名对手，来自里士满的雅各布·L·（“塔克”）米利根和圣路易斯的约翰·J·（“杰克”）科克伦，两人都是密苏里州的众议员，熟知华盛顿的路子，名声也远远大于哈里。科克伦高大随和，幽默诚实，赢的呼声最高。他是“众议员中的人精”，对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背后也有一个像彭德格斯特集团的势力替他撑腰，即所谓的圣路易斯“艾戈一迪克曼组织”。塔克·米利根的优势是受到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的支持——克拉克把米利根视作再次向汤姆·彭德格斯特挑战并在参议院为自己攫取第二个席位的一张王牌。克拉克还同他父亲一样，亦是个富于色彩和强有力的树桩演说家。

米利根和科克伦几周前就开始了他们的竞选，他俩都将攻击目标对准哈里·杜鲁门背后得到彭德格斯特势力的支持这一点上，企图将他这一明显的优势化为致命的弱点，指责他不过是一个集团的傀儡而已。他们发起攻击时，正值堪萨斯城市级选举引发暴力，致使几十人受伤，4 人死亡，从而组织的暴行再度成了耸人听闻的传闻，哈里亦成了易于攻击的目标。

此刻在哥伦比亚，哈里开始回击，他的讲话通过广播传送到全州。“我们不会忘记，米利根和科克伦先生两年前跑到堪萨斯城，为了得到代表密苏里州众议员的提名而获得过堪萨斯城组织的支持。”至于贝内特·克拉克，他只不过想拥有更大的权力，使自己成为老板。

在接下去的几天中，哈里在赛林县和布思维尔想改变他的语气和话题。他坚决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大萧条，从而表明他无保留地支持新政（“新奇的扩音卡车”车窗上挂了一幅招牌，上书“密苏里的新政”）。他讲到过去共和党人以资本主义方式控制政府，对罗斯福的决意结束“富人统治”从而给每一个美国人一次机会的决心大加赞赏。全国 90% 的财富掌握在 4% 的人口手中，他在斯普林菲尔德说。罗斯福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把货币兑换商们从圣堂中赶出来，“以使全国的普通百姓也能拥有享受美好生活的机会”。

杰斐逊、杰克逊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代表的党是“为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服务的党”。他呼吁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推行养老金和军人退役费制度。他还把他在初选时的对手称为朋友，说他说的关于他们的任何言论纯属出于政治目的。

但彭德格斯特的问题却无法摆脱。由于米利根和科克伦均强调他们全力支持罗斯福，因而彭德格斯特实际就成了唯一的争端。

7月10日星期二，哈里的竞选尚未足7天，堪萨斯城宁静的夜晚响起了机关枪声。时间是凌晨3点钟，这回的攻击目标是约翰尼·拉齐亚，他在中央花园饭店门前正要为他妻子开车门时被枪击中。两个不知名的袭击者一直在黑暗中潜伏着，拉齐亚身中8弹。“为什么是我，是朋友遍天下的约翰尼·拉齐亚？”他在医院里呻吟地问医生。根据堪萨斯城《邮报》晨版的头版通栏报道，拉齐亚接着说出了几乎是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事，通知彭德格斯特先生……我最好的朋友，告诉他我爱他。”

汤姆·彭德格斯特和市行政官麦克尔罗伊参加了在圣玫瑰经天主教堂为拉齐亚举行的葬礼，他俩在悼念者当中显得十分醒目。这场葬礼是堪萨斯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尽管高温达华氏106度。“至少有1万人围在教堂周围，挤不进去，”吉姆·彭德格斯特说，“当然不少人是看热闹的，但约翰尼的朋友的确遍天下。”

翌日晚上，在圣路易斯附近的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为表示对塔克·米利根的支持，扯下领带，松开衣领，向哈里·杜鲁门发起了前所未闻的凶猛攻讦。这是密苏里州的“扒一层皮”的政治手腕，是密苏里所热衷的风格。

仿佛我的老友哈里·S·杜鲁门法官发现辱骂我比陈述他自己的特长来得更容易（参议员缓慢地开口说）。他在哥伦比亚的开场白主要是为了攻击我。当时参加集会的几乎清一色是来自堪萨斯城的暴徒——我听说当地人还向人群里张望，看看迪林杰是不是也来了。到场的还有众多州政府职员，都是被他们的上司以不丢掉饭碗为条件逼去的，他们坐在大轿子里就像载着牲畜的卡车开往市场似的。

哈里害怕密苏里东部会有人崛起称老板。哈里·杜鲁门惧怕密苏里出现老板。不必见怪！哈里太低估了密苏里民主党人的智力，以为他们愚昧轻信，故而不厌其详地许诺说他一旦被选为参议员绝不当老板也不对别人指手画脚。上帝保佑哈里的善心——谁也没指责他是老板和想当老板，只要杰克逊县的知名人士还活着而且身体健康头脑清醒，谁也不会怀疑哈里凭他自身的资格能支配别人……根据该法官在杰克逊县所一贯表现出的奴性来看，他保证不当老板的承诺至少是毫无根据的一相情愿。

圣芒钦斯天主教堂每年都在堪萨斯城以北的克雷县举办一次大型野餐会。当3位候选人及贝内特·克拉克和盖伊·B·帕克州长莅临会场时，哈里显然处于劣势。贝内特·克拉克使观众为之深深着迷，尽管获得雷鸣般掌声的是米利根。1万人井然有序地坐着听了4个小时的政治演讲，一直到日落。一位记者写道：“政治头面人物轮番在简陋的木制讲坛上亮相，令汗流浃背的观众兴趣陡增，一直坚持到最后。”

密苏里农民协会主席威廉·赫斯加入了科克伦的竞选班子，他称杜鲁门是“汤姆·彭德格斯特听的差”。“一个彭德格斯特听的差想从县长的芝麻

官跳进美国参议院实乃天下奇闻。当我们回顾曾代表密苏里的那些伟人时，哈里的表演不仅荒唐而且滑稽透顶。”

哈里在回击时，指责米利根在政府里任人唯亲，但他最尖刻的抨击却指向贝内特·克拉克。哈里说克拉克参议员是倚仗其父的名声参加竞选的，而他的表现证明他没有一丝他父辈的遗传基因。

杜鲁门法官受到攻击时判若两人，许多认识他的人都为此而感到吃惊。“杜鲁门的工作作风极为谦逊，”圣路易斯的《环球民主党人报》的一名记者写道，“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做出决定；从不自吹自擂。他工作起来埋头苦干。但舌战时，这个平素安静的人却能发射出致命的火力……”

贝内特·克拉克说，杜鲁门的竞选活动是“虚假和愚笨”的化身，在密苏里的历史上尚属罕见。“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在明年1月从杰克逊县政府退下来后能在县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哈里的意图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也许哈里·杜鲁门受到了高温的影响，克拉克猜测，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不具备撒这种谎的恶毒和创造力。克拉克进一步指责说，为杜鲁门竞选摇旗呐喊的州政府职员共有七八千人，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但，上帝，这正是彭德格斯特的做派。

彭德格斯特到底是懂得如何往政客脸上抹黑的老手，他将一名记者请到他的办公室，在友好和轻松的谈话中他说：“怪了，克拉克参议员是我的朋友，前两天他还来这儿了呢。”

杰克·科克伦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想把辩论拉到一个严肃的档次。他说毁谤中伤是繁荣时期的奢侈品，不应在经济状况如此糟糕和许多人处于贫困时滥用。哈里·杜鲁门在杰斐逊城议会前的一次演讲中也谈到他在走访乡村时亲眼所见带给他的悲伤。

农作物价格自柯立芝政府之后不断下跌，每况愈下。鸡蛋过去1打卖25美分，如今5美分一打。1930年以来，已有1.8万座农场被剥夺了抵押赎回权。窗子堵上木板、栅栏倒坍的被遗弃的房屋比比皆是。佃农们住的是只有两个房间、地板露着土、墙壁糊着旧报纸的棚子。1934年夏天田地的景象和农民脸上的表情凄凉悲戚。毫无疑问，哈里·杜鲁门从未见过这么令人心酸的情景。当时是大萧条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西部平原的沙漠风暴天天见报的年头。无雨而异常炎热的天气持续不断，致使密苏里的庄稼全部枯萎。《圣路易斯邮报》登载的一篇社论用《圣经》的口气描绘了这场悲剧：“在无情的夏季毒日头下，田地做痛苦呻吟，庄稼干枯，牲畜死亡，干旱低沉单调地哼着仇恨的赞美诗时，河流遂变成干涸的疮疤。”

杜鲁门在一次演讲中说，形势变得“如此之糟，每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都焦虑地想缓解其恶化的进程。”

他让自己以一个通情达理的乡村人的形象出现。他是来自格兰德维厄的一个老实的浸礼会农民并不断讥笑他的对手是“城市农民”。他的外表也很相符，脸色由于长时期日晒而黝黑，体格精瘦健康，诚如一则报道说的“修壮如牛”。他已满50，白发已丛生，但看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总是面带笑容——一种大政治家的微笑，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显得更白，两眼在金丝镜片的后面熠熠闪光。约瑟夫·香农觉得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笑得过多。

一天烈日当空，哈里在靠近密苏里州墨西哥镇的公路上看见一个农民在田地里怎么也修不好收割扎束机，于是他停下车，跳进篱笆，报了自家的姓

名便脱去外衣，“开始顶着烈日为他新认识的朋友鼓捣起扎束机来”。当地报纸报道了此事，对他赢得农民的好感大有裨益。

杜鲁门和科克伦都力争拉拢乡村的选票，深知它将决定选举的结果。两者若没有大城市的政治集团做后盾都无获胜的指望，但如果科克伦在圣路易斯的选票数量与杜鲁门在堪萨斯城的选票数量持平，那么鹿死谁手将由农民们来定夺。吉姆·彭德格斯特担心农民们对是否能降雨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政治的兴趣。

6周的时间里，候选人杜鲁门驾车通过高速公路和羊肠小道跑遍了密苏里大部分地区，他“走访”各个县城，与当地人们握手，114个县城中他露过面的超出了一半强。这是个马不停蹄、头顶烈日、累得精疲力竭和口干舌燥的差使，但哈里却乐此不疲。他一贯喜欢在路上跑。“其实我喜欢公路，”他常说，“我愿意跑来跑去……”他对记者说他仿佛觉得像在休假，他的气色看上去确实不错。

哈里又像过去察看各地的县政府办公大楼似的，身边始终由弗雷德·坎菲尔陪着，后者庞大而唬人的形象令许多人对哈里的做法大惑不解。倘若人以群分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标准，杜鲁门法官为何非要选择这样一个伴侣呢？但坎菲尔工作卖力，乐于像从前似的一天工作10至15个钟头。此外哈里觉得他风趣，是个好伙伴，尽管有点怪癖甚至时而使人烦恼。每下榻一家饭店，坎菲尔都要立即查看哈里的住处是否有不如意之处——浴室、下水道、马桶和水龙头。然而他往往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到过的地方身后总留下一溜烟灰。他俩后来还曾多年共事，杜鲁门不愿抛弃坎菲尔，也绝不向坎菲尔做的事而向别人道歉。

那年夏天的一些日子里，他们一跑就是几百英里，在十几个地方停下来吃饭、加油和讲演。有些城镇面积颇大，如密西西比河畔的汉尼巴尔，人口已增至2万的马克·吐温，和位于州东南角的巴特勒县城波普勒布拉夫，后者坐落在明净清澈名不符实的黑河边上，拥有1万人口。候选人经常演讲的地方是人口不超过600的小镇，如拉达东尼亚、埃尔摩、自由城或本顿。斯考德县城的本顿有400人，每年10月邻居节时都举办打擂台活动并因此而出名。30年代，那里山猫猖獗，居民常常需要组织起来驱赶它们。自由城是克雷县治，坐落在密苏里河以北，与独立城遥遥相望。县府广场东北角的那座面积不大的两层楼银行还是1866年遭杰西·詹姆斯抢劫时的那副样子。

前去听杜鲁门法官演讲的人一般不多，通常只有几百人。他们静静而聚精会神地站在县府办公楼前草坪的树荫下，聆听站在办公楼台阶上的哈里用他那快而尖的声音进行演说。听众中的大部分人是县府办公楼里的游手好闲者、没什么事可做的上了年纪的人和放暑假的小男孩。整个气氛亲切而守旧，虽然听者几乎无甚反响，但他总能让人们听他讲完后心情愉悦许多。

弗雷德·坎菲尔备了一本竞选剪贴簿，沿途将当地报纸文章剪贴下来。有一份不知从哪家报纸剪下来的发表于8月3日的剪报称杜鲁门法官不善于辞令，但这一评价对他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参议院里哗众取宠的雄辩之声早已不绝于耳。

初选的前一周，堪萨斯城的巴尔的摩饭店为塔克·米利根举行宴会，当他说任何一个在美国搞选举做弊的人都该被视为罪人的同类时，在场的700人起立为他欢呼。他虽未指名，但显然影射的是汤姆·彭德格斯特。说到他的对手、正在密苏里州的另一端竞选的哈里·杜鲁门时，米利根戏谑地说：

“倘若哈里能进入参议院，他天天都得打长途听取他老板的旨意，耳朵上非长老趺不可。”

米利根此时显然已经落后了，科克伦和杜鲁门则似乎不分轩輊。

8月7日切选那天，犹如哈里说的一切乌烟瘴气全部驱散后，哈里以4万票的超出额获胜。最后的票数是，杜鲁门276850票；科克伦236105票；米利根屈居第三，147614票。

哈里得到的农民选票颇多，科克伦也一样，他走访的县数量上不亚于杜鲁门。哈里取胜的最大超出额是在杰克逊县，共有137000票选他，几乎占他全部票数的一半。两年前，当科克伦在彭德格斯特的支持下竞选众议院时，他在杰克逊县得到了压倒多数的95000票。这次由于科克伦和米利根是组织的对手，俩人总共才得到11000票。在堪萨斯城的一些选区，科克伦一票也没得到。

科克伦觉得他竞选的惨败是因他曾预测在圣路易斯他能获得125000票。他认为他的预测迫使彭德格斯特的人加倍了他们们的努力。真正的结果是，科克伦在圣路易斯（及圣路易斯县）得到的票数是112000——比州另一端的政治集团所获得的票数少25000张。

《堪萨斯城明星报》称此次竞选为彭德格斯特压倒性的优胜。唯一的安慰是西部密苏里如今在参议院有了代表。《圣路易斯邮报》的观点是，独立城的哈里·杜鲁门法官所取得的竞选美国参议院民主党提名的胜利“没有什么意义”。

似乎没人认为杜鲁门本人与他取得的胜利有何关联，他自己都说他只想对他所有的朋友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万分感谢。

诚如人们预料的，秋季大选的对手是个“弱敌”。哈里的共和党敌手是位在职议员，叫罗斯科·康克林·帕特森。他因与格兰特时代的声名狼藉的纽约共和党人罗斯科·康克林同名而引以为骄傲。哈里的初选经费是12286美元，而大选的开销只有785美元。

大选后，哈里和艾尔沃德飞往华盛顿去拜访在初选舌战惨败的贝内特·克拉克。克拉克几年后也面临重新选举，故而希望将他说过的关于其“好友”哈里·杜鲁门及堪萨斯城组织的话一笔勾销。

哈里在堪萨斯城麋鹿俱乐部前的一次讲话中，说他期望在华盛顿站稳脚跟。

12月，新建的、21层漂亮的堪萨斯城市府办公大楼进行最后的装修。其落成典礼在圣诞节后举行，那天，10岁的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满面春风父亲的陪伴下，为查尔斯·凯克设计的安德鲁·杰克逊骑马铜像揭下了帷幕。玛格丽特比她的年龄长得高，一位朋友记得她“又瘦又白——那种缺乏血色的苍白”。显然，她为是她父亲的女儿而感到高兴。

为了奖励弗雷德·坎菲尔的忠诚贡献，他被封为杰克逊县的建筑物主任，实际就是新县府办公大楼的管理人或看门人，头衔好听些罢了。后来人们证实，他“精力充沛，诈诈唬唬且喋喋不休”，但在管理方面胜过所有的前任。

那段日子令杜鲁门夫妇异常兴奋。一周以后，即1935年1月3日，贝丝、玛格丽特和吉姆·彭德格斯特在美国参议院的观者席上看着哈里和参议员克拉克从铺着蓝色地毯的通道走向高台，在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面前就职宣誓。哈里穿着晨礼服和条纹裤，“几乎快认不出来了”。

哈里在堪萨斯城与汤姆·彭德格斯特告别那天，彭德格斯特对他说：“努

力十，少说话，有信必复。”

3

哈里·杜鲁门具有超常的记忆力。他从来不忘记别人的名字、个人爱好和家庭关系。他能记住老早以前在学校读过或学过的东西，常常在闲聊时流露出来，令人惊愕。别人给予他的好处，在困难时期给予他的帮助，他都牢记心中。他刚到华盛顿时已年届 50，几乎是个人生地不熟的议员，因而对那些善意待他的人始终不能忘怀。比如他回忆起哈里·霍普金斯时总是充满激情，因为后者在他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曾给予他友谊。另一位是堪萨斯城《邮报》驻华盛顿记者威廉·赫尔姆，哈里刚到任时曾求助于他的帮助，说自己“两眼一抹黑”，需要找个人帮他四下熟悉熟悉。开始赫尔姆以为哈里在开玩笑。他暗忖这可谓是世界第 8 个自然奇观：一个乐于自嘲、友好可爱和热心的政治家将其健全的悟性掩藏在强大的自卑情结之下。

新墨西哥州的卡尔·哈奇和华盛顿州的刘易斯·施韦伦巴赫是另外两名新当选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们也尽力对哈里表现出友好姿态。哈奇为人谦和，书卷气十足，施韦伦巴赫则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勤勉而做事认真”。在年长而资深的参议员中，两党中有五六个人对哈里都曾给予过鼓励，他们同哈奇和施韦伦巴赫一样都来自西部，或至少拥有西部的人生观。

后来几次事件证明，对哈里至为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伯顿·K·惠勒。此人是蒙大拿民主党人，瘦长而具有独立意识，他抽大雪茄烟，一副流里流气的神态，兼任颇有影响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负责人。

另一个民主党人是亚利桑那州的卡尔·海登，他是 1911 年以准州代表的身份进入国会的。哈里后来写道：“他向我解释参议院的一些技术细节和惯例，这些都让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发蒙。”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人阿瑟·范登堡和“爱达荷的名流”老威廉·E·博拉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哈里。最令人难忘的是来自伊利诺伊的 72 岁的 J·汉密尔顿（“哈姆”）·刘易斯。他是多数党的督导，平素戴夹鼻眼镜，衬着硬高领，戴鞋罩和与其粉色尖髯连鬃胡子相匹配的粉色波浪式假发，并留一撮呈弯曲状的胡髭。一天他走到杜鲁门参议员面前，在他身旁的空座位上坐下。

“哈里，一开始就不必有自卑心理。”刘易斯和颜悦色地说，“头 6 个月你会纳闷你怎么能来到这儿，之后你就会纳闷我们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

脸庞红润、嗜酒如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仙人球杰克”加纳副总统也很喜欢哈里。加纳仍穿燕尾服和条纹裤，他也像汤姆·彭德格斯特似的告诫杜鲁门要刻苦学习，自己没把握时要少说话。这是加纳对初出茅庐者的忠告，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听得进去。加纳本人也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家庭出身亦很低微。后来时不时地，他总让杜鲁门代替他副总统的职位主持参议院的会议。威尔·罗杰斯到国会大厦吃午餐那天，加纳把哈里也请了去，对这一恩典哈里将永远铭记在心。

然而上述友善的姿态都属例外。“我身上背着黑锅。”哈里后来说。堪萨斯城的名声一直追随他到华盛顿。人们称贝内特·克拉克是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而哈里·杜鲁门参议员是彭德格斯特派来的。

新墨西哥州的布朗森·卡廷看杜鲁门的眼神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内华达州的帕特·麦卡伦后来回忆说：“我从不把他当参议员看。”参议院

的改革先锋、内布拉斯加州的乔治·W·诺里斯认为哈里身上“有毒”，拒绝与他讲话。

国会助手维克托·梅塞尔出身在密苏里州，在国会大厦工作多年，轻车熟路，当派他给杜鲁门参议员做助手时，他一口回绝，担心与杜鲁门接触可能会葬送他的前途。他记得自己曾说：“哈里是……一伙歹徒派来的（派到华盛顿），我要是给他工作名誉就毁了。”

但梅塞尔自愿帮着杜鲁门参议员找住房后，他的看法改变了。他们在康涅狄格街的蒂尔登花园住宅区找到一套4室的公寓，月租150美元。事后他们走进一家钢琴铺，杜鲁门坐下来弹了几架钢琴，最后选定一架租用，月租5美元。接着他们又去了一家银行，梅塞尔等着的空当儿，参议员贷了笔买家具的款项。

梅塞尔发现这是位与他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人，现在他极想为他工作。梅塞尔体型苗条、穿衣入时，头发梳成弗雷德·阿斯泰尔的背头式样，他成为杜鲁门办公室5位工作人员的第一位。记者威廉·赫尔姆说，梅塞尔从此以“狗一般的忠诚”为杜鲁门参议员效力。

杜鲁门参议员2月份第一次造访白宫。他心情紧张，在接待室里看到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另外一两个政府高级官员，他们忙着谈论着什么，对他丝毫不加以注意。他本来应与总统会见15分钟，结果只用了7分钟就结束了，因为在罗斯福面前他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乡村长大的人拜见美国总统实在是件隆重的事。”他回忆说。他在后来几个月里打给白宫的几次电话常常如泥牛入海，得不到答复。

哈里几时的朋友查理·罗斯当时是《圣路易斯邮报》驻华盛顿记者，他写道：“我想哈里确实是非常自卑地进入参议院的。其实他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强得多。”

哈里的勤勉是有目共睹的。大多数早上他都在7点钟到达办公室，由于比别人早到得多，于是决定给他配备一把大楼的钥匙，据说他是拥有这种钥匙的第一个参议员。因为他早上起得特早，所以下午时分他看去好像还须刮一次脸。他的腰板挺得比身材高大的人还直，走路速度之快在华盛顿实属罕见。好天气时，他步行几英里至国会大厦，迈着稳健的1分钟120步的军人步子，通常到蔡尔兹饭馆停下来吃早餐。不步行时，他就乘从康涅狄格大街发的有轨电车，朝东拐入宾夕法尼亚街，路过白宫，再朝北抵达国会大厦。

“等到他的同事们开始工作时，”威廉·赫尔姆写道，“杜鲁门参议员已处理完早上的邮件，口述了几百封信，为尽可能多的有能力的民主党人安排了工作，心情急迫地准备下班了。”

他与汤姆·彭德格斯特依旧保持着关系，这一点他并不隐讳。一个堪萨斯城的人想求他帮忙找份工作，他回信说：“你要是能寄给我堪萨斯城民主党组织的推荐信，我愿意为你尽力而为。”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并非汤姆·彭德格斯特一人所为，而是从一开始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政治之中，不容他对此提出质疑。正所谓官职由得胜党分赃。

他为几百人在密苏里安插了数百份工作，包括老朋友和亲属。他弟弟维维安被安排到了堪萨斯城联邦房管局。泰德·马克斯被塞进了堪萨斯城的老兵就业署劳资部。埃德加·欣德成了独立城的邮政局长，一干就是25年。

在他办公室的会客间里，杜鲁门参议员在大理石壁炉台上方醒目的地方挂了一幅装了框子的汤姆·彭德格斯特的肖像。

庞大的参议院办公楼（后来改名为罗塞尔大楼）坐落在国会大厦的东北隅。哈里的办公室在二层，是248号，他的窗子俯瞰着一个后院。他在参议院会议厅的席位是94号，为了容纳占绝对多数的民主党议员，在民主党一边的最后一排座位后又添加了7个席位，94号便是其中之一。哈里的右侧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谢尔曼·明顿。左手的位子一直空着，直到6月份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拉什·霍尔特满30岁，遂按照宪法规定新当选为参议员，才占据了那一席位。

74届国会共有93名参议员，包括霍尔特参议员在内的民主党人占69个席位，共和党人占27个席位。贝内特·克拉克坐得很靠前，紧挨着第二排。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坐在克拉克前面第二排的中央，此人仍扎蝴蝶结领结，穿着典型的南方政治家过去穿的那种直立高领装。坐在第二排的还有政府里的要人、来自肯塔基州的艾尔本·巴克利参议员和来自亚拉巴马的雨果·布莱克参议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埃利森·杜兰特（“棉花埃德”）·史密斯的席位亦在这排。史密斯因其关于棉花王和南方妇女发表的演说及对烟草势力的巧妙攻击而著称。在挨着通道的多数党领袖的第一排座位里坐着阿肯色州的约瑟夫·T·罗宾逊；通道另一端靠近第一排的地方，即哈里左手方向的17号座位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此人是参议院的兴风作浪的中心，他不久前对政府发起猛烈的攻击，包括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企图消灭他。

前一年，朗推出了他的“人人分享全国财富计划”，许诺让“每个男人都成为国王，每个女人都成为王后”。哈里·杜鲁门在参议院的最初几个月期间，朗控制了每一个人，使参议院变成他的一统天下。2月初，他发起对吉姆·法利的攻击，指责后者行为腐败。2月20日，朗称法利是“政治魔鬼”，并将登载在《圣路易斯邮报》的一篇文章转登在《国会议事录》上，把汤姆·彭德格斯特如何授意法利中断国内税收局对约翰尼·拉齐亚调查的事抖搂出来。朗事后对哈里说，这只是取悦于家乡选民们的一点小伎俩而已。

一次哈里代替副总统主持会议，朗又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起来，多数议员不等他讲完便纷纷拂袖而去。后来，哈里在去参议院办公楼过马路时与朗相遇，后者便问哈里觉得他的演讲如何。哈里说他一直听到完，原因是他是主持人，不能半途而去，后来朗不再与他讲话。那年9月，朗在路易斯安那被一名杀手暗杀。

休伊·朗这样的人使哈里感到反感，但参议院那些大名鼎鼎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亦引不起他的好感。由于他承认自己惧怕演说，因而好像特别厌恶那些擅长雄辩并以此而沽名钓誉者。他们是“自我中心族”，唯一的特长就是辩论。

威廉·赫尔姆在记者席上对杜鲁门参议员做了一番观察后写道：“每次开会，他都坐在参议院头重脚轻的民主党一边的最后一排，仔细听着和学着……他取的是保守的作风，从不触犯和激怒那些老家伙们。”

4个月后哈里才斗胆提出了他的第一个议案。由于他自身的经历，他对这一法案的内容极为熟悉——“农业信贷署为农庄财产抵押权提供保险法案”。加纳副总统将此法案提交金融与货币委员会，但立即就被委员会枪毙。

按照新当选的参议员的惯例，哈里被分到两个主要和若干次要的委员会。过去，拨款委员会虽颇具威望，但无事可做意义不大，然而在推行新政时期的1935年，该委员会是华盛顿最大的，权限亦可遮天。当年1月为工作

救济所拨的 48 亿美元的款项约占政府开支的一半。由伯顿·K·惠勒任主席的州际商务委员会似乎使哈里感到如鱼得水，因为他有修筑公路和高速公路的经验，对铁路亦有长久不衰的嗜好。次要的委员会包括公共建筑和公有土地委员会以及卡尔·海登任主席的印刷委员会，后者主要负责出版《国会议事录》（杜鲁门的妈妈让哈里为她订了份《国会议事录》，成为它的忠实读者）。哈里不喜欢的一份差事是哥伦比亚特区委员会，他最终退了出来。他认为特区应设立自治政府。

哈里对分配给他的工作干得十分努力。其实他在参议院的头几个年头几乎完全投身于委员会的工作。两个主要委员会的会议他次次都参加，而且依旧是“少讲多听”。他渐渐摸清了工作程序，多数资深参议员和辅助人员都晓得办事程序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正规教育的不足，因而下决心努力弥补之，从不敢稍有懈怠。惠勒参议员指派他到新成立的州际商务小组委员会调查铁路的财政状况，于是他去国会图书馆查找有关铁路管理、铁道史方面的书籍，直到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 50 卷为止。“我在运输问题方面将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精通”。他私下里信心十足地说。令他失望和吃惊的是他发现国会里很少有人使用国会图书馆。

哈里是在新政的高潮，即“第 2 个百日”的开始时步入国家政坛的。当时的奋斗目标不仅是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而且要改革，为此哈里每次表决都站在占多数的民主党一边，为通过国会史上若干最具深远影响的立法助了一臂之力。他从未为某项议案辩说，亦没介入过任何争论，只是投票而已。他表决同意的议案有：瓦格纳劳工关系法，此法案确保工人加入工会和集体与资方提条件的权利；设立公共事业振兴署；社会保险法；乡村电气化法，后者大概是罗斯福时代所通过的法案中唯一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项议案。1935 年，哈里的家乡州 10 户农庄有 9 户没有电力。

作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哈里全力促成了用来打击公共财团卡特尔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并在制定此法案的过程中首次冲撞了大名鼎鼎和权势在握的从事院外疏通活动的证人。院外活动集团设立的总部在五月花饭店的一个套间里。

哈里决心听取任何人的意见。他后来在谈到一位受雇于中西部铁路公司的说客时写道：“他请多少次客我都照吃不误，然后我认为怎么对就怎么做。”作为密苏里州的真正的儿子，他相信的唯有事实。“我认为与什么人谈话都没害处——不管他的背景如何。实际上你若想得到所有的事实，每个人都有发表其见解的权利。”

在听证会上，为公用事业游说的证人包括华尔街的知名人士如联邦及南部公司总裁温德尔·威尔基和曾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约翰·W·戴维斯。杜鲁门说，其“宣传攻势”是密苏里州的县法官前所未闻的。手持公用事业公司股票的选民寄来了 3 万封信和电报（哈里多年后声称他把信都焚毁了，尽管他的秘书米尔德里德·德赖登不记得曾有过一场焚烧的大火）。院外活动集团还派人赴堪萨斯城去见显然站在他们一边的汤姆·彭德格斯特。但哈里说他们这一招亦没奏效。6 月，这项法案如预料的那样以极大的超出额在参议院通过，杜鲁门参议员同意却没投票，因为对立党的一位议员与他说好也放弃投反对票。因受“急事”羁绊，他安排好如若结果接近他就投赞成此法案的票（他的急事是开车把贝西和玛格丽特送回独立城消夏。她俩在华盛顿住了 5 个月，早已呆烦了）。

“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张实行新政者。”哈里后来坚定而自豪地说。事实也证明在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方面能出其右者参议院中寥寥无几。新政诸多立法的大手笔、来自纽约的罗伯特·瓦格纳参议员夸赞杜鲁门参议员是个极为有用的人。然而在风度、背景、语言、年龄、所接触的人方面，他却与一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年轻有为的新政派相去甚远。历史学家所描绘的主张实行新政者的形象是“受过法律、经济学、公共行政管理或新技术领域的训练，聪颖而充满献身精神……接受过进步理想的熏陶，毕业于20年代改革后的大学”。自由派人士同许多华盛顿的事物一样，对哈里是一种新体验，但老实说，他并不欣赏他们，除了那些具有伯顿·惠勒的秉性或作派是西部的而且多少棱角分明的人。其余的虽说读书多年，却仿佛缺乏健全的判断力。哈里是个彻头彻尾的安德鲁·杰克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汤姆·J·彭德格斯特式的民主党人。他喜爱政治的主要原因是能与仙人球杰克，加纳那类人交往（加纳曾说副总统的职位还不值一个痰盂，此话广为流传）。哈里私下里喜欢取笑那些用“哈佛口音说话的人”，但却从没对白宫里的那位哈佛毕业生进行过揶揄。

哈里不断地投票支持总统的决策，因为在大多数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关头，他真心希望尽力为百姓谋福利。他认为自己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深知他们正在经受的疾苦。当然他也知道投票赞成总统——领袖及“老板”——的价值既是信仰的表白也是一种高瞻远瞩。多数党领袖助理、来自肯塔基州的艾尔本·巴克利后来描述了他如何一眼就出于直觉地喜欢上了哈里·杜鲁门。“犹如一句古老的政治谚语说的，他的票‘总是投在正道上’。”

在不少自由派参议员眼里，哈里是个“乐于合作好相处的人”，他体面诚实，大家都愿意和他在一起。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回忆说：“我喜欢哈里·杜鲁门，但你不必对他很重视。”

总统告诉国会，如果不通过他的全部计划，议员们就别回家，于是议员们冒着酷暑整天开会。1935年之夏是干旱和尘暴最猖獗的夏天，某天温度达到华氏110度，得克萨斯州的一名众议员为了让记者拍张精彩的照片，在国会山的台阶上摊熟了一只鸡蛋。哈里在写给贝丝和玛格丽特的信中把酷暑称作“热浪”，但他对工作和炎热从不抱怨，只是嗔怪她们离他太远。

为了省钱，他从公寓搬出住进了一家旅馆，他在住处、办公室或参议院他的桌子上接二连三地给贝丝和女儿写信，尤其当休伊·朗之类“大放厥词”的时候。朗开始管总统叫“骗子”，预言情势再不赶快改观就将爆发革命。一次他的发言长达1小时45分钟，时而阅读《圣经》上的章节，时而卖弄罗克福特色拉调味汁的配方。

哈里虽然身居要职，他的拼写却没多大改进。“occasion”之类的词总是让他为难，常拼写成“occation”。他不会拼“夏威夷”，还把Byrnes参议员写成“Burns”。甚至他家的地址他都拼不对，屡屡把信封上北特拉华大街219号哈里·S·杜鲁门夫人中的“Delaware”（特拉华）写成“Deleware”。

仅7月份他就给贝丝寄了34封信。晚上作为消遣，他读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撰写的罗伯特·E·李传记的第一卷。有时只翻阅《纽约时报》。他同多数政治家一样是个报纸迷，除了阅读几份密苏里州的报纸外，他还看《华盛顿明星晚报》、《华盛顿邮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但在宁静的夜晚他只读《纽约时报》。那年夏天威尔·罗杰斯在阿拉斯加飞机失事身亡，这一消息令哈里颇感悲伤。罗杰斯是马克·吐温转世，他对贝丝说，“他给

予我们的理念比任何人都多。”

一天晚上，哈里和另外五六个议员跨过波托马克河去参加新设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约瑟夫·P·肯尼迪举办的聚会。

.233 肯尼迪在波托马克河之上的凉爽树林里租下一座叫马伍德的庄园，那是一处由 33 个房间组成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聚会就在那里举行。给贝丝的一封信中，哈里对庄园做了如下描述：“这是一座离公路半英里路的豪华的大房子，坐落在未开垦的树林里，周围是酷似布鲁塞尔毛圈地毯般的草坪，足有 5 英亩之广，庭院里有座游泳池及其他眼花缭乱的装饰物。”哈里从没涉足过这样的房子，他听说此房的造价是 60 万美元。他因被邀请参加这样的聚会而感到荣幸，但关于主人他却只字未提。

哈里想找一处租得起的公寓，以备他们来年居住：

在卡罗拉马路 1921 号看到一处不错的房子。它位于西北角，5 层——两间卧室、两间浴室、一间起居室和一个小餐厅，大厅，月租 125 美元。没车库。然后我又在康涅狄格大街以北一个街区的大教堂路 2218 号找到一所房子……他们正在从顶楼到地下室给它粉刷和糊壁纸，它有能容纳 2 辆车的车库……他们的月租是 90 美元。后来我又去了加利福尼亚大街和康涅狄格大街交叉处的高地路，那儿有一幢挺好的房子，2 个卧室，面东南，4 层，租金 125 元。我认为比卡罗拉马路 1921 号强。接着我又来到加利福尼亚街高地路后面的威斯特莫兰德。6 层有栋 2 卧室的房子，月租 100 美元，4 层有个 4 间一套的房子，月租 79.50 美元。这地方是老城，但地点和房子都不错。……明天我打算去 16 大街 2400 号和杰斐逊大街再看几栋房子。我敢肯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哈里不仅是彭德格斯特推上来的参议员，他还是参议员中穷光蛋之一，这一点他很敏感。缺钱花一直烦恼着他，他还得计算 1 万元的年薪怎样才能使他在华盛顿不致捉襟见肘。他在写给贝丝的一些信中提到他的公共汽车费（20 美分）、《华盛顿邮报》的半年订购费（7.50 美元）和食品帐单（9.53 美元）。预计 7 月 4 日独立庆祝日他可能要去马里兰的海滨度周末，他便“破费”了一回，买了一条游泳裤，但接着就去一位公立医疗的牙医大夫那儿补了两颗牙。他一直想买一套经自己挑选的家具。他对贝丝说他做了些奢华的梦——霍尔拜因和弗兰斯·哈尔斯的绘画、苏联的布哈拉地毯、曲线优美的餐桌和椅子以及桃花心木的床（“够两人睡的”）。然而贝丝应对他充满信心：

我想做个有名望的参议员……倘若我不会很快就去见上帝，在金钱上获得成功将不足为奇。但你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因为我绝不用我的影响去做金钱交易。只要我做得对，我不怕受到别人的诅咒。

仲夏时，哈里 3 次前往纽约去看望住在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饭店里的汤姆·彭德格斯特，后者像个君主似的住在 29 层的一个套房里，一天的房费相当哈里一个月的房租。汤姆·彭德格斯特对哈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令他既兴奋又愕然。“彭德格斯特见到我时那副高兴劲就像见到年轻的吉姆似的。”第一次见面后哈里写信对贝丝说，“我们聊了 3 个小时，无话不谈。”第二次见面是在两周后，汤姆·彭德格斯特“见到我的表情如一个 10 岁的孩

子重新见到他失散的哥儿们一般”。

当时一桩有关保险的巨大丑闻正在暗地里传开，涉及一位在州政府工作的彭德格斯特的人。此人是密苏里州负责保险的主管，叫 k·埃米特·奥马利。早春时，《圣路易斯邮报》的马奎斯·蔡尔兹曾到沃尔多夫饭店采访过汤姆·彭德格斯特，彼时后者即将乘坐“诺曼底”号驶往法国。提问过程中彭德格斯特说：“是的，是我让奥马利批准的那笔保险交易。”接着又气愤地补充说：“你们能怎么着呢？”这句话显然说得不妥（后来当蔡尔兹登上船为彭德格斯特送行时，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彭德格斯特和金发碧眼的彭德格斯特夫人坐在他们套舱的起居室里，屋里几乎摆满了鲜花及山谷里的非常昂贵的兰花和百合花。这便是彭德格斯特，得意之极的密苏里的土皇帝”）。但很明显，哈里在沃尔多夫饭店并没与彭德格斯特谈及有关奥马利幕后的事，尽管他以为他们的话题“包括了所有事情”。

有一件事他俩的确谈到了，即由谁来接替帕克州长，按照密苏里的法律，帕克不能连任。哈里觉得也许可以推出派克县种苹果的富商劳埃德·C·斯塔克。哈里是通过美国军团同斯塔克认识的——斯塔克也在法国当过炮兵军官——后来还交流过几次，其间斯塔克对哈里表白过他的政治抱负。哈里在斯塔克的田庄做过客，他的田庄位于密苏里东北部的派克县，是美国最大的苹果树苗圃并以斯塔克“甘甜的苹果”而享誉四方。在斯塔克的恳求下，哈里给了他一份全州要人的名单，并在梅恩街 1908 号为他美言了一番。事情的进展令斯塔克喜不自禁，他于 1935 年 5 月写信对哈里说：“上周五，我在堪萨斯城会见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很满意。这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

但汤姆·彭德格斯特不喜欢斯塔克，在弗朗西斯·威尔逊去世时就把他当州长的可能一笔勾销了（在威尔逊的葬礼上，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碰巧撞见魁伟的大老板和清瘦的衣着考究的苹果商在一起，他俩一个手里拿着一根烟，在停着的车子中间一本正经地谈着什么）。汤姆·彭德格斯特和吉姆·艾尔沃德都认为斯塔克靠不住并把他们的意思告诉了哈里。

“他不行，”汤姆·彭德格斯特说，“我不喜欢那个狗娘养的。此人不善。”

很久以后哈里对一位朋友说：“老头子的判断能力还是比我强。”

然而正如人们传说的，苹果商亦是一位颇老到的马屁精，当哈里带着斯塔克和贝内特·克拉克那年夏天第 3 次去沃尔多夫饭店时，彭德格斯特首肯了斯塔克。斯塔克将得到组织的全力支持——这意味着斯塔克已有把握成为下届州长——当然，隐含的意思是，组织也将反过来指望斯塔克出力。在乘火车返回华盛顿的路上，“感激涕零”的斯塔克许诺随时都会对哈里给予帮助，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行。哈里同贝内特·克拉克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哈里刚上任的几个月中，国会中对他最嗤之以鼻的非克拉克莫属，而且至今也从不帮哈里一把。克拉克似乎还竭尽全力骚扰并使政府难堪，但罗斯福在任命密苏里州的联邦政府官员时却总是与克拉克合作，而不咨询一贯投政府票的杜鲁门参议员。这是罗斯福争取克拉克支持他的手段，克拉克的目的则是为获得更大的授与官职的权力，所有这些都使哈里受到莫大的冷遇，只有强忍着愤懑和压抑住自尊心。此外，克拉克对那些来自其家乡的哈里称之为“普通主顾”的人也无暇关照，对他们的恳求和需解决的问题置若罔闻。然而哈里意识到，克拉克博闻强记，他不仅熟悉参议院的每一个人，而且也深谙宪法和议会法。他非常好交际，乐于做东，还烧一手好菜——乡村火腿配萝卜

叶和用威士忌做的肉汁是他的拿手菜。无论是中饭、下午、晚上或是任何时候，他都愿意找人“喝一杯”，这一点与仙人球杰克·加纳相似。哈里非常喜爱参议员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即揶揄取乐，传说掌故，这与部队中亲密无间的生活很类似。克拉克的幽默令他着迷，因为它“可以使你的神经得到略微的松弛”。一次请追随时尚饮食疗法的伯纳·麦克法登吃中饭，哈里和克拉克闷闷不乐地隔着桌子面面相觑。“参加这个城市的无酒饭局实在是太难为我和克拉克了”，哈里说道。哈里在办公室里备了一些汤姆·彭德格斯特特的烈性威士忌，专门款待克拉克之类的客人（威廉·赫尔姆写道：“尽管有不少人抨击彭德格斯特本人，但至今我还未听到一个参议员对他的酒的质量提出质疑。”）。与议院仅隔一个大厅是参议院秘书埃德温·哈尔西上校的办公室，哈尔西（及后来他的后任莱斯·比弗尔）也在办公室里为“口渴的人”准备了一些酒。哈里和克拉克不同的地方是，他恪守去一趟哈尔西办公室只喝一杯的原则。克拉克虽比哈里小6岁，但他身材矮胖、下颌宽厚，加上稀落的头发，看上去反比哈里大且更有议员的派头。在印刷精美的《国会指南》中，克拉克自己撰写的小传占了一页纸的3/4，而杜鲁门参议员自己写的小传只有3行。一年后的1936年夏天，民主党在费城召开重新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第2届总统的大会，哈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再次与汤姆·彭德格斯特标在了一起。彭德格斯特刚刚第2次从欧洲度假归来，乘坐的是首次下海的“玛丽女王”号。他是从纽约坐火车抵达费城的，打算每天从沃尔多夫饭店他的套房往费城跑一趟。他于6月23日星期二大会召开的早上到达会场。全国委员会主席吉姆·法利、吉姆·艾尔沃德和杜鲁门参议员簇拥着他在会议现场合了个影，照相机的闪光灯亮时彭德格斯特咧嘴微笑着。所有民主党的头面人物都会集到费城。其中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挚友、平易近文、权势炙手可热的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爱德华·J·弗林；衣着讲究、来自泽西城的弗兰克·黑格，他的名言“我就是法”已被载入史册；芝加哥市长爱德华·J·凯利；农民出身、嗜鸟如命、来自孟菲斯的E·H·（“埃德老板”）克伦普和上衣翻领上插朵石竹花的T·J·彭德格斯特，后者前一天刚庆祝完他64岁大寿。罗斯福都曾追随并与这些人共过事，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将来亦离不开他们。他称他们为明友，后者也都为罗斯福在过去的4年中为他们创造的奇迹表示谢忱。诚如马奎斯·蔡尔兹所言：“新政庞大的开销使他们手中握有他们至今都没有梦想得到过的权力。”当时谁也不曾料到，那天将是汤姆·彭德格斯特最后一次在大型公共场合露面。所以作为那个时代大都市民主党头目的聚会，那次会议是全班老板最后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粉墨登场。哈里从华盛顿开车来到费城，他在会议期间不担当任何重要的角色。他没被分配到任何重要的委员会，只是一个普通的代表。他去费城只为去见彭德格斯特，而在会议现场拍下的那张几人合影是至今所知的唯一——张他与老板一起照的像。

彭德格斯特当天晚上坐火车返回纽约途中突然病倒。医生的诊断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哈里当晚留在了费城，但并没有听完罗斯福晚上的演讲，过了很久以后他才得知彭德格斯特病情的严重性。8月，仍住在饭店里的彭德格斯特病情再度发作，被紧急送往罗斯福医院动手术。他还得了肠癌，须动手术结扎直肠。这意味着汤姆·彭德格斯特将在有生之年身边永远挂着一根管。

哈里·杜鲁门后来说，倘汤姆·彭德格斯特死于那年夏天，他将被视为

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政治头子而留名青史。但事实是他没有死。

直到9月彭德格斯特才能返回堪萨斯城，他乘坐的火车车厢经过了特别改装，行程极为保密。当时初选已揭晓，组织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竞选：劳埃德·C·斯塔克获得民主党的州长提名，至于11月的大选，他将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样稳操胜券。

4

杜鲁门在参议院第一任期的后半时期，发现人们对他的嫌疑渐渐消退。他在同事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议院配给他一间更大的办公室，240号套间，窗子还是对着内院。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及他所在的委员会的人都认为他固执、办事有效率、尊重他人意见、平易近人和非常可爱。“我们一致觉得杜鲁门是个大好人……他心木特正。”历史学家待尔福德·泰勒回忆说，他年轻时曾担任过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律师。杜鲁门即使在于最沉闷乏味的工作时也是耐心十足。虽然没入觉得他在某一特殊领域尤为突出，可使他飞黄腾达——“他没显露出领导的才华”，泰勒说——但其声望却无疑与日俱增。

共和党员博拉是参议院公认的伟人之一，一天他有意把一支胳膊搭在杜鲁门参议员的肩膀上，公开表示出他的友谊。杜鲁门此时甚至也开始在议会发言，总是按准备好的充满数字和事实的稿子照本宣科。一次在一次辩论期间，阿瑟·范登堡让杜鲁门证实一个论点，杜鲁门照办后，范登堡对全体议员说：“当这位密苏里的议员以这种方式陈述一个论点时，我们可以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哈里将这一友善姿态永远铭记在心。

“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别人，他那微笑友善的神态让你不能不喜欢他。”维克·梅塞尔说，“……而且他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我从来没听过他对他的属下大声嚷嚷过，这的确不容易……”杜鲁门的秘书米尔德里德·德赖登说：“我为他工作的这么些年里从没见他发过一次火。他说话一贯平心静气，十分关心他的助手们……”她还记得他的话里不带任何“下流之词”，只要女人在场他从不说脏话。

阿尔本·巴克利从一开始就“本能地”喜欢哈里·杜鲁门，但直到围绕着罗斯福的扩充法院编制计划引发的争论达到高潮时，他才真正对哈里加以欣赏。罗斯福的计划令人沮丧，引起非议，沸沸扬扬一直贯穿1937年始终。

罗斯福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在费城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这便是哈里没听的那次演讲，但他在报纸上读到它后称其为杰作。罗斯福说：“某些时代的人们接受很多的赐予，另一些时代的人们被寄予厚望，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则是在跟命运约会。”总统在1937年1月发表的第2次就职演说时说得更具体。“我看到全国1/3的人在衣食住行方面仍陷于贫困之中。”他说。而国会则同全国公民一样，对他将要推出的新立法拭目以待。

2月的第一周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总统要着手“改革”的是最高法院——实际是想按其所好重新整编——因为高法感到新政初期的某些计划不符合宪法。总统的意图是，如果法官们拒绝在70岁退休，他将把法院的9人编制扩充到15人。罗斯福因在11月大选中获得压倒的优胜，并在国会中赢得史无前例的最大多数席位，因而信心十足地认为他可随心所欲。他既未与议会领袖磋商，也未事先透露他的意图。总统走错了一着棋；企图以扩大人数的办法影响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大错特错，对罗斯福和参议院都是一大损害。

参议院持反对意见的人攻势凶猛，尤其是民主党人，其中不仅包括诸如卡特·格拉斯和贝内特·克拉克的保守派，甚至还有罗斯福过去的心腹，如康纳利和此刻牵头反对法院扩编法案的惠勒。巴克利、杜鲁门和几乎所有坚定不移地追随罗斯福的民主党参议员都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来自白宫的恶狠狠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各自家乡选民对这一法案所表示出的愤慨。6月，连罗斯福的副总统加纳对此事都怒不可遏，索性打点行装跑到得克萨斯州去了。“人民站在我一边。”当加纳与总统发生争执时罗斯福厉声说。大失所望的卡特·格拉斯想，以罗斯福的巨大魔力，可能参议院也站在他一边。“当然，我将反对这一法案，”格拉斯说，“我将尽全力反对它，但我对我的做法是否能带来什么好处不抱丝毫幻想。总统要是让国会明天集体自杀，他们立马就照办。”

杜鲁门同巴克利一样决定支持总统，理由是高法的人数过去也有过变更，但他没参加辩论。由于惠勒卷入法院之争，对铁路工作失去兴趣，把大部分工作移交给了杜鲁门并任命他为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因而哈里便全身心投入到铁路调查的工作之中。6月，正值法院之争紧锣密鼓之时，哈里在参议院发表了其最长而且最大胆的演讲：铁路调查的初期报告。仲夏时节，他极想避开法院之争，并同多数人一样希望此事根本没有发生。愤怒的信件雪片般纷纷寄到他身边，由于他宣布了他关于法院法案的立场，于是被指责为罗斯福的帮凶。他的头疼症继而复发。

总统在白宫的顾问们说，倘若他能赢得这场战斗，他的其他计划便可“顺利通过”。

然而7月14日一切战略突然受挫，那天，一直为总统法院论战打先锋的多数党领袖约瑟夫·罗宾逊在国会山对面他的公寓里突发心脏病猝然死亡。几天之前，职业为内科大夫的罗亚尔·科普兰参议员还遇到罗宾逊的座位旁边，告诫他得悠着点儿。

对华盛顿的闷热不堪忍受的贝丝在写给埃塞尔·诺兰的一封信中道出了对丈夫体力的担忧。“哈里筋疲力尽，感觉不好，若不休整一下恐怕真得大病一场。”

关于最高法院的论争被搁置一旁，等待重新任命新的多数党领袖。呼声最高的是巴克利和保守派头头、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后者的职务是财政委员会主席。这是决定新政在参议院未来命运的紧要关头，罗斯福决心让巴克利取胜，便写了一封致“亲爱的阿尔本”的公开信，信中他称巴克利为“代理”多数党领袖。许多参议员认为这是对参议院内部事物的傲慢干涉，于是又掀起了另一场激烈的论争。

通过私下的民意测验，吉姆·法利推算哈里森将以一票之多取胜。来自白宫的压力愈发强大——而且毫不隐讳。已经表态支持哈里森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威廉·H·迪特里希接到芝加哥老板凯利的一个电话，许诺说他若按照罗斯福的意思投票，将获得任命两名联邦法官的权利，这一手足以使迪特里希转变了立场。投票前一天的7月19号，哈里接到汤姆·彭德格斯特电话，白宫曾给后者挂了电话，让他“告诉”哈里·杜鲁门如何投票。只是这次没有马上向哈里许诺官职授予权。

哈里告诉彭德格斯特，他已表白支持帕特·哈里森，不能食言。“吉姆·艾尔沃德已给我打了电话。”一个小时后哈里对威廉·赫尔姆说，“我不在乎拒绝吉姆，不是太在乎，但回绝汤姆实在是我遇到的最为难的事。”据哈里

说，这是彭德格斯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投票的事给他打电话，一般他都是通过拍电报表明他的观点。

但或许在不喜欢白宫的压力方面，汤姆·彭德格斯特并不亚于哈里，因为哈里又说，彭德格斯特说选谁不选谁“对他来说没他妈什么区别……”

哈里支持哈里森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喜欢巴克利，没有任何反对他的理由——除非是他想向总统表示他不愿再让人牵着鼻子走了。

他丝毫不让步，而且对包括总统在内的白宫的人大发雷霆，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他们绕过他直接去找彭德格斯特明确无误地表露出他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在他们眼里，他依旧是彭德格斯特的参议员，这是他来到华盛顿后所受到的最大的侮辱，所以决定让罗斯福明白他的感受。当告之总统不在时，他便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他受够了像个办公室听差似的被人“气使颐指”，杜鲁门说。他希望得到与他职位相应的礼遇和尊重。

巴克利参议员却一直以为哈里·杜鲁门是支持他的。巴克利后来描述了哈里如何找到他，说：“我（因要为哈里森投票）所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来告诉你我将不支持你，以免增加更大的压力。”巴克利说杜鲁门的直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对他直接面对我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性格表示钦佩。在政治圈里，常常是匕首已逼到了你的后心，而凶手却兀自向你口蜜腹剑地笑着……”

7月21日，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聚集在参议院办公楼那间白花岗岩石的秘密会议室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多数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以一票之多获胜（巴克利后来想象，倘若他以一票之差失利，不知将怎样看待哈里·杜鲁门）。哈里立即表示对巴克利给予支持，此后他们一直是朋友和同盟者。法院法案的争执平息下来。7月22日，参议院以50票的超出额将法案打回司法委员会，将其化为泡影。总统自就职以来首次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哈里则认为他咎由自取。整个事件在哈里看来是一大失误，是罗斯福的一大败笔。

贝丝和玛格丽特每年都在华盛顿和哈里住一段时间，在那几个月的日子里，杜鲁门夫妇从一栋狭小临时的公寓搬到另一栋公寓——1936年春天住在康涅狄格大街的塞支威克花园公寓；1937年初住在第1大街的开罗阿姆斯公寓；1938年住在爱达荷大街的沃维克公寓；1939年他们又搬回最初住过的蒂尔登花园公寓。已长得玉树临风却更加羸瘦的玛格丽特进入了一所叫岗斯敦霍尔的私立女子学校，给哈里又平添了一层经济烦恼。然而独立城依旧是玛格丽特和贝丝的“家”，后者一直感受到她母亲需要她的压力。马奇·华莱士对哈里和他的职业生涯不感兴趣，她依旧认为贝丝在理家方面会做得更好。

长期的分居日渐难熬。“没有你我实在受不了。”1937年新会期开始后哈里写信对贝丝说。他写道她不仅是他的朱诺、维纳斯和智慧女神密涅瓦，她还是普罗泽庇娜并让她查一下这个人物。玛格丽特后来一直记得，普罗泽庇娜是与她悲痛万分的母亲分开、每年都与她丈夫普路托在阴间度过半年的女神。

哈里的信提到他颇有节制的业余生活。他看电影，打扑克赌点小钱，用收音机听交响乐或歌剧。他过去在夏令军营里结识了一位叫约翰·斯奈德的圣路易斯银行家。一次周末，他俩开车到葛底斯堡，步行穿越了那里的战场。还有一天他从拨款委员会里“逃”了出来，跑到军事学院听道格拉斯·索撒

尔·弗里曼关于罗伯特·E·李的讲座，认为“那次讲座是我所听过的最棒的之一”。

他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引起他过分的忧虑。最高法院扩大编制的争论结束后，他感觉很不好，便前往阿肯色州温泉城的陆海军医院做了一次体检和彻底疗养。一个月左右之后，由于他工作更加卖力，他的神经又开始与他恶作剧，头再度剧烈地疼起来。“所谓委员会的工作纯粹是乏味的苦干和做广告似的搞宣传。”他写道，“有时非常令人压抑。”维克·梅塞尔猜测他可能喝酒过多。后来威廉·赫尔姆写道他从没见过谁的酒量能超过杜鲁门参议员。一次赫尔姆亲眼见他一连灌下5杯，却面色一点不变。“我从没见过他流露过丝毫的醉意。”

温泉城的陆海军医院在他病历上写道，他的症状只是严重头疼和“始终感到疲乏”，是一种“综合不适症”。

总统及其心腹对他的反应仍旧是巨大的冷漠，每当他的朋友、密苏里州长劳埃德·C·斯塔克进城时这种感觉对他刺激更大。1936年10月，当斯塔克正在竞选州长时，为他安排第一次觐见罗斯福的是哈里。通过写信和打电话，哈里敦促总统在他路过密苏里州竞选时邀请斯塔克和他夫人登上总统列车。哈里从独立城发出的一份电报向总统保证说：“这对夫妇很招人喜欢。”斯塔克后来成了白宫的常客，满腔热情地称总统为“头子”。他还被邀请乘坐总统的游艇巡游波托马克河，陪总统玩扑克，这是杜鲁门参议员梦里才能幻想到的宠幸。杜鲁门有时甚至让总统的秘书给他回电话都办不到。

一天，斯塔克去国会大厦做短期访问时在哈里的办公室探了个头，说密苏里的一些人想让他哈里竞选连任时也让他参加参议员的竞选，但接着又说哈里不必为此担心。他走后，哈里对维克·梅塞尔说：“那个狗娘养的企图跟我竞争。”

10月的一天夜里哈里孑然一人听广播时哭了起来。“两个孩子在唱《犹他州来的女孩儿》里的插曲‘他们永不会相信我’。”他在信里对贝丝说，“我坐在这里回想起另外两个孩子正在倾听朱莉娅·桑德森和唐纳德·布赖恩歌唱那支美丽的旋律和美妙情感的情景，我对那个孩子如此想念，不得不给她写信才能抑制住我的泪水。”

似乎没人了解哈里内心深处有多么多愁善感。他孤独、思家，因受冷遇而自怜，时常思念往日的时光。“今天是我父亲的生日，”他12月5日写道，“他如果还活着的话就86岁了。我一直希望他能活着看见我被选为议员。他会高兴死的。”

令哈里高兴的是他交了一个看似不大可能的朋友。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和他妻子每星期六下午都在他们那栋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大街的老式公寓里举办茶会。一次铁路小组委员会的马克斯·洛温撒尔邀请哈里去参加冬季茶会认识一下布兰代斯。马奎斯·蔡尔兹后来写道，布兰代斯夫妇的茶点在京城已成了令人“有点儿畏惧的习俗”，其问要玩抢座位游戏，裁判由布兰代斯夫人担当，其目的是让法官在1个半小时内尽可能多地与每个人聊上10到15分钟。杜鲁门得到洛温撒尔的邀请时，坦率地告诉他他不习惯去见这样的主人。但出乎哈里意料之外的是，布兰代斯与他聊的时间最长，他乐意听哈里讲述铁路方面的调查而当他得知哈里读过他写的几本书时，似乎极为喜悦。

他们坐在大起居室里硬梆梆很不舒适的椅子上，屋中的摆设依旧是伍德

罗·威尔逊时代的风格，墙上挂着不少古建筑遗迹的照片。布兰代斯是第一位在最高法院任职的犹太人，也是全国最知名的信仰杰斐逊的开明人士。他当时已 80 多岁，在哈里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老者”。那天很冷，预报有雪，但哈里却因他们的谈话而颇感温暖，虽觉有点不习惯，但比他想象的要惬意得多。“这是一个只有少数人能参加和长见识的聚会。严格说我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但他们让我觉得宾至如归。”

哈里后来又去了几次，他后来曾写道，他发现他和布兰代斯在“庞大的垄断会带来危险”上看法一致。显然，布兰代斯对他的影响很及时。

193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一，杜鲁门参议员发表了他第二次演讲，对企业界的贪婪和腐败大张挞伐。他在 6 月份的发言中，曾提到杰西·詹姆斯为了抢劫罗克艾兰铁路如何起得很早，冒着生命危险抢走了 3000 美元。但当代的金融家们凭借控股公司从同一条铁路竟劫走了 7000 万美元。他当时说：“参议员们可以看到，詹姆斯先生和他手下人同真正的手段高明的大盗相比，不过是‘胆小鬼’而已。”他第二篇发言稿在马克斯·洛温撒尔的协助下曾几易其稿，在他准备充足的发言中，他对华尔街的权力和四处弥漫的拜金罪恶加以攻击，有时他的语调就像他儿时心目中的英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说话。关于他的演讲他事先已贴出通知，以防议会厅里空荡无人。“我的发言也许会给我贴上激进派的标签。”他提醒贝丝，“但它都是我的想法。”

他一生中对自己自大和特权阶层的憎恨，密苏里州对集权和东部由来已久的怀疑，都一股脑地被他宣泄出来，他难以抑制的激情还是他同行参议员们第一次领教。他对参与庞大的破产案产业管理和整顿中的法庭和律师们进行抨击，因为他们是摧毁铁路的罪魁祸首，他还点了几家实力雄厚的涉嫌“法律事务所”的名字——纽约的克拉华—格斯道夫—斯温—伍德事务所；纽约的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加德纳—里德事务所；芝加哥的温斯顿—斯特朗—肖事务所。他引证了律师们为破产案产业管理人收取的巨款，一些律师如何开着破产公司的私人轿车带着全家去加州免费度假旅行，以及联邦法院一位受理破产案产业管理的法官如何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破产的密尔沃基—圣保罗公司的一辆私人轿车。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从内部了解到这些事情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哈里问道。

这些法律界最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所干的伎俩让刑事法庭专办交通伤人案件的律师们听了都为他们感到羞耻。如果根据一个人的过去就能推测他的未来，那么这些人还可从悬而未决的破产案中攫取更多和油水更大的费用，到头来还将成为重新组建起来的铁路公司的律师，支取丰厚的年俸；他们的报酬或可说是他们挣来的，因为他们的勾当就是避开州际商务委员会，随心所欲地自己或让法院曲解国会通过的法律。

这些聪明能干的律师、顾问、检察官，随便叫他们什么都行，采访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成员，与他们会晤，拉他们出去吃饭，讨论悬而未决的案子。你们都知道，委员会是公众的代表，有它自己的律师，但普通的官僚作风十足的政府律师岂是那些笑面虎般的代表庞大的铁路和保险公司及华尔街金融家的律师们的对手，这就像面对屠夫羊羔毫无办法一样

哈里断言根本的问题是贪婪，“野性的贪婪”。

我们崇拜金钱而不是荣誉。在人们的价值观中，一个亿万富翁远比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务员伟大得多。即使这个亿万富翁的财富是建立在儿童和苦力们的血汗之上的也可不必计较。谁也不认为卡内基的诸多图书馆是靠炼钢工人血汗建成的，然而这是事实。我们忘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夺去了多少科罗拉多石油钢铁公司矿工们的生命，然而付出的牺牲还远不止于此。我们对财神顶礼膜拜；一天我们不恢复古老的道德准则，不重新遵循“摩西十诫”，上述状况就不会改变。

能够控制全国财富和聘用全国一流律师的华尔街，竟然产生不出一些能意识到垄断财富和让财团日益膨胀将导致危险的政治家，这实为一大憾事。他们对目前的局势不加以补救，而依旧雇用最有才华的律师为他们的贪婪和私利效力。人民已不堪忍耐，这一现象很快将被消除……

哈里将全国的失业和动乱现象归咎于权力和人口的过分集中和事事都庞大之风。倘若所有保险公司的所有资产的60%不集中在4家公司里，国家将受益匪浅。从国家利益着想，如果1000家保险公司每家拥有400万美元的资产就比大都市人身保险公司一家拥有40亿资产好上1000倍。同样，1000座各自拥有7000人口的城镇远比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城镇更具价值。

我一直在描述的肆无忌惮的贪婪导致了大萧条。倘若所谓的投资银行家们继续让运输公司负债累累，为的是将债券卖给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以便从中提取佣金，水井最终将会枯竭……解决铁路问题没有奇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若没有正派的人负责铁路的实际和资金上的运营并实施国会制定的法律，一切药方，无论其多么具有科学性，都将是废纸一张。

哈里的演讲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立即引起全国劳工领袖和具有改革意识人士们的注意。参议院的人都晓得哈里曾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哪怕是最枯燥乏味的听证会也不会使他厌倦，而有些听证会的枯燥程度的确是破了国会山的纪录。许多次听会的人只有杜鲁门议员一个。

哈里还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勇气，这是同他共事的人有目共睹的。调查的焦点集中在倒闭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幕后的资金欺诈方面。曾于过劳工律师的马克斯·洛温撒尔写了一篇题为《投资者之付出》的有关铁路改编的分析文章。作为这一问题的专家，他提醒哈里深入调查可能会揭示出一些“非法的行径”，这在密苏里州将令他很难堪。杜鲁门指示洛温撒尔和其他工作人员就像进行其他调查似的继续下去。让哈里取消听证会或至少不得操之过急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却锲而不舍。洛温撒尔认为参议院里能顶得住杜鲁门所承受的压力的人决计超不出五六个。

听证会继续进行，哈里以礼貌但绝不松劲的方式盘问证人。洛温撒尔回忆说，公平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因此他也一定要公正地了解事实。哈里在掌握大权后，尤其是握有调查和……统治的权力后并不滥用……他给证人足够的时间考虑”。

有意思的是，这位自身背景似乎很让人值得怀疑的参议员却赢得了一流调查员的美名。

杜鲁门还积极参与了民权问题，虽然这在当时并非显得很重要，而且与他出生的密苏里州的传统背道而驰。他对取缔人口税和私刑的法案一直予以

支持。1938年，参议院就一项反私刑法案进行辩论时，他投票赞成将辩论限制在法案本身，但一位议员以冗长的演说阻挠议事，致使法案未得以通过。

他在“有备无患”，即国防问题上亦旗帜鲜明。1938年在纽约拉齐蒙特召开的一次美国军团大会上，他以警告的口吻说：“我们对另一场大战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因为欧洲的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他呼吁建设一支“举世无双”的空军。孤立主义者的错误是最不可饶恕的，他说。美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并拒绝参加国际联盟已是大错特错了。“我们没有承担起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不能退缩与世界隔绝。美国有幸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希望和平，但“在未来的民主与独裁的斗争中，民主国家必须为保卫他们的原则和财富而有所准备”。

汤姆·彭德格斯特在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这位一度身体健壮、满面红光的大老板如今面色如灰、憔悴干瘪，而且虽然他过惯了挥金如土的生活，却因常年上瘾的赌博使他的财力几近挥霍一空。有一个月，他赌马几乎输掉了7.5万美元。他在梅恩街1908号新雇的私人秘书伯纳德·格奈夫考负责记录他的赌马活动，一次赌注一般是5000至2万美元。后来推算汤姆·彭德格斯特光赌马一项就挥霍了600万美元。同时还揭示出，他谨慎地将赌马交易瞒着家人和朋友以及政府。为了不泄露钱的来源和去处，他采用了光付现金和制造假名的办法。30年代末，他在全国范围内欠下其他赌徒和赛马登记赌注者的钱不计其数，实际已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不再称他为“大老板”，而是“大吸血鬼”。任何熟悉彭德格斯特家族史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命运奇异地捉弄，因为赌马是他们白手起家的起点，市参议员吉姆压在一匹叫“巅峰”马上的赌注曾使他大获全胜。

后来在试图解释汤姆老板衰败的原因时，包括哈里·杜鲁门参议员在内的他的崇拜者都坚持认为他“行为反常”。驱使他干他在年轻时绝对不会干的事情完全是由于他日益衰弱的身体和赌瘾。一个在堪萨斯城警察局干过多年的叫约翰·弗莱文的警官回忆说，彭德格斯特在给他这份工作的那天对他说：“不要拿不属于你的钱，这样你就永远不会遇到麻烦。”

一位新上任的负责堪萨斯城的地方检察官开始了调查，首先将目标瞄向1936年的选举骗局上。此人叫莫里斯·米利根，是塔克·米利根的弟弟，也是贝内特·克拉克的人（他的任命就是克拉克安排的）。然而调查完1936年的选举后，米利根攻击彭德格斯特的主要同盟竟是劳埃德·C·斯塔克州长，他能升到州长的位置是欠了彭德格斯特和整个堪萨斯城组织一大笔人情的。斯塔克攻击彭德格斯特之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决心一劳永逸地将其置于死地。斯塔克的信念是他的忠诚属于人民，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或老板。

米利根和一帮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收集的材料表明，1936年，在堪萨斯城约有6万张选票是“雇人”投的。许多选区登记的选票数字超过了当地人口。几百名被告被送上了法庭，《明星报》记者威廉·雷迪格指出，选举作弊多年来对堪萨斯城人来说并不陌生，令他们震惊的是看到许多作弊者竟都是普通百姓，这的确是事实。审判持续了2年，279人被判刑，而长相英俊、抽着烟斗的“乡村律师”米利根则成了当地英雄。

但最关键的调查直到斯塔克州长在米利根的陪同下奔赴华盛顿后才开始。贝内特·克拉克私下向罗斯福透露，说彭德格斯特在他的所得税申报单中没有提及他的巨额收入。罗斯福于是通知了财政部，财政部便着手对马奎斯·蔡尔兹于1935年首次在《圣路易斯邮报》披露出来的保险受贿事件进行

调查。其间，斯塔克和米利根指挥着 5 个执行特殊任务的联邦调查人员。

他们发现 1935 年 1 月，也就是杜鲁门参议员正在适应国会的工作期间，大美国保险公司的一个叫查尔斯·斯特里特的官员在芝加哥的一家饭店里会见了彭德格斯特。他们的会见是由密苏里州保险业主管 R·埃米特·奥马利安排的。代表 8 家不同的保险公司的查尔斯·斯特里特对彭德格斯特说，过去一项关于保火险费用的争执已扣压了近 1000 万美元，他想通过奥马利的部门解决此事。当然，他愿意出钱。当斯特里特提出出 20 万美元时，汤姆·彭德格斯特一口回绝。随后斯特里特又追加至 50 万，彭德格斯特颌首同意。后来为了尽快促成此事，50 万又增加到了 75 万。

第一笔 5 万现金于 1935 年 5 月 9 日在梅恩街办公室直接送到汤姆·彭德格斯特手中。尔后在米尔巴哈饭店的一间客房里由斯特里特、奥马利和几个保险公司的律师们拟出了一份发放保险费的协议书，接着贿赂的款项继续支付。1936 年春天在沃德公园路彭德格斯特家里支付给他的现金装在一只夹层旅行袋里，总数为 33 万美元。

虽然此事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透露出去，但斯塔克解雇了奥马利，谣诼遂不胫而走。杜鲁门参议员对此事了解多少无据可查。也许他知之不多，因为凡事披露后他都费很大劲才能了解到。然而当地方检察官米利根的任期于 1938 年初到期，斯塔克和罗斯福都呼吁国会重新任命他时，哈里·杜鲁门预见到他将是唯一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按参议院惯例，他只要说米利根的为人令他讨厌就可阻止他的再次任命。然而他没这样做，原因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看在总统的面子上不要投反对票。

当然，他也可完全不插手此事，袖手旁观保持缄默。

但上述两条选择他都未采纳。1938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他大踏步走进参议院议事厅的旋转门，对米利根和堪萨斯城的联邦法官们发起了一场全面进攻，他尖刻猛烈的发言对他的名声毫无裨益，除发泄他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懑和可能为汤姆·彭德格斯特带来稍许满意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他说米利根是罗斯福的“个人任命”，旨在安抚“偏激的党派观念十足的新闻界”。他称米利根腐败并指责法官们玩弄权术，因为他们都是由共和党总统哈定和柯立芝任命的。“我说，总统先生，若是一个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的民主党人在密苏里州西部的联邦区法院受审，他根本别想得到公平判决的希望，就像一个被送上希特勒法庭的犹太人和站在斯大林面前的托洛茨基分子无公正可言一样。”

这是哈里唯一一次抨击总统，唯一一次提及他在参议院的政治背景却难能对其加以辩护，是他在参议院最不景气的时刻。他这次又是按备好的讲稿照本宣科。但他看去有些失控，所做出的反应极为过分，虽然他的一些论点值得一听——比如法院拒绝任何杰克逊县的人被选入陪审团便是一例。

几年后堪萨斯城联邦区法院的一位法官说：“组成陪审团的方式以及在选举作弊的选区只有民主党人被起诉，而实际在同一选区的共和党法官和选举工作人员同样有罪的事实使杜鲁门的观点变得不正常而令人难以理解。他觉得他非要宣泄一通不可，果真他那样做了，但却损伤了他的名誉。”

也许倘若他的辩解颇有分寸，经过推敲，他能打消听众对老板统治的一成不变的偏见。以他特有的优雅举止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可能说服人们对他十分崇拜的堪萨斯城组织所取得的成就加以佩服。然而事实是他适得其反，当投票确认米利根的连任时，哈里是投反对票的唯一参议员。

哈里值得夸耀的是，他对一位老朋友显示出大无畏的忠诚。至少他没有“自逃生路”。

白宫方面对他产生的不悦如此强烈，以致他感到自己的生涯将从此断送。他一连郁闷沉思了好几天。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鉴于我星期二在参议院发表的讲话及来自白宫的反响”，他将无法参加1940年的连任竞选——尽管他后来又管朋友索要这封信。

同时哈里祸不单行。他宣布要让他粗壮的总管、杰克逊县府办公大楼的管理人弗雷德·坎菲尔任堪萨斯城的警察局长，这一想法立即遭到强烈反对。司法部派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在一份各部间传闻的备忘录上，J·埃德加·胡佛草草批了一句：“我指示要对此人进行全面彻底地调查。”1939年3月初，杜鲁门意识到反坎菲尔的意见颇为强烈，便说他唯一赞成的人就是坎菲尔。“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赞成坎菲尔。”然而主要由于联邦调查局收集到的大量不利的谣传和意见，坎菲尔被认为不尽如人意因而遭到拒绝。5个月前的11月，哈里还得到司法部上层人物的许诺，称可以接受坎菲尔并批准任命。“他们认为在下一个会期时将需要哈里。”他在写给贝丝的信中如此论及政府，但那是11月。

在堪萨斯城，组织表面上一如既往地运行着，汤姆·彭德格斯特呈现给众人的是一副安详泰然的姿态。他还似往日般去办公室，只不过如今由于健康状况，他先在隔壁的饭店登上电梯，再横穿2层前往1908号，这样就避开了楼梯。1938年春季举行的市级选举中，虽然新的选举委员会是由斯塔克州长任命的，虽然选举作弊审判闹得满城风雨，组织的候选人仍旧以压倒的优势获胜。考虑到联手反对彭德格斯特的诸多势力，这对后者的是确是场辉煌的胜利，它显示出“执政党……并非失去对诚实选民们的号召力。”喜不自禁、志得意满的汤姆·彭德格斯特不可多得地向报界发表了一席话：

如果……美国的民主党总统真地反对我们，如果美国司法部长真地反对我们，如果密苏里州长真地反对我们，如果独立的堪萨斯城《明星报》真地反对我们——我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

在杜鲁门参议员和其他许多人看来，从前的选举作弊多此一举；民主党无论如何会赢的。汤姆·彭德格斯特与哈里在这一阶段有多少联系，联系的程度有多深，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哈里的秘书米尔德里德·德赖登不记得收到过汤姆·彭德格斯特的信。

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用红铅笔写的字条，写在杰克逊县民主党俱乐部的信笺上，笔迹是彭德格斯特又大又清晰的字体：“请帮助萨姆·芬克尔斯坦。由他给你解释。我们已是40年的老朋友。T·J·彭德格斯特。”1938年12月萨姆·芬克尔斯坦带着那个字条找到杜鲁门参议员，他解释说他想把他住在柏林的两个亲戚西格弗里德和保拉·芬克尔斯坦弄出德国。哈里立即着手办理此事，但圣诞节前夕维克·梅塞尔在给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回信中只说此事已交给美国驻柏林的总领事，一旦有进展将“立即”通知彭德格斯特。当时入境名额已满。两位芬克尔斯坦后来是否成功地逃往美国不得而知。

1939年4月4日星期二，J·埃德加·胡佛本人亲抵堪萨斯城。4月7日星期五，汤姆·彭德格斯特因逃税被起诉。据报道，在华盛顿的杜鲁门参议员听到这消息后显得“震惊和悲哀”。“我敢肯定在大陪审团宣布起诉之

前哈里对他朋友的不幸处境一无所知。”威廉·赫尔姆写道，“直到听说后他好像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彭德格斯特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当记者让哈里发表感想时，他说：“得知这一消息我很难过。对详细情况我一无所知……汤姆·彭德格斯特一直是我的朋友，我不会翻脸不认人。”

他在写给贝丝的信中说：“堪萨斯城的掌权派所干下的可怕事情从现在起将给我造成极大的压力。”

5月22日，汤姆·彭德格斯特在堪萨斯城联邦法院服罪。逃税总额加上罚款一共是830494.73美元。

R·埃米特·奥马利、堪萨斯城警察局长和市政工程主任马修·S·默里也因逃税而被判刑。涉嫌贿赂的保险公司经理查尔斯·斯特里特身亡。彭德格斯特7家公司的司库秘书埃德华·L·施奈德向大陪审团陈述了自己的罪行后自杀身死，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从堪萨斯城到底贪污了几百万美元根本无法准确地计算出。也是在被起诉时身亡的市行政官亨利·麦克尔罗伊通过他做了手脚的作帐方式挪用了20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市年预算的一倍。哈里·杜鲁门的几个朋友后来断言，他在当首席法官的时候如果愿意，完全可以贪污100万美元，这似乎是一种克制的陈述。

“他去参议院时一贫如洗。”埃德加·欣德说，“他手头一文不名，而他拥有的机会最多。他完全可以在任时（指县法官）从公路合同中拿走100万。你知道那样做易如反掌。他可以对一个承包商说：“我要提10%的成。”他们连眼睛都不眨就会给他。但他离任时却两手空空。”

“好像除了我人人都在杰克逊县发了。”哈里从华盛顿写信对贝丝说。

5月29日上午8点45分，汤姆·彭德格斯特在他儿子小彭德格斯特和吉姆·彭德格斯的陪伴下到达利纹沃思的联邦监狱，开始其15个月的眼刑生涯，本来判他3年，鉴于他的年龄和健康，减至15个月。在服刑的当天，法官对记者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彭德格斯特朋友们的心情。“我想我要是和他较熟的话，我也会成为他的朋友。我认为善于交友是他的天性。”

所有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哈里·杜鲁门没有染指任何非法活动。犹如对这位参议员从来不以为然的地方检察官米利根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在哈里·杜鲁门身上发现过疑点。”

《生活》杂志在1939年4月24日的一期中用了6页的篇幅对劳埃德·C·斯塔克的崛起加以报道，还穿插了大量的关于彭德格斯特垮台的过分渲染的照片。杂志说斯塔克州长是年轻的纽约共和党人托马斯·E·杜威在民主党内的翻版，两人都是非法骗局的大敌，并称彭德格斯特倒台的主要原因是把“诚实、办事效率高的苹果商埃劳德·斯塔克推进了总统周围的圈子”。至少他将在美国参议院获得一个席位（其他地方还传说斯塔克将出任海军部长）。

密苏里州对斯塔克的溢美之辞不绝于耳。他被冠以“密苏里的道德领袖”、全国重要人物的头衔，并被认为很有可能成为总统的接班人，总之，是个“前途无量的人”。《圣路易斯邮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他极高的评价是他自己赢得的。”斯塔克把社论剪下来寄给了罗斯福。

他在履行职责方面选择了一条艰难、自然亦是正确的道路。他本可以走一条轻松的路，敷衍塞责地应付差事，悠然自得地听任支持他被提名的、大权在握的彭德格斯特集团的吩咐，对老板不多却颇有分量的要求默然同意，以和为贵……

州长是在堪萨斯城集团政治的阴影之下走马上任的。他必须以行动消除他是彭

德格斯特手下人的嫌疑。

毋庸讳言，杜鲁门参议员所选择的道路与斯塔克的形成鲜明的对照。

《生活》也承认斯塔克在 1936 年接受过彭德格斯特的支持，但强调说州长调头反对曾选举他的政治集团在美国政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分别在 1899、1910 和 1932 年都创下了这样的先例。这 3 位都成了总统，而一本正经、仪表堂堂和阔肩膀的劳埃德·C·斯塔克也“绝对肯定”愿意当总统。

9 月，斯塔克宣布他将竞选杜鲁门在参议院的席位。

5

这是哈里·杜鲁门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竞选活动。“如果斯塔克与我竞争，”他对报界说，“我将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但此话主要是威慑；他心里明白他势单力薄。

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只是耍弄了他一阵儿，让杜鲁门误以为将得到他的支持。杜鲁门为一项悬而未决的法案前往白宫，而总统却把话题扯到密苏里的政治方面。他说斯塔克“狡滑”，哈里对贝丝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骗子。“我认为你们的州长不是正派的开明派。”罗斯福说，“他没有幽默感……自我主义膨胀。”后来哈里又撞上了贝内特·克拉克，他虽“醉眼惺忪的”，却答允支持杜鲁门。哈里认为那一天他得到的许诺未免过多了。

然而罗斯福没有给予任何支持和帮助，甚至鼓励都没有，他只是间接地向杜鲁门透露，他将高兴地为他任州际商务委员会里安插一个俸禄丰厚的工作。“让他见鬼去吧。”哈里说。倘若他当不了参议员，他决不再在此地呆下去。

显然，这回他只有依靠自己了。汤姆·彭德格斯特已身陷囹圄，组织四分五裂。罗斯福至多只能保持个中立，但就连此亦难保证。杜鲁门参议员虽对新政忠心耿耿，罗斯福却不愿做他的后台替他说话。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指出，华盛顿那些“诡诈的伙计们”已把杜鲁门一笔勾销了。

在密苏里，除了堪萨斯城《邮报》之外，所有的报纸都反对他。《圣路易斯邮报》认为杜鲁门的希望是“零”。他囊空如洗，而出尽风头的劳埃德·斯塔克则稳操胜券，因为他既富有又显然背后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撑腰。倘若有人在 1940 年即将到来时有理由厌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此人便是哈里·杜鲁门。

私下里，哈里为罗斯福、彭德格斯特和“可怕的”世界局势感到绝望。1939 年 8 月底，希特勒和俄国人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9 月 1 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玛格丽特从没见过她父亲如此悲观沮丧。他在华盛顿去观看由弗兰克·卡普拉主演的影片《史密特先生进入华盛顿》的首映式，希冀能使自己振作起来，但却在信里对贝丝说，影片千篇一律地把参议员都描写成无赖和笨伯，他离开影院时感到大失所望。故事中的主角是个腐败人物，他是某政治帮派的头子，长得肥大而心狠手辣，统治的城市叫杰克逊，简直就是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化身。这一事实无疑令哈里感到痛心。

公众对新政的看法似乎处于低潮。罗斯福在国会里处处碰壁。新政为艰难时期所开的药方并不全面，经济危机持续着。800万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哈里为他妈妈的农庄所欠的钱而倍感担忧。一些借据即将到期，于是维维安便从杰克逊县学校基金会贷了3.5万块钱，交换了农庄的抵押贷款，法律规定凡不急需使用的教育资金可以借贷。哈里内心的希望是卖掉农庄，用卖掉的钱还清所有债务——他现在后悔当初他从法国回来时就该把它卖掉——但他晓得农庄对他母亲意义重大，在她这把年纪变卖它是她无法承受的。

从表面上看，哈里没有参与贷款事宜，后来也说对此事一无所知，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和维维安一起在文件上签字的还有弗雷德·坎菲尔。

阿道夫·希特勒在收音机里不绝于耳的喧嚣使哈里的情绪日益低落。他在华盛顿和罗伯特·丹福德一起吃中饭，谈到欧洲的局势及德国显而易见的军事上的优势，两人都感到“郁郁不乐”。丹福德是哈里在多尼潘军营时的老上司，如今已晋升为将军。哈里很惧怕纳粹统治世界。他把几张旧的法国军事地图又翻了出来，贴在办公室墙上追踪战事的发展。他公开反对惠勒、博拉以及他的密苏里同乡贝内特·克拉克等参议院中强硬的孤立主义派，更加强烈的主张“军备”，并呼吁总统召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修改1936年的中立法案，当年他本人也曾投票支持这一法案，但现在意识到这是一个错举。10月在密苏里州的一次演讲中，哈里说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3位独裁者又返祖到了“穴居人的野蛮状态”。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国的中立立场已经过时，他说。武器禁运必须解除。“我认为我们不能以拒绝对我们的朋友销售武器的方式帮助世界上的暴徒。”他与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贝尔纳斯一道呼吁增加国防拨款、立即集结陆军并建立一支“所向无敌”的海军。“美国第一”运动及查尔斯·林德伯格在演讲中提出的论点令他大为恼怒。11月11日一次大战停战纪念日那天，他在信里对贝丝说：“这一切有时让我们参加过第一次大战的人……思索，文明世界面临的到底将是怎样的命运。”

然而他一如往日毫无怨言地面临挑战，决心击败“变节者”斯塔克重返参议院，因为他知道新的历史即将在那里被创造出来。他挺起脊背，他要看看到底谁是他真正的朋友。

这一期间，他和另外5名参议员飞往墨西哥和中美洲进行一次所谓的“考察”旅行——“就是玩去了。”他坦率地承认。他觉得圣萨尔瓦多“过于贫穷”，但哥斯达黎加从天上俯瞰却俨然一幅古典艺术大师笔下的绘画，“青烟袅袅的火山、蓝色的湖泊和太平洋同时在1·34英里的高空尽收眼底。”他写信对贝丝说。在巴拿马，他坐飞机观看了整个运河，视察了16英寸口径的防御炮，观看一条船穿过米拉弗洛里斯船闸，而且人人都把他当贵宾“大肆款待”。一位他在赖利要塞夏令军营结识的炮兵军官“款待我的方式好像我就是美国总统”。

回程路过尼加拉瓜时，索摩查总统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在墨西哥城，他买了一些过圣诞节的东西，然而他觉得抵达旧金山住进诺布山的费尔蒙特饭店时才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他喜欢旧金山。“你知道，这是世界伟城之一，过去农场主退休时去的不是艾奥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俄克拉何马，他们来到了旧金山和南加州那座城市。”他写道。后者他指的是他不喜欢的洛杉矶。哈里他们那组人想找女伴，便进城“扎进了贫民窟”，唯有哈里撤了出来。“我想我跟别人不一样，”他对贝丝说，“我和那种女人在一起没乐趣——从来没有，即便在巴黎那会儿，而那时我比现在

还年轻 20 岁呢”。

首次竞选战略会议于 1940 年 1 月在圣路易斯的斯泰特勒饭店举行 到会的人尚不足被邀请人数的一半，有些人忸忸怩怩地对他们为何不能积极参加做出了解释。想认真参与的包括哈里的老朋友、独立城市长罗杰·塞门、哈里·沃恩、约翰·斯奈德和与斯奈德一样，也是圣路易斯银行家的詹姆斯·K·瓦达曼。这些人说无论如何他们都将助哈里一臂之力，尽管以“沉闷苦干”和“讲求实际”著称的罗杰·塞门认为哈里应该认清前景十分暗淡。“哈里，我认为你赢不了，这不光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又听到一些类似的令人沮丧的预测后，哈里唯一的话是，谁要是稍微说几句选举杜鲁门参议员的话他将不胜感激。

不能参加会议的吉姆·彭德格斯特让维克·梅塞尔转告杜鲁门参议员，“如果他在初选时只得到两票，一张票就是我的，另一张票则是我老婆的”。吉姆·艾尔沃德决定一直坚持到竞选结束为止。众议员约瑟夫·香农在做出决定之前需要时间考虑。但后来最为哈里卖力的是吉姆·彭德格斯特，他拉拢的选票远远超过 2 张。当时他已接替残缺不全的组织领头人的位置。

1940 年 2 月 3 日，杜鲁门正式宣布他将成为美国参议院连任竞选的候选人，同时还说他反对罗斯福总统第 3 次连任并称他所支持的总统人选是贝内特·克拉克。

哈里很少像这次这样以政客的面貌出现。当时的世界局势姑且不论，就算是平时，他哈里·杜鲁门正经八百地提议让思想保守、持孤立主义态度和酗酒成癖的贝内特·克拉克竞选总统已足以让人觉得他虚伪到家、出于私利和荒唐可笑了。虽然他发誓说，若罗斯福能成为提名人，他将“作为忠诚的民主党人”支持他，但这也丝毫没有减弱他推举克拉克的荒唐可笑的程度。不言而喻，他是为了让克拉克支持东部密苏里才这样做的，另外一层动机可能是想让罗斯福得知他的感受，知道他也会耍手腕而从中获得些许满足。

他反对总统连任第 3 届却是极为认真的。连任的做法与他基本的政治信念相抵牾。“一个民主国家没有不可缺少的人物。”他私下里写道，“当共和制发展到非依赖一个人而不可时，凯撒就出现了。我不认为一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某个个人的生老病死。”

果不其然，推举贝内特·克拉克当总统的呼声瞬间便销声匿迹。

沃恩和斯奈德用募得的有限的资金拉开竞选帷幕，在圣路易斯的大使大厦“借来”的一个房间里建立起总部。“我们借工作人员、借家具，什么都是借的。”斯奈德回忆说。仿佛谁也不愿意出钱。离开华盛顿的办公地点去帮着竞选活动的米尔德里德·德赖登记得连买邮资的钱都没处找。一次邮出 800 封信，请求收信者每人捐助 1 美元，结果只收到 200 美元，显得事倍功半。鲁弗斯·巴勒斯是独立城的一个律师，亦是哈里在预备役里认识的一个朋友，据他说有一阵儿资金短缺得连饭店的一间房子都租不起，候选人只好睡在他自己的车子里。“一个美国参议员……竟然睡在车子里！”

1940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晚上，即德军占领巴黎的第 2 天，竞选正式开张，地点是位于密苏里州腹地的塞达利亚。刘易斯·施韦伦巴赫是第一个赶赴现场为哈里助威的参议员朋友。到场的共有几千人，比预料的要少，但施韦伦巴赫的露面对候选人是一极大鼓励。玛丽·简和杜鲁门的母亲坐在草坪上的第一排。贝丝和玛格丽特坐在主席台上。玛格丽特后来写道：“16 岁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令人兴奋不已的美国政治——即用你的观念和情感打动

‘那里的’人们，让他们站在你这一边。”哈里的母亲已接近 88 岁高龄，她在人群中与人握手，身边有一位竞选助手为她报出别人的名字。也许作为她那一代人，她从不把人们分为“那里的”或“这里的”。

“他是我们的朋友吗？”凡是她见到的人她都这样问。

更多的参议院民主党人陆陆续续来到密苏里以示支持，这种姿态在初选中并不多见，显示出他们对哈里·杜鲁门真心的尊重和情感。3 位老朋友——卡尔·哈奇、谢尔曼·明顿和刘易斯·施韦伦巴赫——都发言为哈里摇旗呐喊。杜鲁门滔滔不绝地对新政大唱赞歌，尽管罗斯福对他不屑一顾。“尽管总统靠不住，”哈里对贝丝说，“但我认为他的主张对国家最为有利……”参议员吉米·贝尔纳斯听说杜鲁门资金不够，便说动纽约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向竞选活动捐赠了急需的 4000 美元。后来，阿尔本·巴克利也在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发表了演讲。但贝内特·克拉克仿佛决意袖手旁观。据说他在华盛顿说，哈里·杜鲁门为他做过什么呢？

在一家报纸的整版广告中，铁路乘务员兄弟会主席 A·F·惠特尼呼吁支持“我们的好朋友”哈里·杜鲁门，几周后，铁路工会为参议员提供了一笔最大的活动经费，共是 1.7 万美元。哈里在他政治生活中从不过手钱的事，这次也一样，他把资金交给别人管理。然而后期为了弥补开销的不足，哈里从他的人身保险里借出了 3000 美元。

4 年对铁路财政的调查产生出杜鲁门一惠勒法案，此法案正等待着通过，它为铁路成为国家运输系统的主流提供了保障。哈里支持 1937 年的农场租佃法，在价格上给予农民支持的 1938 年的农业调整法通过以后，哈里在参议院发言说，要想使农业得到真正的发展，只能让农民公平地分到国民收入。1939 年，他投票赞成扩大低成本住房计划，追加公共事业资金以及联邦政府增加养老金的数额。最让他值得骄傲的是他参与了民航法（1938 年），它为刚刚起步的航空工业制定出统一的规则。

关于国防和美国应如何面对欧洲危机的问题，哈里的立场坚定不移。他 6 月 30 日在广播里说，美国“应尽可能的向大英帝国销售飞机和军事物资”。

这便是他孜孜不倦所谈及的他的业绩。整个 7 月，他坐着他那辆 1938 年产的“道奇”牌轿车横跨密苏里州，替他轮番驾驶的还是弗雷德·坎菲尔，有时是维克·梅塞尔或是他堪萨斯城的老友汤姆·埃文斯。哈里开车时开得很快，其他人觉得是太快了。

他还要时不时挤时间返回华盛顿，由于欧洲的战事，国会仍在开会。然而他就像上次竞选似的，精神头十足。比他年幼 12 岁的汤姆·埃文斯跟不上这快节奏，只好撤出回家。

杜鲁门的演说没有华彩。他不追求雄辩和那种慢慢推进、华而不实的夸张以及密苏里州的听众传统上十分崇拜的华丽词藻的堆砌。他的声音既平缓又尖细——人越多就越尖细。平时说话时他的嗓音颇低沉动听，但他一走上讲坛音色就变了。有时为了强调他说的话，他两手手掌朝内，在空中上下迅速摆动着，同时脚尖以同一节奏一踮一踮的，这一姿势被他的诋毁者学去模仿取笑。

他不善于将政治化为外在的表演艺术。尽管他十分佩服具有这种天分的人，他在这方面却没有任何起色。参议员的生涯亦没历练出他这道本事。与贝内特·克拉克之流相比，他的演讲简直拿不出手，前者在台上讲半个小时只算得上热身而已。但在与听众直面相视的竞选中，他的话却以言之有物而

能打动人。一次在竞选过程中，他教一位朋友竞选的技巧：“把你的讲话限制在 25 分钟之内，然后和听众们握手，接触的人越多越好。接下去即使你还有时间，照走不误。如果没地儿可去，把车开到马路边上打一个盹儿。”

他在乡村的人群堆里与人握手时常说：“我来这儿是想让你们看看，我并非出生在杰克逊县就头上长犄角屁股上长尾巴。”

哈里还主张维护民权，虽然他的观点按后来的标准够不上大胆和充足，但在 1940 年的密苏里也算得上是激进了。他一开始就在塞达利亚面对几乎全是白人的听众表白了他的立场：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建立兄弟般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限于白人之间，而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应以兄弟情谊相待……倘若一个阶级或种族在政治及民权方面被永久地与别的阶级和种族分离或被置于他们之下，那么别的阶级或种族在遇到更强大的对手并惹起其不愉快时，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这样一来维系我们安全的原则就将消亡……

黑人已经受到的欺压来自各种各样的剥削者，从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兜售衣服、钢琴、家具的推售员到引诱他们卖淫的拉皮条者。我们大多数黑人兄弟挤在简陋的棚屋和简易公寓里，毫无舒适可言。作为自由人，他们理应享受到比这更好的生活方式。

私下里，哈里同他正在争取投他选票的那些乡村人一样，管黑人叫“黑鬼”，在参议院的小餐馆里喝酒时也醉心于和同行们开几句种族歧视的玩笑。他不赞成为黑人争取社会平等，对此他直言不讳。但他主张法律面前的公正和平等。当他听说黑人部队在利纹沃思要塞受到歧视时大为恼火，遂行使他的权力制止了这一行径。

那年夏天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民主党协会大会上，他对黑人听众说，为更多的黑人创造受教育机会只会对所有美国人有好处。“当我们坦诚地认识到相互之间的权益，并尊重这些权益时，我们将能以基督徒的方式解决我们的不睦。”法律平等是黑人的权利，杜鲁门说。“因为黑人也是人，是出生在这里的美国人。”

这次竞选在一点上与 1934 年的竞选完全雷同。竞争者又是 3 个人，而且其中一人也叫米利根。地方检察官莫里斯·米利根认为把汤姆·彭德格斯特搞垮的是他而不是劳埃德·斯塔克，所以论功劳他应成为密苏里州的下届参议员。后来有种说法，认为米利根实际是被杜鲁门的一些人设圈套诱进竞选的——为的是分散斯塔克的选票——不过这一传说一直没找到根据。选举结果的确与传说中的预料相符（正像塔克·米利根在 1934 年分散了科克伦的选票似的），因而对杜鲁门来说，他进入竞选的时机再适宜不过。

前几周的优势完全在斯塔克一边，米利根居次，杜鲁门远远落在后边（丹尼尔·菲茨帕特里克在《圣路易斯邮报》上画了一幅漫画，两辆分别写着“斯塔克”和“米利根”的重型卡车头对头撞在一起，它们之下是一只玩具卡车，印着“杜鲁门”的标记。一旁的文字写的是“没有儿童车的地方”）。然而米利根很快就被挤出角逐，竞争遂在斯塔克和杜鲁门之间展开。哈里·杜鲁门似乎从一开始就本能地意识到，他最大的优势之一正是斯塔克其人。竞选开张之前，一天晚上在华盛顿威拉德饭店吃晚饭时，哈里对他的几位朋友说他敢肯定斯塔克将对他人的人格进行攻击，而只要他哈里根本不提斯塔克的名

字，就将打乱斯塔克的阵脚——“他的棋将越走越错，从而使我稳操胜券。”

果然不出所料，斯塔克一上来就对杜鲁门大张挞伐，称他为彭德格斯特
的走狗，傀儡参议员和骗子。他在乔普林的一次演讲中说：“体面虔诚、诚
实守法的密苏里公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一个靠假选票混进美国参议
院的冒牌货，他在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他那位腐败
的幕后老板效力……”

杜鲁门的卷宗里仍保存着斯塔克感谢哈里把他介绍给汤姆·彭德格斯特
的那封信。竞选班子的一些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敦促哈里将其公诸于世，认
为它肯定能一锤子决定选举的结果。但哈里没同意，说他想让斯塔克自取灭
亡。

关于斯塔克的一些传闻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人们留意到，他的司
机必须向他行军礼。接着，在距初选结束还有几周时，斯塔克以参议员及副
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身份出席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对这一形
势，最后断定哈里·杜鲁门应该得到支持的贝内特·克拉克堂而皇之地开始
大显身手。克拉克对《圣路易斯邮报》的一名记者发表言论说：

劳埃德的野心犹如从天而降的濛濛露水，将大地万物都笼罩起来。他同时想竞
选总统、副总统、海军部长、陆军部长、菲律宾总督、驻英国大使和美国参议员，
这在美国史上实在是破天荒的例子……我明白，他还被提名竞选阿富汗的酋长和斯
沃特的阿克亨德。

斯塔克是竞选副总统职位的 17 个人选之一。他们中有国务卿科德尔·赫
尔、众议院议长威廉·B·班克黑德、威廉·O·道格拉斯、吉米·贝尔纳斯、
亨利·A·华莱士和众议员萨姆·雷伯恩。在芝加哥，斯塔克为代表们分了几
蒲式耳的苹果，在第一轮投票中获 200 张选票。然而最后的决定是由已接受
大会提名将第 3 次连任的罗斯福在华盛顿做出的。他任命的是农业部长亨
利·A·华莱士，此人过去是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人，曾做过由他祖父创办的《华
莱士农民》报的编辑并是位活跃的开明人士。

杜鲁门是随密苏里代表团去芝加哥的，他被划分在职能重要的决议案委
员会里。代表大会于 7 月 15 日开幕，但堪萨斯城翌日发生了一件很少让哈里
感到极为震动的大事。在县法院掌权的共和党人决定对哈里家在格兰德维厄
的农场取消抵押赎回权，于是 7 月 16 日星期二，农场的 195 英亩地便在堪萨
斯城法院台阶上公开拍卖。《明星报》在头版登了一张拍卖现场人群的照片，
文字解释说农场的主人是密苏里参议员之母马莎·E·杜鲁门。哈里事先有没
有得到警告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他无力提供资金使他母亲免于从农场上被
逐走。他还敢断定此事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的是在竞选活动期间令他难堪，
这一猜测无疑是正确的。

代表大会进行了 2 天后，副总统提名之争正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哈里突
觉异常虚弱疲惫，以为自己犯了心脏病。他伸手抓住一道栏杆，在上面靠了
10 到 15 分钟，丝毫动弹不得，后来有个人看见了他的情形，把他扶到了一
把椅子上。

位于蓝岭的家没了——尽管以后还可将其收回。哈里的母亲和妹妹搬到
格兰德维厄的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不久，杜鲁门大妈在没走惯的台阶上滑
了一跤，摔断了髓骨。当时由于髓骨骨折容易致命，哈里觉得她妈妈这回完

了。但她幸存下来，而且对新居毫无怨言。

在一封家书中，哈里让贝丝想象一下如果她母亲被人从北特拉华大街219号逐了出去，她将感到多么大的羞辱。

初选投票日是8月6日；7月底哈里在信里写道：“我脑子里总是想着8月6日。”西奥多·罗斯福曾写过这样一句话：“烦恼的忧虑赶不上忙马加鞭的人。”这似乎也是驱散哈里忧心忡忡的良方。

明天晚上在塞达利亚给你打电话。坐火车晚上9点半到那儿。礼拜四上午10点到达索尔兹伯里，下午2点到基泰斯维尔，4点到不伦瑞克，晚8点到卡罗顿，9点到哈丁。第2天去古巴和开普吉拉多。礼拜六去西克斯顿、莫尔登和波普勒布لاف。礼拜天休息，礼拜一去拉马、内华达、里奇山和巴特勒。礼拜二去哈里森维尔、贝尔顿和堪萨斯城。星期二晚上回家住……31日去圣路易斯。巴克利30日和31日分别去堪萨斯城和圣路易斯。在圣路易斯呆到礼拜六就回家。

哈里在巴克利的陪伴下在圣路易斯做的晚场演讲以惨败告终。大厅里能容纳3000名听众，但到场的只有300人。

然而在最后一周，恰恰是圣路易斯的事态发展不期然地对哈里有利起来。后来竞选结束结果揭晓后，哈里曾对贝丝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认清了谁是我们的朋友……”

出人意料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竟是贝内特·克拉克。在圣路易斯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克拉克开始给全州他认识的人拨电话。“他后来住进了医院，但我们继续催促他帮忙。”杜鲁门竞选班子的一个人回忆说，“他拨电话就没停过。”

克拉克对一位健壮宽肩的爱尔兰裔美国小伙子的影响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伙子名叫罗伯特·E·汉尼根，杜鲁门过去从来不认识此人。他是圣路易斯警察头子的儿子，一度曾是圣路易斯大学的体育明星，法学院毕业后还打过一阵儿半职业棒球。自1933年以来，他一直是民主党政治中的活跃分子，在迪克曼的组织中摸爬滚打，终于登上了市主席的宝座。然而汉尼根效力的对象一直是斯塔克。贝内特·克拉克劝说他改变立场的话或向他做的许诺肯定非常令他信服，因为离初选还剩2天的时候，汉尼根突然抛弃了斯塔克，疯狂地为杜鲁门捧起场来。事后回顾时，哈里认为那是他们在竞选中遇到的一次最大的运气，在他眼里，那位高大漂亮、爱戴花领带的年轻人并非是在耍花招，尽管若是有人像汉尼根对待斯塔克似的在他面前改弦易辙，他就会把他当叛徒看待。

据说在选举的当晚杜鲁门说：“噫……这会儿我才真正感到筋疲力尽。”他的朋友埃德加·欣德接荐儿说，那一夜到天明前似乎格外的漫长。

玛格丽特记得她父亲入睡前曾说他能赢。他们一直在起居室里听着收音机播放选举结果报告。11点时，斯塔克以1.1万票领先。玛格丽特后来写道，那是她妈妈一生中最难忍受的一个夜晚，他俩都哭了。子夜时电话铃响了，当时家人都睡下了，接电话的是贝丝。在圣路易斯的竞选班子里的工作人员戴维·贝伦斯坦想向密苏里参议员的夫人表示祝贺。贝丝以为对方在恶作剧，呼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但贝伦斯坦又打了过来，杜鲁门在圣路易斯获胜。

正如杜鲁门说的那样，他在竞选中险胜。投票总数是66.5万张，他比对方多出的票数尚不足8000。他在圣路易斯也是以8411票的超出额击败了斯

塔克，这完全靠的是汉尼根在贝内特·克拉克的影响下在紧急关头助了他一臂之力，黑人也大都投了杜鲁门的票，而他获得的农民票数比1934年还多。最重要的是他以2万票在杰克逊县取胜。按理说凡是与彭德格斯特家族有瓜葛的人在各县都应一败涂地，但哈里还是获得了2万票，虽然这仅是1934年他在杰克逊所得选票的1/5。他在百姓中的威望、吉姆·彭德格斯特以及残缺不全的组织们的努力，大大抵销了丑闻的轰动效应、他的对手的诋毁以及《明星报》不留情面的反对。这的确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莫里斯·米利根拍来了贺电，并向杜鲁门保证在秋季大选中给予他支持。斯塔克州长没有公开表态，但在给罗斯福的私人通信中将其失利怪罪于“政治集团的选票，而其后台正是操纵着各种势力的贝内特·克拉克”，外加“几乎所有的联邦政府官员，包括各个邮政局长和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使杜鲁门得逞。此外，斯塔克又说，“对我有利的农村选票”没能兑现，“主要是由于严重的干旱”。

米利根因为参加了初选，辞去了地方检察官的职务。当他申请重新任命时，杜鲁门给罗斯福写了封信，申明以公正的眼光看，米利根应该复职。然而，当斯塔克州长的任期期满，杜鲁门听说罗斯福打算把他安插进劳工调解委员会时，杜鲁门从中阻挠使其未能得逞。于是仿佛命里注定本应飞黄腾达的斯塔克满怀愤懑地离开了政界，从此再没有担任过官职。

初选结束后的3天，哈里·杜鲁门走进参议院会议厅时，两党领袖和在场的所有民主党人“一齐冲了上去”迎接他。多数党秘书莱斯·比弗尔对哈里说，据他所知，过去没有任何一次政治竞选能像他在密苏里的竞选那样引起参议院如此浓厚的兴趣。比弗尔出乎意料地为哈里安排了一次午宴。“我看惠勒和吉姆·贝尔纳斯恨不能想吻我。”哈里给贝丝的信中说，他心中仍旧充满当天的喜悦，“巴克利和帕特·哈里森几乎喜不自禁。施韦伦巴赫、哈奇、利斯特·希尔、汤姆·斯图尔特和哈里·施瓦茨差点儿没把我打死。丹尼斯·查维斯自从芝加哥代表大会就没沾过酒，但他说今天这大吉大利的日子他得破戒，于是大喝了一通。明顿拥抱了我……总之，你可以看出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聚会。”

虽然在秋季大选中杜鲁门不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温德尔·威尔基那样痛快淋漓，但也大获全胜，以4.4万票的超出额战胜共和党候选人曼维尔·戴维斯。

哈里返回华盛顿之前的最后一个忧虑是确认他连任的文件迟迟没有下发。根据法律，这一文件需由劳埃德·C·斯塔克州长签字。12月13日，他在拍给参议院秘书爱德华·A·哈尔西少校的电报中焦切地问：“你正式收到我的当选证明了吗？”哈尔西在回电中让他放心，说一切手续都已齐全。

哈里驾驶着一辆崭新的后来跟随着他15年的淡灰色双门1941年产的“克莱斯勒皇家”牌轿车，带着贝丝再次向华盛顿进发。

七、爱国者

战争有许多面孔；或者说战争中的人和民族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埃里克·塞瓦赖德

1

年轻时代的哈里·杜鲁门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抄了一首坦尼森的诗《洛克莱斯大厅》，这首诗他后来一直还带在身上，整齐地叠好放在钱夹子里，此诗问世时飞机还没有发明，但诗的内容描写的却是一场未来的空战：

听见空中传来呼喊，那如雨般可怖的水珠，
来自各国的空中海军鏖战于碧空中……

1940年7月，希特勒的德国空军每天飞越英吉利海峡轰炸英国的港口、机场和伦敦，皇家空军的“火舌”和“飓风”飞机为了自卫腾空与敌机“鏖战”，由此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空战——不列颠之战。情形正如坦尼森所预见的而且更险恶。9月7日对伦敦发起的一次空袭中，德军共派出了前所未闻的375架轰炸机。接着又开始了夜间空袭，美国人从记者罗伯特·邦内尔和海伦·柯克帕特里克发回的报道里，从收音机里爱德华·R·默罗动听的嗓音所播放的亲眼目睹的描绘中，读到和听到了燃烧弹所造成的破坏。默罗在伦敦时间10月10日凌晨5点钟的播音里说：“当我注视着那些白色的火球升空而起又熄灭时，注视那黄色的火焰渐渐变暗而消失时，我想，靠这点雕虫小技休想烧毁这座伟大的城市。”希特勒吹牛说他的猛烈空袭将摧毁英国人的意志。12月29日星期天，伦敦经历了最野蛮的轰炸，城市上空总共投放了1000多枚炸弹。

那天晚上在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轮椅里被人推进白宫一层的椭圆形外交接待室里，通过广播发表了他后来被称作“民主的兵工厂”的“炉边讲话”。他说纳粹决心要奴役世界，并警告说抚摸一只老虎绝不能使它变成一只猫。他认为美国文明自从在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建立以来受到了最大的威胁。他想要的并非战争，而是全面大量地生产军事物资以便提供给那些受到纳粹攻击的国家。“我们必须成为一座巨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因为我们已处于同战争一样严重的非常时刻……”

1941年1月6日，在新当选的两院联合会议上，哈里·杜鲁门参议员聆听了罗斯福发表的第二次强烈呼吁采取行动的讲话，总统对那些为捍卫他所说的4项自由而战的国家的国家表示支持，这4项自由是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脱贫自由和摆脱恐惧的自由。杜鲁门觉得讲话中的总统处在他的辉煌时期。几天后，罗斯福抛出了租借法，以赊购的形式向英国运送武器，两院遂为此引起了争论。参议院持孤立主义的人——惠勒、范登堡、贝内特·克拉克、杰拉尔德·P·奈和俄亥俄州的塔夫脱——极力反对，称这一提案是通向战争之路。一直是杜鲁门师长的惠勒言辞最为激烈，说这一做法将“葬送1/4美国小伙子的生命”，罗斯福称惠勒的话是他那代政界人物所发表的“最恶劣的屁话”。杜鲁门认为惠勒、克拉克等人实在是眼光短浅，大错特错。贝内特·克拉克成了“美国第一”运动的大红人，他赞誉林德伯格，声称“我们将在战

争中失去一切而一无所获”。克拉克反对向英国提供援助，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进一步卷入战事。他说倘若希特勒征服了欧洲，“我们与其把武器在欧洲白白浪费掉，还不如保卫美国”。

杜鲁门断定克拉克正在葬送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且很显然，他的头脑因喝酒过多越来越不清醒。杜鲁门屡次三番地投票反对旨在限制罗斯福执行租借法案的修正案。

杜鲁门此时已是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军事小组的成员。9月，他投票赞成首次和平时期选征兵役法。12月，美国虽未正式参战，却在国防承包契约方面拨出100亿美元的款项。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上将在国会呼吁建立一支200万人的军队，追加10亿美元的军费并说这项费用仅仅是个开端。

当问及他为紧急时期提出的要求是否太过分时，马歇尔回答说：“假如我们除了爱国主义和精神支柱之外样样东西都齐全，我才能彻底松一口气。”

杜鲁门参议员此时已是预备役的上校，他知道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是个严重的问题，便前往位于旧军火大楼酷似养兔场的马歇尔办公室，希望能被应征。马歇尔从鼻子上摘下老花镜，告诉哈里他年龄太大，不如还是留在参议院里为国效忠。

事态发展迅速，华盛顿古老简单的生活方式已成昨日黄花，一夜之间城市仿佛变了个样。大萧条年代，即便1933年实施的新政带来了许多变化，但华盛顿大体上还是一座小城，骨子里依旧是按部就班的南方作派。现在则到处充斥着新面孔，一群群政府新雇员，日益增多的轿车以及繁忙和混乱的景象。一年前，坐落在林荫大道上的诸如军火大楼那样的古老的“临时”建筑物似乎即将被拆除夷平，原因是这些在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说法当时已开始使用）建造的占地几英亩的房屋极不雅观。然而一年后对这类建筑的需求却增加了。大量的新的战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谁也弄不清他们的名字和缩写，如NDMB（国防调解委员会）、OPM（生产管理办公室）和稍后成立的OEM（紧急时期管理办公室）。还有SPAB（供应优先配给和分配委员会）及DPC（国防工厂公司）。

每月都有5000人加入城市的人口。住房的紧张程度已超过了1918年。杜鲁门夫妇幸运地在康涅狄格大街4701号找到一栋5间小房间的新公寓，它在2层，临街，月租120美元。这次他们决心不再动了，因为贝丝——杜鲁门参议员称她为夫人或老板——打算和玛格丽特在此住上一年。

电影院前的队伍总是很长，联邦火车站永远挤满了人群。饭店酒吧和高档餐厅里随时可以听到生产商代理人的喧哗声，他们四处寻找国防承包契约和自称拥有有利竞争地位的有影响的推销人员。谈话内容与过去亦大相径庭，变得更紧迫和充满了诸如“武器贮存”、“装备工厂”和“动员”等新词儿。新政已过时，大萧条亦成为逝去的年代。此时的偶像人物已和在罗斯福执政初年大批蜂拥到华盛顿之辈判若两人；他们是“领取象征性薪俸”、精力充沛身价颇高的公司董事长，这些人虽在政府任职，却还在过去的公司支取薪水，杜鲁门参议员和另外一些人对此做法颇持怀疑态度。

然而就当时的危机而言，尽管节奏加快，却总觉步伐迈得还不够快。对于诸如马歇尔上将那些了解国家的军事实力并全力以赴试图对其加强之的人来说，首要的忧虑就是变化过于缓慢。

起初，杜鲁门面对新的局势有些不知所措。

选民们对密苏里中南部新建的新兵驻地利奥纳德伍德要塞中存在的严重浪费和投机活动大发牢骚，引起了哈里的关注，此外他还对家乡没能得到国防承包契约而感到担忧，于是决定亲自“出外调查一番”。他开着那辆旧道奇从华盛顿出发，一直南下到佛罗里达，再转向中西部，最后北上直达密歇根，沿途在军队设施和国防工厂停下调查。这又是他的一次汽车长途旅行，与若干年前视察县府办公楼的情形相似。后来他声称他跑了3万英里，即比绕地球一圈的距离还多出5000英里，这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估计他总共跑了1万英里，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经历大开眼界。经济萧条在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时期面前显然已经消退。但生产军事武器的匆忙却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巨大浪费。他发现各地情形基本相似。几百万几百万的美元白白地挥霍掉，他想若是几年前联邦政府在救济贫困和失业大军时在管理上产生这样的失误，全国将掀起抗议的呼声。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没人关心，人人都噤若寒蝉。倘若打着国防的口号，花钱就无顶可封。

在利奥纳德伍德要塞，他看到昂贵的设备和物资被丢弃在雪地和雨水里“生锈腐蚀，它们已不能使用，也永远不会被使用……”

承包商丝毫没有建造经验。“而四下里都是人，好几百口，闲在那里白拿工钱，什么也不干。”杜鲁门走访了此地和其他施工现场，把他亲眼所见和人们乐意对他说的都记录下来。除非被问起，否则他轻易不透露身份。

他发现多数军事营地都是以实际成本外加一定比例费用的方式建造的，即付给承包商所有成本费外加一定百分比的利润，这实际是一条牟取暴利的捷径。绝大多数国防工程都是由一小部分大企业承包的，而后者主要集中在东部，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引起哈里的忧虑。他担心在进行政府交易中应贯彻的许多保护性措施已经失效，因而觉得应立即向总统汇报。

返回华盛顿后，他打电话给白宫要求会见总统。从他被引进椭圆形办公室时起，他便受到了最热烈和最令他满意的接待。罗斯福神采奕奕。他一只手臂习惯性地朝空中一挥，在轮椅里对参议员表示最诚挚的欢迎。他俩隔着一张布满了零乱纸张和小摆设的桃心木大写字台谈了半个小时，总统不断地称他“哈里”。然而会见结束杜鲁门离开后，他拿不准他的话是否给罗斯福留下了什么印象。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罗斯福如此礼貌热情，以致你摸不清他在想什么，也弄不清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最后他说：“不管怎么说，我要把我的调查在参议院公诸于众。”

他花了几周的时间准备讲话，其间还找其他议员磋商并征求朋友和属下的意见。他对威廉·赫尔姆说，工业巨头和工会在这种时期显露出的贪婪令他义愤填膺。“不对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说。

1941年2月10日星期一，杜鲁门登上参议院的讲台，描述了他所见到的问题，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国防承包契约的分配进行调查。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是他显身手的时刻。他在政坛及战争期间的默默无闻即将结束——而这完全归功于他自己的努力。

参议院立即做出了支持哈里的反响（哈里除了对令人反感之极的军事开销状态敲响警钟之外，还指责陆军部对议员提出的有关国防承包契约的建议置之不理是不公正的行径，这在国会引起了一致的共鸣。“某州的参议员若是推荐承包商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他说，“尽管对承包商的效率和能力他比陆军部中的任何一个人人都了解得更多”）。先被提交给军事委员会的71号决议案几天之内就得到一致的表决通过，但接着它又被转交给参议院应急

费用审计与控制委员会，它在那里很可能被无限期的束之高阁，因为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吉米·贝尔纳斯，此人与行政当局关系密切，而行政当局是不希望其处理事物的方式受到议会委员会的审查和拖延的。罗斯福对参与国防生产的所有人的告诫是：“速度，速度，速度。”

为了显得这方面的工作有章法可循，罗斯福设立了一个国防顾问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了一个生产管理办公室，但行政管理上并不明确，因为没有专人负责。实际上庞大的国防工程完全由白宫一手操纵，而最令白宫的人讨厌的就是应付一大群国会的调查人员。陆军部对此也发出了警告。只要出现一个烦人的参议员就将意味着没完没了的问题和有损于名声的曝光，更不必说调查委员会野心勃勃的主席了，后者首要和秘而不宣的目的十之八九是为了个人的政治投机。国会旷日持久的调查势必会拖延或阻止整个计划。

只有一个人提醒行政当局不要怀有“忿恨不满的态度”，此人是参谋长马歇尔。他说：“我们必须了解到，国会议员们同我们一样地爱国。”

杜鲁门明白他所提建议存在的潜在危险。他从所阅读的内战历史中知道国会在非常时期骚扰总统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并因拖延战争而使无数人丧生。亚伯拉罕·林肯就曾受到强大的战争行为两院联合委员会不留情面的审查，从而造成无休止的烦恼和延宕。委员会激进的共和党领导班子甚至在指派战场指挥员和作战战略方面都要插手，因而获利者常常是南方联盟。罗伯特·E·李一次曾说该委员会相当于白给他两个师，这句话后来杜鲁门时常引用。哈里在国会图书馆查阅内战资料，以证实上述委员会所犯的过错。

杜鲁门同许多人一样，对杰拉尔德·P·奈及他的委员会所进行的马后炮式的调查表示反感，奈在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后，提出了军火商均是阴谋家的理论。杜鲁门认为奈的委员会是促成国会中存在孤立主义观点的主要诱因，对全国令人痛心的无准备状态起到了最为消极的影响。杜鲁门说战争结束后再去挖掘死马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做法是找出现在的问题并纠正之”。

然而哈里的提议没有被扼杀是由于好斗的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尤金·考克斯在议会提出的另一项提议。考克斯公开鄙视罗斯福，期冀成立一个两院联合委员会对涉及国防的“一切活动”进行调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吉米·贝尔纳斯对总统强调，他还不如落在“持友好态度的人的手里”——即杜鲁门委员会——罗斯福遂应允。贝尔纳斯还要求拨给杜鲁门1万美元的经费，用这点微额资金来监管仅1941年就超过130亿美元的开支实在显得荒唐可笑；杜鲁门极力反对，但最后只把拨款增加至1.5万美元。

71号决议案于3月某星期六下午表决通过，当时在场的只有16位参议员，贝尔纳斯要求立即实施这项决议案时，没有一个人反对，遂以全票通过。一周后在晚上的会议上，参议院拒绝了孤立主义派的修正案，通过了租借法，这项法案的经费为70亿美元。

新成立的委员会正式名称为参议院调查国防计划专门委员会，但从一开始人们就无一例外地称它为杜鲁门委员会。总共有7名成员，5名民主党人，2名共和党人。除了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之外，包括主席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年轻的参议员，此外用一个局外人的话说，个个都没有“惊天动地的能力”。民主党人是康纳利、新墨西哥州的卡尔·哈奇、华盛顿州的蒙莱德·C·沃尔格伦和纽约州的詹姆斯·米德。共和党人有明尼苏达州的约瑟夫·H·鲍尔和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

“看来我可以成就点儿事了。”哈里在信里对贝丝说。前一年夏天初选进行到一半时，他曾对她说：“明年的政治形势看样子能载入历史，我要是能赢的话你就看着吧。”他觉得自己再次成了历史的参与者，而这种感觉自从离开法国后就中断了。他明白，他在参议院的第2任期绝不会与第1任期雷同。华盛顿和世界已经变了样。他也不再是过去的哈里。连他的批评者都承认他的提议是一桩妙举。他交给了自己一项危险重重的任务——因为他必然会与首都一些权势在握、固执任性的人们发生冲突，包括总统——但正如在法国和他大部分生涯那样，最过瘾的事莫过于证明你能胜任挑战。

哈里根据他铁路调查的经验，深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听从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的建议，雇了一名司法部年轻律师。此人叫休·富尔顿，刚刚给一位犯了诈骗罪的联邦法官判了刑。富尔顿年仅35岁，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他个子高大，脸蛋像苹果，身高6英尺，又圆又胖。他戴一顶黑色圆顶礼帽，说话声音尖细。他对杜鲁门参议员说他的工资要达到9000美元，即比经费的一半还要高。杜鲁门雇了他，自信只要他们的工作有结果，钱将不成为问题。

富尔顿像杜鲁门似的起得很早而且工作扎实。他聪明、执著，后来证明是个一流的人选。一连几个月，委员会所能花钱雇的工作人员唯有他一个，尽管这一问题采用参议院惯用的从若干“城里”（行政）机构“借人”的办法临时得到了解决。

雇用的第一个调查人员是来自波士顿的年轻的马修·J·康奈利，他曾为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调查过竞选活动经费。其他调查人员包括后来成为众议员的乔治·米德；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哈罗德·罗宾逊；唯一的一位女子艾格尼丝·斯特劳斯；刚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莫里斯·拉斯克；一位叫威廉·博伊尔的堪萨斯城年轻人，他在彭德格斯特的组织里从选区头子一直爬到堪萨斯城代理局长的位置；还有一贯忠心不贰的弗雷德·坎菲尔，他的办公地点不在杜鲁门办公室，而是在堪萨斯城联邦大楼里。

杜鲁门的参议员助理中唯一发生重大变化的是维克·梅塞尔莫名其妙地突然辞退，显而易见，虽然梅塞尔对参议员忠诚不贰，但他贪污了竞选经费——至少杜鲁门是这样认为的——因而他的上司便让他另谋高就。

为了顶替梅塞尔，杜鲁门把他的乐天派朋友哈里·沃恩调到华盛顿，指派他既当自己的秘书（当时行政助理仍旧使用这一头衔），还兼任委员会与军事部门的联络员。沃恩本身就是预备役的中校（后来他离开去陆军航空兵担任现役军官）。

调查中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亦不能搞政治迫害，杜鲁门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不借助新闻媒介哗众取宠，也不阻碍国防计划的进行。但同时他们也不能被权势和政治压力吓倒。首要的任务是掌握事实。“什么东西都替代不了事实。”哈里说。他们对自己的任务必须十分清楚。“要尽全力搜集事实。”他告诫他们说，同时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对正在调查的对象说他们干得不错。“如果你这样说了，事后又发现他们有差错，他们就会说我们委员会曾对他们的做法表示过同意。”

他们的时间将花在有明显和急需解决问题的地方。不要毫无目标地有意找麻烦——这一点调查人员和委员会成员都要遵守。有一次在内部会议上，非委员会成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也在座，他出于好奇地问：“你们今天上午想探听点儿什么？”他觉得这在内部会议上是个很正常的问

题。

杜鲁门很生气。“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为了诬陷而进行非法调查的。”他答道。

“我想尊敬的主席不喜欢我的问题。”威利说。

“我不喜欢。”杜鲁门说，“对这样的问题我表示反感，我们不是进行非法调查的。”

所有调查结果必须向委员会全体成员汇报，不能只透露给一个参议员或主席。委员会在军事战略、军事人员或国防计划的规模及配置方面没有发言权。

杜鲁门最欣赏休·富尔顿的地方是他“动机纯正”，而后者对委员会总体工作所做贡献之大使一些人后来认为他是委员会的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动力是杜鲁门参议员。

旷日持久的调查于1941年4月15日开始，十几位军界和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来到委员会，他们中有年过花甲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当探讨到军队的资历问题时，马歇尔坚决主张通过选择提拔军官。“你给予一个善于指挥者的不多，他却能成功。”他看着主席说，“你给予一个平庸之辈很多，他照样会失败。”几年后杜鲁门说，他对乔治·马歇尔的尊敬起始于这次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

委员会总共在全国视察了9座兵营，4月23日，他们来到坐落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兵营。他们发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敦盖普的一座兵营的建造费用比预算高出10倍。预算为48万美元的位于得克萨斯的华莱士兵营结果却花掉了253.9万美元。几处实例表明，陆军在选择兵营场地方面表现出“极差的判断能力”（米德要塞便是典型），此外由于一开始就租用卡车和其他施工设备而没有购买，致使约1300万美元被白白挥霍掉。

一次大战以后，当浪费和低效率猖獗盛行之时，陆军曾对兵营建造做过一次专门的研究，但委员会发现，这一专门研究竟然丢失了，委员会主席得知这一消息时“惊讶得目瞪口呆”。杜鲁门在向参议院做的报告中说，如果我国的军事战役计划也像兵营建造计划似的丢失，形势将是何等悲惨。

首要问题是成本加一定比例费用的承包合同是否合理。“根本就没人问过承包商们在平时时期都建造些什么，甚至什么样的价他们就可以接受，”杜鲁门写道：“政府给的固定费用高得惊人，就像圣诞老人在教堂圣诞晚上分发礼品似的。”

有些承包人几个月之内就能挣到平时一年所赚的3到4倍，而且毫无风险可言。一个建筑师通过军队契约合同使他的收入增加了1000倍。

脾气暴躁的军需部长布里恩·B·萨默维尔中将以高效率著称，他对委员会大发牢骚，说它是“为政治目的而成立的邪恶怪物”。他说时间和金钱不能同时节省，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萨默维尔是个出色的将军。”负责调查人员的马特·康奈利回忆说，“但他又是一个严峻的军纪官，讨厌别人的任何插手和干涉。但杜鲁门参议员并不顾忌这些，他照样调查下去。”

后来萨默维尔也承认，杜鲁门委员会仅对陆军建造兵营的一项调查就为政府节约了2500万美元。此外，在委员会的强烈推荐下，陆军军需兵把建造兵营的任务移交给了陆军工兵部队，这在一开始就理该如此。

委员会的参议员们干得都十分卖力，主席尤为突出。4月，在第一次与

史汀生和马歇尔会见前的几个夜晚，杜鲁门患了胆囊炎。夜里他被绞痛惊醒，贝丝以为他心脏病发作。但他的工作日程并没有松懈，到6月份他又累得筋疲力尽。

1941年6月19日，哈里写信给再次回密苏里的贝丝，他说：“我在参议院和街南边（白宫）的名声越来越大，但愿我不犯错误。”要是他不这样白天黑夜地拼命干，他说，身边没有她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又颇感伤地说：“但愿我独自在此的日子不会太长。”

6月22日，传来希特勒沿着1800英里的战线向俄国进攻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当被问及他对这急速变化的事态做何感想时，杜鲁门讲了一番人人都会误解而且不会马上忘却的话。“如果我看到德国要赢，我们就应帮助俄国，”他说，“如果俄国能赢，我们就该帮德国一把，这样让他们相互厮杀得越惨重越好，虽然我不希望看到希特勒在任何情况下取胜。”这番话在这种关头很不合时宜，但同多数美国人和多数议员一样，杜鲁门看不出法西斯德国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俄国之间有何区别，尤其是1939年签署了纳粹苏联协约和俄国入侵小国芬兰之后。他也不愿意因为俄国遭到纳粹的突袭就对苏联政权的现实视而不见。他觉得斯大林正想从发生的事件中渔利，而这一看法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可。

哈里对世界局势和自己都很担忧，便前往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进行体检。医生告诉他除了疲劳之外他安然无恙。他对检查他的内科大夫说他头疼得厉害而且恶心，大夫在他的病历上写道：

去年他参加连任竞选，疲劳过度……其间承受了对他的大量诽谤中伤……对他的攻击使他深受影响，精神刺激很大。从那以后症状明显加剧。最近几个月参议院里活动增多……他觉得他已跟不上目前的工作节奏。

然而他又埋头于工作之中，节奏非但一点儿没减速，他的压力还愈发增大起来，因为调查的触角渐渐伸到了白宫。他绝不含糊其辞，于是人们开始对他拭目以待。8月，他在参议院发言时，参议员范登堡迫使他承认总统犯有过失。“换句话说，”共和党领袖人物范登堡说，“参议员的意思是说国防计划所面临的主要绊脚石是国防管理上缺乏恰当的组织 and 协调……这样的局面应由谁来负责呢？”

“应负责的地方只有一个。”杜鲁门回答说。

“什么地方——白宫？”

“是的，先生。”

“谢谢，参议员。”

哈里同委员会的其他参议员和调查人员跑遍了全国——多数情况下是坐飞机。他们通常在一座城市或军事基地住下来，花一两天的时间进行例行调查，然后像街头剧团似的再度上路，此时人人都对各自的职责十分清楚。他们视察军工厂，在当地饭店里举行意见听取会。他们发现有些地方不存在任何问题。8月底他们去了孟菲斯和达拉斯，尔后又前往圣迭戈、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斯波坎。哈里无论行程多么紧张，几乎每天都写信、打电话或兼用这两种途径告之贝丝他一天的活动。有些信率直地把他们调查的结果描述出来：

亲爱的贝丝：

昨天在圣迭戈过得不错。海军为我们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我们上午9点钟离开机场，10点抵达圣迭戈，海军上将布莱克利领我们四处转了转，看了看正在建造中的海军陆战队兵营，和新兵一起吃的午餐。从圣路易斯来的一个密苏里州小伙子负责招待我，伺候米德的是纽约来的，招待沃尔格伦的来自华盛顿。视察了新建的陆战队基地营地，后来又去了一家飞机厂——联合飞机厂——据说是最大的。经理们清一色都是骗子，跟你根本没一句实话。每人都说什么问题都没有，前景看好，可偏偏有人却陷于可怕的困境之中。分别问了他们五六个人之后，我脑子里有了点大致印象，有些情况很不妙，另外一些还不错。我们生产出的飞机数量很多，要是海军和陆军的弟兄们对他们需要的东西心中有数的话，还可以生产得更多。劳力是个问题，敲诈现象同兵营建造计划一样也很盛行。有些人应该被判入狱。今天召开了几次听证会，明天还有，星期六星期天去旧金山，礼拜一到西雅图……

吻玛格丽特，爱你的哈里

1921年8月21日星期四

加州洛杉矶比尔特莫尔饭店

从华盛顿新建的国家机场飞进飞出，哈里俯瞰着波托马克河靠弗吉尼亚一边的位于阿灵顿公墓下游的巨大沙洲。那里是新建的庞大的五角形军事指挥部的所在，五角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大楼，它清晰地标志着国家的走向。

委员会从默默无闻起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证实了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拿出了结果并引起人们的注意。秋季，其拨款从1.5万元增加至5万元，且又吸收了一名民主党人，西弗吉尼亚的哈利·基尔戈尔和2名共和党人：俄亥俄的哈罗德·伯顿（他后来是最献身的成员之一）和曾做过法官的密歇根的霍默·弗格森，后者同缅因的布鲁斯特一样，听证会审问时都具有不屈不挠的劲头。工作人员编制也扩充了。最终共有15名调查人员和相同数量的职员和速记员。

听证会在参议院办公楼4层委员会总部的449号房间进行，特殊案子则在3层宽敞的大理石秘密会议室审理。杜鲁门办公室后面一间被称作狗窝的房间也经常用作日常办公用，里面有几把旧皮革椅、一个冰箱、威士忌酒，墙上贴满了有关南北战争的场景和照片，还有描绘主席政治生涯的卡通画。

杜鲁门一再坚持欢迎参议院中的任何成员旁听或参加听证会。每当主持会议时，他看上去都准备充足，既能驾驭会场又无独断专行的作派。其实他尽量让其他参议员唱主角戏。在人们的记忆中，哈里主持的听证会在坦率和智慧方面算得上国会第一。一如他早期进行铁路调查时一样，对证人都彬彬有礼，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进行陈述。对证人不威逼，谁也不能表现出不合礼节的感情冲动。一位记者写道：“戏剧性行径被努力地克制住，没有其他国会听证会上典型性的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恫吓。”然而杜鲁门有时很强硬执著，他的方式能让观察者大吃一惊。这是不为他们所了解的他一个侧面。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写道，委员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主席。“杜鲁门个头不高，戴副眼镜，他酷爱肖邦，不喜欢出风头，因而在国会中谁也想象不出他会是个强硬的调查能手。无论从外观和气质上，他绝无斗士的形象。”

总体而言，主席是以公平著称的。一次，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之一、浮夸好斗的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作证时，参议员鲍尔对证人所言工人们都在挨饿的话表示质疑：

“刘易斯先生，你不是在正儿八经地告诉委员会美国大批工人都吃不饱肚子吧？这是彻头彻尾的蛊惑民心的宣传，这你明白。”

刘易斯坐在椅子的边缘朝前探过身子，大脸盘上布满了怒容，声音宏亮而愤怒地说：

“你要是问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但我还没有机会回答，你就管我叫煽动者，我也同样可以以煽动者称呼你，先生。”

杜鲁门插嘴说：“听着，刘易斯先生，我们不允许以莽撞的口吻对委员会的成员讲话。你在这里的权力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将受到保护。我不喜欢对委员会成员那样说话。”

“参议员，那位参议员说我是蛊惑人心你不反对吗？”自尊心极强的刘易斯回答道。

“反对，”杜鲁门说，“我刚才说的话适用于双方。我认为参议员不应说你是蛊惑人心者。”

用实据证明兵营建造中存在的浪费和管理混乱现象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这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委员会信誉的方法，故而杜鲁门以兵营入手。更加巨大的任务——更难、更费时间、更重要，在政治上也更冒险——是对国防生产的调查，即收集事实、数据、具体的事例以及对造船造飞机、兵工厂、汽车制造厂、工会、政府承包契约、大公司和小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物资的贮存等所持的五花八门的不同意见。而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令人异常震惊：计划混乱，管理不当，工艺粗糙，劳资均有欺骗行为，到处都存在严重的短缺。

对于战斗机至关重要的铝非常匮乏，铜、锌和橡胶也供不应求。甚至民用生产大幅度削减后，铝的年产量仅能满足建造一半飞机的需求。美国铝制品公司几乎垄断了这种轻型金属的生产并一再声称能满足国内和国防的需求，但实际其产量离需求相去甚远。镁的生产落后更可悲，经调查披露，其原因竟令人发指。美国铝制品公司和德国一家大财团 I·G·法奔公司通过一个连锁卡特尔达成一项默契。美国铝制品公司为了保障在美国垄断铝金属市场，同意中断镁的生产，并以优惠价格将其拥有的镁卖给德国人，结果德国比美国拥有的镁要多得多。

新泽西州的美孚石油公司也与 I·G·法奔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故意推迟发展合成橡胶厂。杜鲁门在报告中指出：“美孚石油公司”

与德国 I·G·法奔公司达成协议，为了回报法奔允许美孚石油公司垄断石油工业，美孚将让法奔全面控制化学工业的专利，包括橡胶。因此，当几家美国橡胶生产厂家向美孚石油公司表示，想获得生产合成橡胶的许可证时，他们要么遭到拒绝，要么就得接受申请许可证的十分苛刻的条件……不言而喻，I·G·法奔的做法是由德国政府指使的。

这里并不存在“卖国动机”，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做出这样的结论。这仅仅是“大财团按照规则玩弄它们的把戏而已”，而其沉重的代价“却要由整个国家来承担”。

美国政府——特别是生产管理办公室——也疏忽懈怠，未能为满足需求而大幅度增加铜、铅和锌的产量。杜鲁门的担忧是，最为严重的是钢的短缺。

汽车生产商被允许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即在 1941 年可像往年一样生产

汽车，他们说个中原因是他们的设备中可以用于军工生产的只占 10%。1941 年头 8 个月的汽车产量实际超过了 1940 年的同期产量，而且消费了大量战略物资——全国钢材的 18% 及 80% 的橡胶。飞机计划迟迟不能上马，因为陆军和海军把制造何种飞机的决定权基本交给了生产商。“飞机生产计划既无系统又无协调可言。”杜鲁门在报告中说。委员会发现海军舰船局有“疏漏和故意渎职”现象（当舰船局局长、海军上将 S·M·罗伯逊说他认为私营企业和海军造船厂的效率大体相同，但告诉委员会由于不同的簿记体系而比较起来有困难时，委员会说针对这样重大的事情，海军应采取措施查明事实）。调查中发现海军对私营造船商的“慷慨大方已到了过分的程度”。与海军有一项合同的托德造船公司的一位代表在作证时说，如果不用上税，他们获得的利润得用蒸汽掘土机来铲。

10 月底，德军已推进到离莫斯科 70 英里的地方，罗斯福为斯大林提供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物资。

委员会在结论中说，绝大多数问题和拖延的根源在于总统一手创建的笨拙机构，即生产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的负责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曾在通用汽车公司干过的威廉·S·努森和劳工领袖、联合服装工人协会的创始人西德尼·希尔曼。罗斯福的意图是让权力分散，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所谓的“独揽生产大权的人物”，而这一点委员会认为正是最需要的，必须要有一个拥有明确实权的强人。这便是委员会在 1941 年最后几个月准备的第一份年度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希尔曼没有把一份施工合同给予一个低价投标人，因为他害怕美国劳工联合会中“不负责任的”分子出来捣乱，杜鲁门发现这一事情后极为气愤。“首先”，杜鲁门 10 月 29 日对参议院说，“无论是谁引起争端美国都不惧怕……如果希尔曼先生不能或不愿维护美国的利益，我建议找一位能够和愿意的人顶替他的职位。”

报告说生产管理办公室的表现不令人满意。其领导班子不称职。“其履行职能的错误不计其数，其玩忽职守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往往是什么事情也不做，而他们应该认识到，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不等于可以避免问题发生。”

委员会还认为，生产管理办公室有 250 多名象征性领取薪俸的人员，尽快免除这些人对国家和国防事业将大有裨益。这些占据政府高位的公司经理们所做的决策十之八九是为了他们各自公司的利益。“他们心里想的唯有他们自己的生意。”杜鲁门说。报告称他们是“严格意义上的”说客，因为他们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偏袒，“这也是人性使然。”委员会说，应参照其他相应职责的政府职位发给这些人政府薪金，并要求他们与签定了国防合同的公司断绝雇佣关系和停止从中支取报酬。一仆多主同生产管理办公室领导层的权力分散一样，是不可取的想法。

10 月 30 日，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在冰岛海岸遭到一艘德国潜艇袭击后被击沉，115 名官兵遇难。战争话题在华盛顿成了街谈巷议，尽管似乎没人采取什么具体的做法。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戴维·利连索尔 12 月 2 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在日记中写道，好像和日本，而不是和德国的战争屈指可数了，然而人们似乎对此都漠不关心。他对民主体制是否能应付世界局势表示担心。12 月 4 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宣称：“不管发生什么，美国海军绝不会遭到突然袭击。”

为了不使行政当局感到尴尬——从而不致破坏国防计划——杜鲁门提前

将委员会调查结果的副本呈交给总统，后者在报告公诸于世前的最后时刻决定撤消生产管理办公室，成立一个新的战时生产局，牵头人只有一个，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唐纳德·M·纳尔逊。包括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内的其他人也曾敦促罗斯福做出这样的调整，但对杜鲁门委员会来说这是个巨大的胜利。“我们是通过奋斗才把这份工作作为你争取到的。”杜鲁门后来对纳尔逊说，“我们现在还将奋斗支持你履行你的职责。”

此时日本人已轰炸了珍珠港，动员起来准备全面战争的任务遂落在纳尔逊的肩上。此时甚至像伯顿·K·惠勒那样的人也说唯一要做的就是日本人打个稀巴烂。

12月的第一周杜鲁门在密苏里忙着政治事宜。12月6日晚，他住进了哥伦比亚的一家饭店，想补上一大觉。至于他是如何第二天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又是怎样设法赶回华盛顿听罗斯福于12月8日在国会发表的那次重要讲话的，都记录在一周后他写给埃塞尔·诺兰的信中。他之所以写信给她，可能是由于他一直把她看作家中最具有历史感的一个成员。

亲爱的埃塞尔：

终于坐到了办公桌前，我回来后办公室还是第一次空无一人。原因之一是门都锁上了，而且今天是礼拜天。我收拾办公桌时发现许多重要的信件都混杂在纸张文件里。你还记得那张和卷宗效率专家W·C·菲尔兹照的像吗？我的桌子就跟他的桌子一样。每次女孩子们在卷宗里找不到某封信，她们就敢肯定绝对被我胡乱塞在了我桌子的什么地方，可惜的是有时她们的肯定是正确的。

我爸爸生日那天（12月5日）我看过你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一直害怕它会发生，但没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当然，即便按想象中的样子发生了我们也会感到震惊的——如果是战争的话。我星期六去的哥伦比亚，想在周末睡个好觉，再前往杰斐逊城。其实我希望睡上他两天。星期六晚7点钟在城外的潘南特饭店上的床，星期天8点吃的早饭。给夫人打了电话后又接着睡。开车送我来的小伙子中午离开，下午3点钟从克劳斯廷伯斯（你肯定没听说过这地方）打来电话，对我说小日本轰炸了火奴鲁鲁。小伙子是警察局副局长，他去斯普林菲尔德了。我给环球航空公司圣路易斯办事处打电话，对他们说我必须在次日清晨赶回华盛顿，这前后贝丝又打电话来，说参议院秘书挂了电话，通知说礼拜一召开两院联席会议，我得出席。我没车子也没司机，只好给与饭店隔一条马路的哥伦比亚小机场打电话，经理说他有架飞机，可以把我送到圣路易斯。我们4点50分离开，5点35分着陆到达圣路易斯机场。130英里路我们只飞了40分钟。这时问题又来了。我想飞往芝加哥，又试着走孟菲斯线，都去不了，最后我想环球航空公司大概是炒了什么人的鱿鱼，我于是坐上晚上11点的飞机去了匹兹堡。一晚都没合眼听收音机，3点半到匹兹堡，在那遇到了从芝加哥飞来的新墨西哥州参议员查维斯、住在匹兹堡的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斯和从芝加哥来的共和党孤立主义骨干分子柯利·布鲁克斯。后者是伊利诺伊州的新议员，美国军团成员，此人肥胖，鬃发，有个浓妆艳抹金发碧眼的老婆，他是《芝加哥论坛报》最重要的参议员。他的样子好像是吞下了一个火炉子，那些反备战的家伙们第二天都是那副样子，这并非因为他们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一夜没睡觉的缘故。

我到家时（我们5点半到的机场）贝丝已起来做早饭。我的新秘书哈里·沃恩开着我的车在机场接的我，到家时已6点。一直睡到10点，然后前往参议院。那实在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想必你在收音机里听到了。11日时，我们不得不接受德国和

意大利的又一次邀请。天知道结果会如何。真希望我现在是 30 岁指挥着一个炮营。
那要省事得多……

1941 年 12 月 14 日

2

“哈里·杜鲁门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生机勃勃和活跃的参议员之一。”参议院的老雇员理查德·里德尔写道。里德尔 1918 年 10 岁时就开始在参议院做听差，后升任为新闻联络官。他从老卡伯特·洛奇年代起就对所有的议员进行观察，认为没有一个像杜鲁门那般如此热爱政治生活并应付裕如。“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随意乐天的精神……对所有的人和事情（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往往在他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杜鲁门呈现给世界的仿佛是另一副面孔。“当他干正事时，他眼中闪烁的光芒会被专注的神情所替代。每逢这时，你若近看就发现他厚厚的眼镜片使他的眼神变得可怕而古怪，他的冷峻的逼视常使人怪怪地觉得你面对的是另一个人。”里德尔说这种时候他就暗自庆幸杜鲁门参议员是他的朋友。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几周的疯狂和混乱的日子里，陆军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敦促总统撤消委员会，说：“如果我们必须花费时间为杜鲁门委员会提供他们所要的所有材料，我们的行动就将受到破坏。”但总统无此意图，随着委员会工作的进展，其主席的能力和效率愈发使人们刮目相看。第一份年度报告于 1942 年 1 月 15 日提交给参议院。后来又有 50 份报告问世，它们是大量细致的调查的结果，其间共召开过 400 多次听证会，涉及到 1798 名证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委员会所有的报告都得到一致通过。当问及个中原因时，共和党人欧文·布鲁斯特说，当人们面对事实时很容易信服。

1942 年初是黑暗时期。新加坡沦陷给日军，尔后随着温赖特将军和大约 7.5 万名美军和菲律宾部队的投降，巴丹亦落入日军手中，那是美军自阿波麦托克斯之后最大的一次投降。列宁格勒在 6 个多月之后仍旧处于包围之中，在一直被认为远离欧洲战火的美东海岸，德国潜艇几乎随心所欲地击沉油轮——“如此之近，”埃里克·塞瓦赖德写道，“站在迈阿密的楼顶房屋的一个合唱团的女孩都能看到在油轮大火中被烧死的水手。”华盛顿已做好了防主袭的准备。贝丝·杜鲁门为他们在康涅狄格大街的公寓订购了灯光管制窗帘。杜鲁门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戴过的钢盔拿到办公室，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一心想着“打仗”。4 月，他为委员会的事出差驾车经过北卡罗来纳州时，他强使自己只想着春天的到来，“谷物女神色列斯从冥王普路托的宫殿返回来了”。弯曲道路两旁的山茱萸和苹果园中的果树已经花朵盛开，坐落在教堂山一带的饭店一片静谧安宁。但他仍是睡不着觉，战争的局势在心中萦回。

1942 年夏天哈里在参议院做的发言中，呼吁在欧洲开辟第 2 条战线以便为俄国人解围，他认为这在军事上是必要的。在家乡杰克逊城的讲话中，他说这场战争只不过是“1917 至 1918 年我们所打的那场战争”的可悲的继续。他争辩说，那场战争的赢家“有机会使我们几代人获得免受战争蹂躏的和平，但他们失去了这一机会”。“孤立主义的主张”导致了目前冲突的最可怕的灾难。这种现象绝不容许重演。

杜鲁门委员会透露的内幕令人愕然。柯蒂斯一赖特公司被发现为战斗部

队生产和供应飞机引擎次品。一位两个外甥都在陆军航空兵的柯蒂斯—赖特公司检验员哭着对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讲了实情。杜鲁门对一位作证的航空兵军官说：“我要是负责那类工厂的经理，什么事都瞒不住我。我认为这纯粹是失职，可能比这还要严重……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知道。”军官对他的话表示同意。“这是不言而喻的。”杜鲁门说。航空兵不承认发现了什么问题，柯蒂斯—赖特公司还大做广告，强调公司为打赢战争所做出的贡献。但发动机不合格却是现实，而且杜鲁门推测，问题还不止失职而已。由于委员会的调查，一位涉嫌的航空兵将军被送进了监狱。

当委员会询问格伦·马丁公司生产的 B-26 轰炸机存在的问题时，马丁本人说机翼的宽度不够。杜鲁门问为什么不加宽机翼。马丁说图纸早就完成，而且他已签了合同。杜鲁门说如果马丁这样认为，委员会就要行使权力中止合同。马丁说他愿意修正机翼的尺寸。

一次杜鲁门代表委员会说，他们目睹了国防建设中许多阴暗面。然而对杜鲁门来说，他们的发现似乎加深了他对美国财团巨头的怀疑。他是个地道的杰斐逊思想的信徒；心目中的政治偶像始终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早些年杜鲁门在参议院所历数的有关银行、保险公司和企业巨头的罪恶完全是他真实的看法。他从来没有真正结识过一位主要由共和党人担任的实业家或大财团头子，也从不把这些人视作他个人或政治上的朋友。

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他也似乎没有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像国防建设这样巨大和牵涉这么多利益集团的工程出现个别企业决策上的愚笨和腐败是在所难免的。其实，美国工业的实力和美国惊人的生产力正是后来扭转对德、日作战格局的推动力量。它后来被证实是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而杜鲁门却没有把应有的功劳给予促使这一切发生的企业和工业界绝大多数爱国人士。在他所撰写和发表的言论中，常常让人觉得仿佛只有委员会和其调查人员在尽爱国的责任。当然他不相信这一点。根据他和他手下的调查人员所发现的事实来看，或许能更清楚地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想。

一个典型的例子和让人记忆深刻的一次作证涉及美国钢铁公司及其子公司——卡内基伊利诺伊钢铁公司。涉及的问题是为军舰生产的钢板的质量。

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委员会最初是通过雇员们写来的信件得知问题的存在的，那些雇员认为将真相披露出来是他们的爱国职责。刚开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继而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同的抱怨和警告多得到了无法应付的地步。大部分信件显然有些失实，因而调查每一个线索是不可能的。但由亨利·J·凯泽建造的一艘名为“申纳克泰迪”号新下水的油轮于 1943 年 1 月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断为两截时，钢板问题就成了至关重要的焦点。

卡内基伊利诺伊轧钢厂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欧文，距匹兹堡不远，杜鲁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发现，该厂生产的钢材至少有 5%，即每月 3000 吨钢不符合海军制定的规格，但交货时均标明是达标钢。质量检测结果——厂里为了确定钢里碳和其他元素而进行的化学分析——被篡改（其他检测抗张力强度的试验亦如此），借用规格总检验师默里·斯图尔特的话说，其目的“是为了与客户提出的要求相一致”。倘若化学分析没有弄清熔炼的炉次，他说，那么他们就瞎编一个写在记录簿上。

在 1943 年 3 月 23 日举行的听证会上，斯图尔特是首先出场的证人之一，当休·富尔顿鼓励他解释检测的确切程序时，他提供的一部分证词发聋振聩，而且还带着几分不是存心的幽默：

富尔顿：换句话说……你可以捏造出一份你认为符合钢材规格的化学分析？

斯图尔特：对。

富尔顿：在记录簿上你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斯图尔特：为了在记录簿上认出哪个数字代表不正确的熔炼炉次，我们用铅笔在记录簿上标出。

富尔顿：其他标记用什么笔？

斯图尔特：用钢笔。

富尔顿：你除了用铅笔标出记号外，在不在这些假数字前标上前缀呢？

斯图尔特：按惯例写上一个“F”。

富尔顿：“F”是什么意思？

斯图尔特：是Fake（假的）。

富尔顿：可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调查人员说它是电话的意思。

斯图尔特：是的。

富尔顿：但现在你发誓说它的意思是Fake？

斯图尔特：是的。刚开始那个调查人员在我眼里是个生人，而且当时他逼着我回答问题。

助理冶金专家戴维·B·艾尔兰作证说——他显然希望对欧文厂的作假行为做进一步的解释——他是在埃德加·汤姆森厂学会捏造检测结果的。该厂也是位于匹兹堡附近隶属于卡内基伊利诺伊轧钢厂的一家大厂。他说他作假的本事已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无论海军的检验人员何时出现他都能轻而易举地糊弄他们。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名测验员作假时被海军检查人员抓住过，艾尔兰说，但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他作假的次数过多。”此人被开除了么？参议员霍默·弗古森问。没有，艾尔兰说，他被降了职。他被降职是不是因为他做的太过分了？杜鲁门主席问高级职员、总冶金师W·F·麦加里蒂。“是的，先生。”麦加里蒂说。

“做得有点过分他被降了职。”杜鲁门重复说，“他没被开除，只是被降了职。”

“他因在别的部门干得不错，又重新得到一份报酬颇丰的工作。”麦加里蒂补充说。

委员会的3名调查人员于3月初，即“申纳克泰迪”号事件发生后约2个月的时间去过位于欧文的厂家。他们先给位于匹兹堡的卡内基伊利诺伊总公司打了电话，公司总裁J·莱斯特·佩里对他们说，没有公司的律师在场，他们不得与任何一个雇员谈话。此外，在他佩里与杜鲁门参议员通过电话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们不得进入轧钢厂，此举使杜鲁门极为气恼，立即怀疑佩里心里有鬼。调查人员在中午到达欧文后，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接着被邀请去公司食堂吃中饭。他们说他们不是来吃午饭的，而是想立即过目轧钢厂的记录簿。但他们又等了一个小时，最后记录簿终于送到时，他们被告之前一天晚上为了“协助”公司律师的工作，记簿本被拆开分送到几个人的手里。把记簿本重新装订在一起又花去了2个小时。有多少内容被从记录簿上删除或改写，他们不得而知，一位调查人员在呈交给杜鲁门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当佩里在斯图尔特、艾尔兰和麦加里蒂作证之后也坐在证人桌子的后面

时，杜鲁门说：“我不认为你是在积极与我們合作，佩里先生。而且你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整顿工厂并调查作假的原因……对此我感到很吃惊。我想让你向委员会彻底申诉一下你的理由。”

“杜鲁门参议员，我没有想对此加以解释的意图，也不愿引起争论。”佩里淡淡地说。

“你完全可以进行争辩，”杜鲁门说，“这是你的特权。”

佩里坚持说除了合作他没有别的想法。也许他没能领会调查人员来访的真正重要性，也许他本应多做一些工作。他认为他的态度是友好的。他回忆说那天快结束时他才意识到此事的严肃性。“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才明白无误地认清他们想进行调查。”他说。

“我们派调查人员去工厂不是去玩的。”杜鲁门厉声说。

“现在我明白了。”佩里答道。

杜鲁门再次追问他在整顿工厂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有人被解雇？什么地方得到了补救？佩里先是闪烁其词，最后不得不承认至今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他需要时间弄清所有事实及“全部影响”。杜鲁门认为此话不能接受。如果他是公司的第一把手，他说，他会立即查明事情的真相。“我们调查人员调查的结果出来后你就掌握了全部事实。”

在作证的过程中，佩里在准备好的发言里申明了他的看法：虽然公司的领导层对委员会调查人员所披露的不正当做法——与领导层无关的做法——深表遗憾，但即便是厂里提供的不合规格的钢板也“完全胜任它们指定的用途”。就算海军得到的钢板与他们定购的不完全相符，那些钢板也足以达到其用途的质量。“对于没能按照规定的检测程序进行检测的唯一解释是，个别人在繁重的生产压力下有所松懈……”他觉得他不能接受其他人在证词中使用的“作假”一词。他认为“误述”更合适。

更重要的是，就“申纳克泰迪”号而言，他说该船钢板质量欠佳并非是导致其断裂的原因，而即使是此原因，断裂点的钢板也不是欧文工厂的产品。

当时在场的参议员中，对佩里攻击最为猛烈的是两位共和党人，弗古森和布鲁斯特，富尔顿和杜鲁门只是时不时插进一个问题或发表一句看法。弗古森见缝插针，马上问“申纳克泰迪”的钢板是谁制造的？不是欧文产的，佩里再次肯定地说。那是哪儿产的？弗古森问。霍姆斯特德工厂，佩里承认。

“难道你没听见那个证人在这作证说霍姆斯特德工厂是如何教他作假的么？”弗古森问。

“参议员，你使用的词儿‘作假’……”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词儿么？”

接着，参议员布鲁斯特大声朗读一份舰船局整理出来的调查报告，报告明确指出“质量低劣的钢板”是造成“申纳克泰迪”号事故的“直接原因”。钢板的“质量绝对劣等”，布鲁斯特继续读道。它脆的根本不像钢，而像铸铁。

佩里看过这份报告么？他回答说看过一部分。布鲁斯特的火气愈发难以遏制，他问佩里他要是有个儿子坐这种钢板造的船去海外他会怎么想。

佩里答道：“参议员，我对用劣质和次等钢造船和其他战争设备的做法并不宽恕。所以我对那些去海外的孩子们有何感受，这点你们不必担忧。”

杜鲁门插话说布鲁斯特参议员有个儿子正在国外参战。

弗古森说：“如果一个客户要的是强度为6万磅的钢，即试验中断折点

应为 6 万磅，但你给他的产品只有 5.7 万磅的强度，而且还用数字告诉他你进行了试验，它能承受 6 万磅，这算不算是对事实的歪曲呢？”

佩里：算，先生。

弗古森：你是否明白所提交物资的 5% 是上述那种情况？

佩里：今天上午的证据是这样的。

弗古森：你说这是不是以作假的方式向美国政府销售产品？

佩里：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到那种程度恐怕是的。

弗古森：你听见了证词，难道你对这种做法还不相信么？

佩里：根据政府的规格和试验所提供的物资是否有此情况发生我表示怀疑，因为检验都是政府进行的或监督进行的。

弗古森：你的意思是说——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你对你公司的人在此发过誓后所做的证词不相信，是不是？

佩里：他们的证词是否涉及到海军所进行的检验……？

弗古森：不仅涉及到了，他们还说当着海军检验员的面作假也是可能的。

佩里：我说过，那是误述。

弗古森：你是不是还坚持认为卖给政府的物资中没有次品？

佩里：我仍坚持认为对于物资的最终用途来说，它们的质量并不低劣……

弗古森：换句话说，你是说政府该买什么应该听你的，是不是？

佩里：不是，先生。

弗古森：那么，你为什么达不到政府制定的规格？

佩里：我们应该那样做。

弗古森：你为什么没做？

佩里：我们将来会的。

杜鲁门：我要说你将来会……

听证会持续了 5 个小时，继佩里之后作证的是公司律师，当他说到他在为“这一现象辩解”之前必须首先掌握炼钢的技术知识时，杜鲁门打断他问，技术知识与把欺骗者从举足轻重的工作岗位上清除出去有何关联。“我对钢铁行业一窍不通，”杜鲁门说，“我也不想精通，但我可以告诉你，要是记录簿被篡改，作假行为猖獗，我照样一目了然。”

但最终谁应对所发生的负责——责任应追溯到多高的职位——这一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位居总冶金师麦加里蒂之上者无人承认知晓检测和篡改记录的欺骗行为。对劣质钢为何视而不见，听证会也没披露出足够的动机。厂里卷入欺诈的人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一旦被发现将失去一切。唯一——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是为了创立可观的生产记录。

不管怎么说，管理部门发誓要进行补救，最后美国钢铁公司总裁本杰明·F·费尔利斯还向杜鲁门许诺，不管责任在谁，一定会“炒他的鱿鱼”。

布鲁斯特参议员说：“你知道，费尔利斯先生，公司的下属在得不到任何报酬的情况却拿他们的前途打赌，这似乎实在不可思议。这一点给委员会留下的印象最深且令人惊讶。”

弗古森参议员好奇地问费尔利斯先生，通过一天的旁听，他认为卡内基伊利诺伊钢铁公司的经营算不算管理出色的样板。

“我认为当然不是，”费尔利斯说，“我以为它的管理差到了极点。”

听证会结束时，一位记者请杜鲁门就当天透露的情况发表一下个人看法，杜鲁门说他认为披露的内容不宜登报。

关于战时生产局里有人领取象征性薪俸的问题，杜鲁门的立场一直很坚决，慷慨陈说这一体制的非正义性。但由于他所帮着推上台的独揽生产大权的唐纳德·纳尔逊与他观点不同，他最后只得违背自己的正确判断做出让步。纳尔逊不想改变体制，坚持认为这样可以使工业界获取最大的成果，他对委员会说他身边必须有懂得工业生产的人。当问及为何允许这些人继续与大公司保持联系和从中领取好处时，他说高薪的人开销也大——抵押、保险等等——倘若只领取政府薪金必定苦不堪言，无法适应。

“我认为不应有特殊阶层。”杜鲁门答道。当天早上他刚刚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年薪 2.5 万元，是位刚被应召入伍的后备役军官。“他从今以后每月的薪水将是 140 美元，而且在军中时不能再领取那 2.5 万元。”杜鲁门说，“他很乐意这样做，因为他同你我一样，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尽全力赢得这场战争；要是他赢不了，他那 2.5 万的年薪也将一文不值。我一直在幻想，倘若政府能行使权力让这些年轻人离开他们的工作，面对当前的非常时期而改变他们旧有的世界观，那么领取象征性薪俸的人也同样能这样做，并且能高兴地去做。”

他反对领取象征性薪俸的人并非因为他们是商人——他希望政府里有更多的商人，尤其在战争努力方面。但他知道，借调到战争当局的钢铁公司经理们在采取任何可能在战后影响其公司或行业地位的行动时必然会踌躇不前，这乃是“人的本性”。他听说一些占据高职的领取象征性薪俸的人起初推迟了急需的新熔炉的建造，原因是他们担心增大的铸模容量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战后的利润。

但最终他还是无奈地退出了争辩，说假如纳尔逊认为这一体系是赢得战争之必需，委员会则不应从中作梗。几天后在写给纳尔逊的一封信中，哈里讲得更为具体。他写道，委员会不希望将战争物资采办事宜委托给那些显然是软弱无能之辈：

然而委员会认为物资采办计划的最高利益要求此计划应由一个人来领导，此人将按自己的方法行事，对其评判也应看他取得的全部成果……为此，即使在我们与你分歧的方面，委员会也将给予你支持……

哈里认为，委员会若对这一问题死咬住不放，就将冒僭越权力的风险，像喧宾夺主的内战委员会那样达到对政策恣意指手画脚的程度。

通过支持纳尔逊，哈里还恪守了这样一个信念：军工生产必须控制在文职人员手中。仅 1942 年上半年，经济中的军事合同就达到 4000 亿美元。哈里看到野心勃勃的陆军和海军将军们对工农业占据的影响日益增大，于是对未来的局面表示担忧。1942 年秋季，在“时间之旅”的广播节目中，他指出文职人员控制军工生产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并提醒说它将影响到战后国家政治经济的结构。“陆军海军将军们的任务是指挥战斗，”他说，“是告诉我们作战时需要什么。”

如今已打上 3 个星的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再次被召到委员会，对一项称为“加拿大石油”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工程做出解释。此工程是从加拿大至阿拉斯加铺设一条直径 4 英寸、长 1200 英里的石油管道，它的上马私下里得

到萨默维尔的“首肯”，对地势、气候、可用物资、人力都未加以考虑，更没有征得石油专家、陆军工程部队和战时生产局的意见。在陆军部预算中增加的这项 2500 万美元的项目没有任何具体陈述，只是说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建造军事设施。

对此工程之所以保密主要是为了避免政府文职部门的干涉，尤其是避开内政部长兼石油局负责人哈罗德·伊基斯的耳目，此人性情暴躁是出了名的。承包商斯蒂芬·比奇特尔的雇员们管加拿大石油工程称做“自巴拿马运河以来最大的工程”。但此事后来被伊基斯发现，他来到杜鲁门委员会，说整个工程是“从特想节省纸的萨默维尔将军的一页便笺上诞生的……”伊基斯说这条管道没用，委员会在听了萨默维尔的工程总顾问詹姆斯·H·格雷厄姆的叙述后亦同意伊基斯的看法。委员会发现格雷厄姆（伊基斯称他是“彻头彻尾的”领取象征性薪金的人）连管道的长度都不知道。他对成本也没估算过，而且认为别人也没有。“战争时期我不考虑成本。”这句话他对委员会说过多次。

美联社一位叫艾伦·德鲁里的年轻记者在萨默维尔作证的那天也在现场，他写道：“委员会对此事严加谴责，而陆军部却像过去那样拼命想法挽救面子，而没有勇气坦率地承认错误，就事论事；为了在绝望中为此事辩解，抛出了令人困惑的失职理由，但委员会依旧不为所动。”

萨默维尔由 4 名准将和若干少校簇拥着昂首阔步地走进听证会现场。德鲁里在日记中愉快地写道，审问期间，萨默维尔想喝水，把一只杯子递给一名准将，准将又把杯子递给一名少校，少校找不到比他官衔更低的人，便亲自斟满水，把杯子传给准将，后者又把杯子递给将军。

委员会对萨默维尔围攻了 4 个半小时，主要由富尔顿和哈利·基尔戈参议员提问。主席默默地听着。但在听证会结束之前，杜鲁门给萨默维尔读了一封他从海军部收到的信。他解释说他曾问海军，加拿大石油工程是否征求过海军的意见并请求海军参加，这封信就是对他所提问题的答复。信里说，通过翻阅海军卷宗，未发现有关询问这一工程的信函往来。海军部没有一名军官或官员曾破口头问及加拿大石油工程的事宜。

萨默维尔说他从没暗示过他问过海军。“这项工程与海军不相干，就像我们造个面包房与海军一点边都沾不上一样……”

杜鲁门说此工程很可能与海军有关，因为军舰要烧很多油。

“是的，先生。”萨默维尔答道，接着他说海军作战部长和其他人“同意这项工程上马”。

“但海军部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杜鲁门说，“委员会暂时休会。”

一天结束后哈里感到异常疲劳，他向贝丝抱怨说工作的压力又在他身上显出症状来。贝丝了解他的头疼和疲惫，很担心他因过分努力而累垮。她对她说听证会上的证人令他神经烦躁，但他并未显示出来。他谈到恨不能到什么地方，“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莎士比亚和普卢塔克。

然而他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从未透露过他内心的感受，仍像往常似的乐天 and 充满朝气。他神采奕奕，精力充沛。国会的许多元老兄弟们头发已灰白，下巴成双，衣服上沾着油渍，与他们相比，哈里看上去精神饱满，衣服（他唯一着迷的事物）挺括洁净。尽管他的服装不追逐新潮——他仍保持着浓重的中西部风格——但诚如玛格丽特说的，他的衣服永远看上去整洁干净。他的西服洗熨得都很考究，衬衫一尘不染（在华盛顿的最初几年，他费了很长

时间才找到一个干洗工，此人洗的衣服很令他满意)。他有几十套西服——一些是泰德·马克斯为他定做的他喜欢的旧款式，还有一些是从埃迪·雅各布森在堪萨斯城开的新铺子和华盛顿的加芬克尔商店买的。多数款式都是双排扣，灰色或蓝色，式样可以突出他身材的苗条（他逢人就说，他的旧军装他还能穿得进去）。近来他开始扎蝴蝶结领结——他妻子和女儿对此颇不喜欢——上衣口袋里永远塞着一条叠成5个角形状的干净手帕，翻领上也总别着一次世界大战服役徽章。他显得清新爽快，走起路来富有弹性，即便在夏天，他穿着双色夏天穿的鞋子在大理石大厅里走起路来也是矫健如飞。年轻的新闻联络官理查德·里德尔以国会山飞毛腿的绰号引以为自豪，他记得杜鲁门对他行走的速度曾表示赞赏。“一天他（杜鲁门）带着开玩笑的兴致，紧跟我后面亦步亦趋地穿过大堂，引得看见他的人们忍俊不禁。”

随着他新的信心的建立，他似乎也愈发充满了活力。人人都知道他在参议院里已“小有名气”，对此他很惬意。他觉得作为杜鲁门委员会里的哈里·杜鲁门参议员令他十分开心。

然而他却从不摆架子。尽管他掌握了新的大权以及华盛顿充满了紧迫的战争气氛，他的平易近人却一如既往。城中各处妄自尊大的作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膨胀，杜鲁门却不受此风影响。一次他进行完调查后在圣路易斯小住，下榻在坐落在16大街的杰斐逊饭店，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人报》的一位记者后来记述了他的编辑派他去见参议员的情景：

我走到前台问管房间的职员杜鲁门参议员的房间号码。

他把房间号告诉了我。我走到内线电话机旁给参议员的房间打电话。接电话的不是保镖，不是助手，甚至不是秘书，而是哈里·杜鲁门本人。我说了我的姓名，他说没问题，上来吧。我敲了他的门后，杜鲁门参议员亲自把门打开。房间里只有他一人，穿着衬衫，手指间夹着一本合上的书。他把书放下，给我拿了把椅子，然后给我俩一人斟了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便脸上挂着友好的微笑坐下来。我们几乎淡了一个小时，没受到任何干扰。我们当时谈的内容和我后来写的报道，我都不大记得了。我能记得的是他当时读的书是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写的《罗伯特·E·李传》第3卷，我们喝的酒是“老鸦”牌；他非常放松和健谈；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打扰。

报纸上有关哈里的报道几乎都是赞美之词，委员会及其工作此时也得到行政当局的尊重。他欣喜地给贝丝写道，“高层人物每天对特别委员会表示出的尊敬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倘若我能保持不犯一点错误，我们就真的能有效而快速地帮着赢得这场战争。这意味着减少我们年轻人牺牲的人数和获得体面解决战争问题的机会。所以你必须为我祈祷，祝我步步走对。”

他在人人都始终喜欢他的参议院里获得了新的地位，甚至那些过去认为他性情随和工作努力但却平淡无奇的自由派人士对他亦刮目相看。克劳德·佩珀回忆说：“这位来自密苏里的人敢对手握大权的军工复合体的大亨们说‘拿出证据’来，而且许多人在有所动作时被他抓获。”

他还因没有诸多陋习而出名。他不好炫耀，亦不风流。在任何方面他都不装腔作势高人一等。他似乎不愿出风头，听奉承话或哗众取宠。他不想当总统。

过去他只是在密苏里时才偶尔能被人认出来，如今在餐厅和饭店大堂里

人们都知道他是谁，很令他高兴。“现在你必须比以往更多地帮助我，使我不致变成个大傻瓜或自命不凡的讨厌鬼。”他对贝丝说。

玛格丽特此时已长成少女，开始学习声乐，哈里认为她进步很快。她已时常谈到将来要做职业歌手。哈里和贝丝都不会唱歌，玛格丽特甚至从没听她父亲哼过，这对一位如此热爱音乐的人来说似乎不可理解。然而他并不阻挠她，只是说她必须首先读完大学。

他昵称她“玛奇”或“瘦猴小姐”。玛格丽特机灵活泼，性格开朗，给她父亲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满足。

父女俩呆在一起时总是十分开心，别人亦能受到他们欢乐的感染。住在北特拉华街诺兰家的埃塞尔·诺兰的一个侄女回忆说：

“有一天，是圣诞节，玛格丽特和她父亲圣诞节上午来我家做客。

那是我笑得最开心的一次……他俩相互逗嘴……好玩极了，妙语连珠！他把玛格丽特看作掌上明珠，非常愿意和她在一起和她聊天，我们坐在那儿着迷得出了神儿……”

玛格丽特知道，父亲在华盛顿当着朋友的面聊起她可以说上一个小时。

你聪明，身材漂亮，而且将来事业可望有成——现在就由你做决定了（她18岁时哈里在信里对她说）。你是你未来的主宰。你妈妈和爸爸所能做的就是在一旁观望，需要时给你出主意并希望和祝愿你将来生活愉快。会遇到不少麻烦和痛苦，但也会有幸福的日子和努力的工作。

从金钱的角度看，你父亲不能算作成功，但他经过努力给你留下了点（像莎士比亚先生说的）偷不掉的东西——正直而体面的名声。你必须继承这一遗产，万不能玷污它。你是我们的一切，因而对你寄予厚望。

后来他还写信对贝丝说：“告诉我的宝贝，她有一副最动听的嗓子——要保持自然，去除做作，发音要准确，而且为了使人听懂要用英文，这样她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歌手。”她也永远不能变成大傻瓜和自命不凡的讨厌鬼。

他们仨人关系密切，社交活动不多，日子过得平静而不受干扰。在康涅狄格大街那栋窄小、摆设简朴的公寓里，起居室里属于杜鲁门的一角放着一把罩着印花布的扶手椅、一盏台灯、他的留声机和唱片。他一伸胳膊就能够到一只独立式的小书柜，上面有一套普卢塔克的精装本《列传》、马奎斯·詹姆斯写的两卷本《安德鲁·杰克逊传》、弗里曼写的4卷本《罗伯特·E·李传》、《圣经》、《优秀歌剧故事集》、一本约翰·南斯·加纳的传记和《唐吉珂德》。

贝丝已50多岁，看去胖了许多，更像一位主妇的模样，对华盛顿喜欢的程度也超过了以往。战争时期加快了的节奏很适合于她。杜鲁门把她列入了办公室的饷金名单，此种做法司空见惯，但过去杜鲁门曾因此而指责过别人，特别是他参加第一次竞选参议员时抨击过塔克·米利根。贝丝的工资是2400美元，杜鲁门担心万一此事泄露出去将严重影响他的形象，但这额外的收入却使生活水准提高不少。工作人员谁也没她拿的多，至于她真正干了些什么杜鲁门手下人亦众说纷坛。杜鲁门曾私下劝她“只是来照个面签发一些信件即可”。这样对所有的人都说得过去。贝丝每周还在联合服务组织工作一天，而且据说对杜鲁门在国会山所营造的令人激动的气氛“很着迷”。

1942年6月贝丝回独立城小住，她写信对他说他在收音机里的讲话强似

过去百倍。当时他发表的一篇关于橡胶短缺的讲话在全国广播，贝丝认为那是他最好的演讲，埃塞尔·诺兰亦有同感。他所有的辅音都发的很正确，埃塞尔说。

在他们结婚 23 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哈里给贝丝寄去了 23 朵玫瑰，当天给她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早晨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贝丝：

今天就是那一天。这些年来经历了多少事情。既经历过可怕的日子，也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我的铺子破产，让我的朋友弗兰克（华莱士）损失钱财时，当马奇诞生时，好像不记得曾度过那么美好的一天了，尽管你生她时给你带来过痛苦；另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以为斯塔克已经取胜和我失掉东部法官职位的时候。但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却大大超过了失意。1919 年 6 月 28 日是我这辈子中最幸福的日子，因为我似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当一个男人得到一位合适的妻子，他的生涯便铸成了——我便是这样。

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少女。她是我们必须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别的都不重要。

昨晚向你问安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疲乏得几乎睁不开眼。

听完马奇的歌以及（G 大调）小步舞曲和肖邦的圆舞曲我就睡觉了。这里没有你颇感寂寞……

吻马奇，无限的爱并祝你长寿！

哈里

华盛顿特区

1942 年 6 月 28 日

美军在北非登陆后的 1942 年 11 月，《圣路易斯加报》对杜鲁门大加褒扬，这在几年前尚是不可思议的事。马奎斯·蔡尔兹写道，哈里·杜鲁门已经成为参议院“96 名议员中起的作用最大、同时又是最直率和无畏的议员之一”。当年秋天蔡尔兹出版了一本描写华盛顿参战的名为《写自华盛顿》的书，在其出色的描写中，蔡尔兹还将杜鲁门委员会揭露出的骇人听闻的发现同一个新成立的宣传机构——事实与数字办公室所发布的虚假材料做了对比。

《华盛顿明星晚报》称杜鲁门和他的委员会如今已是闻名全国。《商业周刊》称，委员会的大名如雷贯耳，“通常只要说一句‘将把所有情况向杜鲁门委员会汇报’的吓人话，就足以起到祛除营私舞弊的效果”。《民族》周刊称，全国都应对杜鲁门参议员和他的同仁感恩不尽。

《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对杜鲁门参议员在主持委员会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无党派偏见的客观性”极为赞赏，于是邀请了几位杰出的报界同仁在著名的大都市俱乐部与杜鲁门参议员共进午餐。后来他撰文说后者给他留下了“极佳的印象”。截至 1943 年，委员会已撰写了 21 份报告，涉及的领域包罗万象——汽油定量配给、木材、农业机械、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美国船只。1943 年 3 月 8 日那一周，“调查者杜鲁门”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诸多方面，《时代》周刊说，杜鲁门委员会是战争努力中巨大的胜利之一。它是“后方经济战争中的监察人、焦点、良知和中坚”，它是令人鼓舞的标志：即便在战争时期，一个民主国家也能进行自我监督。周刊还说，哈里·杜

鲁门的转变也是令人惊异的，当需要他的时候，他便从一个给彭德格斯特跑腿的一跃而成为充满活力的委员会主席：

一个国会中的委员会能被人看作国防战线中的中坚，这对于民主的信仰者不能不是一种鼓舞——尤其在一个人们对聚集在国会里的代表不大崇拜的国度里。同样激励人的是哈里·杜鲁门的突然出现，在民主体制中参议院里难得有这样的人物。

《时代》写道，杜鲁门本人“诚实得一丝不苟……他唯一的短处是打扑克赌点小钱和偶尔喝一杯威士忌”（刘易斯·施韦伦巴赫从斯波坎拍电报问：“他们说的偶尔喝一杯威士忌是何意思？”）。

由《展望》杂志组织的对华盛顿记者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杜鲁门参议员被列为华盛顿 10 位对战争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之一。

1943 年 4 月 13 日，杜鲁门将委员会的工作搁置一边，飞往芝加哥去支持一项与战争努力毫无关联的事业，而且他这位来自中西部的参议员、浸礼会教徒和共济会会员及美国军团骄傲的成员介入其中似乎显得有点令人惊讶。他在一个大型集会上讲话，呼吁对欧洲面临灭顶之灾的犹太人伸出援救之手。芝加哥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到场人数约有 2.5 万人。主席是知名的罗马天主教徒、联邦法官威廉·J·坎贝尔。主讲人是纽约犹太教教士、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

杜鲁门在他的讲话中说，他和他的战友们 23 年前参加的那场战争“不仅是解放被侵犯的国家，还要解放那些国家里的人民”。如今在“野蛮人铁蹄”的践踏之下，自由已变成齏粉。欧洲的犹太人在“疯子希特勒”的法令下像“牲畜似地”被赶进集中营。对此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私下里，杜鲁门还是习惯地使用“犹太佬”这样的字眼儿，或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鄙夷地称迈阿密不外乎是“一些饭店、汽车加油站、犹太人和简陋的小屋”。然而他的演讲却是心里话，他还顺带提到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并对总统给予犹太人的援助甚微进行了婉转的批评。有些人不相信德国人能犯下像从欧洲发来的报道中描绘的那种滔天罪行，杜鲁门绝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把四大自由挂在嘴边是不够的，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对于纳粹野兽的可怕意图谁也不会继续持怀疑态度了。我们知道他们打算有计划地在整个欧洲进行大屠杀，屠戮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众多其他无辜的民族。

此时是战斗的时刻，他继续说，但为战后制定蓝图也绝非不重要。“今天一而不是明日——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为那些能够从纳粹屠夫手里被抢救出来的人们提供避风港和安全的所在。”自由王国必须向他们敞开大门，他说。

他们的压迫者必须知道，对他们的血腥罪行将受到惩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依赖向被压迫者提供援助的传统和我国伟大的慷慨大度。这并非是一个犹太人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必须也将会公正而体面地面对它。

那是他所做的最强有力和出色的讲演之一。他当时所感受的到底有多大

的重要性，他和他的听众恐怕了解得并不十分真切。

杜鲁门和委员会里其他的参议员——哈奇、鲍尔和哈罗德·伯顿——对战后世界的问题考虑得越来越多。参议院草拟了一项建立一个战后国际组织，即联合国的决议案，发起人是鲍尔、伯顿、哈奇和里奇特·希尔参议员，杜鲁门虽未直接参与，他却被认为是决议案的指导人物。《纽约时报》引用他的话说：美国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不能推卸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他和也曾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的、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一道，于1943年夏季在联合国协会的赞助下赴中西部做巡回演讲，传播国际主义的宗旨。他在艾奥瓦、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和密苏里一遍遍重申那同一的主题。“历史将庄严的责任赋予给我们……我们过去没能带来真正的和平——此次我们不敢再有半点差池……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并非杜鲁门委员会所有的工作都是成功的。加拿大石油工程没有下马，最后耗费了1.34亿美元，这笔钱本可以不花，但比资金浪费更严重的是短缺的人力和急需物资的滥用（4000名军人和1.2万名民工曾一度卷入这一工程的建设）。为了使生产进行下去，被发现犯有粗制滥造和欺诈行为的公司和政府部门，如卡内基伊利诺伊钢铁公司都未受到严厉惩罚。在委员会与美国铝制品公司打完交道后杜鲁门说：“我们要的是铝，不是种种借口。”

然而总体来讲委员会的表现是卓越的。它将被称作美国历史上议会调查方面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功。后来估算，杜鲁门委员会为国家节约的资金高达150亿美元。这肯定是有所夸大——准确的数字是不可能得到的——但金额是巨大和前所未闻的，无论其数量多少，那也只是委员会的部分功劳。委员会最首要的“权力”是其威慑效应。惧怕委员会的调查和在社会曝光，其本身已足以使工业、政府和军界的无数人士遵纪守法，因而从长远看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

不仅仅限于飞机发动机次品及劣质钢的生产被揭露，委员会还为改进军事设备的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人人皆知同时也挽救了许多生命的例子是著名的用于两栖进攻的铰链船头式希金斯登陆艇。此艇是在委员会的强烈敦促下由海军舰船局监造的。使用新型的希金斯登陆艇，部队除了在港口之外也可在各种各样的浅滩登陆。它增加了进攻的灵活性，从而使许多老式的海岸防御设施失效。但在委员会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之前，海军的官僚们一直想强行采纳一项设计低劣的方案。

委员会还一直是向全国披露战争努力情况的源泉。比如在其发布的关于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的报告中，委员会说1942年美国被摧毁的船只吨数是1200万，这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它比当时全国造船厂生产的船只总吨数还多出100万吨。海军立即否认这份报告的真实性的。但当海军部长诺克斯出席委员会的内部会议时，他承认委员会的说法是真实的。

毋庸讳言，不留情面的“监督人”的角色、听证会上对细节的留意以及所撰写报告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增强了大众对如何把握战争的信心。此外，任何被传唤到委员会的人都能指望在听证会上受到公平的对待。那是主席不变的原则。

美联社的艾伦·德鲁里在萨默维尔将军作证的那天对杜鲁门主席做了一番观察后写道：“总的来讲他似乎是个不错的人，与他的名声相符。”但在又出席了幾次听证会后（其中一次杜鲁门出面极力阻止几位参议员威逼证人），德鲁里觉得再多的话也赞美不尽这位委员会的负责人：

国家不知行使了什么样的权力把哈里·杜鲁门选进了参议院，对此人们常会感激万分。他为人出色，是个一流的参议员和道德高尚的美国人。大众的确欠了他很大的情。而他是彭德格斯特老板推出的。政治有时滑稽可笑……

3

一段时间以来，调查人员听到一些关于一项比加拿大石油工程还要庞大的秘密工程的风言风雨，不完整的信息透露出一个只知道叫曼哈顿工程的项目正在花费着无法解释的庞大开销。1943年6月17日，杜鲁门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史汀生。他们的谈话异常简短：

史汀生：这件事我个人完全了解，世界上知道此事的人只有二三个，我就是其中之一。

杜鲁门：噢。

史汀生：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秘密计划的一部分。

杜鲁门：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史汀生：而且我——

杜鲁门：我已经明白了，部长先生，你不必再说下去了。只要你不愿对我说，我就不会再打听。

史汀生：好吧……

杜鲁门：你保证说这是为了一个特殊目的，而且你认为没问题，我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史汀生：不仅是特殊的目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目的。

杜鲁门：那么好吧。

史汀生：多谢。

但不言而喻，越来越多的传闻以种种方式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6月时，他得知的情况已经很多，对那个“非常重要的秘密计划”的基本性质已有所了解。不可思议的是，他甚至在写给刘易斯·施韦伦巴赫的信中提及此事，后者已离开参议院成为斯波坎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政府在哥伦比亚河边靠近一座叫汉福特的荒芜的铁路城镇一带为杜邦公司突然征用了一大片土地，这引起了施韦伦巴赫的担忧。约有50万英亩的土地被征用，于是他写信就此事询问杜鲁门。1943年7月15日，杜鲁门回信说他不必担忧。“对那笔巨大的不动产交易我有所了解，”他说，“我听说是为了建个厂子，为一种可以创造奇迹的秘密武器进行了不得的爆炸试验的炸弹。”他接着又说：“但愿这种武器能灵验。”

杜鲁门这样做是严重的泄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判断上的失误——竟然通过邮递将这样一个消息漫不经心地用普通信件传递出去。这是不折不扣的“知内情者”的传播，这种在参议院成员的小圈子里相互传送消息的做法对陆海空的将军们来说不啻为恶梦，逼着他们除万不得已绝不愿意把任何消息透露给政治家们。杜鲁门甚至都没自己动笔，而是把信的内容口授给米尔德里德·德赖登，这就是说当时她也知道了正在制造“一种了不得的炸弹”。

但显然从没有人发现此信的存在。施韦伦巴赫和德赖登也未就此事透露

过任何消息。

对杜邦公司在汉福特从事的活动所产生出的好奇和忧虑却未终止。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参议员埃尔伯特·托马斯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显然他也听到了不少传闻。杜鲁门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私下里告知杜鲁门，汉福特一地的浪费和低效率所引发的投诉已成“惯常之事”，接着又说：“依本人愚见，这又是一个‘加拿大石油’工程，陆军部怕一旦暴露又成为一个令人震惊的丑闻，所以以保密为幌子加以掩盖。”

杜鲁门尽管与史汀生有默契，却感到了了解此事的压力愈发增大。

1943年11月30日，他通知托马斯参议员：“我已派了一名调查人员探查此事，但愿能发现有何差错。”

几周后，弗雷德·坎菲尔走进华盛顿华拉华拉一间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办公室，发了一份由杜鲁门亲收的电报。为他发报的人读到此电文肯定会忍俊不禁：

杜邦厂指挥官马赛厄斯上校告诉我你和陆军部长有默契，你的委员会的人一个也不去工厂。通过另一个部门，我发现在过去的10天内陆军部发来一封信……是写给陆军军官和高级文职工程师的……内容是这些人必须确保不把关于工程的任何情况透露给任何参议员或与参议院有关的人。

坎菲尔对于工厂的目的可能不比杜鲁门了解的多，他只是尽其职责而已。杜鲁门认为他办事效率高得惊人，一次他谈及坎菲尔时说：“每当我发现我要办什么事，直到此事完成之前他绝不罢手……”

但接到从华拉华拉发来的电文后，委员会对曼哈顿工程的兴趣冷却下来。与史汀生的默契再度被遵守。记载中也未表明杜鲁门曾听说过从U-238中分解钚（即在汉福特进行的工作）或“了不得的炸弹”是如何制造的。

几个月后，史汀生、马歇尔将军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范尼瓦驱车前往国会大厦，在议长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里举行秘密会晤。在场的除雷伯恩之外，还有众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约翰·麦科马克和乔·马丁。当时，即1944年2月，史汀生和马歇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国会披露了“战争中最大的秘密”。几年后乔·马丁写道：

美国正赶在德国人之前执行一项发展原子弹的应急计划。马歇尔就技术细节对炸弹的设计做了描述。史汀生说倘若德国率先掌握了这个武器，他们可能一夜之间就能赢得战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还需要16亿美元生产这种炸弹。由于需要绝对保密，他们提出一个特殊要求，这笔款项的用途不得露出一丝蛛丝马迹。

3位议员同意按照需要的去做。杜鲁门参议员没有被告知此事。

然而史汀生的日记中记载，调查委员会主席不久又缠上了他。杜鲁门此时要求史汀生将汉福特工程的秘密透露给委员会工作人员弗兰克·洛将军。史汀生对杜鲁门参议员的做法十分恼怒，他认为他们之间有默契。他告诉杜鲁门不行，但杜鲁门并不善罢甘休。”他威胁我说我要对可怕的后果负责。我对他说我必须干我所做的事。”史汀生在日记中说。又补充道：“杜鲁门令人生厌，而且是个不守信誉的人。他说得天花乱坠，行为却特卑鄙。”以后无论如何他都不再把任何事情告诉杜鲁门参议员。

八、生命垂危的日子

我不大认识杜鲁门。

富兰克林·罗斯福，1944年7月

1

在1943年初夏，即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年，参议员杜鲁门首次在纸上记下了在某些圈子里的议论，假如总统要竞选第四任的话，他将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他应邀参加了参议员乔·古费在华盛顿家中举行的星期日午宴。古费是一位坚定的新政派人士，他把杜鲁门带到屋外花园里，“十分知心地”问他对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看法。杜鲁门面带微笑地说，华莱士是美国所曾有过的最出色的农业部长。古费笑着说他也这么认为。“然后他想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不会对候选人名单提供帮助、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杜鲁门写道，“我用简单明了的话对他说我不会……”

尽管以后对此事的议论越来越多，当杜鲁门被问及他本人的想法时，他总是给以同样的回答。他想留在参议院。

再者，他认为人应该现实些。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没有表现出对副总统的任何不满，也无意抛弃他。而且即使罗斯福可能改变想法，也还有其他一些人——吉米·贝尔纳斯和阿尔本·巴克利，仅举出这两个最明显有可能入选的人的名字。他们有较高的声望，更富经验，而且会抓住这个机会。杜鲁门对身材矮小、着装整齐、精力充沛的吉米·贝尔纳斯非常钦佩。贝尔纳斯是个南方人，叛教的天主教徒，当年66岁，所有这些可能对他并不利。但是他实际上干过政府中必须做的各种工作，有在三大部门都工作过的经历，最早在众议院当了7任众议员，后进入参议院。1941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仅干了一任就辞了职，成为罗斯福的战争动员局局长，在白宫东侧楼有一间办公室。人们把他一般称为“助理总统”，他是无比的“局内人”，他的政治判断力和为党筹集资金的能力（像1940年为参议员杜鲁门筹集资金那样）被公认为是无人可比的。罗斯福既倚重于他，也很喜欢他。与贝尔纳斯这样的人相比，杜鲁门深知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现在也不比过去更接近罗斯福。

事实上，自从杜鲁门未经仔细审阅就允许《美国杂志》以他的姓名发表由他人撰写的关于委员会调查结果的文章以后，最近人们感到白宫对他的态度明显冷淡。他很晚才发现这篇文章是抨击政府应付战争的努力的（“我们美国人迫切需要的是领导。”文章称，“我们打疯了，准备应付任何情况并作出任何牺牲……我们所要求的是英明地和坚定地领导我们。”）。杜鲁门告诉在参议院的朋友们，他肯定总统不喜欢他。

对副总统人选的猜测仍在继续，杜鲁门的名字常被议论到，因为民主党内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合伙不让亨利·华莱士上候选人名单。

他们人数不多，最初不过6人左右，但是他们是党内最有实力的人。他们毅然不失时机地贬低华莱士，并开始组织更广泛的人反对他。他们之中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沃尔克，他接替吉姆·法利任邮政部长；全国委员会司库埃德·波利，加利福尼亚石油巨富，全国委员会书记乔治·E·艾伦，华盛顿社交界的活跃人物，院外活动集团成员；以及1940年竞选运动紧

急关头时杜鲁门的救星罗伯特·E·汉尼根，此后他升任国内收入局局长，现在不仅特别受总统的青睐，而且准备接替沃尔克任党的全国主席。白宫主管约见的秘书埃德温·“帕”·沃森将军也同意随时尽可能安排反华莱士的民主党人谒见总统。人们希望能以沃森来抗衡众所周知的支持副总统的罗斯福夫人。

但是“同谋”中的关键人物是布朗克斯区的爱德华·约瑟夫·弗林。自从汤姆·彭德格斯特倒台以后，他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党派政治机器头目，他的容貌和举止与爱尔兰成功的政客通常的形象迥然不同。弗林52岁，灰眼睛，头发稀疏灰白，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他衣着讲究，酷爱园艺，在大学主修历史，受过良好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忠诚的朋友，在政治问题上对罗斯福的影响超过行政部门内外的任何人。正是爱德华·弗林使总统争取到1940年的第三届连任，现在他又比任何其他入更多地看到在十一月大选中的失败，除非在副总统问题上做些事情，因为亨利·华莱士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政客。

亨利·华莱士在国家公共生活中是一位极富魅力、思维严谨的人，职业是植物遗传学家，曾为杂交玉米的开发做过重要的工作，他的先锋杂交玉米公司是拥有资产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企业。他是作家、讲师、社会思想家，坚定的民权倡导者，彻底的新政派，拥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他是美国除富兰克林·罗斯福外最受欢迎的民主党人。喜欢他的人把他看作是政界中少见的智谋人士之一和真正民主美国的先知。然而他也容易被人取笑，对于这些难以对付的党的专业人员来说，华莱士似乎不切实际。他们从来就没想让他当副总统，而是1940年罗斯福把他强加给他们的，当时罗斯福以不再竞选相威胁，除非能有华莱士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华莱士智力超群，是个神秘人物，会讲俄语，玩弄飞镖，据说曾与印第安苏人部落的一位亡故首领的灵魂对话。可悲的是他担任副总统似乎并不合适，极缺乏政治才干，甚至缺乏对政治的真正兴趣。当他不主持参议院时，常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学习西班牙语。他是个太有争议的人，与人太疏远，思想太自由——自由得过了头，这是人们对他的主要指控。

在这些反对他的人当中，看来好像只有爱德华·弗林个人对华莱士和他的思想抱有钦佩之心，但是正如政治作家理查德·罗维尔对弗林的观察一样，他只是根据候选人获胜机会的多少来衡量他们。

假如总统说他还选择华莱士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可是罗斯福宁愿让事情顺其自然，他挂虑着战争，也正乐得让每个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去进行猜测。

1944年1月在白宫举行了与罗斯福一起讨论抛弃华莱士“是否可取”的第一次会议，那时离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半年。在一次挑选替换人的讨论中，杜鲁门的名字引人注目，其他人选还包括：贝尔纳斯、巴克利、萨姆·雷伯恩、约翰·G·怀南特大使、参议员谢尔曼·明顿、接替已故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的威廉·D·道格拉斯法官等。极力举荐杜鲁门的是汉尼根，但他看起来好像也同样推崇贝尔纳斯，总的看，在参加讨论的人中，不同意华莱士的人比赞成任何一个可能的替换人选的人要多。

罗斯福拒绝明确表示他的意愿。正如历史学家、当时的一位白宫工作人员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尔·伯恩斯后来所写的，罗斯福在处理问题时没有比这次更为拜占庭式的了。

杜鲁门未参与任何一次讨论，他认为萨姆·雷伯恩是最佳人选，并在公开场合也这样说。

到了春季，吉米·贝尔纳斯看起来好像是白宫明显喜欢的人，尽管华莱士在民意测验中居领先地位。哈里·霍普金斯是唯一比贝尔纳斯更接近罗斯福的人，他特意告诉贝尔纳斯总统非常希望他上候选人名单（在从德黑兰会议回国的飞行途中，霍普金斯望着舷窗外满天星斗问总统，如果飞机失事，他认为谁最适合接替他的职务，罗斯福毫不犹豫地说“吉米·贝尔纳斯”）。当贝尔纳斯看起来好像不太愿意接受此职时，其他人开始向他施加压力。

当时令人关注的不仅仅是11月里丢掉选票的事。总统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容再被忽视，尽管战时有关此事的任何情况都不好公开谈论。4月罗斯福得了一场所谓的“不需卧床休息的肺炎”后，以战时十分秘密的方式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伯纳德·巴鲁克庄园，原定休息两周却延长到一个月。爱德华·弗林在总统回白宫后见到他时，看到总统的病态感到非常吃惊，因此他极力劝说罗斯福夫人利用她的影响不让总统再次竞选。“我感到，”弗林后来说，“他再也活不到本届期满了。”埃德·波利说，他决心把华莱士拉下马完全是出于他确信“华莱士不是当总统的合适人选，……根据不断地观察，我认为罗斯福总统活不长了。”乔治·艾伦在回忆1944年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关键的这几个月的情形时写道，他们这些人中，人人都“认识到，被提名与罗斯福一起竞选的人，极可能就是下一位总统……”

总统的病态引起的担忧是很有根据的，更糟的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他一直秘密地接受一位心脏病专家的不断监察，3月份医生给他做过彻底检查后报告说，如果总统得到悉心照料的话，可能活一年。

5月份罗斯福派亨利·华莱士出使中国，很多人认为此举是华莱士要下台的迹象。6月初离全国代表大会仅剩一个月时，在盟军登陆诺曼底的新闻刚传出后，汉尼根就便拜访了在白宫的贝尔纳斯，他用了几个小时努力说服贝尔纳斯同意做副总统候选人。汉尼根说，总统亲自对他讲过，他确实想要贝尔纳斯作为他1940年的竞选伙伴，这次他宁愿要贝尔纳斯而不是其他人上候选人名单。帕·沃森后来打电话给贝尔纳斯证实了汉尼根所说的一切。

6月27日，汉尼根把事情推进了一步。他告诉罗斯福说华莱士必须从候选人名单上拿掉。他对总统说，总统必须做的只是同意吉米·贝尔纳斯，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通过”全国代表大会和选举。

“太好了。”罗斯福回答道。“4年前（在1940年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是我的副总统候选人，却让宗教问题给搞乱了。”

“那不会有丝毫的关系，”汉尼根回答说，“我是天主教徒，我可以谈这个问题……”

虽然自从1940年参议院竞选后杜鲁门一直是汉尼根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在让汉尼根出任国内收入局局长和民主党现任新主席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对罗斯福具有影响的贝尔纳斯。

罗斯福请贝尔纳斯与他一同去马里兰州卡托克廷群山中的香格里拉总统别墅，准备用几天时间商谈竞选战略，之后贝尔纳斯写道：“我完全可以断定他真心希望我成为他的竞选伙伴……”

然而那时，在长长的一天结束时，贝尔纳斯对他的一位助手也说过：“咳，伙计，我们对副总统这件事不要太激动了。我比谁都更了解那个人（指罗斯福）。”

当聚在总统办公桌周围的二三位工作人员问总统对哈里·杜鲁门的看法时，罗斯福说他没怎么听说过杜鲁门，但是他说，著名的造船商亨利·J·凯泽是“我们要对付”的另一个人。

爱德华·弗林按罗斯福的要求在结束了全国调查后告诉总统反对华莱士的人之多出乎意料。弗林和罗斯福两人都知道秋季选举将会是势均力敌的，罗斯福决不是稳操胜券。弗林告诫说，华莱士上候选人名单可能意味着丢掉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加利福尼亚，这无疑是把情况夸大了，问题是要找出一位对罗斯福获胜的可能妨碍最小的人。因此，根据弗林后来的记录，他们两人一起浏览了名单，权衡所有其他候选人的不利的一面。

弗林同意贝尔纳斯是最强的人选，但是被抚养成天主教徒的贝尔纳斯结婚时离开了天主教，成为圣公会基督徒，在弗林看来，天主教徒们“不会容忍这种做法”。由于贝尔纳斯反对战时的静坐罢工，工会对他不热心。而对弗林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贝尔纳斯的南方背景和记录在案的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这是关键的毛病。1938年贝尔纳斯是南方参议员中反对拟议中的联邦反私刑法的急先锋，他在参院议员席上的一次发言中，主要抨击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长沃尔特·怀特。“黑人不仅已经进了民主党，”贝尔纳斯说道，“而且他们进来控制了民主党。”然后他指着怀特坐的位子喊道：“如果沃尔特·怀特……同意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的话，那么赞同者们应像足球队员听到裁判员的哨声立即停止争球那样放弃它。”

当贝尔纳斯被问到他认为谁应与总统一起竞选时，他往往提到杜鲁门、雷伯恩和亨利·J·凯泽。

弗林和罗斯福一致认为萨姆·雷伯恩不错，可他来自得克萨斯州，又是一位南方人，因此“不能予以考虑”。他们把整个参议院的名单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哈里·杜鲁门了。正如弗林所写的：

他在担任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期间工作出色，在参议院劳工问题上的投票情况是好的；另一方面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党内的保守派，他来自中西部边沿的一个州，从未发表过任何“种族主义的”言论。他正是合适的人选。

弗林离开白宫时深信他的看法得到了总统的认同，即罗斯福把杜鲁门看作是对候选人名单妨害最小的人。这不完全是对该密苏里州参议员令人鼓舞的认可，但它却是弗林早想听到的话，这可能是总统在他离去时给他留下这个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罗斯福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的。

大约就在同时，罗斯福请战争动员咨询委员会委员安娜·罗森堡夫人帮个忙，她的办公室和贝尔纳斯一样在东侧楼。罗森堡夫人已成为一个受总统喜欢的人，她光彩动人，衣着入时，使用贵重香水，把女人的风韵带进了白宫，大受罗斯福的欢迎。与罗斯福夫人不同的是，她还会鉴赏美食，时不时地给总统偷带进一些瓶装鱼子酱，有时也带一些由她的匈牙利母亲做的篓装辣子鸡，她和罗斯福一起偷偷地在总统办公室高兴地大口大口地吃鸡，就“像淘气的孩子一样”，她回忆道。罗斯福现在告诉她，贝尔纳斯是最出色的人，但请她转告贝尔纳斯，由于黑人选票问题，他将不是副总统的人选。罗森堡夫人十分钦佩贝尔纳斯，并想让他上候选人名单，她说不能帮这个忙。如果总统想让贝尔纳斯知道此事的话，那么他必须本人亲自告诉他。但是正如她所知道的那样，总统决不会，也决不能这样做。

杜鲁门准备把工作清理一下,在7月19日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之前回密苏里呆几天。随着会期的临近,关于副总统问题上的闲话更多了。杜鲁门对任何人问他是否对提名感兴趣的回答都是“不感兴趣”。整个事情弄得他心烦意乱,他没见过总统。自从他上次见了总统以来已有一年多了。现在他也不会刻意求见。

“我不想当副总统。”当杜鲁门和威廉·赫尔姆匆匆走过参议院办公楼大厅时,他对赫尔姆说。赫尔姆后来写道,任何看见他脸上表情的人都知道他讲的是真心话。

参议员中被认为参加竞选的其他民主党人士增加了不少,以致记者们开玩笑说,统计非候选人的工作更容易了。7月6日从走廊的传闻中判断,华莱士的提名已经定妥。7月7日,“消息灵通人士”称,总统希望提华莱士,但是他还希望准备3或4名“可以接受”的备用名单,为了万一代表大会拒绝“吞下亨利”。在那种情况下巴克利就是第一人选。7月9日人们注意到,由于参议员杜鲁门继续与战时生产局及陆军海军奋争,他正在扼杀可能得到的任何机会。

“副总统不过就是主持参议院罢了,无所事事,没事找事,消磨时光。”杜鲁门对一位朋友解释道,“它是很高的、完全荣誉性的职位,我没有任何野心去担任那样的职位。”

麦克斯·洛温塔尔和莱斯·比弗尔力争杜鲁门竞选副总统。“夫人不希望我竞选副总统。”杜鲁门告诉洛温塔尔。他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写道:“奇怪怎么会有人给了像我那样接近副总统职位的好运,而我却不想要它。”他明确地写道,他也在思考罗斯福显然要过世的问题,更不用说他自己的岁数也不小了,他补充道:“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但我倒不希望60岁时从后门或任何其他门搬进去。”

这封信写于7月9日,正是这天他开始独自长途驾车回密苏里的家。

7月10日星期一,美国副总统在结束了行程27000英里、历时51天的访华使命后,从西雅图经过一整夜的飞行抵达华盛顿,他疲惫不堪,下午4点半他向总统汇报出访情况。罗斯福像往常一样热诚。他们长时间地谈论中国和华莱士去外蒙古的冒险行动,外蒙古是美国人17年从未去过的地方(华莱士给爱好集邮的罗斯福带回一些蒙古邮票)。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最后还是罗斯福“先谈到政治,他说我出去后应该说未讨论过政治问题”。

罗斯福使华莱士确信,他是他选择的竞选伙伴,他有意使第四任成为“真正是进步主义的”。他谈到职业政客们认为选华莱士可能意味着损失200万或300万张选票(这个数字是由爱德华·弗林提供的)。“总统先生,”华莱士插话说,“如果你能找到任何将比我争取到更多选票的人,无论如何要选择他。”罗斯福告诫华莱士,他在芝加哥争取副总统提名时可能面临严峻考验,可能意味着华莱士的家人要承受痛苦,他对此表示关注。“想想不赞成的嘘声、嘲弄和明确的拒绝。”罗斯福说。华莱士说他对他的家人并不担心。

第二天7月11日星期二,总统正式宣布他竞选下一届总统(扬·艾伦·德鲁里写道,他永远不会忘记当这一消息传到国会山时民主党参议员们脸上的表情。)就像太阳突然从乌云中露出头来,光芒普照大地。每张脸上都露出了放松的表情,我的意思是放松,党保住了,一切安然无恙。7月11日中午吃饭时,霍普金斯再次问罗斯福,他认为谁能成为最好的总统,是贝

尔纳斯还是威廉·O·道格拉斯。“吉米·贝尔纳斯，”罗斯福说，“因为他比周围任何人都更懂得治理。”霍普金斯问如果由党的代表大会去决定的话，总统认为谁会赢得提名，罗斯福再次说：“贝尔纳斯。”

当晚晚餐后，反华莱士联盟的全体成员——弗林、汉尼根、沃尔克、艾伦、波利、加上一位特别有影响的“务实”政客芝加哥市长埃德·凯利——和总统一起聚集在白宫二楼总统的蓝色椭圆形书室，他们把此次聚会视为决定性的会议。

由于天气闷热，每个人都只穿衬衫，未穿外衣，传送了饮料，他们再把所有可能入选副总统的名单进行一个一个地筛选。贝尔纳斯和雷伯恩再次被否决掉，而巴克利现在也第一次被排除掉了，因为在罗斯福看来，巴克利太老了。他像贝尔纳斯一样66岁，仅比罗斯福年长4岁而成为其前辈。而共和党人在他们的芝加哥党代表大会上刚提名年满42岁的纽约州长托马斯·E·杜威为总统候选人，42岁正是罗斯福的共和党人堂兄西奥多就职总统的年龄。因此年龄很可能成为竞选中的一个问题。

罗斯福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上需要有一名年轻人，令他人感到始料不及的是，他竟提名威廉·O·道格拉斯，这是他们任何人都未曾认真考虑过的。他说，道格拉斯年轻（53岁），有生气，是位能干的自由派人士，他有一种能吸引选民的童子军气质。此外罗斯福认为道格拉斯会玩一种有趣的扑克牌游戏。

但是这个提名一下就被否决了。道格拉斯和华莱士一样，没有人想要提他。

议论又转到哈里·杜鲁门，罗斯福在人们交谈中很少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说他已把杜鲁门安排在他的委员会中（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认为他工作得很不错。罗斯福同意说杜鲁门有能力，对政府忠心耿耿，“政治上明智机敏”。据报道，会上“详尽讨论”了杜鲁门与彭德格斯特核心小集团的关系问题，认为这是个不相关的事情就不予考虑了。

使总统感到不安的仅有一点，那就是杜鲁门的年龄。罗斯福称他说不准杜鲁门的年龄，但认为他已年近60岁了。汉尼根知道杜鲁门已经60岁了，他想换个话题，但总统派人去取《国会指南》，交谈在继续。当《指南》送来时，埃德·波利不动声色地接过来没有再开口。

关于哪位候选人可能最适宜并能挑起总统职位的重担与责任，会上似乎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讨论。显然只有罗斯福略有论及，他再次说，总的说来吉米·贝尔纳斯是最合格的人。

人们还记得总统在那闷热的整个夜晚是多么的疲倦和无精打采。弗兰克·沃尔克后来评论说，他从不知道罗斯福是那么情愿在场外旁观，“而让其他人承担一切”。

筋疲力尽的他被战争问题困扰着。自从盟军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国人向伦敦发射了第一批V—1火箭，这是希特勒的可怕的报复武器。在太平洋，美国人突袭塞班岛，遇到了日本人自开战以来最顽强的抵抗。就在一周前7月6日晚，3000名日军在一次大规模拼死进攻中向27师猛扑过去，结果该师官兵全体阵亡。谁也决不希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罗斯福更是如此。

最后罗斯福转过头来对汉尼根说：“鲍勃，我想你和在座的所有其他人都想要杜鲁门。”

罗斯福还没有讲他自己是否想要杜鲁门，就在这时，手中仍拿着《国会指南》的埃德·波利起身建议大家散会，在罗斯福未及再往下说时他就赶紧让屋里的人离开房间。在楼下，当大家将要离去时，汉尼根又决定上楼去取一些书面的东西。据有些人说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便条，那是总统在一个信封上潦草地写下的话：“鲍勃，我认为杜鲁门是最适当的人选。富·德·罗。”然而个人随手写的东西很难被认为是最后的决定，正如乔治·艾伦谨慎地陈述的：“罗斯福仍可随时改变他的想法……。”

大约一天后，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次和总统谈到副总统问题时，没怎么提到参议员杜鲁门。“我猜想他和我一样感到杜鲁门可能会干的，但是杜鲁门与党魁的关系可能会引起一个由他人提出的危害总统候选人名单的政治问题，而这一问题会特别受到杜威的欢迎，杜威在政治上的显赫是与各种党魁进行斗争的结果。”

这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即不管有多少人与总统谈这个问题，他们在离开时无不感到总统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至少目前就是如此。

7月12日星期三上午，汉尼根第一次有机会前往位于沃德曼公园的亨利·华莱士的公寓去见他，此行的使命据汉尼根后来讲，是应总统的要求而承担的。他告诉华莱士，他会损及候选人名单，因此必须退出。华莱士说，他们也可以彼此了解一下，只要总统愿意要他，他就不退出。

13日星期四，华莱士和总统共进午餐，总统向他稍微详细地通报了11日晚的会议，解释说职业政客们愿意选择杜鲁门，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位没有政敌的人，并可以为候选人名单增添力量”。华莱士给总统看了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65%的民主党选民赞成华莱士，赞成风尔纳斯的仅为3%，杜鲁门2%，甚至表现平平的、唯一的其他潜在候选人阿尔本·巴克利，也得到17%的人的赞成。

罗斯福说，他有意给党代会主席萨缪尔·杰克逊写封信说，假如他是代表，他会投华莱士的票。华莱士问他是否会提出任何备选的人名，罗斯福向他保证说他不会。

副总统起身打算告辞。他现年55岁，人清瘦但身体很好，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去打网球。可他外表邋遢，在人面前总是显得拘束，那绺灰中带红的头发蓬乱地盖在他前额的右边，使他看上去像个乡巴佬，与轮椅上的总统那么迥然不同。

“好吧，我以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下周的结果，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华莱士说。罗斯福仰起头微笑着把华莱士拉近身边，有力地拍了下手说道：“虽然我不能公开那么讲，但我希望还是原班人马。”

在同日上午的另一次交谈中，罗斯福告诉吉米·贝尔纳斯，他肯定华莱士在芝加哥的大会上通不过，但是他不会同意除华莱士之外的任何候选人。贝尔纳斯指出，在鲍勃·汉尼根实际上告诉他说他是总统的第一人选之前，他不许自己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关于他对黑人选民所持立场的问题，贝尔纳斯只说当一切都说到并做到时，他并不认为那会有什么关系。他拿出刚收到的南卡罗来纳州的艾肯寄来的一张照片给总统看，上面有罗斯福夫人正在向“一群黑人发表演讲。”看他们脸上的表情，”贝尔纳斯说，“那是偶像崇拜。你不能对我说，因为候选人名单上有一位南方人，这些人就会转而反对比任何人为他们干的实事都多的罗斯福夫人和总统……。”罗斯福说，他认为贝尔纳斯是对的。

“总统先生，上周我在白宫上下听到的全是对黑人的谈论。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想到过白人。你不是一直都在想谁能为黑人做得最多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必须由南方的白人去解决……”

罗斯福说他希望在党代会上人们可以公开竞选，可以理解贝尔纳斯以为这意味着他本人有了提名的一切可能的机会。“你是整个班子中最合格的人，你一定不要不参加竞选，”罗斯福告诉他，“如果你参加，肯定能获胜。”

第二天贝尔纳斯在与汉尼根和弗兰克·沃尔克共进午餐时重复了罗斯福说过的话。汉尼根不信，他说：“我不理解。”贝尔纳斯也不理解，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回到白宫他的办公室后，给罗斯福拨通了电话，此时罗斯福正在纽约海德公园的家中。曾做过法庭速记员的贝尔纳斯用速记记下了他们的谈话。

罗斯福再次重申他不偏爱任何人。“我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不，我不偏爱任何人。”

贝尔纳斯：鲍勃·汉尼根和弗兰克·沃尔克今天说，如果他们在党代会上被问及你的看法时，他们就得对他们的朋友们说，从你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是你不喜欢华莱士，而是你确实第一希望要杜鲁门，第二道格拉斯，而且你对这两个人的选择不管是哪一位都优先于我，因为他们会使候选人损失的选票比我会造成的损失少。

罗斯福：吉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不是我对他们讲的话，而是他们对我讲的。当我们一起审阅名单时我未讲过我想要何人或何人将使我丢选票，但是他们都认为杜鲁门比任何人对选票造成的损失都少，道格拉斯很可能是第二。这是他们达成的共识，而我与之无关……

贝尔纳斯催问他，如果汉尼根和他的朋友们把任何一种说法发表出去，称总统希望提杜鲁门和道格拉斯，那么对他自己的事业来说，就有可能使得事情变成非常难办。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用词，”罗斯福回答道。“他们问我是否不赞成杜鲁门和道格拉斯，我说不是，那与用‘更喜欢’一词不同，它并不表示喜欢的意思，因为你知道我告诉过你，我并没有倾向性。”

罗斯福问贝尔纳斯他是否会争取提名。贝尔纳斯说他正在考虑，但是他需要知道总统的看法。罗斯福答道：“不管怎么说，吉米，你本人和亨利与我的关系都很好。我不太认识杜鲁门。道格拉斯是一位牌友，他很会玩牌，并会讲吸引人的故事。”

贝尔纳斯打完电话，通过走廊径自去了霍普金斯的办公室，向他复述了总统刚才的话。如果有谁知道罗斯福的心思的话，那也许就是霍普金斯了，他现在告诉贝尔纳斯，总统相信如果贝尔纳斯参加竞选他会获胜，他将得到提名。

据贝尔纳斯讲，之后他给在密苏里的哈里·杜鲁门打了电话，尽管杜鲁门记得电话是在上午早些时候当他正要出发前往芝加哥时打来的。到底是在星期五还是星期六早晨打的电话，这一点不清楚，也不重要。但是假定贝尔纳斯在与总统交谈后才会给杜鲁门打电话的话，那么这最有可能是星期六的早晨。

杜鲁门下榻于堪萨斯城总统饭店。贝丝、玛格丽特、马奇·华莱士去弗雷德·华莱士在丹佛的新家拜访他。

贝尔纳斯问杜鲁门当他告诉报界不想要副总统提名时是否是认真的，杜鲁门回答道确实是认真的。他不是候选人。贝尔纳斯说罗斯福已给他开了“绿灯”，最好由杜鲁门在芝加哥为他发表提名讲话，杜鲁门爽快地答应下来，说他很高兴并将尽力组好密苏里代表团。显然他此时也已确信贝尔纳斯既是总统的备选对象也是最好的人选。杜鲁门这么自信，其消息来源一定是从鲍勃·汉尼根那儿得来的。否则他不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如此肯定的回答。

又是根据杜鲁门的回忆，他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是阿尔本·巴克利想请杜鲁门在芝加哥为他发表提名讲话。杜鲁门以说声对不起回绝了，而他刚答应了吉米·贝尔纳斯。

2

芝加哥党代会在副总统问题上完全陷入一片混乱，而且似乎永远不会有必然的结果。人们的野心太大，欺骗、施计、玩弄感情的机会太多，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指令太不确定，反复无常，那里甚至给人一种像是走在小路上随时会遭遇不测的感觉。会上几经出现的情况本来可以不是那样的，并产生具有最深远影响的结果。正如阿尔本·巴克利所写的，在芝加哥演出的所有以前曾在华盛顿演出过的情节中，其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一部令人着迷的政治剧。它是赌注最高的政治，最要小心对待的政治，是那年夏季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任何一次的唯一真正的戏剧性事件。

几周前当共和党人住满了同一些旅馆，在同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厅里挑选他们的被提名者时，并没有什么竞争和惊奇之事。托马斯·E·杜威在第一轮投票时就顺利通过提名，票数接近的唯一竞争者参议员约翰·W·布里克被挑选为他的竞选伙伴。现在集中在一起的民主党人甚至连见他们的旗手和英雄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的领导人完全同意连任又一届总统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罗斯福谢绝在党代会上露面，因为他说他的职责是总司令，正如他把战时当个“好战士”视为他的职责而同意再次竞选一样。他接受竞选的演讲须由联播电台从西海岸某处不公开的地方播出。

但是正如会聚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的许多民主党人所了解的那样，这次挑选副总统任务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他们共同而现实的、不言自明的观点是他们在那儿不是挑选一位而是两位总统，而且即使第一位已明确是谁，第二位是谁也还是不清楚的。

如果在代表们到饭店办理登记手续时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的话，多数人的选择可能是亨利·华莱士。I·F·斯通在《民族》周刊中写道，根据他的内部消息他可以肯定地报道说将会是华莱士。然而，著名的电台评论员H·V·卡滕伯恩实际已宣布阿尔本·巴克利获得提名，而《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则称排在华莱士后面的主要竞争者的顺序是贝尔纳斯、巴克利和道格拉斯，未提哈里·杜鲁门。代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讲话的乔治·艾伦认为有可能是杜鲁门但他没有把握。与此同时，该委员会中最有影响的汉尼根和凯利市长两人则断定是贝尔纳斯。

但是，当然，由于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以没人真正知道，而且也正如乔治·艾伦说得很恰当的那样：“当然了，罗斯福可以提名任何人。”

直到很久以后，杜鲁门才私下对人说他认为是华莱士。阿尔本·巴克

利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时称，他在这件事情上太幼稚了。从政近40年，此次是他第11次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但他从未见过任何像这次所发生的那样的事情。

7月15日星期六离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还有4天，杜鲁门从堪萨斯城驱车前往芝加哥，同一天，总统乘坐的西行专列打破原定计划停在了芝加哥。

据后来透露的消息，罗斯福当时是在去圣迭戈的途中，那儿的一艘巡洋舰将把他送到夏威夷去会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但那天下午3点他的火车被调到侧线上，鲍勃·汉尼根因此得以上车，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总统新的私人装甲列车车厢里同他私下交谈，该列车是战争引起的又一新发明。他们在一起大约谈了半小时。”这次会谈期间总统专列一直停在芝加哥车场内，我们谁都未对外露面。”总统秘书格雷·塔利写道。虽然罗斯福和汉尼根的谈话内容几乎全部保密，但是罗斯福的一个要求可能成为党代会最为人知晓的路线。总统说不管决定什么事情汉尼根必须首先“征得西德尼的同意”，意思由西德尼·希尔曼最后拍板。希尔曼现负责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富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该会是美国政界中的一种新生事物。

汉尼根带着一封信下了火车，信是写在白宫信笺上的，汉尼根没有把它放在公文包里，而是夹在一本《全国地理杂志》中。信中填迟的日期为7月19日：

亲爱的鲍勃：

你已将哈里·杜鲁门和比尔·道格拉斯的情况信告于我。我当然非常高兴与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位参加竞选，并相信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都会给候进人名单增添实力。

始终忠诚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

这封信到底是在华盛顿预先写好的还是那天奉命写就的不清楚。但格雷·塔利说，汉尼根从总统的起居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封信，上面写着两位可以接受的竞选伙伴的姓名，威廉·O·道格拉斯写在前，哈里·杜鲁门写在后，汉尼根告诉她，总统要求在为此信重新打字时，把两个名字的顺序颠倒一下。对她来说，颠倒顺序的理由似乎显而易见。“把杜鲁门的提名放在前，不言而喻他是总统考虑的优先人选。”汉尼根后来否认作过顺序上的变动，由于第一封信已被另一位实际打字的秘书扔掉了，已无法证实或反驳事情的原委。埃德·波利声称汉尼根去见总统时他一直和汉尼根在一起，他后来说，汉尼根回到饭店后才吃惊地发现甚至提到了道格拉斯。而且，罗斯福手中注明日期为7月19日的便条以及写在白宫信笺上的便条的打字复印件还在，都表明杜鲁门的名字放在前面。但是大家知道格雷·塔利从不捏造事实，在此事上她也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干。

无论如何，端庄而爱交际的汉尼根——大家都记得的大忙人鲍勃先生，在他第一次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大耍欺骗花招，这可能是遵照罗斯福的指示做的，也可能不是。因为他的下一步是给华盛顿的吉米·贝尔纳斯挂电话，对于贝尔纳斯来说这是他当天接到的第二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埃德·凯利市长早上打来的，告诉贝尔纳斯他和汉尼根不再担心如果贝尔纳斯提上候选人名单会失去黑人选票，以及汉尼根将在总统专列抵达后把此话转告总

统。现在在第二个电话中，汉尼根告诉贝尔纳斯副总统人选已定，就是贝尔纳斯。“总统已给我们开了支持你的绿灯，他希望你来芝加哥一趟。”

贝尔纳斯立刻离开华盛顿到芝加哥去，他在火车上见到汤姆·康纳利，扬扬得意地透露说他已被提名。罗斯福亲自传达的命令。“哈里·杜鲁门将提我的名。”贝尔纳斯说。

贝尔纳斯于16日星期日早晨抵达芝加哥，一辆鲜红色的消防局局长的轿车和司机已在站台恭候他，这是凯利市长的好意。他被直接送到位于湖滨大道的市长公寓，与凯利和汉尼根共进早餐，他们肯定了他是被选中的人，并引用罗斯福指示的话说：“这个么，你们知道从一开始吉米就是我的选择，干吧，就提他吧。”过了一会儿，凯利也告诉了阿尔本·巴克利：“提名吉米十拿九稳了。”

汉尼根一伙人当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贝尔纳斯一起制定战略。汉尼根甚至下令印制“罗斯福和贝尔纳斯”的招贴画。到下午晚些时候，此话已经在饭店大厅里转来转去的代表和记者中间传开了。

罗斯福给汉尼根的信一直保密。汉尼根后来说，因信上提到道格拉斯所以他没给任何人看。显然还没有人对参议员杜鲁门说过此事，他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提名贝尔纳斯的讲话稿了。

那天晚上在饭店房间里，杜鲁门坐在窗边与圣路易斯的一名记者长谈，窗户敞开着，远处蓝灰色坦荡的密歇根湖的全景映入眼帘。双方已谈妥，杜鲁门所谈的大部分内容不得发表。尽管贝丝和玛格丽特定于星期三从丹佛抵达这里，住在莫里森饭店，参议员还是住在史蒂文斯饭店的一个套间里，即在历史悠久的“黑石”饭店的街对面，这样他“从事的政治活动”就不会打搅她们的睡眠。他的候选人吉米·贝尔纳斯也住在史蒂文斯饭店第23层豪华的皇家航道套间里，比他高6层，几周前托马斯·E·杜威曾经住过这些房间。

杜鲁门说他决心不参加竞选。他知道自己彭德格斯特背景问题还会拖累，他对此不抱希望。他工作过于卖力，未能在参议院享有好名声。记者说他做了副总统就有可能“继任王位”。杜鲁门摇头说：“扯淡，我不想当总统。”然后他从约翰·泰勒起叙述了每一位继任最高职位的副总统所经历的失败与嘲弄，而西奥多·罗斯福这一最明显的相反例子却忽略未提。

同天晚上，杜鲁门向另一位记者重复讲了大致相同的话。那些接替去世总统职位的人在任职期间遭到奚落，伤透了心，完全丧失了往日的尊严。“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

似乎没人回避罗斯福的健康和副总统的提名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个中心问题。杜鲁门在堪萨斯城的朋友汤姆·埃文斯后来称，杜鲁门深知罗斯福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而这恰恰是他为什么不愿当候选人的原因。“我对我现在的位置很满意。”埃文斯记得他说过，“只是这么一点儿的心跳，”杜鲁门说着用食指和大拇指比划出一条很小的缝隙，“把副总统和总统分开了。”

他自从到芝加哥后，晚上一直难以入睡。他对企图刺探他家庭隐私的做法感到愤恨，担心如被搞得声名狼藉会对处于她生命中一个重要阶段的玛格丽特产生影响。他担心家丑外扬，并告诉埃文斯，贝丝已列进华盛顿在职人员的工资单和报界会怎么对待这件事情。数年后玛格丽特写道，他最害怕的是戴维·华莱士自杀一事的披露和复述会使贝丝和她的母亲受到什么样的打击。

埃文斯是位年老的彭德格斯特的忠实追随者，靠着开连锁杂货店大量销

售彭德格斯特啤酒和威士忌致富。他应杜鲁门的请求来到芝加哥，其目的大概是像埃迪·麦金和约翰·斯奈德所做的那样，帮他挡开提名。愁眉苦脸、笨手笨脚的弗雷德·坎菲尔也在旁边担任一般打杂的角色。一位记者注意到，“他看起来好像能在三次中有两次搬倒一头公牛”（坎菲尔后来抱怨他没有看到代表大会会场上的大部分戏，“因为有人要喝酒，我得帮他”，然而他们所有的人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声谈论杜鲁门是位理想的人选——麦金喜欢说这是个命运问题，并试图说服杜鲁门改变主意。

能喝酒的胖子罗伊·罗伯兹身为堪萨斯城《明星报》固执己见的编辑，共和党人，是杜鲁门讨厌的人。他也大汗淋漓地跑上跑下，表现得像是能左右选择候选人的要人一样，令杜鲁门大为恼火。

大家全都看到一点，即总统职位的确处在危急中。如麦金所记得的那样，他们“把杜鲁门拉进一间房间，……向他说明形势”。谈了很久之后，麦金对他说：“我认为，参议员，你去干吧。”杜鲁门厉声质问是什么使他产生这种想法的？麦金说：“因为在密苏里州的格兰德维厄有位90岁矮小的老妈妈想看到他儿子成为美国总统。”杜鲁门脚步沉重地含泪走出了房间。

贝丝、玛格丽特、米尔德里德·德赖登等杜鲁门在密苏里的一小帮朋友，以及他的第一次来芝加哥参加全国党代会的兄弟维维安，他们都相信他不想被提名，他们后来都强调由于压力的增加他变得极端固执。只有仍不为人所关注却在一边观察的维克·梅萨尔想的不同。梅萨尔称杜鲁门在政治上一直雄心勃勃。“我相信他想当副总统。但他不得不装出他不想当的样子。”

约翰·斯奈德几年后在回顾杜鲁门的心情时说，并不全是杜鲁门不想当总统，而是他不想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情况是不同的。

在杜鲁门的记忆中，芝加哥党代会期间总是“那么痛苦”，是他一生中最恼火的经历。杜鲁门的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员马奎斯·蔡尔兹形容他显然是“吓死了”。

7月17日星期一，大会主席萨缪尔·杰克逊公布了罗斯福总统关于华莱士的信引起轰动。一百多名记者争相索要信的油印本。信是星期五写于海德公园的寓所。这一天正是罗斯福给吉米·贝尔纳斯去电话消除他疑虑的时候：

亨利·华莱士担任副总统的4年间（请阅即刻著名文件的关键段落），再早在他担任农业部长的8年间以及更早些时候，我一直与他共事。我喜欢并尊重他，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因此，如果我是会议代表的话，我个人将会投票赞成提名华莱士。

在许多人看来，此信似乎是对华莱士的爱他反而害他的招致死亡的接吻，用一篇报道的话说，即“在罗斯福整个漫长的生涯中最冷漠无情的打发人”。毫无疑问，此信大大放开了对竞选伙伴的选择。罗斯福还写道，他不“想看上去好像是在哪方面都指挥着大会”。有几家报纸称，如果说有人受益的话，那就是吉米·贝尔纳斯。《圣路易斯邮报》称该信极大地鼓舞了“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吉米·贝尔纳斯的士气高昂的竞选班底”。而华莱士的人员，包括西德尼·希尔曼和产联的菲尔·默里把该信的公布当作希望的迹象，因为他们的华莱士是如今持有总统亲笔信认可的唯一候选人。“人们普遍把该信看作是总统的赞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华莱士在议会中的一个党派头目克劳德·佩珀回忆说，从他在华盛顿与总统的交谈看，他肯定总统想要华莱士。直到这时汉尼根方始作出反应，说他也有一封总统提名杜鲁门的信，

但不允许任何人看。汉尼根在“黑石”饭店7层拐角处的708—709套间已成为党代会的神经中枢，因为只有他声称可直接与总统电话联系。在外面地上铺着红地毯的大厅内，记者和摄影师24小时守候着，紧盯着进进出出的人。开始汉尼根想劝阻他们，强调那里没有发生什么事。“不断”进出的凯利市长一直在提总统的信。“你想看吗？”他问一位将信将疑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代表。那位代表回答当然想看。“现在还不在我手里，”凯利说，“但是我明天可以拿给你看。”

那天晚上，凯利在芝加哥北岸区的一个私人公寓里安排了一次晚宴。地点对新闻界保密，晚宴上贝尔纳斯是当时的要人。直到大家快要离去时汉尼根才提到另一个细节，即根据总统的要求，需要“征得西德尼的同意”。汉尼根似乎把这一点视为不过走个形式而已。

星期二早晨，参议员杜鲁门和西德尼·希尔曼请饭店服务部把桔汁、鸡蛋和咸肉送到伊斯特大使饭店希尔曼的套间，杜鲁门把这家饭店称为“特级饭店”。希尔曼生于立陶宛，犹太法学博士，曾在纽约服装区干过周薪8美元的学徒，学裁裤子，那时杜鲁门还在农场扶犁耕地。23岁时希尔曼第一次领导罢工，30岁时建立了美国混合服装工人工会。他还加入过社会党，说话时仍略带口音。在像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厄这样的地方凭这几点就可以使他成为好像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在汉尼根和凯利那样的党的头目眼中，他是个外行，因此不完全可靠，不管他在政治行动委员会拥有多大权力或他对总统多么忠心耿耿。希尔曼甚至不是注册的民主党党员。另外，他作为华盛顿前生产管理办公室两主任之一，受到杜鲁门委员会的猛烈抨击，主要由于此原因，他被罢免。因此杜鲁门没有理由过多指望得到他的合作或支持。

杜鲁门请希尔曼支持贝尔纳斯，希尔曼婉言拒绝这样做。他说他正全力为亨利·华莱士效劳。如果华莱士不可能了，那么他想要么提威廉·O·道格拉斯，要么提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说他将提名贝尔纳斯，希尔曼说那将会是个错误。

杜鲁门直接向贝尔纳斯报告了希尔曼的全部原话，但贝尔纳斯似乎并不介意，这是有理由的。据可靠报告，获得提名需要589张选票，他已争取到400张了。

18日星期二上午早些时候当弗林抵达芝加哥时，汉尼根急忙把他拉到一个角落说全完了，“提的是贝尔纳斯！”弗林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要求召开选拔委员会会议，参加的是前一天晚上的原班人马，地点还在同一个秘密的北岸区公寓，只是这次增加了西德尼·希尔曼，而吉米·贝尔纳斯则没有参加。

弗林坚持只提名一个人，那就是杜鲁门，因为哈里·杜鲁门是他们与总统商妥的人选。

弗林极为恼火。他后来写道：“我吓唬委员会，我磨破嘴皮摆明理由还发了誓。”希尔曼宣称工会不接受贝尔纳斯。弗林说仅在纽约贝尔纳斯就将造成不少于20万张黑人选票的损失。贝尔纳斯是一种“政治性负债”。罗斯福有可能在选举中败北。对此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赞同，有党的主席汉尼根、波利、沃尔克、艾伦、代表劳工的希尔曼、大城市头目凯利。记者把他们称为“融洽的一伙”。

弗林给在圣迭戈的总统拨通电话，每人轮流通了话。最后罗斯福同意该提名杜鲁门。

尽管各种说法有所不同，看起来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很快分别向贝尔纳斯和杜鲁门传达了总统的谈话。汉尼根去史蒂文斯饭店杜鲁门的房间告诉他，汉尼根还给他看了总统用普通写法写的便条，杜鲁门记得上面写着：“鲍勃，提杜鲁门，富·德·罗。”与据说罗斯福11日晚在白宫给汉尼根草草写下的条子用词不同。而且据杜鲁门回忆，给他看的便条是写在草稿纸上而不是信封上。杜鲁门怀疑罗斯福是否写过这张条。他回忆说：“我仍不能确信这是总统的意图。”

大约一小时后，杜鲁门独自去皇家航道套间把事情与贝尔纳斯做个了结，他要求不再履行对贝尔纳斯表示支持的诺言。贝尔纳斯说在目前情况下他完全能够理解，并说他是否留下竞选要留待第二天再说。当贝尔纳斯好不容易拨通罗斯福的电话时，得到的回答是总统不在。

情况突变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爱德·弗林来这个城市不到一天，一切都变了。第二天7月19日星期三上午，也就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特纳·卡特利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长篇报道中有一段披露：

纽约州代表团听了关于反华莱士的势力将选择参议员杜鲁门的报告……纽约全国委员会成员爱德华·J·弗林在领导人会议上向他们通报了华莱士的对手决定支持参议员杜鲁门，纽约州代表团可能至少在第一轮投票后投他的票。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个决定。

贝尔纳斯放弃了竞选，各地的议论是，头头们否决了他的候选人资格。贝尔纳斯向报界发表谈话时称，他的退出是“尊重总统的意愿”。他感到总统背叛了他，忿然离去，返回故里。在同阿尔本·巴克利话别时，贝尔纳斯忿忿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讲太恭维他的话。”巴克利被定为由他为总统提名。

巴克利和贝尔纳斯一样情绪受到震动，罗斯福及其损害他们的诡计令他怒不可遏。他告诉一位记者说他对权术这一套已经厌倦了，并扬言要撕掉提名演讲稿，并和这一切断绝关系。

对杜鲁门来说，情况难以控制。这三四天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日子，他无法控制，他的命运再次由他人来决定。现在揣测集中在他身上。而随着支持他的人的增加，由于彭德格斯特斯的牵连，反对他的人也在增加。吉姆·彭德格斯特是密苏里州代表团中的重要人物，该代表团第一个提名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是颇为违背他的心愿的。杜鲁门在偶然遇见他旧日高中老同学、现任《圣路易斯邮报》特约撰稿人查理·罗斯时说：“为我难过吧，我陷入了可怕的困境。”

杜鲁门从未谈过在这点上他对汉尼根的信任程度，但是在多数人看来，这位党的年轻头目似乎与他担任的这一公开的党的角色不相符。他看起来好像总是在临时应对，很少拿得出有把握的依据。为了证明他确有罗斯福关于杜鲁门的书面东西，他终于公布了曾引起众多议论的信。然而由此产生的只是更多的抱怨和争议。他为什么不说信中提到杜鲁门和道格拉斯呢？他声称同意提杜鲁门仅对了一半，难道欺骗性的半真半假的报道不就如同谎言吗？7月18日公布的一封被猜想是7月19日写的信，它的可信程度又应该是多少呢？

这封信使许多人感到特别吃惊，当威廉·O·道格拉斯后来从报纸上看到

关于它的报道后也有同感。党代会期间，他正在俄勒冈州的山岭中作徒步旅行。没有人告诉过他，他是正被考虑的对象。

与此同时，亨利·华莱士已抵达芝加哥，在谢尔曼饭店拥挤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坐在桌子上，摇摆着长腿说，在会上他要战斗到底。他的支持者声称要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 400 张选票。在谢尔曼饭店召开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秘密干部会议上，产联主席菲尔·默里挥动着拳头、带着浓重的苏格兰粗喉音说：“华莱士……华莱士……华莱士，就这样，继续努力干吧。”

正午前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芝加哥体育馆开幕了，会议死气沉沉，完全是例行公事。在这座巨大的体育馆内，罗斯福于 1932 年、后来又于 1940 年获得提名。馆顶钢梁上悬挂着一幅罗斯福的巨幅画像，这幅画像 1940 年使用过，这次仅稍加修描，使他的脸部看上去不那么苍白。会上有祈祷和发言。而真正的交易则在饭店继续进行着。

3

史蒂文斯饭店和“黑石”饭店仅隔一条狭窄的鲍尔博街。7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杜鲁门“应召”前往“黑石”饭店 7 层汉尼根的套房。汉尼根的领口敞着，衬衫被汗水湿透。他在召集内部核心开会，与会的有波利、沃尔克、凯利、弗林，并第一次加上泽西城党的头目弗兰克·黑格，他从未特别关心过参议员杜鲁门，直到现在还对代表们说他不想提杜鲁门，因为提他的名只能挑起整个党魁问题。

显而易见，此次聚会实际上是为杜鲁门安排的（巴克利后来把汉尼根称为芝加哥的“舞台监督”）。现在到了参议员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了。他们正在安排与圣迭戈通话。

杜鲁门坐在两张床中的一张上，汉尼根手握电话坐在另一张床上。“罗斯福不管什么时候用电话，”杜鲁门回忆道，“他说话声音总是那么大，受话者为防止震耳必须把话筒拿得远离耳朵，因此我发现两边的谈话我都能听到。”

“鲍勃，”罗斯福的声音很响，“你把那家伙说通了吗？”

“没有，”汉尼根说，“他是我所对付过的密苏里人当中最会故意作对的该死的顽固派。”

“好吧，你告诉参议员，他如果想在战争的中途分裂民主党，他将承担责任。”说完罗斯福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杜鲁门后来说他完全惊呆了。“这下完了，把我难倒了。”据报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噢，胡扯！”他自己回忆道：“那么，既然如此，我只能说同意了。可他究竟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

那天晚上，亨利·华莱士突然出现在大会代表席上，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使在座的所有的人，显然也包括亨利·华莱士感到惊讶。

“天啊！”玛格丽特·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密苏里州代表团已决定提名父亲为副总统。而副总统华莱士是非常强的，所以我怀疑我们是否能获胜，尽管南方根本不想提华莱士。”

从她用“我们”这词来判断，贝丝本人也听从这一决定了。

7 月 20 日星期四，会议大厅挤满了人，党代会成了老式政治竞技场，喧声如雷。阿尔本·巴克利在主席台聚光灯的照射下，他那宽脸庞上汗如雨注，

暂时他忘却了对罗斯福的怒气，发表了令人作呕的颂扬伟大领袖的讲话，引起场上持续 40 分钟的示威。华莱士附议提名时发表了他生平最强有力的讲话，富有激情、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自由派原则，引起场上广大听众一次又一次的起立欢呼。他说民主党的唯一机会就是坚持它的自由路线。

从政治、教育和经济意义上讲，必然没有劣等民族。必须废除人头税。必须提供教育机会。今后必须实行不分性别或种族……的同工同酬。

到了晚上总统即将发表讲话时，群众多得已大大超出场内容纳能力，也许足足挤满了 4 万人。据报道，在凯利市长的同意下又仿印了 1.5 万张入场券。凯利表面上是杜鲁门的狂热支持者，实际上内心希望杜鲁门和华莱士陷入僵局，这样他自己的候选人、伊利诺伊州的得宠者斯科特·卢卡斯参议员将坐收渔利。然而仿印入场券的办法却使华莱士又增加了数千名支持者。许多产联组织来的人挤满了廊台，并往大会代表席挤去，还有数千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华莱士的支持者们决心亲眼目睹在大厅内作出决定的、而不是由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的“头儿们”决定的提名。这种想法驱使人们向场内蜂拥。

副总统的提名计划第二天进行。但是随着夜晚的逐渐消逝，还有更多的人要发言大肆吹捧罗斯福，支持华莱士的高涨情绪继续升温。场内的热度几乎令人难以忍受。

在“黑石”饭店，汉尼根告诉杜鲁门他那天晚上可能被提名，这要看他们是否得到选票。他们必须做好快速行动的准备。杜鲁门本应由贝内特·克拉克提名，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克拉克的夫人一年前去世了，他比往常喝酒更多。杜鲁门去找他，汉尼根则前往会议大厅。

当发言和唱票结束时，总统很快获得重新提名。代表们静下来听他讲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成群的麦克风里轰轰传出，众人坐视着空无一人的主席台。昏暗的场内鸦雀无声，即使总统讲话停顿时也是静悄悄的。空空的主席台给人一种神秘恐怖的感觉。罗斯福在圣迭戈他的火车车厢里发表讲话。

“1944 年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什么？”幽灵般响亮的声音问道，“第一，争取战争的胜利——速胜，以优势取胜。第二，建立一些全球性的国际组织，筹备使用世界主权国家的武装力量，防止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

他的讲话刚一结束，爆发了支持华莱士的示威。场内各个角落传出了“我们要华莱士！”的呼声。风琴师受场上情绪的影响，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华莱士主题歌：“艾奥瓦，艾奥瓦，那是玉米生长的地方。”埃德·波利气得脸发青，威胁要割断麦克风的连线，除非改变曲调。

人们看到鲍勃·汉尼根匆匆与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凯利市长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俩人走上主席台，与杰克逊主席碰了头。在华莱士的几位议会党派头目看来，好像提名他们的人的时间突然就是在当天晚上，而且越快越好。

克劳德·佩珀作为佛罗里达州代表团团长坐在靠通道的座位上，他回忆说：“我坐在那儿观看着示威，人越来越多，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样可以看到全场。我（对自己）说：‘你知道，那是真正的示威……’因此当示威达到最高潮时，我说：‘如果能把提名换到现在进行，我们就可能提亨利·华莱士了。’”

现在在大厅后面，汉尼根已开始推开外面的门，让更多的人进入会场，

同时埃德·凯利不停地喊着防火规定。

佩珀在座位上跳上跳下，挥动着佛罗里达州的旗子，拼命想把主席的目光引向他，但是无济于事，他席位上的麦克风没有打开。

他跳下座位，走上通道，拼命从人群中挤过去。记者、数百名代表和观察员看到他马上明白他想干什么。如果他能挤上主席台，将会立即发表自己的提名讲话。

当我走到小门时（佩珀回忆道），即主席台的小围栏……好了，幸运的是把门的是一位铁路工人，我的一位朋友，他打开门让我进去……当我上到倒数第二个台阶时已很难再迈步了。我见主席往这儿看，他看见我从通道走过来。就在我眼看迈上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主席发话了：“有人提出动议休会。凡赞成者请说‘是，是’。”“就这样定了。”“大会休会。”此时我正要跨上最后一个台阶。他们开始大喊：“不，不，不。”

杰克逊后来告诉佩珀他并不愿意那么干，但是他已答应报纸和电台的人第二天待他们有更充分的准备时再决定副总统的提名。杰克逊承认他看见佩珀使劲吸引他的注意，当佩珀走向主席台时，他一直留意着他，而且完全清楚他过来的目的。他没有告诉佩珀的是，他和汉尼根早已商妥那晚在华莱士的人开始提名前就休会。公开的解释是，由于防火法，这一决定是必要的。

哈里·杜鲁门没有目睹到这一切。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找贝内特·克拉克，最后在谢尔曼饭店克拉克本不大可能在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他。他醉得只能说声“喂”，那时午夜已过。“所以我给鲍勃（汉尼根）打电话，”杜鲁门回忆道，“并说：‘我找到你的人了，他喝醉了。我不知道能否让他准备好，我想很难。’”

过去9年中熟悉关心杜鲁门在参议院的活动和成绩的所有密苏里人中，没有人像他母亲马莎·埃伦·杜鲁门那样，对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如此关注和称赞。她一直是《国会议事录》的仔细读者，坚定的民主党人，甚于杜鲁门认识的几乎所有的人。有一次，杜鲁门把她介绍给一位政界朋友，并告诉她，这位朋友在密西西比州长大，12岁以前没见过共和党人。她答道：“他没什么可惋惜的。”

近几天来，在格兰德维厄小小的起居室里，她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党代会的情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不希望她儿子成为副总统，并强调他应留在参议院。

“我也听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情况。他们一直预言罗斯福如果当选，将在任上过世。共和党人希望他如此。他们一直说我也要死了，我快92岁了。我希望罗斯福愚弄他们。”

7月21日星期五，最后一次会议在体育馆内进行了9个小时。这次会议被描述为在很长时间内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奇怪、最惨痛的结局。

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在喝了大量的黑咖啡、冲澡、吃了一些东西后，在汉尼根的帮助下，已控制住自己，完全可以上主席台了。但是他为杜鲁门作的提名讲话很短，没有显示出他往日的文采，根本没有打动听众（几周后，正如杜鲁门预见到的，克拉克在密苏里州民主党的初选中被击败，从而结束了他在参议院的生涯，包括杜鲁门在内的许多人曾认为参议院是通往白宫的地方）。

附议人的发言也强不了多少。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工人领袖说，他本人不认识参议员，但他认为杜鲁门会成为最强有力的竞选伙伴，理由是他是民主党人和美国人。

相比之下，一位名叫理查德·米歇尔的艾奥瓦州法官发表的赞成亨利·华莱士的讲话强劲有力，激起了又一次喧闹的示威。克劳德·佩珀终于得到上台的机会，他动情地恳请民主党不要拒绝接受一位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代表富兰克林·罗斯福民主的人。第一轮投票时华莱士的代表力量看起来好像在增强。

然而汉尼根、弗林、凯利和其他人通宵做工作，与代表们谈话，施加“大量压力”帮助他们认识选择哈里·杜鲁门的意义。谁也不知道达成了多少交易，许诺了多少委任大使或邮政局长的职位，但是据报道，一大清早，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尔克就给每一个代表团的主席通了电话。

杜鲁门力量的战略是组织提名尽可能多的得宠者，从而阻止华莱士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结果一共提出 16 名副总统候选人。发言整整持续了一下午，人们看到代表们三三两两地进出于隐蔽的 H 号空调房间，它位于台下狭窄昏暗的大厅的尽头，参议员杜鲁门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里与人握手。只是后来他才出现在主席台后面的包厢里，与贝丝和玛格丽特坐在一起。亨利·华莱士按惯例在饭店房间里等候会议的结束，而杜鲁门则坐在代表完全可以看得见的地方，用力嚼着热狗，高兴地观看着会场。

提名会吸引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来访者，他们包括电影明星格罗丽亚·斯旺森，他占了一个附近的包厢；斯潘塞·特雷西，他被要求签名留念的人团团围住。代表中有杜鲁门的民主党参议员同事 17 名。人们看到埃德·弗林和弗兰克·黑格正在台上商量事情，这一戏剧性场面使一些报界老观察员回忆起早些时候“大人物们”对他们的默许是更慎重的。廊台上的群众不像前一晚那么多了。凯利市长的警察一直在检票，这样数千名华莱士的支持者就被挡在了会场外。

第一轮投票下午 4 点半开始，华莱士一路领先，直到 429 票对杜鲁门的 319 票，其余选票分属阿尔本·巴克利和得宠者们。到计票快要正式公布时，已过 6 点。大会一直进行了将近 7 小时，中间没有休息。人们希望在晚上会议之前先暂时休会吃饭。而此时主席杰克逊走到麦克风前宣布马上进行第二轮投票。当时大会仍是下午的会议，这就意味着晚会入场券尚不能用，因此华莱士的人不能入场。这是汉尼根的一个大胆之举。

第二轮投票时，几乎一开始就出现了令人激动的情形，正如所预测的那样，华莱士先是领先，后来弗林突然把纽约州代表团的 74 票给了杜鲁门，场上出现第一次平局，现在杜鲁门开始领先。

俩人得票数一会儿又接近了，华莱士与杜鲁门相差 5 票，然后拉开了距离。亚拉巴马州的得宠参议员约翰·班克黑德退出，该州的 22 张票投给了杜鲁门，使杜鲁门得票近 500 张。代表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南卡罗来纳州把原投给班克黑德的 18 张选票转给了杜鲁门，这种突然一边倒的现象继续着。印第安纳州、怀俄明州和缅因州倒向杜鲁门，廊台上则不断传出“我们要华莱士！”的高声呼喊。摄影师簇拥在杜鲁门包厢周围，参议员咧着嘴笑。甚至在第一轮投票时自始至终看上去都在不时抱怨、怀疑的贝丝，现在也面带微笑，并根据要求转过身来，和她丈夫一起摆出照像的姿势。玛格丽特犹如在大学橄榄球赛场上，不停地跳跃欢呼。远在伊利诺伊州代表团那边的凯利市

长对着卢卡斯参议员喊道：“全能的上帝，让我们做成这件事吧。”全场人群都站起来了。

杜鲁门仅需要一个大州的赞同了。俄亥俄州宣布支持杜鲁门，票数本该够了，但是有一位代表对计票提出异议，俄亥俄州放弃了。接着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戴维·I·沃尔什宣布该州投杜鲁门的票改为34票，而这就够了。密苏里州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非正式地、但确定无疑地”成了民主党的副总统提名人。

过了一会儿，伊利诺伊州又给杜鲁门加了55票，更多的州跟随其后。贝内特·克拉克开始领着杜鲁门一队人马从通道走过来，一批警察护送着提名人走向讲台。正式计票结果出来得很晚，但是到8点14分，主席杰克逊正式宣布杜鲁门获胜。最后结果是：杜鲁门获1031票，华莱士105票，道格拉斯4票。

接受提名的讲话是美国政治史上最简短的一次，不足一分钟。杜鲁门说，荣获提名是密苏里州的光荣，他“极其谦卑地”接受这一荣誉。他走到麦克风旁的样子比讲话时还难为情，几乎是一副窘态。许多人都记得他站在台上等候场上的人们平静下来时的样子。他面对嘈杂的大厅，镜片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稍微往后退了一下。

他说：“那么，请给我一个机会吧。”

他被称为“密苏里的妥协”和代表大会的“公分母”。在许多人看来这完全是个可悲的场面。哈罗德·伊克斯在给伯纳德·巴鲁克的信中写道：“我并非不赞成杜鲁门，但是我强烈反对他的提名方法和腐败的城市头目现在在民主党全国组织中好像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社论中都谈到参议员的彭德格斯特根基。《匹兹堡新闻邮报》称他是曾被提名的人中最弱的候选人之一。《时代》杂志在去年夏季刚刚对杜鲁门在他的委员会的工作大加称赞，现在又把他描述成没有生气的平庸之辈，“来自密苏里州的胆小矮人”。

“可怜的哈里·杜鲁门，可怜的美国人民。”理查德·斯特劳特在《新共和》周刊中写道：

因罗斯福和党魁们在代表大会上的交易而将遭受痛苦的是杜鲁门和人民。杜鲁门是个好人，诚实无畏，为人谦卑，是位称职的参议员。他会成为一位不错的副总统。但是像在目前这样的时期，杜鲁门作为美国总统能行吗？

然而，总的说来，反应是好的，即使不算热烈。堪萨斯城《明星报》称，鉴于哈里·杜鲁门的一直是核心人物的背景，他具有“非凡的开发能力”。《纽约时报》称赞他的品格，称他具备经历过政治磨难的有利条件。

他了解政治运动的混乱和激烈，学会了不要轻视探索那将吸引大多数选民的中间道路的艺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勇敢，表现突出；曾当过农民；了解小商人困难的第一手情况。总之，他所具有的经验，有可能使他对各类人的问题都给以切实的同情，而不是会成为空谈理论家或狂热分子。

令人吃惊的是，《圣路易斯邮报》称他为极佳人选。甚至理查德·斯特劳特在他发表在《新共和》周刊上的在其他方面调子低沉的文章中，也由于

杜鲁门虽然并不才华横溢但有性格这一看法而振作起来。

记者艾伦·德鲁里私下在日记中写下了他本人对提名的考虑：

优点方面，参议员杜鲁门是个能干的人：如果有人不得不干他在白宫的工作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另一方面，彭德格斯特背景使他完全处于极易受共和党人攻击的地位，凡熟悉他的人不愿看到他遭受那种诽谤……我想参议员杜鲁门是我所认识的最能干的人之一。

就像在杜鲁门整个生涯中如此一贯的那样，在芝加哥再次由党派关系和党魁制度决定了杜鲁门的命运。没有民众为他当副总统疾呼，也没有个人野心的考虑。如同理查德·罗维尔所写的，没人比哈里·杜鲁门在芝加哥对自己的提升更身不由己了。时间会告诉人们，从全面考虑，政治制度、党魁们和所有的一切最终产生了一个极佳人选。

几天后在独立城，3000人川流不息地从北特拉华219号的后草坪走过，与参议员一一握手。杜鲁门身穿白色薄绉条文西服，与妻子和女儿一起站在一个玫瑰盛开的棚架下。贝丝顺理成章地成为公众角色，尽管她很不高兴如此。在芝加哥提名后，当他们在警察连推带拉的帮助下好容易穿过人群，走到等候他们的轿车旁时，她转身瞪着丈夫说：“我们今后的生活就不得不是这样吗？”乘车回家途中，车外是伊利诺伊州南部7月令人窒息的热浪，而车内的气氛，如玛格丽特回忆的那样，“接近于北极”。“父亲想同时显得高兴而又自若，母亲默不作声。”

他们刚抵达独立城，玛格丽特的舅母、弗兰克舅父的妻子纳塔利·华莱士就亲自毅然将外祖父华莱士开枪自尽的事告诉了玛格丽特。她说此事玛格丽特应该知道，因为早晚会传出去的。玛格丽特精神崩溃了，对此难以相信，她冲到厨房去问维塔·加尔这是否是真的。维塔点点头。玛格丽特不能面对她母亲，一直到晚上才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第一次也是在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她大发雷霆。

“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那一定是他学到的在农场场院里抓小牛和猪时所使的劲。”玛格丽特回忆道。“你曾向你母亲提过此事了吗？”他说。而后杜鲁门“飞快地”冲出房门去找纳塔利舅母。

我希望能告诉你，几年后我问母亲，她对她父亲去世的忧虑是否是她反对父亲提名的内在原因（玛格丽特几年后写道）。但是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我也不敢随便违反1944年那个夏夜父亲对此事下的绝对禁令。

不在城里的记者们第一次察看了这座灰色的维多利亚老式房子，都认为它需要粉刷了。被击败的亨利·华莱士立即宣布全力支持那候选人名单，看不出他有丝毫痛苦的表情。他的勇气和直率反倒受到称赞。同预测的情况相反，华莱士毕竟拥有真正的代表实力，几乎在代表大会上取胜，尽管所有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对付他。假如罗斯福决定要使他获得提名的话，罗斯福是不会有不管什么样的麻烦的。但另一方面代表大会以后似乎没有人比在大会以前更接近于理解罗斯福了。埃莉诺·罗斯福同情地给华莱士写信称：“我希望你会奇迹般地获胜，但是在我看来，好像党的头头们相当顺利地发挥了作用。我被告之参议员杜鲁门是个好人，看在国家的份上我希望如此。”由于

人们对在芝加哥（以及代表大会以前在华盛顿）的幕后情况了解得很少）他们尚未看出埃德·弗林发挥的关键作用——事实是，弗林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使罗斯福确信华莱士是个不利人选，力劝罗斯福把杜鲁门作为最保险的替换人选；弗林在抵达芝加哥的当天，和凯利、汉尼根一样，拒绝把吉米·贝尔纳斯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弗林在第二轮投票中准确地把握时机，把纽约州的重要一票投给了杜鲁门。很清楚，南方人反对华莱士是由于他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的观点，正如北方自由派人士拒绝接受南方人贝尔纳斯是由于他在同一问题上所持的相反观点。还不那么清楚的是弗林对纽约州黑人选票担心的程度，这一点他在春季白宫秘密会议上强调过。关键是杜鲁门与贝尔纳斯一样，没有受到工会的反对。重要的是党内保守派——南方人方面——把杜鲁门视为可以共事的政客，用过去的话说可以“同处”，而华莱士却从来不能这样。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杜鲁门没有敌人，几乎谁都喜欢他，特别是在参议院，战争结束后有许多工作要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参议院将再次参与和平的建立。但是即使弗林关心黑人选票，毕竟还是杜鲁门在民权问题上的记录——他在参议院反对人头税的立场、1940年在锡代利亚的讲话以及1940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与黑人代表的谈话，使他成为合适的人选，对于这个具有顽固守旧的密苏里血统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多少带有讽刺意味的转折，不久他被指控曾是三K党成员。

罗斯福宣称他本人对投票结果非常高兴，并给杜鲁门发去了贺电。哈里·霍普金斯后来说，总统一直注意着杜鲁门，此话与他对吉米·贝尔纳斯所说的有些矛盾。他说：“人们似乎认为杜鲁门是突然从戏法中变出来的一——而那不是事实。”伯纳德·巴鲁克说，每个人都声言愿意按头头（罗斯福）的旨意行事，而头头却按埃德·弗林的意愿行事。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提名期间在圣迭戈与父亲在一起。他后来写道，父亲对“芝加哥发生的情况感到恼火”，他对“代表大会选谁”作为竞选伙伴“明显不关心”。“尽管父亲本人没有承诺，我离开时给我的明显印象是他确实希望首席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作为副总统提名人。但是他明白地表示，对代表们无论选出道格拉斯、吉米·贝尔纳斯还是哈里·杜鲁门，他都‘一点儿也不在乎’。”

就在芝加哥罗斯福重新获得提名的那天，他旧病发作了，此事只有他儿子吉米知道。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死一般苍白，面部表情极为痛苦。“吉米，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挺得过去——疼得厉害。”罗斯福吃力地吐字说。吉米帮父亲平躺在火车车厢的地板上，他吓坏了，大约观察了10分钟后，父亲才叫他帮着扶他站起来。过后不久，总司令驱车上了太平洋岸边的小山顶，他精神振作，面带微笑，专心地观看了一万名海军陆战队员从希金斯舰队强击登岸的水陆两栖登陆演习。

4

1944年8月18日星期二，在白宫南草坪安德鲁·杰克逊栽种的木兰树下，罗斯福和杜鲁门共进午餐。由于天气酷热，罗斯福建议脱掉外衣。他们两人第一次身穿衬衫，坐在小圆桌旁，上面摆着柯立芝时代的水晶和银餐具，摆好姿势，请摄影师拍照。

他们两人从家庭出身、兴趣爱好、个人性格，从说话的声音、喜欢交往

的人到人生阅历等各个方面几乎全都截然不同。罗斯福任职至今已是的第 12 个年头了。他当总统的时间那么长，经历了如此难以对付、轰轰烈烈的时代，使得包括这位密苏里州资历较浅的参议员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看来，似乎总统职位非他莫属。他的财富、所受的教育、从小就知道的社会地位，哪一样都是哈里·杜鲁门所没有的。坐落于哈得孙河上游的罗斯福家族庄园的生活和习惯与密苏里州杰克逊县相距甚远，对后者来说那儿简直就是外国。罗斯福自以为是个农民。在杜鲁门看来，他是那种从未拔过草、从不知道背债或粮食欠收，或从未尝过在严寒的早上 5 点半被父亲从床上叫起来的滋味的农民。

从杜鲁门在星期一晚上打牌、戴共济会戒指和时髦的蝴蝶结领结、在梅恩街结交的朋友们、讲话带有干涩的密苏里口音看，完全可以断定他是美国中部人。他只要一开口即可知道他是哪里人。这并不仅是他来自美国地理上的某一地区，而是来自美国人经历中的一个特定的地方，一种真正拓荒者的背景，美国人想象事物中的一个特定的地方。杜鲁门喜欢强调他的密苏里是马克·吐温和杰西·詹姆斯的故乡。他的举止与外表可能酷似辛克莱·刘易斯小说中的人物，据悉这位作者的著作杜鲁门没看过。从表面看，有人可能以为是乔治·F·巴比特正在杰克逊栽种的木兰树下与总统共进午餐。

另一方面，罗斯福则是来自伊迪丝·沃顿小说和查尔斯·达纳·吉卜森图画中的人物。他是真正的美国执政的权贵，不管他是喜欢政治，还是喜欢像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一样与“男友们”打一晚上的牌，或者他也是共济会会员，在多数早上选戴一种蝴蝶结领结，包括这一种在内，这些都无关紧要。罗斯福一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人给予的——房子、家具、仆人、国外旅行。而杜鲁门几乎恰恰相反。他从没有过可称为属于自己的房子。从小的教育和坎坷的经历使他懂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罗斯福总是知道他可能得到什么——的确，人们对他寄予多大的希望啊，因为知道他是谁。

他们都是特别坚决的人，极具个人魄力和魅力。在喜欢与人交往上也很像（杜鲁门曾经告诉一位记者，人类是“最优秀的群体”）。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灵敏的幽默感，并对没有幽默感的人往往半信半疑。但是爱听故事的罗斯福也爱笑自己的故事，杜鲁门倒更多的是个听众，当有人讲“精彩故事”时，他笑得最开心。罗斯福喜欢奉承，杜鲁门对奉承感到不安。罗斯福喜欢微妙的人际关系，善于迂回解决问题，对困难的问题如能得到含糊的回答感到高兴。他对细微的差异很敏感，在这方面杜鲁门现在和今后都不会如此。由于生长在密苏里农村和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教育的局限，他往往以非常简单的话来表述对问题的看法，如对或错，聪明或愚蠢。他很少用抽象的词语来处理问题，他对问题、甚至复杂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直截了当和自信的，讲得很清楚，最后总是说“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回答”，一种老密苏里人的表达方式，而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很多要说的。

他俩每人都经受过自己痛苦斗争的考验，罗斯福与致残的小儿麻痹症，杜鲁门与债务、失败、无名和彭德格斯特的巨大耻辱。罗斯福喜欢引用格罗顿学院的老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博士的忠告：“生命的旅程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我们处于巅峰——而后又似乎一切发生逆转，开始下滑。要记住的伟大事实是，文明的潮流永远向上……”杜鲁门肯定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两人在内心里是乐观主义者，以各自的方式信守人类进步的老信条。但是

在罗斯福的经历中没有过像年轻的哈里那样，在夜里为母亲动手术提灯照明，也没有经历过像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阿尔贡地区那样的激战场面，或像杜鲁门 1940 年那样为政治生存拼命奋争。

有人称罗斯福是一种魔术大师，想象力丰富，会演戏。他的堂（表）兄弟（姐妹）们认为，如果哈里·杜鲁门是霍雷肖的话，那么罗斯福就是普罗斯佩罗。

杜鲁门往往被称为是个率直的人，其实他不是。他曾向贝丝吐露过：“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生来就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情呢？”一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回忆时感到，他把自己隐瞒得太多，不让公众看到，这是他最大的局限性之一。但是与罗斯福相比——而且杜鲁门今后的命运永远与罗斯福的形成对照，他的确是个不复杂、开放、真诚的人。杜鲁门在他的数百封信和个人笔记中把真实想法暴露无遗，甚至在他将成为历史上的人物明朗后也是如此，而罗斯福则不像杜鲁门，从不抛开假面具，从不把自己内心所有的想法在纸上倾诉出来。

许多美国人一直把杜鲁门看作是“来自密苏里的矮人”。罗斯福即使坐轮椅也比他本人显高大。他具有杜鲁门为之如此崇拜的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届总统所难以比拟的。杜鲁门对这一点也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缺乏比如说像亨利·华莱士那样的超群才智。“我和你不一样，我不是深刻的思想家。”这是他前一天请华莱士在今后的竞选中提供帮助时才对华莱士说的。然而正如共和党众议员乔·马丁所写，杜鲁门远比“多数人认为的精明”。

杜鲁门感到如果是早先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请他共进午餐，他们在一些方面就会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不那么拘束。他们的性格非常相似，在一起可以谈论书籍、军队生活或者男孩们的缺陷，即必须戴着深度眼镜来接触世界。或者可能谈论过去害怕被人当作怯懦的人。杜鲁门像西奥多·罗斯福，而不像富兰克林，他从不知道什么是富有魅力。

总统和他新的竞选伙伴在外表上反差很大。杜鲁门看上去精力旺盛，显得比他的年龄要年轻。总统尽管仅年长 2 岁，就像一位憔悴的老人。他在结束了去太平洋的一次长时间的使命后，前一天才回来，从他肩膀松垂，下眼睑灰白看，显然此行差点要了他的命。杜鲁门已有一年多没见总统了，一下子被他的样子惊呆了。甚至他那出名的宏亮声音也变得有气无力了。

午餐是烤面包加沙丁鱼。两人主要谈了今后的竞选运动，由于总统的女儿安娜·罗斯福·伯蒂格和他们一起用餐，谈话很少涉及机密。杜鲁门后来仅重复了罗斯福的一句话，总统告诉他不要乘飞机外出，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人活着很重要。

使杜鲁门惊愕的是，他注意到总统的手颤抖得很厉害，以致他不能把奶油倒进他的咖啡里。

“总统看上去精神很好，吃得比我多。”其后杜鲁门告诉记者们，他已开始参加编造舵手健在的假话了。杜鲁门给仍在独立城的贝丝和玛格丽特描述了罗斯福如何给了他两朵玫瑰，要他给她们每人一朵。“你该看到你爸从康涅狄格大街走过来……帽子被风吹掉了（因此看上去像个满头灰白发的大学生），手里拿着两朵含苞欲放的玫瑰。”他写道，好像他在这世界上感到无忧无虑。但是他在回到参议院办公室时显得明显不安，告诉哈里·沃恩说他对总统的身体特别挂念，并描述了总统如何用颤抖的手往咖啡里倒奶油，

结果大部分撒在咖啡杯下面的托盘里。“他的手一直在抖，讲话相当困难……好像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而只是他的身体不行了。”

9月，杜鲁门带埃迪·麦金参加一次白宫招待会，会上麦金对总统的样子大为吃惊，心里嘀咕总统是否能活到就职的那一天，亨利·华莱士是否终究可以当上总统了。当他们从大门走出来的时候，麦金让杜鲁门回头向后看，因为那里是他不久将住的地方。杜鲁门说：“埃迪，恐怕你是对的，简直吓死我了。”

罗斯福后来对他的表妹劳拉·德拉诺说，他喜欢杜鲁门，“哈里不错，聪明能干，人品好。他不大熟悉外交事务，但是学得很快……”杜鲁门到底如何看待罗斯福呢，只要从他和朋友们的零星几次谈话或个人笔记和信件中就可以推想出来。显现的图画不是赞美的，尽管并不完全。他称罗斯福为圣诞老人、自负的人和骗子。杜鲁门在写关于他不喜欢的伯纳德·巴鲁克的情况时说：“没人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更自高自大了。”另一次他在给贝丝的信中谈到罗斯福：“他唯恐失去所有的权力和荣耀，因此在该要的时候也不让朋友帮助。”对杜鲁门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感觉，他与人从不疏远，几乎从不躲躲闪闪。他由直率的人带大，从小养成说话直截了当。罗斯福却不是这样。他曾告诉艾伦·德鲁里：“你知道当你见总统时是怎么个情况吗？全听他讲，他只谈他想谈的问题，从不谈你想讲的问题，因此没有多少你能做的事。”杜鲁门对共和党人欧文·布鲁斯特说，他只反对总统一点，即“他不讲实话”。

可是这种对他的总统、总司令、民主党领导人的感觉，参议员哈里·杜鲁门从未在公开场合表露过。那样做将是难以想象的不忠，更不用说是政治上的不明智和不在行了。有时杜鲁门也会站出来为总统辩护，其举止酷似他的父亲。那年秋天竞选中期，在波士顿里茨—卡尔顿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开会，乔·肯尼迪开始中伤罗斯福，说：“哈里，你凭什么为那个杀了我儿子乔的瘸腿的狗娘养的竞选？”他指的是他在战争中死去的大儿子，并继续说战争是罗斯福一手造成的。据杜鲁门后来讲，他尽其所能地顶住了，告诉肯尼迪不要再说了，否则要把他扔出窗外。鲍勃·汉尼根不得不上来劝解，把杜鲁门拉到一旁，提醒他肯尼迪的钱对民主党是如何的重要。

在一个潮湿的圆月的晚上，杜鲁门在拉马尔的老式红砖墙法院前，第一次正式发表了竞选演说，演讲的地方恰与他出生的那座房子同在一条街上。他讲了半个小时，一句也未提到他自己。国家在如此关键的时期需要的是经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国家所需要的人。“你们不能碰运气，应该支持经过磨练富有经验的领导人。”杜鲁门说，似乎他自己的相对经验不足与之毫不相干。

这是他乘火车到全国各地宣讲的主题。他乘坐的“亨利·斯坦利”号是老式的卧铺与餐车车厢连在一起的列车。休·富尔顿、马特·康奈利、埃迪·麦金和弗雷德·坎菲尔与他同行协助工作。

年轻英俊的康奈利，迄今为止仅在杜鲁门委员会里当一名调查员，他还记得参议员是如何把他当作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吸收进去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杜鲁门从芝加哥回来，他的办公室成了吵闹混乱的场所……有摄影师、记者，因此5点我锁门时说，“我想你今天够辛苦的了。”

他说：“是啊，这一天真够忙的，来，咱们到‘狗窝’去吧，我想和你谈谈。”

在那儿他说：“喝点什么吧？你喜欢那该死的苏格兰威士忌，不是吗？”

我说：“让我来调酒。”

他说：“不用了，有些事我能干，我来调吧。”这样他调制好酒后坐下。他说：

“你知道我要搞一次竞选旅行。”

我说：“我想你会的。”

他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

“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去！我懂什么政治啊？”

他说：“那没关系。你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竞选旅行路线是从新奥尔良经过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两州，然后沿太平洋海岸去波特兰和西雅图，再一直向东到波士顿，一路停十几站。杜鲁门从波士顿前往纽约，然后去华盛顿，最后再从华盛顿取道惠灵、匹兹堡和圣路易斯返回。

早晨，火车停在得克萨斯州的尤瓦尔迪，老约翰·南斯·加纳正在站台上等候，他身穿咔叽劳动布裤子，头戴一顶破旧的宽边高顶帽，双手因摘山核桃而被染上颜色。“很高兴见到你，哈里。祝福你，老家伙。”前副总统说，他和罗斯福闹翻后，在离开华盛顿时发誓，只要他活着，就决不过波托马克河，他一直信守着誓言。加纳估摸着怎么也该到12点了，是喝些什么的时候了。杜鲁门径直让他上了火车。

在西雅图，杜鲁门在1万人集会上讲了话。在爱达荷州埃弗里小镇，当火车停下时，仅有3名妇女和教师站在肖肖尼国家森林公园边上等候，而他照旧讲了15分钟的话。杜鲁门解释说，就他们这几个人在那里，这不是他们的错。“他就像我们大家一样。”蒙大拿州众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在比尤特的一次午宴上介绍杜鲁门时说。在驱车经过匹兹堡时，他受到26辆摩托车的护送，拥挤的人群绵延数英里夹道欢迎他。

他不是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家。竞选活动也不那么多姿多彩。他只是个劲儿反复强调，为了赢得战争和建立和平，需要罗斯福的领导。战争一旦结束，不可能再回到共和党人的孤立主义老路，也不存在由像奈和塔夫脱那样的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了。火车上的一位记者认为，这位候选人凭借的是“农民的友善”和“坦诚”而远不是他的言辞，这使他具有感染力，令人可信。

有一次在火车上，杜鲁门受到一场逼真的噩梦的折磨。他梦见罗斯福去世了，他，哈里·杜鲁门当了总统。

共和党人拼命在他身上做文章。“征得西德尼的同意。”成了共和党的竞选口号。但是共和党人和记者们挖空心思翻他在彭德格斯特年代的陈年老账，想把他搞臭，却一无所获。

正如杜鲁门所担心的那样，贝丝的参议院薪水问题被报道出来，受到指责。杜鲁门再三被描写成思想停滞的无名之辈、失败的男子服饰用品商（“他甚至做不出畅销的衬衣”）。和往日一样，再次有人散布谣言称，他有犹太人血统，其根据是他祖父名叫所罗门。杜鲁门反驳道，他不是犹太人，即使是，他也不会为此感到羞耻。

他断然否认的他曾是三K党成员的指控最早出现在赫斯特报系上。此事在他即将抵达波士顿时传开了，而那里由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选票正处于危急中，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对杜鲁门和他的一行人来说，此事无疑

是有意栽赃，以便在杜鲁门一抵达时就在波士顿引起轰动，那天幸好得救于著名的前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当时他是国会议员，与杜鲁门站在同一立场上讲话。

“柯利站起来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马特·康奈利回忆说，对他来说，那是竞选中值得纪念的时刻之一，“（他）说：‘我们有一位很不寻常的副总统候选人，他前往加利福尼亚时，我们听说他是犹太人；他抵达中西部时，我们听说他是三K党成员。’他转过身来说：‘副总统先生，我邀请您参加我的古老的爱尔兰教会，我们很高兴您成为我们的一名成员，我向您保证，我们会抛出选票。’”

“我对杜鲁门先生说：‘那会清除掉三K党问题的。’”

然而最使他难以摆脱的是彭德格斯特的老问题，特别是当它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连在一起的时候。《芝加哥论坛报》是所有报纸中攻击得最尖锐的：

如果他们承认今后4年中罗斯福先生去世或失去工作能力的可能性极小，他们面对的是集无力偿还债务者、彭德格斯特老板掠夺堪萨斯城县政府的顺从工具、参议院内政治匪帮的应声虫和辩护士于一身的杜鲁门的那具龇牙咧嘴的骷髅。

令杜鲁门家人倍感宽慰的是未提贝丝父亲的死，杜鲁门仅对出版商亨利·卢斯迷人的夫人、共和党女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的讲话发了火。卢斯夫人嘲弄贝丝参加他的参议院工作人员的工作这一想法，开始称她为“工资单上的贝丝”。卢斯夫人还宣称，如果像杜鲁门所说，他母亲没有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政治家的话，那么她是不会感到沮丧的。

在通常言语粗野和混乱的竞选中，杜鲁门几乎可以容忍人们所讲的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但是只要提到他的家人，甚至稍有暗指，他的火气就“比兵站的火炉还冲”。从那以后他对克莱尔·布思·卢斯惟有鄙视，私下里说，她的名字应拼写成“Loose”（与她的姓Luse发音相同，意为放荡——译者注）。

杜鲁门与白宫之间很少或没有来往。真正的较量毕竟是罗斯福针对杜威的较量。令接近总统的人高兴的是，这次较量使罗斯福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尽管他很少公开露面，那次在华盛顿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他整个生涯中的最佳竞选演说。他似乎恢复了过去的自我，发表演说时装得十分庄重，时常脱离稿子即兴发挥，使得人们能够欣赏到只有老练的演员才能做到的那一时刻：

这些共和党领导人不满足于对我、或我的妻子或者对我的儿子们的攻击。不，他们觉得那不够劲，现在把我的小狗法拉也作为攻击的对象了。当然，我和我的家人对这些攻击不怨恨，但是（停顿）法拉确实恨他们……

罗斯福的讲稿起草人罗伯特·舍伍德后来说，法拉的故事给竞选增添了必要的兴奋剂。“斗士”回来了。埃德·弗林在挑选副总统问题上经过极度的痛苦和努力后，后来对朋友说，罗斯福在竞选中状态这么好，如果他把法拉放进候选人名单，他也能获胜。

总统在芝加哥发表讲话的那天晚上，10多万人挤满了军人操场。舍伍德回忆说，他“的体力和恢复力明显改善”。在纽约，总统没戴帽子坐在敞篷车里，迎着冰冷的瓢泼大雨行驶数小时，这样可以数让数百万人亲眼看到他身

体不错。这是一次连年轻的壮小伙子都可能被送进医院的严峻考验，而罗斯福最后却好像很兴奋，对有机会显示他的承受能力感到高兴。

杜威提出了共产主义幽灵渗入华盛顿的问题。“现在……在西德尼·希尔曼的帮助下……共产党人正攫取对新政的控制……进而控制美国政府。”杜威告诫说。由于罗斯福从未有过政治对手，他渐渐对杜威产生了厌恶感，就像那场瓢泼大雨一样，这也似乎使他振作起精神来了。

杜鲁门夫妇在堪萨斯城米尔巴赫饭店的一个套间里一直等到选举结果报告出来，有一群政界的和炮兵部队的老朋友来帮助庆祝，长夜尚未过去许多人已喝得酩酊大醉。“这令我吃惊。”玛格丽特回忆道。

哈里·伊斯利，一位来自密苏里州西南部的政界老朋友，在所有的人离去后与杜鲁门一起留下。杜鲁门直身躺在床上，谈到在竞选中自始至终他感到多么孤独和看到罗斯福脸上的死相。伊斯利回忆说：“他知道……在任期届满前他将作为总统。”“他说今后必须依靠他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他说……他知道他将作为美国总统，我想恰恰是这一点把他吓坏了……甚至一想到它就害怕。”

将近凌晨4点钟杜威才在选举中失利，这是自1916年以来总统选举结果最为接近的一次，险胜对方。罗斯福—杜鲁门以超出300万张选票在48个州中的36个州得胜。而就在这些州中只要有30万张票的转移就可以使杜威—布里克当选。杜威请全体美国人和他一起希望“在今后困难的岁月里，神圣的上帝将指引和保护美国总统”。

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寓所就寝前说：“我仍认为他是个狗娘养的。”

为了服从于可悲的战争和总统有限的体力，1945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很阴郁，持续了不到15分钟，这是自林肯以来的第一次战时就职典礼，也是第一次在白宫举行的。典礼在南柱廊举行，廊前站满了人，其中许多是残废军人。草坪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天气寒冷刺骨，没有游行。海军陆战队军乐队的红色上装是整个寒冷、沉默的场景中唯一令人振奋的色彩。

杜鲁门身穿深蓝色的厚大衣，像立正一样平端着肩膀，表情严肃地宣誓就职，接替了亨利·华莱士。然后总统在他陆战队的儿子和一名特工人员的帮助下站起来。罗斯福仅穿了一套夏季薄西装，拄着支架拖着僵硬的腿缓慢挪步，直到他能伸手抓住讲台边缘为止。站在近旁的伍德罗·威尔逊夫人突然想起了她丈夫生命垂危时的样子。

杜鲁门担任副总统82天了，他像往常一样忙于副总统的例行公务，主持参议院会议，出席各种宴会和招待会，与人无数次地握手。罗斯福一直在国外，直到2月底才回来。就职典礼2天后，他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悄然离开华盛顿，乘火车去诺福克，从那儿登上“昆西”号巡洋舰，去地中海的马耳他岛。从马耳他转乘飞机飞往雅尔塔古老的黑海疗养胜地，出席第二次他和丘吉尔、斯大林的三巨头会议。随行前往的有特别顾问吉米·贝尔纳斯，还有一种作为行政当局承认的偷乘者的埃德·弗林。杜鲁门副总统仅被告之，如果有“绝对紧急情况”，可通过白宫与总统联系。杜鲁门自就职以后，一点也见不到罗斯福，也根本听不到有关会议的情况。他甚至尚未与新任国务

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见过面。

可是令他本人感到惊奇的是，他过得很快活。对于轮番的社交活动他不仅不觉厌烦，反倒乐此不疲。据《时代》周刊报道：“这位和蔼可亲、谈吐举止带有乡土气息的密苏里人对于给他安排的日程应付自如，可累苦了杜鲁门夫人和国会大厦社交界的记者们。”

珀尔·梅斯塔为了向副总统表示敬意举行了一次宴会，被称为“华盛顿漫长的盛宴史上最气派的宴会之一”。梅斯塔夫人继承了俄克拉何马石油公司的资产，是匹兹堡已故工具制造富商的遗孀。她最早来华盛顿时是一名共和党人，但是仅在前一年夏季才“跳槽”成为民主党人，因为共和党人拒绝重新提名温德尔·威尔基。现在她已“注意到了”哈里·杜鲁门。

（宴会）有英格兰宫廷茶会的韵味，维也纳舞会的闪烁灯光和好莱坞首映式的狂饮。政府和社会名流出席了宴会。人们衬衫前襟上的星状红宝石扣在灯光下闪光，晚礼服上镶缀着美丽的钻石和珍珠。20美元一瓶的香槟像个瀑布一样流淌。……

“他尽可能非常轻松愉快地与人周旋，毫无矫揉造作之举。”作家约翰·冈瑟在《华盛顿邮报》外事编辑举行的晚宴上见到杜鲁门后写道。冈瑟注意到杜鲁门是最早到场的。

他很活跃，充满生气……是客人中的上宾。

我对他的印象可被人称为明快的灰色。灰色的服装和头发部干净整齐，灰边眼镜使他的灰褐色眼睛变大了，而他的头脑并不灰。谈话时机敏自信，说话快而简明，你必须仔细地听才能全部明白。

后来冈瑟在国会山的一次采访中问他最喜欢什么？杜鲁门回答说：“人。”

国会山的老朋友们发现他完全没有受新角色的影响，“还像从前那样朴实”。他继续在参议院办公楼240号房间办公，把国会大厦中副总统的办公室主要当作会客室，在7层水晶吊灯耀眼的灯光下接待来访者。

查利·罗斯写道，对于两党的参议员来说，到杜鲁门那儿坐坐、聊聊天或许喝点烈性威士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在这些时刻许多参议员发觉到，当亨利·华莱士当副总统时，他们从未到他办公室去过。在他们看来华莱士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与他们话不投机，而杜鲁门则不然。”

杜鲁门、贝丝和玛格丽特现在仍住在康涅狄格大街4701号5室一套的同一个公寓里，每月房租还是120美元。所不同的是杜鲁门的岳母华莱士夫人也已搬来与他们同住。

“哈里看上去总是那么好——体重确有增加。”贝丝给埃塞尔·诺兰写信说，“玛格去看画展，哈里去打牌。”她在给埃塞尔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母亲坐在椅子上实际睡着了——所以非常宁静。”

为工作方便起见，给杜鲁门新配备了一辆公车，黑色墨丘利牌高级轿车和一名司机，司机名叫汤姆·哈蒂，他每天早晨来接副总统，一天工作结束后再把他送回家。在去国会大厦的路上，他们把玛格丽特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下车，她在该校读三年级。前排座位上还有一位年轻人，杜鲁门原以为是哈蒂顺路搭车的朋友，他叫乔治·德雷施，是为副总统配备的第一名特工人员。给副总统配备特工人员的主意是哈里·沃恩提出的，他从现役空军部

队退出后成为杜鲁门的军事助手，这对于副总统来说也是第一次。当沃恩吃惊地发现对杜鲁门没有任何保安措施时，他找到财政部长摩根索说，守卫总统的有 70 或 100 人，而副总统却一个人也没有，这似乎不大合适。

“我通常在 7 点钟去上班。”杜鲁门在办公室给母亲和妹妹写信。

但是现在每天早晨我得把玛格丽特送到学校去，因此 8 点半才到办公室。里塞尔·奥德姆（她替换了米尔德里德·德赖登当他的速记员）那时总是已经在办公室了，我们费劲地处理完一英尺高的大堆邮件。到那时我就得去会见人了——每次见一个人，让他们尽快从办公室通过，并使人感觉不到似乎有人在赶他们。然后我去国会大厦镀金的办公室接见参议员和猎奇者一小时，其后参议院开会，我的工作是为他们祈祷——天晓得他们是否需要，然后在椅子上坐上一小时主持会议。会议结束后，再去接见更多的参议员和猎奇者，他们想看一看这位要人长什么样，他是否会走路、说话，是否有牙。

杜鲁门内心对总统的健康仍感到有什么担心或关注，他似乎一直没有向外人表露。他看起来好像自己也没有为总统的去世做任何准备。仿佛前一年夏季的可怕猜测、竞选时他在火车上做的噩梦都早已忘却、束之高阁了，因为这难以想象的事情更加接近，眼看就要发生了。杜鲁门最接近于公开谈论对今后以及今后问题的看法是与《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麦克诺顿的一次不作记录的谈话。麦克诺顿后来给他在纽约的编辑这样写道：

杜鲁门只是说，他希望通过他在参议院的各种联系对政府具有价值，他以为副总统的工作是一种联络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工作。杜鲁门称他热切希望能把此项工作完全做好。

“每次战争之后都有一段困难的局面，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产生不同意见和误解。”身为历史专家的杜鲁门说，“麦迪逊碰到了，安德鲁·杰克逊经历过，程度更加重了，伍德罗·威尔逊则不得不与之斗争。在每次这样的紧急情况之后，总会有极大的反应。在这点上，我认为人类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我希望这将成为历史上全体人民在严重的时刻随机应变，并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通力合作的时期。”

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杜鲁门，但是他极为担心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以及同盟国之间的战后斗争，这种斗争将彻底破坏和平。他认为要以最大的睿智和外交手段防止战后国内和国际上争夺权力与声望的斗争，他料想今后他的工作将是竭尽全力来实现参议院和总统之间的顺利合作与联络。

杜鲁门眼下的任务是帮助亨利·华莱士获得参议院批准的商务部长的新任命。然而他在总统不在时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最大关注。1 月 26 日就职典礼后不到一星期，汤姆·彭德格斯特在堪萨斯城去世，享年 72 岁。彭德格斯特近 5 年前从监狱放出后一直住在沃德大道的大房子里，他夫人把他限制在佣人住的地方，拒不与他讲话。他几乎破了产，法院的裁决也限制他永远不再踏进梅因街 1908 号。几乎没人去看他，全家中惟有他的儿子还一直孝顺他。人们不知道杜鲁门是否曾经在彭德格斯特从监狱出来后去看过他，而那时要这样做一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当杜鲁门获悉彭德格斯特去世的消息时，立即决定参加他的葬礼。他乘坐军用轰炸机前往堪萨斯城，在圣母访问节天主教堂与数千名追悼者一起站成单行向死者告别。他来回走动问候死者家属的情景被拍摄下来，所有这一切使各地许多人

觉得副总统的行为是无耻的——人们看到的是副总统在怀念一位被判有罪的犯人。然而许多人（可能为数更多）在一位身居如此高位的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值得钦佩和无畏的东西，他仍知道自己是谁，不忘朋友。

两星期后，杜鲁门又成了新闻人物，被登出更多的照片，再次成为一些人的笑柄。他同意参加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餐厅为现役军人举行的舞台表演，为大约 800 名身穿军装的观众演奏竖式钢琴，女演员劳伦·巴考尔也作为节目的一部分，被推上钢琴的顶盖，在观众兴高采烈的喝彩声和闪光灯的劈啪声中来了个大腿亮相。巴考尔回忆说：“我当时只是个孩子，我的新闻代理人安排我做这个动作的。”当时报上引用了一位战士的话：“在这个国家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副总统对着迷人的好莱坞影星唱小夜曲的照片一登出立即引起轰动。令许多人不安的是，杜鲁门看上去好像很开心，实际上他也确是如此。贝丝恼火了，她告诉杜鲁门以后不许再在公开场合弹琴了。

3 月 1 日，在众议院会议厅庄重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坐在副总统杜鲁门旁边，杜鲁门则坐在总统后面的台上，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缓慢而往往漫谈的方式报告了雅尔塔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坐着念稿，并解释说坐着轻松些，不用承受腿上 10 英磅重的钢支架，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到他的身体残疾。

他看起来面部好像比以前更加苍白扭歪。左手翻页时颤抖明显。“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我希望你们也同意说到目前为止此行是富有成果的。”有时他找不到念到什么地方了，就即兴发挥几句：“当然有些其他细节，我在此就不讲了。”有时他失音了，伸手去拿水杯，手又发抖了。“25 年前，美国的战斗人员指望世界上的政治家们去完成他们为之战斗和遭受痛苦的和平工作。我们没有完成——那时我们辜负了他们。我们不能再辜负他们了，希望世界再次幸免于难。”

坐在厅内各处位子上听总统讲话的，不只少数几个人非常了解情况，完全可以领会最后这几个字的含意——约翰·麦考马克、少数党领袖马丁·史汀生部长、马歇尔将军、亨利·华莱士、吉米·贝尔纳斯、萨姆·罗森曼（讲话稿的大部分内容是由他起草的）、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坐在廊台上的埃莉诺·罗斯福，也许一共有 12 个人知道那未向副总统透露的核心机密。

“总统讲话结束后我立即见了她，”杜鲁门写道，“显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罗斯福告诉杜鲁门，他将尽快去佐治亚州的温泉休息。

4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在杜鲁门桌上一堆等待回复的函件中有一封吉米·彭德格斯特的来信，他需要老朋友哈里的帮助。吉米写道：“大约一年来，彭德格斯特酒业批发公司一直设法在搞酒瓶和纸板盒，以维持营业。他们提出三次申请，全都得到地方战时生产局的批准，而上送华盛顿时却均遭拒绝。”吉米解释说，公司在肯塔基储藏了 1.1 万多桶纯烈性威士忌酒，但是没有酒瓶或纸板盒，形势严峻。

“我们要看看马上能做些什么。”杜鲁门指示奥德姆小姐说。

这天杜鲁门与往常一样着装讲究，外穿双排扣灰色西装，上兜插一块折叠整齐的白手帕，三个角露在外面。内穿白衬衫，打一条深蓝色圆点花样的蝴蝶结领结，梳理干净整齐，一副健康、沉着冷静的样子。那天晚些时候，参议院会议厅新闻记者席上的记者对于杜鲁门来往于席间各派参议员之间发表评论说，他明显喜欢与人交往。仅在头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就曾说过：

“这个参议院真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有一批在任何地方都难以寻觅的精英。”

由于处理其余的信件比往常多耽搁了一些时间，杜鲁门搞完后去到参议院会议厅时晚了一些，当天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阿尔本·巴克利替他坐在台上。杜鲁门大约在上午 11 点半才到会。

此时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威利斯刚刚发完言。杜鲁门与巴克利握过手后坐到他的位子上，把几份公函交给读议案的工作人员向参议院宣读。一份关于宾夕法尼亚州巴顿镇为欢迎乔治·S·巴顿将军返回故里制定的庆祝活动计划，另一份关于阿拉斯加立法机构要求增加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的驯鹿群，办法是宣布对狼和幼狼的狩猎开放期。

会议厅内许多参议员是杜鲁门 10 年前刚到参议院工作时结识的。虽然世界变了，到处是战争的喧嚣与灾难，但是这个老房间看起来依然如故，除了顶部许多难看的钢梁是 1940 年安装上去的，用以支撑眼看要坍塌的旧顶篷。这一措施不过是权宜之计，当时由于战争重建工作被迫推迟，因此钢梁还在那里，成了“谷仓椽”，在它们下面参议院的工作继续进行着。

新泽西州参议员霍克斯要求在“国会议事录”中刊印意大利子孙修道会的一项请求，即邀请意大利参加即将举行的组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堪萨斯州参议员里德要求在“国会议事录”中刊印全都是描述运粮棚车严重短缺的 19 封信和电报，他称这一情景是他所遇见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小麦正在地上霉烂变质。

参议院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批准与墨西哥签订的一项影响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水资源利用的条约。参议员康纳利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第一个发言，其后是亚利桑那州的欧内斯特·麦克法兰。两人均吁请批准条约。杜鲁门请一个小听差把一张纸条递给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索顿斯托尔，请他上台，替他主持会议。“有一位密苏里小战士在办公室里等我。”杜鲁门解释道，并答应不超过一小时就返回。索顿斯托尔注意到台上放着一个苹果，问如果他吃了怎么办。

杜鲁门说：“你将承担后果。”

索顿斯托尔几年后讲起此事时，还记得杜鲁门一直是说话算数的，“他过一小时果真回来了”。

人们看到的另一点是，副总统与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威利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人惠里在友好地交换意见。艾伦·德鲁里从记者席上看到此情景时对合众社记者托尼·瓦卡罗说，罗斯福很幸运，有杜鲁门这么好的人与参议院打交道。瓦卡罗皱起眉头说，罗斯福根本不用他。瓦卡罗最近与副总统接触过一段时间，他说：“杜鲁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罗斯福什么也不对他讲。”

记录表明，杜鲁门担任副总统以后，确切地说除内阁会议外，就见过总统两次——一次在 3 月 8 日，另一次 3 月 19 日，即罗斯福去温泉的 10 天前，两次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大约在下午会议的中途时开始就墨西哥水源问题发言，他有时讲得并不扼要，太琐碎，令人无法集中注意力：

人们可能注意到，农垦局关于因皮里尔河谷及其周围地区问题的报告认为，墨

西哥最终要灌溉 80 万英亩土地，为此需要蓄些水。根据墨西哥地区目前的灌水量，80 万英亩土地需引 480 万英亩-英尺的河水。上表脚注听适用的那两项的总英亩数是……

杜鲁门决定另外利用这个时间来给他母亲和妹妹写信，即使没什么好写的：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给你们写信，因为威斯康星州一位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其所讲的问题可说是一窍不通。

希望你们那儿这一阵天朗气清。我们这儿一周来天气特别好，但是今天雨雾迷蒙。我想这种天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也不希望太长，因为星期日上午我必须飞往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

明晚你们当地时间 9 点半请打开收音机，你们会听到哈里向全国发表纪念杰斐逊日的讲话。全国各广播网大概都会转播，应该很容易收听到的。我讲话后还要致介绍辞，请总统发表演说。

望你们都好并一直这样。

向你们两人问好。

有空来信。

哈里

威利结束发言后，巴克利提出休会。主门厅入口处上面的挂钟正指着差 4 分 5 点。

杜鲁门从台上走下来，出左转门，穿过参议员的私人休息室，走进副总统办公室，告诉哈里·沃恩，如果有人找他，他在萨姆·雷伯恩那里。

而后副总统避开他的特工人员，从国会大厦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穿过参议院接待室，在外面经过 8 英尺高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白色大理石雕像，走下铺贴瓷砖的长走廊，绕过“马克·叶温的痰盂”（参院圆形大厅的圆柱形楼梯井，以吐温命名是因为柱子上雕有烟叶），通过圆顶圆形主大厅、雕塑厅（老的众议院会议厅），沿着另一条短走廊走到楼梯口，从楼梯下到一层，向左走过一个厅，再向右走过另一个厅到了萨姆·雷伯恩的私人隐匿处 9 号房间，这个房间的非正式名称是“教育委员会”。

雷伯恩径直把这个房间称为“楼下”，每天下午当“楼上”的正事一结束，他就到这里来饮酒。这是他一天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应邀来和他一起喝酒的人，即使在一个任期内只有 1 或 2 次，也都被视为已到过。杜鲁门是常客之一。

以他通常的轻快步伐从副总统办公室走过那段距离来到这里用不了 3 分钟。因此当他进门时肯定是 5 点刚过。

尽管这个房间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普通的小房间，但它长约 20 英尺，华丽的天花板上绘满鸟鲁，室内的家什也大而舒适实用——

几个用旧的大黑皮椅、一个长沙发椅、一个洗手池、一个由上等薄木板装饰的大冰箱，它多少可与大桌子相匹配，里面存放着雷伯恩的威士忌。

当杜鲁门到时，众议长和另外两人已在里面了，一位是众议院议员刘易斯·德施勒，另一位是詹姆斯·M·巴恩斯，分管国会联络的白宫工作人员。外面阴沉沉的，随着下午时光的流逝，室内光线渐渐暗了下来。没人费心起

身去开灯。

显然是德施勒提醒雷伯恩，白宫曾来电话找杜鲁门，“史蒂夫·厄尔利请你马上给他回电话。”雷伯恩告诉杜鲁门。杜鲁门为自己调了一杯酒，拨了国内 1414 的号码。

“这是副总统。”他说。

史蒂夫·厄尔利的声音听起来紧张而奇怪。他请杜鲁门尽可能“迅速而不显眼地”赶往白宫，并且要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正门进去。

刘易斯·德施勒后来说，杜鲁门的脸色全变了，边说“耶稣基督啊，杰克逊将军”，边挂上电话。

他告诉其他人白宫让他马上去一下，不要对外讲。

他一个人出了门，从另一条路跑步回办公室。这次他沿一层疾步穿过两侧竖立着内战将军和说不出姓名的州长们的铜像和大理石雕像的大厅，他的鞋子在大理石地板上丁当作响。他跑过发出回声的旧地下室，经过参议院理发室，然后从带铜扶手的楼梯上去，到他的办公室去取他的帽子。

他告诉哈里·沃恩他去白宫，不要对外人讲。几分钟后他坐进了车身很长的墨丘利牌轿车，汤姆·哈蒂开车，身边仍未跟着特工人员。车以最快的速度穿行于晚间交通拥挤的街道。此时大约是下午 5 点 1 刻。

当时他脑子里有过什么闪念，他从未对外如实讲过。他后来说：“我想我将去到那里见总统。”“我不许自己想别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他想到也许是罗斯福从温泉回来了，因为总统的老朋友、亚利桑那州主教派主教那天下葬，“我想他可能想让我做些与国会联络的专门事情，派人情我在葬礼后去见他。”

但是即使如此，他为什么跑回办公室？“我一路奔跑”。他告诉母亲。他想象过他是在为什么而跑或者忘带了什么东西吗？

黑色长轿车开到白宫，在宾夕法尼亚大街拐弯，从西北门疾驶进去，停在北柱廊下。此时是 5 点 25 分。

两名招待员正等候在门口。他们接过杜鲁门的帽子，引他进了橡木镶壁的小电梯，这座电梯倒像一只精美的笼子，是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安装的，现在速度非常慢，缓缓升到二层。

罗斯福夫人等候在中央大厅另一侧家属区中她的起居室里。同她在一起的有史蒂夫·厄尔利、她的女儿安娜和女婿约翰·伯蒂格。罗斯福夫人走上前，轻轻地把手放在杜鲁门肩上。

“哈里，总统去世了。”

杜鲁门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他最后终于说。

“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吗？”罗斯福夫人说，“现在有困难的人是你。”

第三部 竭尽全力

九、月亮、星星与所有的行星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艾伦·德鲁里

1

1945年4月12日东部战时时间下午5点47分消息传开了。

国际新闻社首先将消息播出，随后是美联社、合众社、4个广播网和武装部队广播电台。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断了关于丹尼尔·布恩的儿童故事连播“茫茫大路”，全国广播公司侵占了“轰动一时的法雷尔”的节目时间，美国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分别中断了“米德乃特船长”和“汤姆·米克斯”节目。

几分钟内这条新闻传遍了全国各地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时伦敦已临近午夜。柏林已是第二天13日星期五。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欣喜若狂，他亲自给希特勒打电话，称之为命运显露的转折点。在莫斯科，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使馆主持聚会，值班官员打电话报告了他从武装部队广播电台收听到的新近广播。驻巴拿马武装部队电台的詹姆斯·韦瑟斯中士被派去接外面打进来的电话，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电话答道：“对，这是真的。”“对，这是真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的“小白宫”于下午4点45分（温泉的时间3点45分）因脑溢血逝世。两小时前，他坐在牌桌前批阅文件，说他头疼得厉害，然后突然倒下，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如同许多报道所称的，他是在胜利在望的时刻去世的，终年63岁。”他作为总司令所指挥的陆军和舰队已进逼柏林的大门和日本本岛海岸……他所代表和领导的事业正接近于最后的成功阶段。”

罗斯福夫人从白宫给服军役的四个儿子发电称，正如他们的父亲对他们的要求一样，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点史蒂夫·厄尔利写进了白宫最早发布的新闻稿中。她还向厄尔利和哈里·杜鲁门表示，希望乘飞机去温泉，但是她问不晓得她现在再使用政府飞机是否合适。杜鲁门毫不犹豫地说她应该这样做。在罗斯福夫人书房里的情况，杜鲁门只记得此事和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到来。斯退丁纽斯出现在房门口时，泪流满面。

他们同意立即召集内阁会议，请首席法官主持就职宣誓。杜鲁门下了楼梯前往西侧楼。他从总统办公室给莱斯·比弗尔打电话，请国会领导人立即前来，并派车去接杜鲁门夫人和玛格丽特。然后 he 给家里打去电话，告诉贝丝所发生的一切。贝丝没有开过收音机，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西侧楼里人来人往，紧张而忙碌。记者、摄影师、白宫工作人员、特工人员、杜鲁门自己的几位工作人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挤满了楼道和办公室。人们压低的声音里透着紧张。电话铃响个不停。在外面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对面，数千人在昏暗中默默地聚集在拉斐特广场上。

快到7点时几乎所有该到会的人都集中在内阁室里了，他们是：斯退丁纽斯、首席法官哈兰·斯通、萨姆·雷伯恩、约翰·麦考马克、乔·马丁、亨利·史汀生、亨利·华莱士、哈罗德·伊克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克德、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战时生产局

局长朱利叶斯·克鲁格、战争动员办公室主任弗莱德·M·文森、罗斯福的总参谋长威廉·李海海军上将、鲍勃·汉尼根和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她是在贝丝和玛格丽特到来之前在座的唯一女性。未到会的有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他因病缺席，阿尔本·巴克利决定留下来陪罗斯福夫人。身穿军服的白宫卫兵在门口站岗。

杜鲁门自己坐在棕色皮椅上，显得惶恐不安，“茫然不知所措”。当贝丝进来时，他走过去与她握手。几乎谁也不说话。大家全都站了似乎是特别长的时间，等着几位工作人员去找一本圣经。史汀生在记录中写道：“这一伙人全都忧心忡忡。”

贝丝几乎从一听到消息起就一直在哭，不断用手帕轻轻擦泪。玛格丽特记得当时她好像感觉麻木，似乎一切都不是真的。

能找到的唯一的一本圣经是廉价的吉迪恩版本，有鲜红的页边，它放在苛刻的招待员领班豪厄尔·克里姆的桌子抽屉里，克里姆个头不高、曲背、秃顶，现在他要确保把书上的灰尘完全掸掉后才摆放到桌上。杜鲁门后来告诉母亲，假如他早知道的话，就会从办公室书柜里把祖父杜鲁门的圣经带来了。

在室内的一端，他和首席法官斯通在伍德罗·威尔逊肖像下的大理石壁炉台边站到各自的位置上。贝丝、玛格丽特及其他人在他们周围站成一行。几位记者、摄影师、新闻摄影师被通知入内。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人们转来转去，一片慌乱。壁炉上的时钟指向7点零9分，此时距罗斯福逝世2小时24分。

杜鲁门对钟看了一眼。“我记得我开始宣誓时是7点过9分，”他后来说，“我看了一下钟。记得我周围所有人的脸……”

他捡起那本圣经，拿在他的左手里，右手举起。

“我，哈里·希普·杜鲁门。”首席法官斯通开始领读。

“我，哈里·S·杜鲁门。”杜鲁门纠正他。

“……谨庄严宣誓，我将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将竭尽所能恪守、维护和保卫合众国宪法。”

“你敢断言，千真万确。”首席法官加了一句。

“我敢断言，千真万确。”

杜鲁门“轮廓分明的脸紧绷着”，正如一位记者注意到的，他透过深度圆形镜片径直向前看。仪式结束时，他突然深情地亲吻圣经，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仪式前后仅用了分把钟。

其后他请内阁成员留下。

阁员们围坐在桌旁，这时史蒂夫·厄尔利进来请示说，报界希望知道有关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是否按原订计划12天后于4月25日召开。正如室内好几个人所了解的，罗斯福常常独自坐在这同一张桌子旁，两眼注视着威尔逊肖像，沉思威尔逊未能建成国际联盟的悲剧。杜鲁门回答说，肯定如期举行，做出了他作为总统的第一个决定。

杜鲁门在对阁员简短的讲话中说，他打算继续实行罗斯福的纲领，希望他们全体留任。他欢迎他们提出建议，他并不怀疑，阁员们如果认为必要的话，会提出与他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将由他来做，一旦决定做出，他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资深阁员史汀生称到了和衷共济的时候了。会议结束后他留了下来，告

诉杜鲁门要与他谈一件极为紧要的事情，是关于一种能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的新型炸弹。但是未进一步说明，使杜鲁门像过去一样对此不甚了了。

史汀生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在日记中写道，考虑到总统所受的震惊和所知甚少，他的为人令人钦佩。

杜鲁门回家前想起埃迪·麦金在城里，他们约定那晚在麦金的斯塔特勒住处打牌。白宫接线员给他一接通麦金的电话，杜鲁门就说：“我猜想聚会已经散了。”

9点半前他回到康涅狄格大街4701号，发现贝丝、玛格丽特和华莱士夫人去了隔壁戴维斯将军夫妇家，她们三人在邻居家不紧不慢地吃着剩下的火鸡和点心。玛格丽特记得，她父亲除了说从中午到现在没吃过东西外几乎没讲话。戴维斯夫人给他准备了火鸡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不一会儿他起身告辞。回到家他给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一切安好，不用担心。然后他上床就寝，后来他说，他倒头即进入了梦乡。

来往的汽车和有轨电车从他敞开的窗下经过，仿佛一切照旧。与其他夜晚一样，过路行人对这座楼并未显出更多的兴趣。其他过往的居民，有的牵着狗，见到门厅里的记者、公寓周围站着的特工人员感到很奇怪。

记者们占据了放在石壁炉旁的两把长沙发椅。有一个拐角处是该楼的电话交换台和一排信箱。209号信箱上贴了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哈里·S·杜鲁门夫妇”，下面用钢笔手写着“玛格丽特·杜鲁门”。交换台的接线员说，她对杜鲁门一家即将搬走感到非常遗憾。她说：“这样可爱的人呀。”

在华盛顿不断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康涅狄格大街4701号交换台是那天晚上城内最忙的地方——因为罗斯福逝世和杜鲁门就任总统的消息意味着那栋楼里不久将腾出一套公寓，这个说法显然不足凭信。

对于国家、国会、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对于除了那些曾经聚集在内阁室里。人以我的数百名老资格的主张实行新政的人士，对于大多数军队高级指挥官，对于数百万美国海外男女人士来说，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及随后人们意识到杜鲁门成了总统，像大规模频发的大地震动一样，带来巨大的冲击波，撞击着杜鲁门入主白宫的想法。许多人认为它不仅是最伟大的人倒下的问题，而是他的位置由一个无名小辈——或者至少很可能是无名小辈的人接替了。

“天哪，杜鲁门将成为总统了，”人们到处在议论，“如果哈里·杜鲁门能当总统，那么我隔壁邻居也能当。”人们对国家的未来甚忧，担心战争将会拖得更长。“真是莫大的悲剧。天助我们大家。”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戴维·利连撒尔写道。一想到杜鲁门他感到浑身不自在。“国家和世界不该成了这个样子……”

人们议论说罗斯福像林肯一样，在一场伟大战争的最后阶段，几乎是4月的同一天去世，说明了罗斯福的伟大和悲剧的强度。而且这还暗含着一层意思，即林肯也是由一位没有生气的、所谓的“普通人”、注定倒霉的安德鲁·约翰逊继任的。

现在下一个该轮到作为国务卿的斯退丁纽斯准备接任总统职位了。他暗自思忖，是否上次战争后的情况与伍德罗·威尔逊之后的不一样？是否会出现另一个哈定政府，由浅薄的县级政客接管？

按照传统的看法，参议员不会成为强有力的总统。哈定是本世纪以来唯一的另一位出自参议院的总统。人们感到他的当选是最后一招。西奥多·罗

斯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甚至柯立芝都当过州长。州长从经验中懂得一些管理事务。

在德国马尔堡的一间房子里，三位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和巴顿几乎一夜未合眼，谈论着罗斯福，推测杜鲁门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三人都特别沮丧。“从一段长时间来看，杜鲁门似乎根本没资格就任罗斯福的总统职位。”布莱德雷写道。巴顿更尖刻而且更强调这一点：“似乎非常不幸的是，为了确保政治优先，既不由党也不由上帝把完全无意当总统的人弄去当副总统。”

这一天对三位指挥官来说异乎寻常的困难，甚至是在听到有关罗斯福消息之前。在哥达附近的北奥尔德鲁夫，他们看到了他们所见的第一个纳粹死囚营。当他们互致晚安时，一位助手回忆道，艾森豪威尔看上去非常的心绪不宁。

对前线部队的数千名军人来说，同对国内许多人一样，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杜鲁门的资格，不如说是他是何许人。

一位名叫莱斯特·阿特韦尔的士兵记得，在德国一个寒冷刺骨的早晨，他的营在一条乡村道路旁边列队准备去吃早饭时：

“伙计们，”一位军官快步沿着队列走过来……

“我通报一件事：罗斯福总统昨晚逝世了。”

“什么？”你听到队列里传出异口同声的问话。“什么？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死了？”我们大吃一惊。

那位军官继续说：“我们只知道他去世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想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很可能是中风。副总统杜鲁门将接替他。”

“谁？他说的是谁？”

“杜鲁门，你这蠢货。你到底是想谁呢？”

然而，面对杜鲁门接替总统职位这一前景，有些人相信国家有人好好掌管了。他们说他们认识这个人，理解他的家庭出身。他们目睹了他是如何履行职责并了解他可以凭借的内在的机智。在杜鲁门以前和后来的生涯中，最信赖他的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

“杜鲁门诚实爱国，头脑机敏具有丰富的常识。此外，他有胆略。”约翰·南斯·加纳在给萨姆·雷伯恩的信中写道，他本人向记者保证，杜鲁门将成为“上帝”赐予的稳健干练的总统，因为“他是这块材料”。共和党领袖阿瑟·范登堡在记述4月12日的情形时写道，杜鲁门是“一位伟人，心地善良，诚实耿直”。杜鲁门能“胜任吗？”范登堡在日记中推测，“我想他能。”

几年后有人问陆军部副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当他认识到杜鲁门是总统时有什么感觉，他说：“噢，我感觉很好。因为我了解他，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

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他在海军的儿子写信说，最近在与杜鲁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晤后对他有了明确的印象：

他坦诚、率直、果断、朴实。当然在判断力和才智方面有他的局限性，这是经验不足造成的，但是我想他会学得很快，不断增强信心。对我来说，是他而不是亨

利·华莱士当总统，这似乎是件幸事。

《民族》周刊的埃文·I·F·斯通很直率，一直支持华莱士，他写道：“我不愿承认它，但是我想罗斯福先生是精明和有远见的，他挑选杜鲁门先生而不是华莱士先生作为他的继任人。在我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杜鲁门先生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编辑威廉·萨瑟恩在家乡独立城的《考察家》报上写道，国家掌握在“一位高尚的而不仅仅是个政客的人手中”。

在忠诚的老朋友当中，如埃迪·麦金、特德·马克斯、约翰·斯奈德、吉姆·彭德格斯特和埃迪·雅各布森，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去那儿好好干吧，你能胜任。”吉姆·彭德格斯特从堪萨斯城立即发去电报。埃迪·雅各布森对一名记者说：“我希望人们像我一样了解他。”

大约一天以后，在格兰德维厄回答记者提问时，新总统的母亲讲得最得体，令人难忘：“他当总统我的确不高兴，因为我为罗斯福总统的去世难过。如果他是被选上的总统，我会到外面挥旗，而现在显得十分高兴或挥什么旗似乎并不合适。哈里会处好的。”

杜鲁门对母亲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她讲的话是“金玉良言”，“即使由最好的公关人员（顾问们）起草准备，也不可能比她本人讲得更好。”

他只是渐渐地显露自己的感情，使大家明白，如果有人被命运的转折所惊呆，或者对未来担忧，或者为不适合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职位而苦恼，那么这个人就是哈里·杜鲁门。

在白宫人们立刻感到与以往的不同。杜鲁门于第二天上午9点抵达西侧楼，一群记者正等候在那里，他和美联社记者瓦卡罗先后从白宫的大凯迪拉克轿车上走下来。瓦卡罗很早就去了康涅狄格大街公寓。他一个人站在楼外的路边上，希望在新总统动身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时能看他一眼。杜鲁门告诉他，如果他想搭车则请便。

“历史上几乎没有人能与我所接任的人相比拟。”当驶向闹市区时杜鲁门说，“我祈求上帝使我能胜任这项任务。”

1945年4月13日星期五，27年前的今天，他作为一名美国远征军中尉在布雷斯特登陆。

总统办公室里的一切和罗斯福离开时一样，办公家具的摆放、他的舰船模型、苹果绿墙上挂的海军图都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办公桌上的东西动过了，罗斯福的工作人员乔纳森·丹尼尔斯清走了上面的像片和小摆设。现在当杜鲁门进来时，他正站在一边等候着。杜鲁门后来写道，他敏锐地感觉到罗斯福的存在，而丹尼尔斯也是如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丹尼尔斯就与罗斯福有私交，当时他的父亲、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是罗斯福的上司。“似乎这仍是罗斯福的办公室和办公桌。”丹尼尔斯回忆说，“的确，对我来说，好像几乎是罗斯福的太阳光从宽大的南窗射进来，照到杜鲁门的厚眼镜上。”他看着杜鲁门坐进总统高背皮椅，前后滑动，左右旋转，向后倾斜，仿佛在检验这把椅子，他想杜鲁门看上去是小得多么可怜啊。

第一个来访者是埃迪·麦金。“埃迪，昨晚太抱歉了。”杜鲁门从办公桌后面起身与他打招呼。麦金特别紧张，被这种客套弄得不知所措，当杜鲁门坐下时他觉得应站着，他脱口而说在总统面前不知该怎么办。杜鲁门请他

过来坐下，那天下午当麦金说他打算回家去时，杜鲁门请他留下，并说：“我需要你。”

他见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两次，即那天上午谈了45分钟，当天工作结束时又见了一次（上午晤见结束时，杜鲁门请斯退丁纽斯准备一份概述美国在欧洲的一些外交问题的书面报告，并说他在下班前要）。史汀生、马歇尔、李海、福雷斯特尔和欧尼斯特·J·金海军上将午前来谈了约一小时，概括介绍了战争进展情况。从下午大约3点开始，他和吉米·贝尔纳斯谈了“从德黑兰到雅尔塔的一切事情……各种天下大事”。贝尔纳斯昨晚一听到消息，就从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乘飞机赶回来了。

与此同时，白宫内乱作一团。罗斯福的工作人员整夜未合眼，安排追悼会事宜。记者挤满了记者室和大厅，他们被告之总统不接受任何采访，但是总统显然对朋友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几乎都接。贝尔纳斯一离去门就向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罗伊·罗伯茨打开了，他把肥胖的身子挤进总统办公桌旁的槭木扶手椅里，与总统进行了半小时的交谈，其后罗伯茨发表了一篇报纸广泛登载的文章，提出许多事实说明杜鲁门是典型的美国普通人。“如果民主起作用的话，对它是多大的考验啊！”他写道。

那天中午发生了一件令人大吃一惊的事情，即杜鲁门无视传统规定，突然离开白宫，驱车前往国会山，称他想会会朋友。午餐安排在莱斯·比弗尔的办公室内，是为两党和两院挑选来的17名议员准备的，但其中大部分是参议员。杜鲁门带着总统的全班人马——轿车、警察、特工人员抵达国会大厦，在武装人员的簇拥下走过大厅，而仅在一天前他还是一个人在这些地方自由走动呢。午餐是非公开的，记者谢绝入内。面色苍白紧张的杜鲁门喝了些酒，坚持要大家随便一些。午餐有鲑鱼、玉蜀黍面包、豌豆和土豆，很快多数人又开始称呼他“哈里”了。杜鲁门说，他要亲自告诉他们每个人，在一项“可怕的工作”上他需要他们的帮助。他感到被压垮了，且不介意这么说。他们对星期一葬礼后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有什么想法？对此进行了一些泛泛的讨论。杜鲁门告诉他们，他将赴会并为讲话做准备。

当午餐结束，他从办公室出来走进大厅时，看上去仍然紧张，一群记者站立等候着。“这难道不好吗？”杜鲁门说着突然热泪盈眶，“这的确很好。”他在参议院的岁月里，他在发挥作用的报界没有敌人。记者们喜欢他，他与他们在一起轻松自如，毫不拘束，他也喜欢他们每一个个人，并把好几位记者视为真正的朋友。

“小伙子们，你们如果祈祷的话，现在就请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否曾经遇到过一堆干草落到你们身上的事情，但是当你们昨天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时，我感到仿佛月亮、星星与所有的行星全都落到了我身上。”

“没多久，他就把我们当作了他的知心人。”艾伦·德鲁里写道，“坦率地告诉我们发生在他身上的可怕事情——向我们，某些方面的代表，表示出毫无拘束的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以及纯真，他知道此种情况在他余生中不会再有了。”对于一位未经考验的新总统来说，以这种方式来国会山，似乎也是第一个吉利的举动。“很独特，他自己去找他们。这第一次他便没有请他们来找他。”德鲁里写道。

对共和党人阿瑟·范登堡来说，杜鲁门突然出现在国会山标志着罗斯福时期“行政部门蔑视国会”的年代结束了。但是在罗斯福的人当中，与乔纳

森·丹尼尔斯记录的一样，反应却截然不同。他们把它视为倒退的迹象，从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总统变为一个孤独的、也许是卑躬屈节的总统。丹尼尔斯本人感到难堪和愤恨，对杜鲁门毫不钦佩。

第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杜鲁门签发了第一个官方文件——宣布罗斯福逝世的公告，在签写他的名字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时，他感到很不习惯。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就职，选举日以后还有两个月的宽限，可以作好准备并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而他却没有这个过渡期。他现在就是总统，当日剩下的时间、当晚、明天、后天、大后天他都是总统。早餐前他浏览过一遍早晨的报纸，好几版登的都是战争的消息。第9军坦克部队已开过易北河，接近柏林郊区。在某些地点，美军和俄军仅相距75英里。可怕的柏林战役快要进入最激烈的阶段。在太平洋，美国步兵已在保和岛登陆，它是菲律宾中部仍控制在敌军手中的最后据点。在白天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中，400多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对东京进行了两小时的轰炸。

正如早晨报纸的报道，截止目前已有196999名美国人在战争中阵亡，这个数字，正如杜鲁门所了解的，是他本人以前参加的战争中伤亡人数的3倍多。美国各类伤亡的最新统计，包括死、伤、失踪和被俘者，总计达899390人，一周内竟增加了6481人，或者说平均每天死伤900人。在太平洋，胜利的代价越来越大。

现在是由他而非罗斯福负责了。他任总司令，统帅着1600多万男女军人组成的武装部队，由10艘战列舰、27艘航空母舰、45艘巡洋舰组成的历史上最大的海军舰队，以及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集结过的飞机、坦克、枪支、资金和技术，而且是在整个最可怕战争中的最后关键时刻。那天上午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称，欧洲的战斗可能再持续半年，在太平洋可能还得一年半。下一步怎么走？和平可能带来什么？与俄国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斯退丁纽斯呈送的国务院报告简直不是令人鼓舞的：“自雅尔塔会议以来，苏联政府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毫不妥协的立场……”目前被苏军占领的波兰的形势“极不令人满意”，苏联当局一再违背雅尔塔协议。俄国人支持他们自己在华沙的波兰临时政府代表波兰讲话，正试图“使问题复杂化”。没有交换获释战俘。直接向斯大林上诉没有什么结果。

苏联直到那天下午仍然拒派外交部长V·M·英洛托夫出席旧金山会议。现在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以此作为纪念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种姿态，这也是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的敦促下才作出的。斯大林说，如果新总统提出请求——杜鲁门马上照办了，他将派英洛托夫前往，从而取得了貌似第一个外交突破。但是正如哈里曼本人所写，这一姿态没有解决任何基本的困难问题。丘吉尔和英国政府比任何时候都对俄国更加担心。

杜鲁门在对英国或俄国关系上没有经验，对丘吉尔或斯大林也没有直接的了解。他不知道哪些是得当的人。他不了解哈里曼，也不了解自己的国务卿，与他的关系不过是见面时打个招呼而已。他没有外交政策方面的经历，没有自己的专家或有经验的顾问可以寻求帮助。显而易见，他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多少次人们产生了这种想法和议论，或见诸报端。

罗斯福从不向他随时通报情况，或提供关于最高层的决定和计划的背景情况。杜鲁门私下告诉玛格丽特，罗斯福“从未与我表示信任地谈过战争，或外交事务，或他对战后和平的想法”。他毫无准备，情况不明，心里很害怕。

“不用说，杜鲁门总统是在不利条件下接下这一大摊工作的。”那天早晨《华盛顿邮报》严肃的社论称。

他必须挑起一位具有在白宫工作 12 年以上的经验、闻名世界的政治家的工作……在这严重的时刻……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杜鲁门先生的经验与赋予他的责任之间的巨大距离，我们就是不正直的。

他是第 7 位在总统去世后继任该职务的人。第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泰勒，杜鲁门误以为他是通过其曾祖母南希·泰勒·霍姆斯的关系当上总统的。约翰·泰勒于 1841 年取代了威廉·亨利·哈里森，那年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迁移到密苏里。泰勒开了一个重要的先河，决定自己成为名义上和事实上的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当时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合适的，宪法对此也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杜鲁门生于切斯特·A·阿瑟入主白宫的年代，阿瑟在加菲尔德被暗杀后继任总统，在杜鲁门的一生中还有两位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卡尔文·柯立芝分别在麦金莱和哈定逝世后成为总统。但是除安德鲁·约翰逊以外，没有哪一位副总统继任的总统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声名鼎鼎，虽然林肯在人们心中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的形象都高大，但他不是一位世界领袖，南北战争也不是一场全球性的大冲突。他内心有一条分明的界线。像约翰·泰勒一样，他必须是总统，必须按总统行事，但是他觉得自己是吗？“我还是哈里·杜鲁门。”自前一天晚上 7 点零 9 分以后，他几次对不同的人说。

那天上午五角大楼派往白宫的情报官给总统送签发往海外部队的命令，他被请到鱼形房间等候，他总是忘不了那一刻，一位“矮小、头发灰白的人”走进来，伸出手说，“我是杜鲁门总统”，在“我”字上加重语气，好像可能还有另外的杜鲁门总统。

一方面他决心树立他是实际负责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又几乎时时处处感到罗斯福的存在。一幅罗斯福的肖像挂在杜鲁门办公桌的右墙上——身着海军披风的罗斯福侧立着，好像面对一场风暴，他指着肖像对来访者说：“我努力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罗斯福的秘书格雷·塔利对朋友们抱怨说：“我仍然无法把那人（杜鲁门）叫作总统。”然而那时连杜鲁门自己也认为总统仍是罗斯福。“他是我唯一把他看作总统的人。”几个月后他给罗斯福夫人写道。

本世纪中他自己喜爱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有过辉煌的学术生涯。赫伯特·胡佛是世界著名的工程师。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个伟大家族的继承人，曾经是美国最富的、人口最多的纽约州受欢迎的州长。那么哈里·杜鲁门呢？与这些人相比，或者与公共生活中想当总统的许多其他人相比，他具有什么资历呢？

阿尔本·巴克利告诉杜鲁门必须制止对他能力的非议。“对您自己要有信心，”巴克利说，“如果没有自信，人们将丧失对您的信任。”

萨姆·雷伯恩来提另一种严厉的忠告。“我来这里与您谈谈关于你的问题。”雷伯恩开始讲起来：

您有很多大的危险，其一就在这白宫里。我对此已观察了很长时间。我看到白宫里的人试图在白宫周围建起一道围墙，把总统该见的人挡在外面。这是您的危险

之一。特殊利益者和谄媚者会在雨中站上一星期等着见您，把您尊为上宾。

他们将溜进来对您说，您是活着的最伟大的人——而您我都知道您不是。

4月14日星期六上午，担任总统的第二天，杜鲁门决定由约翰·斯奈德出任联邦公债局局长，他打电话给复兴金融公司的负责人杰西·琼斯，告诉他这是“总统”的任命。可以理解，琼斯问这是否是总统去世前做出的决定。“不是，”他厉声说，“他现在刚决定的。”

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来见杜鲁门，想问几个问题作为评价他的方式。杜鲁门说我不想占摩根索的时间，请他送一份关于国家财政情况的综合报告，并像要求斯退丁纽斯一样说要快，以此表明他，哈里·杜鲁门不是在接受考问，被考问的是摩根索。

对于不了解杜鲁门的摩根索来说，杜鲁门似乎既客气又果断。“但是他毕竟是位政客，”摩根索在日记中又写道，“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他脑子里在想的是什么。”

14日星期六上午早些时候，当运送罗斯福遗体的专列从温泉驶抵联邦车站时，杜鲁门正站在罗斯福家属的旁边在站台上迎候着，他两侧站着亨利·华莱士和吉米·贝尔纳斯，他俩最有理由宁愿让他们自己来代替杜鲁门。杜鲁门请他俩陪他去车站，是知道摄影师会把这一刻拍摄下来。他彬彬有礼，仪态大方，他的这一姿态也被看作信心的标志。像国会大厦的午餐一样，这似乎恰恰是他该做的事。

那天天气特别闷热，炽烈的阳光透过薄雾蒸烤着大地，他们三人身着黑色西服一起乘车在有节奏的低沉的哀鼓乐声中随着长长的送葬队伍向白宫缓缓行进。密密麻麻的人群绵延整条宪法大道，等候瞻仰由6匹白马拉着经过的灵柩。杜鲁门写道，他从不会忘记如此众多的人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情景。

午间天空突变，黑云压顶，风抽打着全城各处降在旗杆一半的国旗。顷刻间大雨倾盆而下。4点钟在东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数百人出席——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外国使节、身穿军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托马斯·E·杜威、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当杜鲁门步入大厅时没人想到起立，他看起来好像也没觉察。贝丝和玛格丽特在他身旁，仪式中自始至终他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凝视着前面国旗覆盖的灵柩。

他全天的日程排得很满。由于首都和全国举哀，以及罗斯福一家仍住在总统官邸，他认为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西侧楼的活动上——不再发布官方公告，在罗斯福体面地安葬前停止一切活动。在从火车站回到东厅仪式开始前的一段时间里，仍不断有人从他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哈里·霍普金斯、埃德·弗林、李海海军上将、吉米·贝尔纳斯。杜鲁门与霍普金斯谈的时间最长，霍普金斯形容枯槁，是从明尼苏达的病床上起来参加追悼会的，杜鲁门问他感觉怎么样？“糟透了。”霍普金斯答道。“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杜鲁门写道。他们用了近两小时回顾了罗斯福年代的历史，谈论了斯大林和丘吉尔，当时外面的大雨不断打在高大的玻璃窗上。午餐送到办公室，霍普金斯把椅子拉近办公桌边。

根据罗斯福夫人的要求，东厅的仪式上没有颂词。大家唱了两首赞美诗“永恒的上帝，您是拯救我们的”和“上帝的信仰”。在最后一次祈祷后，又根据罗斯福夫人的意愿安格斯·邓恩主教朗读了1933年罗斯福就职演说中一句著名的话：“让我申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4月15日星期日上午，出席追悼会的许多人乘总统专列经过一夜的旅程聚集到罗斯福的海德公园山庄玫瑰园的墓穴边。老天爷大发慈悲，天气转好，凉爽多了。这是明媚的春天，哈得孙河谷披上了春绿色的盛装，河水闪闪发光。杜鲁门把帽子放在手中，与贝丝和玛格丽特站在一起，当入息号声响起时，他低下了头。

2

第一个考验是4月16日星期一下午杜鲁门向国会发表演说，大获成功。的确，几周来似乎他做的每件事都近乎完美。国会、报界、公众喜欢他们的所见所闻——即使演说开始时出了点小纰漏，杜鲁门在还不该他讲话时就提前开始了。

他从通道走下来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直接走上演讲台，打开一本黑色活页大笔记本，马上准备开始不仅向坐满会议厅的与会者而且向广大收音机旁的听众发表演说。众议长雷伯恩向前探身打断说：“稍等一下，哈里，让我把您介绍一下吧。”他的话从打开的麦克风里传出来，人们听得很清楚。而刚刚在那天上午，雷伯恩在电话里曾对杜鲁门说过：“总统先生，您对我来说不再是‘哈里’了。”可他一激动就把此话给忘了，这一生动有趣的时刻令人多年都可以回忆得起来。

演说刚好15分钟。杜鲁门讲话小心谨慎，语调缓慢，被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打断，讲话结束前共鼓掌17次。

他说：“我十分谦卑地呼吁全体美国人，为保卫富兰克林·罗斯福雄辩地宣告过的理想，帮助我保持我们国家的团结。”

“我也要向我的美国同胞们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保证，我将尽心尽力的支持和捍卫这些理想。这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

各地的人聆听演说时感到欣慰，甚至感到有希望。他似乎是个好人，如此坦率，如此有决心做好工作。有些人对他的声音和口音逐渐听惯了——“United States”（美国）发成“U-nited States”，“nation”（国家）几乎就像“session”（开会）的音，有时“I”（我）接近于“Ah”（啊）——但是他的话让人听起来好像每个字的发音就是如此。

杜鲁门说，他将连续作战，为实现持久和平和改善普通人的命运而努力奋斗。

我们大家都在祈求早日取胜。和平每拖延一天都会付出可怕的代价。各解放军正在彻底粉碎希特勒统治世界的恐怖威胁。东京遭到我们猛烈的轰炸……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趋向必将永不改变，而且势不可当！

“我们的要求过去是，现在还是——无条件投降。”他宣布说，在讲到后几个字他突然提高嗓门，引起场上雷鸣般的掌声。

他讲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和持久的”联合国组织。孤立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地理屏障后面无安全可言了，永远不会了。

“一个大国的责任是服务于世界，而不是统治世界。”

在记者席上观看的保守专栏作家戴维·劳伦斯写道，台上的人与他面对的听众之间“结下了友谊”，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哪位总统曾经经历过。

演说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从海德公园返回的火车上写就的。吉米·贝尔纳斯和为罗斯福起草无数讲稿的萨姆·罗森曼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最后向肃静的会议厅作的结束语完全是杜鲁门自己写的。他抬起头，举起手，以庄重祈求的声音说道：

此刻我衷心祈祷。由于肩负重任，我虔诚地用所罗门王的话向全能的上帝祈祷：
“ 求主赐给您的臣仆一颗睿智的心，让我可以判断您的臣民的善与恶，不然，主民众多，谁能对此判断呢？” 但愿我能成为我的上帝和我的人民的善良忠实的臣仆。

这是年代久远的分辨善与恶的斗争，很长时期以来他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斗争。“ 我不过是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直觉一般，渴望完美。” 他从农场写给贝丝·华莱士的情书中有一次曾这样对她说过。

会议厅里很少听到这样突发的掌声。参议员、国会议员、老朋友们希望他以一种他们以前未曾感觉到的方式取得成功。因为他不是罗斯福，他需要一切所能得到的帮助。因为他不是罗斯福才更容易感到一种共同的联系。杜鲁门成为总统的那天上午，共和党参议员们先后进入 335 号大会议室，在通过了哀悼罗斯福逝世的决议后，他们谈论了杜鲁门的实力与缺点，判定当时决非捣乱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一员，” 其后记者被告之说，“ 他是一位崇高的人，了解我们，像我们一样思考问题。” 即使那些想和他斗的人也被迫感到得帮他站稳脚跟。“ 我们知道突然接手这样一项工作时的感受，并知道哈里·杜鲁门将是最先帮助我们的一个人。”

赞许声频频传向白宫。“ 我听腻了东部口音。” 一位印第安纳州的妇女写道。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一封信称，中西部当地人的机智意味着今后国富民安（“ 他的遣词用句取自广阔的空间，并在其间产生回响。” 《华盛顿邮报》称）。“ 您的谦恭诚挚迷住了您的美国人民的心。” 佐治亚州一位妇女向他保证。“ 哈里朋友”，另一封信的开头写道。对他承受的“ 重负” 和“ 极其重大的责任” 表示由衷的同情。极力劝告他相信上帝，注意身体，有足够的睡眠，吃好。工会、公司雇员团体、退伍军人组织、共产党地方支部、兄弟会、教会组织都保证予以合作。一位来自纽约州杰维斯港的记者称，虽然他“ 与一位实在一文不值的名叫哈里的人素昧平生”，但是他无论如何也要给予支持。

出版商亨利·卢斯从纽约的《时代》与《生活》大厦向杜鲁门通报说，他在一次会见商界朋友时，发现他们一致相信“ 您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履行您伟大的职责”。在托皮卡，一位正在接生的医生在演说播出过程中停下手中的工作，和新出生的公民握手——祝贺他在历史上如此吉祥的时刻进入人世。“ 我可以这样说，” 这位医生写信给杜鲁门说，“ 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从未见过人们行动如此一致，就像对您和您开始的政府所表现出的一致态度一样。” 医生称他是共和党人。

当然，每一位总统同国会和国家都有他的“ 蜜月”，但是杜鲁门是“ 我们之中一员” 的感觉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演说的当天，杜鲁门从他的公寓搬进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暂住，直至罗斯福夫人搬出白宫。几天来，杜鲁门一直在特工人员的护卫下，每天早晨 8 点左右快步穿过马路去上班。有一次，一辆出租汽车司机减速后把头探出车窗，喊了一声：“ 哈里，祝你好运。” 此话仿佛是代表全国说的。

“唉，我经历了任何人都可能碰上的最重要而最难挨的时刻。”在格兰德维厄，他的母亲和妹妹看他于4月16日晚从布莱尔大厦写来的信。

今天下午我们搬进这座房子，在白宫过马路（宾夕法尼亚大街）的斜对面，一直住到罗斯福一家有时间搬出白宫。我们想不搬，但是没用。我得在至少10名特工人员和12名警察的保护下才能走动。公寓内的人不带通行证不得出入，因此——我们把手提箱一起搬走。家具仍留在那儿而且还得放一段时间……但我已交了本月房租，而如果下月这个时候他们找人重新装修老白宫的工程完不了工，我还得再交一个月的房租。

今天向国会发表演说对我是最大的考验。从热烈的掌声看似还算成功。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几乎令我害怕，就像罗斯福夫人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时的感觉一样。也许情况会好起来的。

同一天俄国人开始向柏林发起最后攻势，朱可夫元帅集中2万门炮来开辟一条道路。

第二天上午，4月17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白宫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300多名记者肩挨肩地挤在总统办公室里，前排的人的身子紧靠着办公桌。罗斯福的另一名工作人员，新闻助手埃本·艾尔斯回忆说：“新总统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他站在桌后，微笑着与记者打招呼，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没有回避向他提出的任何质疑。”

杜鲁门一开始先宣读了与罗斯福所制定的一样的战时规则。所有不准记录的讲话都要严守机密，背景材料同样保密，不许说是总统提供的，只有得到总统特许才能直接引用他的话。读完这么多的规则后，杜鲁门说，预期他每周仅能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他本人将会去参加旧金山会议吗？不去。他采取什么步骤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吗？也还没有。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戴维·利连撒尔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他如何安排？他还没准备讨论任命的事。他在种族关系问题上持何立场？他在参议院的记录表明了他的立场。

“您想在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前见他吗？”

“是的。他会顺道来向美国总统表示敬意。他会的。”

亲眼目睹过罗斯福如此多的记者招待会的李海海军上将，对杜鲁门总统“直截了当”地作答很高兴。杜鲁门已请李海继续担任参谋长，他了解李海总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这位年过7旬的老水手也是因说话“直来直去”而众所周知的。

会议结束时的掌声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长期习惯于罗斯福的记者来说，这个变化令人吃惊，而且大受多数人的欢迎，罗斯福把每次记者招待会搞成一种迂回游戏和迷人的表演。杜鲁门感到五天内就像过了五辈子。

三天后当他把他们再次召集来，通报他少时的老朋友查利·罗斯任新的新闻秘书，换下史蒂夫·厄尔利时，这一任命的宣布，得到大家完全的赞同。史蒂夫·厄尔利在白宫工作12年后退休。罗斯早在1918年作为《圣路易斯邮报》的年轻记者来到首都，1931年因研究大萧条的影响而获普利策奖。他受到广泛的喜爱和尊重。厄尔利铁面无情，许多记者都怕他。罗斯更像教授，举止文雅，有耐心，说话温柔。《华盛顿邮报》称：“在这个城市里找不出一个比查利·罗斯更受爱戴或更深受尊重的新闻记者了。”

任用罗斯是贝丝的主意。杜鲁门请罗斯前来布莱尔大厦，他们连续谈了两个晚上罗斯才答应杜鲁门的请求。罗斯已年近 60，他完全明白这项工作有多高的要求，而且接受此任还意味着他的薪金锐减，从《圣路易斯邮报》付给他年薪 3.5 万美元减到 1 万美元。“但是查利，”杜鲁门对他说，“你不是那种能对美国总统说‘不’字的人。”后来他们给独立城过去的老师蒂利·布朗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

记者想查明他们是否把她的名字写对了。

“蒂利·布朗小姐，”杜鲁门说，“马蒂尔达·布朗。我们一直称她蒂利……”

那是在小学吗？

“中学。她教我和查利英文。”

（在蒂利·布朗本人与记者的会见中，她回忆说查利是个“天生聪颖的孩子”，哈里则是个“得挖掘的聪明孩子”。）

杜鲁门第一次去西侧楼办公时，生气地发现 6 位对白宫进行新闻采访的摄影记者不被允许使用记者室内的任何设备，只限制在他们自己那一小块无窗户的拥挤空间里。有人告诉他以前一直是这样的。他说今后不能再这样下去，马上从现在起摄影师与记者享有同样的特权。“他把我们变成了一等公民。”《纽约时报》的摄影师乔治·塔梅斯回忆道，一年前他第一次接受任务为总统拍的照片是罗斯福和杜鲁门在杰克逊的木兰树下共进午餐。

记者发现他们现在得在上午 8 点上班而不是罗斯福时期那样工作日开始的时间是 10 点或 10 点半。他们向杜鲁门开玩笑地抱怨说，现在得半夜起床才能按时上班。“和我一起坚持这样做，我会使你们成器的。”他咧嘴笑着向他们保证说。

留任的工作人员中的态度几乎每天都有明显的改变，他们见他越多，变化也越明显。他待人亲切，体谅人，关心他们每个人。他的精力特别旺盛，这是与过去最惊人的不同之处。乔治·M·埃尔西上尉是分配到绝密的地图室工作的年轻的海军情报官，他记得当他质朴地意识到快步走过来的人是总统时感到吃惊。“他机警敏锐……看上去不错，精力非常充沛，身体强壮。”埃尔西回忆道。特工人员长期以来习惯于靠他们推着才能四处走动的总统，突然发现他们自己跟着这样一个人而忙碌着，他随时能带着人去国会山吃午餐，或干他想干的其他事情。罗斯福带着支架和轮椅，实际上一直是他们的失去自由的人。

“要知道，和罗斯福总统在一起，他受你控制，”白宫特工人员分遣队的弗洛伊德·M·博林回忆说，“他离开你寸步难行……而现在这个家伙，他一走你就得跟着，而且他走得很快！飏飏地，就像一阵风！他说走就走！你得和他一起去。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观念，由于他的活动能力这个地方的战略全部得改变。”

一天中午，杜鲁门临时决定去离白宫几个街区的 G14 街的汉密尔顿国家银行。他戴上帽子就出了门，结果造成半小时的交通堵塞。从这件事中吸取的教训是银行得上门为总统服务，而不是总统去银行。

乔纳森·丹尼尔斯起初认为杜鲁门“很不行”，现在开始用新眼光看他了。丹尼尔斯的结论是这个人不平常。“白宫里普通美国人的陈词滥调是一种势利话，”丹尼尔斯写道，“是那些在罗斯福死后想贬低总统的人发明的。”而且杜鲁门像人们通常议论的那样，并非对就任总统没有充分的准备。因为

他了解那么多美国人的生活，因为他亲身经历过那么多“全国人民经历的沧桑”，他的确准备得异常充分（后来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持相同的看法，称杜鲁门和他前几任总统一样对就职有充分的准备）。丹尼尔斯的结论是，由于杜鲁门“显得过于谦虚”，从而使人十分误解。当总统请他再干一段时间时，他高兴地答应了。

罗斯福的忠实顾问萨姆·罗森曼、新闻助手埃本·艾尔斯、为罗斯福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和任命事项的戴维·奈尔斯、罗斯福的书信秘书比尔·哈西特都像丹尼尔斯一样，起先谈到了辞职，而现在当杜鲁门请他们留任时，他们也都接受了。

比尔·哈西特在罗斯福在温泉逝世的那一刻一直和他在一起，他在4月16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

对于白宫来说，今天上午一如往常，但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无法认识到富·多·罗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另一个人已经接管……总统把我叫去。他非常和善，坦率地请我留任。称他没有料到被指派担负这最重大的责任，在履行这一职责中他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与合作，并说：“我也需要你。”他对其责任与义务的态度真了不起。

然而，工作人员中没人去多想杜鲁门所安置的人。艾尔斯私下写道：“密苏里人显然最多，有一种‘一帮人’想进来的感觉。”新闻工作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参观白宫后沮丧地给他表姊埃莉诺·罗斯福写信称，富兰克林时期，白宫一直是世界大国的伟大首府，而现在这里像一个“密苏里州独立城雄狮俱乐部的休息室，在那里人们首先意识到的是10美分雪茄烟的味儿，以及吸烟室内新的奇闻逸话所引起的轻松的笑声。

显然什么都不懂的埃迪·麦金自以为了不起，有时还酗酒。乔纳森·丹尼尔斯认为麦金“古怪”。哈里·沃恩高嗓门，乐天派，除了滑稽逗乐外似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一个名叫约翰尼·马拉根的怪人，以前在堪萨斯城擦皮鞋，出入于沃恩的办公室，声称是白宫交通队的新头儿，在埃本·艾尔斯看来，他酷似禁酒时期的歹徒。与此同时，休·富尔顿吹嘘自己接近总统，一旦事情定下来，他作为总统讲话的撰稿人在政策问题上将发挥主要作用。

“我们对他们来说是一群陌生人，反过来他们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萨姆·罗森曼回忆道，“在他们进来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

杜鲁门自己的人当中只有两位看上去给人留有好的印象——马特·康内利，总统的约见秘书；罗斯·康韦，来自堪萨斯城，不到50岁，一个腼腆勤快的“矮个女人”，几周前她才加入副总统杜鲁门的工作人员班子，现在是总统的秘书了。

但是麦金很快要走了。杜鲁门感到非常遗憾，他对麦金说最好回奥马哈的家去（“噢，他曾是我炮兵连的一位中士。我打倒过他，还可以把他再打倒。”马特·康内利记得杜鲁门说的这番话）。休·富尔顿也没有位子了。如同杜鲁门在参议院第一个任期后辞退了忠心耿耿的维克·梅萨尔一样，所以他现在要撵走富尔顿了。梅萨尔的下台看起来似乎是由于杜鲁门觉得难以接受的某种形式的财政诡计，富尔顿的过错看起来似乎主要是自吹自擂。富尔顿长期供职，无疑是精明强干的人，但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官方职务，这使

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显然因为他太爱自夸和出风头了。虽然杜鲁门极不愿意辞退任何人，但他不能容忍被他称为“波托马克热”的人，他把这种热症描述为荒唐可笑的华盛顿流行病，其特征是狂妄自大。

哈里·沃恩继续担任总统的军事助理，他给许多人的印象是他在这群人所扮的角色中最不合适。当杜鲁门提他为准将时，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比沃恩讲的故事还可笑。对总统内阁来说沃恩成了同杜鲁门的哈里叔叔毫无二致的人物，他大名鼎鼎、健谈、随和，这些使他成为异常重要的人。杜鲁门似乎需要他在身边，不能容忍对他的批评。“我仍跟着你，头儿，”沃恩咧着嘴呵呵笑着说。沃恩的经历与人们所说的相反，并没有污七八糟的事情，而更多的是粗俗的一类。杜鲁门喜欢世俗的幽默，但从不谈与性有关的传闻，也不愿意听。还有一点与人们印象相反的是沃恩从不喝酒。尽管有人担心沃恩意味着麻烦透顶，却没人不喜欢他。艾尔斯写道：“事实是，沃恩虽然讨人喜欢，但似乎缺乏冷静、老练和调和的意识。”

在后来的几年中，一些了解杜鲁门的人议论说，对杜鲁门来说，沃恩是莎士比亚意义上的说聪明话的傻瓜，他戳穿许多总统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听着的蛊惑人心的和虚伪的事情，他不会装模作样或弄虚作假，他有时表现粗鲁，很不“稳重老练”，缺乏“调和的意识”，搅得像埃本·艾尔斯那样的人很不安，这些不仅让杜鲁门发笑，而且也使其他人稍稍回到现实中来。

杜鲁门喜欢在他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具有迥然不同的风格与观点。他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毕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他知道有着多少个哈里·沃恩。重要的是、他从经验中也了解到沃恩极为忠诚，而现在他需要所有可能的效忠。

当沃恩给他送去联邦调查局搞的一些电话窃听记录——罗斯福时期的通常做法——并问他是否感兴趣时，杜鲁门看了几页有关一名白宫助理的夫人活动的记录后说，他没时间看如此荒唐的东西，他说：“告诉他们，我没授权搞这类事。”

杜鲁门很少用联邦调查局和它的局长 J·埃德加·胡佛，这与罗斯福形成鲜明对照，罗斯福喜欢胡佛取证的方式，非常喜欢看胡佛送上的关于要人私生活迹近猥亵而富于低级趣味的秘密。罗斯福于 1936 年秘密命令胡佛开始收集政治情报，这是杜鲁门极为厌恶的政策。杜鲁门认为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直接威胁了法律规定的公民自由权，他现在不像罗斯福那样尽力讨好胡佛——胡佛一下子就看出来，令他怒不可遏。

胡佛选了一位与杜鲁门是同乡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小莫顿·奇利斯，独立城奇利斯大家族成员之一，作为他的使者前往白宫，向总统说明是否有什么事需要联邦调查局为他办理，他唯一要转告的就是这句话。而杜鲁门在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年轻人后，请他转告胡佛先生，美国总统任何时候想要联邦调查局服务，他的要求都将通过司法部长提出。从此以后，据胡佛的一位助手后来讲：“胡佛恨透了杜鲁门。”

“我们不要盖世太保或秘密警察，”杜鲁门任总统仅一个月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联邦调查局有那个趋向。他们搞性生活丑闻和赤裸裸的讹诈……对此必须加以制止……”

杜鲁门不喜欢胡佛很可能也同胡佛和他的特工人员在整倒汤姆·彭德格斯特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尽管谁也不知道杜鲁门曾这么说过没有。

不过看起来沃恩好像对胡佛有好感，或者至少爱在幕后与他打交道。沃

恩及时请联邦调查局窃听托马斯·科科伦（与著名的“汤米软木塞”谐音）的电话，他是前罗斯福的助理和华盛顿检察官，据说他认识城里的每位要员，并被认为是正在反杜鲁门的事，向有影响的自由派人士和报界泄露诋毁材料。沃恩知道杜鲁门讨厌和不信任科科伦。搞窃听的正当理由是出于白宫的安全，而实际上是十足的政治监视。尽管杜鲁门同样不赞成这种做法而且鄙视胡佛，但他对此还是开了绿灯。窃听的情况最终没有得出什么重要的结果。胡佛仍继续把沃恩看作是他在白宫的朋友。

杜鲁门在任总统的第一周内签署了一张汇票，批准付给政府 67 年来所欠老查尔斯·多尔蒂先生 1879 年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工作时的加班费 135.67 美元。他签署了最后一天在参议院主持讨论的《墨西哥水源条约》，接见了第一位外国要员——文质彬彬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艾登后来电告丘吉尔称新总统似乎“真诚友好”；以及一个共和党参议员代表团，他们在罗斯福时期极少踏入行政办公楼的门。代表团团长罗伯特·A·塔夫脱自 1932 年以后就没去过白宫。佛蒙特州的乔治·艾肯高兴地看到人们对杜鲁门如此全面的好感，但相信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他后来对艾伦·德鲁里说：“他迟早会有政敌的，如果没有，他恰恰不是一位出色的总统，就这么回事。”

他会见了萨姆·雷伯恩、鲍勃·汉尼根、土耳其大使侯赛因·拉基普·巴伊杜尔、菲律宾总统塞季奥·奥斯敏纳、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法国大使乔治·皮杜尔、他的亲兄弟维维安和弗雷德·坎菲尔，他俩轮流坐他的皮椅。他与把国旗插上硫磺岛折钵山的 3 名幸存者——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勒内·加农、艾拉·海斯和助理药剂师约翰·H·布拉得利合影，还与一位残废军人的 5 岁女儿玛格丽特·安·福德合影，这位小女孩在他的翻领上别了一朵罂粟花，为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发起募捐。此间，他决定由吉米·贝尔纳斯担任他的国务卿，尽管几周后才宣布这项任命，但消息很快传开了。国会山的人觉得他的选择再好不过了。很少有人像贝尔纳斯那样对华盛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了解参议院和白宫的活动，有这方面的经验，他认识丘吉尔，见过斯大林。罗斯福认为他最具备当总统的条件，作为国务卿，下一个该轮到他不是斯退丁纽斯任总统了。这是杜鲁门决定任命时的主要考虑。

萨姆·罗森曼告诫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罗森曼对贝尔纳斯特别看不顺眼，认为他是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他说：“总统先生，我想你并不了解吉米·贝尔纳斯，而你自以为了解。在温和的参议院中他是某种对手。但是我想你会对此后悔的，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做。”

“对于与我们以前的头儿从前在一起开会而言，现在看到杜鲁门迅速干脆地处理并决定每件事，令人倍感欣慰。”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一次内阁会议后写道，“没有总统无休止的‘独白’，整个会议很有条理，因此实际讨论的问题比我们预计的要多二三件事。”

杜鲁门经常在李海海军上将的陪同下去地图室，罗斯福把它建在主楼一层，作为他跟踪战争进展情况的一种手段，这一想法是从丘吉尔那儿借鉴过来的，后者在唐宁街 10 号也有类似的安排。低矮的地图室把守严密。唯一的一个窗户上挂着遮蔽窗帘，满墙挂着大幅地图，上面的彩钉标明军舰与部队的最新部署。对杜鲁门来说这个地方太令人羡慕了，他过去靠着挂在参议院办公室墙上的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地图跟踪战争形势。“阵地司令员的报告一到，战斗形势的变化马上就标出来了。”他写道，“消息日夜不停地传来，因此我们的军事图总是截止目前最精确的。”李海对杜鲁门所了解的世界地

理和军事史以及吸纳新情况的速度印象很深。一位海军助理的助手威廉·里格登上尉自 1942 年以来一直在白宫值班，他后来评论杜鲁门说，据他所知，没人像杜鲁门那样下工夫，“深入掌握所发生的一切情况”。

杜鲁门会见了预算局局长哈罗德·D·史密斯，他说杜鲁门总给他出问题。4 月 20 日星期五杜鲁门会见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紧急委员会主席拉比·斯蒂芬·怀斯，讨论了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犹太难民问题。最大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已经获得解放。“我请求你们相信我所报道的关于布痕瓦尔德的情况。”爱德华·R·默罗曾经从现场广播说。然而国务院的一份报告已经送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告诫称巴勒斯坦问题“极为复杂”。11 点 45 分宣布拉比·怀斯的任命，仅用了 15 分钟。中午哈里曼大使抵达白宫。

W·埃夫里尔·哈里曼是 E·N·哈里曼的儿子，他的父亲开办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是华尔街的“矮个子巨人”，据称他既不怕上帝也不怕 J·P·摩根。儿子长得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据说倒像“箭领”里的男角，身材修长，一表人材，尽管表情有些阴郁。他低沉、优雅的嗓音也可能一下变得很单调，一些不了解他的人误以为他精力不足。

哈里曼作为一个美国大富豪的继承人，是在超过他的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所了解的奢华生活中长大的。临哈得孙河的哈里曼庄园方圆 20 平方英里，包括 40 英里的马径和有 100 个房间的石堡。年轻的埃夫里尔先去了格罗顿，以后去了耶鲁，父亲去世后联合太平洋公司实际上交给了他，他最终成为公司的董事长。他收藏塞扎纳（法国一位有名的抽象派画家——译者注）和毕加索的艺术作品，曾一度是全国排名第 4 的马球手。而且他还是一位顽强的人，建起了自己的海运帝国。40 岁时，他帮助建起获得巨大成功并备受尊敬的哈里曼—布朗兄弟华尔街银行业公司。参加新政前，他可能是信仰杰克逊民粹主义的杜鲁门所认为的国家大多数麻烦的祸根人物的典型，以及早些时候，杜鲁门对他的铁路公司调查最紧时，在参议院发言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的人。杜鲁门在莫斯科的二把手乔治·凯南称，哈里曼“极为欣赏个人大权在握”。哈里曼自 1943 年 10 月起就任驻俄大使，人们知道他每天工作 18 至 20 小时，他撰写的详细的长篇报告在国务院很出名。他与斯大林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一个美国人或任何一名其他的外交官都多。眼下他看上去好像特别疲惫和忧虑。他的右眼微微地眨巴着。

在此之前杜鲁门从未见过哈里曼，也从未与这种背景的人真正共过事。哈里曼是又一个新的经历，他是几位受过同等教育，将在杜鲁门政府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一位东部波兰裔人，这些人包括查尔斯·波伦、约翰·J·麦克洛伊、詹姆斯·福雷斯特尔、迪安·艾奇逊、罗伯特·A·洛维特。甚至到目前为止可敬畏的亨利·史汀生与杜鲁门都还比较疏远。

现在陪同哈里曼在座的有斯退丁纽斯、副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国务院俄国问题专家查尔斯（“奇普”）·波伦。斯退丁纽斯作了介绍，但在其后的半小时中，他、格鲁和波伦几乎没讲多少话。

杜鲁门要求详细谈一下关于苏联的最紧迫的问题。

俄国人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哈里曼开始讲。他们想与美国和英国合作，又想扩大对东欧邻国的控制。不幸的是，斯大林圈内的一些人把美国的宽宏大量和愿意合作的态度误以为是“软弱”的表现，这使斯大林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随心所欲。尽管如此，哈里曼的看法是，苏联人不会冒与美国闹翻的风险。他们战后需要巨大的财政援助，为此，美国可以也应该在关

键问题上坚持立场。

杜鲁门说他不怕俄国人，表示要采取坚定的态度，当然要公平合理。“不管怎么说俄国人需要我们，甚于我们需要他们。”

哈里曼想知道杜鲁门了解多少最近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来往通信以及他自己发回函电的情况，他很高兴地发现杜鲁门掌握很多情况。杜鲁门一夜又一夜地不断翻阅地图室的档案，以至他都担心用眼过度可能会严重损伤他的视力。

战争期间人们始终普遍关注苏联，但是更认真地看待它是在 1944—1945 年的冬天，甚至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我可以证明，”一位国务院官员写道，“国务院的官员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地谈论着来自苏联的危险这一话题，而到了 1944—1945 年的冬天，随着胜利日的临近，它成了华盛顿的重要议题。”

3 月，丘吉尔告诫称关于波兰的雅尔塔协议正在遭到毁损，波兰失去了它的边界和自由。哈里曼报告称，被俄国人解放的美国战俘一直关在俄国营地中，那里的条件“令人难以置信”（罗斯福有一天与安娜·罗森堡共进午餐时，用拳头重击他的轮椅扶手说：“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与斯大林做交易。”）。4 月，美英就德军在意大利投降问题进行谈判，招致斯大林发来措辞尖刻的电报，谴责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各自达成与纳粹分子的休战。罗斯福很恼火，但复电时保持语气温和：

如果在胜利在望的时刻，如此的不信任和缺乏诚意有损于已蒙受巨大生命、物力和财力损失的整个事业，这将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丘吉尔给罗斯福发电，敦促对俄国人采取“率直的立场”，罗斯福复电称：“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有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们害怕了。”

罗斯福去世前 10 天，一份日期为 4 月 2 日呈送总统的战略情报局的秘密报告——后来杜鲁门也获得了这份报告——告诫称，一旦战争结束，美国面临的形势甚至比日本和纳粹德国的崛起还危险：

俄国将从目前的冲突中出脱为截止目前欧洲和亚洲的最强国——如果美国袖手旁观，它将强大到足以统治欧洲，同时称霸亚洲。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用不了几年它比德国或日本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强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俄国甚至可能在军事潜力上大大超过美国。

俄国可能恢复沙皇的掠夺传统，“奉行扩张政策，目标是把整个欧洲甚或亚洲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报告告诫称，“如果它的此项政策得逞，对美国来说，它将成为比目前所知道的还要可怕的威胁……”

哈里曼对苏美关系的状况感到如此担忧，以致在得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之前就想飞回华盛顿去。4 月 6 日，他在发给国务院的一份长电中称，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对苏联政府讲明，他们不能指望我们按他们定下的条件予以合作”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苏联政府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是从他们自己的私利出发的。”他在另一份措词强烈的报告中称。

苏联和苏联人强加给东欧人民的少数派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纲领是建立极权主义，终止我们所推崇的个人自由和民主。

罗斯福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去温泉前对《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吐露说，斯大林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

但他拒绝放弃与俄国人共事的努力。在他去世的当天给斯大林捎去的最后口信中，他说今后他们之间不能再相互不信任了，不能再有像在德国投降问题上那样的“小误解”了（在把这一口信转给斯大林前，哈里曼力主删掉“小”字，而罗斯福没有同意）。同一天他给丘吉尔写道：“我尽可能低估整个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这些各种形式的问题似乎每天都发生，而多数问题已经弄清了……”他仅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们必须坚定，迄今为止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哈里曼告诉杜鲁门，俄国控制波兰或罗马尼亚意味着的不仅仅是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而且是秘密警察的使用和言论自由的结束。他们所面临的是，哈里曼用了一个令杜鲁门难忘的词说，对欧洲的“野蛮入侵”。

美国的政策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必须丢掉任何幻想，即以为苏联可能按照国际事务中公认的原则行事。哈里曼坚持称他并不悲观。他相信双方互让就可能与俄国人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关系。

杜鲁门说，他认为不可能得到斯大林百分之百的合作，能得到百分之八十他就很高兴了。

莫洛托夫预定两天内抵达华盛顿。杜鲁门说如果波兰问题不能按雅尔塔协议得到解决，那么参议院很有可能拒绝让美国参加联合国，他将“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这一情况告诉莫洛托夫。

哈里曼告诉总统，他对“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感到多么的欣慰。

贝丝和玛格丽特第一次去看白宫的住处、她们未来的家时非常沮丧。玛格丽特写道：“白宫楼上乱七八糟……令我如此丧气。”室内物品有破旧的，也有上等崭新的，有一般的也有富于情调的，罗斯福夫妇不关心色彩的协调，也从不想向外人展示，他们在其间生活得很舒适。他们和在家里生活一样，如同一个“舒适环境”中的老式乡村绅士的家庭。罗斯福夫人留下了未动用的5万美元，这是国会拨给他们的房屋保养和维修费。她的心思主要放在其他问题上了。

地毯已磨出织纹。墙壁看上去就像多年没清扫过似的，曾经挂过照片的地方留下了一块块浅于墙色的镜框痕迹。留下不多的家具年久失修，破旧不堪。一些帐帘实际上已经霉烂。领她们参观的传达室副主任J·B·韦斯特回忆说，那房子看起来像个鬼屋。罗斯福夫人告诉贝丝说还可能会看见老鼠。

4月23日星期一下午2点召开的是一次里程碑会议，与会者先后来到椭圆形办公室，他们是罗斯福曾经为同一个目的召集而来的原班人马，其中没有一个是杜鲁门在参议院的老同事，没有杜鲁门自己挑选的新外交政策顾问或俄国问题专家，没有密苏里“帮”，除杜鲁门外根本没有一个密苏里人。他们全是罗斯福的人：斯退丁纽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马歇尔、金、李海、哈里曼、波伦、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邓恩、莫斯科军团司令约翰·R·迪恩将军。

预计莫洛托夫很快要到了。他在前一天抵达华盛顿，下榻布莱尔大厦。莫洛托夫与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晚宴后进行了短暂会晤，两人非常友好。杜

鲁门发表讲话，对俄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表示钦佩，并告诉这位苏联部长他“坚决承担我们已故总统订立的一切义务与协议”，并竭力沿着那条路走下去。这是杜鲁门第一次与俄国人交手，一切进展顺利。而现在斯退丁纽斯报告俄国人无视美国的意见，在波兰傀儡政府问题上坚持己见。杜鲁门说，迄今为止与俄国人之间的协议似乎一直是单向的。如果俄国人不想合作，他们可以“请便”。

他征求与会者的意见，首先请年长的亨利·史汀生谈，史汀生认为波兰问题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极为不幸。似乎没有必要太急，越急越危险。史汀生十分忧虑，“因为怕我们冒失地陷入这样一种境况，发现自己与俄国关系破裂……”美国必须十分小心，努力在不“正面碰撞”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福雷斯特尔极不同意他的意见。波兰形势不是孤立的例子。俄国人正在进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他说与其将来不如现在就摊牌。哈里曼补充说，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是苏联统治波兰计划的参与者。

李海海军上将根据他在雅尔塔的经验，确信俄国人决不允许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他告诫说在波兰问题上与苏联闹翻了可能是件“严重的事情”。

杜鲁门打断他的话说，他无意向莫洛托夫发出最后通牒，他只想表示坚定明确的态度。

史汀生插话说，俄国人在关心东欧方面“因事关他们自己的安全，也许比我们更现实”。

迪恩将军根据他在莫斯科的经验说，在与俄国人打交道中，美国方面显出丝毫的恐惧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马歇尔将军同意史汀生的看法，力主谨慎行事。他说他最关心的是俄国有可能拖延参加对日作战，“直到我们把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全部干完”。

史汀生发现自己对杜鲁门抱有同情感，正如后来他在日记中所写：

我非常同情总统，因为他是刚上任的新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本不该出现的。

我认为雅尔塔会议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会上的大量交易是从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而不是从俄国强大这一严峻的现实出发的……

会议结束时已很清楚，美国现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基调变了。杜鲁门说他将采纳多数人的意见。

“他的确是这样做的。”波伦回忆说。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是苏联仍掌权的最早几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和历经革命、西伯利亚流放、大清洗和战争的幸存者，其显赫地位仅在斯大林之后，位居第二。莫洛托夫很强硬，举止极为审慎，情感从不外露，除口吃外没有任何缺陷。他习惯穿深蓝色的欧式西服，戴夹鼻眼镜，蓄小胡子，看上去倒像个体面的英国中小学校长。

莫洛托夫准时于5点半来到总统办公室，陪同人员有翻译V·N·帕夫洛夫和俄国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波伦为杜鲁门翻译，杜鲁门开门见山他说，希望在波兰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不承认不搞自由选举的波兰政府。他打算不管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仍继续筹建联合国的工作，并希望莫斯科记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支持，战后美国的经济援助计划需要国会投票表决通过。

莫洛托夫说盟国合作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是三国政府平等相待。他坚持

说波兰人一直在与红军作对。杜鲁门打断说，他对宣传不感兴趣。他希望莫洛托夫向斯大林通报他对苏联政府未能履行协议感到忧虑。

据波伦后来讲，莫洛托夫变得“脸色苍白”，试图转移话题。杜鲁门说他愿意与俄国友好，而波兰是个伤感情的问题。美国准备履行在雅尔塔达成的所有协议。他仅要求苏联政府也这样做。

杜鲁门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莫洛托夫回答说：“有生以来还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

“履行你们的协议，”杜鲁门对他说，“就没人对你这样说话了。”

但是据波伦讲，并没有过这最后的对话。杜鲁门只是打断谈话简短他说：“莫洛托夫先生，就这样吧。如果你把我的看法转告斯大林元帅不胜感激。”就这样结束了谈话，莫洛托夫转身离开了房间。

然而不管以哪种方式结束了会晤，杜鲁门的调子不会错。甚至哈里曼都承认：“当总统如此有力地抨击莫洛托夫时，我都有些吃惊……”哈里曼回忆道，遗憾的是杜鲁门“干得”太狠了。“我想这是个错误……”

至于波伦，他认为杜鲁门只是讲了罗斯福在同样情况下也会说的话，除此之外，罗斯福当然会“更圆滑些”。差别是在风格方面。

当这一情况的消息传到国会山时，阿瑟·范登堡称之为他长期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史汀生极为不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总统知道。“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有件绝密的事情我应尽快与你一谈。”他在匆匆给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

此事我在你就职不久后向你提过，以后未再力陈是因为考虑到你承受的压力。

但是它与我们目前的对外关系有关，对我在这个领域的整体考虑有重要影响，因此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此事，不能再拖了。

4月25日星期三中午，杜鲁门就职的第12天，莫洛托夫访问后的第2天，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的当天，史汀生又去了白宫，但这次是他一个人。曼哈顿计划或S-1（史汀生愿意这样称它）的负责人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稍后从侧门被领进去，经过一层，以避人耳目，他被请到总统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等候。马歇尔将军完全不参加，因为他们对报界当中异常的好奇心感到十分忧虑。

战争和毕生为国服务夺去了史汀生的健康。按照医嘱，凡在可能的情况下他现在都要回家睡午觉。他认识的第一位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罗斯福任命他为纽约区检察官，那时杜鲁门正在联合国家银行当职员。当杜鲁门在农场学习生计时，史汀生已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手下任陆军部长。柯立芝任命他为菲律宾总督。胡佛让他出任国务卿。当富兰克林·罗斯福1940年再次任命他为陆军部长时，他已是72岁的政界元老了。

史汀生毕业于耶鲁和哈佛法学院，终身的共和党人，公认无误的刚直不阿的人，只是有点老式和严肃不苟。他讲话带有不明显的老人喙音，马甲背上挂着一条沉甸甸的金表链，中分头，前面的头发盖住额头，这种发式现在已经与翼领一起消失了。他也是曾当面告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总统先生，我不喜欢你对我掩饰。”史汀生曾挥动着弯曲的关节炎手指训斥说。

几年以后杜鲁门在回忆史汀生时，称他是“一位真正的人——诚实正直，

名符其实的政治家”。他像杜鲁门一样，不能容忍虚伪或罗唆，对 1918 年在法国野战炮兵部队服役感到无限自豪，而且仍然愿意人们称呼他“史汀生上校”。

他最早得知 S—1 是在 1941 年 11 月，当时罗斯福任命他负责一个委员会，就所有核裂变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自此他一直督察该计划每一阶段的进展情况。

在杜鲁门办公室里只有他和杜鲁门。史汀生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打字的备忘录，杜鲁门阅读它时他等在一边。备忘录上都是史汀生自己的话，而且第一句话就是特意要使人吃惊的。这份备忘录是他那天上午刚写就的。

4 个月内我们将完全可能制成人类历史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武器，它是一颗可能摧毁整个一座城市的炸弹。

虽然美国和英国共同开发这一“最可怕的武器”，但是目前只有美国具备制造能力。然而这一垄断不会长期保持下去，“在今后几年中，很有可能开始制造这种武器的唯一国家是俄国”。

史汀生根本不乐观。考虑到世界“道德进步”的状况，“现代文明有可能被彻底摧毁”。

当杜鲁门看完备忘录时，格罗夫斯将军被人领进来，交给他另一份关于曼哈顿计划的约 25 页的报告，也请杜鲁门过目。

总统拿了一份（史汀生写道），我们拿了另一份并看了一遍，回答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整个过程和出现的问题，事实上我想这些情况使他非常感兴趣……他还记得在他担任杜鲁门委员会主席时，我不让他调查这个计划……他说他现在完全理解了，为什么对于我来说搞其他的都不如现在搞的事业明智……

杜鲁门后来说，史汀生像关心原子弹缩短战争的能力一样，关心着它在决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史汀生请求批准建立一个专门的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这个新力量”的含意和向杜鲁门提供咨询——以帮助他决策。杜鲁门对他说干吧。

杜鲁门问了哪些问题，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后来都未讲过，但是在格罗夫斯文件夹中的一份备忘录上，格罗夫斯批注道：“总统对资金开销数额并不感到忧虑，但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完全同意有必要搞这项计划。”又据格罗夫斯称，杜鲁门在看那份长报告时停下来好几次，说他不喜欢同时对付这么多问题。格罗夫斯和史汀生回答说，他们已无法再简洁了。“这是一项庞大的计划。”格罗夫斯对总统说。

事实上，S—1 是历史上最庞大的科学工业工程，是最重要的、保守得最好的战争机密。这项计划交给工程兵团全面负责，由监造五角大楼的格罗夫斯主管。计划的发起是出于担心纳粹也在于同一件事。他们的确在干，尽管不像想象的那么认真或成功。美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耗资 20 亿美元，这已丝毫不是秘闻了，有 20 万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进去，其中仅少数人对计划有些模糊的了解。杜鲁门委员会的勤奋的主席对此都知道得这么少，这足以证明计划的安全措施是多么的极其有效。但是那时麦克阿瑟将军、切斯特·A·尼米兹海军上将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将领也都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什

么。

虽然美国和英国共同享有秘密的科技细节，而实际上它完全是个美国的计划——由华盛顿发起、监制、资助和指挥。说到底它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计划，他的决策，他的冒险事业。没有他个人的兴趣与支持，这项计划决不会获得如此优先的地位。对于杜鲁门来说，它因而是罗斯福的另一部分遗产，有待继续奋斗，而罗斯福再次对他几乎帮不上什么忙。罗斯福身后没有留下书面的政策条文，只是去年秋天与丘吉尔在海德公园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协议，仅称新武器一旦研制成功，“经过深思熟虑后，也许会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应该警告他们说将反复进行这种轰炸直至他们投降”。

这颗炸弹是否起作用，谁都说得不准。据格罗夫斯说，到7月初第一次试验才能准备就绪。

《华盛顿明星晚报》需要了解总统早餐吃些什么（桔子汁、麦片——通常是燕麦片、烤面包片、牛奶，不加咖啡）。伦敦图索夫人的蜡像馆来信索要总统量体的准确尺寸，要求将数据尽快传过去，他的办公室答应照办了：身高5'9"，胸围42 1/2，腰围35 1/2，鞋码9B，领圈15 1/2，手套码8，帽围73/8。

他通过联播网向联合国会议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很糟糕，通篇夸夸其谈、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的声明，而这恰恰是杜鲁门所厌恶的、通常决不采用的那种方式。“我们谁也不会怀疑，”他说，“有了上帝的指引、友好的合作和辛勤的工作，我们将会找到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合适解决办法。”1·F·斯通在《民族》周刊中评论说，杜鲁门通常是这样讲的：“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对于我们能否干好它我没有把握。但是我们要尽力而为。”

4月25日下午，他去五角大楼通过跨越大西洋的“秘密电话”与丘吉尔通话。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克·伯纳道特伯爵收到来自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和平试探，德国秘密提出要谈判，希姆莱想要投降，但只向西方盟国而不是向俄国人投降。丘吉尔说，显然纳粹必须同时向所有同盟国投降。杜鲁门答道：“对，这与我的想法一拍即合……我完全同意。”他马上把这个消息电告斯大林。

杜鲁门第一次抽时间去看他自己在白宫的住处，据传达室副主任J·B·韦斯特说，他“以轻快的步伐”穿过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对韦斯特来说，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近看总统。他突出的感觉是，总统的眼镜使他的眼睛显得好大。“我感到他在注视着我，上下打量着我，把我看透了。”

4月27日，美国和俄国军队在柏林以南50英里的易北河会师。一天后传来消息说墨索里尼被他的党羽杀死了，尸体像被宰的猪一样两脚拴起来倒挂着。5月1日星期二，汉堡电台播出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希特勒也死了，在柏林地下指挥所自尽。在5月2日红军攻克柏林的当天，总统不得不召开记者招待会，称德国最后投降的谣传是不真实的，尽管丘吉尔一直在暗示一周内将实现和平。

邮政部长和劳工部长希望退休。司法部长不想退而杜鲁门希望他退。预算局局长需要占总统更多的时间。陆军部长回来研究S—1特别委员会成员名单。很难想象一位总统还要考虑多少事情。玛丽·简·杜鲁门从密苏里格兰德维厄不断来信，内容令人难忘——以使哈里及时了解她所忍受的苦惱。

亲爱的哈里：

我们收到的邮件太多了，详细内容我都记不清了……我们想把有关你正在做什么的信全都看一遍，迄今坚持得很好。上周我掉了7磅，这没什么奇怪的，自你任职以后早餐是我们唯一能按时吃的饭……有人昨天打电话来向妈妈要照片，称他是来自华盛顿的艺术家。我告诉他很抱歉，但妈妈目前却能摆好姿势让人拍各种照片……

1945年4月24日

玛丽·简在她多数来信中翻来覆去地谈了他当总统给他们所造成的极大损害。眼下她最关心的是他是否能回家过母亲节或者她和母亲是否能像他建议过的那样去华盛顿。

亲爱的哈里：

我的确希望你能回来，但是如果不行，我相信我们能说服妈妈去你那儿一趟。请告诉我，关于你喜欢我穿什么式样的衣服你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想打扮得入时，也使妈妈打扮妥当，通知得如此唐突，必然使你相当难办了……

1945年5月1日

亲爱的哈里：

我昨天到的家，发现妈妈身体很好，如果可能的话，非常想星期五走。我原计划今天去（堪萨斯城）搞到凡是必要的东西，可是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嗓子嘶哑，因此格雷厄姆医生嘱咐我呆在家里。为什么当我有这么多事要做时会出现这些事呢？我真希望一切能准备就绪以便在星期五出发。

无论如何，你星期三给我来个电话，我不给你打了。如果可以，你尽早打过来，因为如果明天我不能去买东西的话，我想星期三怎么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点停当呢？

1945年5月7日

杜鲁门抱着理解的心情写道：“你们俩在这可怕的打击下做得很好。”

德国最高司令部于5月7日向盟军投降，欧洲长达5年的战争——历史上代价最惨重、最凶残的冲突结束了。凌晨2点40分在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在赖姆斯的一所学校的砖房里签订了投降条款。投降是无条件的。

丘吉尔想马上公布这一消息，但俄国前线的形势还不稳定，斯大林坚持再等一等。杜鲁门同意盟国三方于第二天5月8日欧洲胜利日上午的同一时间宣布。

8点半杜鲁门在他的办公室里把消息透给了记者。9点在外交人员接待室他向迄今记录在案的最多的电台听众发表广播讲话，罗斯福经常在这间接待室向全国广播。

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我只有祝愿要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能够活着亲眼看到这一天就好了……我们必须为结束这场战争而努力工作，因为我们的胜利还只有一半。

在另一项声明中，他呼吁日本投降，警告说“我们的攻击力量将不断增加，打击也将更加频繁”，战争拖得越久，日本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就越大，

而“这一痛苦和灾难都是徒劳无益的”。此外，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或是奴役日本民族”。

在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以及世界各地的城市，人们举行了疯狂的庆祝活动，而华盛顿没有，那儿正在下雨，几千名政府工作人员在收听了广播后仍然坐在他们的办公桌旁。“我号召每一个美国人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赢得最后胜利。”杜鲁门说。

5月8日是他的61岁生日。他已当了总统三周零四天。前一天，罗斯福夫人搬出了白宫，杜鲁门夫妇则搬了进去。“没有引起什么混乱，”如他后来所写的，“除了玛格丽特的钢琴不得不吊起来通过二楼起居室的窗口搬进去。”把罗斯福夫人搬出去需要动用20辆军用卡车。把杜鲁门夫妇从马路对面的布莱尔大厦搬过来只需要一辆卡车。

3

“俄国的形势”对杜鲁门的影响大于他所泄露的情况。杜鲁门知道罗斯福夫人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担心他对俄国人的态度，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如果要使天下太平，耐心必须成为口号。他对前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描述过，他如何对准莫洛托夫“的下巴迅速地连续猛击两拳”，而后问道：“我做得对吗？”杜鲁门对亨利·华莱士说，俄国人“就像来自贫民窟的人，举止恶劣”。华莱士开始担心杜鲁门在没有充分掌握情况和思考下作出过快的反应。

杜鲁门突然采取断然行动，在欧洲战争一结束时，不仅对俄国而且也对法国和英国减少了租借物资。正在航行途中的船只被召回。显然，由于有国务院官员关于罗斯福已经批准的说法，他没有看命令本文就签了字，铸成大错，他不得不迅速撤销了自己下的命令。

有几个晚上他累得筋疲力尽，8点就睡下了。一天早晨他在熬了前一大半夜重读雅尔塔协议后说，每看一次这些协议他都发现一些新意。埃本·艾尔斯说：“情况不断表明他是真心诚意想把事情干好的。”

甚至在德国投降之前，丘吉尔于5月6日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中，就要求英国和美国军队“坚守”他们在德国和东欧的现有阵地，而不要撤回到早些时候同俄国人达成的军事分界线。丘吉尔说，“向他们表明我们必须拿出或保留的是多少”是至关重要的。杜鲁门5月9日回电说：“我目前的意图是坚持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解释。”在德国这就意味着从易北河后撤150英里往西直到达爱森巴赫。

5月11日，丘吉尔首相又发来两份电报，陈述了他对俄国人及欧洲前途的忧虑。“总统先生，在未来的两个月内，世界上一些最严重的问题将得到解决。”他在第一份电报中说。“我担心当俄国人在德国向易北河挺进时，可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在第二份电报中说。俄国人对于波兰、东德、波罗的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大片地区的控制，将成为“欧洲史无前例的事件。”“在我们对波兰问题感到满意，并对俄国占领东德的临时性质”以及在东欧其它地区有待确立的形势感到满意之前”，盟军不撤出现有阵地是必要的。丘吉尔警告说，所有这一切只能在美军撤出欧洲和“西方世界收起其战争机器”之前得到解决。

在5月12日的电报中，丘吉尔的调子变得更加使人惊恐不安：

我对欧洲局势深为担心……获悉美国在欧洲的半数空军早已开始向太平洋战区调动。报纸上充满了美军大批调出欧洲的报道。我们的军队根据以前的安排也可能要进行明显的裁减。加拿大军队肯定要调离。法军力量薄弱，难以应付。任何人都能看出，除了适量的军队以牵制德国外，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将在很短时间内不复存在。

而与此同时，关于俄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他们的阵地上降下了一块铁幕。”丘吉尔继续道，首次使用了一个新的说法，“我们不知道幕后在进行着什么。”

两个人都承认很快在某地同斯大林会晤的重要性，虽然杜鲁门认为，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他不应在6月30日财政年度结束之前离开华盛顿。同时，他将派哈里·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

5月13日，是杜鲁门就任总统满一个月的日子，他在写给独立城的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我真是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确曾有人被迫当总统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我……但是，我必须临危不惧，并竭尽全力。且请继续祈祷并抱乐观的希望吧。”

安东尼·艾登在5月14日拜访杜鲁门讨论会晤斯大林一事时，对其“安详、自信的神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到这里来作出决定的，”杜鲁门说，“不管它们证明是对还是错，我都要这样做。”

“为了实现合理的持久和平，三个大国必须能够相互信任，并且他们自己必须真诚地希冀和平。”他私下写道，“他们还必须对较小的国家有信心。俄国对小国没有信心，英国亦然。而我们有。”接着，他无奈地补充说：“我是希望和平并愿为和平而战的。”

他建议霍普金斯对斯大林交替使用外交语言或大棒，哪个可以奏效就用哪个。

波伦和哈里曼极力主张霍普金斯出使俄国。他们从旧金山飞回华盛顿，对联合国大会遇到麻烦深感沮丧。莫洛托夫正在回国的途中。霍普金斯被认为有可能在平息事态方面获得成功，因为在斯大林看来，他曾经与罗斯福关系亲密，又一直在为与俄国合作的政策而努力工作。霍普金斯还可以为三巨头会议做出安排。尽管重病缠身，霍普金斯立即同意前往。

当时，在玛丽·简的陪同下，92岁的玛莎·埃伦·杜鲁门在她头一回乘坐飞机后，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也是在她长子当总统后第一次来看望他。

杜鲁门派了总统专机去把她们接来。这架绰号“圣牛”的四引擎银白色C—54飞机，曾将罗斯福载往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妈妈从步出机舱的时候起，就成为轰动华盛顿报界的人物，这使杜鲁门感到欣喜不已。“嗨，无聊！”看到那么多人出来迎接她，她惊呼道。如果她事先知道会惊动那么多人，她说她是决不会来的。她个头不高而且驼背，却“像一只百灵鸟那样喋喋不休”，她身穿深蓝色套装，翻领上戴着一朵大蓝花，头戴一顶蓝色春草帽，帽檐上饰有栀子花的镶边。

在驶往白宫的途中，玛格丽特在车上逗奶奶，问她是否想睡在林肯用过的床上。奶奶体内南方联盟的血液直往上涌，说如果那是被选中的东西，她宁可睡在地板上。杜鲁门以为，安排她住进许多女王曾下榻的玫瑰客房一定

会使她感到十分舒适，但他母亲发现床太高，房间太精致，把它让给了玛丽·简，自己选择了隔壁一个较小的房间。

她来时正赶上母亲节。她在白宫呆了一周多时间，迷住了周围所有的人。“嗨，你会情不自禁地喜欢她，”特工人员弗洛伊德·博林还记得，“你知道她是十分直截了当的。”第二个礼拜天，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国会大厦的圆顶和华盛顿纪念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杜鲁门带她乘总统游艇到波托马克河上观光。

贝丝同 J·B·韦斯特和一位堪萨斯城装修工一道，动手改造白宫的私人住所。房间被油漆粉刷一新，修理了家具，有的则被丢掉了。购置了新家具（多数为古董复制品）。安上了新的窗帘和帷幔，墙上挂上了从国家美术馆借来的绘画（主要是山水画）。贝丝的母亲搬进来了，住在北柱廊对面的一间客房里。来自杜鲁门的参议院办公室的里赛尔·奥德姆将充任贝丝的私人秘书，并为华莱士夫人做伴，被安排住在华莱士夫人隔壁的一间房间里。

杜鲁门、贝丝和玛格丽特各有自己的房间。杜鲁门在总统卧室中一张古色古香、挂有罩篷并有四根帐杆的床上就寝。这个房间罗斯福曾经使用过，就在南侧楼的椭圆形中央大厅后面，杜鲁门也和罗斯福一样，将其用作个人书房。1801 年元旦，约翰·亚当斯就是在这个椭圆形大厅里举行过白宫的第一个招待会，不到一年前的 7 月的一个闷热的夜晚，罗斯福也在这里会见鲍勃·汉尼根、埃德·弗林和其他一些人，决定由谁来出任民主党的第二号候选人。

贝丝有两个房间——起居室和卧室——与总统的卧室相连，而玛格丽特就住在楼角的一个房间里，同她母亲是一厅之隔，透过房间窗户可以俯瞰宾夕法尼亚大街。“我的房间是粉红色的，配有白色仿古家具，深粉色帷幔和白色窗帘。”玛格丽特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房间里还有壁炉和镜子，天花板很高（25 英尺）。”她是自威尔逊年代以来白宫第一位年轻的居民，此时她主要关心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期末考试。

为锻炼身体，杜鲁门开始使用罗斯福在一层修建的游泳池。杜鲁门力图以方向常变的、自称的侧泳方式游六至八圈，仰头划水以保持他的眼镜不湿，他希望逐渐达到能游出 1/4 英里的成绩。

晚餐之前，他和贝丝会在所谓的“休息室”里喝杯鸡尾酒放松一下，但据 J·B·韦斯特回忆，工作人员了解他们的嗜好还颇费了点功夫。

一天晚上，贝丝首次点了威士忌鸡尾酒。主管酒类膳食的男仆领班阿朗索·菲尔兹，一位夸耀调酒技术高超的酒店侍者，按照通常的做法往冰凉的玻璃杯中对酒：每杯一盎司波尔旁地区生产的烈性威士忌，橙子片，一小匙糖，再掺入少许苦味药酒。第二天晚上，她要求不要把饮料弄得太甜，所以菲尔兹试用了另一种配方。

这一次，她等到次日早晨才向 J·B·韦斯特抱怨。这是她所尝过的最差的威士忌鸡尾酒。她和总统对那些混合甜饮料都不感兴趣。韦斯特同菲尔兹谈了话。菲尔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第三个晚上，他给她对了双份的烈性威士忌，并放冰，当第一夫人品味时，他立在一旁静候反应。

“我们喜欢威士忌鸡尾酒现在这样的调法。”她笑着说。

菲尔兹是位高大、英俊的黑人，他在后来谈起杜鲁门夫人时说，她“容不得骗子、逃避责任者或拍马屁的人”，获得她认可的唯一途径是尽可能将你的工作干得出色。“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不想再为更能理解人的人去干

了。”

J·B·韦斯特在艾奥瓦州长大，他感到她特别实事求是和具有风度，“仪态端庄而不刻板”。他喜欢她。“和我所了解的多数中西部妇女一样，她的价值观念要比那些热衷于打扮的女性深邃得多。”

总统给他的深刻印象是他有自知之明和安之若素。一家三口极为相亲相爱。“实质上，他们都不喜欢抛头露面，也不在公众场合表现亲热。”韦斯特写道，“但是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在一起——读书，听广播，弹钢琴和多半相互交谈。”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12年间从未在白宫单独住过。他们很少一起用过餐。

主楼的服务人员共有32人，有饮食侍者、厨师、女佣、守门人、管工、木工、电工和花工，其中职位最高者有传达室主任豪厄尔·克里姆、第一夫人的社交秘书伊迪丝·赫尔姆和上了年纪、头发灰白的老管家亨里埃特·内斯比特。这位管家是罗斯福夫人所喜欢的人，主管膳食，但因伙食一贯很糟，他是唯一似乎成为有问题的人。邮政长官艾拉·史密斯最初在1897年来工作时是当通信员。总统的私人通信员塞缪尔·杰克逊是在塔夫脱政府时期开始任职的，主守门人约翰·梅斯也是如此。

杜鲁门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家庭情况和在白宫服务的年头儿。当客人来访时，他总是——介绍服务员的名字，他们从未见到以前的任何一位总统这样做过。

美联社驻白宫记者梅里曼·史密斯仍记得，“速记员的孩子何时患了感冒，或白宫的某个服务员何时失去了一位亲属，总统全部知道。”勒罗伊是白宫负责打扫树叶的杂工，总统认识并喜欢他。总统认为，他在海厄利亚（佛罗里达州）赛马场冒充重要官员，并被请进了包厢一事是件热闹的趣事。

有一件事情长时间以来一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5月8日德国投降的那天是杜鲁门的生日，晚上，厨师长伊丽莎白·穆尔为他烤了个蛋糕。晚餐后，杜鲁门走进厨房向她表示感谢。阿朗索·菲尔兹注意到，这是自柯立芝以来第一次一位总统进白宫的厨房，据说，柯立芝如此频繁地进出厨房，只因他爱管闲事——为了查看有没有扔掉什么施舍物。

“我总感到他（杜鲁门总统）把我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可以容忍的佣人来理解。”菲尔兹写道，“我理解他希望我成为一个男子汉……罗斯福总统亲切热情，但他使人感到，他和多数贵族一样，确实并不理解人。”

哈里·霍普金斯对杜鲁门讲过，他请求罗斯福内阁继续留任是个错误。霍普金斯教训说，作为总统，身边应该有自己的的人。现在换人开始了。

鲍勃·汉尼根被提名为邮政部长，接替有病的弗兰克·沃尔克，沃尔克在罗斯福逝世前就提出辞职。这是对一位政党主席的传统报偿，无人感到意外。杜鲁门的参议院老朋友和亲信刘易斯·施韦伦巴赫将出任新劳工部长，接替弗朗西丝·珀金斯，她是率先告诉杜鲁门希望引退的。至于农业部长，在克劳德·威克特辞职后，他挑选了新墨西哥州众议员克林顿·安德森。为替换罗斯福的来自费城的贵族气十足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他任命了名不见经传的得克萨斯州人汤姆·克拉克，一位曾主管刑事司的副部长出任司法部长。

上述人事变动公布后几乎没有引起什么轰动。在杜鲁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只有人问及克拉克拼写自己名字的后面是否有个字母“e”。杜鲁门对部分人离任也未表示惋惜。他认为沃尔克是位很正派的人，只是缺乏主意。

虽然珀金斯是位“了不起的女士”，但不懂政治，另外，他也不喜欢内阁中有位妇女。至于比德尔，杜鲁门对他从来不太在意过。

唯一出了纰漏的是比德尔的卸任问题，杜鲁门对此事处理不当。他无意解雇人员。“我猜测我天生不善于在切菜板上进行操作。”他曾有一次对贝丝说过。为了避免与比德尔对抗，他让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同比德尔联系。比德尔深感受辱，说如果总统想让他辞职，总统应该自己向他提出。这就该是一位内阁官员的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杜鲁门派人去请他来，并承认他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上有误。他告诉比德尔，他未曾想要蔑视他，然后请他辞职。

“总统似乎安心了，”比德尔写下了他对此情景的看法，“我站起来，走到他那儿，拍着他的肩膀，‘你看’，我说，‘这’并不那么困难。”

吉米·贝尔纳斯接替斯退丁纽斯出任国务卿，这最终的宣布使换下来的部长达到五位，等于内阁成员的一半。老新政派只有三人留任——华莱士、伊克斯和摩根索——而且预期他们也不会呆得太久。史汀生只打算干到战争结束，这就使福雷斯特尔成为唯一一位有可能留任的人了。

从表面情况看，新班子是杜鲁门个人的设计。除贝尔纳斯外，所有的人均来自密西西比河以西。他们中没有锋芒毕露、引人注目或奔走呼号的自由派。所有的人都是善良可靠的民主党人，是非常稳妥的人选。但最重要的是，五人中的三位——贝尔纳斯，施韦伦巴赫和安德森——都在国会中任过职。杜鲁门决心既有一个他可以把大部分责任托付给它的强大内阁，又能同国会相处得比罗斯福好。甚至选中汤姆·克拉克也主要是根据萨姆·雷伯恩众议院议长的推荐。

令海军上将李海和其他职业海军军官遗憾的是，杜鲁门还起用了一位预备役军官做他的海军助理，他是另一位密苏里州人，海军上尉小詹姆斯·K·瓦达曼，这一任命几乎与哈里·沃恩的任命相等。同沃恩一样，瓦达曼在1940年参议院竞选的紧要关头，和杜鲁门站在一起。他和沃恩一样，知道如何使“头儿”高兴。一次，杜鲁门同沃恩、瓦达曼、乔治·艾伦和约翰·斯奈德乘总统游艇在波托马克河上巡游并一起玩纸牌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两肋由于大笑而感到疼痛。

然而，另一项任命被认为是杜鲁门表现出真正的政治勇气的第一个迹象。显然，这不是一个像往常一样的政治事例，也不是罗斯福风格的政治事例。

随着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戴维·利连撒尔的任期即将届满，杜鲁门受到保守民主党人的强大压力，要求抛弃他。田纳西州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人称“老麦克”，是位棱角突出而外表懒散的参议院议长和拨款委员会主席，正处于“权力的巅峰”，他威胁说，如果杜鲁门敢于重新任命自由派人士利连撒尔，他将领导一场记忆中的最大的批准斗争。他坚持在任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问题上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罗斯福为避免与麦凯勒产生麻烦，早已谈到要任命利连撒尔担负别的职务。

利连撒尔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的新政派人士，在杜鲁门接替罗斯福的问题上，颇费思索，几乎病倒。他被召到白宫。杜鲁门的印象是，利连撒尔的工作一直是第一流的，杜鲁门也这样对他说。然后，他微笑着问利连撒尔，他是否准备继续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如是，他将会被重新任命。当然，与麦凯勒会有些麻烦，杜鲁门说，但他以前同麦凯勒较量过。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利连撒尔表示怀疑地和激动不已地记述着）……没有谈他作为总统要任命我将会承担什么“后果”……没有谈诸如……罗斯福总统曾对我说的那样，如果麦凯勒关于我的意愿没有得到尊重，他会干出些什么来破坏安宁——没谈这些——情况就是如此。

这种做法令人钦佩。朴实，没有虚伪的夸大之词，没有搞得复杂化，直截了当！

结果，麦凯勒的反对几乎未产生什么影响。5月23日，参议院批准了这一任命。

早些时候，杜鲁门在见利连撒尔之前，曾面带喜色地对他的工作人员说：“老麦克会得脑溢血的。”

5月末的另一个早晨，杜鲁门在9点钟的例会上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做了一件可能引起反对的事情。他邀请了赫伯特·胡佛来见他。他前一天晚上给胡佛写了封信。信件正在邮寄中，因此想变卦也无济于事了。

自1933年罗斯福首次出任总统以来，这位前总统在白宫一直就是不受欢迎的人。杜鲁门认为到了结束这种状态的时候了。他说他希望与胡佛谈在欧洲救济饥荒的问题。还有，尽管他没有说出来，胡佛是在他的位子上坐过的另一个凡人，或者是经常被人同罗斯福相比而知道这种感受的人。

“见了赫伯特·胡佛，”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并就食品和美国历届总统——尤其是我们两位——所遇到的普遍麻烦进行了愉快和建设性的交谈。”

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杜鲁门还记述道，以致使他几乎不知道再考虑些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把它归功于上帝。我想，上帝在指引着我。”

4

新近完全由文职人员组成的高度保密的S—1临时委员会，除了由史汀生担任主席外，还包括8名成员，其中有3位著名的科学家参与该计划的研究。他们是：哈佛大学校长、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T·康普顿，科学研究与开发署主任、华盛顿卡内基学院院长万尼瓦尔·布什。拉尔夫·A·巴德是海军部副部长和前芝加哥金融家。威廉·L·克莱顿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际贸易专家。乔治·L·哈里森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总裁，他是史汀生有关S—1计划的特别助理。

第8位是吉米·贝尔纳斯，他由总统任命，为其私人代表。

第一次会议于1945年5月9日星期三在史汀生的五角大楼办公室召开。“先生们，我们的责任是推荐有可能改变文明进程的行动。”德高望重的陆军部长这样作了开场白。会议于5月14日和18日继续召开。5月31日星期四，又召集了关键的两天会议，积极参与开发原子弹的4位物理学家组成的专门顾问小组这次也参加了讨论，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和阿瑟·H·康普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放射实验室的欧内斯特·O·劳伦斯，以及极为重要的人物、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J·罗伯特·奥本海默，原子弹就是在他的实验室里组装的。

最后一次会议讨论了包括同苏联人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广泛的问题。马歇

尔将军提出可能邀请俄国人派一些他们的科学家来观看第一次试验的问题。贝尔纳斯反对，表达了一种得到大家同意的观点，即最好的计划是“尽快推动生产与研究，以确保我们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尽一切努力来改善我们同俄国的政治关系”。

经过充分讨论，委员会和科学家顾问小组一致得出 3 点结论：

1. 应对日本尽快使用原子弹。

2. 为了给“尽可能多的居民留下深刻的心理印记”，应对被工人住房和易受毁坏的其他建筑物包围的战争工厂使用原子弹（奥本海默向他们保证说：“原子弹造成的视觉影响是巨大的。”）。

3. 使用原子弹前不发出警告。

贝尔纳斯离开会场后，直接到白宫向杜鲁门汇报，据贝尔纳斯后来的回忆，杜鲁门说：“他只能勉强同意，因为他想不出其他办法……”

与此同时，史汀生收到一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长信。他将此信称之为“一位诚实人写的“值得注意的文件”，并立即把信传给了马歇尔。这封信是通过正常的安全渠道写给总统的。“我将亲自把总统的那一份送给他，”史汀生在回信中说，“或者通过贝尔纳斯……”

信上的日期是 5 月 24 日，是住在纽约东 11 街 23 号的一位不出名的工程师 O·C·布鲁斯特写来的。他是为 S—1 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的，但自德国战败后，他一直为“锁在原子弹中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可能对未来意味着什么问题所困扰。“毁灭人类文明的想法不是感情夸张的歇斯底里，也不是怪人的疯话。我认为，这是十分现实的、几乎难以避免的结果。”在该计划的最初阶段，布鲁斯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希望这将被最终证明是不可能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德国有任何可能在这项任务中成功的机会，我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首先得到这个东西，并在德国有机会毁灭我们之前将其摧毁……只要德国的威胁存在，我们就不得不全速进行，……随着德国威胁的消除，我们就必须停止这个计划。”他强烈要求对日本的一个目标使用一颗原子弹作为示范，但以后就不再生产核原料。

我当然并不想提出任何损害对日作战的建议，尽管这可能看起来很可怕，但我知道，目前在征服日本方面遭受更大的伤亡，会比无节制地竞相生产这种原料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好得多……我以我们国家的未来和世界和平的前途的名义，请求您，先生，不要因为我人微言轻，在公众眼里既没有影响也没有名气，而对此不予置理……

信送到了白宫，但杜鲁门看了没有，不得而知。然而，信被很快退了回来，没有什么标记说明总统的反应。

关于杜鲁门的心境可以从他 6 月 3 日星期日的亲笔日记中得到一点提示：“度过了几天非常紧张忙碌的日子。”这是他的唯一评论。他后来说过，他当然认识到原子弹爆炸将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和伤亡。

事实上，没有人对于这一武器可能产生的威力十分清楚。科学家专门小组预测的爆炸力相当于 2000 吨到 20000 吨的 TNT 不等。

对于苏联人可能要花多少时间来发展这种武器，专家们的估计是 3 到 5 年不等，虽然格罗夫斯将军个人推断为 20 年之多。

史汀生较多思考的是更广泛的历史性后果。他在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将原子弹“不仅仅看作是一件新式武器，而且也看作是人类对宇宙关系方面的革命变化”是何等的重要。他像O·C·布鲁斯特那样警告说，此计划可能意味着“文明的末日”。原子弹可能是一种弗兰肯斯坦恶魔（即自己所创造而反过来毁灭自己的怪物——译者注），或者可能意味着“文明的完善”（科学家专门小组的欧内斯特·O·劳伦斯预言，从地球上的来源而不是从太阳获得我们能源的日子或许是有可能出现的）。但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6月6日星期三，史汀生前来与总统更详细地讨论这份报告。

史汀生告诉杜鲁门，他对B—29轰炸机的燃烧弹轰炸对日本造成破坏的报告深感不安。史汀生说他一直坚持要准确地轰炸目标，但现在空军通报说那不可能做到，因为日本不像德国，工业不集中，而是分散在雇工住房中间，或与他们毗邻相连。

史汀生意识到，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在华盛顿如同在全国一样，人们对于轰炸民事目标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37年日本人轰炸上海时，人们认为那是最骇人听闻的暴行。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时，罗斯福乞求双方要克制，不对平民进行“非人道的野蛮”轰炸。他1940年12月的“民主武库”演讲具有特别的威力和紧迫性，因为德国轰炸机正在伦敦上空进行狂轰滥炸（爱德华·R·默罗曾说过：“烧毁一座伟大的城市是多么虚弱的举动啊！”）。但是，战争的趋势变了，杜鲁门在他的皮夹子中仍然携带着的坦尼森诗篇中所描写的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的“恐怖的露水”，已经变得更加恐怖了。1945年2月的那个冬天，在对德国德累斯顿的三次空袭——两次英国的，一次美国的——中燃烧弹引起的风暴性大火在200英里之外都能看到。估计共有13.5万人丧生。

最近一期《生活》杂志刊登了几幅300架B—29轰炸机空袭东京后从空中拍摄的照片，该杂志说，迄今为止，只有发生灾难性大地震时才能造成如此的破坏。这份杂志没有提到有多少男人、女人和儿童被炸死，但是在3月9日到10日的那个晚上对东京的一场如此可怕的火力袭击中，就有10多万人丧生。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在最后几批袭击中可以闻到人肉烧焦的气味。由于日本再次发誓要战斗到底，袭击继续进行着。5月14日，500架B—29轰炸机袭击了日本第三大工业城市名古屋，《纽约时报》称之为空战史上燃烧弹的最大集中。5月23日，东京的5平方英里市区被抹去了痕迹。36小时以后，16平方英里的地区遭到摧毁。几周内，其他几座沿海城市——横滨、大阪、神户等也遭袭击。

史汀生对杜鲁门说，他不愿看到美国的“暴力行为超过希特勒”。但是，他也担心日本的一些目标可能被常规空袭炸得如此厉害，以致会使S—1没有“合理的背景”去显示其威力，这一似乎打动了杜鲁门的见解，加上史汀生以往的担心，显得如此古怪，竟然使他放声大笑，然后补上一句，说他明白了。

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所担心的都不是应不应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只是如何使用它才能尽快制止大屠杀。史汀生1942年给格罗夫斯将军的指示是“尽早生产”原子弹，“以便使战争结束”。

正如史汀生所强调的，委员会的作用仅仅是咨询性质的。向总统提出建议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而他痛苦地了解这一切全得靠他的判断。

向总统提出建议的最终责任是要我来负的（他后来写道），而我并不太想掩盖这一点。委员会的结论同我个人的相似，虽然我是独立地得出我的结论的。我感到，为了迫使天皇及其军事顾问们真正投降，必须给他们以巨大的震动，使之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有摧毁日本帝国的威力。这一有效震动将拯救数倍于它可能造成损失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

委员会和科学家专门小组考虑过向某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城市扔原子弹、作为给日本人的一个无害的技术性示威的可能性，后来将它否定了。马歇尔将军最初设想，可以先对大的海军设施等“纯军事目标”使用这一武器，以后如有必要再向制造业中心使用，这样人民将会事先得到警告而离去。马歇尔说：“我们必须用这种事先警告的办法来减轻使用这种武力时因考虑不周而可能引起的责骂。”但是现在马歇尔显然改变了想法，另外，他也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科学家们终于提出建议说，任何示威都不足以壮观到产生必要的“巨大震动”。也许只有备好一颗炸弹。有人担心这颗炸弹可能不灵，而且，事先公布一件据说是威力无比的秘密武器，它一旦失败，要比没有试图这样做还要糟糕，并只能支撑日本人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奥本海默在代表科学家专门小组写的材料中说：

在最初使用这些武器的问题上，我们科学界的同事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些建议包括从纯技术性示威，到精心设计的军事应用以引诱投降不等。那些主张纯技术性示威的人希望使原子武器的使用成为非法，并担心如果我们现在使用这种武器，我们在未来谈判中的立场将受到损害。其他人强调立即在军事上使用该武器是拯救美国人生命的机会，并且相信如此使用原子弹将改善国际前景，因为他们对阻止战争的关心多于对销毁这一特定武器的关心。我们发觉自己更接近于后面的这些观点；我们不可能提出什么技术性示威大概会结束战争的建议；除直接军事应用外，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可以接受的其他选择。

贝尔纳斯提出了进一步的顾虑，即假如事先告诉日本人投原子弹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把美国战俘转移到这个地区。被认为对原子弹了解最多的奥本海默强调，死于原子弹爆炸的人将会比常规的燃烧弹炸死的人少得多。他估计死亡人数可能是2万。

史汀生告诉杜鲁门，委员会所强调的和他的所有高级军事顾问们谈论的是，将会制止战争的是这一武器的“冲击价值”，缺了它，什么也不行。

史汀生想到了冲绳岛——大家都想到了冲绳岛。数百架日本“神风”敢死队的飞机对美国舰队的袭击造成了毁灭性后果——包括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在内的30艘舰艇被炸沉没，300多艘受创损坏。甚至在10天的海空大战后，当美军在岛上登陆时，还受到敌人利用坑道和掩体进行的疯狂顽抗。冲绳岛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结果，美国人死1.2万多人，伤3.6万人。日本的损失比美国惨重10倍——11万日本人丧生——而据后来的研究表明，岛上平民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5万，相当于总人口的1/3。

“我们把扔原子弹的问题看得特别重要。”马歇尔将军后来解释说。

我们刚刚经历了冲绳岛的痛苦体验。此前在太平洋的其它岛屿上也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进攻硫磺岛的第一天比在诺曼底大规模进攻开始日那天的损失还要惨

重)……日本人每次都表明,他们不会投降,他们要战斗至死……可以预料,由于他们在国内的各种关系,在日本本土上的抵抗将会更加激烈。我们对东京一个晚上的轰炸就造成了10万人丧生,而这表面上似乎未产生任何影响。是的,日本的一些城市被摧毁了,但就我们所知,他们的士气丝毫未受影响,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似乎很有必要震慑他们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结束战争;我们必须拯救美国人的生命。

在一些同研制原子弹计划有关但未参加委员会讨论的科学家当中,对这样的推论存有尖锐的分歧。

芝加哥大学的利奥·西拉德,是一位在匈牙利出生的才华出众的物理学家,曾与爱因斯坦一道说服罗斯福率先开始实行这一研究计划。4月初,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说,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引起同俄国的一场原子武器竞赛,并且对避免武器竞赛是否比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日本这一短期目标更为重要提出疑问。由于罗斯福的去世,这一备忘录未能送出。于是,他开始通过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一位朋友兼同事安排谒见杜鲁门。他的这位朋友名叫艾伯特·卡恩,是一位数学家,来自堪萨斯城,为了支付读完研究生院的费用,曾经一度为汤姆·彭德格斯特工作过。西拉德在约定日子去白宫见新任的约见秘书马特·康内利。康内利在看过西拉德的备忘录后,也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还说:“一开始我有些怀疑,因为这次约见是堪萨斯城传来的。”)。他告诉西拉德,总统希望他会见吉米·贝尔纳斯。西拉德不知道贝尔纳斯对临时委员会的作用,也不知道他不久将要成为国务卿,在芝加哥大学教务长沃尔特·巴特基和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的陪同下,连夜乘火车赶往斯帕坦堡。

5月27日,就在临时委员会十分关键的最后一次会议的几天前,三人见到了贝尔纳斯。贝尔纳斯读着备忘录,马上被其语气所激怒。备忘录说,“只有那些对所涉及的事实有第一手了解,即积极参与这项工作的少数科学家”才能对真实的形势作出评估。贝尔纳斯还对西拉德本人过分偏执和狂妄自大感到厌恶。“他的言谈举止和想参与决策的欲望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贝尔纳斯后来写道。

据西拉德说,贝尔纳斯讲他从格罗夫斯将军那儿获悉,俄国没有铀,美国由于拥有原子弹就能“更好地驾驭俄国人”。西拉德则肯定地认为那恰恰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据贝尔纳斯说,西拉德、巴特基和尤里所告诉他的有关原子弹威力的一切,没有减少他对“他们帮助研制的这种可怕武器”的恐惧。

西拉德离开斯帕坦堡时,决心给杜鲁门起草一份请愿书,基于“纯粹的道义原因”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他在回芝加哥途中在华盛顿又作了停留并见到了奥本海默。

同史汀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奥本海默此时已精疲力竭,其神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出了一些问题。起爆管未能按设计引爆,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奥本海默看起来要垮了。他身上出满了水痘,体重减少了30磅。6英尺多高的个子,体重才115磅。

“奥本海默和我的观点不一样。”西拉德回忆道,“他说:‘原子弹是骗人的……一种没有军事意义的武器。它会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一个很大的砰砰的声响——但它不是对战争有用的武器。’这些话使我感到吃惊。”

贝尔纳斯在多大程度上同杜鲁门谈论了西拉德，要是谈了的话，没有记录可证。但在讨论原子弹问题时，海军上将李海一直向杜鲁门保证，“那该死的玩意儿”决不会起作用。对李海来讲，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6月2日星期六，在白宫住了不到一个月后，贝丝、她的母亲和玛格丽特收拾行李，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前往独立城去过一个漫长的夏天。马奇·华莱士对白宫里的生活不甚满意，贝丝也是如此。“我们踏上回家之路了，在‘回家’下划线，并添上4个惊叹号。”玛格丽特写道。在父亲看来，她似乎幽默地表达了非常不满的情绪。“我希望——真诚地希望，”他私下写道，“这一情况（我担任总统）将不会给她带来不利影响。”

在家里，北街特拉华219号的房子在多年失修后正在重新修理和油刷。它已不再是灰色，现在变成了白色，“肯塔基青藤”沿窗垂下，恰如“夏日之白宫”。

杜鲁门仅仅单独过了几个晚上即开始感到孤寂和有些可怜起自己来。第一个星期日，他事先未通知任何人就徒步穿过拉斐特广场来到圣约翰教堂，悄悄地坐到后排长椅上，教堂里多数人都未注意到他。他知道，这正是林肯有时来祈祷的地方。“能认出我的人不会超过6个。”他在日记中写道。

一天晚上，李海海军上将留下来吃晚饭。接着，他和杜鲁门做东为白宫所有的雇员及他们的家人举行了一个招待会。但多数晚上，他都在楼上椭圆形书房里度过，他在工作，长长的窗子敞开着，让春天温和的空气吹进来。

杜鲁门从房内晚上发出的声响，辨定白宫里有鬼魂出没，并试图想象以前的哪些居住者与此相关。

亲爱的贝丝：

就在2个月前的今天，我还是位有理由感到高兴和满足的副总统。你也许还能记得过去那些情景。但情况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令人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我还坐在这间老房子里，处理外交上的事情，阅批报告，修改发言稿——而同时又一直听到鬼魂在过道里，甚至就在这个书房里来回走动。地板发出声响，窗帘前后晃动——我勉强能想象出老安迪和特迪正在为富兰克林而争吵。或者詹姆斯·布坎南和富兰克林·皮尔斯在判定对国家更为无益的是什么。而当米勒德·菲尔莫尔和切斯特·阿瑟也参与进来时，喧闹声便显得几乎难以忍受……

艾森豪威尔将军凯旋而归，在首都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杜鲁门为他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只有男士参加的晚宴，人人都认为搞得很成功。“他是个好人，很有人缘儿，”杜鲁门告诉贝丝，“他干得十分出色。”到处都在谈论艾森豪威尔应该竞选总统，杜鲁门对贝丝说，这对他确实很合适。“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就愿意把总统的位子让给他。”

他一个人在老房子里住着，有时在屋子里闲荡，有时调整一下钟表，他恨一个人独处，恨孤单地用早餐，甚至恨为白天的活动而修饰自己。“家人离开后，我总感到很孤独。没有人对我的领带、发式、鞋子和衣服唠唠叨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常常系条难看的领带，即使鲍勃·汉尼根和埃德·麦金都不会戴，只是为了引起贝丝和马奇的大声抗议。现在，她们离开了，我不得不穿戴得体，没有乐趣。”

然而，事实似乎是，他的一切都特别地好，好得无懈可击。他的威望高得难以想象。根据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报告，87%的人赞同他的总统行为，

甚至比罗斯福曾经得到的支持率还要高。他也不再是每天出现在办公室里、晚上写信的可悲人物了。“他像平常一样，富有愉快的幽默感。”埃本·艾尔斯有一次在星期一早晨注意到。杜鲁门为他在国会山上的威望而高兴，他对记者招待会和工作人员都感到满意。他喜欢由查利·罗斯值班。最令人振奋的是霍普金斯取得的“良好进展”。霍普金斯于6月12日从莫斯科归来，他同约瑟夫·戴维斯一起于次日早晨来共进早餐。戴维斯是执行完会见丘吉尔的使命后从伦敦回来的。

霍普金斯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篇电报中已将每次同斯大林的谈话都作了详细报告。斯大林尽管因美国中止《租借法案》的方式大为生气，但看来仍愿平息事态。他甚至还同意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程序问题上的立场，这实际上意味着挽救了旧金山会议。

丘吉尔在后来的电报中再次极力主张美军不要从划定的欧洲占领区撤走。“任何真正重要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告诫杜鲁门说，“你和我都要对未来承担巨大的责任。”但是霍普金斯告诉杜鲁门，美军推迟撤离苏占区“势必引起俄国人的误解。”据说艾森豪威尔将军也认为美军留在苏占区是不明智的。杜鲁门仍决心不做任何违背罗斯福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事情，并相信这是对俄国人显示美国的真诚并诱使对方作为回报履行他们自己的义务的最好途径。6月11日，他通知丘吉尔，美军将根据协议撤回，丘吉尔认为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几年后，杜鲁门这样写道：

根据雅尔塔协议，我们位于距占领区边界以东大约150英里处。我感到在这场战争中，为使俄国继续作战而达成的协议应该得到遵守，我是严守协议的。也许不该那么迅速地执行它们罢了……

关于波兰，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他愿意进行谈判。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罗斯福从雅尔塔回国时，这一问题毫无进展，只是现在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得到了确定。杜鲁门曾希望会谈安排在阿拉斯加。但是，正如前两次——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一样，斯大林的意愿得到了尊重。会议将在位于红军占领区内的柏林市郊波茨坦举行。日期选择在7月15日。

杜鲁门对霍普金斯所争取到的一切是如此高兴，甚至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也因此而有所好转，而霍普金斯面如死灰的样子令白宫里的其他人都感到吃惊。杜鲁门确实感觉到，霍普金斯此行对他的身体有益。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一直是我们的朋友，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不呢”。

霍普金斯是从病床上起来前往莫斯科的，他为自己的国家立下了英雄业绩。杜鲁门特别感激他，也感谢了他。霍普金斯与罗斯福一起工作了那么长时间，关系如此密切，他后来对查利·罗斯说，这是他第一次受到一位总统的感谢。

杜鲁门总统正在努力推断要在太平洋采取的行动，并力图了解麦克阿瑟。他从未见过麦克阿瑟，但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不喜欢他——“喜怒无常的高级将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先生。”杜鲁门在私人日记中提到他时这样说，“不明白一个能够创造出诸如罗伯特·E·李、约翰·J·潘兴、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等人的国家，怎么同时又会产生出卡斯特、巴顿和麦克阿瑟这类人。”

他脑子里构想着进攻计划以及拟议的用海军封锁日本、企图以饥饿迫其

投降的办法。李海海军上将在一份盖有“紧急”字样的备忘录中注意到，总统希望了解所需人员和舰只的数量。

他希望得到对于进攻日本本土上所需时间和人员伤亡损失的估计……他的意图是，对以最大限度减少美国人生命损失为目的的战役作出决定。资金和耗时的节省比较起来并不那么重要。

“我必须决定对日战略——我们是进攻日本本土呢，还是进行轰炸和封锁？”杜鲁门在日记中估量着，“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难作出的决定。”没有提到 S—1 计划。

1945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在白宫审查进攻计划的极其重要的会议上，也未提到 S—1 计划。随着会议的进行，这使史汀生的一位参谋、陆军部副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感到特别惊奇。他注意到，在讨论中，就像原子弹并不存在一样。

马歇尔将军所提出的计划是分两个阶段进攻，11 月份先从距冲绳岛仅 350 英里、日本最南端的岛屿九州开始。这场作战，马歇尔说，将同诺曼底一样困难，但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路线，伤亡人数难以预料。他估计在第一阶段，即仅仅最初的 30 天内，人员损失将同吕宋岛的相近，约 3.1 万人。

金海军上将说，冲绳岛会是更为现实之计，并把伤亡数估计在 4.1 万人。尼米兹海军上将则预计头 30 天内将伤亡 4.9 万人，比在诺曼底同样长的时间里多 7000 人。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估计 5 万人，尽管极力主张进攻的麦克阿瑟认为这一估计数过高。

五角大楼的另一项估计包括进攻九州岛的南部和北部以及日本本土（“决定性进攻”），其人员损失达 22 万人，将近百万人部队的 1/4。但马歇尔参谋部的托马斯·汉迪将军 1945 年 6 月 4 日写的备忘录，列举了同日本媾和的好处，称，如完全避免进攻，美国将会拯救不少于 50 万到 100 万人的生命——这表明，最高层当时使用过如此大的数字。史汀生肯定，日本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打得更加凶猛，军人和老百姓都是如此，双方人员的损失都将远远超过这场战争中的所有其他战役。美国人的伤亡数，史汀生担心，可能达到 100 万。

该总体计划的代号为“陷落”。对九州的突袭称为“奥林匹克”，将于 11 月 1 日开始。其后在 1946 年 3 月实施“王冠行动”，对日本本土的主岛本州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在进攻本州前，将最大程度地实行空袭，达到的程度是，如一份备忘录所言：“对日本扔下的炸弹，要超过整个欧战中对德国所投的数量。”

杜鲁门批准了这一计划。

麦克洛伊在前一天晚上已向史汀生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观点，他在整个讨论中一言不发。但在会议结束时，他记得：“当我们开始收拾文件时，总统看见了我。‘麦克洛伊，’他说：‘凡是没有发过言的人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转向史汀生，他说：‘说吧。’”

麦克洛伊回答说，炸弹的威胁可能会提供一个“政治解决的办法”。可以避免整个入侵。房间里立即静了下来，好像仅仅提到这件极其机密的事情也是不合适似的。

“我说，我会告诉他们（日本人）我们有炸弹，我还会告诉他们这是一

种什么样的武器。然后，我要告诉他们投降的条件。”他认为还应告诉日本人，他们可以保留他们的天皇。有人问他，如遭到拒绝怎么办。“只要警告了他们，我们在道义上的地位就更加强大了。”

杜鲁门表示，他要考虑一下这个意见。

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字那天，他乘坐“圣牛”号专机前往旧金山歌剧院发表演讲。他告诉代表们，他们去到那儿是为了让世界保持和平，“免受战争的恐惧”，他加强语气地宣称道，同时双手的手掌向内，按照“免受”、“战争”和“恐惧”几个字的节奏，在空中一下一下地猛劈着。旧金山是他担任总统以来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地方，该市给予他的热情接待使他大为吃惊，当他乘敞篷车驶过时，100万人拥向街头，向他欢呼。

第二天，他首次作为总统飞到堪萨斯城，经历了杰克逊县前所未有的最盛大的荣归故里的欢迎场面。“爸爸喜欢此时的每一分钟。”玛格丽特回忆着。他在市区的弗兰克·斯皮纳理发店理发时的情景被拍成了照片。他顺便去了艾迪·雅各布森的西港男士服装店，参加了独立城市长罗杰·塞尔门的家宴后，同特德·马克斯、吉姆·彭德格斯特和曾在D炮兵连服役的七八个人一道喝烈性威士忌并且聊天。当他在“摩门教教徒改革派”巨型礼堂演说时，场内座无虚席。“我将努力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他谦恭地说，“但也不要对我期望过高。”

次日，在接受了堪萨斯城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后，他讲述了他如何在从旧金山起飞、经停盐湖城后、在飞机上俯视大平原时想到了他的祖父所罗门·扬。从堪萨斯城到盐湖城再返回家，所罗门·扬每次要花3个月的时间。现在，他的孙儿仅用3个半小时就到了。

“我急切地想使你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已不再像一个县、一个州、一个国家那么大了。”他说，“它是我们大家必须和睦相处的世界。”

7月2日，他去到参议院，力促批准联合国宪章：“这个宪章是从世界的现实经历中得来的，在这个世界上，一代人两度未能保持住和平。”

随着前往柏林动身日期的迫近，他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了，这间办公室看上去更多地是按他本人的意愿布置的。属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东西都搬走了。从国家美术馆借来的、伦布兰特·皮尔所画的乔治·华盛顿肖像，现在挂在了他对面的壁炉台一侧。另一侧挂的是西蒙·玻利瓦尔的画像，这幅画是委内瑞拉大使1941年送给他的礼物（这一礼物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送给美国最大的社区密苏里州的玻利瓦尔的，该社区以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的名字命名）。壁炉台上方挂着题为《袭击》的雷明顿的作品，是从史密斯森尼亚博物馆借来的。画面表现了骑马的印第安人战士在阴森的月光下遭受袭击的情形，画的前景是，一匹战马猛地后腿立起，正像一天晚上D炮兵连在孚日山脉遭到袭击时，杜鲁门自己的战马受惊后腿立起的情形一样。

一套早期飞机的图片替换了罗斯福的海军风景画。罗斯福的画像仍挂在杜鲁门右手一侧的墙上。在以前摆放一艘军舰模型的桌子上，现在摆上了安德鲁·杰克逊骑士的青铜复制品，原件是由查尔斯·凯克雕塑的，立在堪萨斯城法院前面。在他办公桌后面的窗前桌上，摆放着贝丝、玛格丽特和杜鲁门母亲的照片以及各种书籍。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办公桌移走了——杜鲁门把它送给了罗斯福夫人——换上了曾属于西奥多·罗斯福的7英尺长胡桃木办公桌。按照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标准，桌面整洁，不铺任何东西。除了一个大的绿色吸墨器

和电话机外，还有几副放在不同盒子里的眼镜、两个供客人用的金属小烟灰缸、一座大炮模型、一座时钟、两个笔架（一个精美，一个普通）、一些铅笔、日期戳、日历、两个放大镜、一个糨糊瓶、一个玻璃墨水池以及一个磨损了的盛冰水的旧的保温大水罐，最后这一件是罗斯福的个人财物之一，杜鲁门要求留用了。

在一个小银框里镶着贝丝 1917 年拍摄的照片，他在法国时一直带在身边。另一个小镜框里是马克·吐温亲手书写的座右铭：“行必正，人意足，天下惊。”

杜鲁门的办公桌上下都没有蜂音器，他不喜欢“按铃”唤人，而是站立起来，走到门口。另外，他命令拆掉了罗斯福有时使用的暗藏的录音装置。

S·J·伍尔夫是一位艺术家，《纽约时报》派他作一幅总统工作时的速写画，在他的眼里，杜鲁门轻松潇洒，考虑到所有那些必然装在他脑子里的国家大事，这是令人吃惊的。一位总统肩上的责任如此重大，杜鲁门说，如果他总是想着它们，并不断地考虑他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决定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将会“很快地被压垮”。

杜鲁门确信，俄国人是希望成为朋友的。他看不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欢迎他们的友谊并投桃报李”。他说他期待着会见斯大林和丘吉尔。但他给贝丝写信时说他对此行“深感沮丧”。

史汀生以前从未参加过三巨头的任何会议，这次也没有受到邀请前去。这是出于对他健康的考虑，杜鲁门告诉他。史汀生敏锐地意识到，有多少事情可能有赖于 S—1 计划的最后一分钟的进展，他决定不邀自往。他将乘飞机去，先于总统抵达柏林。

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也急切地希望自己能去，而当他发现未能如愿时极为不快。摩根索有一个剥夺德国的全部重工业使其降为农业国的计划，但杜鲁门从未认真地对待过这个主意，而史汀生则强烈反对，理由是一个经济上强大和丰饶多产的德国是未来欧洲稳定的唯一希望。“惩处德国全部战犯，”史汀生向杜鲁门建议道，“永远剥夺它的武器……监视其政府行为一直到受纳粹教育的一代人从舞台上消失……但不要剥夺它最终建成一个心满意足的、对非军事化文明方式感兴趣的德国的手段。”

有人还向杜鲁门指出，去柏林途中如发生不测，他和贝尔纳斯国务卿两人都遇难，那么，根据继承法的规定，亨利·摩根索将成为总统，这一想法使杜鲁门极度苦恼；这是否因为摩根索是个犹太人——摩根索怀疑是这个理由——但在杜鲁门的言谈和文字里从未表示过。

7月5日，摩根索到椭圆形办公室来见他，根据杜鲁门关于会见的叙述，摩根索说，他在波茨坦会议上发挥作用十分重要，如果他不能，他将会辞职。杜鲁门说，如果情况如此的话，他将立即接受他的辞呈。当天就发表了这一通告。

杜鲁门任命弗雷德·M·文森接替摩根索出任财政部长职务。文森担任了14年国会议员，被认为是国会中的财政问题专家，还担任过5年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这之后，又由罗斯福任命，先后做过稳定经济办公室主任和战争动员与恢复办公室主任。文森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个多才多艺、勤奋的社会活动家。他的凹陷的下颚和眼睛下面的黑圈，使他的面孔看起来像一只疲倦的猎狗。他还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式肯塔基政治家——务实、幽默、精明——按杜鲁门的估计，他是政府中最出色的成员之一。

关于同杜鲁门的分道扬镳，在摩根索自己的日记中未提到波茨坦问题，只提到杜鲁门在对于他是否留任到战争结束问题上似乎“很软弱和犹豫不决”。据摩根索说，他告诉杜鲁门：“不管你愿不愿意让我呆到‘对日胜利日’……毕竟，总统先生，我认为我可以毫不自负地说，我至少同你新任命的5名阁员中的某些人一样好，甚至比他们更强，而且，我认为你在他们当中某些人的问题上，肯定犯了错误。”

几年后，在同乔纳森·丹尼尔斯的一次谈话中，杜鲁门说：“摩根索不知道如何区分大便和苹果酱。”

“我已作好准备去见斯大林和丘吉尔。”他在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说，“我得带上我的晚礼服、燕尾服、黑色传教士外套、高礼帽、大帽子和常礼帽……我的公文皮包里塞满了以往会议的有关材料，以及有关我该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的各种建议。但愿我不是非去不可……”

“我真恨这次旅行！”他在7月7日星期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这是在“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写的，他自1918年首次赴欧后，现在再次乘船前往欧洲。

十、决断的夏季

今天的首要现实是战争

——亨利·L·史汀生

1

杜鲁门习惯于在旅途中自己照顾自己。他总是自己买火车票，自己拎手提皮包，自己付饭店的账单，驾车旅行时，他喜欢自己选择行车路线和过夜地点。在灰色克莱斯勒轿车前部的司机杂物盒内保存着他的旅行日志，这些是由美孚石油公司加油站分送的那种硬纸壳的薄薄的小笔记本。他在上面仔细记录了所行里程和沿途的各项花销，如在罗阿诺克，买 10 加仑汽油用去 2.25 美元，在纳什维尔，午餐花去 45 美分，从康涅狄格大道到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行驶 1940 英里。甚至与弗雷德·坎菲尔一起进行巡回竞选演说途中，他也宁可自己驾车，自做安排。因此，他现在当选总统后，旅行对他来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不能再自行其是。大小事务均有人为他安排。去旧金山时，他发现竟有数百人随行前往。对他来说，去任何地方都“简直就像移动一个马戏团。”杜鲁门说。所以，安排杜鲁门出国访问是进行了非凡的大量工作的产物。为准备波茨坦会议，国务院、陆军部，陆、海、空三军，白宫和情报部门全部派员参加。英、俄两国政府也是如此。在这庞大的队伍中，最接近杜鲁门的核心班底有 53 人，他们乘坐万吨级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在“费拉德尔菲亚”号轻型巡洋舰护航下，穿洋过海，到达大西洋彼岸（“就像用 2 艘军舰送你的老爸过池塘一样。”他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这样写道）。靠近英吉利海峡时，英国的 1 艘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正等候在那里以护送他们穿过多佛尔的悬崖峭壁。在海上颠簸了 8 天后的“奥古斯塔”号 7 月 15 日星期日停靠在安特卫普港，受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一行的欢迎。杜鲁门乘坐由 47 辆轿车组成的车队向南开往布鲁塞尔一机场，公路沿途有他的老部下、全副武装的 35 师的全班人马担任警卫。在机场，“圣牛”号总统座机和另外两架 C—54 运输机等候运送总统一行前往柏林。这 3 个半小时的飞行是他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段行程。过了法兰克福，有 20 架 P—47 霹雳轰炸机为他护航。

透过飞机舷窗，下面德国的凄惨景象从他眼前掠过。“没有亲眼目睹过的人简直无法想象从空中俯瞰到的惨状。”巴顿将军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说。展现在杜鲁门眼前的是炸毁的桥梁、铁路，工厂的残骸，整座整座城市的废墟和烧毁的百孔千疮的土地，他知道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像动物一样在瓦砾堆中寻找着食物。到处都有疾病和饥饿威胁着他们，或千上万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在那里徘徊。在美国历史上，从 A·林肯、W·威尔逊到 F·罗斯福，还没有哪一个战时总统曾像他现在这样，面对着如此满目疮痍的景象。

午后，飞机降落在热浪滚滚的加托机场，机场上迎接他的有史汀生部长、哈里曼大使、金海军上将、两名俄国将军、俄国大使、葛罗米柯和第二装甲师的一个仪仗队，仪仗队从一大早就在骄阳下等候着。从加托到最终目的地要经过苏联控制的防区。在这 10 英里长的防区内，俄国边防军岗哨林立，沿途每 20 英尺就有一名士兵，荷枪实弹，刺刀出鞘，这些精干的有着亚洲人脸

孔的士兵，头戴绿色军帽，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在道路两旁。

参加本次会议的美国人比雅尔塔会议多了4倍。杜鲁门的随行人员有贝尔纳斯、李海、波伦、查利·罗斯和地图室的埃尔西上尉和弗兰克·格雷厄姆上校；还有一名医生，阿方斯·麦克马洪上校；总统的仆人，阿瑟·普雷蒂曼，此人曾经侍候过罗斯福；一名海军摄影师、11名海军厨师和招待员；沃恩将军、瓦达曼上校以及再一次有弗雷德·坎菲尔，此人是美国堪萨斯城警察局长，临时隶属于情报机关特遣队，充当总统的一名特别保镖（杜鲁门特别乐意把这位身材魁梧的他以前的县政府负责人，向俄国人介绍为坎菲尔元帅，因为警察局长和元帅这两个字在英语中发音相同，他们以为这一头衔表明军衔，因而对他表现得极为尊重）。“他是一位总统曾经有过的最警醒的贴身保镖。”杜鲁门后来这样说，“会议期间，他站在窗口，双手抱臂，向外怒目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人……好像谁要打扰了美国总统，他就会生吃了人家一样。”

飞机送来了食品、成箱的烈性酒和葡萄酒，瓶装水每天从法国空运过来。因为一架满载枕头的飞机迷了路，少将级以下的军官睡觉全都没有枕头。为了使杜鲁门能保持与华盛顿的秘密联络，陆军花了数周的时间在苏联占领的100英里区域内，安装了无线电中继站和打字电报机线路，苏占区将会议场所与美军防区分隔开了。

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准备住在位于柏林市郊叫作巴伯尔斯贝格的三栋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与格里列梯湖毗邻，离波茨坦三英里，这是从25栋别墅中挑选征用来的，仓促地进行了装修。这个湖滨的社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基本上没遭到什么破坏，现在被数千名俄国士兵和保安人员以及英美的大批卫兵严密监视了起来。头戴绿军帽的俄国士兵随处可见，街道上、公路边、十字街头和湖边。他们有时从树丛中走出来，四处张望，然后又隐没在树林里。俄国的编制人员——军事、外交和保安——总共超过了2万人。

杜鲁门下榻在凯撒大街2号，这座被称为“小白宫”的用黄色灰泥粉刷的三层小楼就坐落在湖边。有人告诉他，这里曾经是纳粹电影业巨头的别墅，此人已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事实上，这是著名出版商古斯塔夫·米勒-格罗特和他庞大家族的宅邸，这一家族的悲剧性故事，杜鲁门是几年以后从出版商的一个儿子给他的一封信中才得知的。这座始建于上世纪末的庄园多年来曾经是德国的和外国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聚会的地方。

战争结束时，我的双亲仍住在那儿，事实上，他们的一生都是在这座别墅里度过的。后来，我的几个姐姐也带着孩子住了进去，因为那儿是郊区，可以更安全地躲避炸弹的袭击……5月初，俄国人来了。在您住进这所房子的10个星期前，它的居住者们一直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强盗般的俄国兵，不分昼夜，随便进出，当着我父母和孩子的面强奸了我的姐姐们，并殴打我年迈的双亲。所有的家具、壁橱、衣箱等都被刺刀和枪托捣毁了，里面的东西四处散落并遭到破坏，其野蛮行径，难以言表。一座具有文化修养的宅第的财富在几小时之内被毁坏殆尽了。

这家人只被告知，这栋房子要派“重要用场”，全家人一小时内就给扫地出门了。之后，俄国人抢走了里面的全部东西，包括整个一间图书室的善本书和手稿，这些珍品用叉车拉走填进了弹坑。杜鲁门在抵达时发现，这里的家具——沉重而深色的条顿风格的餐具柜和桌子，一张巨型雕花写字台，

几把垫得既软又厚的椅子和一架大钢琴——曾被没收后挪到别处，最后一刻又给匆匆搬了进来。

一名美国记者几周后设法看到了这座房子里面的情景，他称这栋小楼是“梦魇住宅”。《纽约时报》记者坦尼雅·朗这样写道，室内气氛沉闷可怕，光线暗淡，“挤满了使人感到压抑的静物和可怕的灯盏”。杜鲁门也用“梦魇”二字来描绘楼内的情景，虽然他对建筑物有兴趣，但他更讨厌这栋楼的外表。他回忆着以前曾经住过像可爱的芒提尼苏奥比小镇那样的地方，把这所房子叫作被毁坏的城堡——他说是被德国对于要掩饰任何法国式的东西这一需要毁坏了。“他们在面向湖水的入口处的每一侧都用碑石竖起一对烟囱，这样他们就可以挡住城堡的漂亮屋顶和塔尖。”他在日记中写道，“把一个好端端的地方变得如同地狱一般，不过完全是德国式的罢了……”

窗子上没有纱窗，据同去的好几个人说，这里的蚊子和雅尔塔的一样多。卫生设备，用官方的工作同志的话讲是“严重不足。”

尽管这样，杜鲁门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地方就算可以了。别墅的主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正过着悲惨的日子，对此当时他一无所知。他住在二层的套间，包括一间卧室、起居室、大办公室和一条可以眺望湖光水色的走廊。湖面狭窄，蜿蜒曲折，更像一条河，远处的树木看起来就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草地一直延伸到水边，草地上有三四名戴着白手套、打着绑腿的美国宪兵在值勤。有人说，俄国人曾将一些由于伤势过重而走不动路的德国士兵扔进了湖里。

李海海军上将住在总统居处的楼下，贝尔纳斯国务卿和奇普·波伦住在一层。查利·罗斯、沃恩、瓦达曼、坎菲尔和情报部门特遣队住在三层。地图室设在离一二层之间楼梯平台不远的一块L形的空地上。电话总机设在地下室。

杜鲁门抵达时看上去精神很好，有备而来。旅行中，大西洋上气候宜人，横渡海洋时航行平稳，他一点儿也没有晕船。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这次航行不再需要迂回行驶，也没有在夜间实行灯火管制，这与他在1918年横渡大西洋时很不一样，这次他拥有了海军上将的船舱。舰上有电影，还可以与罗斯、沃恩和允许同行的几位用专线电报发稿的通讯社记者玩扑克游戏。杜鲁门每天一早就在甲板上散步，并用双筒望远镜观看炮术练习。他在写给格兰德维厄的家人的信中谈道，他在船上遇到一位海员，名字叫劳伦斯·杜鲁门。“他来自肯塔基州的欧恩斯伯勒，是我们祖父的哥哥的曾孙。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有一对就像玛格丽特那样的绿色眼睛。”

但是，在海上的一周时间主要是与贝尔纳斯、李海和波伦一起工作。这三位都曾与罗斯福密切交往过，在雅尔塔时也和他在一起。李海后来说，总统整天向他们搜集实情，征求意见，波伦也为杜鲁门的“敬业”精神感受颇深，几乎连闲聊的工夫也没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来发现总统“准备之充分，令人吃惊”。

波茨坦会议上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与雅尔塔会议的那些没有什么不同：东欧（尤其是波兰）的政治前途；对德国的占领和划分；俄国协同击败日本的承诺，这是杜鲁门认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都强调苏联对日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以缩短战争日期和减少美军伤亡。麦克阿瑟将军也两次坚决认为俄国人的协助是必要的。

杜鲁门也有一项他自己的得意的建议，即要保证所有内陆水道和大运河

的自由通航，他肯定地认为，这个主意将会大大有助于保证今后世界的和平。

但是对于此次会晤以及时于迄今为止为了前所未遇到的一切麻烦和作出的一切努力来说，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许多方面则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需要逐渐了解三巨头中的其他两个（杜鲁门称他们为“俄国”先生和“英国”先生），他需要面对面地见见他们，并估量他们，而他们也需要了解和估量他。这位彻头彻尾的美国新总统最有美国人特色的是他的基本信念，即他认为，多数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造成的，一旦人们逐渐彼此了解，即使最复杂的问题也会实际上并不像被有些人说成的那样复杂。他也知道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度会晤斯大林的结果是罗斯福相信私人外交。

杜鲁门无论干什么都想获得成功。几年前，他曾向贝丝吐露心迹说，谁都不“像我那样地一心想赢”，而他的这个脾气没有改变过。他知道有备无患和做在会议讨论前的准备工作的价值——尤其是在他觉得力所不及、身处其他似乎知识十分渊博的人中间并将受到他们评判的时候。“在过去的三周中我学习和工作得比我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1918年他在芒提尼苏奥比的高级炮校时曾这样写道，该校班里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进入参议院以后，他发誓说：“我要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更精通交通问题。”

但是，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为自己天赋的口才而骄傲。有机会与别人谈话时，他觉得能获得他所需要的几乎任何东西。“你曾经被一位部长吓倒过吗？”最近他在办公室对一位来访者说，“而当你终于见到了你想要见的人时，却发现他很有人情味。”他确信如能与斯大林会面并与之打交道，他定能逐渐了解他和理解他；在这一点上，他和在他之前的许多其他人一样犯了一个大错误。

战时，丘吉尔访问华盛顿，与罗斯福见面，曾特意要会见那些知名的有影响的参议员。然而，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资历较浅的参议员并不曾在首相的名单上。所以，虽然在最近几个月里，杜鲁门和丘吉尔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当1945年7月16日星期一上午，这位人们熟悉的身材矮胖的人物抵达凯撒大街2号时，却标志着他俩的第一次见面。丘吉尔希望他对总统的拜访能成为头一份交易定单。杜鲁门指定了时间，即上午11点，丘吉尔则准时来访。

丘吉尔也在前一天下午飞抵加托，下榻在附近一座相当大的、更为诱人的湖边别墅。与他同时抵达的有艾登外交大臣，杜鲁门先前见过，常务副外交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首相的女儿兼司机玛丽·丘吉尔，她身着英国本土防卫军辅助部队低级指挥官制服，对沃恩说，她父亲10年来未曾这么早起过。

丘吉尔也没有为这一次的三巨头会议像杜鲁门那样做好任何准备。他未曾听取汇报，也没有来后的日程安排。他觉得这些他都不需要。他在比亚里茨附近度了假，作画，这就是他为波茨坦会议做准备的方式。

丘吉尔年逾七旬，他一生中的见闻和作为比除了少数人以外的任何人都多。他曾经是一位骑兵军官，驻外记者，在南非当过战俘，做过英国贸易委员会的总裁，早在1911年就是海军部长。他撰写过19本书，是作家，也是画家、丈夫、父亲，还是一名热心的节假日瓦工。有一次，他需要钱，巡回演讲仅5个月就挣得了5万美元。他出生在一个城堡里，父亲是勋爵，祖父是公爵。大家都知道，他的母亲是美国人，聪明美丽的纽约姑娘珍妮·杰罗姆。在政治方面，他开始是个保守党党员，后变为自由党党员，最后又转回

到保守党。他克服了政治上的失败和耻辱，经受住了他自己经常出现的阴郁的心情，在纽约曾被一辆汽车撞倒，险些丧命。作为整个战争期间的首相，作为英国意志的辛辣尖锐和不屈不挠的喉舌，他成了英国雄狮的化身，那些崇高的言词都出自他的口而并非捉刀人的技能，他说：“这个国家具有雄狮般的心，我有幸使其发出怒吼。”

他的怒容，人们熟悉的举起的V字型手势和凸出的雪茄烟，加上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使他超凡脱俗，显然成为当代的伟人之一。假如问及当今世界上他们最敬佩谁时，既然罗斯福去世了，大多数美国人就会说丘吉尔，而且或许在稍加思索后，杜鲁门也会这样说。然而，盼望与这样的人共享一个光圈极其令人不安。杜鲁门对于前来柏林，私下表示过十分忧虑，忧虑的背后则是极度的明显怯场——对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一起时的情景的回忆，拍照时摆开的姿势，博得人们无与伦比的关注和爱戴，一贯的信心十足，以及明显的相互尊重，使他更加惶惶不安。罗斯福和丘吉尔见过9次面，据丘吉尔计算，交换过1700次信电。首相访问白宫时，一点也不拘束，如同在家一样，罗斯福夫人因此认定该是修建一座正式的国宾馆的时候，这就是后来的布莱尔大厦（有一天早晨，在黎明前的某个时候，她发现首相穿着睡衣在大厅里踱步，他嘴里叼着雪茄，手里端着白兰地，说他还要再和罗斯福谈谈，必须立即叫醒他。这是一则人们特别喜爱的华盛顿传闻，但不知是否可信）。他和罗斯福把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看作古希腊诗人荷马的戏剧，而他们这两位扮演主角的专业演员演得尽善尽美，他们的竞技状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罗斯福对他说过：“与你处在同一个10年内很有趣。”埃莉诺·罗斯福在最近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和温斯顿和睦相处是多么重要，建议他应与温斯顿说文论书，让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引述从打油诗到希腊悲剧的一切优秀篇章。

但是，丘吉尔毕竟老了。他看上去老态龙钟，声音听起来疲乏无力和使人沮丧。他曾以如此巨大的活力所领导的帝国濒临破产，不再是个强权大国。7月5日的大选结果再过10天等军队的票数计入后才能揭晓。这次选举本来可以推迟，但有人指点说他的声望正处于顶峰，因此丘吉尔就这么干了。虽然别人相信他会获得大胜，但他私下里却表示没有把握。

丘吉尔在第一次会见杜鲁门时并不重视他，后来这成了关于杜鲁门总统职位的神话的一部分。以后在丘吉尔成了受到高度敬仰的名人的岁月里，他在总统的游艇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看法。他开始说：“我必须承认，先生，我对你很不尊敬，我不愿意你接替罗斯福的位置……。”但是事实上，杜鲁门从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谈了两个小时，而且据杜鲁门说，却没有考虑有关会议的事情；但是丘吉尔回到寓所后对他女儿说，他是多么喜欢这位新总统。玛丽·丘吉尔写信给她母亲说：“他说他肯定能与他共事。我高兴并欣喜得几乎哭了，这看起来就好像是上帝的保佑，也许这是F·D·罗斯福的遗赠。我能看得出来，爸爸的忧虑消除了，信心增强了。”

后来丘吉尔的朋友兼医生洛德·莫兰问他杜鲁门是否有能力，丘吉尔回答说他认为有。他说：“杜鲁门无论如何是个极有决心的人，他不理会地面的脆弱，只顾把他的脚用力地往下踩站在那里。”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丘吉尔从木质地板上稍稍跳起来，然后让他的两只赤脚啪地一声落下来。

然而，根据当天结束后杜鲁门在日记中的记载，他对丘吉尔的印象并不

那么好。如同白宫的管家阿朗索·菲尔兹在评论贝丝时所表明的那样，对杜鲁门夫妇的阿谀之词并不多。

我们进行了一次极愉快的谈话（杜鲁门指与丘吉尔）。他是一个极富魅力和非常聪明的人——聪明一词的意思是在英语而不是肯塔基意义上说的。他对我讲了许多，关于我的国家多么伟大，他多么热爱罗斯福和他打算多么爱我等等的废话。好吧……我肯定，如果他并不力图给我太多奉承的话，我们会相处好的。

斯大林此时哪儿也没有露面。他在哪儿，为什么没有来，均不得而知，但开会的日期只好推后一天。

在杜鲁门已离开华盛顿期间，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奉东京之命，开始与苏联人接触，探讨停战的可能性。7月12日，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给佐藤大使发去一封“紧急绝密”无线电报，称天皇“为各交战国臣民所遭受的日益严重的灾难和牺牲而忧虑重重。陛下衷心希望看到战争的迅速结束。陛下想要派近卫皇太子作为特使亲赴莫斯科谈判”。

佐藤回电说，与苏联人谈论和平是没有意义的。他强调说这一建议的谈判是完全不现实的。莫洛托夫不感兴趣。佐藤直言不讳地告诉东乡：“归根到底，如果我们真的希望结束战争，我们没有挑选的余地，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或与之十分接近的条件。”

这份电报被美国监测系统截获（早在几年前，日本的密码就被破译了），立刻送给了杜鲁门。而重要的是，东京也再三警告佐藤说日本不会同意接受无条件投降。

总统还从联合情报委员会得到一份报告，警告说，日本可能试图就用这些和平建议在同盟国中间制造不和。而即使没有这样的警告，对杜鲁门来说，如同对其他试图评估形势的人一样，也还有着对1941年12月日本正是在袭击珍珠港时在华盛顿进行和平谈判的惨痛记忆。

16日下午杜鲁门的日程安排上有空缺，他决定参观柏林。车队集合在凯撒大街2号门外的车道上，10分钟后，杜鲁门由贝尔纳斯和李海陪同，坐进了敞篷林肯车的后座，车队沿着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迅速行驶。天气闷热，有风吹来，就觉得舒服多了。

在去该城市的半途，他们遇到了部署在公路一边等候他检阅的美国第二装甲师，谢尔曼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分成两行排列着，一眼望不到头。车队停下，杜鲁门从车上走了下来。有人向他介绍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装甲师，也是他在此之前仅只可能想象过的展示军威的壮观场面。他登上了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乘车检阅着编队，他站在车上，车子缓慢地沿着一排士兵和装备行驶了20分钟，足有一英里半长——“好的士兵加上几百万美元的装备，足够支付到柏林去的费用了。”他当时这样想。

车队继续前行，前面好几英里路满目疮痍，到处是弹坑，烧焦的断垣残壁，和似乎望不到头的无家可归的德国人行列。他们大捆小包地肩扛手提着那点可怜的个人用品，在公路两侧蹒跚而行，他们中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儿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目的地往前走着，表情茫然，目光呆滞，没有愤怒，没有悲伤，也没有恐惧，这一情景使总统极不好受。上次战争结束后，当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来到巴黎时，热情洋溢的人群把他当作英雄和救世主一样向他欢呼。而眼前这些步履艰难的跋涉者们当中的多数人对他的到来却无动于衷，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来看一眼。

柏林，曾经是世界第4大城市和延续了上千年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在市中心，或者说是以前的柏林市中心，小小的总统车队驶进了著名的老街区——俾斯麦大街，柏林大道和林登中街，这里一度人人称颂的椴树已不复存在。俄国人已经用推土机扫清了一些主要的通衢大道。所有街道两旁的破砖碎瓦，在遭到炸弹损毁的没有了窗户和屋顶的建筑物残骸之间聚积起了二三层楼房高的大堆。所有的东西都被煤烟弄黑了，在难以忍受的暑热中，尸体和敞开着的污水管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几乎令人难以忍受。

英美轰炸机曾昼夜不停地蹂躏这座城市，大约5万人在空袭中死于非命，5倍于德国闪电式空袭伦敦时的死亡人数。接着在4月间，俄国的大炮和军队开了进来。

在威廉大街，杜鲁门的车子在帝国总理府和被炮火毁坏的石头阳台旁停了下来，希特勒曾经在这里向他的纳粹追随者们发表高谈阔论的演说。杜鲁门没有走下车子，“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开始说，他知道人们期望他说些什么，“但是他们自作自受。这就是当一个人弄巧成拙时所发生的情况。”这就是全部他感到所能说的话。

他看到了勃兰登堡门和该城市昔日漂亮的中心公园——动物园的残骸。1939年，希特勒为庆贺自己的50岁生日，在这里检阅了军队和坦克方阵，两百万柏林人向他欢呼。

车队继续缓缓前行，弯曲绕过体育宫的废墟，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向聚集在这里的众多的人群发问，他们是不是德国人民“最后全胜”的真正信徒，人们高呼“元首万岁”，“我们追随领袖和统帅”；接着车队经过国会大厦，1933年，纳粹在这里放了一把火，然后嫁祸于共产党人，这给了希特勒夺取独裁政权所需要的借口。

来这里访问的美国人，尽管事先阅读过一些材料，听说了一些情况，也看过一些照片和新闻记录片，但面对被征服的柏林的现实，他们还是没有做好准备。“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破坏。”杜鲁门这样写道，他曾在1918年目睹过一些那样的事情，这是“绝对的毁灭”。李海海军上将的军事生涯是从1898年搭乘古老的“俄勒冈”号绕过合恩角去古巴的那次著名的航行开始的，对他来说，这是一场违反战争的文明规律的灾难。在当晚一次气氛压抑的宴会上，他们小声谈论着现代战争可怕的破坏性，如李海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那些从华盛顿来打这场战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杜鲁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情绪一直很低落。

我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阿特兰蒂斯、北京……西庇阿、拉美西斯二世……谢尔曼、成吉思汗（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有某种形式的和平——但是，我担心机器的发展比道德超过了几个世纪，而等到道德赶上来时，就没有理由再要任何这种形式的和平了。

被蹂躏的人们在瓦砾堆里彷徨的情景在他的脑海里久久萦绕。但是，他们自作自受，这对他们是适当的，他在给贝丝的信中说。

那天下午，丘吉尔也自己巡视了柏林，他用了半小时的时间视察了帝国总理府，希特勒的地堡遗址。（“假如他们赢了这场战争，眼前这一切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人听见丘吉尔这样说，“我们就会陷入困境。”）丘吉尔说，杜鲁门不愿意在这些废墟上走动，因为他决不想使那些不幸的人以

为他在幸灾乐祸地冷眼看着他们。

来柏林采访会议的记者们被拒绝参与所有重要的事务，不让接近与会者甚或出入代表团在巴伯尔斯贝格的住地，他们只能获得查利·罗斯偶而提供的新闻稿，因而他们常常不得不小题大做。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为《纽约时报》一专栏撰稿，她推测道，神秘的约瑟夫·斯大林肯定在同一天下午也到达了柏林某地，但不让人知道他的出现。她写道，很难想象这位苏联大元帅不想巡视这座被征服的城市，她又描述了这三个人在尘土飞扬的残骸中到处高视阔步地走动。

我们时代的这场戏剧中有些时刻似乎是集中在一个单个的场景中的。波茨坦会议就是其中的一个时刻。在所发生的事情被琢磨成像这样的一幅画面以前，我们很难领会它的意义。那幅画的画面上有三个人走在一个坟场中，他们是手中掌握着当今世界上大部分权力的人……

然而，与7月16日星期一同一天下午出现的事情相比，柏林的毁坏程度要小得多。当时社鲁门不知道，他们谁也不知道，那天凌晨5点29分（柏林时间下午1点29分），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地段发出了一道令人目眩的闪光，“一道不是这个世界的光线”，历史上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史汀生于当天晚上7点半在巴伯尔斯贝格他的住处收到了这个消息，即华盛顿的乔治·哈里森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他把电报直接送给了杜鲁门。

电报称：“今晨施行手术，诊断尚未完成，但结果似乎令人满意，已超过预期的效果。”详情后报。

2

“12点只差几分钟时，我从办公桌抬起头，看到斯大林站在门口。”总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7月17日星期二的中午，阳光透过杜鲁门身后高大的窗户，照进了房间。大理石装修的小壁炉上方挂着一幅由镀金材料镶框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式的水果和死鸭的静物画。他的办公桌摆放在对着门的一角，地上铺着一块很大的东方地毯，这张雕刻精细的桌子极大，桌腿带有4只大爪。陪同大元帅来访的有莫洛托夫和译员帕夫洛夫。

斯大林是前一天晚上到的，住在波茨坦附近一片浓密的森林深处。但有关他的到达时间以及从克里姆林宫乘火车行程1000英里等情况全部对外保密。有人说他迟到是因公务缠身，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着重显示自己的重要性。

假使社鲁门是在外面等候斯大林的到来，他就会看到12名带有重武器的俄国卫兵从不知道的地方突然出现并包围了楼房，接着几分钟后，一辆长长的封闭的美国派克汽车出现了，厚厚的防弹玻璃使人只能看到车里模糊的身影。斯大林走出车外，哈里·沃恩像一名扶轮社社员那样，跳着跑下楼房正面的台阶去迎接他的到来，乔治·埃尔西回忆说。黄色楼房外面的俄国卫兵有点不知所措。

“我站起身来，走上前去迎接他，”杜鲁门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微笑着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我们握手，随后我同莫洛托夫和译员打了招

呼……”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利——斯大林，是世界上唯一最具权威的“钢铁巨人”。他是拥有 1.8 亿人口、170 个民族、占据地球表面 1/6 的国家的绝对统治者，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的最高统帅，而杜鲁门与几乎每一个同他初次见面的人一样惊讶地发现，他是如此的矮小。“有一点儿小个子的味道。”杜鲁门这样形容他，斯大林身高大约 5 英尺 5 英寸。

他朴素地穿着轻便的卡其布制服，配有红色肩章，红色线缝一直延伸到裤角，左胸前口袋上佩带着一枚系着红色缎带的金星，这是苏联英雄奖章，这赋予他一种表达得比较克制的权威，除此之外，别无他饰。他的一双灰黄色小眯缝眼有点儿怪，他的小胡子和粗发中有些已呈灰白色。他脸上麻点密布，脸色不好——他有着在苏联高层人物圈于中被称为的“克里姆林宫肤色”，是一种久居室内的不健康的苍白，再加上他最近生过病，因而更差——他的很不整齐的牙齿被烟草熏染得颜色变深。有人告诉杜鲁门，他的左胳膊有残疾，但看不太明显，是儿时的一次事故造成的。斯大林烟抽得很凶，一支接着一支，而且烟卷儿总是夹在右手指间，也只用右手做手势。他有一双异常大的、看上去很有威力的手手硬，心肠也硬，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说过。

站在旁边为杜鲁门做翻译的波伦，觉得斯大林与仅几周前在莫斯科接见他和霍普金斯时相比，老了许多。斯大林行动迟缓、僵硬、说话不多、声调很低。在杜鲁门看来，他似乎是一位老人，而他们的实际年龄相差不到 5 岁。斯大林 1879 年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赤贫家庭。他的父亲是鞋匠，上过几年学，爱酗酒，母亲是个老糊涂的在家承接活计的洗衣工。在成为革命者以前，他最初是学做教士的。

杜鲁门穿着新烫平的双排扣灰色西服和双色夏令鞋，对比之下，看上去精神焕发。

他们坐进柔软舒适的椅子，两旁坐着贝尔纳斯，莫洛托夫，波伦和帕夫洛夫。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他对他们之间的会见期待已久。斯大林庄重地同意说这样的个人联系十分重要。贝尔纳斯为缓和气氛，问及斯大林有关他晚睡的习惯。斯大林说只是战争改变了他的许多习惯。杜鲁门试着随便一些，提及罗斯福曾以绰号称斯大林为“约瑟夫大叔”，但是对这位缺乏幽默感的俄国人，这也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杜鲁门说，他希望与斯大林以朋友相待。他又继续说他不是外交家，不愿意旁敲侧击，在听取各方对问题的看法后，他通常表示同意或不赞成。到这时，斯大林脸上才显出一点儿悦色来。

他们简要地谈论着打败德国的事情。斯大林说，他肯定希特勒还活着，正躲在西班牙或阿根廷某地。然后，他突然完全主动地说，按照他们在雅尔塔所商定的，苏联人准备在 8 月中旬对日本宣战并进攻满洲。他已向中国人作出保证，苏联承认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不会干涉那里的内部政治问题。

杜鲁门说，他感到特别高兴。但是斯大林好像要确保杜鲁门听懂他的话，又重复说，到 8 月中旬，“按照在雅尔塔所商定的”，红军将同日本交战，对此，杜鲁门表示，他对苏联人遵守诺言充满信心。

这时，哈里·沃恩溜进了房间，在杜鲁门的耳边悄声问他要不要请“这些家伙”共进午餐。

杜鲁门低声问准备了什么饭菜？肝和熏肉，沃恩答道。“如果肝和熏肉对我们来说是够好的话，那么对他们也一样。”杜鲁门回答说。

当他邀请斯大林留下用餐时，斯大林谢绝了，说这不可能。杜鲁门说：“你想留下就能留下。”结果，斯大林留下了——吃了奶油菠菜汤、肝和熏肉、火腿、肉汁土豆菜丝汤、菜豆、裸麦粗面包、果酱、水果片、薄荷糖、糖果、雪茄和一种加利福尼亚葡萄酒，斯大林没有抽雪茄，但特意夸了葡萄酒好。

杜鲁门认为整个午宴进行得很好，这正是由于宴会是因一时高兴而举行的，也很随便。他决意喜欢斯大林了，“我们有可能达成一项符合世界和我们要求的协议，对此我感到是有希望的。”

斯大林几乎总能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丘吉尔一度把俄国叫作“难解的谜中之谜”，他再三提醒罗斯福和杜鲁门要警惕俄国对欧洲的威胁，但他仍然承认喜欢斯大林这个人。罗斯福终于几乎相信他能与“约瑟夫大叔”相处融洽。在回忆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的行为时，吉米·贝尔纳斯写道：“其实他很讨人喜欢。”约瑟夫·E·戴维斯曾短期任驻俄大使，波茨坦会议期间，他天天和杜鲁门坐在一起参加会议，曾在1941年出版的一本内容粗浅却很畅销的书《赴莫斯科的使命》里，称斯大林极其聪明和和善。“小孩喜欢依偎在他的怀里，小狗也侧身挨近他。”戴维斯写道。甚至艾森豪威尔在那年夏天稍后访问莫斯科后，也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描绘斯大林是“父亲般的慈祥 and 宽厚”。

杜鲁门写道，他发现斯大林温文尔雅，笃厚务实，“诚实，但机敏过人”。他们之间一点也没有争论的迹象。甚至在会议尚未开始时，杜鲁门就已经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他欣喜异常地在日记中写道：“他将在8月15日参加对日作战，那事发生时，日本人就完蛋了……我能对付斯大林。”

斯大林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他情绪不稳定，多疑，欺诈，无法形容的残忍，他用恐怖手段和秘密警察实行独裁统治，他对摧残数以百万计的本国人民和奴役更多的人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一切当时外部世界了解得不如后来那么清楚。虽然这样，但是这个人的罪恶在1945年时还是不再成为什么秘密了。雅尔塔会议前夕出版的二月份《时代》周刊评论说，斯大林及其政权蓄意造成至少300万农民死于饥饿，另外清洗掉了100万反对他政策的共产党人。文章说，借用列宁的话说，事实胜于雄辩，而这些便是事实。其实事情的真相更加可怕。大概500万农民丧失了生命；约1000万人被赶到强迫劳改集中营去。“我追忆着我的朋友们，”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曾说，“我所看到的全是尸首，堆积如山的尸首。”

1942年，斯大林本人曾告诉丘吉尔。“1000万”农民被“处理掉了”。1940年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期间的某一个时候，他杀害了数千名波兰军官，这就是有名的卡腾森林大屠杀。事实上，“约瑟夫大叔”是空前的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之一，与恐怖的伊万雷帝（他崇尚的沙皇）没有什么两样，阿道夫·希特勒也不过如此而已。

然而，波伦写道：“在外国人面前斯大林的行为举止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关于他这个人的真实本性和性格的线索。”斯大林是伪装的天才：

1945年春季，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我和霍普金斯与他在一起的10天里，斯大林的行为堪称楷模。他耐心、认真听别人讲话，举止表情总是很平静，在

这副面具后面丝毫看不出凶恶残忍的迹象。

这副面具是成功演员的手段，难得取掉。在德黑兰，有一次丘吉尔争论说，在法国过早的开辟第二战场会导致成千上万盟军士兵无故丧命。斯大林附和说：“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变成统计数字了。”

20年的从政使他学会了怎样看人，杜鲁门想。他只需要看一个人的眼神就可以了解他。在回忆与斯大林的初次见面时，他写道：“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他的双眼、他的面孔和他的表情。…”

午宴结束了，会议要在下午5点才开幕。杜鲁门走上楼梯，到他“梦魇”的房屋里午睡去了。

3

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全会，也是战时三巨头的最后一次代号为“终点站”的会议，在波茨坦塞西林宫举行，这里过去是普鲁士威廉王储的夏宫，不久前先被德国人后又被俄国人用作一所军人医院。这座爬满长春藤的形状不规则的两层楼石头建筑物属于新都锋风格，样子很像庞大的英国乡间别墅，有花园和内院，花园一直延伸到湖边，内院里，俄国人在一个巨大的星形花坛里种植了红色的天竺葵。

用橡木板装修起来的洞穴状的接待大厅被用作会议室，室内靠几盏笨重的锻铁枝形吊灯照明，光线昏暗。房间色彩的组合是深红色、黑色和金黄色，效果可想而知，所幸有一扇两层楼高的巨型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花园和湖光水色。

房间中央有一张直径12英尺的圆形会议桌，桌上铺着像法国东南部勃艮第葡萄酒的颜色一样的红台布，桌子周围均匀地摆放着15把椅子，3个国家每一国5把。专为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准备的3把椅子一下子就能被人辨认出来，因为它们比较大，椅背上都坐着一对不协调的镀金的丘比特像。会议桌后面另摆了一大圈椅子和几张桌子，供各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们使用，他们只是在讨论到各自的专题时才到场。

3位领导人都从各自单独的门进入会场，每个入口均有俄国土兵严密把守。全体入席后，卫兵撤出，门也关上了。

杜鲁门虽然仍穿着早先穿的那套灰色西服，但是换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衣和蝴蝶结领结。丘吉尔和斯大林都穿夏季薄卡其布制服。丘吉尔在大家入座时点燃了一支8英寸长的雪茄。斯大林提着一个公文包，他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好像在说，他已准备好了。

杜鲁门的右边坐着贝尔纳斯和李海，左边坐着波伦和戴维斯。丘吉尔的班子里现在有克莱门特·艾德礼，此人是丘吉尔在大选中的工党对手，首相从国家利益考虑，决定让他参加会议，以备艾德礼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

《纽约时报》评论说：“历史上从没有过一次会议像这次一样代表着胜利一方的总体军事力量，从没有过一次会议面临着如此严重和更加复杂的问题，也从没有过这样三个人世间的人为各自的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幸福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

然而，《时代》周刊的记者不在现场，来到柏林进行采访的近200名其他记者也不在场，因而如丘吉尔所说，他们“怒气冲冲”。为了在波茨坦“不

走漏消息”，如斯大林坚决主张的那样，“每一件事都是在一圈刺刀的后面进行的”。甚至在任何一个时候被允许进入会场的审定人员的数量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次，当贝尔纳斯的秘书给他送去一些文件而又不得不等候几分钟时，两名俄国女工作人员立即走进去坐下，直到她离开为止。

会议在下午 5 点 10 分正式宣布开始，斯大林首先致辞，他说杜鲁门总统作为在场的唯一的国家元首，理应主持会议。丘吉尔附议。杜鲁门表示谢意，然后，如同在国会第一次演讲一样，他直接投入他事先准备好的讲话，迅速宣读了他认为本次会议应该遵循的逐项议事程序。他建议成立一个外长委员会，为召开一次和平会议做必要的准备。斯大林立即表示犹豫不决，询问解决欧洲和平问题为何要中国参加。杜鲁门提出一份对德国如何实行管制的草案。丘吉尔说他还没有机会来审阅它。杜鲁门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关于执行雅尔塔宣言的声明，在该宣言里，3 大国保证协助所有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政府。他不失时机地接触到最棘手的话题。“雅尔塔会议以来，”他读道，“宣言中所担负的义务没有得到执行。”引起特别关注的国家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丘吉尔再次说他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一文件。

杜鲁门读得很快，要求改变对意大利的政策。必须尽快让意大利加入联合国。这时，丘吉尔表示反对，并且为了证明论点他乞灵于对罗斯福的回忆。丘吉尔说，他们讨论的重大问题太多未免过于仓促。他提醒杜鲁门，法国垮台时，意大利袭击过英国，罗斯福本人把此举称作“暗箭伤人”。在美军开到前，英国人已同意意大利人在非洲打了两年仗。

杜鲁门停顿了一下，好像仅仅是因为提到了罗斯福才唐突地打断了他的话。

现在他读得慢多了。他说他感谢让他担任会议主席的荣幸。他说他是带着某种惶恐的心情来参加会议的。他不得不接替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无法替代的。为了他本人，也为了美国，他完全理解罗斯福与首相和大元帅之间所获得的亲善关系和友谊，而他，杜鲁门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可以够得上同样的亲善关系和友谊。这段话简单明了，本该作为开场白，当丘吉尔以其令人作呕的丘吉尔方式回答时，场上的气氛立刻改变了。丘吉尔的话虽无正式的逐字记载，但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卢埃林·汤普森和贝尔纳斯的工作人员本·科恩都做了记录：

丘吉尔（汤普森笔录）说，他想代表英国代表团感谢总统接受本次重要会议主席的职务，感谢他明白无误地阐述了以他为首的强大共和国的观点。他们对罗斯福总统的难以磨灭的热烈情感，将会在这一历史时刻出现的人身上继续下去，而且他愿意向他表达极诚挚的敬意。他相信，不仅是他们两国之间的而且还有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增进。他们千方百计解决的世界性重大问题越多，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会越紧密。

斯大林说，他希望代表俄国代表团说，他们和首相“具有完全同样”的心情。

会上盛行的方式为：丘吉尔声音低沉，滔滔不绝，斯大林和杜鲁门一样，直截了当，简明扼要。

轮到斯大林讲话了，他声音很低，语句很短，因而句间停顿的时间很长，

好像一个习惯于和译员一起工作的人那样。他希望讨论德国海军（当时在英国手中）的分配、德国的赔偿、苏联的托管权（他指的是殖民地）问题，弗朗哥西班牙的未来和波兰的前途。

丘吉尔同意波兰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又说下一轮会议日程应留给外长们（艾登、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去决定。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同意了。

“这样，明天他们将为我们准备好一些最称心的意见了。”丘吉尔说。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回避不了不称心的问题。”斯大林回答道。

“我们会谨慎行事来解决它们的。”丘吉尔说着，已做好结束一天会议

的准备。

斯大林再次转向吸收中国参加和平会议预备工作的问题。丘吉尔认为，吸收中国进来会产生不必要的复杂情况。斯大林建议将这一问题提交外长们去讨论，他也玩起了丘吉尔的把戏。杜鲁门说，如果外长们决定不让中国参加，他不予反对。

“既然所有问题都由外长们去讨论，我们就无事可做了。”斯大林评论说，引起了与会者们的第一次笑声。

丘吉尔认为，外长们应为每天的讨论提出三四个议题，“足够使我们忙才行”。

杜鲁门忍不住了。这根本不是他此行的目的。他说：“我不愿只是讨论，我要作出决定。”

“你每天都想有所收获。”丘吉尔回答道，就好像他现在刚开始理解这位美国新总统似的。

是的，而且下次会议他希望早点开始，杜鲁门说。

“我遵守您的命令。”丘吉尔答道，斯大林立即插话，目光落到丘吉尔身上。

“首相，今天你这样服从命令，我想知道你是否将与我们平分德国舰队？”

这支舰队要么分掉，要么摧毁，丘吉尔大声说。战争武器是可怕的东西。

“让我们分吧，”斯大林说，“如果丘吉尔先生愿意的话，他可以沉掉他所分到的船只。”外务大臣认为首相的表现是可悲的。艾登注意到首相讲话“嘶哑罗嗦”，太受斯大林的迷惑，他将此意告诉了别人，使杜鲁门感到生气，认为这是对丘吉尔的不忠行为。亚历山大·卡多根在给妻子的信中说，首相话太多，而杜鲁门却很务实，令人钦佩。杜鲁门在给贝丝的信里写道，这使主持参议院的工作显得比较顺利，他明显对自己和对他的随行人员的评价感到高兴。

伙计们说我能倾听他们的意见，我希望这样。李海海军上将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卓有成效的工作，贝尔纳斯和我的同事们显得洋洋得意。我非常担心，因为我不知道事情会不会按照规则地发展。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有了开端，我已达到我此行的目的——斯大林 8 月 15 日参战，没有附加条件……我敢说，我们将提前一年结束战争，想想孩子们不用去送命了！这是重要的事情……

但愿你和马吉能来这里。但这是一个只会使你们难过的悲惨地方。

信是 7 月 18 日一早写的。在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他说：“丘吉尔总是喋喋不休，而斯大林只是咕哝着什么，但你能明白他的意思。”自他离开华

盛顿后，妈妈和玛丽·简已给他写过6封信，他要在整个会议期间，与她们保持通信联系。这天早晨，他有消息告诉她们，他知道她们喜欢听到这类消息。维维安的大儿子，陆军中士哈里·杜鲁门与他共进早餐。

他在格拉斯哥港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准备回纽约。我告诉他们让他在来看一下会议或者回去之间作出选择。他选择了来看我。我给了他一个由斯大林和我签发的到柏林的通行证。他将乘飞机回去，这样到家的日期将与他乘“伊丽莎白”号几乎是一样的。他无疑是个英俊的战士，站立挺拔，着装得体，我为他感到自豪。

大约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亨利·史汀生走进来，显得极为激动，他收到了乔治·哈里森夜间发来的第二封电报：

医生返回，心情振奋，信心百倍，小男孩与他的大哥一样强壮。他的眼神能从这里看到海霍尔，他的尖叫声能从这里传到我的农场。

陆军机要中心的译电员惊愕了，还以为这位年迈的陆军部长又做了一次父亲。史汀生向杜鲁门解释电报的意思。阿拉莫戈多的闪光在250英里以外都看得见（华盛顿到海霍尔的距离，海霍尔是史汀生在长岛上的庄园），声音传出去50英里（到哈里森在弗吉尼亚州的农场的距离）。杜鲁门显得格外高兴，在灵斯大街23号丘吉尔的住处吃午饭时，他给他看了这两封电报。杜鲁门说，应该告诉斯大林。丘吉尔同意告诉斯大林“这一伟大的新情况”，但不告诉他“细节”。丘吉尔建议，早告诉他比晚告诉他好。但如何通知他？书面还是口头？通过一次特别会议还是非正式通知？

杜鲁门认为，最好是在开完一次会议后告诉他。杜鲁门说他将会相机行事。

他们俩人单独在一起就餐。丘吉尔哀叹大不列颠的令人忧郁的状况，债台高筑，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小。杜鲁门说，美国欠了英国许多，因为英国在战争开始时“坚守堡垒”。“如果你们像法国一样沦陷了，”杜鲁门告诉丘吉尔，“我们现在就可能正在美国沿海打德国人呢。”

他们谈到了太平洋战争，丘吉尔考虑是否可以想个新的措辞，以使日本人既投降又能给他们军队留些面子。杜鲁门回答道，他认为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人在军事上无信誉可言。丘吉尔说：“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要面子的，为此他们准备面对大批人的死亡，这时我们可能不那么重要，而对他们却很重要。”丘吉尔讲到这一点时，杜鲁门也变得“非常同情”，并开始谈及“关于他对美国人无休止的流血所承担的严重责任”。

“他使大家产生了个人友谊和朋友的忠诚，”丘吉尔写道，“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午饭后，杜鲁门由贝尔纳斯和波伦陪同对斯大林进行回访，使他吃惊的是，第二次午宴又在等着他，专为他准备了精美的饭菜，按俄国人的方式要无数次地举杯敬酒。

斯大林告诉杜鲁门日本人秘密施展的和平试探手段，并从桌上递给他佐藤的信件。斯大林说，最好“哄日本人去睡大觉”，说他们要求让皇太子近卫访问一事太不明确，无法回复。杜鲁门没有说什么表明他已知道日本的主动表示一事。他说，他要把这件事留给斯大林去答复。

波伦回忆道，斯大林透露的日本建议给杜鲁门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那是俄国人可能终究要准备与他们公开交往的一个信号。杜鲁门还欣喜地发现，斯大林这位最高的苏维埃强人，在他的杯子里用白葡萄酒代替了原来料想的伏特加。杜鲁门说，大元帅应该访问美国，他允诺说，如斯大林来访，他将派“密苏里”号战舰去接他。

他说他想在和平时期与美国合作，就像在战时合作过的那样，但这会很困难(杜鲁门事后记录道)。他说美国严重地误解了他，俄国也误解了我。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国家弥补这种局面，我要尽我所能在自己国内去做。他对我报以极真诚的微笑，并说他也要在俄国尽力而为。

下午，会议继续进行，丘吉尔又是口若悬河、没完没了地说，从表面上看，会议仍在友好地进行，但也能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斯大林在与杜鲁门交谈中，他用一句话击中了涉及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几乎所有问题的困难现实，即今后那么多挫折与不和的症结：

“我们不能逃避战争的结果。”斯大林说。

正式的议题是德国，杜鲁门建议立即讨论这一问题。丘吉尔坚持要给德国下一个定义。如果德国的含义是战前地理意义上构成的德国，他就同意讨论——他明显意思是，目前德国的东部边界是红军占领后确定下来的。

斯大林：德国是战后所变成的德国。不存在另外一个德国……

杜鲁门：干吗不说是 1937 年的德国？

斯大林：减去德国失去的土地。我们暂且把德国看作是地理学上的一部分。

杜鲁门：而什么是地理学上的一部分呢？

斯大林：我们不能逃避战争的结果。

杜鲁门：但我们必须有一个起点。

斯大林同意了。丘吉尔同意了。“这样，大家都同意以 1937 年的德国为起点。”杜鲁门说，好像他们取得了一大进展那样。

他们转而讨论波兰问题，丘吉尔对这一题目谈得甚至比往常更长，花费了这次会议所余下的全部时间。

杜鲁门感到恼怒了。他说他可以“对付”斯大林，但丘吉尔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不准备在整个夏天都待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听人连篇累牍地讲话。”当天夜里他写道。白天早些时候他就对贝丝说过，斯大林同意联合打败日本是他此行的目的。这一天结束时，他几乎失去了耐心，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相信小日本在俄国到来之前就会垮台了。当曼哈顿(S—1 曼哈顿计划)出现在他们国土上空时，我肯定他们会这样的。”

在次日的第三次会议上，各方唇枪舌剑，争论激烈，杜鲁门尤为突出。当再次提出德国海军问题时，他说他同意三国平分舰队，但只能在日本投降后进行。商船是特别需要的。“我们需要每一颗炸弹和每一吨食物。”佛朗哥西班牙的未来是个令斯大林头疼的问题，杜鲁门说他不喜欢佛朗哥，也决不希望介入西班牙的另一场内战。“在欧洲，仗打得够多的了。”当雅尔塔宣言问题提出来时，斯大林坚持此类事情放到以后再讨论。

杜鲁门对几乎任何事情的进展都缺乏耐心。他想家，“对会议这整个事

情厌烦了。”他向贝丝吐露真情说。

只有这天晚上杜鲁门举行的聚会才挽救了这一天。他在凯撒大街2号设宴款待丘吉尔和斯大林，席间有美国27岁的钢琴家萨金特·尤金·利斯特和他的搭档、民间一流小提琴手斯图尔特·坎宁演奏乐曲。斯大林陶醉在音乐里。对在场的美国人来说，这永远是会议期间最值得回忆的一个晚上。

两位身着演出服的音乐家应杜鲁门的要求从巴黎乘飞机来到这里。豪华的大钢琴摆放到后门廊里，从那里可以俯瞰波光粼粼的湖水。进餐后所有的来宾在夏夜徘徊不去的暮色中都聚集到那里。有一会儿杜鲁门本人演奏了帕岱莱夫斯基的《G大调小步舞曲》，早在45年前，帕岱莱夫斯基在堪萨斯城为他表演过这支曲子。但最精彩的场面还是利斯特演奏的肖邦的《A小调圆舞曲第42号作品》，这是杜鲁门特意要求的。利斯特原先不知道这段曲子，也未曾有过时间学会它。后来，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当时他要求在场的人中是否有人能为他翻一下乐谱时所发生的情况：

一位年轻的海军上校朝着钢琴走了过来，咕哝着说他不识乐谱，但在需要翻页时，我如能给个示意，他可以试一试。于是……总统大大地一挥手让他站到一边，并自愿亲自承担这项工作。试着想象一下吧！天哪，简直使我不知所措了！感谢上帝，尽管整个气氛激动人心，总统出人意料地充任为乐谱翻页的角色，我仍能出色地演奏完这首圆舞曲，即使并不那么引起轰动。想象一下美国总统在为你翻乐谱……但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杜鲁门很高兴看到斯大林显然过得很快活。“这位老人喜欢音乐，”他告诉贝丝，“我们的年轻人演奏得很精彩。”

到20号星期五，一周将近过去，仍没有在新墨西哥州爆炸试验的进一步的消息。但是，当杜鲁门邀请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共进午餐时，据布莱德雷后来的叙述，话题却集中在太平洋战略和原子弹的使用问题上。

布莱德雷是密苏里州人，在这之前从未见过杜鲁门，他喜欢所看到的一切。“他直截了当，不装模作样，思路敏捷，有说服力。”布莱德雷感到，似乎杜鲁门早已下定决心要使用这种新式武器。杜鲁门从未征求过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但艾森豪威尔说他反对使用原子弹。他认为日本已经被扫垮了。早些时候，史汀生也表示过，希望美国不首先部署如此可怕的武器。然而，艾森豪威尔最后承认他的反应只是个人的，没有对此问题经过分析的根据。

艾森豪威尔还劝杜鲁门不要去求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虽然他承认“世界上还没有什么力量能把红军阻止在这场战争之外，除非他们未及参战胜利就来到了”。

杜鲁门的日记里有这层意思，即假如他真相信“曼哈顿”能一下子就带来这样的胜利，他这么说也许正是时候，但当时他没讲，这表明要么当时他对原子弹还没有足够的把握，要么与布莱德雷的印象相反，他尚未下定决心。

“但是，我们大家都想让俄国参战。”几年后他对女儿说，“假如事先我们知道原子弹的威力，我们就决不会让这头熊出头露面的。”

午饭后，杜鲁门由这两位将军陪同再访柏林，这次是到美军防区参加升旗仪式并发表讲话，这是珍珠港遭突袭的那天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的

那面旗子。仪式在一个鹅卵石铺成的小广场上举行。那天阳光灿烂，史汀生和巴顿将军都在场，巴顿身材魁梧，富于戏剧性，他显赫地脚登带扣的马靴，身穿马裤，头戴精制的四星头盔，从头到脚，绚丽夺目。他肩膀和袖子上缀满了金星，杜鲁门还没有见过谁身上佩带这么多的金星。他数了数，共 28 颗。

杜鲁门情绪激昂地做了即席讲话，没有讲稿，他用词谨慎，站着讲话时，两肩耸起，大拇指勾在双排扣西装的侧兜里，非军人的西方样式的斯特森牌帽子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讲话具有他本人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他在联合国的演讲——也是三巨头到德国以来其中任何一个人的首次公开表态：

我们今天在这里，在我们最大的敌人的首都上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代表美国人民把它升起来的，美国人民正在盼望着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人民都有机会享有人生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只有少数上层人物才享有。

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在为和平而战斗，为人类的幸福而战斗。我们不是为征服而战斗。我们从这场战争中，不要一块领土，不要金钱之类的东西。

我们要的是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这时，他的拇指离开了上衣口袋，腾出手来，在他强调“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这几个字时，用人们熟悉的手势，按照它们的节奏在空中一下一下地猛劈着。）我们想要看到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即在战争时期能做到的事情在和平时期也能做到。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部取得这次胜利的庞大机器为和平事业而转动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展望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情。

这些话不是亚伯拉罕·林肯说过的，也不是罗伯特·舍伍德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写成的，但却感人至深，甚至打动了强硬的记者和老兵们。《纽约时报》的雷蒙德·丹尼尔写道：“这是多么自然地表达出来的一成不变的爱国之情啊，杜鲁门总统的简单朴实的信仰宣言将柏林的这一天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一信仰将几百万美国男子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为他们极少有人所能表达的信念而打仗。”人们没有预料到，杜鲁门把这一时刻变成了“对我们在场所有人的持久鞭策，”卢修斯·D·克莱将军记录道。“军人受过不感情用事的训练，”克莱在数年后写道，“而我却始终忘不了那次简短的升旗仪式。”

乘车回来的路上，杜鲁门的心情很好。他转过身去突然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没有什么您可能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会设法帮您得到的。尤其明确的是这包括 1948 年的总统职位。”

布莱德雷记得他竭力忍住了笑。艾森豪威尔一脸的惊愕，他答道：“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在下届选举中成为您的对手，但这个人不可能是我。”

那天夜里，杜鲁门在记录当天的会议情况时，只说了：“约瑟夫大叔今天看上去疲惫不堪，脸都拉长了，首相显得不知所措。”主要议题是意大利。没有什么进展。

7 月 21 日星期六接近中午时，史汀生收到了由特别信使送来的急等看的格罗夫斯将军的报告，报告里首次描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情景，史汀生称之为“一份极有份量的文件”。午后不久，他和马歇尔将军共同阅读了这份报告，3 点 30 分，史汀生将它呈送给总统。贝尔纳斯被召唤进去，关上了门。史汀生开始用他那老人的刮擦声音大声朗读报告。

试验是“成功的，出乎人们最乐观的预料”。炸弹不是由飞机从空中投下，而是在一个 100 英尺高的钢塔顶上爆炸的。“产生的能量”估计相当于 15000 到 20000 吨 TNT。

历史上第一次有原子弹爆炸。这是怎样的一次爆炸啊……在短时间内在半径 20 英里内都看得见的光辐射，与几个太阳的光在午时的强度不相上下；随后形成一巨大的火球，持续了几秒钟。这一火球呈蘑菇状上升到 1 万英尺以上的高空，然后开始转暗。由爆炸引起的光在一般 180 英里以外的阿尔伯克基、圣菲、银城、埃尔帕索和其他几个地方都清晰可见。在同等距离的几个地方都可以听到爆炸声，但一般是传到大约 100 英里以外。只有极少的窗户被震坏，虽然其中一个是在大约 125 英里以外的地方。爆炸后形成大面积的云团，随着巨大的气浪向上汹涌翻腾，在大约 5 分钟内，直至高度为 41000 英尺的平流层，即离地面 36000 英尺，裂变在 17000 英尺高的逆温层中不间断地发生，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裂变会在逆温层中停止。主爆后不久，云团中又发生了两次辅爆。云团中包含着从地面卷起的几千吨灰尘和大量气化铁。我们当前的看法是，气化铁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时燃烧，引起辅爆。裂变产生了大量的高度放射性物质并被包含在这一云团中。

报告描述了钢材如何从钢塔上蒸发逸散，在一个直径为 1000 多英尺的弹坑中被研碎的泥土又如何形成浅绿色的铸块。

距爆炸现场一英里半处，设一重 220 吨的巨型钢制试验圆筒，筒底座坚固地浇在混凝土基础里，环绕圆筒的是 70 英尺高的加强钢塔，固定在混凝土基础上。钢塔好比是能在一座典型的 15—20 层高层建筑中或者在库房结构中看到的钢建筑架间。建造这座 6 层楼高的钢塔用去了 40 吨钢材。交叉斜拉筋比平常用于标准钢结构的坚固了许多。由于这是没有实体墙的一座建筑物，爆炸产生的推力因受力面积小而减小了许多。爆炸使钢塔从基础起裂开，塔身扭曲变形，断裂并倒塌在地。这表明在这样的距离内，无掩蔽的永久性钢建筑物和砖石建筑物均可被摧毁……我们谁也未曾预料到会有这样大的破坏力。

格罗夫斯也介绍了他的副手，托马斯·F·法雷尔将军的印象，爆炸时，他和奥本海默一起呆在控制掩蔽部里。

“在场的每一个人人都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可怕潜力。”法雷尔在报告里写道，他写到了爆炸产生的“烧灼之光”和“预告世界末日的隆隆声”，并描述了爆炸后的情景。

基斯塔科夫斯基博士……伸出双臂与奥本海默博士拥抱在一起，欢呼着。其他人同样兴高采烈。大家被抑制住的情感在这几分钟之内全部迸发了出来，并似乎立即意识到，这次爆炸远远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料和科学家们最狂热的愿望。所有的人似乎都感觉到他们置身于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时刻……

在报告的结束语中，格罗夫斯写道：“我们都充分意识到，我们面前还有我们的真正目标。这次成功的试验是很重要的……”

史汀生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读完这整份文件。其间杜鲁门或贝尔纳斯是否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些问题或评论，不得而知。但是，史汀生读完以后，杜

鲁门和贝尔纳斯都显得异常高兴。特别是总统“备受鼓舞”，史汀生写道：“他说这给他带来了全新的信心，他感谢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并用这样的方式来协助他。”

的确，他们三人都感到如释重负——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如此巨额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力，总算没有付诸东流。倒不仅仅是花费了 20 亿美元，而是这 20 亿美元本来可以以其他方式用于战争的。这个东西发挥了作用——它能结束战争——而且这也是引以自豪的事情，因为如此复杂而巨大的任务完全是史无前例的任务，竟是由美国人胜利地完成了。

很明显，这消息使杜鲁门的信心增强了。很难想象他不是这样。他和贝尔纳斯都感觉到，在未来与俄国人讨价还价的谈判桌上，他们的实力会因而更加增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完全能理解的——但绝不像有些人后来争论说的那样这是首要的考虑。

会后，杜鲁门直接来到塞西林宫，因为紧接着的会议正在进行，他的变化是明显的。他对自己更有把握，也更加自信了。“显然发生了什么事。”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位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写道。丘吉尔后来对史汀生说，他想象不出总统是怎么了。（第二天，史汀生去见首相，给他读了格罗夫斯的报告，丘吉尔的反应比杜鲁门还要强烈得多；“史汀生，火药算什么？”丘吉尔大声说，“电力算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再临。”）

在桌上交换意见时，斯大林说，三国政府应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与原德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恢复外交关系。杜鲁门不同意，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得延搁了。

“在这些政府建立在令人满意的基础上之前，我们不能承认它们。”杜鲁门说。

他们再次谈到了棘手的波兰问题。雅尔塔会议以含糊的语言同意波兰西部从德国得到新的领土，以补偿俄国从波兰东部割去的领土。争论的焦点是波兰的西部边界，而事实上，波兰现政府（和红军）已经接管了德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杜鲁门认为，这类事情应该在和平会议上予以解决。他说，以 1937 年的德国作为出发点是已经同意过的。

“我们决定自己的区域。我们派军队进驻划分给我们的区域。现在，未经与我们协商就让另一个占领国政府分得一个地区……我对波兰是非常友好的，对俄国关于西部边界的提议表示同情，但我不想那样做。”

换句话说，俄国人不能独断专行。不理解这一点，赔款或关于德国的其他问题就不可能有进展。

“我关心的是德国的一块很有价值的领土被割让了。在考虑赔款和供养德国人问题上必须把这块土地认为是德国的一部分。波兰人现在没有权利夺取这块土地，也没有权利从和解中得到这一点。我们是保持占领区直到实现和平呢？还是把德国零零碎碎地分让出去？”

他不是好争辩，只是事情是明摆着的。丘吉尔高兴了。艾登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总统最好的一天，李海也这样认为，尽管他确信，不管说了什么，俄国人并不打算改变他们在东欧的路线。李海认为，波兰是“苏联的既成事实”，美英对此无能为力，除非与俄国人开战，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晚，斯大林为其西方盟友举行了盛大宴会，气氛轻松自如，没有丝毫紧张痕迹。杜鲁门度过了他在波茨坦期间最美好的时光。他在写给母亲和

妹妹的信中说，斯大林的这件事干得“非常成功”。

宴会开始时是鱼子酱和伏特加，结束时是西瓜和香槟酒，中间有熏鱼、鲜鱼、鹿肉、鸡、鸭和各种蔬菜。每隔5分钟敬一次酒，直到至少敬了25次酒。我吃得很少，喝得也不多，但这是一次愉快而有趣的宴会。

当我在这儿同斯大林、丘吉尔饮宴时，我想要告诉你们一位来自费城名叫利斯特斯的年轻中士演奏钢琴，另一个来自首都管弦乐队的青年表演小提琴。他们是我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演奏得非常精彩。斯大林派人回莫斯科带来了两位最优秀的钢琴家和两名女小提琴手。他们演得棒极了。演奏了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及所有其他人的作品。我向斯大林和艺术家们祝贺他们的表演才能。尽管他们的脸脏，两位女士也相当胖。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宴会。

他对贝丝说，这晚的聚会意味着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并再一次提到他已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即俄国答应在反对日本方面给予支持。或许斯大林可能也已告诉他，100万俄国军队现已集结在满洲边界。

“席间，他满怀信心地和我谈论着，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将进展顺利。在有些事情上我们不会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我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

丘吉尔对音乐不感兴趣，他对杜鲁门说，他烦透了，想回去。杜鲁门说，他得等宴席结束后再走。丘吉尔悄然退到了一角，和李海又坐了半小时，等音乐停止后，如兴致颇高的杜鲁门所说的那样，“便皱着眉头、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离去了”。

两天以后，轮到丘吉尔做东，这次他就进行报复了。他召来了皇家空军的一支管乐队，并指示他们，从宴会开始到结束，要不停地演奏，而且声音越大越好。

在整个美国代表团里，最难判断的人物大概是欧内斯特·J·金上将，他是海军作战部部长，性格坚强，经验丰富，是罗斯福不可多得的助手。金将军为人稳重，给人印象深刻，他参加过所有重要的战争会议，开始时是参加1941年夏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船上会议，那次次会议产生了大西洋租借法案。斯大林在波茨坦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金将军探过身子去对洛德·莫兰低声说：

“你看总统，这一切对他来说全是新的，可他能对付。与罗斯福相比，他是一个更地道的美国人，他会做好工作的，不仅为美国，也为全世界。”

波伦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时是罗斯福的译员，他后来说，杜鲁门头脑冷静，与人交往轻松自如，“在整个会议期间表现出一位拥有丰富经验的领导人的气派”，令他惊讶不已。

总统身体健康几乎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和斯大林起床很晚，而我起得早。”杜鲁门后来评论道，“这使我的每一天都特别长……”然而，他似乎不知疲倦。他每天早晨5点半或6点起床穿衣，很有规律，不需要闹钟或任何人叫醒他。部下发现，他总是愉快、自信。不管受到多大压力，从未见他讲过粗鲁或欠考虑的话，或训人，或显出丝毫的不高兴。他自始至终完全保持着自然与真诚。每日负责记录的海军助理里格登上尉回忆说：“他从不装腔作势。”一位名叫弗洛伊德·博林的特工人员说，总统最大的优点是从不摆“架子”。“他从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和谁都谈得来！下至普通农夫，上至英国的国王……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秘密……他从

不头脑发胀——从不，你知道，从不摆架子。”

在柏林，黑市——香烟、手表和威士忌的交易——和卖淫猖獗。一天晚上，塞西林宫一轮艰苦的会谈结束后，陆军负责公共关系的一名年轻军官，看到杜鲁门要独自乘车离开，把头探进车窗问可否搭个便车。杜鲁门请他上车，开车的弗洛伊德·博林在行驶间难免不听到他们的谈话。军官说，如果总统需要什么，需要任何事情都可以，只要他说句话。“任何事情，你知道，比如女人。”

“听着，孩子，我和我的爱人结婚了，”杜鲁门说，“她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我要你明白这一点。以后再也不要对我提起这类废话。”

“车子开到住地时，”博林记得，“他下了车，对那个家伙连声再见都没说。”

埃米里奥·科拉多是国务院官员，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他回忆起21日星期六下午在凯撒大街2号所见到的一个场面。科拉多带着一份文件来找总统签字，他被领进了一个空旷的大房间里，从上面可以俯瞰到湖，他看到“一个身穿短袖衬衫，个头不高的活跃人物坐在一架大钢琴前，钢琴的角上放着一杯饮料”。与他在一起正在唱歌的是贝尔纳斯和李海，他们俩人都没穿外衣。

我认为这是很精彩的（科拉多几年后说）……总统钢琴弹得很棒，是相当老式的爵士音乐风格，他们正在欢度时光。

他们不是喝醉了酒或者类似的什么情况。他们每人都喝着饮料。我常常回忆着这一幕情景：五星上将、国务卿和总统，有一点儿音乐伴随着共度某个周六下午。事实上，哈里·杜鲁门很有人情味。他们正在稍微地放松一下自己。在这之前，他们共进了午餐……他们有一点儿闲暇，因而他们出现在那里……我不能说歌儿唱得水平很高，但钢琴弹得很不错。

4

杜鲁门在波茨坦已进入第二个星期，他知道对原子弹的决定不能再等了。

7月22日星期日上午10点，他参加了由第二装甲师随军牧师主持的新教友礼拜。其后，又参加了由他的老朋友，D炮兵连随军牧师柯蒂斯·蒂尔南神父主持的天主教弥撒。蒂尔南当时担任驻欧陆军总牧师，是应杜鲁门的请求飞到柏林去的。

在上午的中段时间，杜鲁门写信给贝丝道：“我在11点30分去参加由他主持的弥撒，我已作了新教友礼拜，所以我猜想上帝在本周内一定会保佑我——哎呀，我是多么需要他的保佑啊。”

早餐刚过，史汀生就出现在凯撒大街2号。他带来了华盛顿发来的电报，称“最后行动”即将准备就绪，需要确定目标城市。史汀生希望把京都从名单中删掉。杜鲁门听了理由后，同意了他的意见。京都幸免于难。“京都虽然是重要军事目标，”史汀生写道，“但它曾经是日本的首都，是日本艺术和文化的圣地……”在批准的目标名单上，第一个是广岛，日本本上军队的南方司令部和军需库就设在那里。

星期一清早，史汀生再次来到杜鲁门的二楼办公室。一份警告日本的最

后通牒已基本拟好。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知道的《波茨坦公告》。史汀生认为，在此时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不明智的，日本人会将这一词语理解为他们不能保留天皇。他竭力主张将其改为同盟国将“把对日战争进行下去，直至它停止反抗”。但贝尔纳斯强烈反对作任何这样的修改。他坚持说，无条件投降是我们长期确立和经常宣称的目标。这是珍珠港事件以后重整旗鼓的极其伟大的口号，因而不能放弃。杜鲁门在4月16日对国会的首次讲话中把它作为政策加以重申。它是纳粹必须接受的条件，在这么晚的时候，在我们付出了如此大的血的代价后放弃让日本人接受这一条件，在胜利就在眼前时接受任何低于它的条件，将被认为好像是姑息。贝尔纳斯还确信，这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对多数美国人来说，裕仁是日本狂热的军事集团的罪恶象征。6月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仅占7%的一小部分美国人认为战后应继续保留他，即使作为一个傀儡，而足有1/3的美国人认为他应作为战犯被处决。如其他一直在向杜鲁门提供建议的人一样，贝尔纳斯认为就条件问题与日本进行的任何谈判都是浪费时间，并且觉得如果继续保留裕仁的皇位，那么这场战争就是毫无意义的了。虽然杜鲁门认真听取了意见，但史汀生最终还是没能说服他。7月24日星期二几乎肯定是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上午9时20分，史汀生再次上楼去到杜鲁门的办公室。他发现总统坐在那张巨型雕花办公桌后面，“正独自埋头工作”。史汀生带去了另一份电报：

绝密

急发

陆字 36792 号，哈里森呈陆军部长专阅。绝密件。手术可在从 8 月 1 日起的任何时候进行，这取决于病人的准备情况和大气条件。单从病人的观点看，8 月 1 日至 3 日有些机会，8 月 4 日至 5 日是好机会，除非突然旧病复发，手术在 8 月 10 日前进行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1945 年 7 月 23 日华盛顿

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说这正是他所要的，他非常高兴……”

后来，杜鲁门写道，贝尔纳斯、史汀生、李海、马歇尔和阿诺德将军在波茨坦取得一致意见，即应该使用原子弹。他回忆道，马歇尔再次强调这可以挽救不少人的生命，“我问马歇尔将军，在东京平原或日本的其他地方登陆会损失多少人。他的意见是，这种入侵会给美国造成至少 25 万人的伤亡……”他本人“经过长期认真的考虑后”，才得出自己的使用核弹的结论，他写道，并补充说：“我不喜欢这种武器。”

很可能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时刻说明他在那时拿定了主意，或宣布他已下了决心。最有可能的是他从未认真考虑过不使用原子弹。诚然，假如他在此时说声不，并下令取消一切行动，那将会使这一计划的整个历史来个急剧突变，更不用说使那年夏天事态发展的可怕势头来个急刹车，以至于这几乎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有些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在以后的岁月中会论证说，日本这时已被打败，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和几份情报部门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然而，日本的失败不是问题之所在。迫切需要的是日本的投降，因为日本一天不投降就意味着屠杀还在继续。在理论上，在杜鲁门当总统很久之前，日本就已经被打败了（日本人自己的研究认定，早在一年半以前，即 1944 年 1 月时，日本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然而，自杜鲁门担任总统后的三个月内，美国人在

太平洋战场上的伤亡接近三年以来太平洋战争伤亡总数的一半。越接近胜利，血的代价就越高。无论美国在一次入侵中设想的伤亡人数是多少，假如伤亡是可以避免的话，这个代价就太高了。

军事情报局上尉小查尔顿·奥格本回忆说：“当时，我们有大量事实证明，从日本的精神气质来讲投降是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人已完全明白，他们的处境已毫无希望，但他们仍在散兵坑和地堡里负隅顽抗，为了肃清他们，我们成千上万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献出了生命。”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没有一支日本部队投降过。

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日本已被打败，同时也预测日本人还将坚持几个月，与此同时他们不时发出和平试探，既想按照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结局结束战争，又想“削弱美国血战到底的决心……”

（日本）现政府的基本政策（1945年7月8日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称）
是尽可能拖延战争并拼死地作战，以期避免彻底战败，并在和平谈判中取得更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日本领导人正在玩弄拖延战术，以期同盟国厌战，产生不和或出现一些“奇迹”，为安排妥协性和平制造机会。

必须强调指出，这不是假设说对入侵不作准备了——指双方均是如此——这一点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时被忽视了。

杜鲁门在早些时候曾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调动100多万军队，对日本实施最后攻击。30个师正从欧洲战场调往太平洋，即从世界的一端调往另一端，这一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供应物资堆存在塞班岛。日本在本土约有250万正规军，但是年龄从15岁到60岁的每一个男子，17岁到45岁的每一个女子都被征召去服兵役，并用从古代铜炮到竹梭标等各类武器武装起来，教他们将炸药捆在自己身上，扑向正在行进的坦克。一名妇女记得，有人给她一支木工的锥子并指示她只要杀死一名美国人就行。他们告诉她：“你一定要对准肚子，懂吗？肚子。”负责防卫计划的将军告诉其他高级军官说：“在敌人登陆的两个星期内投入20个师，我们就可以全部歼灭他们，并确保日本的胜利。”几千架飞机已作好准备去充当神风突击队。

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和盟国军队中没有哪个人认为日本人看来会停战。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25名战地记者经过笔录比较，推测战争在1946年6月以前的将近一年内不会结束。在五角大楼，各大厅挂着人们长期不会忘记的招贴画，上面画的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步兵，脸上表现出誓死的决心盯着一张日本本土岛屿的地图，画的上部用粗体字写着“下一个目标！”几个字，在五角大楼没有什么关于早日结束战争的谈论。人们最关切的是，即使东京政府会放弃战争，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量日军也还可能继续作战下去。

杜鲁门预见到任何企图进行的入侵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残杀。他在几个月后讲道：“我想到，我们的25万优秀青年值数个日本城市，我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但是，25万人或2万人的伤亡不是当时的问题所在，一两次毁灭性打击的震惊效应也制止不了战争——特别是以B-29空袭形式的毁灭性打击已经成了标准的、几乎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当今的基本事实是战争，”史汀生在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开始时说。日本人是令人鄙视的敌人，他们背信弃义，是袭击珍珠港的罪犯（当时和平

谈判正在进行)，是轰炸马尼拉并制造巴丹死亡进军的罪犯。他们蓄谋杀害了美国战俘，是他们这些狂人下令进行近乎疯狂的“神风”突击队袭击。有关巴丹死亡进军的详情直到2月才为世人所知，并激怒了全国上下。他们的其他暴行还包括巴拉望岛大屠杀。在此次暴行中，菲律宾巴拉望岛上的日本兵将140名美国战俘诱入防空壕，然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5月德国投降几天后的报纸上刊出了一张被蒙上眼睛的战俘的照片，这位美国飞行员跪在地上，手被反绑着，他将被挥起大刀的日本军官斩首。

在波茨坦，波伦写道，“怜悯之心不会在任何盟国官员的心中萌动”，无论对德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如此。

试想，经过腥风血雨的搏斗入侵日本后，人们才知道在今年仲夏时曾有一种是以能结束战争的武器而没有被使用，那么，总统和其他负有决策责任的入又如何向美国人民交待呢？

假如原子弹在3月份已准备就绪并由罗斯福使用，假如日本人在那时就因此害怕得投降，那就会挽救了从那时起在太平洋地区牺牲的近50万美国人的生命，更不用说数目大得多的日本人的生命了。

也没有任何人怀疑过罗斯福会使用原子弹。史汀生写道：“从1941年至1945年期间，我从未听总统或政府中任何其他负责人建议过在战争中不应使用原子弹。我们当然全都明白此事所涉及的重大责任……特别是罗斯福总统曾多次对我讲，他自己意识到了我们的工作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我们是处在战争中……”

李海后来说：“我知道罗斯福会不失时机地使用它，以证明他并没有白白浪费20亿美元。”

杜鲁门一周前给贝丝的信中在讲到斯大林同意对日作战时说：“我敢说我们现在可以提前一年结束战争，想想吧，我们的孩子们将免于死亡！这是很重要的。”对他来讲，这一贯是件重要的事。他从经验中知道，入侵日本是地面部队的任务，对步兵和炮兵来讲是艰苦的、非常可怕的事。杜鲁门与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出现现代战争以来的任何最高统帅们不同，他曾和地面部队一起作过战。在阿尔贡，当他看到一个德国炮兵连进入左翼阵地，虽不在他的管辖区内，但他命令自己的炮兵连开火，因为他的行动可以挽救生命，即使他可能会因此受到军法处置。“这与我方的炮兵恰似一回事。”他在后来谈起这枚炸弹时说，此话使许多人感到他对事情太不敏感，过于简单化了，但是这是他的战争经验之谈。

他个人私下承认，在他任杰克逊县法官时，有一次他曾允许一名骗子承包商偷窃1万美元，目的是防止他偷窃10倍于此的钱款。他容忍了罪恶，目的是防止更大的罪恶，别无其他选择。他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他在皮克威克旅馆夜深人静中独自书写时，这样问着自己：“你们来评判吧，我不能。”

可以想象，如后来很多人争论的那样，日本人可能会在11月和预定的入侵之前投降。也可以想象，如当时的战略家们所说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被海军封锁困死，在连续的燃烧弹轰炸下损失惨重，被迫投降。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毕竟可能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杜鲁门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告诉他不要使用这种新式武器。马歇尔将军完全相信，即使投下原子弹，而且完全达到科学家们所预示的效果，日本人仍会打下去。马歇尔更多地认为原子弹是一种使入侵行动伤亡小一些的方式。如果认为原子弹可以使入侵成为没有必要，那是我们对它期望过高了。事后，他告诉戴维·利连索尔：“我们知道

日本人是死心塌地的，是狂热的……我们只有一个一个地消灭他们。所以，我们认为原子弹是保护和准备登陆的极好武器。”马歇尔对美军在硫磺岛的伤亡感到如此惊骇，以至于他同意在冲绳岛使用毒气。

一份由利奥·西拉德草拟、敦促从道义出发，应事先向日本人提出警告的请愿书由 70 名科学家签了名，但直至杜鲁门启程赴波茨坦后才递交到华盛顿。杜鲁门从未见过这份请愿书。他也没看到一些科学家从道义出发力主使用原子弹的相反意见。其中的一份请愿书写道：“为了祖国敢冒生命危险的战斗人员难道没有权利使用已经设计出来的武器吗？总之，当我们拥有稳操胜券的手段时，难道还继续让美国人流血吗？不！即使我们只能挽救数量不多的美国人的生命，我们也要使用这种武器——现在就用！”

想象不出有什么比用燃烧弹摧毁日本东海岸的所有城市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了（另一科学家写道）；恶魔群居的地狱比熊熊燃烧的东京更为恐怖，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围。当这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时，我们为什么试图在此划一条道德的界线呢？

在芝加哥冶金试验室对 150 名科学家进行的民意测验中，87% 的人投票认为，如果其他方式不能迫使敌人投降，他们就同意将这武器用于军事目的。阿瑟·康普顿应请求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在后来写道）！

我参加了讨论的全过程，在我看来，如果我坚持反对的立场，仍有可能阻止对日实行原子打击。我的和平主义的孟诺派先祖的思想在我脑海中闪过。对于原子弹会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和极度痛苦我知道得太清楚了。我知道它被一些未来的暴君掌握后的危险性。我和这些事实生活在一起已达 4 年之久。但我希望战争结束。我希望生活重新恢复正常……我希望通过使用原子弹，许多我所认识的优秀青年会顷刻间从战争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生存而不是死亡的机会。

丘吉尔要写的是并非决定的决定，回顾往事，这似乎也是事实。“历史的事实不会变，必须由后人评价。”丘吉尔写道，“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自然形成的和没有异议的；我也从未听到过丝毫的不同意见。”

“杜鲁门没作决定，因为没有决定可作。”乔治·埃尔西回忆道，他仍记得当时的气氛，“像在铁轨上前进的列车一样，他无法阻止……一切如水到渠成，事后，人们说原子弹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整个该死的战争本来就是可怕的东西。”

至于杜鲁门，他后来声明说：

何时何地使用原子弹，则由我作最后决定。在这方面不能造成错误。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使用它。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们建议使用它，而当我告诉丘吉尔时，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如果原子弹可能有助于结束战争，他就赞成使用它。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这一关键的时刻发生在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1

点 30 分凯撒大街 2 号，杜鲁门和丘吉尔召集英美联合参谋团成员在餐厅召开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这是杜鲁门、丘吉尔与其军事顾问们仅有的一次圆桌会议。会议决定：除非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况，原子弹将在今后几周内投入使用。杜鲁门后来告诉阿瑟·康普顿，在作出决定的同一天，他通知了斯大林，这是 24 日下午早些时候的事。

事情发生在塞西林宫一次争论尤为激烈的会议结束的时候。散会了，杜鲁门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人步履缓慢地绕过桌子，走到斯大林和他的翻译正站在那里地方。

“我随意地向斯大林提到，我们有了一种具有超常破坏力的新式武器。”杜鲁门回忆道，“他只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并希望我们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

杜鲁门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什么样的武器——他没有使用“原子弹”一词——也未提任何共享科学秘密等事。斯大林看起来既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丝毫的好奇。他没有问这一武器的性质，它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也没问为什么他以前没听说过此事。他没有建议让苏联科学家了解此事或允许他们对其进行考察，实际上，他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当时，波伦在房间的另一端密切注视着，在他看来，斯大林的反应是如此地完全不假思索，以至于使他怀疑总统是否讲清楚了他要说的话。当时留意看着斯大林的丘吉尔写道：“如果他对世界事务中正在发生的革命略有所知的话，他的反应就应该是明显的。”贝尔纳斯也肯定斯大林没有领悟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否则，他会马上要求进一步详细了解情况。但斯大林却没有这样做。在会议结束前，他再也没提过这个话题。

事实上，斯大林知道的比任何英美人所想象的要多。苏联的核研究工作从 1942 年就开始了。人们后来得知，一名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一直在向俄国人提供原子弹的秘密已有一段时间，此人名叫克劳斯·富克斯，是德国出生的已加入英国国籍的英国公民。他所提供的情报被莫斯科认定是“极其重要和非常有价值的”。斯大林完全听懂了杜鲁门的话。根据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会后，在巴贝尔斯贝格他们住地的保密室里，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告诉喀察托夫（苏联原子计划负责人）要加紧工作。”（另外，根据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所说，那天晚上，斯大林甚至还电告全面监督原子计划的拉弗连齐·贝利亚去施加压力。）

在以后的几年内，杜鲁门经常说，对原子弹作出决定后，他睡了一个好觉。他被描述为当晚睡在白宫，脑子里很清楚他做的事是正确的。但是，在巴贝尔斯贝格陌生“梦魇”的房子里，在德国夏日的持续高温下，他睡得相当不好，处在比他后来所声称过的严重得多的不安之中。

住在楼下的吉米·贝尔纳斯回忆说：“参与研制或参与我们决定使用原子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高兴。”

“我们发明了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炸弹。”杜鲁门在 7 月 25 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向空军发出按计划执行的一般军事命令的那一天。“可怕”一词在他脑海中反复出现。他想知道，这种炸弹会不会是圣经里所预言的那种“毁灭之火”。好像要使自己信服那样，他写下了这种炸弹如何只用于军事目标，但他明白，这只是部分属实。

从现在到 8 月 10 日这段时间内，将用这一武器来对付日本。我已告诉陆军部长

史汀生先生，要这样使用它，即只对准军事目标和步兵、水兵，而不是妇女和儿童。即使日本鬼子野蛮、残酷、无情、狂热，我们作为世界共同幸福的领袖也不能将这种可怕的炸弹投向它的旧都（京都）或新都（东京，在那里，皇宫至今未遭破坏）。

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轰炸的目标将纯粹是个军事目标。我们将发出警告，要求日本人投降和保住性命。我肯定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我们将给他们一个机会。希特勒一伙或斯大林一伙没有发现这个原子弹对世界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它似乎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5

这最后的想法——可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是他涌现出来的压抑不住的天生乐观主义和对发展的信心呢，还是试图说服自己的另一种方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只是意味着对结束战争有用，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5

有些历史学家的论点认为，原子弹在波茨坦扮演了杜鲁门向俄国人施加压力的手段这一重要角色。但是，杜鲁门除了在听取格罗夫斯的报告后私下显得信心增强了以外，没有说过任何重要的话或做过任何重要的事来支持这一理论，而且这一整个看法遭到当时在场的目睹者强有力的否认。据说，在阿拉莫戈多的试验前的某个时候，有一次杜鲁门和他的助手们说，如果原子弹试验成功，他“肯定会用它敲打那些家伙”。但是不清楚他指的是敲打俄国人还是日本人。而且，在他与斯大林的交往中，从未有过“敲打”的暗示或力量的炫耀。“在波茨坦谈判中，从未提出过把原子弹用作向俄国人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的想法。”哈里曼写道，“这决不是总统当时的心情。他的心情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盟友对待——一个公认的难以对付的盟友，希望他的所作所为像个盟友。

在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原子弹秘密前的会议上，这位大元帅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难以对付”，杜鲁门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从不好战或横加指责。他强调说，他无意责难斯大林或他的政府。唇枪舌剑是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丘吉尔终于大大地恢复了他原有的生气。

按照日程，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巴尔干各国原先与德国结盟，是德国的所谓“卫星国”。美国和英国的立场是，意大利应该被接纳，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现在全部由俄国牢牢控制）则不应该，除非它们建立了民主政府。斯大林说，既然意大利也没有举行民主选举，他不理解为什么对意大利采取这样仁慈的态度。杜鲁门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大家都可以自由出入意大利，而西方盟国却不能自由出入巴尔干国家（贝尔纳斯在外长会议上也证明了这一论点）。

“我们要求根据在雅尔塔共同商定的民主路线重新组建卫星国政府。”杜鲁门说。

斯大林冷静的反驳非常简单：“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法西斯政府，那它就是民主政府。”他答道。

丘吉尔指出，意大利是一个有新闻自由的开放式社会。在那里，外交使团可以自由行事。相比之下，在布加勒斯特英国使团却像遭到逮捕一样被圈了起来。周围围上了铁栅栏，丘吉尔阴沉着脸说。

“一派胡言！”斯大林因生气而呼喊起来。

“政治家们如果愿意，可以将彼此的陈述称作胡说。”丘吉尔回答道。

正如波伦所写，会议的此时此刻再明显不过地暴露出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鸿沟。

杜鲁门站在丘吉尔一边，他说美国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外交使团所遇到的困难也是引起我们关注的原因。（那天夜里，丘吉尔长时间地与洛德·莫兰谈到他敬佩杜鲁门对斯大林讲话的方式简洁明了、直截了当。“总统不愿意完全顺从任何人，而是设法弄清事情的真相。”丘吉尔说，他揉了揉眼睛，好像提醒自己不是在做梦吧。“要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能这样就好了。”接着他停顿了一下后，又遗憾地说，“现在太晚了。”）

杜鲁门试图以另一方面的进展来救助下午的会议。他在前一天正式介绍了他的使世界内陆水道、河流和运河国际化的计划，包括多瑙河、莱茵河、达达尼尔海峡、基尔运河、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可出入世界各海洋。“我不想在20年后因多瑙河的争执再打一场战争。”他说，“我们需要一个繁荣自立的欧洲。一个垮下来的欧洲对任何一个国家，乃至世界和平都没有好处。”斯大林说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因而，杜鲁门现在又将此问题提了出来，抱着乐观的希望。很明显，这对他是重要的。

斯大林打断了他，宣称：“讨论此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7月25日星期三，大会休会。丘吉尔准备回伦敦去面对大选的最终结果。艾登和英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准备回去，还有丘吉尔在大选中的对手，羞怯和少言寡语的克利门特·艾德礼。尽管是炎热的夏季，艾德礼仍穿着三件套西装，他似乎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相信丘吉尔肯定会在大选中获胜，他在几天后即可返回。

丘吉尔有一个外人所不知的情况，即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预兆。他曾做过一个梦。梦里他发现自己死了，躺在一间空房子里，身上罩着一块白布单。他告诉莫兰他知道那是谁，因为他从伸出的双脚认了出来。

“真遗憾。”斯大林在那天上午的会议结束时说，当丘吉尔宣布他已无更多的话可说了。

会后，在塞西林宫前门外，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摆好姿势，准备留最后一次影。当一大群摄影师和新闻摄影记者拍下这一时刻时，杜鲁门以十足的美国政治家派头站在中间，双臂交叉在胸前，他同时握住两人的手，先朝一人笑一笑，然后再转向另一人笑一笑。斯大林也禁不住咧开嘴笑了。

次日，从伦敦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丘吉尔被击败，艾德礼当选为新首相。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它，但俄国人看起来尤为不快。莫洛托夫一再追问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事先会不知道呢？斯大林又将会议推迟了几天，而且谁也没再见到他。

先是罗斯福，现在是丘吉尔，杜鲁门私下写道。旧秩序正在成为过去。他不安地想到，如果斯大林突然“死去”，一场权力之争会把苏联搞得大乱。“独裁者通常不会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我从此次会议的俄国代表团中看不出谁能接班。”他对丘吉尔的情感是混杂的，几乎和他是喜欢他的差不多。关于丘吉尔的情况太糟了，他在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说，但他又说“这对世界来说也许不会造成影响”，话里的意思是，没有丘吉尔的参与，这样他可能会与斯大林取得更好的进展。

同一天，7月26日，在太平洋中的提尼安岛，“印地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送去了一颗原子弹的U—235部分，绰号“小男孩”。当天晚上，贝尔纳

斯和杜鲁门决定发表波茨坦公告。

公告以杜鲁门、艾德礼和蒋介石总司令的联合声明的措词发表，它保证日本人民获得人道待遇。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不会受到奴役，作为一个国家不会遭到毁灭”。一旦言论和宗教自由得以确立，一旦日本制造战争的政权已被除掉，并自由选出一个负责的、“倾向和平”的政府，占领军即将撤出。

“无条件投降”一词只在公告的最后一段出现过一次，而且详细说明只是武装力量，而不是日本民族的无条件投降。除此之外的选择，日本则将“迅速完全毁灭”。

裕仁天皇的命运是模棱两可的。公告里没有提到他。也没有解释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使日本“迅速完全毁灭”。

日本无线电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6点收听到了这个公告，铃木首相及其内阁为此开了一整天会。与此同时，美国飞机在东京和其他10个日本城市上空撒下了几百万份翻译打印好的公告传单。

铃木决定对此事不予理睬。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公告只不过是老调重弹，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要“以沉默来扼杀它”。

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于28日星期六夜抵达巴伯尔斯贝格，杜鲁门决意不被这两位“面无表情的人”所感动。贝文的体重看上去好像有250磅。

艾德礼先生不像胖老头温斯顿那样敏锐，贝文先生相当浮夸，不像个外交大臣（杜鲁门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写道）。贝文看上去是属于约翰·L·刘易斯一类的人。艾登是个完全过于注重形式的家伙。我不喜欢艾登——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他对自己的上司不公平。我确实喜欢老丘吉尔。他像兰格（北达科他州参议员威廉·兰格）那样健谈，他精通英语，讲半小时话后，他至少得来个一句妙语警句或者也许两个思想什么的，这些可能要用4分钟来表达。如果有人将他的话记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他就停在那儿不讲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人，而另外的两人则是面无表情的人。艾德礼毕业于牛津大学，说话和艾登一样，带有浓重的喉音。但我听他说话没有什么困难。贝文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他当然不知道你老爸从建筑行业到煤矿一生都在与这类人打交道。因而，他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等着瞧吧，现在还很难说。”他写信给贝丝道。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刚到，他发现杜鲁门在俄国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情绪，这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对照。哈里曼“非常沮丧”。贝尔纳斯则“急于在俄国人插进来之前解决日本问题”。陆军部送给总统的全部文电先到距凯撒大街2号半个街区的巴伯尔斯贝格陆军机要中心并立即译好，然后再送到凯撒大街2号，交给地图室的值班军官，由他们呈送总统。7月30日星期一早些时候，又收到一份给杜鲁门的紧急绝密电报并被译了出来，但为了不打扰总统的休息，直到次日早晨才呈送总统。电报是由华盛顿的哈里森发来的：

格罗夫斯计划的时间表进展很快，现在必不可少的是要在8月1日星期三之前得到你批准扔放的声明……

已经到了杜鲁门在原子弹问题上作出最后决断的时候。现在就是这个时

刻。这个决定只有他能拍板。

电报是7月31日星期二早上7点48分呈送给总统的。杜鲁门用铅笔在粉红色的电报纸背面写下批复，字迹大而清楚，然后他交给埃尔西中尉发出：

建议获得批准。准备就绪后即扔放，但不得早于8月2日。

埃尔西瘦高个子，是个诚挚英俊的年轻军官。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历史重大转折点的见证人，他说不清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在波茨坦的那些天里，每件事似乎都是那么重要。”埃尔西回忆道。给他印象极深的是，杜鲁门“在离开斯大林、离开波茨坦之前，不希望发生任何事情”。现在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在8月2日前结束工作。史汀生已回到五角大楼。马歇尔准备即日早些时候离开。

波茨坦会议应该是值得庆贺的。它应该是最和谐、最有希望的三巨头会议，是历史的分水岭。由于他们的共同敌人、令人憎恨的纳粹已被歼灭，它标志着同盟国之间产生好感的新纪元。这至少是波茨坦会议的诺言。但事情并非如此，实际上也没有过多少机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在他们第一天见面的午餐会上，斯大林曾告诉过杜鲁门，他要像在战时一样，在和平时期与美国合作，但是，他说和平时期的合作更困难。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明白，这种潜在的紧张气氛自始至终都可以感觉到。正如丘吉尔所观察到的，杜鲁门重结果，轻言谈，每天总要有所收获——杜鲁门说这就是他到那里的目的——他的耐性越来越小，他似乎觉得他马上就可能成功了。“尽管总是在谈，但我们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你看，我们没有浪费时间。”这就是在丘吉尔离开之前，他给贝丝的信中写到的。他想要德国的未来能有个满意的解决。德国是关键，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他希望波兰，东欧和巴尔干各国能进行自由选举。他希望俄国能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但只有这最后一个问题他感到他成功了。在其他问题上，他面对的是含糊、拖延和挫折，斯大林不希望红军占领的地方接受对他原有的控制有威胁的任何协议。杜鲁门做了不少尝试，但在他与斯大林之间没能取得多少进展甚至没有进展。

罗斯福会做得更好吗？这一定是杜鲁门多次问过自己的问题。奇普·波伦认为罗斯福不会很成功，因为由于他个人对与斯大林早期达成的协议的关心，当他面对斯大林的不妥协态度时，罗斯福会表现得比杜鲁门更加气愤。对波伦、哈里曼和其他对付俄国人有经验的人来说，杜鲁门做的是不错的。波伦后来写道：

“在辩论中，他从未失败过，也未显得没头脑和不了解情况。”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没想玩阴谋、耍花招，他们只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路线，总统在外交方面的缺乏经验毕竟没有太大关系。决没有玩阴谋的任何余地。

“为我祈祷吧，祈求上帝保佑我一切顺利吧。”在最后一个星期开始时，他写信给贝丝道。

我们在波兰及其西部边界以及赔偿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和波兰已就奥德和西尼斯河流域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达成协议……自离开你后没有多大进展。

我不喜欢这样。

但红军已推进到奥德河和西尼斯河，因而已同意将这两条河作为波兰的西部边界。另外，东普鲁士的南部包括但泽港已划归波兰，而苏联则被授与其北部。至于波兰的自由选举，只同意应“尽快举行”，实际上意味着波兰问题仍未解决。

对于德国在战争期间的前盟国——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前途问题被搁置起来了，留给外长委员会在以后某个未指定的时间去解决。

德国被分成4个军事占领区——美国、英国、俄国和法国——实际上被从中间东西分开。在德国的完全非军事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争议。纳粹战犯将交法庭审判。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争议，甚至连审判地点也无争议——决定设在纽伦堡。关于赔偿，根据一个复杂的方案，苏联拿走了最大份额——主要是先进设备——这是鉴于苏联在人员和财产方面损失最严重这一事实。

斯大林在有些事例上并没有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苏联对意大利在非洲的前殖民地的托管权，在波斯普鲁斯的一个海军基地，对德国鲁尔工业谷实行四大国控制等。但是，作出很大让步的是西方领导人，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正如李海所说，俄国对东欧的占领确实是个既成事实——还因为他们希望与斯大林取得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想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是决不可能的，杜鲁门试图掩饰形势，向美国人民解释说：“这是一个互相让步的问题——是愿否与你的邻居做一些妥协的问题。”

对哈里曼和乔治·凯南这些有经验的苏联问题专家来说，过于相信俄国人会信守“民主”和“正义”之类的话是愚蠢的。或把对德国的安排问题上达成的协议看成是现实可行的也同样是愚蠢的。未参加波茨坦会议的凯南事后由于杜鲁门的天真而感到绝望。哈里曼自始至终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他发现贝尔纳斯把他如此的排斥在严肃的讨论之外，以致他判定这是他辞职的时候了。

杜鲁门提出的水道建议没有进展。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8月1日，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只要求在最后的公报中提一下这个问题。艾德礼说他同意杜鲁门的意见，但斯大林再次拒绝。杜鲁门指出，这一建议已经过讨论，他只坚持这一个问题。“斯大林元帅，在会议期间我已作出多次妥协来强化你的意见，”他说，“我个人现在要求您在这个问题上也作一次让步……”

未等他的译员翻译完总统的话斯大林就打断了他。

“不！”斯大林说。然后用强调的口吻，而且是第一次用英语重复说：“不，我说不行！”

这是一个令人难堪而为难的时刻。杜鲁门脸红了。“我不能理解那个人！”有人听到他这样说。他转向贝尔纳斯。“吉米，你是否意识到我们在这里已经整整17天了？哎呀，在这17天里，你总能决定点什么事情吧！”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杜鲁门称俄国人为他所遇到的最顽固的人。他现在总算明白了，他们是最不留情面的讨价还价者——“他们贪得无厌。”他后来这样说——在日记中，他相信他了解了斯大林政权的真实情况。“这是一个纯粹的警察政府，”他写道，“一小撮上层人物只是靠大棒、手枪和集中营统治着下层大众。”后来，他与约翰·斯奈德谈起过他与斯大林的一次使人不安的交谈，那是有关卡腾森林大屠杀的事。当杜鲁门问到那些波兰军官的下落时，斯大林冷冷地回答说，“他们离去了。”

即使如此，杜鲁门仍然喜欢他。在波茨坦会议即将结束时，他在给贝丝的信中写道：“我喜欢斯大林。他很直率。”他后来告诉他的白宫工作人员说，斯大林说的话是靠得住的。埃本·艾尔斯写道：“总统看来对他的印象不错，而且喜欢他。”杜鲁门告诉亨利·华莱士，斯大林是个好人，他想把事情办好。另外，杜鲁门也很自信地认为斯大林也喜欢他。杜鲁门对乔纳森·丹尼尔斯说这使他想起了汤姆·彭德格斯特。“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斯大林最像汤姆·彭德格斯特。”

没过很长时间，没过10来年，杜鲁门就承认他在波茨坦时太天真了——用他的话说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并把斯大林称作“没有人性的俄国独裁者”。即使这样，当时他还说：“我喜欢这个小杂种。”

杜鲁门后来告诉美国公众，在波茨坦会议上，除“军事协议”外，没有任何秘密协定或承诺。然而，一项关于“东南亚军事行动”的秘密协议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丘吉尔和他们联合参谋团决定，“为了作战的需要”，越南或印度支那将被分割，由中国负责纬线16度以北地区，英军负责以南的部分，这样，越南就没有统一和独立的可能性，而法国却有充足的机会卷土重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8月1日，杜鲁门用加密电报将上述决定通知了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当时，他面对军事和政治上的许多其他决定，这一决定似乎并不显得十分重要。

那天晚上，在塞西林宫举行了第13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几乎用了全部的时间来讨论最后公报的措词，直至午夜过后才结束。会上的斗争局限于细节问题。莫洛托夫建议修改关于波兰西部边界走向的那一段措辞，原文为自波罗的海穿过斯维内明德镇。他希望用“以西”一词代替“穿过”，莫洛托夫说。

“以西多远？”贝尔纳斯问。

“紧靠西侧。”贝文建议。

“紧靠西侧可以。”斯大林确认道。

“那好吧。”杜鲁门说。

“同意了。”艾德礼说。

杜鲁门宣布会议的议程结束时非常认真地说，他希望下一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

“上帝愿意的。”斯大林回答道，这是他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提到上帝。然后，斯大林用明显异乎寻常的赞誉之词评价贝尔纳斯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工作都努力……而且工作得很出色。”

人们在桌子周围频频握手，互祝身体健康，旅途平安。如同后来证明的那样，杜鲁门和斯大林再也没有见过面。波茨坦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国会议。

在他私下所作的评价上，斯大林后来告诉尼基塔·赫鲁晓夫，杜鲁门是微不足道的。

在凯撒大街2号，行装打点已进行了几天，每个人，特别是总统，急于启程。

8月2日星期四早上6点45分，他的车队已排在车道上。7点15分，他

们向加托机场出发，按照杜鲁门的请求，机场上不举行仪式。8点5分，“圣牛”号专机腾空而起，向英国普利茅斯飞去，美国“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正等候在那里。“这样我们可以在海上少呆两天，因为从安特卫普出发，穿过英吉利海峡需要很长时间。”他在给母亲和玛丽·简的信中解释说。他写道，他将同英国国王共进午餐。

与乔治六世国王的午餐会设在英国皇家海军的“雷诺”号战列巡洋舰上，它和“奥古斯塔”号和“菲拉德尔菲亚”号一起停泊在普利茅斯港锚地。杜鲁门惊奇地发现，国王“非常愉快”，“是个好人”，对波茨坦发生的一切事情极感兴趣。

我们的午餐丰盛，令人胃口大开（杜鲁门记录道）——

汤、鱼、羊排、豌豆、土豆和巧克力冰淇淋。国王和我，再加上哈利法克斯勋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一名英国海军元帅、李海、（艾伦·）拉塞尔斯（国王的私人秘书）和国务大臣依次围桌而坐。餐桌上他们无所不谈，又像什么也没谈……

登上和离开英国舰艇的礼节太多。

当天下午，国王作为回访登上了“奥古斯塔”号，检阅了仪仗队，“举杯致意”（杜鲁门高兴地写道），并向杜鲁门要了三张照片，分别给他的两个女儿和皇后各一张。

国王离舰15分钟后，也就是下午3点49分，“奥古斯塔”号启航了。

第二天，8月3日，也就是他在海上度过的第一个整天，杜鲁门把几名随行记者叫到了他的船舱里。他坐在盖着绿绒毯的小桌前，一本活页笔记本放在他面前，他开始向记者讲述原子弹及其历史。他讲得很慢，声音不高也不低。他的心情看上去喜忧参半。“他对我们拥有这种可以加速战争结束的武器感到高兴和慰藉。”

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回忆道，“但是，他又对这种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开发忧心忡忡。”美国“独家制造”的局面能维持多久，杜鲁门心里没底。笔记本上的材料是他向全国发表的声明，在离开波茨坦前就事先准备好了。

记者们感到极为丧气。“这是自发明火药以来最大的新闻。”史密斯写道，“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只有坐等。”

8月4日，根据正式的航海日志，总统早晨5点起床并在甲板上散步，看上去已从长时间累人的会议讨论的极度紧张中完全恢复了过来。早早用过早餐后，他全天都在研究会议文件并起草向全国发表的讲话。8月5日星期天，他做完礼拜后就继续工作。梅里曼·史密斯记得，那天极为紧张，杜鲁门显得神色焦虑。史密斯和其他记者试图谈论其他的事情。“这个秘密是如此之大而且可怕，以致我们之间都无法相互讨论它。”与此同时，军舰以26.5节的全速，劈波斩浪，向前行驶。

8月6日星期一，在海上已航行了4天，早上，总统和其他几名随行人员在甲板上晒太阳并听由船上乐队演奏的音乐会。军舰已驶入纽芬兰以南的墨西哥湾流。太阳出来了，天气明显转暖。全体船员都换上了白色制服，在阳光映照下十分耀眼。

时至中午，军舰位于北纬39°55'，西经6°32'的位置。海上风平浪静。

将近正午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决定在甲板下后餐厅与一些水兵共进午餐。杜鲁门与6个士兵坐在一起，刚开始吃饭时，地图室的一名军官格雷厄姆上尉急匆匆地跑了进来，递给他一张日本地图和一份已经译好的发自陆军部长的密码电报。

广岛四小时前遭到轰炸。“各方面的情况表明轰炸完全成功，看得见的效果比任何一次试验都好。”杜鲁门读着。格雷厄姆上尉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圈上被炸的城市。

杜鲁门一下子激动起来了。他抓住格雷厄姆的手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然后让他将电报拿给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的贝尔纳斯看。时间刚过正午。几分钟后，第二份电报又送了进来：

大型炸弹于8月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7点15分投于广岛。初步报告表明轰炸完全成功。这次比前次试验更有成效。

杜鲁门这时一下子跳起来向贝尔纳斯喊道：“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了！”就像科学家们第一次在阿拉莫戈多进行核试验时一样，杜鲁门感到兴高采烈。他用叉子轻轻敲了几下杯子，让大家注意。“请坐在原位听我讲几句。我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下一枚新型炸弹，其威力比两万吨TNT还要大。这是极大的成功！”

在水兵们的欢呼声中，他跑出去，向大家宣布这一消息。“实际上，他没有大笑，”梅里曼·史密斯写道，“而是满脸的微笑。从他向舰上的人们挥舞的这篇小小电文的字里行间，他看到了战争即将迅速结束。”在军官舱里，他让人们坐在原位不动，并重复着在餐厅讲的话，然后补充说：“我们赌赢了。”他说他宣布任何事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过。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据乔治·埃尔西的回忆，总统的反应看起来并非失态。“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每个人都在欢呼。”几分钟后，舰上的电台收到了华盛顿有关这枚炸弹的新闻公报。然后是总统的广播文告，文告就是在不久以前由白宫在华盛顿时间上午11时发出的。

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一枚炸弹……这是一颗原子弹。它是宇宙基本能量的一种利用……现在，我们准备以更快的速度彻底地抹掉日本任何城市在地面上的每一个生产企业。我们将摧毁他们的码头，他们的工厂和他们的通讯设施。这里不要有什么误解；我们将彻底摧毁的是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等待他们的将可能是从天而降的毁灭之雨，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那种毁灭之雨……

这篇文告和其他任何广播中均未提到广岛被毁坏的情况，因为此时华盛顿尚不知道详情。

全国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如释重负——特别是有儿子或丈夫正在军队服役的家庭。战争肯定将会随时结束。

对于在太平洋服役的几百万军人和正准备从欧洲乘船调往太平洋战区的军队来说，这一消息的到来如同一道令人高兴的缓刑令。这些人当中有一名作家，叫保罗·富塞尔，当时21岁，是驻法国一个步兵排的中尉，尽管他的腿和背部严重受伤，被确定为40%的残废，按原计划仍然要参加入侵本州的

战斗。“虽然每次从车后面跳下时我的腿会弯曲，但我的伤情被认为可以承受未来的任何行动。”他记得，广岛事件以后，当他意识到“我们将再没有必要以装出来的男子汉气概，在枪林弹雨中冲上东京附近的海滩时，我们如释重负，高兴得掉下眼泪来。我们将要活下去了。我们终于可以长大成人了”。

然而，尽管如此，有关原子弹的消息也给美国人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含糊暧昧和恐惧感。那些未被战争触动过的孩子们记得，父母亲们脸上露出奇怪的忧虑表情，并且惊讶地大声问道发生了什么难以想象的新的恐怖事件。可怜的世界还能保持原样吗？

“昨天，”汉森，鲍德温在8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我们在太平洋夺取了胜利，但是我们也播下了罪恶的种子。”

社论性的推测极为严重。《芝加哥论坛报》写道：“整座城市和全城的人不是不可能在一秒钟内被仅仅一枚炸弹所毁灭。”《堪萨斯城明星报》说：“我们正在对付一种可能倾覆文明的发明。”在圣路易斯，《圣路易邮报》发出警告说，科学可能已“签发了哺乳动物世界的死亡证书，并订立契约把已变为废墟的地球转让给蚂蚁”。《华盛顿邮报》在题为《闹鬼的森林》的社论中说，随着杜鲁门新型炸弹的发现，所有科学幻想小说的虚构的最丑恶的恐怖事物似乎都已变成了真的。

8月的华盛顿，天气变得异常凉爽，晚间可以睡个好觉。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评论道，善于思考的人们睡得并不踏实。

“我们的一些科学家说，这一地区（广岛）今后多年内无法住人，因为原子弹爆炸引起放射性污染，地面的动物生命遭到破坏。”李海海军上将写道，他先于总统飞回华盛顿。“将来这种原子行动可能产生的致命作用是可怕的。虽然我们首先拥有了它，但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将来也肯定会研制它，并有可能用来对付我们。”

罗伯特·奥本海默曾预计死亡的总人数可能是2万。8月8日来自关岛的最初报告称，广岛的6%已被夷为平地，伤亡人数可能高达20万。最终的估计是，8万人当即身亡，另外5万到6万人在以后几个月内死去。在这总数中，也许1万人为日本士兵。

另有数千人遭到骇人听闻的热烧灼、冲击波和射线毒害的伤害。在后来的报道中，有人亲眼看到，站立着的人被烧成焦炭，鸟类在半空中燃烧，妇女的“皮肤像和服一样挂在身上”，尖叫着跳进河里。一名5年级女孩记得：“我不知叫过多少次，恳求他们砍下我烧伤的胳膊和腿。”

曾写过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柏林的墓地闲逛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现在把原子弹写成是“结束一切最后通牒的最后通牒”。因为这可能只是从科学家和军人通力合作的实验室库房里取出的一个小样品而已。

还没有一个人在谴责美国的科学家、军人或总统。

8月7日下午接近5点时，“奥古斯塔”号抵达诺福克。杜鲁门立即离舰并乘专列向华盛顿驶去，8日上午，全国上下都知道他已回到办公桌前。此时，日本仍没有说什么话，既没有乞求饶恕，也没有投降的迹象。在五角大楼，史汀生和马歇尔私下里很担心，炸弹是否没有获得预期的震动效应。

8月9日报纸上刊载了更加惊人的消息。百万俄军开进了满洲里——俄国对日作战了——而且第二颗原子弹投在了日本的主要海港长崎。

没有召开过关于第二颗原子弹的高层会议。杜鲁门没有再作过另外的决定。除了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军事指令之外没有发布任何命令，这项指令是

由马歇尔的代表托马斯·T·汉迪将军于7月25日送给太平洋战区的负责指挥官、第二十航空队卡尔·A·斯帕茨将军的。指令的第二段写道：“计划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一旦完成就立即把另外的一些炸弹投向上述那些目标……”第二颗炸弹——绰号为“胖子”的钚弹——已准备就绪，从提尼安岛“发出”，考虑到天气条件，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天。

后来的估计表明，长崎共有7万人死亡。如果不是投弹手偏离目标两英里，破坏程度会更加严重。

“日本人在4天之中再次感受到这种可怕武器的惊人效果。”《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和大多数其他报纸一样，它暗示结束战争已指日可待。在国会山，典型的反应是“现在战争不会拖很久了”。

华盛顿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佐治亚州参议员小理查德·B·拉塞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称，对日本人的攻击一定不能停顿。

让我们将战争进行下去，直至他们乞求接受无条件投降。敌人对珍珠港的罪恶袭击把我们拖入了战争，我看不到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说明我们对付日本人应比对付德国人更加体谅和宽恕得多。……如果我们手中没有足够数量的原子弹可以用来立即结束战争，那就让我们在原子弹生产出来之前继续使用TNT和燃烧弹吧……只要敌人还握着手中所有的牌，这就是总体战争。今天，美国人用鲜血、财富和事业心使我们占了上风，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改变规则呢？……杜鲁门在同一天，即8月9日用自己的肺腑之言书面答复了拉塞尔：

我知道日本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度残忍和野蛮的民族。但是，我无法使自己认为，因为他们是畜生就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就我本人而言，我确实为由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愚蠢”而必须消灭它的全体国民这一点感到抱歉。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的意见是，俄国人加入战争后，日本人不久就会投降。

我的目标是挽救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的生命，但我对日本的妇女和儿童也有人道主义的情感。

那天夜里，他在有关波茨坦会议的广播讲话中，特意力劝全体日本百姓立即撤离工业城市以保住自己的生命。他告诉美国人民：“我了解原子弹的悲剧性意义。”

我国政府不会轻易生产和使用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正在研究它……我们先于德国人发明了它。

我们发明了原子弹并使用了它。我们用它对付那些偷袭了珍珠港的人，对付那些用饥饿折磨、毒打直至处死美国战俘的人，对付那些口是心非，完全违背了国际战争法的人。我们使用它是为了减少战争带来的痛苦，是为了挽救成千上万美国青年的生命。

我们将继续使用它，直至我们完全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有日本投降才能阻止我们使用它。

长崎被炸的当天上午，日本战争最高指挥委员会在东京皇宫外铃木首相的防空洞里召开了一次至关紧要的会议。三名有实权的军事指挥官（两名陆军将军，一名海军将军）激烈争辩，反对投降，致使会议陷入僵局。现在是

把美国人“引诱”上岸的时候。防卫厅长官阿南将军主张在日本国土上进行最后决战——这是民族尊严所要求的，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尊严所要求的，“让整个民族像美丽的鲜花一样被毁坏不是很精彩吗？”他问道。但是，当长崎的消息传来后，会议休会，然后，当天夜里在皇家图书馆复会，天皇参加了会议。最后，在长崎被炸后不到24小时，由裕仁作出了决定。他说，他们必须“忍受这不能忍受之事”并且投降。

只要了解到天皇仍将会是君主，日本政府就会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0日星期五早晨，杜鲁门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6点30分，当他正准备离开自己的住所时，陆军部传令兵送来一份无线电电报稿。贝尔纳斯、史汀生、李海和福雷斯特被召集去参加9点钟的一次会议。“我们能在保留天皇的同时还指望消除日本的好战精神吗？”杜鲁门后来写道。“我们能附有这样大的‘但是’的电文当作那种我们进行战斗以求实现的无条件投降吗？”

史汀生和以前一样，说应该允许天皇存在下去。他认为这是唯一的审慎做法。李海表示同意。贝尔纳斯坚决反对。他坚持不折不扣的无条件投降，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一致赞成的方针，而且他确信，美国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他提醒大家，三巨头在波茨坦已要求无条件投降。他不能理解：“在波茨坦时，我们没有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参战，我们尚能如此，而今天为什么反而要后退呢。”杜鲁门要求看一下波茨坦声明。

福雷斯特认为，在措辞方面变动一下或许可使条件变得让人可以接受，而这一点引起了杜鲁门的共鸣。

他决定否定贝尔纳斯的意见。他决定，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如果日本想保留天皇，那么“我们‘就要告诉’他们如何保留他”。如贝尔纳斯用言词表达的那样，正式的答复声称，天皇可以保留，但“须经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同意”。即使这不是无条件投降，于此也非常接近了。这与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一个月前告诫东京的情况完全相同。

在当天下午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以最明确的信心汇报了这些事态发展，并通报了各个同盟国政府。同时，他下令未经他特别许可不再使用原子弹（当时还有一颗原子弹可供使用）。他说，再毁掉一座城市的想法太可怕。他讨厌杀掉“所有那些年轻人”的想法。

杜鲁门后来对亨利·华莱士说，几天来他头疼得厉害。华莱士问是“真的头疼还是借喻它事”？杜鲁门说：“两者兼而有之。”

艾德礼当晚来电表示同意，但澳大利亚人却坚决反对。“天皇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所负的责任不应该豁免……除非这个制度垮台，否则日本人就不会改变，他们在太平洋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将只不过是推迟到下一代去而已。”

同时，令人心碎的消息在华盛顿传播开来，提醒全国人民，战争仍在继续。7月29日夜，曾将广岛原子弹的核心部分运抵提尼安岛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遭到日本潜艇鱼雷的袭击，军舰在几分钟内沉没，数百名水兵随舰沉入海底，另有数百人在海上漂流。他们在水中泡了好几天，许多人被鲨鱼吞掉了。在救生船到达时，已有800人丧命。

第二天，8月11日星期六的上午，蒋介石来电表示同意，澳大利亚人也勉强同意了。苏联人看来在拖延，以期在控制日本方面有些发言权，并继续向满洲挺进，但斯大林最终也同意了。正式的答复传送给了东京。接着开始了等待。

贝丝·杜鲁门从独立城来到了白宫；在离开了两个多月后，他们在外表上恢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星期天，杜鲁门坐在桌前写信。这天是他妹妹的生日。他告诉她，他本该较早就写，但他实在太忙了。“几乎每一次危机看起来都是最严重的一次，但是在它过去以后，却发现它原来并不那么糟糕……”

在记者们眼里，他异常地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他能从容不迫地对待和处理“一系列紧张刺激的事件，静观战争的结束”，其方式明显缺乏吸引人的技巧却又注重事实。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贝尔纳斯国务卿，他从隔壁的昏暗的旧国务院大楼不断地进进出出，看上去有点“好冲动”。谣言四起。和平即将来临。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期待着随时发布消息。

但是星期天过去了，却没有日本人方面的消息。13日星期一也是这样。杜鲁门向部下吐露他已命令马歇尔将军恢复B—29空袭。这天晚些时候，查利·罗斯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将继续值班到半夜。

次日上午仍然是等待。“这一天像以前几天一样开始了……记者和新闻通讯员们挤满了记者室和大厅。经过数小时的紧张等待和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些人已是疲惫不堪了。”埃本·艾尔斯写道。外面的人明显地按钟点越聚越多。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对面的拉斐特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大多数是身穿夏天制服的男女军人。

日本的答复于8月14日星期二下午4点5分送到总统那里，日本投降了。6点10分，瑞士驻华盛顿的代办来到国务院，向贝尔纳斯国务卿转交了日本的照会。贝尔纳斯当即将它带到白宫。

（照会文本本应早10分钟送到，但是由于16岁的投递员托马斯·E·琼斯在从美国无线电公司在康涅狄格大街的办事处得到此件并往瑞士公使馆递送的途中，在康涅狄格大街曾被警察拦住，请他作出U形转弯，因而耽搁了时间。）

就在将近下午7点时，记者们挤进了杜鲁门的办公室等待发布新闻。杜鲁门站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坐在他旁边的，或者站在他身后的有贝尔纳斯、李海、贝丝和大部分内阁成员以及独立城《考察家报》的休·金特里。金特里碰巧在城里，接受了贝丝请他喝午茶的邀请。杜鲁门告诉贝丝不要走远，因为她“可能收听到一则新闻报道”（她记得“他刚要去游泳。而我想，如果他能松弛一下去游个泳岂不是很好吗！”）。

由于夏时制，外面光线仍然很亮。拉斐特广场上聚集了至少一万人，他们只受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一排人数不多的警察屏障和宪兵的控制。杜鲁门身穿双排扣海军蓝西装和衬衣，佩银蓝色条纹领带和相配的手绢，显得干净利落而又合乎礼仪。记者群中有些骚动。杜鲁门面带微笑，与一两个人打着招呼。一名特工人员宣布“全到齐了”。弧光灯亮起来，为新闻摄像打光。杜鲁门看了一下钟。7点整时，他挺了挺胸，用缓慢而清晰的声音，按照握在他右手中的一页纸开始读道：“我今天下午收到了来自日本政府的照会……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盟国最高指挥官去接受投降。记者们拥向门口。杜鲁门和贝丝回到他们的住处，但是外面的庆祝越来越热闹。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厄外面装有护墙板的小房子里，玛莎·埃伦·杜鲁门向起居室的客人们说了声请原谅，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接长途电话。

“喂…喂，”一名客人听到她开始讲话的声音，“是，我很好。对，我

一直在听广播……是，我很好……如有可能请回来看看我……对，好的……再见。”

“是哈里，”她走进来说，“哈里真不错……我知道他会来电话的。在一些事发生了以后，他总要给我打电话……”

拉斐特广场上有人跳起了康茄舞。大群的人几分钟内突破军警的警戒线，越过障碍物，冲过大街，拥向白宫的围栏。陷入人群中的有轨电车和汽车顶上很快站满了穿白色军服的水兵，为的是看得更清楚一些。人们在欢呼。钟声四起。汽车喇叭嘟嘟作响，人群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杜鲁门！我们要见杜鲁门！”

总统在第一夫人陪同下走到草坪向人群挥手、微笑。欢呼声此起彼伏，他们着V型手势致意。“群情激奋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回忆道。“我和大家一样激动不已……”他和贝丝回到屋里，但外面的人还在呼唤他，所以他再次出来，走到门廊上，对着麦克风即席讲了几句话。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天，”他开始说道，“这是全世界自由政府的节日。这是法西斯和警察政府在全世界灭亡的日子。”今后的伟大任务是在全世界恢复和平并建立自由政府。“我们需要你们大家的帮助。而且我知道我们会做到的。”赞许的欢呼声又一次在树林中回响，不管他说些什么都会是这样。

他再次穿过草坪，来到离高高的铁围栏很近的地方，他微笑着，不断地挥手致意，胳膊都举酸了。这是华盛顿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欢庆之夜，人声鼎沸，群情激昂。50万人走上街头。白宫周围拥挤的人群增至5万多人。第二天的报纸曾报道称，一名兴高采烈的士兵搂住一位老百姓喊道：“现在我们都是老百姓了！”

上任仅三个月，哈里·杜鲁门面对着历史发展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作出了比他的前任更伟大、更困难和更具深远意义的决策。不论林肯在上任之初，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上任后混乱的头一百天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都不能同他遇到的这些突发的如此重大的问题相比。早在少年时代，杜鲁门就仔细阅读过《大男人和名女人》和《富豪的生活》，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这一见解他从未改变过。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始终是守旧的。但如果有人陷入过并非自己制造的漩涡，那这个人就是他。“我们不能逃避战争的结果。”斯大林在波茨坦这样说过，而正是这种结果从杜鲁门在威尔逊画像下举起右手宣誓就职的那天夜里开始就一直困扰着他。联合国的创建，苏联红军在东欧威胁性的存在，英国的衰败，已显示出的大规模毁灭的恐怖，柏林的废墟，在新墨西哥州、广岛和长崎的核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都是战争的结果，实际上他本人目前的任务也是战争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这一前提，如同多数人那样，那么就应该认识到，夺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生命的正是战争所造成的过度劳累。

在人类活动的漫长过程中，最引人注意的首先是包括人性在内的基本要素的延续性，人性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多大变化，这是杜鲁门阅读历史后得出的结论。“世界上唯一的新事物是你不了解的那段历史。”有一天他对一位采访者说。显然，在历史最重大的一个转折关头，史无前例的权力和责任落到了他的身上，原子弹和蘑菇云赫然耸现的阴影确实是世界的“新事物”。旧的准则不再适用。欧洲成了一片废墟，英国作为世界强国已经完蛋，亚洲遭到了破坏并处于可怕的混乱状态。又有谁来评说斯大林呢？

杜鲁门只有过一次想到，历史与他所说的也许不同，历史有它自己的方向和力量——如威拉·卡瑟笔下的“超过人类的力量”，卡瑟描述了早期世界冲突开始时的情况及其对像他这样来自美国中心地带的许多小城镇人生活的影响。在8月17日写给母亲的信中，杜鲁门将过去的几天称作是“令人晕眩的漩涡”，他置身于漩涡的中心，奋力想做些事情。

“以前每个人都一直在以极快的步调行走，”他写道，“而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挺起胸来散步了。”

